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阿拉法特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导 言

这本书介绍同一名字的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以色列神话中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活生生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按照以色列官方看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暗杀者的辛迪加”，其领袖是一个“心怀无穷仇恨”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试图来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所开始的事业。这就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辩护士们告诉以色列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故事。上述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描述，出自以色列政府官方发言人之口，当时梅纳赫姆·贝京任政府总理。对阿拉法特的描述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一史实。同时提出三个论断。这些论断必然会引起许多尖锐的争论。

第一个论断是，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范围内，没有一位阿拉伯或犹太领导人，像阿拉法特那样做了那么多事情，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准备基础。

第二个论断是，阿拉法特曾表示，他要劝说他的同事和人民，为取得同以色列的和平相处，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具体的实际利益，而作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让步。如果当时以色列有一位老练的、有胆识的领袖能作出相应的反应，那么，1980年就会得致全面解决，甚至更快些。

第三个论断是，尽管阿拉法特已难以向其日益失望的人民证实政治解决和妥协能够取得成果，但阿拉法特仍不失为阿拉伯方面掌握和平钥匙的人。在最近的将来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华盛顿政府，能否明智地帮助阿拉法特使用这把钥匙而不是迫使他扔掉钥匙。

我希望支持这三个结论的根据，将有助于推动寻求中东和平途径的更有知识和更为诚实的讨论，而不要等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为时太晚的时候。

显然，阿拉法特仍然是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的主要暗杀目标，因而有些读者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出版者就曾问过，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甚至密切到让我了解他过去的秘密以及他的组织的内幕？

回答是很直率的，但要书写成文字却非易事。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创议写这本书的是我，别无他人。我花了两年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请他腾出足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使我能写成这本书。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三位最高级的同事——阿布·杰哈德、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协助，我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我努力说服他们，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

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方面是，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化。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富有感情的人，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我感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使他变得脆弱。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而是说他容易被伤害。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我认为，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我曾告诉他，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只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有两位是国防部长。我还告诉他，我和果尔达·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为此，我得了一个绰号——“果尔达的男朋友”。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我总要

先送她一束红玫瑰。

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主要事实如下。1979 年底，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但是最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计划。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些领导人一方之间，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在以色列这方密谋和平的关键人物，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工党的领导人。

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色列人，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 12~18 个月，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他一上任，我的计划就告吹了。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也被看成是叛逆。

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写报道的日子里，曾有多次机会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只是由于和平计划才使我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而他也决心给我以一定信任。

当和平计划夭折后，我才研究并决定写这本书。这一计划流产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确已取得一些坚实进展。在我第二次穿梭会见阿拉法特后，一位以色列人士对我说，“我们正使生米成为熟饭。”假如贝京不连任，那么以色列工党政府有很大可能授权和阿拉法特进行秘密的、直接的谈话。如果那样，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

我把写作此书看成是我本人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贡献的继续。我要表明，我是作为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真诚朋友而写这本书的。我对这两个民族都怀有深厚的爱。

一般说来，犹太人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中的知识精华。同样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华。这两个来自各种族融合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使这一地区得到更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

要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公正的待遇——历史的、合法的和道义的权利。这种公正待遇至少应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家园的权利。必须指出，按照这一方案，在协商进程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承认以色列，其代价是取得原曾属于他们的全部土地的不到 30%。同意这一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它在国际关系中信奉的首要准则：强权即公理，而正义只是强权者空口说说的抽象概念。正是由于一些强国的须导人和政府，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致使我们这些 20 世纪后期的人类，行走在灾难的旅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鼓舞的含义。当公理战胜强权得以证实的时候，那么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以色列首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说，犹太人“只有保持他们的道德、精神和知识水平”才能得以生存。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本·古里安所描绘的他们的生存途径，已被近几届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行动是对全体犹太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一种讽刺。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列愿意放弃信奉强权即公理，那么它必将得益甚多，同时也有益于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

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击溃，此后它使用了恐怖武器以表明巴勒斯坦事业继续存在。阿拉法特发出许多信号中的第一个信号，即表明他决心劝说解放运动面对现实（即以以色列得以在1967年前的边界内生存）作出让步。从那时起，在巴勒斯坦方面，阿拉法特即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阿拉法特需要以色列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相应的反响，至少在原则上应接受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每当阿拉法特朝着和解方向采取政治行动时，以色列却报以枪弹和炮轰。阿拉法特表明他希望政治和解的意愿越多，以色列就越加变得决心摧毁巴勒斯坦政治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顺便还要说说，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袖们从未真正把巴解组织视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有资格作权威性发言的人就是布赖恩·厄克特。多年前他曾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久就退休了。在其任职时，他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四位秘书长。他主要在幕后活动，是联合国主管处理危机的负责人，擅长于中东事务。在外交界，他被称为“中东先生”。很难想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能成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卓著专家。作为外交家，厄克特坦率得令人惊讶，并使人耳目一新。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不为梅纳赫姆·贝京威胁所吓倒的非犹太人。在一次庆典场合，他刚刚从贝鲁特全见阿拉法特后来到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贝京指责厄克特，并告诉他以后不许再与阿拉法特谈话。厄克特答道：“总理先生，我是国际社会的公仆。你竟然教训我能同谁和不能同谁谈后，难道不感到太过分了吗？”当然，贝京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厄克特说：“以色列有制造神话的才能，并使世人当成真理来接受。他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大神话。事实不是这样。他们可以像对待双手被缚在背后的人那样来对待作为军事力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真正害怕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74年以来，以色列拒不采用外交办法来考察和对待现实及阿拉法特的政治和解主张。这是实现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也是继续进行屠杀使这一地区长期浸于血泊之中的主要原因。

1974年阿拉法特开始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说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认识实行和解的需要，自此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都拒绝考虑即使是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微型国家的想法。它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将对以色列的安全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以色列的这种奇特断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亨利·基辛格却成了其学舌者。

在我执行我的中东和平计划期间，我发现，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部门有数量惊人的并在日益增长的最高级领导人，私下都表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难以对付的威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举出他们中的一位，即陆军少将施罗莫·盖西特。我之选中他，可以这么说：他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对以色列形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最知情的以色列人。

盖西特任军事情报署研究室主任多年。在这个岗位上，加上他能从莫萨德——以色列中央情报安全局那里获得有关的情报和消息，他可能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了解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曾短期担任1967年以色列所占领土军事长官。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事与愿违，他被委任为

军事情报局局长。他接受的任务是不仅要管理这个机构，而且要改组它，以便这类失误不再发生，即对以色列未能预料到 1973 年战争的部分指责。对盖西特来说，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机构需要帮助时，显现出此人的素质、能力及判断力。以自己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轻易排斥一个人的深思熟虑的意见，是愚蠢的。

在我同盖西特的一次谈后中，他的一段评论对这本书很有启示。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的困难是，我们已成为自己宣传的牺牲品。”盖西特的评论的含义是指责历届以色列政府，在关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军事威胁的实质问题上，欺骗了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很多的人们。我相信，同熟谙内情的一些以色列人一起，通过对全部有关情报进行诚实、客观的研究，盖西特的指控即可得到证实。除了 1948 年的几个星期，当时新生的犹太国正为其生存而战斗，以色列从未有过被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联合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危险。

1967 年的“六天战争”，是对历届以色列政府如何掩盖事实真相以便煽起大规模的、言过其实的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恐惧的最好证明。1967 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我在以色列，我可以证实当时以色列人完全地、真正地相信他们将受到阿拉伯人的进攻。他们所能获悉的所有消息和证据，证明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的军队已经动员起来；阿拉伯世界官方电台接二连三地渲染犹太国很快要被“毁灭”。但是以色列军方及政界领导人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无意进攻，而是在玩弄唬人的化招。事实上是以色列人帮助设计了这一圈套，使纳赛尔陷进去了。

这次战争对所有阿拉伯人是不堪设想的耻辱，也给阿拉法特一个机会，得以在被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带有一定勉强的支持下，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战后不久，一位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告诉我，如果不是纳赛尔给以色列进攻阿拉伯以借口，那么以色列将会另找理由制造“6 至 10 个月之内”的战争。因为其军事策划者们认定，袭击苏联装备的大量阿拉伯装甲部队的时机已经到来。数月之后，事情就表达得更明白了，一位身份不亚于伊扎克·拉宾的人公开确认，以色列知道纳赛尔是在唬人。拉宾作为参谋长为以色列策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他接替果尔达·梅厄担任总理。1968 年 2 月，拉宾在致《世界报》的一份声明中也十分坦率地承认：“我们知道纳赛尔不想进攻。”

作为以色列人受自己政府洗脑的结果，包括经常放映大屠杀的影片，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怀有恐惧。鉴于犹太人的历史，也鉴于以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恐惧缺乏真实基础，当冲突的客观事实经过理智思考检验后，就会显示出这点。看来明显的结论是：唯有以色列人民不再做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时，和平才有可能。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打开某些以色列人的眼界，我的劳动将是值得的。

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没有给我的工作以捷径。他们不曾说过：“来，请坐下，我们已准备好向你披露我们的秘密。”从开始起我能获得多少内幕情况，依靠的是两件东西。一是我同他们交谈的能力，二是我询问的质量。当我得到线索时，常常比我得到对在某一危机特定时刻真实发生的一切详细介绍更为满意。此时，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以得出 2 加 2 等于 4 的正确结论。

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阿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以如实介绍作为当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传略开始。随后简要叙述为什么会出现巴勒斯坦问题。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真实性质，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几乎从未被入问及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建立以色列国？正如巴勒斯坦人所说，这是一个奇妙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

第二部分，“地下年代”，叙述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他与阿拉伯前线国家情报机构的冲突，他和其他人一起着手建立地下基层组织网，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解放组织。阿拉伯前线国家方面不希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通常并不明言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无意同以色列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无论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讲得如何与此不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地下年代，另一个矛盾是发生在阿拉法特和法塔赫集体领导中不同意其军事战略的多数同事之间。阿拉法特是真正相信巴勒斯坦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得到解放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他坚持采取军事行动，又怎么能在将其意志影响他人方面取得成功？

第三部分，“斗争”，这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阿拉法特如何没有用许多场战斗去解放巴勒斯坦，而是更多地用于保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存在。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然后是以色列，都力图取消巴勒斯坦事业。在这些年头里，阿拉法特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判断什么时候超级大国是他的敌人，什么时候又成了朋友。这里也有关于阿拉法特领导能力的传奇故事，即他如何说服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和人民，为了同以色列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和为巴勒斯坦人民取得某些实际利益而作出难以想象的让步。

我所要研究和写作的是一部阿拉法特的传记。在这里，可以这么说，我是想以人的故事来统率政治上的戏剧性事件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失败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不时常停下来解释阿拉伯国家内部和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情况——而这些情况又是他必须掌握的——那么就完全不可能弄懂阿拉法特的用意。我认为就是这些必须的注意力的转移，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实质内容。我希望他们将能使本书读者不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实质，而且理解为什么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象征，至少是衡量正义的尺度，仅仅他的存在，迄今为止就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惊人的成就。有一次在白宫的草坪上，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在政治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这点来看，并且考虑到不利形势，可以这样说，阿拉法特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幸存者。如果他不是巴勒斯坦人，我想犹太人将第一个向他致敬。

为了方便不熟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及巴勒斯坦各组织名称的读者，我在书后附了一份主要人物及组织的名单。

在寻求中东和平道路上，此书如能有助于促进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更为真诚的讨论，那要充分感谢所有那些给了我时间、信任和友谊的巴勒斯坦朋友们。

我还必需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我就不能完成此书的写作。第一个是我的银行经理，他允许我为了旅行、工作和生活得以大量透支。第二个人是我的妻子尼科尔，她支持甚至鼓励我决定以我们的住房作为透支的抵押。她是我调研的助手和图书管理员。她将谈话录音复写成文字，这些谈话录音带提供了主要资料来源。她为我最后的手稿打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将此书

首先奉献给她。但我们同意根据需要作了另外一条献辞。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詹恩·海勒。显然，这是一本最易引起争论的书。可以这样说，本书故事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片布雷区，詹恩帮助我跨越过去而未触雷。

第 四 版 序 言

对过去 40 年中绝大多数时日来说,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知情的和理智的公开讨论及研究如何结束这场冲突,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问题,总起来说,是北美和西欧的主要宣传媒介和大的出版社封锁这类情况,以色列的绝对支持者认为这种情况给予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和要求以合法性。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我要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保持缄默的密约必须被打破。

在缺乏通过谈判结束阿—以冲突的情况下——条件是将满足以色列的真正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自决的合法要求——中东是一个正在俟机发生爆炸的地区。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地区的末日是可预见的,但仍可防止,其情景的轮廓如下:

以色列拒绝从它在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几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这种撤出是联合国安理会 242 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所要求的。而在阿拉伯方面,对于以色列能被说服同意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信念彻底消失。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场剧变,表现为现存阿拉伯制度(它曾长期准备谋求一项同以色列的体面的和解)的推翻和它由革命的政权所取代,这些革命的政权将准备采用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对抗这个犹太国。

1971 年,果尔达·梅厄在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准备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这个题目,即以以色列如果在战场上面临某种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她说的话促使我提出下面补充的问题:“总理,你是在说,以色列将准备把这个地区甚至把整个世界同它一起砸得粉碎吗?”她毫无迟疑地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正在说的确切的意思。”在这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社论力劝它的读者们赞同梅厄夫人所陈述的任何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在一个末日到来的情况下会怎样作出反应……报以一个核的玛萨达¹。

地区大战的前景,正在成为在北美、西欧(无疑的也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苏联)的讨论会上进行议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真正的专家们似乎同意,如果以色列使用它的核武器,大概将会有不下于 4000 万阿拉伯人被杀害。但是,这个状况和犹太国的消失很可能仅仅是全球性灾难的开始。即使两个超级大国能够避免陷入最后一轮冲突,在中东的这样一场爆炸的后果不会局限于这一地区。随着失去阿拉伯的石油、贸易和金融,全球的经济将会遭受一种打击,各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将会瘫痪。在一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当领导人力图维持一个表面的秩序时,在西方被认为的民主将被独裁主义所代替。在某种情况下,世界会需要一个替罪羊,会出现反对各地犹太人的另一个巨大的转折。

我试图在这一序言中提出一个非常简明的论点,这就是,在地球行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与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利害攸关。冒着作为一个危言耸听者被打发的危险,我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一地区一场爆炸可能产生的后果,目的是强调对通向和平之路——在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迟之前——进行理智的讨论的紧迫需要。而要举行这样一种讨论,除非公众舆论,特别是在美国的公众舆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较好的了解:……

¹ 玛萨达(Masada),希伯来语,地名。它以巴勒斯坦靠近死海的一片岩石各字命名,犹太一教派的信徒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最后的抵抗。——译注

他是谁，他真正地代表着什么；他曾经如何冒着他的信誉和生命危险使他的人民准备接受这不可思议的事——同以色列和解；还有，最为重要的，只要犹太国和它的美国盟友会允许他这样做，他会以和平的名义提供些什么。

校 译 者 的 话

深受沉重民族灾难的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进行长期正义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史诗，产生了众多民族英雄和杰出人民领袖，构成了当代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一幅特别感人的画卷。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巴勒斯坦朋友从 50 年代起有过多年接触。1987 年 5 月，阿拉法特主席在和我作过一次较长时间交谈以后，嘱其办公室主任赠送了我一些关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书籍。其中，英国作家阿兰·哈特所著《阿拉法特》一书深深吸引了我。我感到促成此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对从较多方面和较深层次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形势发展，进一步加深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和中巴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会是有益的。值得高兴的是，阿兰·哈特先生也通过我们的朋友尤素夫·拉吉布大使告诉我们他希望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殷切意愿，并热心地在 1989 年给我们及时寄来了当年在美国首次出版的这本书的最新版本。经过译者的辛勤工作，出版社同志的积极努力，巴勒斯坦朋友、作者和尤素夫·拉吉布大使的鼓励和协助，这本最新版本传记及时在 1990 年纪念巴勒斯坦革命 25 周年的日子里问世了。这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表达我们共同对正在继续奋力进行的受到世界人民瞩目的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一种关切、一份奉献。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阿拉法特的一生，是巴勒斯坦人民在遭遇近代史上罕见的苦难、艰危和复杂处境下，为了争取民族生存、恢复合法权利，进行长期英勇卓绝斗争，经历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程的一个缩影。巴勒斯坦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公正、合理解决，根源在于以色列坚持对巴勒斯坦的侵略、扩张政策。巴勒斯坦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历史，包括近三年的被占领土的人民起义，揭示了一个真理：受侵略、压迫的民族是不可能用武力征服的，最终必将获得独立和解放。而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也是不自由的。受以色列侵略、扩张之害的固然是但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而且也有以色列人民。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标志着巴勒斯坦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阿拉法特为主席的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和领导核心，在总结几十年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近几年来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灵活的政策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实际步骤，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崇高赞誉，取得许多突破性的成就。以色列空前孤立。以色列越来越多的人民也日益觉醒，反对当局侵略、扩张政策。“多行不义必自毙。”以色列现在是必须改弦易辙、正视历史现实、对巴解组织的一系列和平建议作出积极响应的时候了。以色列必须撤出 1967 年以来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必须恢复，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国应互相承认，通过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进行谈判，以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中东各国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中东曾是人类古文明摇篮之一。困扰中东几十年的问题一旦得以公正、合理解决，将对这一地区和世界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团结奋斗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必胜。尽管道路漫长、崎岖，中国和世界人民深信这一天必将来到。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交。中国人民一贯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中巴人民之间有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友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亲切会见巴勒斯坦朋友。邓小平主席在 1989 年 10 月 5 日会

见阿拉法特总统时说：“我们是几十年如一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典范。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们争取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将近4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间相当。应该说我们是40年如一日的朋友。再过40年，我们就是80年如一日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这既总结了历史，又深情地阐明了未来，反映了中巴关系的实质和两国人民的心愿。

本书以巴勒斯坦主要领导人、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为主轴，介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发展；巴勒斯坦革命事业艰辛、曲折、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东问题诸多错综复杂矛盾的侧面；以色列决策者的图谋及得手和失败的经历；美以关系及超级大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幕后交易；阿拉法特及其主要同事的生平、业绩和在争取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全面、公正、和平解决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立论较为客观、公正。内容丰富翔实。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问题较为关键。作者亲身接触人物较多，事件叙述深入具体。尽管也有一定局限，个别方面也有不尽确切之处，但基调是严肃的，公正的，符合和反映当今历史潮流发展趋向的。这是一本严肃的具有一定深度和较多第一手材料的关于当代中东著名人物和国际政治关系的著作。相信会对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许多历史事实、阿拉法特生平及其主张，探索、研究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关心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

谢邦定

1990年6月30日

中译本序言

曾记得 1988 年在阿尔及利亚首都与阿兰·哈特先生邂逅相遇，他问起我能否把他撰写的阿拉法特传记译成中文。特别要说的是此书被看作是歌颂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国土上展开英勇绝伦的人民起义诗篇的外一章。聆听此言，我颇觉欣喜。尤其是我的朋友谢邦定大使也在较早时候有意促成此书译成中文出版，表示乐意为此尽力相助。担负主要翻译工作的吕乃君女士和其他朋友为这本传记及时出版，作出了辛勤努力和可贵贡献。

飧读此书是颇为有益的。因为此书出自一位持中立立场作家之手，他既广交巴勒斯坦朋友，又有以色列朋友。很自然，我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既有同感，又有异议，诚如通常在诸如此类情况下发生的事一样。总而言之，这也是一本用中文出版的重要参考书。此书通过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这位巴勒斯坦革命领袖和斗争象征的传记，以作者之所见所闻涉及革命的若干方面。须知，要笔吟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丰功伟绩绝非一件容易之事。我曾亲眼目睹作者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时间会晤这位巴勒斯坦领袖，又是如何饕餮有关阿拉法特总统的资料和文献。阿拉法特是一位革命领袖和象征，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开拓者。他是一位献身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事业的伟大革命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老练的政治家，熟稔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去接受或反对某一件事物。他又是一位具有睿智和深邃远见的军事家，他对他战士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并同他们朝夕相处。这种异乎寻常的鱼水之情亦曾数十次地使他死里逃生，化险为夷。我知道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下为狂风恶浪所动摇。他把梦想变为现实，化不能为能，化能为现实，化现实为真实。终于在 1988 年 11 月 15 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1989 年 4 月 2 日，他被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一致选举为巴勒斯坦国总统。巴勒斯坦国业已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世界政治地图上，余下的只是在地理版图上略作一点勾勒而已。

此时此刻出版此书中译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正值巴勒斯坦光荣革命经历了 25 个春秋；正值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国土上英勇的人民起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正值在我国人民斗争史上翻开了崭新的光荣篇章。我国人民的斗争充满了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前后长达 70 余年。也就是从 1917 年颁布贝尔福宣言起，当时英国政府用它外交大臣贝尔福爵士的喉舌许下了一个凶多吉少和子虚乌有的诺言。它毫无法律依据，却又具有险恶用心。它违背了道德行为和国际准则，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从而损害了代表那里占 92% 人口的人民利益。

当我国人民开始发动这场光荣革命之时就迈上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腹背受敌，险象丛生。同时又要对付清剿、迫迁、斩草除根和折人意愿的种种阴谋。困难是如此之大，为人类历史所罕见。然而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的革命斗争摆脱了清剿和灭绝人寰的魔爪，使巴勒斯坦复生，同时又使一度在被占领土上和国外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几乎令人遗忘和成为十足难民的巴勒斯坦人民奋发起来，在爱国的旗帜下重新携手团结，万众一心。以阿拉法特为首的革命领导人能够发动人民、武装人民，使之众志成城，在人民心中播下了自尊、自信的种子。同时，又重新确定巴勒斯坦事业作为一个民族解放事业，不再把它看作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斗而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组织；从而巴勒斯

坦事业已成为一国人民坚持行使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事业。我们的斗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内部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势力。此外，我们的革命还担负起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世界解放运动的重任。而在这革命征途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则莫过于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宣告独立、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了。迄今为止，已得到了 100 多个国家的承认。我们的人民群众砸碎了令人憎恶的占领者的锁链，高举起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旗。近日来，我国人民欢庆英勇的人民起义二周年。在那里，我国人民开始谱写他们气吞山河、不屈不挠的斗争新篇章，重申他们决心赢取合法的民族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并且在他们的首都、不朽的那路撒冷城建立起巴勒斯坦国。自从宣布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和采取政治上的主动之后的一年间，在国际上致力于维护巴勒斯坦权利的领域内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突破。同时，能够集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继续领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展开争取合法的民族权利斗争。

巴勒斯坦人民可歌可泣的起义是当代不可多见的一场人民革命。他们是那样的坚贞不屈，以致于在世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这场气壮山河、前仆后继的起义，在现时候就是要争取独立，就是要在嗜血成性、十恶不赦的占领当局的废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这场起义，凭借它的广泛性，依靠它那巧妙的组织和自信心，必将持续下去。人民的意志日益坚强，坚持斗争，岿然不动，直至自由和独立。英勇顽强的人民起义已经使敌人的阴谋政策和计划——破产：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沙米尔的计划、美国的迂回欺骗战术。敌人施展野蛮的伎俩，反对我国人民，采用恐怖手段，诸如使用毒气、实弹射击。它使尽一切手段：诸如蹂躏、骚扰、集体惩罚、驱逐出境、威逼利诱、亵渎圣地、恣意屠杀、恐吓祈祷者，甚至在神圣殿堂内任意杀人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奇迹，他们面对这种种清剿、扼杀人民意志的阴谋，承受起这一切野蛮的行径。以色列政府又已把恐怖升级，甚至没收私人财产。同时又大搞抢劫、围困以及狂轰滥炸城市、乡村和难民营。我国人民遭受到重大损失，蒙受的牺牲也是惨重的，可是革命仍将继续，势不可挡的人民起义促使人民更加齐心协力、万众一心。这是英勇和鲜血、希望和屈意志所谱写成的一首悲壮史诗。以色列政府依仗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撑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对我国人民倒行逆施，日复一日，变本加厉。美国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庇护者、资助者、武器供应者和狼狈为奸者。现在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阿拉法特总统于 1988 年在日内瓦宣布的和平倡议。只有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抱有故意。美国为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计划喝彩，完全无视巴勒斯坦的倡议，也就是说要我们向以色列屈膝投降。那个经常喋喋不休高喊人权的美国却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无动于衷，哪怕是片刻的丝毫同情也没有。在今日，能与以色列罪犯狼狈为奸者、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沆瀣一气者，也只有美国。美国大耍欺骗术，要求我们接受投降计划，费尽心机要制止起义。至今已有 100 多个国家承认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要比承认以色列实体的国家数目多得多。美国对我们仍怀有故意，这是我们人民天天感受到的。我们人民遭到外来殖民主义移民入侵，这些人只要那里的土地，而不要那里的人民，奉行的是一项种族主义政策，完全是依仗美国的撑腰。至今美国尚未改变它的立场。我们要求美国正视巴解组织是一个捍卫正义事业的政治实

体。我们是为了保卫我们人民的权利。至于美国和以色列则竭力扼杀这些权利。甚至美国的最新建议也不过是企图把它的建议强加给巴勒斯坦代表、否认我们人民的权利、否认巴解组织的作用，却以沙米尔的计划作为解决办法的基础。我们认为，保证我们的会谈和建议走向公正解决的基础，只有以巴解组织的和平倡议为依据，它有权在国内外组成巴勒斯坦代表团。会晤的日程表是公开的，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同时，这种会晤应被看作是为召开国际会议的预备性会谈。这样的国际会议应该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

阿拉法特总统于 1989 年 10 月对中国这个友好国家进行了第七次访问。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访问从未间断过，打从革命开始之前早已开始了。1964 年亚西尔·阿拉法特由阿市·杰哈德兄弟陪同对中国作首次访问，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巴勒斯坦领导决定开始武装斗争。所以，中国是第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知晓这项决定的国家。已故的首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曾于 1965 年 8 月访问过中国，于 1965 年 3 月 22 日签订了一项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外交使团的协议。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最近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却具有特殊意义。这是他被一致地拥戴为巴勒斯坦国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他同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会晤正如以往一样是一次亲切的会晤。通常我们在友好的中国都能感受到友人的温馨、盛情的款待以及对于我们正义斗争的原则性的和热诚的支持。巴中友谊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是一种客观的和历史的必然。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为实现两国友好人民的目标而斗争的真理所赋予的。也可以说，这种友谊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我们两国都把支持世界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垄断势力在昔日和今日所奉行的掠夺政策和霸权主义的解放斗争作为两国的首要任务。中国是巴勒斯坦国天经地义的盟友。同样，巴勒斯坦国也是中国天经地义的盟友。而我们两国又都是世界各国解放运动的天经地义的盟友。巴中关系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大国与一个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小国之间关系，而且也是恪守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争取社会进步，积极支持世界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自主、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两个友好国家的莫逆之交。中国支持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立即承认巴勒斯坦国等确是生动地体现了友好的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有着坚如磐石般的战斗团结和以沫相濡的互助。我再一次申明，我们特别珍惜我们两国友好人民之间、我们巴勒斯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团结和战斗合作的关系。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曾经重申过并一如既往地强调，决心巩固、加强和维护这种历史性的关系，旨在为我们两国友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利益作出贡献。尤其是中国正值进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正处于英勇起义之际。在这里，我愿意奉告诸位，在所有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巴勒斯坦国和人民中国之间进行的协调是高水平的。我们高度评价最近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就解决中东问题所持的立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在我们多事之秋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核心。

确实如此，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武装斗争中打了五场正规战争，最长的一次阿以战争是在 1982 年打响的。人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经受了最残酷的折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然而终于把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列入解决的议程，终于迫使大同进行对话并予以重视。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历程真是巴勒斯坦革命的斗争史，真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史，真是

巴勒斯坦事业的斗争史。但是它的主题应该是“法塔赫”运动的斗争。“法塔赫”从诞生起就历经艰难，征途坎坷，破不尽敌人的阴谋暗算，但终于赢得了成功，迎来了胜利。在这漫长的斗争岁月里，亚西尔·阿拉法特兄弟展示了他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他那超凡的才能深深地烙印在全体人民和民族的心灵里。一当他向敌手挑战，就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事实，像一场政治抗衡赛中不可轻视或难以打破的纪录。尽管他身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巴勒斯坦革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尽管他的政治地位变了，但是他仍然平易近人，胜似士兵中的一员。一旦同以色列人或别的敌人打响战斗，他总是身先士卒，第一个站出来率领他的战士们上阵。随着时光流逝，他同各级组织的战友们结下了深情厚谊。早在组织决定宣布他新职之前好几年，在众战士心目中他早已是巴勒斯坦革命部队当之无愧的总司令了。自从走上领导岗位之日起，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负责，而不仅是对他的组织负责，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从一个思想传播者变为他的人民和民族的象征，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变为声威显赫、名震寰宇的领袖，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伟大的胜利。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辉煌胜利，友好的中国人民实现了独立和自由的宏图，这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气贯长虹的中国人民已经摧垮了所有的反革命势力的阴谋，并坚强有力地抵御一切帝国主义干涉内政的企图，为加强世界的安全和平、为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我衷心祝愿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更伟大的成就。同时，我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发展和在为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建设中成功、进步和繁荣。

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

尤素夫·拉吉布

1999年1月1日

献给我众多的以色列朋友和其他犹太朋友.....希望此书所讲事实能鼓励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给和平以机会。

阿拉法特传

第一编阿

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

第一章阿拉法特其人

“当你不了解阿拉法特的时候，你是不会喜欢他的。”

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出生在突尼斯的作家和外交家，名叫哈玛迪·艾四德。他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中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他认为，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他们只能依靠一掠而过的、表面的宣传形象来了解阿拉法特，因而对他产生一个不良的印象。这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此外能更多了解些什么呢？

在他凸起的、转动的眼睛下，有一个高鼻子。这在他略嫌小的面孔上，显得太大一些。他的孩子般的耳朵，在脸颊两旁也只有很小一点。他想拉拉它们吗？是的。而他那两层厚厚的、几乎是畸形的下嘴唇，毫无疑问是阿拉法特身上最不令人喜欢的地方。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下嘴唇翘起来，整个脸形成了一幅难看的漫画。总起来看，他的相貌同样是不讨人喜欢的。脸上的络腮胡子，经常好多天不刮。他看上去好像该洗澡了，衣服脏乱。而他的神情是挑战性的。他的姿势是戏剧性的、夸张并富有进攻性。他的声调经常是好战的。总之，他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平淡的、不讨人喜欢的小个子，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阿拉法特是矮个子，只有 5.4 英尺高，可能还更矮些。同前几年相比，现在关于阿拉法特形象的突出的特写少多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大腹便便。看来他的体重同他的身高和年龄还是大致相称的。他现年 59 岁。

只要时间和环境许可，出于自择，阿拉法特的衣着外表是无懈可击的。他的许多制服熨得笔挺——我在三个阿拉伯国家首都碰见过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到旅馆的洗衣间送取主席先生的衣服。他的靴子和鞋能经得起最严格的英国或印度的军士长的检查。他也非常注意他的手和指甲。

他用阿拉伯传统的花格子头巾作头饰。头巾上红色表示沙漠，黑色表示国家，白色表示城市。阿拉法特的头顶已近全秃，只剩一圈正在变灰的黑发。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要是不戴头巾或军帽，看上去就像一个和尚。事实上，假如阿拉法特被禁闭在修道院里，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比现在更简朴了。

阿拉法特最令人吃惊之处，正如所有巴勒斯坦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他的“善动特性”。无论他在那儿，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谁在一起，阿拉法特总是不安静。他的眼睛不停地巡视。这种经常的搜索是他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他的手常在忙碌。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似乎总在不停地弯曲和摆动他的膝盖，用脚打出密码的信号。巴解组织对外政策负责人哈拉德·哈桑说：“他没有一分钟是安静的。”“他不能安静。”

他有一双深沉的、棕色的眼睛。这是侦察者的眼睛，对那些有机会接近他的人，给以密切的注意和巨大的威慑力量。和他的鼻子或对危险的警觉一起，阿拉法特的眼睛是他的头号情报和安全系统，阿拉法特的首席顾问哈尼·哈桑说：“阿拉法特从不坐着，除非他已估计他是在潜伏的暗杀者的火力很难或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方。”哈尼说：“他总是不满意他第一次坐下的地方。”“有时我们都已坐定，谈得正起劲……突然，阿拉法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要求换一个座位。我们从不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我们知道，他已断定他坐的地方很容易成为一个目标。”

涉及他人身安全的问题，阿拉法特坚持他本能的感觉是他唯一最可靠的

参谋。哈尼说：“有时我们告诉他信任某某人是不明智的。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没问题。’”

阿拉法特至今还活着，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他的本能的感觉使他很少倒下。阿布·伊亚德为此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我和他讨论了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 50 多次未遂行动的详细情况。阿布·伊亚德是萨拉赫·哈拉夫的化名，是巴勒斯坦安全和反谍报机构的执行官员。我对他说：“请告诉我，为什么阿拉法特迄今还活着？他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阿布·伊亚德笑道：“我把实情和秘密告诉你。”他对我说。“60%是靠阿拉法特自己——他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30%是运气好，10%可以算在我们自己情报机构的有效作用上。”

人类的一种侦察眼力，赋予了动物被猎杀时新的自卫本能。

莫萨德至今从未利用过以色列自己的情报人员，来具体执行暗杀阿拉法特的阴谋。据阿布·伊亚德说，莫萨德通常采用恐吓的手段驱使巴勒斯坦人来干这种事。莫萨德擅长的是搞毒杀。

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构也物色一些巴勒斯坦人来干同样的勾当。这就不奇怪，阿拉法特不能轻易信赖别人。“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哈尼·哈桑说。“当一个可信赖的同伴被杀害后，他痛哭。当阿拉法特认为你可信时，他也报以忠诚。他不是那种随便调换身边工作人员的人。当你忠于他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牺牲你。”哈尼·哈桑接着说，阿拉法特非常珍惜忠诚。对那些为事业而奋斗的人，即使犯了错误和遭到失败，也倾向给予宽容和谅解——只要他们忠实于他。

为什么阿拉法特能够避过许多杀害他的企图和阴谋而得以幸存，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行动保密。阿布·伊亚德说：“当主席乘汽车或飞机要从甲地到乙地时，就连我们这些最接近他的人也不知道他何时动身。”

有一回，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有幸和阿拉法特一起乘飞机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他是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参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安排我和阿拉法特一起旅行的是哈拉德·哈桑。哈拉德花了很大力气勉强说服了阿拉法特，同意我和他一起旅行。哈拉德让我做好出发的准备。晚上 6 点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现在你必须耐心。”“也许 12 分钟以后会来电话，但也可能 12 小时以后。”

午夜 12 时 25 分电话来了。由于从住处到机场的距离阿拉法特两倍于我，我想他已经走在路上。很明显这意味着如果我这方面迟到将造成麻烦。至于我，我不必担心。有人为我计划并计算行程时间以便最后一秒钟准时到达机场。我乘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轿车在贵宾室门口停下时，阿拉法特在 6 名保镖护卫下正从一辆黑色的装甲奔驰车里走出来。在不到 30 米远处，一架中型的沙特阿拉伯喷气客机的发动机已起动，准备起飞。不到两分钟，我们全部登上飞机，而这架沙特阿拉伯飞机也完成滑行起飞了。

我的印象是，在机舱门完全关闭以前，我们已开始滑行。在有关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许许多多神话中，有一则是说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可能拥有一个包括 5~7 架客机的机队。事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旅行是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好意借用飞机而成行的。当他提出要求时，这些国家政府就将自己飞机提供使用。在这方面他的两个主要的资助者是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当他计划空中旅行时，他遵循两个原则：有些地区他只在夜间飞越：他从不飞入贝鲁特，也不从那里起飞。事实上，自从 1982 年以来，他

也没有利用贝鲁特机场的可能性。即使在贝鲁特曾是他进出最方便之地的那些年头，为了怕被绑架或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他也从不利用那里提供的方便条件。1973年2月，以色列确曾击中一架利比亚客机，机上100人全部罹难。阿拉法特对我说：“我没有证据，但我对以色列人以为我或我们的其他领导人在飞机上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

阿拉法特多少次濒临被绑架或击中的危险，这是一件值的思索的事情。但是，我从阿拉法特本人和阿布·伊亚德那儿确曾发现，这是真实事情，以色列战斗机的驾驶员总是尽量飞得贴近他们企图攻击的客机机身，以使用视觉直接侦察机上是否坐有被认为正在旅行的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其他高级领导人。阿布·伊亚德说：“我只能断定以色列人从不相信阿拉法特或者我是在飞机上。很多次我们确在飞机上。但是以色列人自从击落了利比亚客机后，再担负不起犯另一同样错误了。如果他们确信我们是在机上，他们肯定会对我们进行迫降。”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拉法特身边一名最接近的工作人员确实死了。但这不是无数次中任何一次企图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结果。这是在1969年1月，他从安曼到巴格达的公路上，不控制自己，高速驾驶而出事的。

他走在准备去会见伊拉克总统的途中。在高功率的奔驰车里坐了3个人。正式司机在后座上睡觉，阿拉法特在开丰。在他旁边是阿布·达乌德，当时达乌德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的司令。那是早上6时30分，光线不好，雨下得很大，前窗的雨刷几乎不起作用了。可是阿拉法特感到时间晚了，他加速行驶。在他们前面，向同一方向行进的是一辆大货车。阿拉法特转动方向盘准备超车。一辆小汽车迎面快速驶来，他退到货车后面，急刹车。这时这辆奔驰车猛撞在大货车后部，车顶从车身上被掀开了。

阿布·达乌德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身材最高大的一个，他继续叙述这个故事。“在撞击前的一刹那，我们被甩到车座下边。我的鼻子流血，但我能够活动，舒展自己。阿拉法特则躺着，像睡在子宫里的胎儿，双手放在头上。他不动，也没有声音。我想他是死了。”

大约20分钟以后，阿拉法特的警卫车赶到现场。这是一辆大众小面包车，车上载有警卫人员。他们为阿拉法特和达乌德腾出一点地方，安顿好，开车送到200公里外的最近的一所医院。

阿拉法特唯一的伤处是手骨折了。他被迫留在医院两天进行手术治疗。在住院期间，伊拉克总统和其他人员都到医院亲临探视。

绝大多数阿拉法特的同事们都可以叙述一、两个关于他们乘坐阿拉法特驾驶的汽车的亲身经历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哈米德·阿布·西塔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之一，他不愿意和主席一起旅行，除非阿拉法特答应他以安全的速度行驶。有一次在同一条从安曼去巴格达的公路上，阿布·西塔强迫阿拉法特停车。“我说：‘当心，阿布·阿玛尔，如果你继续以这么高的速度开车，我们就到不了巴格达了。我们两人都会死去。我要回安曼去跟你换乘另一辆车。’用这种办法，我才迫使他缓行。”我问阿布·西塔，阿拉法特是否经历过许多公路交通事故。他说：“是的，很多。”

我要求阿拉法特自己来解释，为什么他得以避过许多致命的交通事故和暗杀阴谋而幸存下来。他同意那种说法，即他的鼻子和对危险的警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加上好运气。然而，还有比这更多的。“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本正经他说，“我相信还有某些未被察党的东西。”

阿拉法特的“好动特性”，他的不得安静的天性以及他总想做点事情的需求，是他的伟大财富之一——惊人的、非常充沛的精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为此，他被他的朋友和敌人描绘得犹如一个“非凡的人”。

阿拉法特一天工作 18 至 19 小时，已成习惯。在过去十几年中，一周工作 7 天，一年工作 365 天。“在所有这些日子里，”阿拉法特对我说，“我连想都没想过要休一、两天假。”他每天睡眠时间平均不超过 5 小时，有时还要少。当条件许可时，他宁肯分两段时间睡觉：一段是在早上大约 4 时至 7 时之间；另一段在下午 4 时至 6 时之间。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会议经常在晚上 9 时或 10 时开始，几乎总要到拂晓才结束。下午这一觉可以说明，为什么阿拉法特经常在午夜显得特别精神。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他思维和反应最好的时候。

当我为写此书完成初步调查时，显然，有关阿拉法特个人及其私生活的有用的资料，只需一张邮票的背面就够写了。出于好玩，我真的写在邮票反面。我写的是：“阿拉法特：不吸烟，不喝酒，单身汉。非常富有感情。惊人的坚韧性。”就是这些。他把自己包在秘密之中，甚至他的出生地究竟在哪个国家（更不用说哪个城市或村镇），也成为需要考察的事。

我从阿拉法特本人身上发现，把他描绘成不吸烟者，并不完全确切。“我从来没有为消遣而抽过一支纸烟或一斗烟丝，”他告诉我，“但在过去，作为我的伪装的一个部分，我曾吸过纸烟和烟斗。现在我把自己看成半吸烟者因为当我们开会时，我被不断吸烟的同志们所包围。”当阿布·伊亚德告诉我他每天要抽五六包纸烟的时候，我对阿拉法特所讲的就更能理解了。

在所有曾一度统治中东舞台的领导人中，果尔达·梅厄是最著名的不喝酒的人。当她问“你要喝点什么”时，她就给你送上了茶、咖啡或水，如果你运气好，水里还加上苏打。阿拉法特本人选择的饮料甚至比梅厄更局限。他只喝茶和水。据他的朋友们说，阿拉法特只在他心须时才喝水，经常是在有助于食物消化时喝水；而他饮茶则是在他高兴的时候。哈拉德·哈桑说：“我们的主席不是一位社交的喝茶者！”可是，茶，确切他说，他在茶里加的东西，是阿拉法特生活中一件小小的奢侈品。他喝茶时要加蜂蜜，当我们一起在萨那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时，他书桌上唯一的東西是一瓶蜂蜜。我得到一个印象，即蜂蜜对阿拉法特就像豆形胶质软糖对罗纳德·里根一样重要。

正如其他报告人和作者所发现的那样，阿拉法特极不情愿谈他的私生活。我决定利用我们单独在萨那的好机会——只有一只蜂蜜瓶在我们之间，跟他谈谈。

“有一次在科威特你将要举行婚礼了，真有其事吗？”我问他。

“有过这事。”

“你那时真的想要结婚吗？”

“是的。”

“你曾热恋过？”

略等片刻，我以为他会突然发作，以他的方式要我走开。可是没有爆发。他非常安静，说了一句“你是在逼我。”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要像我需要的那样来了解你，那么，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拉法特目光凝视着遥远的过去，然后终于转向了我。脸上的表情变了。眼里含着泪水。“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曾爱过。对我来说，决定不结

婚是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

“你的同事告诉我，你决定独身，不要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你为事业作出的最大的牺牲。”

“是这样。”

“你为什么作出这么巨大的个人牺牲？”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是，我知道，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跟我长期共处患难之中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方面。其次，我认为，我是为我所有的人民，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而作出自我牺牲的。”

“请你谈谈那位曾经要跟你结婚的妇女的情况——她真的理解吗？”

“是的，她十分理解。”

阿拉法特出乎意料地改变了语调。伤感的表情变成了调皮的微笑。

“你知道我曾有过一次婚姻吗？”他说。“那是在1967年战争之后，我正在约旦河西岸战斗。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我和我们的人被包围了。他们给我设了圈套，许多圈套。那些日子，我们的保卫工作还不太好。怎么办呢？怎么逃出去？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妻子。她扮作我的夫人。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有一个婴儿，于是我们又带上孩子。我抱着孩子，伪装成一个幸福家庭中的丈夫，带着妻儿，通过了以色列的封锁线。我们是多么愉快啊——拉着手，欢笑着。当然，我的外貌也乔装打扮了一番。或许这也是我过去曾经抽过烟的日子中的一次。”

大约就在那时，阿拉法特曾经再次闪过过结婚的念头。根据大家所说，他同情一个名叫纳蒂娅的妇女。事情是这样的，纳蒂娅的好朋友曾问她，亚西尔是否提出过。她答称没有，她也不希望这样做。由于纳蒂娅已结婚，关系就变得很复杂。虽然，她的婚姻并不如意，她和丈夫分居。然而仍然存在问题。她丈夫死了。当时他正从一个建筑工地走过，一袋水泥掉在他头上。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事故。也有些人猜测不是。

阿拉法特总是否认，他力图掩蔽的内心巨大痛苦是由于他没有妻子和自己的家庭所引起。可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认为，他身处孩子们中的欢乐心情，告诉人们另一层含义。最了解阿拉法特的妇女大概要算乌姆·杰哈德了。她是阿拉法特的副司令阿布·杰哈德漂亮而富有活力的妻子。乌姆·杰哈德跟大家说，阿拉法特特别喜欢儿童，“孩子们对阿拉法特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世界各地的代表与阿拉法特会见时，议程中的第一项常常总是关于他们的孩子。查希迪·泰尔齐是巴解组织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代表，他代表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就这个问题谈了这样的看法。“事情几乎就像审问一样。阿拉法特要知道有关我孩子的所有情况。他们在哪儿？在哪个学校上学？几年级？他们取得哪些进步？等等。有一次，我从纽约到贝鲁特，当时我们正处于很大的危机当中。阿拉法特跟往常一样，先询问我孩子的情况。我说：‘真主啊，阿布·阿马尔，我是来到这儿商讨重要政治问题的，而你所要知道的是我的孩子们在做做什么！’阿拉法特回答：‘不，不，你错了。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生命。他们的重要性并不次于我们的政治。’”

从乌姆·杰哈德讲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可以表明，阿拉法特要求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注意遵守严格纪律。1966年，在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杀害阿拉法特和控制法塔赫前夕，他和杰哈德一家在大马士革住在一起。住宅的三

楼当时几乎就是法塔赫的行动总部。

乌姆·杰哈德说：“一天，我们的儿子杰哈德不见了。他一直没有回家，我们都震惊了。有些人担心他被以色列特务绑架了。阿布·阿马尔跑下楼，带了几个人跟他一起。他们坐上汽车去寻找杰哈德。阿布·阿马尔终于找到了他。他非常生杰哈德的气，对他说：‘你父亲不会打你——可是，我要处罚你。我要打你。’接着他就这样做了。”

阿拉法特的一些终生挚友仍然强烈要求他结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他需要有妻子的照顾。我们知道这点，他也懂得……可是，他说，现在太迟了。”趋势是阿拉法特将长期是个单身汉。但是，如果他能把斗争限于政治范畴，并幸存下来，他也许还会娶一位夫人。或者他的少数朋友是这样想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当然，阿拉法特是一位穆斯林。但他不是狂热者。关于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虚构故事之一，是他曾经是狂热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成员。穆斯林兄弟会 20 年代源于埃及。它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第一次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1979 年在伊朗推翻了国王统治，取得了政权。以色列国 1948 年建立后，有些后来成为阿拉法特高级同事的人确曾在一个时候参加过兄弟会。阿拉法特没有参加，虽然他曾利用过它。

那是在萨那，我亲眼看到在宗教事务方面阿拉法特实用主义的一次有趣的体现。在离开这个古老国家首都大约 15 英里的地方，有法塔赫的基地，阿拉法特打算在那儿向他的战士们介绍一下他跟阿萨德摊牌的最新发展。阿拉法特原打算在中午时分在战士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但是，就在他将要发表演说之前，营地遭到雷电和骤雨袭击。集会推迟了。大约 4 小时后，在天气变好的时候，阿拉法特下令集合部队。他开始讲话不到几秒钟，穆斯林下午祈祷的时间就开始了。清真寺里毛拉呼唤的录音通过扩音器向外传播，震耳欲聋。起初，阿拉法特还试图同他竞赛。当毛拉暂停讲话呼吸时，阿拉法特开了一个玩笑，说真主同他达成协议了。但是，双方的竞赛太激烈了。集合的军队对两者的声音都听不清，不知哪个是阿拉法特的，哪个是毛拉的。

阿拉法特跟一位高级官员耳语了几句。此人匆匆离去。几秒后，毛拉的呼唤声中途被切断了。阿拉法特继续他的演说。

穆斯林被要求每日进行 5 次祈祷，对于阿拉法特以及其他许多繁忙的、现代化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一义务十分不便。他对这一问题同样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乌姆·杰哈德说：“他总是在早上祈祷，而且常常把一天 5 次祈祷集中在 1 次进行。”

一些比较生疏和偶尔接触阿拉法特的观察家们，认为阿拉法特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他们这样看是可以原谅的。其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对什么是玩笑的理解很单纯，几乎像孩子一样。他也会大笑。在私下交谈中，他喜欢的玩笑诸如把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描绘成蠢人。近几年来，只要时间允许，阿拉法特成了一个醉心于观看电视卡通片的人，如《疯狂的曲调》之类。他的一位受过学院教育最多的同事，有一次在突尼斯跟他开玩笑说，看卡通片是孩子的事，对巴解组织的主席来说是不太合适的，阿拉法特半开玩笑地回答，他喋喋不休地举出了世界上六七个知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姓名。他说：“你应该读读他们的著作。他们都说，看卡通片是生活在紧张状态中的人们可能的最好休息方式。他们说的是对的。你应该试试！”

阿拉法特的领导作风清新、率直，其特征是诚实而又十分富有人性。他

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如同是多情的父辈和亲爱的兄弟。他是在这一基础上，来表现他自己作为领袖的为人和领导及处理巴解组织的内部事务。正因在这一基础上，他的领导作风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所接受。

他和其他许多以封建领主方式统治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统不一样，阿拉法特既不拥有宫廷，也不喜欢头衔。人们称呼他阿拉法特主席，他并不反对，但他更喜欢叫他的化名阿布·阿马尔（阿马尔的阿文意思是“建设”）。在阿拉法特的同事们当中，不论是比他年长的还是年幼的，经常称他为“老人”。

不言而喻，阿拉法特受到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中许多同事们的爱戴。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是阿拉法特这个人，而不是政治家阿拉法特。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阿拉法特也受到许多其他知道他的巴勒斯坦人的爱戴。

阿布·杰哈德同阿拉法特一起，是后来变成法塔赫组织的地下运动的共同创建人。对了解真正的阿拉法特来说，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他说：“阿拉法特的奥秘就在于他和我们的情感融化在一起，阿拉法特不只是一个政治象征。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的恐惧、梦境和苦难之中。当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难时，阿拉法特也感到痛苦。当我们中的一位战士被杀害，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被凌割。当我们一个孩子死去，即使是自然死亡，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死去。这是真正的阿拉法特。他不仅是我们的领袖。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大家，我们感情的全部，我们力量的全部，我们弱点的全部，我们矛盾的全部。……你理解吗？”

查希迪·泰尔齐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为阿拉法特的高尚人品所倾倒。

“1982年夏天，我的妻子在纽约住院。她得了癌症，接受放射治疗。那时以色列把贝鲁特变成了人间地狱并企图杀害阿拉法特，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向领导谈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在纽约的一个同事向领导反映了。接着发生的事是，我接到了阿拉法特的电话。他对我没有把个人的困难告诉他很生气。他这样说：‘我的真主，你不认为你应该把你和你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吗？’我说，‘啊，阿布·阿马尔，我在这儿，你在那儿……。’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见你。’我再次跟他说，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当你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权利打扰你。他不再生气了。可是他说：‘你错了。你的妻子是我们的姐妹，你应该告诉我。’然后，他让我把所有的详情都告诉他。并且问我他能帮我做些什么。随后，他坚持要我把妻子的病情经常告诉他。阿拉法特的和蔼、仁慈，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对阿拉法特的一个批评是“他要包揽一切”。这一批评得到他所有同事的赞同。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的这些做法会被看成干预，令人不满。可是在阿拉法特，情况不是这样。哈拉德·哈桑说：“阿拉法特的问题——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和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事业的人。阿拉法特和我们一样是一位普通的人。这意味着什么？他有身体、头脑、心脏和灵魂；他有活力、情感和巨大的爱。他把所有这些东西百分之百地都献给了事业。也许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汉。但是，这是现实。你可以说，事业是他的妻子和情人。他全身心地献身于这位妻子和这位情人。他这种献身精神感染着你去跟随他。在这方面，我们没

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我们赶不上他。我相信，如果阿拉法特不是自己包揽一切，那么生活对他和对我们都会更轻松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人，你就会理解这个问题。”

对阿拉法特高尚人品的承认，不只来自他天然的政治盟友。1967 年以来，有影响的人物乔治·哈巴什曾是阿拉法特内部最坚决、最激进的政敌。今天哈巴什被广泛地认为是巴勒斯坦左翼政治力量中有知识的人才，正如哈拉德·哈桑被认为是右翼力量中的能人一样。然而谈到阿拉法特本人的时候，哈巴什讲的跟哈拉德·哈桑一样。“在某些方面，阿拉法特像孩子一般纯真。他哭泣，而我们真实感到他是如此动情，如此关切和如此忠诚。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我们一方，我们同他有许多政见分歧。我们常常认为他是一个讲究策略而不讲究战略的人——而这正是他的最大弱点之一。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热爱他呢？”

哈巴什也同意哈拉德·哈桑的看法，即阿拉法特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他将永远不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傀儡。

关于阿拉法特决心维护巴勒斯坦自己决定问题的独立性，哈拉德曾这样说：“1975 年萨达特对我讲，他担心阿拉法特会把自己出卖给叙利亚。这时我跟萨达特关系很密切，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你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记得我还对萨达特讲了这样一段话：‘阿拉法特本性是一位不可能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的人，如果他照镜子，如果他认为镜子里的人将控制他，他会把镜子打碎。此人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

现在暂且把他著名的、令人敬畏的性格搁置一边。阿拉法特人品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待人总是那么谦恭有礼。当你在阿拉法特也在场的任何一个地方作客时，即使他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他也从不如此忙碌或如此介入之深以致他找不到时间来确使你的需要得到注意。如果你跟他的工作人员发生了问题，他会来解决。在餐桌上，阿拉法特亲自张罗。他本人关心你的盘子里和酒杯里总要是丰盛的和满满的。

当他跟自己人在一起时，阿拉法特最不讲究形式和礼仪。但是，当他和他的同事一起会晤国家元首和政府及国际机构代表时，情况就迥然不同。在这些场合，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阿拉法特是一个热衷于遵循礼仪和外交礼节的人。

在萨那的一个晚上，我同巴解组织主席及巴解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聊天。多数人穿着宽松的敞领衬衫。只有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绿的军服，看着大家。他的军帽放在书桌上蜂蜜瓶的旁边。这时有敲门声，门从外面打开，主席通讯官的头和双肩探进屋来，他报告说，同沙特阿拉伯的无线电联络业已接通，请求阿拉法特准备与法赫德国王通话。

阿拉法特点点头，然后按照一套详尽程序检查自己的仪容。他起立并整理自己军服。我印象里，他把两条裤缝叠得笔直。他的上衣袖口一定要恰到好处，然后戴上他的军帽，并用了一点时间整理它。我和他的一些同事跟他开玩笑，他毫不在意，专心整装。可是，他仍不满意，继续用他的手掸去他肩上假想的落发。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同法赫德国王通过无线电进行一次谈话。除了阿拉法特，任何人也不在意这位主席在无线电话器前穿的衣服和裤子。可是，阿拉法特就很认真。沙特阿拉伯国王应该按照扎宾要求受到尊重——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阿拉法特仍然在科威特当建筑和承包工程师的话，他现在将成为一个大富翁。哈拉德·哈桑说：“也许是一个拥有数百万家产的富翁。”但是，阿拉法特除了花点钱买他喜欢的快车外，他把在科威特挣得的钱全部花在创建解放运动上。在地下年代，他的多数同事的收入不是维持家用，阿拉法特承担了诸如印刷、出版、出国旅行等项开支费用。哈拉德·哈桑说：“最后，他把他拥有的每一便士都用于革命事业。当要求他把全部时间用于革命斗争时，他没有同他的伙伴清算帐目就离开了他的企业，为此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有一种意见说阿拉法特是腐败的，因而引起巴解组织内部左右两派的蔑视。哈拉德·哈桑的看法是：“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清白的人。当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对此你不会有一秒钟的怀疑。”乔治·哈巴什很坚定地说：“关于我们正谈论的话题，依我看，阿拉法特是廉洁的。”

由于他完全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和他清白的声誉，自从1969年他担任巴解组织主席以来，他的绝大多数同事要求阿拉法特来负责巴解组织的财政。

虽然只有少数人在公开场合随便议论，把他们知道的看作真的。而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国家的多数阿拉伯记者，则是被他们目睹的到处贪污、腐化所强烈吸引。在私人谈话中，最了解情况、最坦率批评阿拉伯国家腐败的是埃及的洛特费克·胡利。他7次被纳赛尔政权监禁，但仍然赞佩纳赛尔。我问胡利，他如何比较阿拉法特和纳赛尔？他回答说：

“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纳赛尔有一个家，有家庭，他享受作为总统的物质上的特权，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清白的人。要是仅指这些话，他在阿拉伯领导人中是罕有的。但是，即使跟纳赛尔相比，阿拉法特也称得上是一位圣人。阿拉法特一无所有，只有他的事业。我认为，阿拉法特有一种我们当代阿拉伯人从未见过的生理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勇气。我深信，阿拉伯世界，甚至你们的世界，将会及时承认这一真理。……但是，也许直到太迟的时候才能这样。”

在阿拉法特的许多显明的品格中成为话柄的是他可怕的脾气。当他真正欢乐时，他的面孔似乎缩短了。他半眯着眼睛，皱起鼻子，咧着嘴放声大笑。当他发怒的时候，他的脸鼓得像一只充了气的气球。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警告，是他的许多同事所形容的在他那凸起的双眼里出现“闪光”。据泰尔齐说：“这就像暴风前的闪电一样。”那些最了解阿拉法特的人可以较早地察觉他即将发怒的征兆。乌姆·杰哈德说：“你可以从他的所有活动中确定地说出来。他的发怒是一种能量的散发，支配他的全身——他的双手，他的双腿，每一件东西。”

就我听到的关于阿拉法特的性情，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的脾气发作时，足以使一个陌生人相信巴解组织主席是一位暴君。他叫喊，他咒骂，用他的食指在空中挥舞。他的一位同事说：“这不是歇斯底里。阿拉法特从不歇斯底里。当他发怒时，从他身上发出的是单纯的、赤裸裸的怒气。这些怒气来自心底深处，就像钻井钻头第一下打在油和煤气的混合物上。”

在一次庆典场合，阿拉法特办公室主任以辞职来抗议这位上司发脾气。朋友们引用他的话说：“我不能再忍受这种呼喊了。仅仅为必须听取这种呼喊，我已经被搞得精疲力竭。两个星期后，主席要我回来。他向我允诺将努力不这么大声叫嚷。我知道他会努力去做——但是，我也知道，他会失败。我回来了，我在这儿……仍旧对这种叫喊厌倦。我认为它并非必要。”

也许由于他们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听得见阿拉法特声音的地方度过，他的许多高级同事们比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更宽厚些。哈拉德·哈桑说：“首先，人都有他自己的秉性。他的脾气暴躁是他性格的另一面，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他能够改变它，或者说，他应该改变。可是，我们不能。况且，这也非易事。当你像阿拉法特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事业，你需要有发泄感情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个安全阀，我很少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我毕竟有我的家庭，我的书籍，我的著作。阿布·杰哈德、阿布·伊亚德及其他人——他们也有妻子儿女。对我们来说，家庭是安慰的源泉。必要时我可以把自己遇到的挫折向妻儿倾诉。这很正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发生的情况，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为了我们事业的原因，他放弃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不要低估他所作出的牺牲。作为一个人，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阿拉法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哈拉德思考着。他说：“我看是，作为局外人可能这样看。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告诉你，实情是阿拉法特有时表现出极大的自我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超过我们其余的人控制力的总和。正是在这些场合，我对他更加钦佩。”

显然，不管怎么样，阿拉法特发怒决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当时他认为是挑衅而引起。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塔赫人士说，阿拉法特有时把发脾气作为威胁别人的武器。

我不如道阿拉法特的暴躁脾气是不是一条关于他性格中阴暗面的线索。我告诉自己，假如阿拉法特品格中有邪恶、报复的一面，我需要取得一些真正的确实存在的线索。而这可以通过了解当巴勒斯坦叛徒的叛变行为被发现时，他是如何对这些人执行纪律和进行惩罚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以色列、阿拉伯、西方和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了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为他们服务，充当他们的情报员和间谍。在以色列情报机构中的还搞暗杀。这些人渗透和潜伏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机构的各个层次中，已不是什么秘密。由莫萨德控制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的最成功之处是，他们的职务使他们得以容易地杀害阿拉法特及其他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只要他们不在最后时刻被破获或自首。

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宪章，没有主席签署的书面命令，不得处决巴勒斯坦人。阿布·伊亚德是负责同巴解组织法律部门磋商、准备判决命令并呈交阿拉法特批准的人。我请他告诉我，自从1967年以来，他向阿拉法特报送了多少这类要求签署的命令。阿布·伊亚德是1967年被委任为法塔赫安全事务负责人的。

阿布·伊亚德的回答是：“准确数字我无可奉告，因为我确实忘了。如果我按记载来回答你的问题，可以说，很多。”

我的下一个问题很明确，“阿拉法特实际签署过多少判决的命令？”

阿布·伊亚德毫不迟疑地回答，“3个或4个。”

“3个或4个？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阿布·伊亚德是这样解释“或”这个字的。直至1983年年底这段期间，阿拉法特签署过4个死刑判决书，但只处决了3个巴勒斯坦人。被判处死刑的一个突出人物是阿布·尼达尔。他的法塔赫分裂集团，暗杀了30名或者更多的支持或参与同犹太人对话的阿拉法特的同事。尼达尔受到缺席审判并被判死刑。但是，由于他至少受到两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和情报机构的保护，阿布·伊亚德的人迄今尚未把他列为执行枪决的目标。

在同一次谈话中，阿布·伊亚德主动提供了以下情况。“如果你想知道

我真实的想法，……阿拉法特的弱点是他拒绝处决叛逆者。而这正是我们内部出现这么多麻烦的主要原因。”主席的许多法塔赫的亲密同事都有相同的看法。

为了强调他对此事的看法和他受到的挫折，阿布·伊亚德告诉我，1982年轰炸贝鲁特时，沙龙将军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干掉阿拉法特。大约70个以色列特务，其中很多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装备着最新式的跟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的发报机。他们的任务是监视、跟踪并报告阿拉法特的行动。然后，以色列空军配合他们出击。幸亏阿布·伊亚德的情报人员发现了以色列的间谍网。在1名特务自首后，另外27名特务被捕获。阿布·伊亚德最可信赖的助手之一结束了这个故事：“阿布·伊亚德对阿拉法特反对处决叛徒极其厌烦，以致这次他没有寻求阿拉法特的批准。我们获得了供词。阿布·伊亚德指示我们把这些人都带走并枪决。我们执行了。”

阿布·伊亚德补充说：“我并不是抱怨，因为阿拉法特是一位善良的人。这也是他伟大力量之所在。我只是怪他在某些情况下，好得过分了。”

在领导层中有一位居稍次要地位的人，名叫哈米德·阿布·西塔，阿拉法特称他为“我的老师”。阿布·西塔是巴解组织执委会中的独立人士。他住在约旦首都安曼；在执委会中他负责处理被占领土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日常政治事务。在我同他谈话中，我提到了阿拉法特不愿处决叛徒的事。

阿布·西塔证实，他及巴解组织的地区官员曾多次要求对叛徒实施处决。“但是，阿拉法特从未签字，”他说。“主席经常提出一些其他解决办法。有时他要求我们把这人关起来。有时他把这人调到很远的地方，使他无法捣乱。阿拉法特从未允许我们开执行处决的先例。告诉你实情吧，阿拉法特憎恨流血。”

“有一次我真的跟阿拉法特生气了。我说，‘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以色列特务，我们应该抓几个典型事例，把罪大恶极的人处决。阿拉法特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真的，你应该懂得，这不是我处理事情的方法，我已经多次向你阐述过我的理由。再说，这个人有儿子和亲戚。他的三位亲属跟我一起工作。如果我们杀了他，他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将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不能签署这个文件。’”

在阿拉法特签署过的4个人的处决命令中，除其中一个搁置未办的处决阿布·尼达尔的命令以外，两个是涉及向以色列特务提供地图和情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出卖行为使以色列军队得以找到并袭击了巴解组织的基地，杀害了大量平民。另一个是以色列的最有成绩的特务，一名巴勒斯坦花花公子。他用一个伪装成发刷的无线电发报机汇报阿拉法特的行动，并险些用有毒的大米杀害了主席。一位上了年纪的天主教神父伊卜拉欣·伊亚德，是主席在个人危难时给予信任的人。据他说，当这个几乎要暗杀掉阿拉法特的特务被处决时，阿拉法特“像孩子般哭了”。“就在这一天，阿拉法特指示要确保此人家庭得到照顾。”

可以这样说，如果阿拉法特利用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对巴解组织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集团以及法塔赫组织内部的激进分子，强制执行纪律，那么，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少受许多灾难。阿拉法特的许多同事支持这一论点，包括哈拉德·哈桑，他们曾对主席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出妥协主张这一危险行为给予全力支持。但是，正如阿拉法特后来所阐明的，他有充分理由坚持不用武力解决巴解内部问题。

阿拉法特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干预并挽救了一些政敌的生命，否则他们将被他的支持者处死。有一个人多亏阿拉法特救了他的命，此人即艾哈迈德·贾布利勒。他是巴解组织内部一个很小派别的领导人，多年来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支持。当叙利亚和利比亚 1983 年指示他参与叛乱行动以反对阿拉法特时，贾布利勒成了国际宣传工具注意的中心。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贾布利勒参加巴勒斯坦地下组织时，他就是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从那时以来，他就忠实效命，干了许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的事。在 1966 年，他是为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攫取对法塔赫控制权的头面人物。贾布利勒的打算是想在阿拉法特被暗害后，由他掌握领导权。从首次反阿拉法特的政变失败时起，叙利亚决心要阿拉法特屈从于他们的意志；而贾布利勒，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他总是愿意为他们效劳去干这肮脏勾当。1974 年以后，贾布利勒依然充当叙利亚的代理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巴解组织内部破坏阿拉法特的政治行动。当他的政治图谋失败后，他就组织袭击以色列的恐怖活动。目的是给阿拉法特以及正在与以色列进行政治协商解决阿以问题的同事们找麻烦，并使他们失去信誉。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完全了解这一计划，但是，这正适应他们把巴解组织看作并描绘成一个僵硬、顽固组织的需要。从而他们可以借此指责阿拉法特，并且证明，他们拒绝通过外交途径来研究阿拉法特协商解决的主张是有理的。

1976 年贾布利勒被法塔赫军事机构捕获，他们要杀掉他。阿拉法特派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去营救他，并护送他到大马士革以保证安全。第二次是贾布利勒遭到他自己组织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谋害。在他的同伙们的围困和陷井中，他的生命两次处于危险之中。这次仍然是阿拉法特派他自己的警卫营救了贾布利勒。他们还给他一些钱，以使他逃离黎巴嫩。

哈尼·哈桑是法塔赫的执委之一。他引用阿拉法特对待贾布利勒的故事，来证明阿拉法特不是一个志在报复的人。哈尼补充说：“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如果亲兄弟是个叛徒，就可以杀掉他。可这不是阿拉法特的作法。他甚至不会花几秒钟的时间想象把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杀掉。他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做。”

哈马蒂·埃希德向我评介说，“巴勒斯坦事业总是需要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作领袖。毫无疑问，巴解组织主席就是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可以转而微笑或流泪。一些十分了解他的观察家们根据他这种天才的表演，把他称之为“计算机”。哈马蒂·埃希德越说越远，他说：“阿拉法特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方便的计算机，任何东西都不如他的反应更为真实。他自编程序。只要他一触按钮就立即对任何事件和情况作出反应。”阿拉法特肯定要以一个计算机的速度和准确性进行他的选择，但是机器不能接替人。

1983 年 2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贾布利勒发言把阿拉法特及其政策骂得一钱不值。就在这个会上，阿拉法特作了一次最生动的表演。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巴勒斯坦的流亡议会。它是巴勒斯坦最高决策机构，巴解组织是向其负责的。出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公众。阿拉法特的目的，是劝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把里根计划拒之门外，寄希望这一计划能有所改进。至少他要求最后决议不要全部拒绝里根计划。

大家知道，全部拒绝里根计划将带来困难，或者会使阿拉法特继续寻求政治协商解决成为不可能。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贾布利勒正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工作着。按照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情报机构中上级的手谕，并受到卡扎菲 3400 万美元的资助，贾布利勒力图分裂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巴解组织。那时除阿拉法特及其少数最亲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在会场中心贾布利勒的私人房间里，有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利比亚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他每天，有时是每时，同卡扎菲保持着联系。

贾布利勒在会上发言，粗暴地攻击阿拉法特及其政治主张和协商政策。在其他方面，他要求彻底拒绝里根计划；结束同侯赛因国王的对话，影射打倒侯赛因；永久停止同犹太人的一切接触。

贾布利勒继续发表他冗长的攻击，在大庭广众和辩论激烈的会议厅里，许多人都在想阿拉法特将作何反应。每当一个发言者离开讲坛时，阿拉法特总要半跨台阶去拥抱他或她，阿拉法特将如何对待贾布利勒呢？

阿拉法特采取各种姿态来表达他对别人的尊敬和赞赏。通常他采用阿拉伯传统方式表示他的欢迎和尊重——粗略地吻一下面颊和紧紧拥抱。假如你是一位好朋友，或者他要使你感到他把你当作好朋友，他会拉住你伸出来的手，轻微地扭转，使握手的两个姆指形成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要是你真正是他所钦佩和敬重的朋友，或者是他所需要的朋友，他会让他的手和你的手一起。举过他的头。

在确切判断贾布利勒已经结束他的讲话后，阿拉法特从他的座椅上站起来，急忙跨上台阶去迎接刚从讲坛上下来的贾布利勒。当他们互相贴近时，阿拉法特拥抱贾布利勒，在他面颊上亲吻三次，然后转过身来，把他们握成“v”字形的手展示给大家。当他意识到观众是在同情他时，阿拉法特举起他双手和贾布利勒的一只手。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毋庸置疑，这位“老兄”显示了他为首领。贾布利勒将不会受到更多羞辱，他只好强作微笑。

阿拉法特的伟大力量之一，在于他在被压倒和被排斥之后，奋起斗争的才能和意志。这种伟大力量，显然是他永不减退的乐观主义的产物。同这种力量同出一源的是，阿拉法特有把别人从沮丧和失望中解脱出来的才能。伊卜拉欣·伊亚德神父过去在危机时刻曾给阿拉法特以安慰和精神鼓舞。他在主席被叙利亚驱逐后几天来到突尼斯。当时即使是他，也为对前途失去信心所困扰。伊亚德神父对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并且是一位神父，但是，即使是我，在情况变得十分清楚，即阿萨德显然已下决心只要他可能，就要毁灭我们时，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失去了希望。后来我和阿拉法特相处了一些时间。说真的，安慰他应是我的工作，但是给我以新的希望的却是阿拉法特。那是令人惊奇的，阿拉法特如何以简朴的事物本质鼓舞起你自己的信心。”

很多巴勒斯坦人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哈拉德·哈桑有时是对作为政治家的阿拉法特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他曾这样说：“有时当我远离阿拉法特，而他又犯了一些我认为是愚蠢的错误时，我非常生气。有时我对自己说，‘以这样一个人当我们的领袖，我们将能作些什么呢？’然后，当我同阿拉法特在一起的时候，我惊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阿拉法特的秘密，就在于当你同他单独在一起或者同他共在一个小集体里时，感受到的他的人品的影响。这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人仅仅从宣传形象上来了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常常说他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领袖人物的超人的魅力。虽然他能在巴勒斯坦的讲台上发表感人的演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宣传工具来介绍他自己及其事业。但是，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有自己非凡的领袖人物的特色，以及在个人基础上通过同人民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工作的魔力。当他私下和个别人或少数人进行谈话时，当不需要他在许多不同观众前亮相的时候，当在闭门交谈的情况下，阿拉法特是处于最佳状态，最能打动人。事实是，每当阿拉法特在公开场合开口讲话时，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观点在 22 个阿拉伯国家的每个首都，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及东、西欧国家的首都，在巴解组织的竞争各方，在以色列，会被怎样解释。这就使阿拉法特不能在充分活动范围内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公开的演说者。他的成就是秘密的。顺便讲讲另一个故事。这可最好他说明阿拉法特惊人的规劝和领导能力。他曾劝说巴勒斯坦的决策者们准备同以色列和解以换取建立巴勒斯坦小型国家，这意味着巴勒斯坦将以有效的和平来换取少于原有家园 30% 的土地。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领导人中，对阿拉法特个人的伟大品质和力量是没有异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人们对这位主席的突出缺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这就是他所有的同事们都公认的他的“个人独断”——当他看到事态有进展可能性时，他坚持自由行动，作出个人创议。这似乎不是出自为了贪权的原因。正如哈尼·哈桑所说：“阿拉法特是有首创精神的人。这是他的工作习惯和作风。任何一个黑暗的隧道，只要他还能看到一点点光亮，他就会一直走到尽头。当他决心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你通常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

事实上，阿拉法特的个人独断问题，正是由于他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建立集体领导而存在的。如果阿拉法特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集体领导的禁锢，是否会更有利于巴勒斯坦事业，我想未来的史学家们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约 21 岁时即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这个事业，要求巴勒斯坦人改变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即使是他们得到较小程度的公正对待。这个事业，有它的悠久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以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真实生活。

第二章事业

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谁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原先的家园在哪里，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作为 1948 年以色列国建立所引起的后果，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当时几乎占 90%——感到自己要从家园出走，流落到新犹太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成为不讨人喜欢的难民？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毫不困难地从历史事实中找到。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这个字是一个总称，它包括所有居住在中东，以阿拉伯语为祖国语言的人民，而不分宗教信仰。在公元 7 世纪，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先知弟子影响下皈依伊斯兰教。但是，阿拉伯人是先于伊斯兰教的人民，他们原本是异教徒，住在中东，包括巴勒斯坦，为此，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黎明。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是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原始居民。这块土地今日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作为这块土地上最早的、真正的主人，比第一个到达这里的古代希伯来人早 2000 年，甚至更早。

在犹太神话和某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中，确实给人以这样的概念，即阿拉伯人最早在 7 世纪，我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时来到巴勒斯坦。这不是事实。正如卡唐所说：“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不包括从阿拉伯半岛进入巴勒斯坦的大批阿拉伯移民，或对这个国家的任何殖民化，其实入侵者人数很少，而且都被本地居民所同化。由于许多本地人民皈依信奉伊斯兰教，致使、（阿拉伯）基督徒的优势转化为（阿拉伯）穆斯林的优势。”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当犹太人开始流入巴勒斯坦时，当地犹太人的后裔总数为 12000 人。这些当地犹太人约在公元前 1200 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首次渗入巴勒斯坦，以后继续留在那里，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在许多世纪的历程中又陆续返回的约有 12000 人。这样，到 1880 年，在巴勒斯坦约有 24000 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又离开了。当时，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则有近 50 万。

世界历史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曾经在这个或那个时候，统治过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第一次占领巴勒斯坦也只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正如卡唐所说：“远古以来，巴勒斯坦人就是巴勒斯坦（现在称为以色列）的原始的、延续的居民。”

1919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指派金·克兰委员会调查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声称的，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占领给予了犹太人以这块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是这样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经常提出，基于 2000 年前的一次占领，他们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这种自称的最初所有权简直无法给以严肃的考虑。’事实上，24000 名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强烈反对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

《巴勒斯坦和国际法：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法律方面》第 2 版（朗曼集团，伦敦，1976 年），第 10 页。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巴勒斯坦问题的法律方面，我最近的论述是引自《巴勒斯坦和国际法》。亨利·卡唐是巴勒斯坦人，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法理学家。他的书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73 年第一次出版时，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巴勒斯坦和国际法，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法律方面》，第 48 页。

《中近东的外交》，第 2 卷（范·诺斯特朗德，纽约，1956 年），第 70 页。

一年后，在英国上议院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次辩论中，西登汉勋爵对以前和以后的许多观点作出反应说：“我完全同情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的愿望，但是，如果为此要使另一个民族承受巨大的非正义的对待，那么我认为这样的民族之家就不应该建立。巴勒斯坦并非犹太人固有的家园。它是在他们征服后占有的，而且从未没有全部人领过。现在他们则公开索要这些。他们对巴勒斯坦提不出比古罗马后裔对这个国家拥有的更为正当的要求。”

巴勒斯坦人是今天称之为以色列的国土上的最早的、合法的主人，我提出这一观点，并非建议历史的时钟能够或者应该倒退，我也不想否认 20 世纪的犹太人以人类社会的名义，有要求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权利，对这个国家和环境与犹太文化进行历史的联系，欧洲的犹太人得以在这里存在是几个世纪迫害的结果，而纳粹大屠杀使这种迫害达到了顶点，我的目的仅仅是提供历史的纪实。

犹太复国主义原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运动。它的创始者们在 19 世纪末期开始争取大国的支持。他们在 1917 年 11 月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它宣称。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英国政府愿意“尽其最大努力来协助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不做任何阿事情来损害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社会所享有的公民权和宗教权利：”

贝尔福宣言似乎包含两个承诺。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对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对这些问题有过生动的辩论。难道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许诺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许诺不相抵触吗？这个问题有点书生气，其实，当宣言出台时，英国就不想尊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许诺。

英国政策的真正目的从不公开说明或向公众宣布。但是，了解它的最好的线索，除了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在巴勒斯坦实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拒绝控制犹太人移民之外，是贝尔福于 1919 年 8 月 11 日写的备忘录中所包含的内容。他说：“在巴勒斯坦，我们并不建议去对这个国家现有居民的愿望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四大强国都互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不论其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它根源在于久远的传统，当前的需要和将来的希望。它比现在居住在那古老土地上的 70 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有着更加深远的含意。”

这里，或者说巴勒斯坦人也这样认为，是了解以色列国为什么要建立的一把钥匙。当贝尔福讲到“将来的希望”远比巴勒斯坦人的意愿和权利更重要时，他不是就谈到了那个不好开口的政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吗？

哈拉德·哈桑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如下：

“英国人及其他一些人认为世界是他们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统治和剥削。他们对作为人民的阿拉伯人或犹太人根本不个在乎。英国人把建立犹太国的计划——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励下——看作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培植一个欧洲殖民地的机会。这样一个欧洲犹太人的殖民地，将为英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服务。

《汉萨德的报告》，英国上议院，1922 年 6 月 21 日，第 121 页。

写这封信的日期是 1917 年 11 月 2 日。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 年》，第 1 辑，第 4 卷（英国文书局，伦敦）。

“英国以及其他外国战略家们，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就明显地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即使在初期，也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和因素。可以打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星星之火，到时候就会引起阿拉伯革命；一旦革命获得成功，将会诞生一些政府；这些政府将不允许英国及其他大国，为其自己利益而统治这一地区。因而，假如阿拉伯革命成功，英国及其他大国就不能再控制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资源和战略财富。我讲到的这些内容，你只要想想石油，很快就会懂得我的意思，正如你讲英文，可以证实布丁是食品一样。许多许多年以来，你们西方人掠夺阿拉伯的石油。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而偿还极少，你们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十分愚蠢。如果你们按照阿拉伯人的需要允许石油价格逐步提高，那么，世界油价的暴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等等。

“英国人及其他欧洲人，后来还有美国人，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破坏阿拉伯革命，这个机构就是犹太国。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英国及其他国家如何深信这。一机构将为他们服务，事实上这一机构确实在为他们服务。

“仅只犹太国的存在及其所表现的非正义性，对阿拉伯国家就是一个极大的骚扰，在如何对待犹太国以及它给所有阿拉伯人带来羞辱这个问题上，造成了这些国家及人民长期分裂。……当这些国家被分裂后，他们就可以操纵并使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争斗，这是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手法，这就是那些支持建立犹太国的人如意算盘。

“他们的另一个打算是，在如何对待犹太国及因此而产生的阿拉伯国家内部仆裂问题上，将大量消耗掉阿拉伯世界的智力、政治和经济能力。由此引起的后果是，阿拉伯国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实现他们的发展潜力。阿拉伯国家停留在落后和不发达的时间越长，外国列强耍弄分而治之的诡计就越容易，在如何对待以色列问题上造成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太大，以致不能形成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阿拉伯团结。如果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能够被阻止，那么，大国对中东政治、经济的控制就不会受到实质性挑战。阿拉伯国家不是任由地作出自己决定，而是发现自己变成越来越多地要依附大国的亲善意图。因为大国能够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因而他们也就能够决定在其需要时把它变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你开始看到问题的整个轮廓了吗？

“如果你从客观的立场来审视一下全部有效的证据，你会发现这一阴谋不仅是针对巴勒斯坦的——虽然我们巴勒斯坦人成了牺牲品。这一阴谋是反对整个地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的斗争不应在巴勒斯坦开始——巴勒斯坦则是斗争必须在那儿结束的唯一地方，我们的斗争应该在西方世界各国的首都开始，在莫斯科开始，……在那些帮助建立犹太国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牺牲阿拉伯人民的国家的首都开始。”

就实质和事态细节而言，巴勒斯坦人分析以色列国被建立起来的原因是正确的，在正式文件以及公开发表的一些在巴勒斯坦人问题上起主要角色作用的人的日记和传记中，证据纷陈，其所有论点都是为了得出同样的结论。

巴勒斯坦人试图发动一场全面反抗英国的起义，主要是恩使英国停止犹太移民。1936~1939年期间举行的巴勒斯坦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到1938年秋，英国约有2万军队驻扎在这个国家。英国实际上是要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不仅在战斗中失利，也损失了他们的领导人，有两三百人被监禁。许多人被放逐，另一些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杀害。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巴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对立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作为他们的掩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已中止存在，二次大战后，英国确曾允许巴勒斯坦一些政治流亡者回到他们的家园，但很清楚，他们中的多数仍然受到监视，不能自由组织起来。

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以前，大概有 2 万巴勒斯坦上层人士，尽可能多地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财富和资产，离开了他们的故乡。这些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要逃离，按照以色列权威的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仅仅是效法他们那些对斗争厌倦而离去的领袖，另一个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是接到流亡异邦的在大马士革的领导人的命令而离开的。虽然也曾有过国外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劝告特定的巴勒斯坦公众离开家园，但是，巴勒斯坦人外逃的主要原因还是对犹太恐怖主义的恐慌和惧怕。这种恐怖活动的规模是巴勒斯坦人无法相比的。犹太恐怖活动采取两种方式：对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暴力行动；有组织的私下散布关于巴勒斯坦人的谣言、诽谤和威胁运动，犹太人称之为“心理战”。两者的目的都十分清楚，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逐出他们的家园。

犹太恐怖主义最可怕的暴行是在名叫代尔亚辛的巴勒斯坦人的村庄犯下的，1948 年 4 月 10 日，约有 260 多名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在那里被屠杀。有些人是被砍死的。一位孕妇被屠刀剖开了肚子。犹太军队采取如此野蛮的进攻，部分地是由于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而他们自制的斯坦枪卡壳，弹药供应不上。

这次特别的攻击，是由两个主要的犹太恐怖集团联合进行的。一个是伊尔贡，它的总司令是梅纳赫姆·贝京。一个是斯特恩帮，它的领导人之一是伊扎克·沙米尔。此人正巧后来接替贝京成为以色列总理。客观他说，这两个人是比任何巴勒斯坦人都更有权威、更加残酷、更为成功的恐怖主义的领导人。

正在创建中的犹太国的正式地下武装叫哈加纳，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这个组织的官员描述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行动是：“纯粹以屠杀和暗害为目的的预谋”。哈加纳的另一官员跟斯特恩帮的司令说：“你是一头蠢猪。”

英国驻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名高级专员为代尔亚辛所发生的事件所激怒，他主张动用英国的武装来惩罚这一事件的责任人。当他得知没有英国地面部队可动用时——自 2 月以来英国正从巴勒斯坦分阶段撤军——他考虑对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基地发动空袭的可能性。可是当时没有照明弹可用。而且，无论如何，伦敦没有授权进行这一攻击。应该指出，坎宁安的发怒不只在于代尔亚辛事件的后果，在英国占领巴勒斯坦的最后几年，坎宁安和许多英国官员及人士对伦敦不允许他们强硬反对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强烈不满。然而，英国也确曾出价悬赏过贝京的头。在伊尔贡领导人的相片下，通缉告示上有这样的描述：“身高：173 厘米。体型：瘦弱，肤色：灰黄。头发：黑色。眼睛，棕色。鼻子：长钩鼻，特征：带眼镜；平足：牙齿不好。国籍：波兰。”有意思的是，许多犹太官方领导人希望贝京死去，因为他太极端了。而阿拉

柯林·利冈在载于 1977 年 11 月 13 日《观察家》上《贝京传略》中的引语。

在阿里·柯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啊，耶路撒冷》（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伦敦，1972 年）中的引语，第 280 页。

法特的情况则是，少数他昔日的同事曾盼他死，因为他太温和了。

1939 年伦敦方面宣布，允许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国并不是英国的政策。在这之后，犹太恐怖分子转而采取了反对英国的报复行动。英国这一表现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种打算完全是玩世不恭的。英国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与阿拉伯人为敌。另一个因素是，某些英国的大臣们开始领略到，1917 年贝尔福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巴勒斯坦政策的提议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性的后果。但为时已晚。

198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当时正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前高级官员。他以不引用他的姓名为条件，对我谈了以下内容：“你从不会知道，我们对不允许我们与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作斗争是多么气愤。我们几乎要反抗了。这是有关巴勒斯坦真相的一部分，它将永远破封禁，但是我要把这些都告诉你，当我的人员波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杀害后，我们经常到身着我们的便服的人群中去搜捕谋害者。我们常常可以了解到谁是作恶者，一旦发现，就把他们枪毙。”

关于代尔亚辛事件及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深刻含意，没有比梅纳赫姆·贝京自己听说的能够被引用来作为更好的证据了，他在后来以自豪的心情写道，“这一残酷暴行取得了好结果。”这就是“阿拉伯的宣传工具在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军队中散布恐怖的传奇故事。只要提到伊尔贡的士兵，他们就惊慌失措。这一传说故事相当千 6 个营的以色列兵力……惊慌笼罩着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柯罗尼亚村原先曾击退哈加纳的每一次进攻，后来，这里没有继续进行战斗，一夜之间就撤空并陷落了。贝蒂一依卡沙也撤离了……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阿拉伯人甚至还没有和犹太军队接火就逃跑了。所有犹太军队经过海法向前进军，就像刀切黄油一样。阿拉伯人在惊恐中呼喊‘代尔亚辛’，开始逃命。”

回顾以往，每个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都不难指出，广播代尔亚辛大屠杀的全部真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种宣传，势必在巴勒斯坦人中引起更大惊慌并加速人员外流。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广播这个消息呢？可悲的实情是，那些决策者们担心阿拉伯军队不来援救巴勒斯坦。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过许诺和自夸，但当危境出现时会寻找借口袖手旁观。在极度痛苦之后，对于广播内容负有责任的巴勒斯坦人决定公布亚尔代辛的全部真相，希望以此震动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迫使这些同家采取行动。

一些以色列的宣传家们，为了缩小甚至消除代尔亚辛的重大影响，曾经强调在大屠杀前有约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逃离。这话多半是真的，因为老百姓通常在战斗中都有人要逃离的。

代尔亚辛绝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遭受大屠杀的地方。在纳斯尔·艾尔一丁，安·艾尔一宰通赫，艾尔一比纳，艾尔一巴萨和萨夫萨大，都发生了巴勒斯坦公众遭受犹太恐怖分子制造的浩劫。

以色列另一位领导人伊格尔·阿隆后来也揭露了很多关于巴勒斯坦人大批外流的主要原因。阿隆去世时是副总理。1948 年他是哈加纳进攻部队帕尔马契的司令。在他写的帕尔马契的历史著作中，包含有他如何在上加利勒进行他称之为心理战的实战内容。他说，他急于要“净化”阿拉伯地区而又不

动用他自己的已经精疲力竭的军队。“我召集了所有的犹太莫克塔尔（地方宗教首领）。他们同各个村庄的阿拉伯人有接触。我要求他们到处向阿拉伯人耳朵里放风，进行恐吓，说大批犹太军队已经到达，将要烧毁胡利赫地区所有村庄。他们应当向阿拉伯人建议趁时间还来得及赶紧逃走。”

这一计划随即执行。上加利勒的阿拉伯人真的逃离了。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开展了同样的造谣恐吓活动，并取得了同样的效果。事实上，从联合国分治决议时起，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军事政策的一个特点。因为阿拉伯人不仅在分治计划规定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占绝大多数，在划归犹太人的领土上阿拉伯人也接近多数。因而，在要建立的犹太人国家的区域内，首先必须优先考虑的就是“清除”在该地的阿拉伯人。

还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有些巴勒斯坦人是受恐吓电话和炸弹威胁而逃离自己的家庭和国土的。这种恐吓是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拿手戏。值得指出的是，在冲突中首先使用信件炸弹的是犹太人。

在 1947 年，英国失去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它不愿意，或者当时也许已不可能解决它自己造就的这一问题。英国放弃了调停冲突的企图，它对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远不平等的要求。总之，英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撒手不管了，请求联合国过问。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尽管犹太人原来只占不到 1/3 的人口和少于 6% 的土地，它却不顾事实，把这个国家 57% 的土地划归犹太人。联合国决议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我最好还是引用卡唐的话：

“合法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十分清楚的。联合国是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组织。它是为实现宪章所规定的特定目的而成立的。这个组织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巴勒斯坦拥有主权或任何其他权利。因此，联合国无权决定巴勒斯坦分治，或者把它领土的任何一个部分划归一个外国移民的宗教的少数派，以便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联合国不能把不是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联合国的成员，不论是个别的还是集体的，都不能分离、削弱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主权，不能任意处置他们的领土，或者以分治来破坏他们国家的领土完整。”

如果联合国会员中的许多较小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投票，那么分治计划就不会通过。它之所以能得到通过，仅仅是由于美国得到苏联的默认，并威胁一批小国参加投票，以取得必须的多数。而美国又受到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对此，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詹姆斯曾写道：“我认为最令人难受的、遗憾的事实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制于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特别集团对政党基金的捐献。”

当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兄弟拒绝分治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地降临巴勒斯坦。投身这场斗争的有一名巴勒斯坦学生，他就是阿拉法特。当时他 19 岁。

在英国将于 1948 年 5 月 14 日午夜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统治之前 8 小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宣布独立，第二天宣布以色列国建立。以色列人在大卫·本·古里安领导下，对阿拉伯人拒绝分治并准备战斗暗自高兴。如果分治计划实现，犹太人至少在开始时遵照规定，只能得到巴勒斯坦的 57%。正

《哈·斯费尔·哈·帕尔马契》第 2 卷，第 286 页。

《福莱斯特日记》（维京出版社，纽约，1951 年），第 345—347 页。

如本·古里安自己所说，在战争中，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自此，以色列国的边界将由武力来决定，而用不着考虑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或国际社会的意愿。

分治计划刚刚通过，巴勒斯坦人不顾武器不足，加紧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阿拉伯国家——除了有争议的埃及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之外，没有一个是真正想参加战斗的——直至以色列国实际建立，他们才把自己的部分兵力投入战斗。“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正式宣称是从5月15日开始，当时来自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部队对新以色列国发起了攻击。

直至6月11日在联合国安排下实现第一次停战，以色列人是处在真正困难中。尽管阿拉伯部队战斗不力，以及像阿拉法特所形容的阿拉伯国家“背信弃义”，如果埃及人向特拉维夫长驱直入，以色列人就有可能被打败。但是，持续了30天的第一次停战，却成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决定性转折点。停战条款规定，不能向作战部队提供弹药或武器。在这期间，阿拉伯国家没有从西方供应者得到一粒子弹，而以色列利用休战则获得了所有类型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其后果是，当战火再度燃起，以色列就处于主宰战争过程和结果的地位。第一次停战后，战争成了在装备精良的6万以色列军队和装备不足的2.15万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单方面的争夺，以色列国防军是在停战中建设起来的。

1949年，由于一系列停战协议而使战争最后停止时，以色列占据了分治计划所划归它的全部领土和划归巴勒斯坦的领土的一半。另一半被约旦和埃及拿去了。巴勒斯坦不复存在了。这是战争的一个后果。另一后果是制造了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到1949年年中，约有10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园，流浪到新以色列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下降到13.9万人。

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希望成为长久的难民。他们天真无知，以为当阿拉伯军队击败犹太人时，即可重返他们自己的家园。埃及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海达尔在开罗夸口说，同犹太人之间没有战争。“这将是一次不冒任何风险的检阅。两个星期之内军队就可开进特拉维夫。”人们说，海达尔取得他的地位归功于这一事实：他是一个能使法鲁克国王开心的蠢人。埃及总理马哈茂德·诺克拉西不相信海达尔，诺克拉西了解埃及军队的真实情况。那些应该用于重新装备军队的钱，被法鲁克及其亲属、朋友享乐耗尽了。起初诺克拉西曾劝说法鲁克不要介入这场战争。可是到最后，为保住职务，他遵循他腐败的国王的意愿于下去了。

犹太人将在两周之内被击败，这一信念在阿拉伯其他国家首都也曾表达过，巴勒斯坦人听任愚弄。问题不在于巴勒斯坦人过分天真。真正的悲剧是他们没有领袖。

1948年5月，联合国委派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他于9月16日在那路撒冷完成了第一个进展情况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建议联合国必须确认，“阿拉伯难民有权在尽早的时间内，返回他们被犹太人占领领土上的家园。”第二天，贝纳多特就被犹太恐怖主义分子暗害

在柯林斯和拉皮埃尔《啊，耶路撒冷》一书中的引语，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在同我谈话中曾强调过这点。

联合国文件 A/648。

了。在以色列，人们普遍认为，沙米尔先生的斯特恩帮应对此事负责。12月，联合国194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家园和得到赔偿的权利。

杜鲁门总统后来要求以色列放弃在战争中强夺的领土，回到分治计划所规定的边界。事实上，杜鲁门非正式地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在边界和难民问题上作出让步。以色列不仅拒绝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并通过非正式渠道警告他，如果他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能够而且将促使美国犹太人集团反对他。这是历届以色列政府相继对每一任每一位美国总统惯用的讹诈牌。既然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以色列耍弄这种花招也就不会遭到谴责。真正的悲剧在于历届美国总统总是对以色列的恐吓让步。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只好允许300万犹太人选出的代表来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1984年，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的真实性质引起了警觉，这是因为以色列的高傲和政治上的不妥协已形成对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利益的主要威胁。还没有足够的美国人看到这一点，但这却是中东日益恶化的形势及目前发展的现实。

自从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斗争的实质、巴勒斯坦人真正奋起反对的东西是：当作为以色列人第二次进入的后果、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在1949年成为无国无家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出于不同的目的却怀有同样不明言的希望，即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因为英国及当时的一些大国认识到，以色列的存在是使阿拉伯国家处于衰弱和分裂，并无法对大国控制和剥削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物资，进行成功的挑战的最可靠的保证，巴勒斯坦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被用来作为牺牲品。他们的真正罪过忧在于他们拒绝从地球上消失。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需要强调。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天真或愚蠢。他们晓得是英国和其他大国利用了他们。实际上他们愿意被利用。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总有一天以色列会成为受害者而不是政治权术的得益者。机会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利益而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政府。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那些曾经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外国政府，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有一天会转而改变立场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犹太人将成为牺牲品。以色列的许多领导人曾在私下告诉我，他们确信这一天会来的，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只是其中的两位。

犹太国为什么会成为中东军事超级大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这样的。它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它的领导人曾经真正害怕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准备着有朝一日那些大国将会使以色列成为他们政治权术祭坛上被宰割的羔羊。应该观察多少年来以色列防务政策发展的来龙去脉。历届以色列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积聚足够的军事力量和必需的政治力量，以威胁他的朋友，特别是美国，放弃其即使是想出卖以色列国的念头。

这也是以色列历届政府为什么要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军事威胁问题上，故意欺骗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的真实原因。显然，以色列历届政府知道，总有一天，正是那些背叛巴勒斯坦的友好大国会同样地背叛以色列。当然他们不能公开地说他们预想到的事一定会成为事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事件中的真正的首恶者并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仅仅是根据规则玩弄国家之间的赌博游戏，真正的首恶者是那些领导人，他们多年来创建了一个这样的世界秩序或制度，在这里强权即真

理，而正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没有地位的。这一结论，得到阿拉法特以及我向他们谈及这一观点的每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赞同。

1943 年以后，阿位伯国家确曾宣布过，全部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责任和目标。对此，他们承担着义务。这也是真的，阿拉伯国家如果能够做到，他们就将击毁以色列。但是，这也是真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与以色列战斗的企图，以便解放即使是巴勒斯坦的某一部分。

阿拉伯国家明白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这一事实将在以后的篇章中清楚地显现出来。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多数阿拉伯领导人知道，真正的战斗不是同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的战斗。如果巴勒斯坦的任何一部分得到解放，真正的战斗是同那些为了自己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大国的策斗。只要犹太国的存在是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全而政策目标服务，他们就要保护和捍卫阿位伯国家当其在内部考虑他们真正的选择时，必须估计到另一个现实，这就是苏联同西方大国一样对以色列的存在承担若义务。这一事实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曾经支持犹太国的建立。他们预计，以色列的存在必然激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多少年后，莫斯科可为自己利益加以利用。但是，紧接着 1918 年后苏联对犹太国承诺义务这一事实，远比其所提出的理由更为重要。

1948 年后，阿拉伯领导人私下得出的唯一可能的结论是：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军事、经济、政治手段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并在实际上击败它，因此，只要大国南要以色列国生存下去，解放巴勒斯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对阿拉伯国家政权来说，汇如对以色列领导人一样，实质问题是他们不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的人民群众。阿拉伯政权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感到软弱无能，他们就越要高喊抗击和打败以色列。是阿拉伯人的语言而不是阿拉伯人的行动给以色列的宣传以可信凭证，他们呼喊他们的国家面临毁灭的前景。

从至少作为对正义衡量标准的巴勒斯坦斗争的来龙去脉来看，正如上面概括叙述的，对阿拉伯国家在这场斗争中的软弱无能不能夸大。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完全是在孤军奋战。因为他们处于软弱状态，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已更多地成为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盟友，而更少地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可靠支持者。我们将会看到，正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的军队，首先阴谋消灭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领袖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许许多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从 1913 年以前至今的历届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贯背叛巴勒斯坦事业。但是一般说来，哈拉德·哈桑拒绝谴责这些政府是叛徒。他就这个问题说的一些话，代表了巴解组织领导人中一些同他持有相同见解的同事。有些爱挖苦人的人会说，哈拉德·哈桑及其同事们不能指责这些政府是叛徒，那是由于他们需要而且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哈拉德·哈桑是这样概括他自己的看法的：

“关于阿拉伯政权，你几乎可以说你想说的一切，而且都是对的。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腐败的。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缺乏才能的。他们不懂得怎么打他们的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他们情报机构的俘虏。结果是他们不接触、不理解他们人民的感情。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靠压制手段进行统治。阿拉伯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还有其他，但是，你不能说这些政权是叛徒。你要成为一个叛徒就必须有具体行动。你必须要去出

卖。然而，从未出现这些政权要去出卖我们的情况。他们是以我们知道的方式行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察觉在大国统治和控制中东战略物资和资源的阴谋面前无能为力。对大国阴谋，他们和我们都注意到，要是你想知道真情，阿拉伯政权的真正问题，是他们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这是他们感到无能为力的产物和结果。”

正如哈拉德·哈桑及其他同代人设想的，他们终于走到一起，形成了怯塔赫的领导核心。巴勒斯坦斗争的目标之一是打破阿拉伯的失败和防守心理。以色列的战略是强化这一心理。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怯塔赫的这些领导人只是刚刚 20 岁左右。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们中的多数是理想主义者，对置于他们面前的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还天真无知。起初他们并未意识到有阿拉伯失败和防守心理这种事情，而且这些将被证实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有很多东西必须学习。

第二编

地下年代

第三章 “为背叛所触痛”

穆罕默德·亚西尔·阿拉法特在 1929 年 8 月 24 日生于开罗。他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生了七个孩子，他排行第六，正西尔的大姐名叫伊娜姆，还有两个姐姐是第三和第五，名叫约斯拉和哈迪加。第二和第四个孩子是男孩，名叫加麦尔和穆斯塔法。最小的是亚西尔的弟弟法萨。

虽然他出生证上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可是据伊娜姆说，他弟一开始就叫亚西尔，亚西尔的意思是“容易”，更通常的说法是“没问题”。

亚西尔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有一张圆圆的愉快的笑脸，她的名字叫扎哈瓦，意即“骄傲”和“美丽”。她出身于那路撒冷阿布·沙德家族。这是圣城最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家族，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

亚西尔的父亲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出身于加沙和汗尤尼斯的古德瓦家族。这个家族就是哈拉德·哈桑所描述的侯赛尼家族的“贫困家系”，这意味着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哈吉·阿明·侯赛尼的亲属。在犹太人眼里，哈吉·阿明·侯赛尼是巴勒斯坦方面罪恶的化身。尽管他在巴勒斯坦但有教养的上流人士中并不受到很大尊重，但他在 1922 年被英国指派为耶路撒冷的穆夫蒂之后，却曾是巴勒斯坦的一位有影响的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占领了巴勒斯坦，英国人违背巴勒斯坦穆斯林知名人士自己的意愿，委派哈吉·阿明·侯赛尼为穆夫蒂，是想以此使他成为他们的人。有一个时候，他真的跟英国合作，并试图限制那些主张只有运用暴力才能挫败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夺取巴勒斯坦的图谋的人。但是，当绝大多数的普通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选择了暴力手段时，哈吉·阿明·侯赛尼及其他领导人就必须作出抉择，站在前面来领导，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30 年代后半期，当巴勒斯坦反叛者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哈吉·阿明·侯赛尼是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号敌人。从 1941 年到 1945 年，他逃亡到纳粹德国，在那儿他受到希特勒的重视。当这些情况被披露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家们就很容易地任意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大屠杀的实际上同谋者。这种指责是荒唐可笑的，但在那种环境下又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事实，哈吉·阿明·侯赛尼是许多希望纳粹取胜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他们想以此阻止英国人以牺牲阿拉伯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控制中东。

1927 年，在亚西尔出生前两年，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全家迁往开罗。他为什么离开巴勒斯坦，至今还是个谜。有些人认为，他是被英国暗地驱逐出境的许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巴勒斯坦人之一。那些认为他是被驱逐的人说，这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变卖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据哈米德·阿布·西塔说，有一次亚西尔·阿拉法特带着失望和激动的感情说：

“我父亲连两米巴勒斯坦土地也没有留给我，很可能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决定住在开罗，为的是有利于发展他的企业。很多其他人也这样做。

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主要靠食品批发生意谋生。他赢利最多的一个工厂生产罐头奶酪，产品销售到阿拉伯世界。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体格健壮、意志坚强的人，伊娜姆说，他一天要走 15 至 20 英里路。“从家到他的办公室有 8 英里，每天来回，其余路程是回

见他的顾客。”在伊娜姆记忆中，她父亲是一个容易激动和性情暴躁的人，“常常大声叫嚷”。但是，他又是一个慈祥的人。伊娜姆说：“我知道他做生意赚很多钱，可是我们家，从未见到。经常有在巴勒斯坦的贫苦人民请求他的帮助，他从不拒绝。他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而生活的人。”伊娜姆补充说：“真正说来，我们在物质上是相对贫困的，但精神上我们是很富有的。”

阿拉法特本人不愿意谈他的家庭生活，我想这是因为他不想再去触痛以往家庭的创伤。

关于这一主题，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资料，只有两个片断。第一个是他勉强证实了他幼年时期的生活是很不幸的。“是这样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要是伊娜姆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那么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仍将是个谜。

1933年阿拉法特的母亲去世。这件事对阿拉法特早年的痛苦生活具有决定意义，伊娜姆说：“她患肾脏病，当疾病发作后一周，她便去世了。那时医生的医术还不高明。”

那时亚西尔4岁，他的弟弟法萨18个月。“我母亲去世后，法萨和我被送到在那路撒冷的叔叔萨利姆·阿布·沙德家，”这就是阿拉法特亲自告诉我的有关他幼年生活的第二个片断，也是最后一段情况。

亚西尔和法萨在那路撒冷生活的四年是段空白，唯一的纪念品是阿拉法特5岁时的一张照片。阿拉法特的一位同事说，显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孩。我从伊娜姆处得知，萨利姆叔叔并不富裕，我从这里得出的判断是，他很穷。

当阿布德·拉乌夫娶第二位夫人时，亚西尔和法萨回到阿拉法特在开罗的家，接着陷入了苦难。继母对阿布德·拉乌夫的孩子非常冷酷，家庭简直成了战场。家庭妇女间的吵闹和谩骂，伤害和刺痛着亚西尔。从那时起，几乎20年，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厌恶妇女的人。15年后，他跟一位大学时的同学说，他很少跟妇女握手。

作为对孩子们抗议的反应，阿布德·拉乌夫在结婚后几个月。与L呐下二个妻子离异。不久，他再次结婚，并在家里采取了新措施，以缩小内部冲突的规模，他的第三个妻子有她自己的住所，而要求伊娜姆担起抚养弟妹的责任，这是伊娜姆对所发生事情的说法。但当阿拉法特偶尔对他的亲密战友谈论他的家庭生活时，他总是否认他大姐抚养了他。这一矛盾也许可以用这个事实解释清楚，即年青的阿拉法特对伊娜姆企图控制他的生活感到不泌相反抗，一方面，因为她是个妇女；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强调的狄人精神，坚持他自己的权利，前面我曾引用过哈立德·哈桑对萨达特总统说的话，阿拉法特是一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人。我认为，大约自1939年，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未来的主席10岁的时侯，情况就是这样。

在亚西尔9岁或10岁时，伊娜姆就很清楚地感到，他的弟弟“小论在玩的方面，还是在感情方面，都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调\大战爆发后不久，亚西尔就把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孩子组织起来，分组进行操练。他手执棍棒，敲打那些不服从他命令的人。他喜欢在我们家的庭院里野营。他经常参加埃及的游行示威。好几次我去追他，把他拖回家……免得他卷入纠纷。”

从10岁起，阿拉法特似乎既是位自然的领袖，又是一个“强欺弱的学生。然而，在他身上又体现了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善良和勇气。伊娜姆说：“亚西尔总是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就连一块小小的巧克力也要跟大家分享。他从不关心自己。有一天，我为正西尔和队萨买了新的衣服。

亚西尔很生气，拒绝穿池的新衣，除非这一地区的穷孩子也都能穿上新衣！”

据仙娜姆说，亚西尔的活力成了他们的邻居犹太母亲们议论的话E，“记得有一次，我被犹太邻居难住了。”伊娜姆说：“她对我说，‘你们的亚西尔多么活跃和聪明。我知道吃鱼会使男孩耽阴伶俐，你是否给他吃很多鱼？...

在下西尔从那路撒冷回到开罗之后，3岁那年，他开始自觉地对犹太人以及他们的习惯发生兴趣。伊娜姆说：“他回到开罗后不久，就常去犹太人的聚集地和俱乐部，他跟我们说，他要研究犹太人的心理。”

当我们谈到这点时，伊娜姆微笑着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我不能肯定是否应该告诉你。.....亚西尔用他自己侍有的方法来捉弄我们的犹太邻居，当正式早祷过后，他经常跑上大街，用他的高嗓门叫喊‘伟大的真主！伟大的真主！’他唯一的目的是要把那些还在酣睡的犹太人惊醒！”

伊娜姆竭力要扮演她做母亲的角色，因而跟他的弟弟，十几岁的亚西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摩擦的原因是，亚西尔上中学时常常缺课，伊娜姆说：“在这方面，他给我添了许多麻烦。我们的亲戚常打电话跟我说，‘你一定要让亚西尔去上学！，麻烦的是亚西尔的确到学校去了。我经常亲自送他上学校。可是他从教室溜走了，有时我上学校接他，他不在那儿。唯有晚上跟他的朋友一起在家时，他似乎是认真地、饶有兴趣地在进行学习。但是他是装的，我经常到他的房间送茶给他们，当我快走近时，亚西尔就说，‘将军要到了！’等我走进屋时，亚西尔和他的朋友们就假装在做作业——其实他们是在讨论政治和军事问题。”

阿拉认特多次逃学时，他究竟是在干什么呢？答大似乎是，他是在使自己接受政治教育。据我所了解的一个情况，当他在十三四岁时，曾在埃及议会工作过，作为一名侍应茶水的服务员。我曾问阿拉法特这情况是否确切，他回答说：“不很确切，但是，在我少年时我就很关心政治。我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一方面通过我的亲戚，一方面靠我自己想办法。”

1946年，在他17岁生日前夕，阿拉法特成为从埃及向巴勒斯坦私运枪枝、弹药行动的关键人物。

那些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曾经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结束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并从而结束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打败纳粹德国及轴心国只意味着一件事——巴勒斯坦人为了不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家园，必须进行战斗。1946年5月，哈吉·阿明·侯赛尼回到开罗，组织第二次反对犹太复主义的存在和英；政策的战斗。据说是法国人帮助他逃离纳粹德国的。作为回报，他答应他们将不谴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维持其影响所作的努力。

巴勒斯坦国内的民族主义分子不需要哈吉·阿明·侯赛尼来指点他们必须进行战斗。他们懂得这一点。他们的困难在于缺乏足够的武器。反之，犹太人却远比巴勒斯坦人装备精良，英国人允许哈加纳得到发展和武装，这是一支在巴勒斯坦的神秘的却是正式的犹太人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委托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生产一些小型武器、弹药——特别是手榴弹和地雷。毫不奇怪，在中东的英国军队所需的部分武器被转移到犹太人的仓库里去了。犹太人继续制造小型武器。弹药的能力并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另一方面，英国人却阻止巴勒斯坦人起来并进行武装。阿布·杰哈德和哈拉德·哈桑跟我说，巴勒斯坦人会由于身是携有子弹和小刀被绞死。

1917年初，巴勒斯坦人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从埃及往巴勒斯坦私运武

器。阿拉法特的工作是，当代理人带着钱从巴勒斯坦来到开罗时，设法获取武器——首先是来福枪。在这项行动开始的时候，阿拉法特的主要任务，是引导那些来寻觅武器的人到开罗和亚历山大他们能够获得武器的地方去。由于阿拉法特的阿拉伯语带有埃及口音，听以他也参与讨价还价。当地人都以为他是埃及人，这就大大减少了巴勒斯坦人被敲竹杠的机会。当城市里武器供应开始枯竭时，获取武器就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第二个好的来源是沙漠中的部落，通过他们取得武器，意味着要忍受盗贼的夹击，他们会杀人，更不用说带的是去寻购武器的金钱或用金钱购买来的来福枪了。那是年青的阿拉法特，自愿，承担这些最危险的使命，阿拉法特在其形容为“最困难的日子里、作为军火商取得的成功，为这位未来的巴解组织领导人赢得了一位勇敢的人的最初的荣誉。阿布·阿迪卜是巴解组织驻科威特首席代表，也是主席的亲密战友。他告诉我：“当我在 50 年代初，作为学生来到开罗时，我记得我曾见过一位老人，他对我说，他和其他很多人对去阿拉法特买军火的地方都十分恐惧。这位老人预言，亚西尔·阿拉法特将会成为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

有一次，阿拉法特完成贩运军火冒险回到开罗，他拜访了一位经营废旧金属的商人。他想买一辆他曾在这位商人院子里看到的破旧装甲车。当阿拉法特注视着装甲车的残骸时，商人走近来问他：“肯定你不是对它感兴趣吧？”“它已无用了，报废了。”

“噢，是的，我有兴趣，”阿拉法特回答说，“我想买它。”

“那你必定是傻瓜，”商人说。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同情我，”阿拉法特说，“你应该廉价卖给我。”

第二天，他带领他的三四十位朋友来到商人的院子。在阿拉法特的指挥下，带着一片责骂声，他们推着装甲车走到了外交部。那里满挂着旗帜，成为游行示威的中心。人们要求埃及政府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武器。阿拉法特对埃及当局是否会对其要求作出反应，不存任何希望。他更多地想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后，通过游行示威的行动长人民的志气。

人们确认巴勒斯坦分治导致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升级。而游击队的战斗力则由于阿拉法特的军火贩运活动而得到提高。到 1948 年初，尽管多数阿拉伯政权拒绝向他们提供武器，巴勒斯坦人对他们在战场上的活动并不犯愁。但是，4 月 8 日传来了使许多巴勒斯坦人绝望痛哭的消息。为了控制耶路撒冷，阿卜杜勒·哈德尔·侯赛尼在战斗中被杀害了。阿卜杜勒·哈德尔·侯赛尼是巴勒斯坦最伟大的战士。甚至犹太军队的司令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历史学家、评论家，对他的勇敢和他的战略策略思想都深为敬佩，这位传奇式的巴勒斯坦战士在反对英国的战斗中就已出名。后来，1938 年，哈吉·阿明·侯赛尼派他到纳粹德国受训。1941 年阿卜杜勒·哈德尔回到开罗，他的家成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第二阶段军事斗争的作战指挥部。1947 年底，他回到巴勒斯坦领导斗争。

哈米德·阿布·西塔是阿卜杜勒·哈德尔的追随者之一。当阿卜杜勒·哈德尔逝世的消息传到开罗时，阿布·西塔是福阿德第一大学工科三年级学生。亚西尔那时年近 19，在这所大学读一年级或预备班。他也是学习工程的。阿布·西塔召集这所大学里的巴勒斯坦学生开会。他们聚集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会场，当人们集合后，阿布·西塔发表了一个简短而富有戏剧性的讲演。他说：“这不是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将从我们手中被夺走。如果我

们失去了祖国，我们学习又为了什么？我们必须到巴勒斯坦去战斗！”在一片赞同的欢呼和歌唱声中，阿布·西塔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点着他的课本。

1983年，当他回忆这一情景时，阿布·西塔说了这些话：“第一个效法我的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正拿着一本书和一些书面作业，他把这些扔进了火中。他非常热情和富有感情。我们两人的父亲是多年的朋友，我1946年以来就认识亚西尔，但是我从来没有见他那么激动过。”

很多书和作业不断丢进火里，阿布·西塔发表了另一个声明。他告诉聚会的学生，他准备立即到巴勒斯坦去。他说：“可是，你们多数人都没有作战的经验。”“你们必须让自己得到训练，然后跟着来。”阿布·西塔前几年在阿卜杜勒·哈德尔设在叙利亚的一个基地受过军事训练。他在开罗阿卜杜勒·哈德尔家中的厨房里学习过如何制造炸弹。有一次他们在厨房里还引起了爆炸和起火，阿布·西塔面带笑容追述着，“正当阿卜杜勒·哈德尔在教授如何运用硝酸和硫酸去融化桥梁时，爆炸发生了。”

在焚书仪式结束时，阿拉法特把阿布·西塔拉到一边，他说，“我将跟你一起到巴勒斯坦去。”“我时刻准备着战斗，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阿布·西塔伸手搂住阿拉法特的肩膀。“我亲爱的亚西尔，……你太年青，太缺乏经验。我们是真正去打仗。我们不是玩游戏。你要使自己得到训练，然后再跟我去战斗。”

阿拉法特从阿布·西塔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他几乎要发脾气了。“我知道如何去战斗。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训练，我将跟你一起去。”

跟其他许多人一样，阿布·西塔以为阿拉法特是在穆斯林兄弟会接受第一次军事训练的，在一段时间里，他曾是那个组织的成员。事实并非如此。当我问阿拉法特自己关于他的第一次军事训练时，他的回答简短、扼要。“我是接受一位德国军官的秘密训练。他是跟我的亲戚一起回到开罗的。”我还问过阿拉法特，他是否曾花费很多时间陪伴哈吉·阿明·侯赛尼。他的回答是，“不是很多。”阿拉法特心目中的顶袖是阿卜杜勒·哈德尔·侯赛尼，阿卜杜勒·哈德尔·侯赛尼是对阿拉法特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

就这样，在1948年4月的一天，阿布·西塔、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另一人动身去巴勒斯坦。这第三人是埃及军队中的一位少校，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他们从开罗乘火车去坎塔拉。可是他们没有签证，没有任何正式证件，因此，他们必须避开苏伊士运河正式渡口的海关人员和边境警察。当阿布·西塔和阿拉法特没有取得成功时，少校运用他的影响找到一条小船。在夜幕降临时，他们横渡运河。

阿布·西塔说：“今天当我回想此事时，禁不住要发笑。上船时，我和阿拉法特都没有武器。阿拉法特悄悄地跟少校说：“好了，我们三人将要去跟犹太人战斗了。三人中只有一人有武器。我们要发疯了。

“少校微微一笑。‘别着急，’他轻声回答。‘我会让你吃一惊。看看那底下。’甲板底下放着一些来福枪和手枪。”

他们渡过运河，就上了去加沙的路。在那儿他们分手了。少校和阿拉法特向西南行进，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战士们的一个小队，他们正在包围达鲁姆村的犹太人占领区。阿布·西塔往南去贝尔谢巴。他是那一地区的贝督因人，他决定回家乡参加战斗，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据阿布·西塔回忆，一支犹太大军队在几辆“24型坦克”支援下于5月10日向贝尔谢巴附近发起了进攻。“24型坦克”可能是装甲车或自制坦克。经过激烈战斗，犹太人突破了巴勒斯坦防线。阿布·西塔说：“后来，我发现犹太坦克有一半向达鲁姆村的方向移动。他们试图冲破对那儿的包围。我派了一名通讯员骑马给穆斯林兄弟会送去情报，要他们警惕，并准备伏击，接着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穆斯林兄弟会有几门大炮和迫击炮。当犹太坦克从达鲁姆村的斜坡向下行驶时，兄弟会击中了第一辆坦克，其余的也都陷入埋伏。全部犹太坦克被击毁。活着的犹太士兵被迫撤退。”

5月14日，英国人统治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天，也是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前夕，阿布·西塔接到父亲命令，要他返回开罗。他父亲说：“明天，阿拉伯军队就要来了，他们会迅速地执行任务。你应该回去学习。”

第二天，阿布·西塔动身回开罗，回程中他特地经过达鲁姆村。“我们曾经在这块地方受到打击，我想在回开罗前体验一下胜利的欢乐。阿拉法特见到我十分高兴。他以为我也许被杀害了，我们互相拥抱。兄弟会的朋友们告诉我，亚西尔发射了迫击炮，击毁了犹太人的第一辆坦克。”

阿布·西塔对那一天的主要记忆是，当兄弟会成员——他们全都是埃及志愿者——要去拣一点被击毁的犹太坦克碎片留作纪念时，阿拉法特加以制止并控制他们行为。“阿拉法特非常坚决。他告诉大家，这不是士兵在战场上应有的行为，即使他们是志愿兵也不应该这样。”

当这两位朋友在所谓以色列的独立战争的前夕分手时，阿拉法特深信，巴勒斯坦人能够打败犹太人，只要他们能得到必需的武器和弹药。当时，以阿拉法特的亲属为首的巴勒斯坦领导集团不愿意阿拉伯军队来干预。他们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认为，如果阿拉伯国家派出他们自己的军队，这将会使冲突国际化，并使问题解决成为不可能。国王的意见是，阿拉伯国家应该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所需的武器，进行他们自己的战争。阿拉法特认为，如果阿拉伯国家当时接受沙特国王的忠告，巴勒斯坦人必能打败犹太人。

然而并非如此。阿布·西塔和阿拉法特分手后几小时阿布·西塔回开罗，阿拉法特继续战斗——以色列宣布独立，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发起攻击，其结果大家都知道。

当我们谈到这一时期的生活及巴勒斯坦的悲剧的形成时，阿拉法特告诉我，在战斗刚开始的几年，他有机会研究和分析了阿拉伯联盟的许多秘密文件，当时它的总部设在开罗。“那时我还很年轻，但由于我的家庭关系，我同一些巴勒斯坦政策的制定者们很接近，因而有机会发现产生巴勒斯坦悲剧的真正原因，我发现了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情。”我问阿拉法特，从他研究的结果及他在巴勒斯坦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回答了一句话。“事实是我们被出卖了——被阿拉伯国家出卖了，还有，我要遗憾他说，被为制造犹太国出了大力的英国人出卖了。”

阿拉法特认为战争的转折点是第一次停火协定，它于10月6日生效，持续30天。阿拉法特说：“那是我们悲剧真正的开始。在第一个停火协定之前，我们控制着整个地区。当然犹太人有一些好的或者强的据点，但由我们控制着。归根结蒂，这是我们的家园。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非法的犹太移民人数大增，但我们毕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到第一次停火协定时，犹太人曾经宣称他们立国，但这个国家并没有被建立起来。一个月之内，情

况是怎样变化的呢？”

阿拉法特就他自己的问题给了我许多回答。在全部非常复杂的因素中，一个明显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一事实，即犹太人被允许利用停火协定来获得新的志愿人员和大量武器、弹药。而另一方面，阿拉伯主力部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却没有从西方供应国那儿得到任何东西。

“然而，”阿拉法特说：“那不是我们悲惨日程上的主要部分。那是后果而不是原因。主要问题是，阿拉伯国家是在英国及其他大国，主要是英国的影响下。而这些政权越是腐败，他们就越受人摆布。”

我问阿拉法特，他是否联想到由于英国及其他外国的压力，包括威胁，使当时组成阿拉伯联盟的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也门和沙特阿拉伯接受了停火协议，并在停火协定结束时，也不认真进行战斗。

“确实是这样，”阿拉法特回答。“只要你研究一下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你就会看到背叛的后果。在一些地方，如果阿拉伯军队向前推进，就很容易占领犹太人的阵地。当我们的人民责问阿拉伯指挥官，为什么他们不前进时，他们的回答都一样：‘我们没有接到命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军队不是不战而撤，那么犹太人就不可能占领我们的许多地方。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如果阿拉伯军队不是按照他们的命令，在离去的时候开放通道，海法是不会不经战斗就陷落的。这是一桩十分肮脏的交易。或许有一天，我们有时间来叙述全部故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想世界公众舆论将会感到震惊和厌恶。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事情为什么令人难以置信。”

阿拉法特和所有巴勒斯坦人都了解全部真相。对他们来说，背叛的最有讽刺意味的行动是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决定解除巴勒斯坦战士的武装。这个决定是秘密作出的。据推测，早在5月15日以前，在英国及其他大国强大的、难以忍受的压力下，他们作出了这一决定。当阿拉伯军队进入巴勒斯坦时，这一决定付诸实施。在他们到达巴勒斯坦人正在作战或准备自卫的地方，阿拉伯指挥官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没收巴勒斯坦人的武器。每一位跟我进行过谈话的巴解组织领导人，都着重谈到这一不可思议的但却是真正的事实。阿布·吉哈德、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是亲眼看到他们的人民被解除武装的许多人中的三位。阿拉法特自己则是被他的阿拉伯兄弟解除了武装。

“我不能忘记，”阿拉法特对我说，“当阿拉伯军队开进巴勒斯坦时，我在加沙地区。一位埃及军官来到我们分队，命令我们放下武器。开始我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们问，为什么。这个军官说，这是阿拉伯联盟的命令。我们抗议，可是没用。军官给了我一张收到我的来福枪的收据。他告诉我，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取回。这时，我明白了，我们被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卖了。我自己被他们的背叛深深触痛了。”这时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不能忘记，”阿拉法特反复地说。

阿拉法特补充说，犹太恐怖活动加上阿拉伯军队解除巴勒斯坦人的武装，两者结合，构成了巴勒斯坦人民惊恐和外逃的主要原因，并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难民问题。

阿布·杰哈德提醒我注意，在阿拉伯联盟的文件中有一份文件足以证实反对巴勒斯坦人的阴谋达到了何种程度。1948年时，他年龄尚小，未能参加战斗，可是他一直保留着他父亲和叔叔被缴武器的收据。阿布·吉哈德说：“你知道的事情是，阿拉伯联盟组织了自己的特别志愿部队到巴勒斯坦进行

战斗。你也许不知道的事情是，阿拉伯联盟对他部队的指挥官发出了秘密的指示。他们接到命令，不许巴勒斯坦人指挥任何一个大队或小队，也不能让巴勒斯坦人在任何一个大队或小队中占多数。”

“我们可以说，因为这是真的，阿拉伯国家当时表面上假装是在支持我们的事业。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企图是使我们中立。也许这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是腐败的，而且被控制在英国和其他大国手中。但是他们所作所为的记录，就足以说明一切。”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卜杜拉赫曼·阿扎姆私下评论说，当阿拉伯联盟领导人决定接受第一次停火协定时，“阿拉伯人民将永远不会宽恕我们将要做的事情。”阿拉法特在加沙蒙受了被阿拉伯兄弟解除武装的羞辱之后，决定去耶路撒冷防区。他说，在那里，他和阿卜杜勒·哈德尔生前领导的部队一起战斗了几个月。到阿拉法特回开罗时，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这场灾难的规模已经很清楚了。

1949年初，超过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民变成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的公民。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而且失去了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犹太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成为多余的难民。阿拉法特自己的经历就是巴勒斯坦人意志消沉的戏剧性证明。他告诉我：“我的亲友们建议我到美国去继续我的学习。在这种完全失望的情况下我同意了。我提出申请签证，并开始计划去美国的旅行。我为获得签证一直等了好几个月。”

据阿布·杰哈德谈，这一著名引文记载在阿拉伯联盟会议的秘密记录中。这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接受停火协议。

第四章 学生领袖

由于失望，阿拉法特着手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如果进展较为顺利并较快获得批准，他在赴美国的途中会及时获得签证。引起阿拉法特失望的原因，不仅仅是这场大灾难的事实。他发现正式的巴勒斯坦领导权仍在他的亲戚哈吉·阿明·侯赛尼控制下，他们并没有认真制定一项同新的犹太国进行斗争的计划。

阿拉法特是在他和哈吉·阿明在黎巴嫩举行的一次会议期间发现这一情况的。时间大约在 1949 年底。伊娜姆回想起他的弟弟节省他的零用钱来筹措此行路费的情景。她说：“他吃得很少，以便积攒较多的钱。”

据伊娜姆说，阿拉法特会见哈吉·阿明的目的，是想探寻是否有可用于购置武器的资金和支持一场新的军事斗争的可能。我不确切了解哈吉·阿明跟 20 岁的阿拉法特所谈的内容，但我认为大概同他请求哈拉德·哈桑给予帮助时的谈话是一样的。

在大马士革，哈拉德·哈桑曾试图建立一个游击队组织袭击以色列。阿拉法特不知此事。哈拉德说：“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天真。我们的看法是，只要我们能促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真正进行战斗，以色列将会被击败。大难过后，我们被一个念头统治着——我们必须把阿拉伯国家推向另一次战争。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必将进行报复，这就会迫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这时，我们还未开始懂得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拉伯国家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他们越是受到以色列的打击，这种心理就越加强烈。唯一了解这个情况的是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然而，他们向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公众所说的，却与他们所了解的真相相反。”

在哈拉德·哈桑决定建立一个游击队组织后的一个月內，有 100 多名在 1948 年战争中英勇敢战的战士支持他。他们自己命名为巴勒斯坦文化俱乐部。哈拉德解释说：“当我们还在自己的国家并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他们不准我们建立政治的或准军事的组织。当然，犹太人是被允许建立他们的组织的。他们建立了哈加纳这一地下的但是正式的军队；他们建立了犹太人社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预备中的政府；他们还有许许多多政治的和劳工的组织。所有这些都得到英国人的认可。我们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一般会社和俱乐部名义掩盖下把自己组织起来，例如童子军俱乐部，体育俱乐部，文化活动俱乐部，等等。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发现同样的戒律加诸我们巴勒斯坦人的身上——不过这次，正是那些不愿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文化俱乐部举行了多次研讨战略策略问题的讨论会。“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哈拉德说，“我们既无武器又无钱。我们甚至没有钱购买食品，我们在挨饿。在冬天，东西都冰冻了，我们没有水。我们常用冰盥洗，因为我们没有化冰的手段。”哈拉德处于失望之中，这时，哈吉·阿明来到大马士革。

哈拉德说：“以前，我们两家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可是，有些朋友安排我会见哈吉·阿明。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我告诉他我干了些什么。他拍拍我的背，说：‘很好。’然后我告诉他，我们需要钱。我说：‘对不起，你能否给我们一点钱？这样我们可以很好地组织起来并购买一些武器。’他

没有回答我……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战士们中间，告诉他们一切都只好取消。我第一次试图组织一支游击队的尝试就是这样完结的。”

阿拉法特说，连续几个月，他陷入极端失望的境地。“那时，我正在等待美国签证，我开始分析整个局势。我发现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我对自己说，‘不，我不离开了。’”

1950年，阿拉法特刚刚21岁，他重新回到福阿德第一大学学习工程。他的思想单纯而有逻辑。巴勒斯坦的失落是因为阿拉伯现存的旧制度的统治的无能和腐败。这些政权是如此的腐败和软弱，因而很容易受大国——特别是英国的摆布和控制。只有以革命来推翻旧制度的政权，才能改变形势。因而，也许阿拉法特是这样想象的，由一个革命的埃及来领导的未来的新的阿拉伯国家，将会同以色列战斗并击败它。所以，逻辑的推断是，阿拉法特应该全力支持埃及的民族主义力量。

1950年时，阿拉法特已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具有的过人的素质。他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有着极为良好的关系。这个组织正在策划政变以推翻法鲁克国王。这是阿拉伯所有领导人中最腐败的一个。阿拉法特现在可以很好地利用他在青少年时代和求学期间悉心建立起来的联系。

阿拉法特同纳赛尔四个最亲密的同事有经常的联系。这四个人的姓名值得一提。一个是阿卜德尔·哈基姆·阿梅尔，1948年曾在巴勒斯坦参加战斗，1953年成为埃及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阿梅尔还是纳赛尔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是凯末尔·侯赛因。他是炮兵军官，曾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1954年后是政府部长。阿梅尔和凯末尔·侯赛因实际上是同纳赛尔一起制定政变计划的两个人。阿梅尔还同纳赛尔一起建立了自由军官组织。接触的第三个人是哈立德·毛希丁，他也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1954年在一场权力斗争中，毛希丁由于反对纳赛尔被驱逐，但两年后为他恢复了名誉。还有一位与阿拉法特接触的高级人物是后来接替纳赛尔当了总统的安瓦尔·萨达特。他也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并且跟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

50年代初，阿拉法特本人未见过纳赛尔。如果他们相见，也许阿拉法特会发现，纳赛尔并不想跟以色列打仗来解放那怕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领土。纳赛尔知道，击败以色列就意味着打败它的西方倡议国，而这是他所做不到的。对此，阿拉法特一直没有察觉，直至他领导巴勒斯坦人去进行一场军事斗争而同纳赛尔发生了冲突之后才发现。

在阿拉伯军队于1948和1949年蒙辱失败后，愤怒激发了正在策划政变的纳赛尔。这种愤怒，不是直接指向以色列，而是指向腐败的阿拉伯统治者，特别是他自己的国王。他们曾在没有充足武器装备和协调作战计划的情况下白白让士兵到战场送死。

1950年，当阿拉法特从他自己极端失望中摆脱出来时，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并不是推翻法鲁克王朝的唯一的民族主义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的目标跟他们相同。虽然阿拉法特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确曾同它的高层领导建有联系渠道，他充分利用兄弟会准备提供支持的机会，当情况适合他这样做的时候。阿拉法特对我说：“你必须记住，穆斯林兄弟会曾作为志愿者在巴勒斯坦跟我们并肩战斗。”

阿拉法特很可能是两面下赌注。当时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是穆斯林兄弟

会在埃及的任何一个新政权中会有多大影响。纳赛尔的一些高级同事至少曾经是兄弟会成员。还有一些是秘密的同情者。

自从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直到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 1952 年 7 月发动政变这段时间内，实际上是穆斯林兄弟会在支配着埃及事态的进程。正是它的压力和活动的结果，阿拉法特取得了第二次战斗的经验，这次是反对英国人的行动。

1936 年，在法鲁克继承其父福阿德国王的王位后几个月，英国又强迫埃及签订了一个新的同盟条约。条约赋予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驻军 20 年的权利，并在条约期满时可继续延长。埃及的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是一个耻辱的、把自己出卖给英国的条约。可是，民族主义力量是分裂的，因而也是无力的。由于软弱无能而造成的真空，使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变成政治组织，并领导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 1950 年，当兄弟会再次出来带头时，法鲁克国王决定要利用民族主义分子。他唯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存，当老资格的穆斯塔法·纳哈斯当选，再回到总理职位时，法鲁克指示他，给予民族主义分子，包括兄弟会成员放手处理一些问题的权利。

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场破坏和骚扰运河区英国军队的运动。阿拉法特在他称为“反对英国占领的斗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他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袭击英国的阵地。他试图在他的大学里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营地。

阿布·阿迪卜当时是他的一位同学。他对我说：“我不知道阿拉法特是如何进行的，但是，他说服了埃及当局允许他在我们大学的校园内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营。他甚至要埃及人向他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阿拉法特成为我们的高级军事教官。”

阿拉法特告诉埃及当局，他的目的是训练每一个学生，只要他自愿执行反对英国的任务。然而，他的真实意图是训练新一代巴勒斯坦战士中的精华。直至 1954 年，阿拉法特才离去。那一年，埃及当局关闭了校园，禁止在大学里进行准军事活动。“我们失去了军训的方便条件，”阿布·阿迪卜说，“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阿拉法特当了我们的体育训练教员，在他的教导下，我们都成了合格的战士。事实上，我们跟以前一样进行训练，只是没有武器。”

伊娜姆·阿拉法特回忆起她弟弟的脚步明显地重新变得轻快有力，那时他已从失望中走了出来。“在我们的公寓前进出口处有一个相当大的门，经常关着。我估计大概有 1.5 公尺高。每天清晨，亚西尔总是等候着火车驶近的声音，这辆火车将载他去开罗市中心。他从不看手表，只是静候火车的声音。我们的住地离车站很近，他从我们家走到车站需要多少时间，他计算得分秒不差。一旦他听到火车临近，立即从公寓连跑带跳越过大门。他从不开门。他总是把手撑在门的顶端跳跃而过。

1951 年初，当阿拉法特正在训练巴勒斯坦和埃及学生以打了就跑的战术来对付英国人时，结识了萨拉赫·哈拉夫，即阿布·伊亚德。他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全和反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

他们第一次会见的那天，哈拉夫是为了观察阿拉法特的行动而来的。当时阿拉法特并不知道，哈拉夫完全是受穆斯林兄弟会之托前来调查他的。哈拉夫是兄弟会热心的会员。阿拉法特是想让人们知道，他有意竞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取胜，阿拉法特需要穆斯林兄弟会中他的同学们的支持。这给兄弟会的领导人制造了麻烦。他们对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有保留，一方面是因为他拒绝参加穆斯林兄弟会，另一方面由于他

同纳赛尔的最有影响的同事们关系密切。至少某些兄弟会的领导人怀疑阿拉法特是那些即将夺取政权的军人的代理人。但是，以后的事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埃及出现的很不安定和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政治局势中，当环境迫使阿拉法特必须与所有和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人保持良好关系时，他总是努力保持他的独立。当穆斯林兄弟会转而反对纳赛尔时，他的真正难题开始了。

阿拉法特十分机警地察觉，被人们看作是依附于穆斯林兄弟会是危险的。最能证实这一点的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展他的竞选活动。他在家或在宿舍，几乎给每一个在开罗的巴勒斯坦学生都打了电话。他尤为关注那些刚从巴勒斯坦来的学生。这些新来的学生还未打开行李，就常常先受到阿拉法特的拜访。

阿布·阿迪卜说：“我是从加沙到开罗来上大学的 50 个巴勒斯坦学生之一。经常是五六个学生租用一套公寓。我还记得，当阿拉法特给我们打电话时，我们是多么吃惊。他自我介绍后说：‘我在这里为你们服务。我能帮助你们做些什么？’他对每一个来到开罗的小组都这样做。”

阿布·伊亚德对第一次遇见阿拉法特的记忆是什么呢？“从一个纯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来说，我不喜欢他的埃及口音。一点也不喜欢。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个印象。但是，当我观察他训练学生时，他的突出的领导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富有活力。十分坚强。非常热情。我喜欢他跟学生谈话的方式。我记得他曾这样说：‘假如你们这样走路，这么做，你们就会使你们脚下的大地发抖，你们将会引起一场火山般的爆炸。’”

阿拉法特 1948 年得出结论，巴勒斯坦人被软弱的、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所出卖。从那时起，阿拉法特立誓将尽自己全力来维护巴勒斯坦人自己决策的独立性。那时，巴勒斯坦人还没有自己制定政策的机构。但是，这一原则仍然被用来指导阿拉法特：如果巴勒斯坦人依靠别人来为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将永远不会收复任何失去的土地和权利。

这就不难想象，阿拉法特强烈的独立精神，被他在竞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中要成为有希望的竞争者，就必须依靠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这一前景所困扰。一旦竞选获胜，就会出现兄弟会要求回报的危险。兄弟会很可能企图迫使阿拉法特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和做法。这从长远考虑，只能对巴勒斯坦事业不利。与此相联系的是另一个更为紧迫的危险。如果兄弟会转而反对纳赛尔，阿拉法特就会处于同纳赛尔对立的地位，而纳赛尔正使自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战士和新的救世主。阿拉法特在寻求一个他能影响局势的处境。他正在进行一场十分危险的赌博。当后来他真的、可怕的要失去同兄弟会的关系已成定局时，他别无选择，这对他也许绝非堪以告慰之事。

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的选举在 1952 年举行。每一位候选人提交一份一道参加竞选的将来与之合作的搭档名单。在阿拉法特提交的名单上，除他本人之外，还有八个名字。据阿布·阿迪卜说，主席的竞选很激烈。“可是，阿拉法特名单上的九人，得到的选票最多，而阿拉法特本人得到的票数等于其他八人得票数的总和。”阿拉法特名单上的第二个人是萨拉赫·哈拉夫。他成为阿拉法特的助手。由于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他经常被短期监禁。

如果说阿拉法特多么感激穆斯林兄弟会，特别是感激萨拉赫·哈拉夫，这是有争议的。从以后的事件来看，阿拉法特并不认为他要感激兄弟会在选

举中的支持。然而，他似乎认为必须感谢萨拉赫·哈拉夫本人的支持，以及他对兄弟会中当时的巴勒斯坦成员和那些以为阿拉法特是哈吉·阿明的亲属而反对他的领导的人的影响。到 1952 年，哈吉·阿明在巴勒斯坦新一代激进分子的心目中是没有信誉的。阿拉法特认为他必须忠实于萨拉赫·哈拉夫，这也许就是这位巴解主席为什么在以后年代与其老朋友、老同事在内部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而意见分歧时，总不愿采取对抗的原因之一。

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很快显示了他具有多种领导才能，他能够控制任何他参加的组织，那怕只给他一半机会去做。阿布·阿迪卜说：“当然，我们有一个执委会，但事实是阿拉法特做了 90% 的工作。”

如果阿拉法特不是在解决同学们的问题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很可能他的一些同学对他专制的领导作风会公开表示不满，甚至提出挑战。然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人都难于跟这位年青人作对，他已证实他能不负众望。

据阿布·阿迪卜及其他当时在开罗的巴勒斯坦学生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是缺钱，这主要因为他们是难民。很多人交不起学费，也缺乏必要的食宿费用。“由于他们不能预付学费，”阿布·阿迪卜说，“许多人受阻不能及时上学。”可是，阿拉法特说服了阿拉伯联盟，由他们负担全部巴勒斯坦学生的学费，这一问题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这是阿拉法特的一个巨大胜利，”阿布·阿迪卜补充说。

在那一次及其他许多场合，阿拉法特的同学们对情况明显的好转感到吃惊。这种有利变化是他们的领袖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克服了阿盟的官僚主义和埃及政府的衙门作风而取得的。阿布·阿迪卜说：“正如一个才华横溢的协商者，阿拉法特有其独特的接触上层人物的方法。他经常同部长、总理、甚至总统、国王谈话。谁也不能阻止他这样做。”

阿拉法特当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是在纳赛尔政变后不久。纳赛尔和他的同事们主要因为他们本人年轻和不知名，选择了穆罕默德·尼格比将军作为他们的头面人物。当这位将军一就职埃及总统，阿拉法特通过幕后活动，他本人及巴勒斯坦学生代表团就被邀前往拜访。尼格比曾在巴勒斯坦当过旅长，而以后的事件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穆斯林兄弟会——在他与纳赛尔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曾转向兄弟会寻求支持。

会见时，阿拉法特向尼格比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他们以此纪念在巴勒斯坦英勇作战并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巴勒斯坦人和埃及人。他们在请愿书中对这位尽人皆知的挂名首脑说的话则是，“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人。”这份请愿书最不寻常之点是用血写成的。

阿布·阿迪卜确认，早在 1952 年或 1953 年，阿拉法特首次谈到他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想法。他的同学们的反应是复杂的。据阿布·阿迪卜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阿拉法特作为学生领袖所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在他当选为主席之前的学联是无所作为的。它处于一种无活动的冻结状态。阿拉法特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我们也很钦佩他的奉献精神 and 突出的领导才能。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真实情况，我可以说，当阿拉法特提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时，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予以认真对待。我也不是想说，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反对这一想法。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不认为巴勒斯坦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这样想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大国反对我们的阴谋集团是如此强大。”

阿拉法特由于他代表大家取得的成就而受到他所有的同学们的钦佩时，

他作为一个人并不普遍地受到尊敬。在他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前的几年，显然，阿拉法特喜欢用拳头来解决争论。在他当选后，在一些情况下仍存在暴躁脾气这个弱点。

虽然阿布·阿迪卜没有告诉我他自己的情况，但他也是一个嘴上不说，但却强烈不满阿拉法特的暴躁脾气和在讨论中喜欢争执的人。大约十年之后，当阿布·阿迪卜被征询是否愿意担任法塔赫第一届执委会委员时，他表面上说：“原则上我同意，但是，如果阿拉法特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不参加。”其实，阿布·阿迪卜是许多决心迁就阿拉法特性格的人之一，他情愿为他的很多优良品质和实力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

阿拉法特认为，当他在开罗当学生领袖时，他的最有意义的成就是，成功地说服了埃及当局允许他们创办并发行一份学生杂志。杂志的名称是《巴勒斯坦之声》。阿布·阿迪卜说：“事实是，我们有一份自己的杂志，这意味着阿拉法特创造了另一个奇迹。我们知道，埃及当局并不真心愿意看到我们巴勒斯坦人有我们自己的有力的声音。……然而这份杂志正是这样。至今我还搞不清，阿拉法特是如何说服埃及当局给了他必需的许可。”

阿拉法特本人带着一种阴谋家的暗喜，向我阐述了《巴勒斯坦之声》的真正意义。“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显而易见，这份杂志不只是为学生联合会的。它负有远比这更重要的使命。在以后的年代，当我们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时，我们自己可以面向我们的巴勒斯坦群众讲话。但是，在《巴勒斯坦之声》上，我是在真正地向我们的巴勒斯坦弟兄们讲话，他们可能是在其他国家的秘密小组的组建者们。杂志发行到许多地方，包括加沙、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等。实际上，这是我们跟那些能够组织起来的人们进行接触的第一个地下渠道。”我曾对阿拉法特说，这份杂志真正起到了他在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中第一次招募士兵的作用。阿拉法特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说：“是的，是这样。”

在那些意识到这本杂志远不是可以一掠而过的巴勒斯坦人当中，除阿拉法特外，没有一个人对这一地区未来事件进程的影响能超过它在加沙的一位青年读者。他的名字叫哈利勒·瓦齐尔。他后来称为阿布·杰哈德。与阿拉法特一起，他可以说是法塔赫的共同创建人。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建立了法塔赫的第一个小组。此后，在他们当中组织和建立了小组的地下网络。在此基础上，法塔赫诞生了。面对绝大多数同事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是主张巴勒斯坦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位主要鼓吹者。法塔赫有一个中央委员会。法塔赫作为发挥作用的组织是多少人殚精竭虑的产物，包括一些已经失去联系的人，有的已经去世，还有一些人今天仍同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一起参与集体领导。

阿拉法特第一次见到瓦齐尔是在他于 1954 年初夏在加沙被埃及人监禁后不久。几个月后，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同瓦齐尔接触，阿拉法特本人在开罗被埃及人投入了监狱。要不是一只骆驼因脚踩踏在一个金属盒子上拐跛了腿，年青的瓦齐尔就会在沙漠中被埋葬了，他们两人可能就不会相遇了。

哈利勒·伊卜拉欣·瓦齐尔是一位小店主的儿子，1935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拉姆勒。当为控制巴勒斯坦所进行的争斗达到高潮时，他还不满 13 岁。拉姆勒在特拉维夫和雅法的西南，相距约 10 英里，离卢德很近。瓦齐尔及其一家如何从他们的家园被驱赶出来，这段历史是十分戏剧性的。

“我对犹太复国主义军队进攻雅法那天情景记忆犹新，事情就像发生

在昨天一样，”阿布·杰哈德对我说，“这个城市的阿拉伯人为我们在拉姆勒的人开来了一些小汽车和卡车。他们呼喊：‘帮帮雅法，帮帮雅法。’我记得，拉姆勒的男人和妇女们登上了小汽车和卡车。有一位男人带着一支老式手枪和一些小刀及棍子。在这种时候，我们都互相帮助。我们知道，犹太人如果占据了雅法，就会来到拉姆勒和卢德。果然，事情就真的这样发生了。在一个夜晚，他们包围了拉姆勒和卢德，由于约旦人不战而撤，他们的行动轻而易举。我们被围困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们的人民无法战斗，他们没有任何武器。这个城市的市长和一个代表团会见了犹太指挥官。市长对他们说：‘行，你们可以进城，但是，你们必须不伤害人民，也不得把他们监禁。你们必须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过正常的生活。’犹太人说：‘不。’他们要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我们的城市。

“当我们决定不离开时，犹太人把拉姆勒和卢德置于他们的炮火之下。我忘不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房子的屋顶被击中了，我们住在底层。接着另一枚炮弹在街上爆炸，我们的门被气浪冲垮了。拉姆勒到处都遭到炸弹轰击。市长通知大家到清真寺和教堂去避难。我们住在这个城市的基督教区，就进了罗马天主教堂。在途中，我们的一些邻居被炮弹炸死了。

“在犹太人进入这个城市以前，我们在教堂里住了两天。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一个挨着一个睡在地上。人与人之间连放一只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好把我们的腿放在别人身上。当犹太人进城时，我跑上五层楼。我从百页窗里往外看，亲眼看到犹太士兵开枪射击并杀死一些尚逗留在街上的妇女和孩子。我不能忘记这一切。随后，我注视着犹太士兵闯进我们的住房，他们用脚踢破大门，向里开枪射击。他们时而把人拖到大街上杀害。

“在教堂里，人们哭喊着。他们喃喃地说，‘狄亚代辛，狄亚代辛。’我们肯定，我们将要遭到屠杀。神父做了一面白旗，当犹太士兵进入教堂所在的街道时，他走出去会见他们。神父和士兵一道进入教堂。他们对大家说，‘举起手来。’每个人都举起双手。然后犹太人开始分隔我们。他们说，他们需要所有 14 岁到 45 岁的青年和男人。然后把他们送进监狱和集中营。我们这些被留下的全是孩子、妇女和年迈的男人。

“第二天，犹太人允许我们回到自己家里。我永远记得随后发生的一切。夜里，犹太士兵不下十次闯进我们家。他们破门而入，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他们声称要搜查武器，实际上是要使得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和恐慌感。这是他们的策略以迫使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国家。我的祖母当时已经衰老，并且病得很厉害，那天夜里犹太人每次进屋都要把盖的东西从她床上扯下来。当犹太人发现我们并不想离开家园时，他们就更加怒气冲天。

“两天后，犹太人通过他们的高音喇叭宣布了一项通知。他们命令我们离开家园，并到一条路上指定的几个点集合。他们说他们将安排几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拉姆安拉。我们在路边住了三天。夜里他们向我们上空开火。第二天，大轿车仍然未来，他们命令年老的男人步行去拉姆安拉。我和我的三个弟兄，其中一个婴儿，我的三个姐姐，我的母亲、祖母和婶婶，一起被留下了。

“第三天，大轿车来了。我们随身带着一些袋子。有一个袋子里装着一点面包和奶酪，还有一套我非常喜欢的睡衣。当犹太人告诉我们不能携带袋子上车时，我试图把面包、奶酪和睡衣带上。我以孩子天真的语气同一位司

机说话。我用希伯来语说，‘先生，先生，我想带点吃的，’我指着我的袋子。他说，‘可以，可以。’当我把手伸进口袋时，传出一阵希伯来语的大声喝斥。刹那间，母亲把我抱进怀里——她看到一个犹太士兵正瞄准我。他打了几枪。要不是母亲发现这一切，我会被射中，也许被打死。子弹恰好没有打中我，而打在我们一位邻居的腿上。他是玛萨拉家族的。现在他住在安曼。如果你去看他，他会对你说，子弹在他腿里，这是为了哈利勒·瓦齐尔的生命而作出的牺牲。

“拉姆勒的妇女和儿童最后总算被送上了车，汽车开往拉姆安拉。但是，他们的苦难远未过去，更大的折磨还在后头。

“当我们来到离拉姆安拉还有 10 多英里处时，犹太人停下轿车，要我们下车步行，他们指着远方说，‘拉姆安拉就在那儿，你们必须走过那些山岭和谷地。’于是我们开始步行。我们只能慢慢地走。有些妇女衰弱多病，每走几分钟就得停下来喘口气，歇一歇。其他一些妇女虽然能够行走，但由于背带她们的孩子而变得精疲力竭。

“第二夜，犹太人向我们发射大炮和迫击炮弹。起初我们躲在岩石后面，可是射击连续不断，每个人都开始惊慌、哭叫了……我们拼命地跑啊，跑啊，一直跑到拉姆安拉。我忘不了这一切。有的母亲抛弃了他们的孩子——她们已经太疲惫无力，再也背不动他们了。甚至我的婶婶也要我母亲丢掉几个孩子。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我的婶婶对她说：‘你带着三个孩子无法奔跑。你会被杀死的。你必须丢下两个孩子，等我们到达拉姆安拉后，我们会帮助你的。’我的母亲拒绝了。她对我说：‘哈利勒，你才 12 岁，又不很强壮，你想你能带着一个小妹妹一起跑吗？’我说，‘能，’我就这样做了。有些孩子因为没人带领被丢弃在后面。有些孩子则因为他们的母亲被杀死而被丢弃。这些情景我至今难忘。

“这一地区没有阿拉伯军队——没有正规军，没有志愿军，没有任何一种阿拉伯军队。犹太人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和住在哪儿。这场精心策划的袭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在一种非常惊慌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中抵达拉姆安拉。他们期望我们对这一段经历的描述将使其他的人产生恐惧而逃离自己的家园。迫使我们在恐怖状态下离开家园，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十分成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全部战略。”

抵达拉姆安拉后，在继之而来的更大的惊慌中，哈利勒·瓦齐尔和 50 来个由拉姆勒来的妇女儿童要设法在一辆准备开往希伯伦（即哈利勒）的卡车上寻找容身之处，从那儿他们再横穿进入加沙。在联合国分治计划下，加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埃及人在战争中占据了这块地方。在 1949 年签订停火协议时，加沙实际上变成了埃及的一部分。在同样情况下，应当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另一部分，没有被以色列占领，而变成了约旦的一部分。

阿布·杰哈德讲完这段故事后苦笑了一下，他说：“我知道你会感到难以置信，但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如果你在以色列留心作些调查，你会找到证据来证实我所讲的都是真实的，在他们的书箱中和在他们的报纸上，有些以色列人开始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在几个月前，一些以色列报纸曾十分尖锐地批评拉宾先生，当时他说出了他及其同伙在 1948 年如何把巴勒斯坦人从拉姆勒和卢德逐出。”

我曾同阿布·杰哈德的母亲谈论过上述事件。当我在大马士革会见她时，

阿布·杰哈德在好多英里以外，正被围困在特黎波里。自从我跟阿布·杰哈德谈话后，她确实尚未见过他的儿子。但是，她的叙述在每一个细节上和阿布·杰哈德所讲的完全一样。94万巴勒斯坦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只要你问及，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

至1949年，在加沙地带几乎有25万难民。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联合国1954—1956年停战监督组织的参谋长伯恩斯将军，在他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这部书中曾这样描绘加沙地带：

“这一地带大约40公里长，平均宽度为8.25公里；这样，其总面积约330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只有2/3的土地多少是可耕的，其余是从海边以不等距离延伸向内地的沙丘地。在这一地带约有31万阿拉伯居民，其中21万难民来自巴勒斯坦南部，现已成为以色列占领区。这样，一平方公里可耕地约有1500人——大约每平方英里3,900人。那儿的深井有充足的水源可供日常家用和部分灌溉。人们在较好的肥沃的土地上密植着小麦、大麦、小米，土豆、洋葱、秋葵，柑桔、李子、葡萄和西瓜。但是，就所产的食品来说，它自然只能养活人口的一小部分。21万难民的食品靠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供给。口粮标准是一天1600卡路里，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按西方标准，1600卡路里是减肥饮食。维持难民的生活费用每人每年约27美元。

“他们住在用泥土和混凝土砌块筑成的小棚子里，屋顶是波纹铁的，一行挨着一行排列着。有较充分的医疗服务，也许比他们在被逐出自己生长的村庄以前所享受的医疗条件还好些。特别是有较好的妇幼保健诊所，其结果是婴儿死亡率较低。孩子们到处成群出现。小学可以接收很多儿童。小女孩们穿着漂亮的黑白条纹的棉布衣服。小男孩穿着土黄色的衬衫和短裤。中学可以接纳相当部分青少年。考试期间，可以看到许多青年人在马路边漫步，背诵功课，此外那有别的什么地方他们可以集中学习呢？所有这些青年男女们在完成了他们的中学学业以后，又能做什么呢？在加沙地带，没有他们就业的机会，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谋生。

“在这21万难民之外，这一地区大约有3万居民，靠耕种或做小生意为生。31万人中除去上述24万人，剩下的人不符合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关于难民的定义。他们都是穷苦人，靠埃及政府菲薄的救济为生。人们在街上虽然看不到饿死或病死的人，然而，加沙地带就像一个大集中营。它为大海和人为的不能逾越的边界与世隔绝。在靠近拉法的巴勒斯坦和西奈之间的边界，埃及人不准许他们通过。人们穿越其周边停战分界线，就有被以色列人开枪射死或被埃及人拘捕入狱的危险。他们遥望东方，看着那曾是阿拉伯人的土地，那些宽阔的田野，现在被少数以色列人大面积地耕种着，以色列人的聚居点连成一串，保卫着这些高地或更远的地区。毫不奇怪，他们是用仇恨的眼光来怒视那些撵走他们的人。”

在加沙，瓦齐尔家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几位婶婶，跟一位叔叔一起住了几个月。后来情况逐渐明朗，巴勒斯坦人在近期内无法返回家园，因而瓦齐尔一家搬进了他们自己租用的住房，阿布·杰哈德说：“这是十分简陋的住房，实际上只是一个2米宽5米长的房间，我们一家14口人全住在

里面。它是用很粗劣的石头筑成的，屋顶是仓促搭就的。我无法向你叙述这段困窘的日子。有一次，大风刮走了洗菜盆。另一次，屋顶被风掀掉了，屋顶上的石头正好坠落在我母亲的头上，她被砸伤了。鲜血从她脸上直往下流。”

哈利勒·瓦齐尔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受教育。他极想继续学习。大约过了八个月左右，由于加沙地带难民极度拥挤，他发现任何学校都没有空额。在那段时期，他出售一些零星物品，“主要是供儿童们用的糖果和小玩具”，挣点钱帮助他的母亲。其后，他得到机会进入了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开办的小学。

由于他比阿拉法特小六岁，又不像阿拉法特对阿拉伯国家的背叛有亲身感受，哈利勒·瓦齐尔是在它们背叛后一二年，才开始懂得对巴勒斯坦人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他了解这些主要是听取了参加过1948年或更早些时候的战斗的那些人的介绍。到他16岁生日时，瓦齐尔沿着与阿拉法特极其相似的路线在思索。“在大灾难以后，在我们等待着能够返回我们国家的日子，我们深信，那些曾经背叛我们的阿拉伯政权将会由新的领导人来取代，他们会使阿拉伯军队强大起来。他们会真正投入战斗。”那时，叙利亚已经发生了四次军事政变。

“以后纳赛尔和尼格比上台了。”阿布·杰哈德说。“在加沙及每一个地方，巴勒斯坦人都十分欢乐，感到非常兴奋。我们确信，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变化，将会为我们重返家园开辟道路。我们把纳赛尔看成新的萨拉丁。”

阿布·杰哈德、阿拉法特、哈拉德·哈桑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们斗争中的这一时刻，都持有并重视这一看法。在1948年阿拉伯军队被击败后的政治大变动期间，巴勒斯坦老的和新的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裹足不前。在每一个他们只是希望暂时避难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都很快就投身于政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革命者；他们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和复兴党人；他们甚至成为共产主义者。简言之，只要他们能对阿拉伯政局变化发挥影响和作用，他们可以变为任何一种政治信徒。他们的目的是要劝说新出现的阿拉伯政权，把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当成所有阿拉伯人优先考虑的首要问题。说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过去和现在是最大的机会主义者，说的是表面现象。但是，机会主义是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斗争手段的名称。据传说，阿拉法特有一次曾经讲过，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就像是唯一的男性访问者在一个不祥之夜进入妓院去办公事。他的评论是针对他的阿拉伯领导人同事们讲的，意指巴解组织主席必须去勒索或者必定被勒索。

阿布·杰哈德接着说：“纳赛尔开始掌权。我们耐心等待。我们等着，等着，但情况没有丝毫变化。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我们年轻，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因而，我们不懂得纳赛尔及其他新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做任何一点事情以帮助我们返回我们的家园。我们不知道，他们也是被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大国吓坏了。我们只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再次陷入失望之中。”

哈利勒·瓦齐尔在加沙亲眼所见的事情，有助于使他相信，开罗新政权的真正意图是要加紧它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阻止他们自己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你想了解事实真相，”阿布·杰哈德说，“请看，在加沙的各个难民营就是监狱。在约旦，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黎巴嫩，在所有这些地方的

难民营的情况，也都一样。我们在难民营的人民，是完全被隔绝的，他们不允许我们有任何行动自由。他们不准我们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言论和撰写文章。他们不准建立组织和游行示威。我们试图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则被作为间谍来对待。我可以给你讲成百上千个关于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如何恐吓和虐待我们的人民，以便在我们当中发展他们的间谍的故事。”

埃及人在加沙反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中，特别有一项对愤怒的瓦齐尔是火上加油：“许多巴勒斯坦难民有这样一个习惯，尤其是在周末，他们偷偷越过边界去看望他们在以色列那边的家、他们的田园、他们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远远地眺望——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是多么痛苦。在那些犹太人尚未移来定居的地区，巴勒斯坦人有时悄悄地回到他们家中，看看是否一切完好。有时在深夜，他们从自己的园地里采回一些水果和蔬菜。我记得有一个人把自己井上水泵的电动机带回来了。这是在加沙，也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的习惯做法。但是，当以色列由于少数巴勒斯坦战士的行动而开始惩罚埃及和约旦时，埃及当局，还有约旦当局竟然说，不论以任何理由越过边界到以色列都是严重的罪行。这样就出现了成百上千巴勒斯坦难民，仅仅因为他们跨越边界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土地，就被埃及和约旦当局监禁五年、七年、甚至十年。”

阿布·杰哈德说到的战士，是一小部分参加过 1948 年的战斗并设法保留了自己武器的巴勒斯坦人。阿布·杰哈德评述道：“阿拉伯国家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解除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这些少数战士进行着相当于私自而且常常是单枪匹马的战斗。他们的努力是哀婉动人的。但是，当这类情况以后不断出现时，这些微不足道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就给了以色列领导人以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他们借此发动大规模的反对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报复性进攻，巴勒斯坦人正好也在这些国家。

这种报复性进攻，经常同一般的挑衅完全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单纯为了向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显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第一个这类严重警告是 1953 年 10 月 14 日由一名以色列年轻的官员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发出的。他的名字叫阿里埃尔·沙龙。那一天，他同他的 101 特别部队袭击了约旦的基比亚村。这次进攻是对以色列一名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遭杀害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们是被一名巴勒斯坦人扔出的或埋下的一颗手榴弹炸死的。作为报复，沙龙和他的部队用炸药炸毁了几十所阿拉伯民房和建筑物，屠杀了 66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绝大多数人的身上被子弹打得布满窟窿，而且可以证实，在被杀害人当中，有些是被强迫呆在家里，他们则在其四周进行爆炸。在基比亚村，死亡的比例是 22 : 1，阿拉伯人每打死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就打死 22 个阿拉伯人。在以后年月里，根据我自己的粗略估算，死亡比例大概超过 100 : 1，有利的当然是以色列。

以色列领导人采用报复性的战略和政策，并且告诉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在遭到毁灭的危险中，以色列是受威胁的一方。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不亚于哈拉德·哈桑所说的在阿拉伯政权中形成的失败和防御的心理。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阿拉伯领导人确实因此而感到惊慌，并且正如阿布·杰哈德所描述的，采取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控制和抑制措施。

事态进程证明，以色列人远比巴勒斯坦人更懂得阿拉伯领导人的心理。当以色列领导人知道他们的报复性进攻正在吓坏阿拉伯领导人时，巴勒斯坦领导人，特别是阿布·杰哈德和阿拉法特却正在制订他们的战略，完全错误

地相信他们可以迫使阿拉伯领导人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决定他们命运的战争。这是瓦齐尔观察了在加沙所发生的事情后，头脑中正在自然形成的想法。

瓦齐尔的具体想法，也是在阿拉法特心中早已定型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巴勒斯坦人可以用挑起以色列人越来越大的报复行动，来扭转与以色列抗衡的局势。以色列越被激起向阿拉伯国家进攻，阿拉伯国家就越需要武装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尊严，阿拉伯国家必须去进行战斗，这一天总会到来。这时以色列肯定会被击败。这就是理论。为了把它付诸实践，巴勒斯坦人需要建立突击队组织，他们能够在以色列发动一场持久的、协调的破坏活动，以激起越来越大的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哈利勒·瓦齐尔深信这是他们前进的道路，因此在 1953 年，当他 18 岁时，他决定带头在加沙建立他自己的突击队组织。“我曾秘密接受军事训练，”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受训的，谁是教官。然而，从他和阿拉法特跟我谈及的早年的情况看，显然，他是经由一位埃及军队中的少校，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成员的培训而成为突击队组织的领袖的。这位少校在开罗同阿拉法特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很有可能就是在 1948 年陪同阿拉法特和哈米德·阿市·西塔从开罗去加沙的同一位少校。阿拉法特告诉我，在 1954 年以前他本人没有见过瓦齐尔。阿布·杰哈德说，他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是在 1955 年。当我对这两个不一致的讲法向阿拉法特提出询问时，他断然说，“不，不，不。阿布·杰哈德错了。那肯定是在 1954 年。”在这件事情上，或者是阿布·杰哈德的记忆使他失望，或者是他在施放烟幕。也许是他对自己早期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仍然敏感。也有可能是，哈利勒·瓦齐尔的名字列入阿拉法特保有的 1953 年秘密受训的名单之中，瓦齐尔从那时起就表示他准备组织一个突击队小组。

当他自己的训练完成时，瓦齐尔就开始为他的小组征募志愿人员。“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确信他们是清白的。”阿布·杰哈德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埃及的各种情报机构的间谍或代理人。”我评论说。

“是的，”阿布·杰哈德回答道，“这就是我说的意思。”

因为埃及当局不允许巴勒斯坦人参加任何形式的准军事活动，瓦齐尔的训练活动就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在埃及统治下的加沙，我不得不采取跟我的父辈在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采取同样的策略。我必须佯装是在组织一个体育俱乐部。为了使我的年青战士能够适应，我经常让他们从加沙跑步到狄艾尔·巴拉赫，约有 10—15 英里距离。我们在天亮前离开，一直到天黑方返回。真正的秘密训练是在加沙附近的丛林中埋设地雷和引爆。”阿布·杰哈德所讲的丛林，大多数是稠密的棕榈树群。“在我们进行了很好准备时，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秘密行动。我们把地雷埋设在以色列油车使用的公路和小道上。”

在 1953 年的最后几个月和 1954 年的最初几周，瓦齐尔得到了地雷和炸药的足够供应。那位少校和他的同事们从埃及军队的仓库里偷出这些东西来供应他们，但是到 1954 年初，由于纳赛尔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危机日益加剧，这条供应渠道趋于干涸。当时作为内政部长的纳赛尔陷入同尼格比总统争夺权力的斗争。尼格比曾被看作是纳赛尔的傀儡。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在政府里有更多一些发言权。部分地是为了他自己生存的原因，尼格比在大力推进兄弟会的这一要求。纳赛尔以一个小小的事件为借口，解散了兄弟会，把

它的许多领导人投入监狱。

这位少校是向瓦齐尔供应地雷的关键人物，不知为什么成了纳赛尔同兄弟会及尼格比第一轮摊牌中的一名受害者。这次摊牌纳赛尔曾濒临失败。这位少校可能被发现是兄弟会成员，并且遭到逮捕。另一种可能是他被转移到远离加沙的埃及军队某部。第三种可能是这位少校决定保持一种非常不令人注目的形象。不论是那种情况，瓦齐尔再次陷入了某种失望的境地。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有相当战斗力的破坏小组，但是，现在他没有地雷。

没有一个年轻人会在追求理想中一遇障碍就迟疑不前，瓦齐尔决定自己试制地雷。他需要一个某种形状的金属盒子。这意味着他需要有铁匠的帮助。谁是可信任的铁匠呢？因为依靠当地人去做这种事是太危险了。瓦齐尔便来到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在那儿他找到一位铁匠，按照他的设计制造一只金属盒子。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瓦齐尔把甘油炸药放进他的金属盒子里，并且安装了引爆装置。然后他把金属盒子埋入边界一个地方的沙土里。按照他的计算，这里正好是一支以色列巡逻队在以后几天中途经的地方。也许他有一个应急计划，可以把以色列人引到这里来。随后来了一个名叫阿卜德尔的人，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骑在骆驼上。忽然骆驼的一只脚触到了金属盒子，它疼得放声大叫。骆驼的腿脚跛了。阿卜德尔咒骂起来。当他从沙土里用力挖出这冒犯他的金属盒子时，他带着它去到加沙的警察局。他们把它送给埃及军事情报机构的同事，他们中的两人被委派去侦察是哪个铁匠制作了盒子。

这两名情报人员在加沙进行调查。他们接到指示，如果需要，他们应查访加沙地区的每一个铁匠。他们进展得不快，但工作很有条理。终于他们在拉法找到了制作这金属盒的铁匠。这可怜的铁匠确实不知道这位顾客的姓名。当这两名情报人员正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时，铁匠的儿子开口了。“我知道他是谁，”他说，“他是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瓦齐尔。哈利勒·瓦齐尔。”

约一小时后，瓦齐尔被逮捕，被投进了监狱。埃及人剃光了他的头发，告诉他将长期被囚禁。瓦齐尔要求准许他以两个星期的时间去参加考试。他的看守大笑，并对他说，他们保证，他将不会再回学校学习。

当瓦齐尔被捕的消息传到正在开罗的阿拉法特那儿时，他很焦虑，但并不感到惊讶。他很谨慎地在上层人士中进行活动来援救瓦齐尔。显然，他成功了。瓦齐尔被捕一个月之后获得了自由。几星期后，当瓦齐尔尽最大努力来说服埃及军事情报机构不再对他密切注意时，阿拉法特秘密来到加沙会见他。

我并不详细了解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在他们也许是第一次会见中讨论些什么，但是，以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们取得了战略上的一致，即挑动以色列对阿拉伯前线国家发起更大的更经常的报复性攻击。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来写他们的结论时，他们大概会说，以色列领导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允许两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齐尔来指挥这一地区事件的进程。如果以色列没有采取以最大的兵力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的政策，很有可能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无法推进他们的事业。在那时，供以色列选择的是承认这一事实，即纳赛尔和其他有关的阿拉伯领导人都无意和以色列在军事上对抗。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之点是，瓦齐尔的突击队的

行动应该更有实效。这是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首先，要对付纳赛尔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直至最近，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是瓦齐尔赖以进行行动的地雷和炸药的主要供应者。这一来源正在急剧减少或甚至完全枯竭，仅此一点，就需要他们更加精心地选择在以色列的目标。要使这一行动后果能够保证激起以色列更大、更频繁的报复性攻击，那么，瓦齐尔必须袭击对犹太国更为致命的目标，而不是军事巡逻车。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共同制定的新的战略中，一个明显的优先考虑的对象是水源。这是以色列的新移民点的命根子，破坏水源这一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连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在当时也未必想象得到。

当时的开罗，各种事态正发展到它们各自的高潮。纳赛尔为了向尼格比施加压力，使他从总统的宝座上下来，他在4月第二次任命自己为总理。5月，他下令停止在苏伊士运河区对英国军队的袭击，以吸引伦敦方面进入谈判。那时正当阿拉法特失去了在福阿德第一大学的军事训练营地和各种设备。10月，纳赛尔批准了一个新的英国—埃及条约。纳赛尔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有英国军队将于1956年6月18日前从埃及撤走。而英国人则得到了他们说的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运河区的基地将由英埃两国民用技术人员共管7年。纳赛尔在私下表示，如果英国的技术人员是军人，他也不介意，只要他们穿便服，行为跟老百姓一样就行。但是，纳赛尔最大的让步是，他同意了英国的要求，如果在这7年内，埃及或其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受到一个外来国家的攻击——不包括以色列，英国军队可以重返埃及协助击退侵略。纳赛尔的希望是，他的和解姿态将会使西方相信他要使埃及成为西方的朋友和同盟者。当时，纳赛尔也希望西方，特别是美国，将成为他的武器供应者。他经常私下向伦敦和华盛顿保证，他无意与以色列在军事上对抗。

不出预料，穆斯林兄弟会把纳赛尔同英国签订的协定看成是把埃及出卖给帝国权势的行为。10月26日，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试图暗杀纳赛尔。随即有数百人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为兄弟会的成员，在杀害纳赛尔计划中有共谋关系。在这些人当中，就有亚西尔·阿拉法特。他的一些年青朋友也得到了恶报。阿拉法特本人不是兄弟会的成员，但他确曾利用过它；而且在加沙他曾利用兄弟会唤起人们对同以色列相对抗的关心和热情，这是违反纳赛尔的意愿和政策的。

阿拉法特被他的阿拉伯兄弟关进牢狱并横遭拷打，这是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他们把我关在监狱好几个星期，”阿拉法特告诉我。“我说，我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我不是。在那些拷打我的人中，有些人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但是，他们是想要得到一些别的东西。他们要我提供我所知道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情况——他们的姓名，我和他们联系的地点，等等。但是，他们无法使我屈服。”

这一天终于来到，当时阿拉法特转而占了拷问者的上风。“我对他们说，‘请注意，如果你们真想了解实情，如果你们真想证实我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那么，请你们去找阿卜德尔·哈基姆·阿梅尔问一问，去找侯赛因·凯末尔问一问。’”阿拉法特谈话中提到的都是纳赛尔最亲密的同事的名字，他们都是他的朋友和熟人，他们会为他担保。

“最后，”阿拉法特说，“那是凯末尔·侯赛因，他亲自来到监狱释放我。”就是这同一位凯末尔·侯赛因，曾经帮助纳赛尔制定政变计划。

阿拉法特并不知道，当他刚刚尝到自由的滋味时，埃及情报机构的一些高级官员已在发誓要对他报复。他们对没有准许他们搞垮必要时甚至杀死阿拉法特而发怒和抱怨，他们感到受骗了。他们仍然坚持阿拉法特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此后，他们又荒谬地断言总有一天他会企图谋害纳赛尔，而这正是在 1967 年战争中阿拉伯人蒙受耻辱以及终于出现战争这一事实的一个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原因。

在阿拉法特被释放时，穆斯林兄弟会的许多领导人被绞死了，纳赛尔当时已成为埃及总统。事态的发展迫使纳赛尔迅速走上了他不愿意走的道路——同以色列对抗并依靠苏联作为他的武器供应者。作了许多事以影响这些事态发展的人是哈利勒·瓦齐尔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二人在这方面并未得到以色列任何帮助。

第五章不与纳赛尔为伍

阿拉法特—瓦齐尔战略，即激起以色列发动更大更经常的报复性攻击，一开始就产生了超出他们两人预期的更快更好的效果。

1955年2月28日夜，以色列分两路向加沙地带发动攻击。这次攻击把苏联卷进来了，因而使一场地区性的冲突变成了潜在的全球对抗。事实上，苏联卷入不深。它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但也只是作为埃及的武器供应者，此后又供应叙利亚。众所周知的加沙袭击，实际上只是以色列领导人无意中多次向阿拉法特伸出援助之手中的一次。60年代末，摩西·达扬对我说，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只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双方都能够自由地拍板成交。当时，这是一个公正的看法；但是以色列的加沙袭击，迫使纳赛尔转向苏联寻求武器。

以色列人声称，这次袭击的目的是教训一下纳赛尔，从而迫使他阻止破坏者从加沙地带进入犹太国。但是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袭击加沙之前，纳赛尔和埃及当局至少已尽其能力图阻止巴勒斯坦人越过无标志的沙漠边境。对那些仅仅越境去看望一下他们失去的土地和家园的难民，就判处直至十年的囚禁就足以证明这点。如果必须计及加沙地带的地理环境，那么，事实是，直至1954年底，纳赛尔并不是他自己房子的主人。到1954年底时，应该说除了缺少一个直接环绕加沙地带的带有岗哨塔的柏林墙外，纳赛尔和埃及当局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和实际的措施，以阻止巴勒斯坦破坏者向以色列移动。在穆斯林兄弟会受打击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不得不在没有它的秘密共谋下行动。

据阿布·杰哈德谈，以色列袭击加沙的主要原因是，靠近法鲁加的一个以色列大蓄水池和水泵设施遭到破坏。“我们用了许多炸药，这次爆炸引起了大水。第二天，我亲自去探查爆炸的后果。洪水一直冲到贝特哈那，离法鲁加大约15英里，然后流入地中海。我看到洪水把犹太人移民点的种子、植物都冲走了。我们都高兴极了。”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事前就商定蓄水池和水泵设施是首要目标。

2月28日夜，以色列的报复性进攻由两排伞兵为前导。他们猛攻并摧毁了在加沙本市的埃及军事指挥部建筑物。阿布·杰哈德说，埃及驻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城市的水井。战斗十分激烈。阿拉伯方面有14名埃及和巴勒斯坦战士丧生——后者是在埃及军队中的现役正规战士；3名阿拉伯公民包括一个小男孩也被杀害。以色列方面死8人，伤9人。但是，那天夜里还有更多的屠杀。

在加沙的驻军被侵扰之前，一个要求增援的信号发到拉法。为回答这一要求，一位埃及中尉和35名士兵，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登上一辆卡车，以最快速度向加沙市前进。以色列的第二支突击队正在等候这辆装载援军的卡车，并且作好伏击准备。这一伏击告诉人们，要求增援的信号大概是一位会说阿拉伯语的以色列伞兵发出的。

这次伏击简单而又奏效。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横拉了一根电线，两端拴着汽油桶。当奔驰前进的卡车撞上电线时，汽油桶就跟汽车相撞。汽油桶爆炸了，几秒钟之内，卡车起火。以色列人紧接着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卡车攻击。着火的卡车里只有两三个士兵设法跳出来，坚持战斗。增援的22人被打死，其余13人受伤，多数人伤势严重。

纳赛尔丢尽了脸。就在以色列发起进攻前不久，他访问了加沙驻军，并告诉他的士兵们，他们可以放松一下。他特别对他们说，他不愿意使停火线变成战场，他也不相信以色列会进攻。显然，他认为他已置巴勒斯坦人于他的控制之下。在这次袭击加沙军营的事件中，被杀害的人中有些人是在床上被击毙的。

随后，瓦齐尔和阿拉法特成功地组织了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游行。这是使纳赛尔感到羞辱的第二个并且是主要的原因。阿布·杰哈德说：“在以色列人进攻之后，我把学生们集合起来，我们把自己的手绢浸染了被害者的鲜血——他们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有两个口号，这是我们传给纳赛尔的口信。‘如果你想拯救我们，请训练我们。’‘如果你想拯救我们，请武装我们。’这是我一生中在加沙看到的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之后，由于群情激奋，我们同埃及当局发生了冲突。我们焚烧了他们的办公室。这对纳赛尔是一次很大的震动。当然，我们还计划了更多的活动。”

当阿拉法特在开罗担当他的角色准备好执行任务时，瓦齐尔委派了一些代表从加沙到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包括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向他们通报以色列进攻和埃及军队失败的情况。在这件事情上，阿拉伯报纸被禁止发表巴勒斯坦的观点。但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正确地估计到，阿拉伯报纸不能拒绝登载自1949年停战协定以来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发生的这次最严重冲突的第一手材料。阿布·杰哈德说：“长期以来这是第一次，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声音，巴勒斯坦人民的声​​音，能在阿拉伯世界到处被人们听到。我们不得不叙述的情况对纳赛尔来说是个大丑闻。他蒙受了耻辱。”

阿拉法特，作为他在开罗的角色并且他仍然是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在阿拉伯联盟总部前发动了一次游行示威。他要求纳赛尔接见他和一个学生代表团，考虑并研究加沙的形势。纳赛尔急于安抚巴勒斯坦人，因而立即同意会见。据阿拉法特回忆，在会见中“纳赛尔不止四十次讲到 he 非常震惊，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么多情况——包括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为了赢得时间以便作出他的抉择，纳赛尔同意阿拉法特和他的代表团访问加沙，考察情况并写出报告。

“阿拉法特正式来到了加沙，停留三天，”阿布·杰哈德说。“我们全部时间都在一起。他给我们的人民，不只是学生，而是全体人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感到并且知道他和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阿拉法特回到开罗，向纳赛尔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主要问题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使巴勒斯坦人民赤手空拳，失去武器，难以保卫自己。看来，阿拉法特试图劝说纳赛尔，让他和瓦齐尔及其他一些人建立某种正式的巴勒斯坦防卫力量，阿拉法特希望最终能使之转变成一支突击队或打击力量——得到纳赛尔的允准。

纳赛尔不仅受到震惊和羞辱，而且陷于困境。纳赛尔不知所措，十分苦恼，而阿拉法特要求他武装巴勒斯坦人民，这又使他愁上加愁。

这位埃及总统一方面必须向他的士兵、普通民众和阿拉伯世界，表明他决不向以色列的进攻俯首屈服。他也必须设法使巴勒斯坦人平静下来并给以安抚。问题是纳赛尔无力组织他自己的人，直接投入反对以色列的哪怕是很小的军事冲突。道理很简单，埃及的武装力量敌不过以色列。他们虚弱，装备不良，而且组织得很差，士气十分低落。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利用巴勒斯坦人来还击以色列。另一方面，纳赛尔又不愿意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成为独

立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的领导人。

纳赛尔的回答是一种不愉快和不幸交织的折衷物。他决定将一些巴勒斯坦人加以训练和武装，然后派去打击以色列。但是，他坚持这种训练、武装及攻击目标的选择必须由埃及军队情报机构控制，而这一情报机构并不正式存在。简言之，阿拉法特、瓦齐尔或其他有抱负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都受排斥，没有他们发挥作用之地。纳赛尔是要两全其美。他用组织一些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办法，希冀赢得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尊敬。但是，因为他又要求埃及军队不要卷入，希望以此能够说服西方约束以色列。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不是傻瓜。他们知道纳赛尔正是为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巴勒斯坦人。当适合他的需要时，他可以让他的巴勒斯坦突击队或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人员停止进攻。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自然很失望，因为纳赛尔否定了他们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拒绝他们在埃及允诺下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补偿，他们得悉他们的行动导致了以色列的报复性进攻，这就迫使纳赛尔行动。从这方面看，他们的战略进展顺利。

阿布·杰哈德告诉我，他的秘密组织在纳赛尔决定利用巴勒斯坦人时，中止了活动。他没有说，纳赛尔曾对阿拉法特和他自己说要他们靠边站，但含意十分明显。阿布·杰哈德还说，纳赛尔派到加沙的人是一位名叫穆斯塔法·哈菲兹的少校。他的任务是招募和训练巴勒斯坦志愿人员，执行在以色列打了就跑的使命。据阿布·杰哈德谈，以色列人是少校最好的助手。“在哈菲兹到任后不久，以色列人就炮击并轰炸了加沙和狄亚巴拉赫。几星期后。以色列人再次轰炸加沙，许多百姓受伤。医院里住满了伤员。哈菲兹少校带领他的一些志愿人员巡视医院，然后对他们说：‘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必须准备献出你们的生命。’”

尽管纳赛尔正在玩火，可是他很清楚，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有限制以色列的意愿。他正在准备发动的由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人员进行的攻击，最终将导致反对埃及的大规模报复性进攻。这样他就不得不拼命争取时间以获得必要的武器和装备来加强他的武装力量。

查看一下记录，包括纳赛尔本人同外国来访的领导人、外交官以及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谈话，只能证实一个可能的结论，即埃及仓促购买武器是为了防御目的，特别是为了抵挡以色列的进攻。

1955年加沙袭击之后，纳赛尔的主要想法是使对埃及的进攻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以致以色列没有能力承担。1965年，摩西·达扬写到关于1955年的情况时说：“当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领土内行动而当地军队没有能力认真抵抗时，阿拉伯军事失败就公开地暴露在他们自己的人民面前。”达扬说的是对的。这正是2月28日以色列袭击加沙事件所表明的。这也是纳赛尔为什么急于购买武器的原因。

记录对另一件相关的事情也表明得很清楚。纳赛尔和他的绝大多数同僚都希望西方，特别是美国，成为他们的武器供应者。

如果西方即使是暗示一下他们准备认真考虑他的请求，纳赛尔肯定会要求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的人员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

当西方拒绝向纳赛尔提供武器时，他没有别的选择了。他做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他之前所做的事——他转向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也就是转向苏联

求得他的武器。1955 年 9 月，纳赛尔宣布同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一笔巨大武器交易。从此以后，苏联直接卷入了。莫斯科现在处于可以同西方大国采取同样行为的地位——利用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从那时至今，多数政治上清醒的阿拉伯国以及一些政治上尚未完全意识到的阿拉伯国家都忧心忡忡。当阿拉法特这样说时是代表了他们大家：“你们这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是太盲目、太愚蠢了。如果西方不迫使纳赛尔转向莫斯科求助，苏联就不可能有一只小手指来染指中东。少数阿拉伯人，主要是少数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真的。但是，我们穆斯林人民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者是违背我们的教义的。由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也是反共产主义的。那些把我们阿拉伯人说成共产党人的盟友的西方人，不是不了解情况就是傻瓜和罪人。”

对纳赛尔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武器交易，以色列正式的、公开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纳赛尔只有一个目的——摧毁以色列国。这一武器交易就是证明。达扬此后写道：“对以色列明确昭告关于即将到来的埃及的进攻，是捷克和埃及之间达成的武器交易……”

在研究了所有可以得到的和有关的情况之后，在我多年来同许多完全了解事实真相的以色列人进行私人谈话的基础上，我得以确信，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多数以色列当年的领导人，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纳赛尔的意图总起来都是宣传谎言。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他们有充分理由需要这么说而且广为传播。

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方法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打算和战略。这就是阿拉伯政权必须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回转过来承认犹太国。这些条件包括镇压巴勒斯坦人民，不承认他们的权利和身份——当他们被射击、被轰炸使之屈服的时候。为使这一政策取得成功，以色列显然需要成为这一地区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能强使按照它的条件解决问题。这样，以色列领导人对有关阿拉伯政权的真正担心，并不是害怕它们有一天会变得强大和有能力在战场上击败以色列，而是担心有朝一日——除非以色列保持它的军事优势——当阿拉伯人获得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以色列的报复性进攻。这种报复性进攻是以色列用以教训阿拉伯人的主要手段。如果这一天来到，以色列将不得不为其继续生存而进行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人必须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接着将会提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行为和犹太国存在的合法性这些意味深长和有根据的问题。

纳赛尔的军火交易，对以色列使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阿拉伯人的能力，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以色列为什么拼命宣传它确实面临毁灭性的威胁，原因就是为了解说服西方必须向犹太国供应它所需要的任何武器。西方领导人知道，以色列人关于他们面临的威胁性质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甚至是在撒谎。一个明显的迹象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供应以色列 50 架战斗机和坦克以及其他重型装备。以色列曾经告诉美国人，它需要这些来平衡纳赛尔很快将会得到的重武器。

在纳赛尔的采购单上，有一个项目在以色列引起了真正的惊慌。纳赛尔曾经要求并被告知他将得到伊柳辛喷气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可以从高空轰炸

以色列城市，所飞高度使得他们能够不被以色列流星喷气战斗机所拦截。这也是真的，流星喷气机作为战斗机将要被纳赛尔即将得到的米格-15 战斗机高出一档。但是，正如每一个西方专家所了解的，全面的军事力量对比，优势仍在以色列一方。即使在人力方面，以色列也占上风。阿拉伯联盟军队的全部兵力为 205000 人，其中 100000 为埃及人。以色列可以在 48 小时内动员 250000 名男女兵员。以色列人能够讲的真话充其量就是纳赛尔的伊柳辛和米格-15 能给他们造成一点麻烦。但是即使这个问题也在几个月之内就得到解决。那时以色列说服法国向它供应了神秘-4 式战斗机。从那以后，实际上以色列是这一地区的超级军事大国。

如果那些正在准备领导巴勒斯坦人民的人，特别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齐尔赞赏这一事实，事态将必然采取另一不同进程。

1956 年 7 月，阿拉法特完成了他在福阿德第一大学的学业。他从此成为一名合格的土木工程师。当我问他为什么他选择当一名土木工程师时，他说：“我的数学很好。我的专长是数字和计算。工程也是我最有用的攻读科目。它不会妨碍我继续我的军事进程——甚至有助于我。”

在阿拉法特结束他的大学生活时，他自然就不再担任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他曾利用这一职务掩护他开展政治活动。他毫不延迟地换了一个新的掩护方式。他创立了巴勒斯坦毕业生联合会并担任主席。“这样，”阿拉法特说，“我可以和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甚至在欧洲的巴勒斯坦毕业生，进行正式的联系和接触。”这位未来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还必须设法谋生。他一离开学校就在埃及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作为工程师谋得了一个职业。

阿拉法特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因为纳赛尔坚持由他自己的情报人员组织和协调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人员从加沙向以色列的袭击，他与其说是把以色列和埃及推向战争的挑动者，不如说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很快再次进行行动。

如果听凭他们一意孤行，以色列领导人大概已使他们反对埃及的报复性进攻升级到了战争的程度——尽管是有限战争。他们急切想给纳赛尔一次教训，使他永远不要忘记阻止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人员进行伤害以色列的进攻；他们热切希望及早有机会大量地摧毁现在正运抵埃及的新的苏联武器。但是，当英、法政府邀请以色列加入一项摧毁纳赛尔的阴谋时，以色列领导人获得了一个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机会。

7 月 26 日，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当时几乎全部依靠的石油进口要通过运河。纳赛尔作出这一重大的挑战性姿态，主要是由于几天前美国决定撤销对阿斯旺高水坝项目的财政支持而引起的。纳赛尔把阿斯旺高坝的建设看成埃及发展的关键。他也是伤心的，因为他看到西方一项破坏阿拉伯团结前景的阴谋。纳赛尔在察觉这一阴谋中，可以说是正确多于错误。巴格达条约在 1955 年由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签订，美国参加条约委员会。巴格达条约不只是一个不能使共产主义逼近中东的联盟。它也是一条允许英、美通过其重要的同盟者影响这一地区事态的秘密途径。这些盟友或多或少会按照大国的旨意行事。

当纳赛尔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时，英国当时的首相安东尼·艾登就决定要除掉这位埃及领导人。艾登及其政府的问题是要寻找一个侵略埃及的借口。纳赛尔并没有停止石油从苏伊士运河通过，而且他明确表示不想这样做。

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秘密商谈中制造了一个借口。阴谋的基本部分是，以色列人 10 月 29 日进攻埃及。第二天，英法政府将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及和以色列武装力量停止战斗，并从紧靠苏伊士运河的地区撤走各自的军队。英、法军队随后进驻运河地区，使埃及和以色列脱离接触，维护运河航行自由。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设想的，以及以色列人所希望的，是纳赛尔受尽羞辱并被推翻。（30 年之后，解密的官方文件披露，英国授权其情报机构刺杀纳赛尔。）

在埃及拒绝接受最后通牒后，英法向埃及机场和军事目标发起了攻击。接着伞兵部队和突击队在运河区登陆。战斗一开始，拉阿法特立即自愿到埃及部队服役。作为一名少尉，他带领埃及第一支未爆弹处理队进入塞得港。当我问及阿拉法特的感受时，他笑了。“你知道，”他说，“在地面上处理炸弹既简单又安全。因为在地面处理炸弹和地雷是有一定规则的。只要你循章去做就得以幸存。可是当炸弹来自空中，幸存者就要靠运气了——因为它没有规则。”阿拉法特似乎很欣赏他在这次战争中的职责。

11 月 6 日午夜，主要由于美国的压力，战争停止了。这次是英国、法国出了丑。对这次事件的意义，哈拉德·哈桑认为：“美国人阻止英、法行动并不是真正为阿拉伯人做多少有利的事。当然，美国人是希望阿拉伯人这样想的。但是，美国人是在真正玩弄一张聪明的牌。美国人对英国人蒙受羞辱感到高兴，他们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取代英国成为这一地区的西方主要势力——这正是所发生的一切。1956 年的战争使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纳赛尔现在是一位英雄。他已成为埃及的，一般说来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他被阿拉伯民众，包括巴勒斯坦人，欢呼为新的救世主。可是，巴勒斯坦人很快就发觉，纳赛尔并不想改变他的看法，即不能用武力来解放巴勒斯坦任何一部分土地。以色列在刚结束的战争中的前进速度，恰恰是加强了他的看法，即在他所能预见的将来，犹太国不可能在战场上被打败。

在战争中，以色列人占领了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西奈半岛全部。他们还攻占了沙姆沙伊赫和在亚喀巴湾入口处的蒂朗岛。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次把人打得晕倒的军事上的胜利。11 月 15 日，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一分遣队到达后，英、法、以军队开始撤退。对以色列人来说，症结是沙姆沙伊赫和加沙。以色列人企图继续占领那里，直至埃及和犹太人的国家媾和。这样，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开始了一场意志战。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心要以色列人退出所侵占的每一寸埃及领土，但是，这花费了他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进行努力。

在以色列占领加沙期间，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一直使那儿的活动频繁。瓦齐尔 9 月来到开罗继续他的学业。他同阿拉法特商量，他要在开罗指挥反对以色列的行动。阿布·杰哈德说：“当以色列人占领加沙时，我恢复了地下组织的活动。他们需要一些武器和弹药，但是，这时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我的突击队员们进行了一些反对以色列人的活动。取得在占领下斗争的经验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但是，我指挥的大多数行动是清除间谍和那些跟以色列人合作的奸细。”

瓦齐尔在加沙的秘密代理人之一是一位非常年青而又漂亮的女士。她的名字叫英蒂莎——意思是“胜利”。她刚刚 15 岁，是瓦齐尔的表妹。她掌握着瓦齐尔和阿拉法特的许多秘密；但是，当她在加沙时，她还有一个自己的

秘密——她和她的表哥哈利勒正在相爱中。在恋爱和随后与瓦齐尔结婚的掩护下，她开始成为法塔赫的秘密武器。

当以色列人在 1956 年占领加沙时，英蒂莎已成为一名有经验的秘密情报递送者。她从 13 岁起就是瓦齐尔许多秘密信件的信使。在以色列占领期间，她的工作是传达瓦齐尔的指示和散发号召巴勒斯坦人抵抗占领的宣传小册子。“有时候，”她告诉我，“我经常带着武器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我将一些手榴弹携带回家，藏在柑桔篮子里。我母亲发现了这些手榴弹。她非常吃惊。她说如果以色列人发现我带着手榴弹，我会被杀死的。我对她说：‘妈妈，这些以色列士兵多数是年轻男子。我是一个姑娘。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请你不要为我操心！’”

英蒂莎对以色列占领加沙时最清晰的记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包括她的家庭，采取防备措施以免他们的女儿遭受以色列士兵强奸。“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士兵在夜里闯入居民家中，把姑娘们带走，并奸污她们。当一名以色列士兵杀死了一位他要强占的妇女的丈夫的事件发生后，我们都十分忧虑和震惊。这名士兵随后又杀死了这位妇女。如果你引用我的话，我想以色列人不会说我是在撒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次事件。

“在那些屠杀后，我们自己组织起来保护女孩子们。各家一致同意，如果以色列士兵闯进谁的家中，谁就大声叫喊，以此警告其他各家。我们经常被这些喊叫声所惊醒。有些地方几户住家的入口是一条狭长的街巷，他们通常就用铁制器具设置路障。他们常常是夜晚设障，清早拆除。我的父亲有他自己的特别计划。虽然我已 15 岁，我的姐姐比我大一岁，我的父亲还是让我们同他和我们的母亲住在同一房间里。他在卧室墙边靠放着一个梯子，它可以通向屋顶。要是以色列人进来，我父亲的计划是，让姐姐和我从梯子上爬出去，逃到邻居家中。如果必要，我们再从那儿潜逃。我父亲是如此担忧，以致每天晚上都要嘱咐我们该怎么办。”

当战争结束时，阿拉法特曾被征询是否他愿意留在埃及军队中。他被告知，作为一名未爆弹处理专家，他的技术得到很高评价，他还得到提升。“他们要我训练其他人，”阿拉法特说，“我告诉他们，我已另有工作。我知道，假如我留在部队，我就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我就不能自由地开展组织工作。”

阿拉法特在学生中开展组织工作，曾使他有机会参加在布拉格和斯图加特举行的学生代表会议。虽然当时他不知道，他在西德协助建立的巴勒斯坦学生组织联络网将证实是他最好的对未来的保险单。但是，1956 年底和 1957 年初在开罗，阿拉法特和他今天高级同事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今后将向何处去？法塔赫渊源于那个时期的辩论过程。

为了谋生，阿拉法特重操工程师的职业。但是，他的生命和爱足政治。“我很激动，”他告诉我，“因为我们的巴勒斯坦学生组织已在各地生根——遍及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可是，我们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开罗的讨论中，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占优势。两人对前进的道路坚信不疑。但是，他们两人都赞同的采取独立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口号，当时未能赢得多数支持。当法塔赫领导人最后面对这一问题时，由此引起的分裂几乎毁坏了他们的组织。

“我们的第一个决定——你可以说这仅仅是一个原则性的决定，”阿市·杰哈德说，“就是我们必须组织和武装我们自己。”

第二个原则决定是，巴勒斯坦人不得加入任何阿拉伯政治党派或运动——包括穆斯林兄弟会。阿布·伊亚德，当时称萨拉赫·哈拉夫，是开罗辩论中的主要参加者。“十分明显，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憎恨政治党派，”他告诉我，“瓦齐尔说他们是‘开玩笑’。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人的家庭由于父亲、儿子、弟兄分属不同党派而正在走向分裂，一个支持这个政权，另一个支持那个政权，等等。他这样说是对的。”然而还有比这更多的。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确信，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运动，即使是一个政治性的运动，在这阿拉伯政治纷争之地，是不会被允许存在的，除非巴勒斯坦人表明，他们无意干预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

虽然开罗的辩论对要实现的目标没有作出定论，但是必须建立一个某种类型的独立的巴勒斯坦运动的思想则已确立。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现在需要献身的任务就是去组建它。在每一个有巴勒斯坦公众的国家和地方，利用学生组织作为活动的掩护，他们计划创建地下的政治基层组织，并把建立的基层组织联合起来。他们必须处于地下状态，因为没有阿拉伯国家愿意见到独立的巴勒斯坦运动出现。

1957年3月，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威胁以色列如果它不撤退，美国将支持对以色列的制裁之后，以色列结束了对加沙地带的占领。当加沙的形势多少回复到正常时，瓦齐尔离开开罗到沙特阿拉伯从事教学工作。他需要钱，但更吸引他的是有机会在那儿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网。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哈拉夫回到加沙，在难民营的学校里教书，在那里度过了几年。

阿拉法特本人曾经计划把开罗作为他的总部。他称之为家，他的家庭，他工作的地方都在那儿。由于纳赛尔现在成为阿拉伯世界重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开罗显然将成为有指望的阿拉伯革命的源泉。许多有关未来的阿拉伯政策和战略的重要决定将在那儿制定。阿拉法特企图在他的工作条件和他的雇主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地出去旅行。但是，开罗是他的基地。或者阿拉法特是这样想的。然而，开罗不是这样的地方。他很快得悉，他在埃及的出现是不受欢迎的。

要是阿拉法特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结束对加沙占领的全部情况，在他被迫离开埃及之前，他大概就会带着厌恶的心情离去。他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向以色列领导人宣读了骚动取缔法令，但是，他不知道他们之间曾拼命地讨价还价。通过联合国机构，并为了给艾森豪威尔他所需要的东西得以对以色列人变得强硬起来，纳赛尔被要求作出两项秘密承诺。一个是，他将不怙恿任何埃及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为期10年——除非他受到挑衅。另一个是，他要阻止巴勒斯坦人从埃及的土地上和加沙地带发起对以色列的攻击。

以色列人一撤出加沙，阿拉法特说，他的鼻子就嗅到了开罗的“异味”。他还感到，纳赛尔的一些同事，他以前都把他们看作是朋友和合作者，变得冷漠了。但是，第一个真正的信号是，当他“秘密”访问伊拉克回来时，埃及情报界来的对手找麻烦了。“这样的访问实在不是什么秘密访问，”阿拉法特对我说。“真正的问题是我应该告诉埃及当局我将要去什么地方并会见什么人。出于明显的理由，我没有这样做。”

这“明显的理由”是，在他访问巴格达时，伊拉克是纳赛尔的敌人。把伊拉克的统治者费萨尔国王和总理努里·赛伊德描绘成英国的傀儡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纳赛尔早就认为，他们将甘愿接受英国人提携从而可以替代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

事实上，阿拉法特访问伊拉克的目的并不是埃及情报人员所设想的那样。阿拉法特去伊拉克不是同费萨尔和他的总理晤谈。他是去同正在计划杀害他们的人会谈——卡里姆·卡赛姆准将和萨利姆·阿里夫上校。

“当我回到开罗，他们就开始压榨我，”阿拉法特说。“我的雇主对我说，我不该去伊拉克。我告诉他们，此事与他们无关，因为我的离去是不领薪金的，这是由我决定的。随后我得知，那是一些埃及情报人员通过我的雇主来压榨我。我决定，现在是我离开埃及的时候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如果我留在开罗，我就不能自由地开展组织工作。”

当阿拉法特离开埃及时，他要到达的目的地是科威特。但是，那不是他的第一选择。“我在沙特阿拉伯有一个工作等着我，但是正式的文书工作被延误了。当我正在等待时，我得到了另外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科威特，我决定前去任职。”显然，言外之意是，他认为在开罗等待允许他进入沙特阿拉伯的证件太危险了。当他到达科威特后，证件竟然很快就到了。

在同纳赛尔对抗之前，阿拉法特发现他自己和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英不一致。这一出戏的场景在科威特。

第六章黑暗中的烛光

阿拉法特在到达科威特的几周之内，再次带头迈出新的步伐，并希望其他人随之前进。九、十月间，他建立了可以被称为法塔赫的第一个地下秘密小组。它有五名成员，其中有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齐尔。

瓦齐尔在沙特阿拉伯只生活了三个月时间。他不加修饰地告诉我，有“许多理由”使他离开了那个国家。沙特人大概十分怀疑他的地下活动，要求他离开。瓦齐尔直接去开罗，他想在那儿跟阿拉法特讨论他的下一步行动。到达开罗后，瓦齐尔对阿拉法特被迫到科威特避难，感到震惊和困惑。这不是好兆头。他们两人曾互相秘密商定，设想建立一个地下基层组织网，在此基础上很快组成他们的独立的组织，他们是这么期望的。可是现在，他们从一个阿拉伯国家被赶到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哈拉德·哈桑说：“假如科威特的当权者们不给我们进行组织的自由，也许就没有巴勒斯坦的复兴。”

瓦齐尔毫不延迟地离开开罗去科威特。但是他的行动极为谨慎。他估计到他可能被埃及情报人员跟踪，因为他们急于要增添他们的关于阿拉法特和他活动的档案材料。科威特在1961年6月前还是英国的保护国。瓦齐尔在到达科威特时，竭尽全力避免引起英国安全机构对他的注意和兴趣。出于谨慎，差不多在一个月后他才作出决定，这时他已“足够清白”可以冒险去会见阿拉法特了。

当他们在8月或9月相会时，瓦齐尔显然难以判断，他们两人中谁受的折磨最重。乌姆·杰哈德后来告诉我，事实上是她丈夫比阿拉法特更容易激动；不同于阿拉法特，他拼命“把他的感情隐藏在自己心中”。她说：“可是这种自我控制对他十分危险。有时候他在家激动得都快崩溃了，我以为他心脏病发作。但不是。这就是他克制自己感情付出的代价。”

受挫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在阿拉伯世界敌对的环境中试图组织一个地下运动遇到困难。他们的真正恐惧是时间不饶人。阿布·杰哈德说：“我们，阿拉法特和我，认为只有依靠军事行动，我们才能确定巴勒斯坦人的地位。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向阿拉伯国家和世界证实，我们巴勒斯坦人依然存在，我们的问题不能被掩盖起来。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时我们还年青，对许多事情太天真……可是，我们懂得，在大国世界里枪声比语言更响亮。你可以说，我们决定我们必须采用同那些想使我们消失的人采用的同一种语言。”

当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于1957年8月或9月间在科威特进行商讨时，他们知道，对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有着强有力的反对论点。他们也清楚，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付出时间建立他们的组织，并筹集款项装备它，然后用更多的时间来训练他们的战士。可是，他们最担忧的是时间因素。不采取一些军事行动来证明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放弃斗争，这样拖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使人以为巴勒斯坦人的斗志已经彻底瓦解。

阿布·杰哈德继续说：“我们，阿拉法特和我，决定现在已是停止讨论、开始行动的时刻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经不起关于如何解放的哲理的奢侈的讨论。我可以说，有两点坚定信念在指引着我们。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依靠自己，这已无需加以证实。我们已等待了很久，希望阿拉伯人帮助我们重返祖国。可是，他们使我们失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被世界上发生的革命所激励。阿尔及利亚革命就像一把强烈的希望之火，在我们面前燃烧。

当 1954 年阿尔及利亚开始他们的革命时，他们只有几百阿拉伯人，反抗 20000 法国军队和装备精良并富有战斗经验的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向我们证实，一个民族能够自己组织起来并在战斗中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

这就是瓦齐尔和阿拉法特在他们建立第一个法塔赫秘密小组时的想法。这个小组的其他三名成员是：卡里姆·阿德尔， he 现在是科威特的数学督察员；优素福·阿米拉， he 现在在科威特拥有一家超级市场；还有一名叫谢迪德。

“当时我们对正在创建的组织的名称并不太关心，”阿布·杰哈德说，“以后，对这个组织应叫什么名字曾进行了许多讨论，一个时候名单上提出了二十个名字。从开始直到以后，我们选择了法塔赫这个名字，当时非常需要绝对保密。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防止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破坏。我们知道，他们将企图在我们内部安插他们的代理人。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组织。”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设想，第一个法塔赫小组将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方迅速发展起来的同类小组的核心。每一个新建的小组有责任筹集款项购买武器。在短期内，这些小组的领导人进行聚会，组成新组织的领导机构。这就是理论。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开始感到，他们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日子临近了。但是他们的乐观缺少依据。经过漫长的 7 年，法塔赫才从地下出现。

部分的原因看来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信任问题。在巴勒斯坦散居在外的总人口中，对多数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来说，巴勒斯坦人通过他们自己进行武装斗争来解放他们家园这种主张是荒谬可笑的。事实上，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并没有如他们为实现其主张而不得不装出来的那种野心。正如阿布·杰哈德所说，他们的主要想法是，军事行动对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是必需的。此外，他们的实际意图是使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下去，挑起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深信阿拉伯人必将赢得胜利。这是在 1957 年以及下一个十年内他们所设想的最终目标——直至阿拉伯人在战争中失败，他们是应该取胜的，如果他们的战略正确。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不能说他们把独立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说他们真正的战略是把阿拉伯人推向一场他们的政权所不希望的战争。因而，多数巴勒斯坦积极分子作出的结论认为，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真正主张巴勒斯坦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解放他们的家园。因此产生了信任问题。

但是，在法塔赫处于地下年代，为什么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发现他们只是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这里还有另一个有关的原因。多数巴勒斯坦人——群众以及许多成为领袖的巴勒斯坦人，满足于把解放巴勒斯坦的任务交给纳赛尔和革命的阿拉伯政权。跟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一样，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失去了家园是由于旧制度下的阿拉伯政权软弱和腐败。多数巴勒斯坦人看到，旧制度下的政权已腐败到变成了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傀儡，而正是这些大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了犹太国。当纳赛尔掌权时，特别是在他 1956 年取得了反对英、法的胜利后，多数巴勒斯坦人简单地设想一切都将起变化，解放巴勒斯坦将成为赛纳尔宣称由他领导的泛阿拉伯革命的首要任务。

在所有那些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者的人当中，在所有那些采

取行动企图迫使西方公众舆论想一想巴勒斯坦人的困苦处境的人当中，当时没有一个人比乔治·哈巴什博士更加支持这种想法，即巴勒斯坦人应该信任新的阿拉伯政权，特别是纳赛尔。

乔治·哈巴什，这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未来的领导人，1926年出生于利达（即卢德）。人阵这个组织曾最先倡导劫持国际航线客机。哈巴什是希腊东正教粮食商人的儿子。他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医，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位出色的有才华的学生。1953年，哈巴什同其他人包括瓦迪·哈达德一起，创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后来成为人阵恐怖行动的策划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是坚信纳赛尔在改变和统一阿拉伯世界事业中会取得成功的阿拉伯激进分子的联盟。它立誓支持纳赛尔的努力。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从1953年到1967年，哈巴什确信纳赛尔掌握了通过阿拉伯团结以实现巴勒斯坦解放的钥匙，他坚信他应利用它。

我问哈巴什，为什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反对在需要时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运动进行地下斗争的思想。他回答说：“如果你是在说，我在反对巴勒斯坦人在解放他们的国家——也是我们的国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我反对的是，那种认为唯有巴勒斯坦人才关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解放他们家园的观点。我认为，解放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我们必须和革命的阿拉伯政权和阿拉伯大众一起工作。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协调的战略。我经常跟我的法塔赫的同事们说，他们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我们跟随和效法的榜样是错误的。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是一场单纯的、典型的殖民地斗争。我们的情况不一样。由于一些大国的既得利益，情况要更加复杂得多。这不仅仅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人的问题，或者甚至也不是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美国的卷入、苏联的卷入，等等。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时坚持要同纳赛尔和阿拉伯革命政权协作的原因。我们可以说，他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因此，正如你所了解的，使我们改变了想法。”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巴什的观点无疑很容易得到多数巴勒斯坦人的赞同。

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建立了第一个地下秘密小组后不到24小时，他们被完全意想不到的坏消息所震动。谢迪德，小组的第五个成员，宣布他将不再参加将来的任何会议。他退出了。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他对瓦齐尔说：“我的境况是这样，我不能继续同你们在一起。”换句话说，正如阿布·杰哈德对我说的：“他决定他不能在我们所选择的要行进的道路上支持我们。”

谢迪德的决定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不悦。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要赢得对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组织这种想法的支持是多么困难，这个组织如果他们能自主行事将尽可能以最少的延迟来发动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接踵而来的还有更坏的消息。在随后的讨论中，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得悉，小组的另两名伙伴卡里姆和阿米拉也有许多与谢迪德一样的疑虑。七年后，卡里姆和阿米拉跟随谢迪德走向了政治迷途。他们离开了法塔赫，如果不作这样的选择而是反对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所赞同的路线，将引起法塔赫的分裂。但是，在1957年他们满足于仅把他们的保留记录在案。

在几天之内，也许是要向卡里姆和阿米拉表明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浪漫主义者，阿拉法特和瓦齐尔重新修改了他们的计划，并针对他们认为的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准备了新的进攻战略。他们认为，主要障碍是那些

巴勒斯坦人——事实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无知，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依靠纳赛尔和新制度下的阿拉伯政权来解放他们的家园。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是正确的，他们深信这种无知的存在和持续，仅仅是由于阿拉伯政权禁止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各种探讨。因而需要的是有一份地下的巴勒斯坦出版物，一份报纸或者至少是一份定期的有实质内容的杂志。它将力图说服它的读者，阿拉伯政权无意为解放巴勒斯坦而战，巴勒斯坦人必须依靠他们自己，支持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正在努力创建的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阿布·杰哈德说：“我们的看法是，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黑暗之中。我们打算出版的杂志将是黑暗中的烛光。”

这是理论，但是在他们点燃这支蜡烛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卡里姆和阿米拉的帮助下，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必须找到一位可信赖的、他们能以性命相托的出版商。他们还必须组织一个地下发行网。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各个学生组织，但是，他们还应该向那些被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严密控制的难民营渗透。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他们要为这一冒险事业集资。1958 年那一年，主要是进行筹备工作。

杂志的名称定为《我们的巴勒斯坦：生命的号角》。阿拉法特本人筹集了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款项，才使刊物得以出版。“我给以资助，噢，那是因为我方便条件，”他说。在第一个法塔赫小组留下的四位成员中，实际上阿拉法特是唯一有赚钱机会的人，科威特正在经历着一个惊人的迅猛发展时期。那儿会遇到好运。阿拉法特一到科威特，就开始从事建筑和承包工程师职业，先在公共工程部工作。在 1957 到 1964 年期间，他确实赚了一大笔钱。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毫无疑问，如果这位未来的巴解组织领导人留在科威特当企业家，他将多次成为百万富翁。“但是我没有兴趣为自己聚敛财富，”阿拉法特说。“我知道我必须为我们的活动取得财源，直至建立我们的组织。”

1959 年《我们的巴勒斯坦》创刊号出版前不久，阿拉法特、瓦齐尔和他们的同事选择了法塔赫这个名字。阿布·杰哈德说：“它是这样得来的。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运动——不是一个小组，不是一个阵线，也不是一个组织。这是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运动呢？这是一个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样，我们确定了我们的名称。我们是争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运动——HarakatAl-TahrirAl-WataniAl-Filastini。法塔赫——Fatah 是来自阿语全称首字母的倒写。

阿布·杰哈德的笑声不时打断他的故事。“许多社论是以法塔赫的署名写的。有时用其全名。有时只用 F.T.H. 三个缩写字。每个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谁是这位法塔赫先生？’他们正在说话！”

阿拉法特本人编辑了杂志的第一期直到可以付印。这是一本月刊。当稿件都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去贝鲁特旅行。在那儿他们找到一位他们可以信赖的、住在偏僻街道上的出版商。第一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们的稿件绰绰有余。“但并非经常如此，”阿拉法特说。“好几次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章和图片来排满这个刊物的 30 页或 30 页以上的篇幅。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或阿布·杰哈德，或者我们两人，就坐在印刷所赶写文章来补充空页。当我们缺乏思想时，我们就去拜访我们在贝鲁特的朋友，请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巴勒斯坦》这一刊物的内容是赤裸裸的宣传性的。当它谈及未来时，它是彻底的不妥协。正确被定义为“加速以色列消失的一切事情”。好事就是

“导致侵略国的瓦解”。和平是“向狄亚代辛的屠夫和基比亚的罪人复仇”。但是制定政策不是做游戏。《我们的巴勒斯坦》只有两个真正目的。第一，使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相信，如果他们认为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在采用军事或其他手段解放巴勒斯坦问题上真诚的，他们是受骗了。第二，说服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懂得，唯一的抉择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在解放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

阿拉法特、瓦齐尔及其他人，他们为《我们的巴勒斯坦》撰写如何对待以色列的文章时，没有故意采取激烈抨击的姿态。在这个刊物的专栏中，大部分怒气和蔑视指向新制度下的阿拉伯政权，“他们封住了巴勒斯坦人的嘴，捆住了他们的手，使他们在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抵制把他们重新组合的主张的情况下失去行动的自由。”

对阿拉伯前线国家政权来说，《我们的巴勒斯坦》是极端的颠覆性出版物。据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谈，埃及和叙利亚情报机构奉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刊物发行。阿布·杰哈德说：“由于许多阿拉伯情报机构的活动，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在埃及和叙利亚，《我们的巴勒斯坦》遭到禁止。在约旦，有时被禁。黎巴嫩和海湾国家允许刊物发行。我们还把刊物寄给在欧洲和美国的巴勒斯坦人。”

作为杂志的一名主要撰稿人，也是一名首席摄影师，瓦齐尔被委任组织地下发行网。他本人的任务之一是战胜叙利亚的查禁。“我记得有一次我乘小汽车从黎巴嫩通过正常通道进入叙利亚。我带了200份杂志在大马士革散发。在海关检查处，他们搜查了汽车，发现了杂志。‘这是什么？’他们问。我非常友好并故意炫耀自己。我用惊奇的口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该感到脸红。这是《我们的巴勒斯坦》。你留下吧，如果你喜欢它，我保证当我路过时，你可以经常免费得到一本。’当我过了海关检查处，走到看不见它的地方之后我驱车快速驶往大马士革！”

很多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那些处于阿拉伯情报机构经常监视下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人，发现阅读《我们的巴勒斯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一个名叫萨拉吉的人，他是叙利亚的一名军事司令官，”阿布·杰哈德说。“我忘不了他。他负责他所管辖地区难民营内的间谍工作。当难民们带有《我们的巴勒斯坦》而被抓获并送交给他时，他就用他自己特殊的办法来折磨他们。他穿着长筒靴踩在他们的脖子上，在他提问时就拼命不断使劲蹂躏。在叙利亚、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许多巴勒斯坦人由于阅读我们的杂志而横遭凌辱。他们总是问同样的问题：‘你加入的组织叫什么名字？’‘你知道的这个组织里的姓名都是些什么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提供任何情报。

巴勒斯坦人仅仅因为阅读《我们的巴勒斯坦》而遭虐待这一事实，对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来说，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证明阿拉伯国家及其情报机构确信，一个地下的独立的巴勒斯坦组织已经存在。实际上尚非如此，然而如果阿拉伯国家及他们的情报机构就是这样认识的，那么可以肯定地断言，许多巴勒斯坦人都会得出或者正在得出相同的结论。阿拉法特说：“正是这种力量的出现——其实，当时我们还不拥有这种力量——使我们得以建立更多的小组，并为我们的组织开拓和奠定广泛的基础。”

“唷，”阿布·杰哈德笑了，“生活道路就是这样。要不是《我们的巴勒斯坦》给我们带来这股力量，很可能我们也许已经完蛋了。”

作为法塔赫的新兵招募人，《我们的巴勒斯坦》是很出色的。在和阿拉

法特及已经建立了小组的其他人商量后，瓦齐尔负责协调征兵运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掩护身份是杂志的《读者来信》执行编辑负责人。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如何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秘密。”阿布·杰哈德说。“在杂志的每一期中，我们都为那些要给编辑写信的人一个地址。我们终于开始收到巴勒斯坦人从阿拉伯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许多信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地方小组领导人的名义写的，这些小组是政治性的小组，他们是在俱乐部或社团名义掩护下组织起来的。当然，他们在通讯中对所使用的语言很谨慎小心。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办法来暗示他们真正的目的。譬如，他们说：‘从你们的杂志中我们察觉到了一些好东西。’他们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他们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他们会说，‘我们愿意跟你们讨论一件重要事情。请派人到某某地方同我们联系。’”

我们会直接派一个人去联系。当然，我们必须采取许多防范措施。在第一次会见某个新人或小组时，双方都有疑虑。我们必须肯定他们不是阿拉伯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他们也必须确信我们不是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或傀儡。然后，当我们确信能够给予信任时，我们就在他们耳边悄悄地说：‘是的，你对了。我们是一个有很多成员的大的地下组织。我们有争取解放的政治、军事纲领。我们随时准备同你们合作。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小组，筹集资金，准备我们成为一个运动的这一天的到来。’就这样，我们把涓涓小流汇合成一条大河”

不要忘了那时阿拉法特还在当建筑和承包工程师，瓦齐尔继续教书谋生。但是，只要时间允许，他们就各自到不同地方去旅行，与那些正在建立新的小组的人亲自接触。阿拉法特负责机票及其他费用。

《我们的巴勒斯坦》共出月刊40期。到最后一期出版时，这本杂志明显地证实了它已经成功地服务于它的宗旨——法塔赫的正式而秘密成立的准备阶段已臻完成。但是，在1959年初，这个刊物的第一期出版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方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从那以后，他们献身于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的理想，这意味着，他们也从事着同纳赛尔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尖锐斗争。同那些无意同以色列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摊牌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的杂志出版40个月之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都十分清楚他俩所采取的立场的含义。如果他们现在不能为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而赢得必要的支持，作为领导人，他们将完蛋。他们将更加接近失败，超过他们两人在最黑暗时刻所想象的。

60年代初，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发现他们自己在军事行动问题上同他们的大多数同事处于对立状态之前，有三次事态发展有助于巴勒斯坦舆论转向支持那些认为巴勒斯坦人不能依靠阿拉伯政权的人。

第一次在1961年9月，埃及、叙利亚之间联合的解体。这两个国家于1958年决定联合。有些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忠于纳赛尔和他的关于阿拉伯团结是巴勒斯坦解放的先决条件的主张。对他们来说，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分裂是一个不祥之兆。如果这两个重要国家不能团结，那么被认为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的更大、更广泛的阿拉伯团结有可能吗？许多愿意依赖纳赛尔的巴勒斯坦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战略。当纳赛尔谈论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先决条件时，他的意思是，只有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了，他们才会有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来同西方特别是美国成功地进行讨价还价。简言之，只

有当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他们才能劝说美国迫使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进行某些协商。纳赛尔谋求阿拉伯团结不是为了同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的目的。这些正是 50 年代末许多巴勒斯坦人所不理解的。

第二次是纳赛尔发表了一个戏剧性声明。1962 年初，他在加沙宣称，他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虽然当时这不是公众都知道的事，纳赛尔是在响应从华盛顿肯尼迪政府发出的秘密信号。肯尼迪，如同所有美国总统要做的，每四年中有几个星期要听取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汇报。他们对肯尼迪作的汇报，正如他们和他们的前任自 1948 年以来向历届美国总统所谈的那样，贯穿着这样一种观点：美国支持以色列拒绝给巴勒斯坦人任何东西，这将对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利益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肯尼迪不仅听了他们的劝告，并且作出行动，他决定推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全面解决。肯尼迪知道，假如以色列愿意和巴勒斯坦达成某些协议，有关阿拉伯国家是会同以色列讲和的。作为第一步，肯尼迪私下压以色列至少应该允许一部分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当然，这样做同当时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是一致的。以色列领导人采用他的一贯的做法，拒绝合作。肯尼迪的第一个反应是强硬的。他告诉以色列人：不妥协就没有导弹。那时以色列正等待一批鹰式导弹交货。

当这场特殊的意志战正在进行的时候，纳赛尔接到来自华盛顿的传话，埃及领导人应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表明他无意同以色列作战，这样能够帮助肯尼迪和他本人。肯尼迪完全相信纳赛尔没有兴趣与以色列打仗。他要纳赛尔发表这一声明，目的是为了与公众取得联系。这就是纳赛尔著名的讲话的背景。他在加沙发表谈话这一事实，同这个讲话本身几乎同样重要。纳赛尔试图以他在那儿所说的话来告诉肯尼迪，也告诉以色列，如果埃及、美国、以色列能够达成一项妥协，满足巴勒斯坦人最小的要求，他将准备对付任何巴勒斯坦好战行为的爆发。最后，肯尼迪就像他的前任和后继的每一位美国总统一样，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讹诈面前退却了。当时这位总统正在勉为其难地支持他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努力粉碎“有组织的犯罪”——这是黑手党的委婉称呼。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不需要水晶球来告诉他，他正在树立太多强敌，包括某些准备杀害他的人。在黑手党要枪杀他的情况下，肯尼迪需要犹太人的支持。

第三次是法国为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所击败。这个解放运动就是世界知名的民族解放阵线。法国经历了七年多的战争之后，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意志。1962 年 7 月，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本·贝拉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

事实证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十分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把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经验用于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是正确的，深信同一个独立的、革命的阿尔及利亚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阿拉法特已准备好并等待着利用这一时机。

“我开始同阿尔及利亚革命者进行接触是在 50 年代初，”阿拉法特告诉我。“事实上，我在他们 1954 年开始进行长期斗争之前就同他们进行过良好的对话。我保持者接触，他们答应在他们取得独立以后将援助我们。我从未怀疑他们必将赢得胜利，而他们的胜利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

7 月 3 日，阿拉法特，这位从科威特来的建筑和承包工程师，同世界各国的要人一起，在阿尔及利亚聚会，庆祝这个国家从法国统治下获得独立。阿拉法特利用这可能的第一次机会，以他极大的机智和魅力提醒他的主人不

要忘记诺言。“我亲爱的亚西尔兄弟，我们作出了诺言，我们将信守诺言，”本·贝拉总统说。“不久我们将坐在一起并讨论我们如何援助你们的革命。”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阿拉法特心情很急，他带着一个特定的援助要求来到阿尔及利亚。他曾向他在科威特的同事发誓，如果他得不到本·贝拉的满意的答复，就不回来。阿拉法特希望的事情是原则上同意法塔赫在阿尔及尔设立它的第一个正式办事处。它将不用法塔赫这个名字。它可以称作巴勒斯坦局。当然，除了名字以外，它是道道地地的法塔赫。

法塔赫需要在某些地方正式地公开出现，这一点无需向阿尔及利亚人多加说明。他们清楚，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在阿拉伯中心地带就像受羁押的犯人一样。法定地不允许他们就他们的事业谈论或写作。法定地他们不准许组织起来。他们被剥夺了同阿拉伯世界以外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会见和公开谈话的机会。在阿尔及尔设立一个办事处将结束法塔赫的孤立，使它的领导人得以同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革命的领袖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接触，他们经常访问阿尔及利亚。

阿拉法特当时可以要求他的阿尔及利亚朋友给予另一不同方式的支持——提供训练法塔赫战士的便利，然后供应武器弹药。但是，对阿尔及尔的这次访问，阿拉法特决定在这一时刻跨越一座桥梁。他的谨慎是由于他知道，他的援助请求使本·贝拉处于一个困难境地。一方面，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有充分理由支持巴勒斯坦人。他相信他们的事业，帮助他们将会突出他自己的革命信誉。另一方面，这将同纳赛尔产生一些麻烦。埃及领导人肯定反对任何有助于促进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出现的行动。阿拉法特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本·贝拉原则同意他的要求。阿拉法特很高兴，甚至很激动。他取得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突破。但是，也有令人十分烦恼的忧虑。当纳赛尔得悉巴勒斯坦人将被允许在阿尔及尔向世界打开一个窗口时，他会作出什么反应？很自然，而且十分明显，他会把巴勒斯坦局看成是对他控制和遏制巴勒斯坦人政策的一个主要威胁。阿拉法特自己心里已经决定哈利勒·瓦齐尔将是去阿尔及尔建立这个局并开展活动的合适人选。如果纳赛尔给他们制造麻烦，瓦齐尔也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在回科威特的旅途中，出现了另一个理由使阿拉法特想到他最信赖的同事。

几乎在阿拉法特同阿尔及利亚进行接触的同时，瓦齐尔在加沙结婚了，新娘是可爱的英蒂莎，他年少时的情人。当他 1956 年离开加沙去开罗后，他们已三年未曾见面。此后，在 1959 年夏天，英蒂莎被问及，她是否愿意会见一个人，他是地下运动的“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我说，‘是的，当然愿意’，第二天，我被带到一个秘密的会见场所，”英蒂莎告诉我。“那儿有很少几个人。他们分成小组正在谈话，就像一个没有饮料的鸡尾酒会。有几位我认识，有几位不相识。然后，我见到了哈利勒。我们为重逢而高兴，彼此叙述着。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地问他：‘谁是那位我将要会见的非常伟大的领导人？’

“哈利勒很认真并开始观察一张张面孔。我跟踪着他的目光。然后他对我说：‘你没有看见他？’

“我说，‘没有，告诉我吧。’

“接着他笑了。‘那就是我，哈利勒·瓦齐尔，那就是你要会见的人！’

“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准备继续做我们的秘密工作？’

“我回答他：‘是的，当然。你了解我，了解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为你们在过去所做的一切。我没有变，一点也没有变。’

“他很高兴，但是他变得十分严肃。他说：‘英蒂莎，我们不再是玩游戏。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长期斗争。这将是非常危险的。阿拉伯政权将力图消灭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会遭受拷打和杀害。当我们开始行动时，整个世界会反对我们。’

“我说，‘是的，我懂得。’

“然后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中。他非常温文尔雅。‘英蒂莎，如果你已准备好，我要你为我做两件事。我希望你照管我的秘密工作。请你为我打印秘密文件并妥加保管。这是第一件事。’

“我说，‘我已准备好。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妻子。’

“我不需要考虑。‘为此我也准备好了，’我说。我吻了他。”

当时瓦齐尔还在执教谋生，只有假期他才有空出去旅行和地下小组接触。这些小组是由遍布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组成的。

从1959年夏天开始，英蒂莎跟他一起旅行。在公开场合，她是他敬慕的未婚妻。实际上，她是他的助手和所有机密的保管人。到他们结婚时，她对地下组织网——名称、人员和密码——跟瓦齐尔知道得一样多。如果瓦齐尔一旦被捕或被杀害，她将能够继续他的工作。

这一对情人原打算在1960年夏天结婚。由于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其他一些同事们的压力，他们改变了计划。当时，除阿拉法特外，正在作为法塔赫领导人出现的多数都已结婚。希望瓦齐尔推迟他的婚期，是在这样基础上提出的，婚后生活的责任和欢乐将会占去他太多宝贵的时间。简言之，事业将受损害。出于他的好脾气，瓦齐尔决定他的同事们得分。到1962年，英蒂莎大概对这些闲话已感到极其厌倦，说什么她更像瓦齐尔夫人，而不是未婚妻。

瓦齐尔和英蒂莎在加沙结婚以后，出发进行一次周游阿拉伯世界的旅行。“我们作了一次伟大的旅行，”她笑着告诉我，“但这不是我要称之的蜜月。我们从一个秘密会议到另一个秘密会议。

上午会议。下午会议。晚上会议。我们多半是在汽车和飞机上睡觉。”

工作蜜月在1962年9月8日结束。那天清晨阿拉法特从他的办公室驱车经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来到科威特机场。瓦齐尔已经用信号通知他将带着他的“秘密武器”到达。

回想起她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时，英蒂莎说：“他在机场迎接我，就像我是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我们拥抱后，他提着我们的行李上车。然后他护送我们到我们的表哥家中。”

我问英蒂莎关于她对这位巴解组织未来主席的最初的第一个印象。带着对这位男子明显的喜爱之情，她回答说：“他非常礼貌。非常友好。非常慈祥。非常热情。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多情。”

阿拉法特对他的两位朋友所享有的爱情和欢乐的反应，也许很好地促使他思考婚姻的前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陷入了热恋并订了婚。后来，在他作山他的牺牲以后，阿拉法特多少有些把瓦齐尔——杰哈德的家当作自己的

家。对哈利勒和英蒂莎来说，他亲密得就像是最敬爱的兄长。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他是第二父亲。和杰哈德的这种特殊关系，帮助阿拉法特填补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空白。

当 1962 年即将结束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理由感到满意。在巴勒斯坦方面，无可否认，确实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也许是大多数，依然对纳赛尔和所谓的革命的阿拉伯政权寄予信任。纳赛尔声明他没有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被意味着他没有即时的计划。所以，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也不能自称他们已经扭转了这一潮流。但是，《我们的巴勒斯坦》已经发出光和热。作为它的后果，到 1962 年底，已有日益增多的受其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深信，阿拉伯政权是不能依赖的。仅仅这一事实，就使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有足够理由对他们 1959 年以来努力的结果感到满意。他们还创建了地下基层组织网。它处于良好状态。可以说，法塔赫的机体业已形成，正等待着注入新的生命。

在科威特，1963 年的第一项议事日程是讨论建立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即将开始的不是很多权力之争，而是一场关于政策的意志战。阿拉法特很快将发现，自己和那些敢于说出他们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同事们处于对立地位。

第七章领导问题

直至 1963 年，地下组织网——即法塔赫，当时它的骨架已形成，只是缺少名字和血肉——的实际领导人仍是初创时的四个人——阿拉法特、瓦齐尔、卡里姆和阿米拉。阿拉法特，由于他的经验和他的人品，是四人中的领头人。在 1963 年，阿拉法特的希望是，这个组织的法定领导职务应该围绕着他来建立，因为他和瓦齐尔为推动这个组织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仅在同级人员中是首席，而且是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于 2 月份组成时，阿拉法特实际上被降级了。可以说，他被降为十人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他来说，当时最紧迫的事情，是需要发动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来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在这最紧迫的事情上，他处于少数地位。

这样，在阿拉法特同集体领导中的他的同事和朋友中的多数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意志战。这是一场原则争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之争。争论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形式的领导最适合巴勒斯坦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需要。这场意志战，首先影响了法塔赫的内部政策，后来又影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内部政策。直至 1983 年，当阿拉法特不愿再受集体领导的约束，决定不顾一切向阿萨德总统摊牌时，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阿拉法特认为，叙利亚的领导人是罪恶之源，他利用他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影响，来破坏和阻挠巴勒斯坦人旨在谋求同以色列进行政治和协商解决的每一次和每一个行动。

阿拉法特真诚的感情从未在公开场合经受这么大的打击，因为他是完全忠于他的同事的。我认为，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反对集体领导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是制造灾难的方法。显然，阿拉法特很清楚，在这种状况下，在集体领导中的个人，发觉他们自己常常处于以最正当的理由同政治上相抵触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盟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才得以生存，有些领导人甘愿自己受埃及的影响，有些受叙利亚的影响，有些受约旦的影响，有些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还有一些受伊拉克的影响，如此等等。在另一方面，有些人更多地受美国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受苏联的影响。

阿拉法特认为他们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潜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集体领导将容易被阿拉伯和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纵。其次，也是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受外来的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领导班子将无法在危急时刻或最有利时机作出有力的决定。总之，阿拉法特的看法是，集体领导将使决策的进程陷于瘫痪。

除了事件的证明以外，有关阿拉法特对集体领导制度缺点的强烈反感的唯一真实线索，来自同他的两位最高级的忠诚的同事的秘密谈话。这两人过去和现在都完全信奉集体领导的思想。但是，在另一话题下，他们告诉我，阿拉法特曾多次私下要求赋予他的决策全权。阿拉法特每一次提出的论据的实质是，如果他能以领导的名义自由作出决定，他会推动事态进程。每一次他的推断的结果是，他将早在过去就使事态取得进展，如果他曾被赋予作出决定的权力，而不是必须采取平衡行动以致作不了决定，或者虽作出了决定却为时已晚，不能把握时机作出及时反应。

先是对领导问题、然后是关于战略问题的意志战，是在特定的人物之间

进行的。可以说，早期的主要对抗是以阿拉法特为一方和哈拉德·哈桑为另一方。哈拉德富于雄辩，代表多数主张集体领导的中央委员发言。领导反对阿拉法特“不成熟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也正是哈拉德。

这一对抗发展到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就几乎要分裂和毁灭法塔赫的地步，以后又促使阿拉法特怀疑哈拉德·哈桑有朝一日要取他而代之。现在他们两人可以对这种猜疑坦率地相互交换意见。“至少有三回，”哈拉德对我说，“我告诉阿拉法特，如果他真的相信我要取得他的职位，我愿意辞去我的职务以证明他是错误的。”

哈拉德·哈桑 1928 年出生于海法。他对民主和公开辩论的迷恋，使他厌恶独裁和他称为阿拉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搞的“突然袭击思想”，这是他在巴勒斯坦少年时期形成和经验的产物。

“第一个用哈拉德这个家族名称的是一位法官，”哈拉德说。“在他之后很久，这个家族分为两支。一支拥有土地，做地产生意，十分富有。这个家族的我们这一支沐浴宗教文化。我的父亲执掌伊斯兰法规事务。他也是文化和政治事务负责人。我可以说，他很受人尊敬并很知名。我们并不富裕，但直到父亲辞世，我们生活都还可以。

“我们的家族数百年来负责管理圣乔治山洞，那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宗教信徒的圣地。每逢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家成了很有教养的这三种宗教人士聚会的场所。在这三天里，他们经常来到这里，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每次有数百人。由于人数太多，他们自带食物，但是，我们的家成了某种形式的宾馆。我们通常提供各种方便条件。我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当我六岁时，我的父亲眼睛失明了。作为长子，我不得不负起接待客人的责任。我也有义务侍留在父亲身边，领着他各处走动。尽管我还年幼，我已习惯倾听各种辩论，我想你会说，政治胚芽就是这样在我心中培植起来的。”

当哈拉德 1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作为长子，他必须承担家庭的责任，这个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当时很年轻，像是他的姐姐，他的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一位女佣人。“因此，我必须学习和工作，”哈拉德说，“由于我的责任和年龄，我不能像许多比我年长的亲戚那样百分之百地投入政治和军事斗争。但是，我参加了伊斯兰童子军运动海法支部。我曾告诉过你，英国人不允许我们巴勒斯坦人自己组织起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以俱乐部或社团为掩护进行聚会和训练。”

1947 ~ 1948 年哈拉德为武装斗争作贡献的故事，还有很有趣的一面。“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英国部队结束了值勤任务或作为调遣计划的一部分而换防时，有些英国士兵和军官就准备把他们的武器出卖给开价最高的购买者。因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购买这些武器展开了竞争。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我在英国军队的通讯处找到一个工作。我的特殊任务是查明各种部队何时撤离。然后，我有责任从准备出卖武器的士兵和军官手里购买武器。很遗憾，我于得并不顺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并负有同样使命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犹太妇女。实际上她是一个英国犹太人。由于她有钱和漂亮，多数情况下她占上风。”哈拉德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这个故事。“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重逢。”

1948 年 4 月的一天，哈拉德下班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家人已经逃离了。海法被犹太军队所占领。上个星期发生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哈拉德说：“你

知道，犹太人经常说，除非你是一个犹太人，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纳粹大屠杀后的感受。我相信那是事实。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说法也是事实。除非你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在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的感受。由于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真的相信，一旦犹太军队进入我们的城镇，我们将被杀尽。我母亲给我留言，她决定保住五个人的生命比失去六个人好。”

哈拉德乘坐的英国军队工作人员的汽车被哈加纳的一个巡逻队拦截，停在他家附近。“巡逻队的领导人蔡姆，出身于曾是我们家的朋友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在孩提时，我和蔡姆有过许多争吵。现在他要把我投入监狱，还声言他要审问我。我担心我将被杀害。英国军官拒绝把我移交给他。蔡姆对我说，‘这次就算了，但是我们将会再见。’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当英国人不再在这儿保护你时，我将逮住你’！”

在犹太人控制海法的几天之后，哈拉德拿不准是留下还是离开好。在他踌躇未决时，他跟一些犹太朋友通了电话。“他们说，如果我去他们那儿，他们将帮助我。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我将离开。’然后，他们中的一人对我说：‘你看，犹太人并不都是一个样。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不是那种想伤害你们或者强占你们土地的人。当你们的人民回来时，他们应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我不能说这些犹太人想保护我是出于全然错误的理由。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们对前途是十分恐慌的。他们相信，我们巴勒斯坦人总会重返我们的家园，他们期望把他们的保护作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保险单。然后就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我说了一声，‘再见’，并把电话挂上了。”

在第一个停战协定结束之后，哈拉德的英国朋友告诉他，不再有什么希望了。犹太人将取胜。巴勒斯坦人完结了。哈拉德决定移居肯尼亚。他考虑将乘澳大利亚女皇号轮出发旅行。轮船在海法港外停泊，准备运载 1000 名英国军人，几百名埃及人，他们都是为英国人服务的厨师和勤杂工。哈拉德从埃及在海法的名誉领事那里得到了去肯尼亚的签证。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乘坐英国的军车到海边。在那儿等待乘小船上澳大利亚女皇号轮船。我正在等船时，来了一些以色列士兵。他们要逮捕我。两位英国宪兵插入了我和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人开始叫喊，要求英国人让开。‘这是以色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当局。’

“当他们正在争吵时，小船到了。我跳了进去，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祖国。我应该对那些英国宪兵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哈拉德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的旅行在赛得港突然终止了。他没有健康证明书，因而被埃及卫生部门隔离检疫。“英国行政官员试图帮助我。他指出我是过境。像其他地方的官僚们一样，埃及人不想知道这些。如果我有钱贿赂他们，事情就会另一个样子。不幸的是，我身无分文。”

几星期后，哈拉德被转移到西奈火热沙漠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我们约有 16000 人住在帐篷里。它名为难民营，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关押巴勒斯坦难民的埃及监狱。”

哈拉德在难民营居留的年月里，忙于从事各种工作。他办了一个学校，他自己承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他自愿在难民营诊所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管理难民营的事务并尽量充分利用难民营有限的设施。他自己委任自己为难民营里组织逃亡的官员。

“我优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并决心同以色列战斗的年青人逃离。出于同情，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些人。譬如有一位从海法来的男人，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儿。她在难民营出生，由于她的妈妈没有足够奶水而死去。然后这位可怜的男人的妻子也死了。我为他安排逃往开罗。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他又给我以帮助。那是在他家洗了一次澡，这是一年来的第一次。”

我问哈拉德他如何组织逃亡的。“我用我仅有的东西——食物未引诱埃及警卫人员转向我们。真主知道，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但是，它比埃及军队赖以生存下去的食物要好一些。到我安排我自己逃跑时，我已失去了我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

哈拉德逃离难民营是在埃及当局宣布西奈难民营的居民将要转移到加沙以后不久。“我不能上那儿，”他说，“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到某个地方，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

此后的几个月，哈拉德实际上成为阿拉伯情报机构追捕的逃亡者。“在开罗，后来在约旦，我发现凡是想要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工作和主张自由地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人，都无立足之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家人是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某个地方。经过一番斗争，哈拉德得到了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的签证，然后终于到了贝鲁特。从那里，他用从大马士革一位亲戚处借到的最后一点钱，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去西顿。“我正前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进行下去——没有联系的人名，没有地址。我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有谁会知道我的家？我将如何探询我的家人？此后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的。”

“突然，没有清楚意识到的任何理由，我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并让我下车。我把最后一点钱付给了他。随后，我看到我的一位表兄正在从我下车地方对面的大楼里走出来。起初他没有认出我，我呼叫他。我们亲吻，流泪，然后我问：‘我的母亲在那儿？我的母亲在那儿？’

“我的表兄被问呆了。‘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母亲在那里？’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她在这里，就在你停车的地方！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和家人重新团聚，自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也是富于戏剧性的。我的母亲曾经明白表示，对于第一个带给她我还活着的消息的人，将给以一条金项链作为奖赏。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她每天都独自一人在自己房里度过一段时间——她为舍弃了我而感到内疚，哭得心都碎了。她相信我已经死了，因而不断地谴责自己。起先没人急于上楼去告诉我的母亲关于我的到来。我的弟弟、妹妹及其他人担心我的出现对她震动太大，说不定会犯心脏病。我的胃缩小了，我瘦了许多，我的头发几乎拖到背上。”一位名叫纳赫拉的16岁的美丽姑娘，开门迎见了哈拉德和他的表哥。“就在那一瞬间，”哈拉德回忆，“我想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妻子。”后来纳赫拉真的同哈拉德结婚了。由于她报告了哈拉德还活着的消息，她得到了金项链作为奖赏。她的小妹妹终于上楼去叫哈拉德的母亲，她得到了另一件礼物。

“当母亲见到我时，她激动得站不稳了，我以为她会倒下。她哭喊首，然后，她对形势使我们处于十分可怕的境地而感到非常生气。她为未能好好养育我们而感到羞愧——她以为我会饿死。她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惭愧。我住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盥洗室。房间太小了，当我躺下睡觉时，我不得不把

我的腿伸向盥洗室。

“在随后的时日里，我发现我的母亲变化太大了。我父亲去世时她才 28 岁。她现在已不再是温柔天真的妇女。她是坚强的，并已准备好成为一家之主。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对我说：‘哈拉德，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家境太坏了。除面包外，我们每月从红十字会领取的食物不够供养全家。四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只能靠面包和洋葱度日。”她还告诉我，当我在巴勒斯坦工作时，她积蓄起来的工资都已用尽。接着她谈到了金子。我们的传统是丈夫把金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妻子。这是我们为妻子和家庭提供未来安全保障的一种方法。

“她对我说：‘哈拉德，我有一些你父亲给我的金子，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他的嘱咐。在他逝世之前，他说金子只能用于两个目的：一是支付他的孩子受教育的学费，一是满足我们客人的请求。如果我们需要食物和衣服，我们必须工作。这些就是他的叮嘱。’

“我问我的母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她说：‘哈拉德，我就要作出一个决定，并且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有四个儿子。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都很聪明。他们在他们班上经常是名列前茅。第四个儿子在学习上不是那么聪明。我已决定第四个儿子必须结束学习，开始工作。你同意吗？’

“当我回答同意时，她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黎巴嫩法律规定巴勒斯坦人没有工作的权利，’她说。‘你必须运用你的一切力量，为你最小的弟弟谋一个职业。’”

哈桑弟兄中的老四终于找到了一个汽车油漆工的工作。“正式说来，他不是受雇，”哈拉德说，“他只是帮手，报酬是秘密地付给的。他挣的钱确实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我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都必须去工作，而我还想继续我的学业。在我脑海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组织一个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组织。”

哈拉德决定到叙利亚去碰碰运气。先是 1950 年，后来又在 1951 年，他在那儿试图组织突击队的想法没有成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的第一次尝试由于哈吉·阿明·侯赛尼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而告吹。

在那次失败之后，哈拉德的命运有了好的转机。他附属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学院，把当英语和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自由职业，开始得到优厚的报酬。“我按时计酬，而我的聘请人多数都很富有，”他说。

在叙利亚，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继续认真进行反对以色列斗争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同兄弟会叙利亚分会合作下，哈拉德试图再次努力组建一支巴勒斯坦袭击力量。这一回，他得到也在叙利亚工作的他的弟弟阿里的一些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里和我得知，兄弟会大马士革分会的领导人穆斯塔法·西巴伊急需教师教他学英语。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是叙利亚议会的副议长。阿里得到了当英语教师的职业。然后，他安排我在西巴伊办公室工作。我本人不是兄弟会成员，事实上，我跟你讲真话吧，他们拒绝让我成为一名会员，因为我不能每天按时做五次祈祷。我不能因为必须祈祷而去祈祷。我只有在自己想祈祷时才去做——我从小就是这样做法。”显然，哈拉德的左道邪说没有伤害他和兄弟会的关系。

叙利亚的国防部长是马鲁夫·达瓦利迪。他是兄弟会的秘密会员。哈拉德与西巴伊和达瓦利迪接触后达成一项交易，他希望能导致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的形成。那时，在大马士革的急切想重新同以色列进行战斗的巴勒斯坦人，以童子军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同西巴伊和达瓦利迪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是，哈拉德的人需要全部成为兄弟会的会员。交换条件是，西巴伊和达瓦利迪将安排童子军在山里受训并加以武装。“在这种方式下，我利用兄弟会作为掩护，”哈拉德说。“由于我们受到西巴伊的保护，叙利亚政府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将会看到我们在边境发动我们的军事行动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正当我们准备好开始我们的秘密训练时，大马士革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一切都完结了。”

11月政变是两年内叙利亚的第四次政变。从那以后，哈拉德再次成为一名逃亡者。他被逮捕、监禁，可是，当他向新的叙利亚军事情报头目证实他不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时，他被释放。1952年夏天以前，哈拉德再次失业。“犹太人把我们赶出家园。阿拉伯人不希望我们在他们的国家存在。在这时刻，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经历之中。在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失去土地、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失去食物、失去尊严的民族，而最坏的是失去了希望。当你被剥夺了尊严，你变得更像牲畜而不像人——但是你的存在还有一定意义。当你失去了希望，你就失去了一切，你什么也不是。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国家和那些大国期望于我们的。他们要结束巴勒斯坦的历史。”

使哈拉德更加沮丧的是，他再次担起家庭这付重担。当他从西顿移居大马士革后，立即就请他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到他这里来。他不忍心让他的最小的弟弟在需要继续学习的时候去干工作。“他们都来了，可是现在我的母亲的金子都用完了。唯一可庆幸的是，我的最小的弟弟比我们其他几个最先完成了学业——被认为最不聪明的人得到这样结果还是不错的。现在金子用完了。我们受到了教育，却再次陷入饥饿。

“当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我的母亲建议我应当结婚。我提醒她在西顿时她对我说的一番话，那时我说总有一天我要跟纳赫拉结婚。她当时说：‘哈拉德，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工作，前途渺茫。你身无分文。除非你能给纳赫拉安排一个生活有保障的未来，否则你连结婚的念头都不能有。’

“我说：‘妈妈，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我再次没有工作。我仍然前途渺茫。我还是身无分文。’

“在那些日子里，由于她自己的经验，我的母亲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的对答。‘这不由你，’她说，‘这是真主的事。或许当你结婚时，真主会带给你好运气。’”

一份巴勒斯坦企业家发来的电报到达，告诉哈拉德已为他在科威特找到了工作。这时他无钱复电。一位朋友给了他一点钱。当从科威特寄来的机票到达时，他没有钱雇出租汽车去机场。还是这位朋友为他雇了出租汽车并送他去机场。

在科威特，哈拉德作为一名企业家开始了很有希望的新生活。这是从事进口的企业。他到任后不久就陪伴他的雇主进行了一次长途国外旅行。由于哈拉德的谈判技巧，这次旅行颇有成效。他们旅行归来，经过联系在科威特建立了许多新的代理处。哈拉德说：“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我没有得到

我的劳动报酬。我从早上八点工作直至午夜。几个月后，我欠了相当于九个月薪金的债务。因此，我对我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向我的雇主建议，我们应该重新组建这个公司。我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建立一个董事会，董事应取得一定比例的利润。”自然，哈拉德建议他应是一名董事。“我的雇主拒绝了这一计划。我说，‘好。再见，谢谢你。’”

已经上到了梯子的顶端，哈拉德发现自己又落到了底层。在 24 岁时，他表现有才能，在很多方面做出好成绩，他成为在科威特发展部服务的一名打字员。“当时，科威特仍是英国保护国。不到一年，我成为发展部的助理秘书长。后来，我是计划部的助理秘书长。随后决定我担任市政委员会秘书长。它实际上是政府。”

如果说，在其他所有人之上有一个人是对科威特的发展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哈拉德·哈桑。“英国人企图停止我继续拥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和力量。他们放风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颠覆分子。他们关于我的种种说法纯属胡言。幸运的是充分负责的、正派的科威特人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在阿拉法特到达科威特之前，哈拉德和其他人试图依靠他们自己建立一个政治党派，然而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事实上，这个党曾经建成，但是，它从内部被分裂和搞垮了。因为创建者们在如何领导这个党及由谁来决策等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对将来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位要当党的领袖的人物具有同阿拉法特一样的思想方法。哈拉德说：“他愿意跟我们磋商，但是，他要由他自己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我离开了这个党。此后，直至我遇到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及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之前，从政治上来说，对我是十分艰难的时期。”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是指卡里姆和阿米拉。

1960 年，哈拉德在第一次会晤法塔赫的四位领导人之后，开始为《我们的巴勒斯坦》撰写文章。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科威特的同一块几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却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未相会，这是令人困惑的。当然，这可能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从事地下工作十分秘密，因而哈拉德不知道他们的行动。但是，也有可能，由于彼此听到有关对方的传闻，因而两人不急于相会。他们也许已经感到，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哈拉德确信，不是阿拉法特，而是卡里姆和瓦齐尔建议吸收他和他的伙伴来讨论关于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我问哈拉德，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时，他为什么坚持集体领导。“首先，你必须考虑我的背景和出身。”他说。“我曾告诉你，我出生时就浸沉在公开辩论的传统之中，这是从童年起的我的经历。所以，你可以说从一开始我就争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只是一部分。我也反对突然袭击思想。我懂得政变只能导致更多的政变和社会流血。

“如果你愿意找一个实例来研究我所谈的情况，请看叙利亚。在以色列诞生以后，直到 1970 年，在那个国家发生了十次军事政变。现政权靠镇压它自己的人民才得以维持它的权力至今。这是独裁的反映。这是突然袭击思想。这是阿拉伯世界的毛病。这不是我希望我的人民所应走的道路。”

集体领导，同其他事物一道也是防止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成为独裁者的一种手段。这是特别用来控制阿拉法特的一种手段。他有一个像是暴徒的名声，像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准备着呼喊、叫嚷、鼓出发怒的眼睛，一意

孤行，他被许多已成为他最亲密的同事看成是潜在的独裁者，他有了机会自己就会建立一个军事力量基础，用武力来强加他的意志。这由于有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了确认。此人即哈尼·哈桑，哈拉德的弟弟。他支持阿拉法特的道路，使军事选择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正如时间将要向所有他的最亲密的同事们证明的一样，做一个许多人担心他会变成的独裁者，不是阿拉法特的本性。但是，在 1963 年出现了许多表面现象与此相反。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瓦齐尔应该尽可能快地去阿尔及尔建立巴勒斯坦局。尽管本·贝拉总统向阿拉法特保证，没有什么麻烦的问题。但是，在集体领导班子中瓦齐尔的多数同事们显然认为，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加之法塔赫没有资金，瓦齐尔得到指示，把他的妻子送回加沙她的父母家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她将一直留在那儿，直至瓦齐尔把办事处实际上设置起来。他们结婚才六个月，哈利勒和英蒂莎并没有为这分手的命令所激动。但是，中央委员会已经说了，他们就得如此。

第二个决议是如哈拉德向我所描绘的关于“维护法塔赫纯洁的规定”。决议规定，凡是要求加入法塔赫的人，首先要退出他们原来所属的任何其他政治党派或团体——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认为所有阿拉伯政党都是受政府操纵的集团，”哈拉德说。

这一维护纯洁性的规定之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系出自三个原因。首先，要使巴勒斯坦人自己确信法塔赫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组织。“我必须指出，开始我们对此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和天真的，”哈拉德承认。“1963 年时，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能够真正独立作出我们的决定。直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完全独立的，除非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作出维护纯洁规定的第二点理由是，必须缩小这些政府情报机构危害的范围。他们都在企图渗入法塔赫，这是当然的事。第三，必须使个别的阿拉伯国家相信，法塔赫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工具。

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开始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哈拉德所形容的“持续、沉重和惩罚性的讨论”之中。他补充说：“经常是这种情况，我们下班后就直接去参加会议。会议持续通宵，我们又从会议回到工作。从黎明到清早上班之前能够睡上一会儿都成了一大享受。”

中央委员会对解放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而刊载在《我们的巴勒斯坦》上的文章也没有留下多少供人们想象的内容。这是一本宣传性的刊物，而不是政策性的文件。在西方，人们经常说，如果那些法赫塔和巴解组织领导人，从一开始就以清醒和现实的眼光提出他们期待的合理的要求来拯救他们的人民，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能够避免自 60 年代以来他们所曾经遭受的许多苦难。但是，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它忽略了法培赫的真正目标。

组成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西方模式政党的创始人。正如哈拉德向我说明的，他们从未企图要对他们的人民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对你们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政策，现在请投我们一票。”在 1963 年，支持哈拉德·哈桑想法的多数法塔赫领导人的目标实质上就是防止巴勒斯坦问题被掩盖起来，然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在内的民主机构，在那里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斗争的最终结局。这是前进的民主道路，无论如何没有别的选择。在 1963 年及其后的许多年，如果哪一个巴勒斯坦领导集团鼓吹，甚至事实上承

认犹太国，它将被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所唾弃。如果个别领导人这样做，他们将会被暗杀。

1959年之后，主要由于《我们的巴勒斯坦》所发起的辩论，使得少数但却日益增多的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看到，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在于把现存的两种想法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同意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观点，不能依靠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运动，以说服阿拉伯政权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同意那些人的主张，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协调他们的战略，因为事情很明显，没有阿拉伯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到头来巴勒斯坦人无法收回他们祖国的即使是部分的土地；显然，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将成为这一协调的障碍。信奉这第三条道路的人在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占有多数。他们的领头人是哈拉德·哈桑。我和哈拉德详细交谈中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他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承认，阿拉伯政权不会同意参加一场真正的解放斗争，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因而，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实质性差异，是在如何迫使这些政权卷入进来的问题上。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哈拉德对我说，“是仔细考虑纳赛尔所宣布的战略。正如你所知道的，他的口号是，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即使他在阿拉伯团结上取得成功，他也不想军事上同以色列对抗。正如我们逐渐了解的，他的看法是，团结将赋予阿拉伯政权以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讨价还价的实力，迫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影响——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原则上我们同意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寻求的团结是不会实现的。纳赛尔正在高谈阿拉伯团结，然而我们很清楚，阿拉伯国家分歧太大了以致无法团结。

“我们的结论是团结必须来自底层——来自人民。因而我们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或事业是阿拉伯人所不能反对的？回答是：巴勒斯坦的解放。对所有阿拉伯人民来说，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光荣的和神圣的事业。它甚至是一个神圣的义务。这样，我们把纳赛尔的口号反转过来。我们说，解放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团结的关键。这样就明确了我们的战略。

“通过公开辩论和利用我们所有的全部宣传手段，我们要激发和掌握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群众的创造力。我们考虑，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敢于在他的公开讲话中忽略解放巴勒斯坦这一主题。不管他们私下怎么想，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的讲话。因此就给了我们机会。此后，当阿拉伯领导人由于本国群众的压力而采取行动时，我们就可以使他们和我们对话。我们将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制定一个真正解放我们祖国的共同战略。我们要求他们给予支持，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责任帮助巴勒斯坦人，而是因为他们还有责任防止犹太复国主义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如果这些领导人同意和我们合作，那将给所有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带来希望。如果他们排斥我们，我们将引发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群众同这些政权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目的是要激发一场真正的阿拉伯革命，结局是使上台的政权将具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志。

“这是我的想法。我把法塔赫看成是火车头，它将带动阿拉伯火车走向巴勒斯坦的解放。不幸的是，我发现火车大部分不能运转。”

哈拉德似乎说过，他彻底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直至执政的阿拉伯政权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愿这一时刻。“这是我当时的观点。”他证实说。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由于他们急速的军事行动计划遭到反对而感到“十分沮丧”。其后的事件表明，他们是如此地灰心，以致他们至少考虑过离开中央委员会和建立他们自己的分离出去的组织的可能性。但是，这是最后采取的一种选择。通过暗示他们也许准备采取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步骤，他们保险对全面的战略和政策将不会早日付诸表决。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在寻找途径以增强他们自己的地位，并向他们的同事施加压力。

在开展这样的行动中，必须采取的的第一个行动似乎就是把哈拉德的弟弟哈尼·哈桑从德国召请回来。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比他更热切于开始反对以色列的战斗。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哈尼发现他自己将站在阿拉法特一边反对他的哥哥。

到1963年，哈尼像阿拉法特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为他这一代最强有力的学生领袖。直至一年以前，他力量的基地还远离战场。他是欧洲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也是许多加入学联的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仅在西德，就有3000巴勒斯坦学生和65000巴勒斯坦工人。1962年，当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在其加沙代表大会上选举他为主席时，哈尼加强了他掌握巴勒斯坦学生力量的地位。从那时以后，哈尼处于能够影响和左右各地巴勒斯坦学生政治行动的位置上。他在德国还组建了他自己的地下突击小组。它没有武装，但在进行秘密训练。

哈尼说：“告诉你我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的情形，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斗争。他要我把学生和我自己的突击小组交给他和瓦齐尔。我说可以，但我告诉他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约旦必须成为战场的一部分。我们在德国的组织的理论是，我们必须解放约旦。阿拉法特说：‘不，不，不，不。’他准备作出任何其他让步，以取得我们的支持，但是，他不愿意，那怕是花一秒钟考虑反对侯赛因的想法。

“随后我遇到瓦齐尔，是他真正使我信服了。他说：‘瞧，你有一个好的组织并准备进行战斗。但是，你没有独自进行战斗的手段，你不能孤军作战。你必须成为一个大的很好装备起来的军事组织的一部分。我们是这个大的组织。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讲到这里，哈尼笑了。“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由于他急于得到我的支持，瓦齐尔给了我许多关于法塔赫军事实力的假情报。他说他们已有一支庞大的秘密军队和许多武器。他甚至跟我说他们有一些直升飞机。我还应该说，瓦齐尔和阿拉法特没有告诉我他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有大问题，以及多数人正在反对军事道路。”

哈尼那时没有觉察到他已成为一个骗局的受害者，他返回德国为军事行动进行征战。“我召集了我的组织的一次会议，我们决定加入法塔赫，以为他已准备好开始武装斗争。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正站在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一边反对其他人。”

瓦齐尔改变了他的外貌和身份。他更名阿拉·本·阿玛尔。他以这一化名旅行到阿尔及尔，设立巴勒斯坦局，向世界启开法塔赫的窗口。他立刻陷入了麻烦。纳赛尔正在幕后压本·贝拉拒绝巴勒斯坦人任何行动自由。那时埃及领导人正按照控制巴勒斯坦人的他自己的战略在工作，而在表面上好像将要给他们一些自由。阿尔及利亚总统在思考第二个想法。他要恪守他对阿

拉法特的承诺，但又不希望与纳赛尔为敌。他的两难的结果是持续六个月对瓦齐尔的态度摇摆不定。

如指示所要求的，英蒂莎在加沙正耐心等待她与在阿尔及尔的丈夫相会合的通知。她说：“这对哈利勒是十分艰难的六个月。他在许多不同的旅馆里住宿。他非常焦虑。他确实开设了办事处，但是许多次阿尔及利亚人竟不让他进入。”

当瓦齐尔同阿尔及利亚当局在进行一场神经战的时候，英蒂莎正经历着她自己的当地的一点小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瓦齐尔的改名。

“一天我在加沙我父亲家里正同我的一些女友相会。这只是一次社交性的聚会。在聚会安排时，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正为她们认为我所发生的事情而忧虑。女士中的一人出示了一封她在阿尔及尔的儿子来信。在信里这位儿子谈到他如何拜访了巴勒斯坦局并会见了哈利勒。”这位女士照着信念道，哈利勒坚持他的名字叫阿拉·本·阿玛尔，并且否认他有一位妻子在加沙。

当英蒂莎继续叙述她的故事时她笑了。“你可以想象由于这封信我的朋友们正在想些什么。他们认为我的丈夫抛弃了我而另有新欢！我对我的朋友说：‘你的儿子必定会见了貌似我丈夫的某一个人。哈利勒在贝鲁特，我不久就要去他那儿。’

“这天稍晚些时候，我父亲跟我谈话。他非常不安。他说：‘唉，我的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和你丈夫在一起？你跟他生气了吗？’我誓守秘密，即使我的父亲我也不能告诉真情。我请他不要担心。”几星期后，英蒂莎的父亲去世了。他带着她的女儿被她丈夫抛弃的信念走进了他的坟墓。

在阿尔及尔经受了六个月磨难之后，瓦齐尔被告知巴勒斯坦局将要被关闭。他大怒，但还沉着。在答复送信人的时候，他发表了他自己拟定的一份戏剧性的声明：“我坐在这里，因为本·贝拉总统曾给我允诺。如果我现在要被扔到街上，那么总统必须来这儿并亲自做这件事！”

这是一个绝望的孤注一掷的对抗，但是，也是瓦齐尔和法塔赫从而成为胜利者的一场斗争。本·贝拉下令，给巴勒斯坦局和其他在他的首都的外交使团一样的地位和特权。“这是一个历史时刻。”阿布·杰哈德说。“我们已经揭开了我们斗争历史的第一页。我们为争取承认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而斗争，这个民族的权利正在被剥夺。”

英蒂莎离开了加沙到阿尔及尔和丈夫团聚。白天她是教师。晚上她是瓦齐尔的秘书和特别助理——同时还是她的孩子们的母亲。关于她对巴勒斯坦局的成功所作的贡献，哈拉德·哈桑这样说：“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没有她，我们不能使我们局的工作正常进行。没有她当教师挣钱，我们将无法支付办事处的日常开支。在那些日子以及以后的几年中，作为一个组织，我们一贫如洗。”到这个时候，阿拉法特一直在谋取足够的经费来清付在阿尔及尔的巴勒斯坦局的开支费用。不难想象，为什么哈拉德及其他人不希望法塔赫是在依靠阿拉法特的施舍。

直至巴勒斯坦局设立，法塔赫的主要问题正是创建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个想法缺乏信任。“从阿尔及利亚给予我们正式允诺时起，我们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阿布·杰哈德说，“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阿尔及利亚作为我们的朋友，给我们以革命的信任，在当时比黄金和枪炮更有价值。”

瓦齐尔现在享有全部自由来促进巴勒斯坦事业，其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得到出入于常驻外交使团并与之接触交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接触许多由外国领导人率领的来阿尔及尔访问的代表团。瓦齐尔对中国给予最优先的考虑。1964年初，对他的耐心的答谢是邀请他访问中国。

3月20日，瓦齐尔和阿拉法特在伊拉克相会，然后飞往北京。阿布·杰哈德说：“我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因为邀请是以我作为巴勒斯坦局的主任发给我的。”这两人选择巴格达会面的事实使人联想起中央委员会事先不知道这次中国之行。很可能瓦齐尔和阿拉法特希望中国能同意向他们提供武器以开始斗争，若能如愿以偿，这样令人吃惊的事实的宣布将有助于他们扭转对哈拉德·哈桑及其在中央委员会里最热心支持者的形势。

当他们被要求阐明他们的军事战略时，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告诉中国，他们决定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解放巴勒斯坦，他们以为这是中国人乐意听的内容。

回答使巴勒斯坦客人吃惊，中国人对阿拉法特和瓦齐尔说，他们不认为通过游击战争能使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的条件和巴勒斯坦人所处的环境是明显不利于这样做的。“他们告诉我们，以游击战争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阿布·杰哈德说。阿拉法特对中国人谈话的看法更加切中要害。“他们是非常坦率的。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提出的主张是难以相信的。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们在将要被解放的领土上没有根据地，也还看不到创建这些根据地的前景。你们将从那里开始？进行游击战争不具备条件。’我对他们说：‘好：这是你们的想法。但是我们仍然将要开始。’”他失望了吗？中国人所说的肯定对他的士气不利？“不，不，”阿拉法特说。“他们所说的只使我更加坚定，更加顽强。”

如果他们的访问在第一次并且是不同寻常地直率地交换意见之后就结束了，那么，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将以没有取得任何显示他们努力的成果而离开了中国。中国人不会为一项失败的事业提供武器。但是，谈话继续进行，阿拉法特说明，如果巴勒斯坦人不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以证实他们依然存在并决心维护他们的权利，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大国就会如何成功地把巴勒斯坦问题彻底掩盖起来。中国人显然赞同这一看法。巴勒斯坦人只有通过战斗才能确定他们的地位。他们也许还得出结论，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并不像他们第一次所表现的那样幼稚。

“最后，中国人给了我们一项允诺，”阿布·杰哈德说，“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将提供我们一些武器——但是必须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开始了我们的斗争之后。我想，在我们能够证明我们是认真的，是能够在阿拉伯国家预期消灭我们的企图中生存下来以前，他们是不愿意承担义务的。”中国人可以采取一种从容的姿态，因为当时苏联亲纳赛尔，强烈反对巴勒斯坦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因而巴勒斯坦人不会转向苏联。

阿拉法特回到了科威特。瓦齐尔把他自己和法塔赫介绍给北越和北朝鲜。他回到中东后，他发动了一场反对阿拉伯政权及中央委员会中反对军事行动的同事们的宣传运动。作为巴勒斯坦局的主任阿拉·本·阿玛尔，他在科威特的电视上出现，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开罗发表了一次或两次演说。“我必须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语，”他说，“但是，在每一个地方，找拿革命的亚洲国家对我们所允诺的支持和那些离我们家园很近的却很少支持的进行对比。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在批评阿拉伯国家，

只是没有直接提出。”

根据大家所说，当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讨论中国承诺的重要意义时，他们掌握了一些新的辩论依据。可是在 1964 年 4 月，这两个人十分清楚他们仍然处于少数地位。如果他们那时把他们主张的军事战略提出付诸表决，他们将会失利。

然而，在几个星期内，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多数人在表决中赞同军事行动。此事他们应该感谢纳赛尔。他作出一项决定，这实际上搬掉了哈拉德·哈桑立足的基础，并使他失去了他对中央委员会的控制。阿拉法特，高明的策略家，充分利用新的形势，并威胁如果他不能实现其主张将分裂法塔赫。

第八章决定战斗

成立了在舒凯里·艾哈迈德领导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事件，毁掉了哈拉德·哈桑所立足的基础，并为阿拉法特创造了逐渐地将其意志和路线施影响于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机会。纳赛尔是最初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设计师。他打算使它成为他的傀儡。但是，它的真正的教父是当时在迪安·腊斯克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

纳赛尔为一种巨大的恐惧而提心吊胆。那就是听任巴勒斯坦人自行其是就会把他拖进一场同以色列的战斗，而他知道，在这场战斗中他是无法取胜的。正如纳赛尔本人此后对阿拉法特及其他法塔赫领导人所说的：“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情报机构的报告。它们使我多少对你们的地下活动有所了解。”

1964年纳赛尔非常担心巴勒斯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但是使他更害怕的是，那些准备战斗的巴勒斯坦人同他在叙利亚的对手和敌人结成同盟的前景。必须找到一个途径来抵销处于地下活动的巴勒斯坦人造成的威胁。这个问题的出路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机构。它将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自我表达的讲坛，和某种程度的独立的力量的表现。但是它必须在实际上由纳赛尔所控制。

纳赛尔不是独自一人有这种担心。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阿拉伯前线国家的领导人，都十分害怕放手让巴勒斯坦人去挑动以色列人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大家都害怕的情况下，他们都默许纳赛尔建立一个傀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计划。

美国人从未正式承认，他们的影响是在纳赛尔创建一个巴勒斯坦人统一体的决定中的一个因素。这个统一体将受那些阿拉伯政权的控制。他们私下已准备好面对这一事实，如果他们有机会迫使以色列人妥协，他们需要他们所能得到的美国的一切帮助。可是按照许多法塔赫领导人的看法，美国对纳赛尔的影响即压力，是很大的。以下是哈尼·哈桑同我的谈话并得到他哥哥和阿拉法特的确认：

“在我们同纳赛尔言归于好之后，从我以及我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和纳赛尔的多次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60年初，美国人对他的讲话给他影响极深。我并不认为纳赛尔和迪安·腊斯克达成了什么交易，但是，我是说在他们之间取得了一项很好的谅解——甚至在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必须被控制和必须阻止他们按照自己意向采取真正政治和军事主动问题上心心相通。

“美国人对纳赛尔说，如果他真想同以色列人言和，他必须接受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做很多事这一现实——因为以色列的存在已是生活中的现实。事情的是非曲直不再有什么关系。美国人说，他们已准备向以色列施加一些压力，但是，他们思考最多的是，他们可以劝说以色列接受一项允许一些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家园的协议。其余的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满足于补助金和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开始新的生活。

“现在我们来讲真正的要害。美国人早已知道纳赛尔、侯赛因国王、黎巴嫩当局以及其他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准备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既成事实并同以色列国和好——以他们能为巴勒斯坦人得到某些好处为条件……这样至少可以让那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说，他们没有屈服，他们已为巴勒斯坦人尽

同阿拉法特及其他法塔赫领导人的私人谈话。

了最大的努力。对阿拉伯领导人来说，这是面子问题。他们需要美国的帮助，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保全他们的面子。美国人现在真正告诉纳赛尔的事是为取得他们的帮助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代价就是要纳赛尔及其他政权采取行动制止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美国人向纳赛尔暗示，如果他不能够或不愿意控制巴勒斯坦人，那么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没有和平，美国人就不能也不愿阻止一个侵略的、扩张主义的以色列用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阿拉伯人。

“当在法塔赫的我们开始了解和重视纳赛尔时——不幸的是那是 1968 年，已为时过晚——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以上这些事情。你应该知道，阿拉法特真的到了把纳赛尔视作一位父亲的地步。我记得有一次，我想那是在 1969 年，当时纳赛尔把他心里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阿拉法特。他说，那曾经是他的希望，他能运用他的影响和美国人一起跟以色列谈判，使他们退回到 1947 年分治计划的边界线。但是，在 1969 年纳赛尔说：‘我坦率地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以色列人对如何讹诈美国人已达到极点，而现在是以色列人在为美国制定中东外交政策。有一天，当你我已逝去，美国人将会为他们的愚蠢而受到惩罚。但是那一天是太遥远了。’

“我还记得我和舒凯里的一次个别谈话。他对我说：‘瞧，我的孩子，你还很年轻，但是你必须很精明。如果你要为我们的人民做些事情，你必须利用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是真的，阿拉伯人创建了这个组织。因为迪安·腊斯克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它是我们拥有的一切。’”

这不是不可能的，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对中国的访问，是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里的人向纳赛尔施加更大压力的原因。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腊斯克为必须遏制中国着了迷。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升级，中国人在中东取得初步地位的前景使腊斯克心绪不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原则决定，是在第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它于 1964 年 1 月在开罗召开。应纳赛尔邀请前来的十三个阿拉伯国家元首议程中的主要议题是，对以色列企图把加利利海的水改道引向内盖夫沙漠应采取什么行动。不需要别人告诉，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知道以色列这样做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改道后的水将给新的以色列移民点以生命，而他们会使犹太国变得更强大起来。毫不奇怪，以色列宣布他的前进企图，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极大义愤。如何使它平息下来是纳赛尔面临的紧迫问题。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纳赛尔原先曾宣布，他将把以色列干的改水工程看成是战争的起因。这是空洞、愚蠢的大话。但是在他说这种话的时候，纳赛尔考虑除此之外他仅有一种选择——在失望中举起双手，承认阿拉伯国家在面对以色列的强力和侵略态度前，军事上政治上是无能的。现在，纳赛尔必须寻找个台阶下。他认为最少丢脸的途径是在好伙伴中走下台阶来。这就是召开第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的主要原因。

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个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进行改水工程企图的反应。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建议将约旦河北部支流的水改道，以便减少流往以色列的水量。这是同纳赛尔的战争威胁叫喊大不相同的。第二个建议是建立阿拉伯联合（军事）司令部（阿联司）。自然，阿拉伯的宣传家们会任意宣扬，这是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人准备同以色列决一死战的证据。事实上，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把建者成立的阿联司看作是改进他们反对以色列进攻的一种防御手段。但即使是这样，这一建议仍会被多数阿拉伯人看作是次中择优。第三个建议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组织。

它能让巴勒斯坦人民“在解放他们国家和实现自决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得到了它的出生证书。

首脑会议后四个月，东耶路撒冷成了召开巴勒斯坦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地点。422 名巴勒斯坦人出席了大会。他们据说是从所有散居在国外的个人、社团中“选举”产生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法塔赫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哈拉德·哈桑，他们都以独立人士身份出现。其他代表中的许多人是各种阿拉伯政治党派和运动的成员。

作为一个热爱并竭力主张民主道路的人，哈拉德·哈桑为他亲眼目睹的一切“惊呆了”。代表们不是为对战略、政策和目标进行任何一种认真讨论而聚会在一起的。他们的出席只是被要求在舒凯里起草的纲领和文件上盖上橡皮图章。最重要的两个文件是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本宪法。它们都被通过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宣布成立。舒凯里当选为它的主席。这个组织必须设在开罗的建议被通过了。最初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做的每一件事，正是哈拉德发誓法塔赫所不能做的——一个“选举”出来的独裁机构和一个阿拉伯政权的工具就这样，尽管阿拉伯国家曾经允诺巴解组织不会缺少经费，但它在推进巴勒斯坦事业方面仍不能有所作为。

但是，当时许多普通的缺少经验的巴勒斯坦人并不如此看待最初的巴解组织。他们的想象为这一事实所吸引，巴解组织将具有它自己的军事组织，即人们知道的巴勒斯坦解放军。按照舒凯里的计划，在每一个阿拉伯前线国家要建立巴勒斯坦解放军团，如果可能并进一步走上战场。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批准这一计划，侯赛因的情况是完全缺乏热情。但是，阿拉伯政权都曾经坚持掌握控制机制。所有巴勒斯坦解放军部队都要在他们所驻留国家的政府的监督之下。

特别是对阿拉法特和瓦齐尔来说，当然也对其余的法塔赫中央委员会里他们的同事们来说，这其中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些政权被迫进行战斗以前，巴勒斯坦解放军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它将是这些政权所要求它的那样——傀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傀儡军队。

艾哈迈德·舒凯里当一名傀儡头目在很多方面是合格的。但是，为什么他愿意做使纳赛尔获利的事，其中有一个突出的原因。舒凯里是一位政治上的外国雇佣者。尽管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把自己拍卖给最高的出价人。在 50 年代，为了钱他在联合国代表叙利亚。此后，可能为了获得更大的酬金，他代表沙特阿拉伯。在后一个职务上，由于他对西方的批评和辱骂远远超过了他得到的指示，因而也受到沙特阿拉伯日益增多的不满。当舒凯里拒绝向联合国屈服时，只好摊牌了。沙特阿拉伯指控埃及侵略也门。当时纳赛尔正在进行一场把英国人赶出南阿拉伯联盟包括亚丁的战争，费萨尔国王企图阻止他。费萨尔解雇了舒凯里，纳赛尔任命他为巴勒斯坦驻阿拉伯联盟代表，以表示对他的感谢这是他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入席证。担任主席一事得再次感谢纳赛尔的倡议。

为达到纳赛尔的目的，舒凯里具有一大资本和一种伟大才能。他的一大资本是他在多数巴勒斯坦人中被视作一位真正的甚至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造就了这一印象。他的伟大才能是他的口才。舒凯里

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把他描绘成是阿道尔夫·希特勒和伊恩·佩兹利天主教二人的某种混合体式的演说家，不是不确切的。据以色列人说，是舒凯里第一个创造了这句话，“把犹太人赶进大海去”。不管那是否真实，巴解组织的第一位主席确曾向以色列人发表过最可怕的威胁。正是这一资本和这种才能的结合，使舒凯里成为一个极好的傀儡。

在 1964 年临近时，正如他后来对法塔赫的一些领导人所谈的，纳赛尔面临令人震惊的进退两难困境。除非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准备看到他们的国家慢慢毁灭，作为坚持他们有朝一日将解放巴勒斯坦这一虚幻设想的代价，他们最好的希望是同以色列人谈判，在谈判中他们的主要责任将是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最好的可能的和解条件。客观地说，可以这么说，如果以色列领导人曾经准备给巴勒斯坦人必要让步以挽救阿拉伯国家的名誉，以色列能够在 1967 年战争之前和阿拉伯人和好。

在十多年中，纳赛尔在他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开讲话中，采取深思熟虑、精心斟酌的模棱两可的措辞，努力在进退两难困境中生存下去。从他偶尔发表的寓意含蓄的讲话中，如果巴勒斯坦人愿意展开他们的想象，他们可以得出结论，纳赛尔确实在暗示他总有一天要为解放他们的家园而战斗。但是，这是真正的由他模棱两可之词所引出的他们的如意算盘。与此同时，他知道以色列领导人会利用他的模棱两可之词进行宣传。纳赛尔利用每一个秘密的机会和私人渠道，向西方领导人及他们的使者们保证，他没有被迫在公开场合，说过任何可被用来意味着他已改变想法、相信巴勒斯坦能够通过战争或武装斗争得到解放的话。

纳赛尔进行工作，赢得时间以争取能给巴勒斯坦人某些好处的协商的战略，需要从以色列领导人那儿得到两件东西：一个是对他困难处境的理解；一个是在他们一方为巴勒斯坦人做某些积极事情的意愿。无疑，许多以色列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确理解纳赛尔的两难处境，但是，他们的战略是使他们的人民和西方世界相信巴勒斯坦人已不复存在。1971 年，当时的总理果尔达·梅厄在接受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采访中就明确说过：“巴勒斯坦人现在不存在了。”

1963 年后期，纳赛尔认识到他的模棱两可之词正在两条战线起着反他自己的作用。它引起日益增多的巴勒斯坦人对他失去信任或至少对他的信任产生了疑问。而他又声称他正在阴谋摧毁犹太国，从而给以色列的宣传增加了可信性。对纳赛尔来说，对以色列正在宣传战中赢得胜利忧心忡忡。但是，正如他以后对法塔赫领导人所说的，当他想到一旦以色列领导人说服西方使他们相信犹太国正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中，他们将会如何动作时，警铃开始鸣响。因此纳赛尔相信，以色列领导人将要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确知他们可使埃及蒙受羞辱的失败。在纳赛尔看来，战争是完全合乎逻辑地要发生的。以色列的目的是利用它的优势军事力量迫使阿拉伯国家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媾和。

纳赛尔非常了解以色列领导人。他对联合国和美国的承诺，即十年不进行反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动，1967 年到期。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正在决定于 1967 年或 1968 年发起进攻。如果他们想以战争迫使阿拉伯人按照以色列的条件媾和，那也好。如果不是这样，阿拉伯国家将要求另一个十年或十年左右时间来重建他们被击溃的军队。到那时，以色列将要在政治战线上反对阿拉伯国家。

在 1964 年临近时，纳赛尔必须寻找一种办法继续对以色列进行含蓄的威胁，以便保持他的对巴勒斯坦人的信用，而在同时又使埃及与威胁无关。就在这节骨眼上，舒凯里进入了角色。纳赛尔可以依靠他发出必要的威胁。由于巴勒斯坦人知道舒凯里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是纳赛尔的人，他们——或者他们中的多数——会得出结论，他代表纳赛尔的思想。以色列人显然会得出同样结论。但是，纳赛尔可以解雇舒凯里，或者如果需要，在他选择的时候消灭他。在这种情况下，纳赛尔希望抵销巴勒斯坦地下组织的活动，又否定以色列人关于另一次战争宣传是有根据的。但是，他知道他正在玩火。

舒凯里认识到他是纳赛尔计划中的一个傀儡这件事，可为他同哈拉德·哈桑的一次谈话所说明。当时这两个人相会，寻求在巴解组织和法塔赫之间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舒凯里对我说：‘你知道我是被带来压榨你们的！’”我问哈拉德，他是否将舒凯里的评论意译了。“不，”哈拉德回答，“那些确实是他所使用的语言。”

哈拉德是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中被委派去探索同舒凯里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的几个成员之一——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前后。另一位是瓦齐尔。他告诉我：“当舒凯里承认阿拉伯国家不允许巴解组织有任何自由时，我说，我们准备做他的秘密派别。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可以防止这些国家非法剥夺巴解的独立。”瓦齐尔和哈桑兄弟确信舒凯里真想同法塔赫打交道。“好几次我们认为已同他达成协议，”哈拉德说，“但是，他从未实践诺言。他不是自由的代理人。”

法塔赫之竭力想同舒凯里达成协议，原因之一是它希望从内部来影响和改变巴解组织。更重要的是，法塔赫没有别的选择。纳赛尔关于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地下组织的作用的谋算，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立，对法塔赫是一场灾难。主要由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创建的地下组织网和干部都瓦解了。哈拉德说：“没有任何更多的办法来减轻我们面临的危机。我们损失了大部分军事干部。他们说他们曾发誓忠于巴勒斯坦，而不是对一个组织。因此，他们离开法塔赫去参加巴勒斯坦解放军，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将被允许发起对以色列的进攻。我们安排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

从以后的事件来判断，恰当的估计是，法塔赫至少损失了 80% 甚至多达 90% 的干部。纳赛尔接着要求科威特当局关闭法塔赫在那儿的办事处。尽管法塔赫还是一个地下组织，但是纳赛尔从情报部门报告得知，科威特办事处就是它的总部。哈拉德说：“科威特当局正式通知我们，他们不能同意设立两个办事处——一个是巴解组织的，一个是法塔赫的。他们正式关闭了我们的办事处，但是，他们非正式地允许我们设立一个秘密办事处。”

在他注意到地下组织网解体时，阿拉法特知道，如果他不采取主动，发起军事行动以确立巴勒斯坦地位的时机很快将永远丢失。1964 年夏末，可能同瓦齐尔磋商后，他决定迫使中央委员会表决他的军事战略的时候已到。他还决定，如果表决结果反对他，他将成立他自己的分离组织。

阿拉法特现已下定决心，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阻止他以尽可能少的延宕发动军事行动。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仍然必须找到中国人曾经向他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他将从何处出发？因为他不能从以色列境内出发作战，他必须在阿拉伯前线国家之一设立基地。埃及？不可能。约旦？不可能。黎巴嫩？不可能。只剩下叙利亚。随着复兴党日益巩固在叙利亚的绝对权力，同它达成和解的前景是合乎情理地光明的。但是，当危境来临时，即使是一

个血气旺盛的复兴党人的政权，会准备浸泡在法塔赫军事行动挑起的以色列的报复性进攻中吗？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阿拉法特才能具有信心地勇敢地面对那些反对他的军事道路的中央委员会同事们。

“巴特”（Ba'ath）——意思是“复兴”或“新生”——是1943年米歇尔·阿弗利克和他的同伴在大马士革创建的民族主义进步党的名字。按照他们的抱负，复兴党将是一个建立单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主要的倡导者。这是他们的阿拉伯统一之梦。在利用阿弗利克的口号作为他们自己掌权的阶梯的叙利亚领导人连续执政期间，叙利亚复兴党变成了纳赛尔在领导所谓的革命的阿拉伯世界的竞争中的主要对手。法塔赫的存在应归功于这种竞争。阿拉法特的技巧则在于利用一方对付另外一方。至今仍有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阿拉伯人说，阿拉法特不应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分歧。由于他这样做了，他不被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信任，这只能责怪自己。阿拉法特要证明自己是无可匹敌的机会主义者。但是，是阿拉伯领导人而不是阿拉法特，确认巴勒斯坦人所能使用的唯一真正有效的进行交易的能力是通过机会主义。在信任问题上，也应当这样说，绝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不信任他们的最密切的同事而远远不是喜欢他们——这样，阿拉法特就很好地和他们走在一起了。

阿拉法特在50年代曾会见过阿弗利克及复兴党其他创始人。那时，他把这种接触视为对未来的一种保险单。1964年下半年，他几次访问大马士革的目的，实际上是去要求这种保险。10月发生的叙利亚第八次政变给他以极大帮助，肯定他事先知道此事。政变结果是，清洗了叙利亚军事机构最高层中残余的亲纳赛尔分子。复兴党人完全控制住了局势。

但是，即使是在政变之前，叙利亚的局势也正向着对阿拉法特有利的方向转移，或者看起来是如此。在1月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纳赛尔和叙利亚人进行了一场舌战。叙利亚人对参加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元首们说，如果他们团结起来，他们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击败以色列。发怒的纳赛尔对叙利亚人说他们是“不用脑子”。当纳赛尔想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他的傀儡的意图明显暴露时，开罗和大马士革角力的舞台搭置起来了。巴解组织成立不久，叙利亚人通过通报阿拉法特关于他们同纳赛尔的分歧，赢得了特别的一分。阿拉法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他正在被邀请去叩叙利亚的大门。

阿拉法特在叙利亚的两个最重要的联系人是军事情报主任艾哈迈德·苏韦达尼和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后来任叙利亚总统。这两个叙利亚人在想助阿拉法特一臂之力方面，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苏韦达尼是一位穆斯林军人，他同纳赛尔一样，不相信阿拉伯人能在常规战争中击败以色列。他的看法是，阿拉伯人只有一种军事选择，那就是把以色列拖进持久的游击战争中。苏韦达尼是武元甲将军的一位赞赏者，武元甲策划了越南先对法国后对美国的军事胜利。苏韦达尼要求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都投入游击战争；他要求叙利亚树立榜样起带头作用。因此，他的兴趣是在寻求一次同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

阿萨德的动机比这简单得多，也缺乏诚意得多。他一心一意想成为叙利亚总统，他希望巴勒斯坦人的牌掌握在他的手中。纳赛尔用舒凯里作为他的傀儡，阿萨德则要阿拉法特成为他的傀儡——或者他要消灭他。

从一开始，阿拉法特对他和叙利亚人关系的性质就不存什么幻想。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想利用他。他也要利用他们服务于他的目的。这必定

是一篇难以写出来的安排。但是，在 1964 年秋，阿拉法特处于极度失望之中，他将从哪些地方去寻求帮助呢。

阿拉法特向苏韦达尼要求三件事：在叙利亚组建法塔赫的自由；允许接受和贮存他期待从阿尔及利亚和中国得到的武器；建

立一个基地，止在阿尔及利亚受训的法塔赫军官能在此基地训练征召的新兵。当时法塔赫的第一批 20 名专业军官正在阿尔及利亚军事参谋学院学习。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后，瓦齐尔在说服阿尔及利亚当局接收法塔赫学员一事上曾经获得了一次成功。“在那时以前，我们所有的训练都是在假期利用部分时间进行的，”阿布·杰哈德告诉我。“为 20 名专业军官取得在学院学习的位置，对我们来说是富于戏剧性的事情。”

苏韦达尼的第一个反应是令人鼓舞的，但仅此而已。他跟阿拉法特说，他完全有信心说服他的上级给法塔赫所需要的便利；但他又说，叙利亚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大概要有附加条件。他的上级也许会坚持不能从叙利亚土地上发起对以色列的实际攻击。阿拉法特并不感到惊讶。他预料到叙利亚人是想两全其美。

他们想要获得信用和光荣，他们赋予第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生命的方式终于出现。但是，他们又将做一切事情来避免得到以色列报复的后果。对以色列的进攻必须从约旦和黎巴嫩出发。苏韦达尼告诉阿拉法特，他将努力在 12 月给他某种肯定的答复。

阿拉法特现在已尽其所能准备好和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对抗。他的精神状态是不妥协。如果他的多数同事不支持他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他将分裂法塔赫，走自己的路。

中央委员会在关于法塔赫是否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定作出前，进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从前曾经使法塔赫领导人陷于分裂的问题，没有表决就解决了。同意法塔赫应当战斗。

为什么哈拉德·哈桑和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撤消了他们对军事行动主张的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哈拉德非常坦率：“你可以说，因为这是事实，我们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即将成立，被推上了一条我们不愿采取的道路。由于它的存在，由于它不是如此众多的巴勒斯坦人所设想要建立的那样真正的组织，我们决定，要使真正的斗争主张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就是进行战斗。”

哈拉德和曾经反对军事行动主张的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确信总有一天他们的人民会懂得，他们对傀儡巴解组织寄予信任是错误的。但是，到那时就太迟了，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满足于阿拉伯国家设法从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那里得到的无论什么东西。少数巴勒斯坦人最终也许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家园。其余的人也许会得到一些补偿。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具有同一性文化和他们自身存在的民族将宣告结束。法塔赫只有选择军事行动，才能表明在关于他们未来的任何决定上，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发言权是不能被否定的。

现在有撕裂法塔赫的威胁的问题是，何时军事行动应当开始？那些原先反对军事行动主张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们现在说，除非法塔赫作为一个军事单位而不是在开玩笑，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实际使用武力的。法塔赫有 20 位高级军官在阿尔及利亚受过专业训练，这很重要，但已决不能补偿这一损失。法塔赫已经丢失了它的绝大部分地下干部，他们转而加入了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军。阿尔及利亚、中国和叙利亚曾经允诺给予帮助，这不是不重要，但是承诺仅仅是承诺。就进行快速军事行动的对手而言，现在法塔赫完全没

有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征招新兵、进行训练和装备一个可靠的游击力量中心，需要时间和财力。

这些论据背后的残酷现实，在 1965 年 3 月或 4 月，阿拉法特和天主教神父易卜拉欣·伊亚德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

以色列政府曾宣称，它认为阿拉伯国家应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动负责。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慑于这一威胁和以色列必然的报复性进攻，命令他们的情报机构找到并摧毁法塔赫，消灭它的领袖们。纳赛尔曾经出价悬赏阿拉法特的脑袋。在科威特，那些原来反对军事主张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处于惊慌之中。他们试图和纳赛尔联系，以便说明法塔赫不是叙利亚的傀儡，把它看成是他的敌人是错误的。阿拉法特本人为极度的疑虑弄得精神不安。战斗是唯一的道路吗？难道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他是否有权要求巴勒斯坦人投入一场也许会使成千上万人献出生命的武装斗争呢？阿拉法特并不害怕向他自己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甚至对它们已有了回答。但是，它们是正确的回答吗？他能向谁求得保证？

在这样烦乱的心情状态下，阿拉法特由瓦齐尔陪同从科威特去到贝鲁特的一个女修道院，同一个非常特殊的巴勒斯坦人——伊亚德神父进行谈话。为什么阿拉法特选择这样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作为他的精神顾问，这是一个谜。以下是伊亚德神父自己叙述的他和阿拉法特的谈话。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为什么巴勒斯坦人除了战斗没有选择余地的理由。他主要关心的是世界上的许多政府拒绝为巴勒斯坦人做任何事情。他说，每年联合国都要通过决议，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确认他们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表示关心。但是，这都是言词。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这样说是正确的。我还必须告诉你，阿拉法特不是一个幼稚的人。他对我说，‘神父，我完全明白，即使进行战斗，我们也不能收复巴勒斯坦。我们必须用战斗来向世界表明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战斗，以向世界表明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我们必须战斗，以便激发世界人民的良心。如果我们不能说服世界人民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将失败，完蛋。’

“他问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说我真心同意。然后他告诉我当时的一个极大的秘密。他说，当法塔赫开始它的军事行动时，只有七名受过训练的战士——阿拉法特自己和另外六个人，他们总共只有五支来福枪！他还对我说，他们开始行动时一个钱也没有。形式上有一位朋友给法塔赫一张相当于不到 1000 英镑的支票——但是他们被告知，在两三个月之内他们不能兑换现金。因为帐户上还没有钱！

“当阿拉法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我说：‘听来好像你需要帮助。你是否要求我帮助？’阿拉法特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神父，我从你这里需要的只是你的祝福。’我给了他祝福。”

这是阿拉法特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向伊亚德神父寻求道义上的支持。

我问阿拉法特，他能否证实伊亚德神父所说的，法塔赫开始它的军事行动时只有七位受过训练的战士和五支来福枪。显然，对这个问题他并不完全高兴。他回答说：“事情并不完全像伊亚德神父所告诉你的。”也许他正在想到 20 位法塔赫军官在阿尔及利亚受过训练以及阿尔及利亚、中国、叙利亚曾允诺的帮助。

“钱是怎么回事？”我问。“伊亚德神父关于钱的说法是否基本正确？”

阿拉法特笑了。“是的，真是这样，”他回答。他补充说：“但是，真的，我的同事不需要对钱付出那么多忧虑。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依靠我来弥补这张支票。”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确信，如果他们延误他们的军事行动，直至法塔赫筹集到足够的款项，然后再重新征募新兵，训练和装备游击队，那就无法进行武装斗争。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最后试图说服他们中央委员会同事们，同意立即进行武装斗争时所采用的主要论点。阿布·杰哈德告诉我：阿拉法特和我提出两个主要论点。我们说，首先，我们不是一个政府，不是一支军队，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我们同事所要求的办法去组织。我们没有在开始行动之前进行组织工作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说，我们所处的是这样的环境，我们必须采用革命的思想方法和革命的战略。问题的要害是，革命不是用预备而是用行动开始。因此，我们说，我们必须开始我们的武装斗争，并通过斗争建设我们的力量。”

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着重强调法塔赫的信誉正处于危急中。他们进行了许多宣传。他们激发了许多期望。假如他们不立即行动，他们将失去那些地下组织中至今仍拒绝加入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军的人的支持。阿市·杰哈德说：“在中国人以及其他答应供应我们武器的人眼中，我们也面临一个信誉问题。除非我们证明我们是严肃的，否则将无人支持我们。我跟我的同事们说，除非我们进行战斗，否则我们正在敲响的大门将不会向我们敞开。”

尽管法塔赫领导人，一直到现在仍不准备公开谈及，法塔赫在那关键性的表决前后的日子里已十分接近分裂，甚至也许是毁掉自己。但是，由于一名中央委员，大概是尤素福·阿米的拉辞职，在表决阿拉法特要求立即开始军事行动的主张时，才没有出现5：5的局面。不然在那种情况下，法塔赫将分裂。哈拉德·哈桑向我证实，表决结果是5：4，阿拉法特的方案获胜。

哈拉德·哈桑使导致阿拉法特胜利的策略得到协调。虽然他很晚才勉强改变了对军事行动的看法，不管他正在强烈反对在他们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以前就开始行动，哈拉德的理智——如果不是他的感情——告诉他，对法塔赫来说，没有其他选择。如果中央委员会现在分裂，他们的组织将会被葬送。他十分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将有机会重振旗鼓。如果法塔赫不存在，那就没有条件创建一个可靠的机构允许巴勒斯坦人为他们自己说话。

但是，哈拉德和阿拉法特的意志战远未结束。事实上正进入一个新的更富于戏剧性的阶段，将看到阿拉法特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即将到来的对抗的原因，是一种意见分歧，很可能是关于集体领导在多大程度上对允诺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上的真正误解。那些曾经反对阿拉法特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意见的中央委员们持有这样理解：承诺不是无限制的。表决之后，他们争论说，一旦行动已经开始，并根据阿拉伯国家的反应，赞同军事行动的决议必须再作审议。他们曾经问道，假如阿拉伯国家决定粉碎法塔赫，将持何种立场？那时法塔赫将视作在同这些国家作战吗？或者法塔赫那时希望同他们在关于需要采取共同战略问题上能够达成一些谅解，将转变同他们对抗的立场？

结果，军事行动是以“暴风部队”的名义发起的，而不是法塔赫。据哈拉德·哈桑说，这是“最后一分钟”的决定。作出这一决定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如果军事行动引起阿拉伯国家完全敌对的反应，法塔赫

可以声明它与暴风部队无关，如果他们表示接受，法塔赫仍然可以作出政治选择。阿布·杰哈德说：“我们太害怕阿拉伯国家了，以致不使用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发明了‘暴风部队’来测试他们的反应。”这一策略的明显的含义是，至少中央委员会中某些成员没有把允诺进行武装斗争看成是不受限制的，而是需要受检验的事物。

发明“暴风部队”的第二个理由是，为法塔赫提供绝对安全的掩护。哈拉德说：“我们正等待着阿拉伯国家试图阻止我们的军事行动。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能有多长时间可以自由地继续我们的军事行动。我们设想，采用使阿拉伯情报机构搜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的办法，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建设我们自己！”

证明哈拉德迟早想同阿拉法特对抗的事实是，他阻挠阿拉法特成为法塔赫的第一位军事司令的任命。这一职务交给了阿布·优素福。哈拉德公开的解释是，由于阿拉法特出生于开罗，长时间生活在开罗和科威特，他在那些法塔赫将从那儿发动反对以色列的打了就跑的袭击的地区，是一位陌生者。而另一方面，阿布·优素福则是在巴勒斯坦本土上成长，因而他了解这一地区和了解那儿的人民就像了解他自己一样。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阿拉法特被排除在法塔赫军事组织的领导之外的一个理由。但是，还有比这更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错看了他的人品。哈拉德和其他人害怕，一旦给予机会，阿拉法特就要建立一个军事基础，以便依靠武力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

同时他将会以独裁者的面目出现，也可能使用他的军事力量来破坏任何政治和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这已为哈拉德的弟弟哈尼所证实。他轻声笑着说：“他们真的把他看成是潜在的军事独裁者。

这是他们为什么决心阻挠他成为领袖的真正的原因。”正如事件的发展将证明的，阿拉法特的同事们在看待他的问题上犯的错误不能比这更严重了。

12月初，苏韦达尼通报阿拉法特，他在大马士革的上级已经给他开了绿灯，准许他在一个“试验时期”同法塔赫合作。阿拉法特很失望。他所真正获得的一切就是苏韦达尼提供咨询的便利。作为回报，叙利亚人则可将其硕大的手指插进法塔赫的这块小馅饼中。从阿拉法特观点来看，这是一项最不满意的安排，但是这又是一项他不得不接受的安排。没有苏韦达尼的帮助，他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机会来说服叙利亚政权允许他建立一个基地，使法塔赫征召的新兵能在那儿受训，并作为贮存武器和弹药的地方。取得这一基地是绝对优先之事。

当阿拉法特想到在苏韦达尼的报告里缺乏实质内容时，他由失望转为警惕。起初他曾自我满足于这一想法，叙利亚政权仅仅是将它的选择搁置起来。但是，他对这一问题想得越多，他就越认识到叙利亚真正在忙于什么。阿拉法特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们正在设想，一旦法塔赫表明自己的真实目的，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的政权将立即寻机摧垮它。随后，这样一个时辰将在数月甚至数周之内来到，那时法塔赫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叙利亚寻找避难所。在这种情况下，法塔赫的领导人将十分绝望，不得不接受叙利亚领导人作为它帮助的代价而提出的各项条件。这些条件如果被他们接受，将导致法塔赫成为叙利亚的傀儡。正如阿拉法特看出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叙利亚人正在为法塔赫的军事领导人设置陷阱。如果他们同意成为叙利亚的傀儡，他们就

得以生存。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独立性，他们就将被消灭。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叙利亚人已经挑选了他们要强加给法塔赫的傀儡头目，用他来取代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如果他们拒绝做他们被指定要做的事的话。此人的名字叫艾哈迈德·贾布利勒。他要成为叙利亚的舒凯里和巴勒斯坦的犹大。

此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他和苏韦达尼最后一次谈话后不久，当他把一些甘油炸药放在汽车行李箱里从黎巴嫩驶往叙利亚时，阿拉法特被捕了。接着叙利亚人把他关进监狱。下令逮捕他的是奥尔基·穆罕默德上校，叙利亚情报部巴勒斯坦局的负责人。阿拉法特被指责为国家的敌人，并被控告为颠覆的目的而运进炸药！

阿布·杰哈德对叙利亚的行功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在18小时，或者大约这一时间以后，释放了阿拉法特。因为当时他正同苏韦达尼一起进行工作，当然，他们知道炸药是要运往约旦去的。我的看法是，奥尔基逮捕阿拉法特是让他震惊一下——向他提醒他是经常处于监视之下。他不能进行任何行动而不为叙利亚当局所知。”

这是一种可能的解说。另一种并且是更不祥的说法，它为以后发生的事件证实，哈菲兹·阿萨德是要将阿拉法特曾经被捕和曾被控告进行颠覆记录在案。

当1964年即将结束和法塔赫准备采取军事行功时，有四种对抗正在形成中。一种对抗是在法塔赫同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的阿拉伯政权之间的对抗。另一种是在阿拉法特同哈拉德·哈桑之间。再一种是在阿拉法特同叙利亚之间。还有一种是在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之间。

在法塔赫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的前夕，力量对比大致如下：在巴勒斯坦人一方，法塔赫只不过是一种思想，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是一个不准备同以色列进行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傀儡。在另一方是犹太国。它拥有这一地区最强大、最有效和最有战斗力的陆军和空军。当时离它拥有自己的核弹也只有一年。

即将开始的并且还未结束的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在一个大卫和一个歌利亚之间的战斗。但是，与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世界所认识的相反，真正的歌利亚是犹太国。

按基督教圣经及其他资料记载，大卫是古代以色列国主，歌利亚是古代巴勒斯坦西南腓力斯国的勇士。勇士和童年的大卫战斗，被大卫杀死。——译注

第三编 斗 争

第九章起义领导人

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首脑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做了很多工作，帮助阿拉伯国家孤立和摧毁法塔赫。回顾过去，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以色列人的大错保证了法塔赫的生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主义的觉醒，最后使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而重新振兴。而以色列本身就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标记的傲慢的产物。

为了证实阿拉法特本人向我谈的情况，阿布·杰哈德曾这样说：“我们必须对以色列人道谢，这就是这段历史的关键。如果以色列领导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保持沉默，阿拉伯政府及其情报机构就将很快消灭我们。最初，阿拉伯报纸不准发表我们的军事公报。编辑和作者都得到指示，但同时他们也不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少数几个巴勒斯坦人在没有阿拉伯政权的支持下进攻以色列，这种主张只是一种梦呓。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同时，阿拉伯情报机构正在制定摧毁我们的计划。无疑我们处于极度困难之中。没有公开宣传，我们就不能赢得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群众的关切和注意。没有公开宣传，在阿拉伯国家企图摧垮我们情况下，我们将无法生存。可是，以色列总理列维·艾什科尔在一次演说中确认了我们的行动并威胁阿拉伯国家，这是一个转折点，以色列救了我们！”

法塔赫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计划在1965年元旦前夕进行。那天深夜，四名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预定从黎巴嫩的艾因·希尔维难民营出发进入以色列，把炸药埋在贝特·内脱法运河和抽水站。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未能到达接近边界的任何一处以前，就被黎巴嫩安全人员逮捕了。这四个人被监视了好几天。

错误在那里呢？阿布·杰哈德的解释很简单，就怪这四人说得太多了。“在每一个难民营都有阿拉伯情报机构的特务，”他说。“我想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四个人会对他们的朋友讲，他们将要去干什么。他们的朋友又会转告别人。在那时候我们的安全工作很薄弱。”

完全可以肯定，情况就是这样。这四人中没有一个是法塔赫成员。事实上他们是作为叙利亚兼职特务列在苏韦达尼的受雇人员名单之上。告诉阿拉法特这四个人的名字的正是苏韦达尼。这很可能是苏韦达尼坚持发起第一次行动。而阿拉法特在那样一个基础上同意，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明法塔赫严重缺乏足够军事人员。

黎巴嫩人利用这四个人被捕，竭力损害以暴风部队名义出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信誉。显然，阿拉法特并不知道这四个人已经被捕，也不知道第一次军事行动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当这四个人被安全地严密地监禁在贝鲁特监狱时，阿拉法特及其同伴们散发了“第一号军事公报”。在一个深夜，他们乘阿拉法特的蓝色大众牌汽车在城里四处行驶，把他们的公报放进所有黎巴嫩报社的信箱。几小时后，暴风部队发动首次行动的消息刊登在各家报纸头版。

在这种情况下，使人难以置信的是，黎巴嫩的编辑们居然在未与有关当局核实事实之前，就发表了暴风部队行动的消息。因此，必定是黎巴嫩当局曾经希望暴风部队的声明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宣传。为什么？答案在两天之后就出现了。在黎巴嫩安全官员发布简要情况后，正同样是那些黎巴嫩报纸报导了这四个从艾因·希尔维难民营出发的人是如何被捕的详情。这样就

使人感到暴风部队十分愚蠢。

这必然使苏韦达尼私下感到十分满意。越是促使阿拉法特得出他不可能从任何一个阿拉伯前线国家发起进攻的结论，就越加迫使他依靠叙利亚。他越是不得不依靠叙利亚，他就越加可能被诱惑而成为叙利亚的傀儡。

然而，阿拉法特并没有把宝全部押在苏韦达尼一个人身上。没有告诉苏韦达尼，阿拉法特和阿布·优素福已经作了为在贝特·内脱法运河和抽水站进行第二次袭击的准备。在 1965 年 1 月 3 日夜里，一个真正的法塔赫突击小队从约旦进入以色列。他们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埋好了他们的达那马特爆炸装置。他们的错误是出在设置定时装置问题。这是一个陈旧的时钟，延误了爆炸的时间。直至他们返回约旦以前还未爆炸。这就给了以色列人以机会，探查出爆炸装置并止住了时钟。

1 月 4 日天刚亮，法塔赫人员回到了约旦的国土，任务完成了——他们这样想。但是，刚刚入境，他们就遭到约旦边防巡逻队的伏击。他们命令法塔赫人员投降，放下武器。当他们拒绝投降时，战斗开始了。突击队的一名成员艾哈迈德·穆萨被杀害了。这也是可以预料的，法塔赫的第一名伤亡人员——这个组织的第一位烈士——竟是被阿拉伯兄弟所枪杀的。

穆萨被杀害一事是一种迹象，证明侯赛因作为他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做的事，决心阻止法塔赫利用约旦作为它向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出发地。然而，法塔赫早期的破坏性袭击，多数仍是从约旦出发的。1965 年的头三个月，法塔赫进行了十次破坏性袭击——七次从约旦，三次从加沙地带出发。

可是，尽管法塔赫最后采取了行动，但由于整个阿拉伯国家都禁止有关法塔赫——或者当时自称的暴风部队——及其行动的报导，法塔赫得不到它所需要的宣传，以引起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群众的注意，从而难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正是列维·艾什科尔的威胁性讲话，使暴风部队这个秘密才从阿拉伯国家力图隐藏中泄露出来。法塔赫在更有规律的基础上也得到以色列之音的帮助。它的阿拉伯新闻播发了关于“恐怖分子”活动的报导。以色列人确认发生了某些事情，而阿拉伯世界却保持沉默，这导致日益增多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提出问题。这些敢于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谁？他们得到了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秘密支持吗？或者他们是在依靠他们自己？甚至一些信任纳赛尔的巴勒斯坦人，当别人谈到那些起来行动的人时，也开始表示钦佩。但是这些发疯的巴勒斯坦人究竟是谁？

如果阿拉伯政权不准备失去他们对局势的控制，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回答。而他们的回答又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即能使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丧失信誉。

按照在埃及控制下的报纸、电台的宣传和广播，暴风部队是由西方情报机构出钱建立起来的。暴风部队为西方和以色列服务。它的目的是把阿拉伯国家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推向战争。因此，暴风部队的目的是使阿拉伯国家失败。而所有同这个组织有联系的人都是叛徒。反暴风部队宣传中最有发明创造性的一篇是埃及在贝鲁特的喉舌《光明报》写的。它的作者是沙菲克·胡特，后来他成为真正的巴解组织驻黎巴嫩的负责人，是阿拉法特的资历最深的中尉之一。沙菲克对这场宣传战的贡献是，他断言暴风部队是中央条约组织的代理人。中央条约组织是英国、爱尔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为了进行经济和军事合作于 1959 年建立的。几年以后，沙菲克以埃及情报头目们如何成

功地以这种胡言乱语来愚弄他们自己的逗人发笑的故事来款待法塔赫领导人。

约旦的主张则是，最好的宣传是把暴风部队说成是共产主义者。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建议的对策。当时，英国秘密情报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关于他们两者当中由谁来控制约旦特务机关问题上的争端尚未解决。哈拉德·哈桑说：“约旦人没有把他们的宣传限制在报纸和电台，我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他们向所有的海湾国家送去了他们的报告，断言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我们都被当成是头号敌人——不管这个敌人是什么人。这些政府没有说到的关于我们的唯一事情是这一真谛——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反对无法忍受的不平等和维护我们的独立而斗争。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曾经愿意成为任何一个情报机构的工具，我们的经费问题早已随即获得解决。”

事实上，由于法塔赫十分缺乏资金而导致阿拉法特接替阿布优素福成为军事司令。哈拉德对我说：“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发笑，但是这是事实。阿布·优素福有八个孩子，而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足够的钱用以赡养他的家庭！”这样阿布·优素福不得不去找工作谋生。当阿拉法特正式被要求出任法塔赫专职军事司令时，他结束了他的建筑和承包企业。正如哈拉德以前所说，由于他迅速清算了他的企业，使他损失了一笔钱；但是他还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他还想用他自己的钱购买武器、弹药。但是，这在当时只是他自己心中怀有的一种想法。

哈拉德和担心阿拉法特具有军事独裁者素质的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对最近事态的变化至少可以说是不愉快的。但是，除可能的瓦齐尔之外，要阿拉法特担任法塔赫军事司令是唯一选择。

而瓦齐尔大概是会拒绝它的，如果他被赋予超过阿拉法特的职务。

对那些怀疑阿拉法特会利用他的新的权力干些什么事情的人来说，问题是在寻找一种方法来控制他的个人主义。阿拉法特提出，他将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游动，在这种情况下，期待他或任何一位军事司令对必须在战场上作出的或者需要立即作出的决定，要经常寻求在科威特的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十分荒谬的。一份信件到达科威特并得到回音，需花费三至五天。这不可能进行战争。这是愚蠢的。因此，阿拉法特要求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候作出军事行动决定的自由。对那些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怀疑者们来说，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作为一种妥协，他们建立了一个小的军事委员会。它被授权以集体领导名义作出军事决定。它将给阿拉法特以指示。这是理论上的。

当情况变得十分清楚，暴风部队是不能靠宣传手段使之信誉扫地并被摧垮时，埃及、约旦和黎巴嫩转而采取直接的、野蛮的行径。奉纳赛尔的指示，陆军元帅阿布德尔·哈基姆·阿玛尔，1953年以来一直任此职务的埃及陆军总司令，阿拉法特的老朋友，向阿拉伯联合司令部发出了一项命令。它要求阿拉伯联盟所有成员国的武装力量都应把自己视作与暴风部队处于作战状态。阿拉法特说：“这个命令一经发出我们就立即知道了，因为苏韦达尼给我们看了它的副本。”阿布·杰哈德说：“哈基姆·阿玛尔向阿拉伯联合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包括两个部分。它要求阿拉伯军队阻止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还要求军事情报机构搜集关于暴风部队的情报。”哈位德·哈桑说：“这些政权在1963年和1964年就想消灭我们的运动。唯一不同的是，在1965年他们有了一个打击的目标。”

这些情况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发现法塔赫这一容易得到的目标。在以暴风部队名称掩护下，它在最后一分钟作出的进行军事行动的决定，成功地在关键的几个月内愚弄了阿拉伯情报机构。“由于采取了这一策略，我们保存了我们的组织。”阿布·杰哈德对我说，“不幸的是许多巴勒斯坦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几个月期间，数百人被关进监狱，并受到严刑拷打，迫使他们说出有关我们的情况。一些人的指头被打断了。一些人被强迫在碎玻璃上行走。有些人的脚底被棍棒抽打，直至青筋在血肉模糊中裸露出来。”

绝大多数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监狱里遭受拷打的巴勒斯坦难民们一点情报也未提供。暴风部队对他们和对他们的拷问者同样是个谜。

在无疑是一个协调的残酷摧毁暴风部队的进攻的早期，这些政权取得的唯一显著胜利是在加沙。在那儿埃及情报机构以折断几根手指和砸破几个脑袋为代价，发现了三个法塔赫的地下小在约旦，直至以色列用在哈尔基利亚、杰宁和舒纳发起报复性进攻威压侯赛因时，消灭为约旦情报机构发现的法塔赫小组的行动才被采取。这位国王，并不反对他的情报人员需要多么残酷就多么残酷地从那些被怀疑是暴风部队成员或其同情者那里榨取情报。正如开枪射死艾哈迈德·穆萨一事所证明的那样，他不需要哈基姆·阿玛尔的指示，告诉他必须采取各种实际措施阻止巴勒斯坦破坏者从约旦进入以色列。但是，由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占多数，这位国王懂得要在一种勉强的方式下行动，自己才不致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在这一事件中，以色列迫使他别无选择。以色列报复性进攻的信息十分清楚：如果他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们将使用其优势军事力量一点一点地消灭约旦。这是一个残酷的逻辑，在1982年夏天把以色列从远道引入贝鲁特。这也是一种可笑的逻辑，如果以色列同阿拉伯前线国家秘密合作，那么法塔赫在当年就会被消灭。因为叙利亚无意促进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法塔赫的终结就意味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复兴的任何希望的终结。

从60年代初至今，以色列的宣传家和西方许多本当很了解情况的人，把阿拉法特及其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领导集团中的同事们描绘成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的傀儡。尽管阿拉法特曾有一次试图通过苏联玩他的和解牌，而莫斯科也确曾利用它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内部的影响，在1981年破坏法赫德计划（美国曾自称支持这一计划），但除此之外，没有更多东西能接近事实。1965年，当法塔赫正为其生存而战斗时，苏联牢牢地跟那些要勾销巴勒斯坦问题的人站在一起。哈拉德·哈桑说：“苏联强烈忠告纳赛尔要快速和不择任何手段摧垮我们。他们告诉他，关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思想属于‘民间传说’。他们形容我们是‘放牛娃’。”我问哈拉德，他和其他法塔赫领导人如何得知苏联的态度。他回答：“几年之后，纳赛尔把当时苏联劝说他该怎么做，全都告诉了我们。并且以后还是苏联人自己，证实了纳赛尔所谈的内情。”

1965年法塔赫最重要的、保守得最好的秘密是个别人的身份。此人实际上就是参谋长和军事行动协调者。只有两个人能胜任这一工作——阿拉法特自己和瓦齐尔。如果事情按照阿拉法特的愿望和预期发展，瓦齐尔一旦找到他的继任人以接替他管理在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局的工作，他就可以立即来到贝鲁特担任这一职务。

3月，瓦齐尔真的离开了阿尔及尔，并从那儿旅行来到贝鲁特，但没有成为法塔赫的参谋长。在他到达黎巴嫩首都的两天内，和阿拉法特举行了一

次紧急会议之后，他启程前往欧洲。法塔赫开始行动已经三个月，但是阿尔及利亚人和中国人还远未能相信它具有成为一个有效的、可靠的游击队组织所需要的素质。因而，他们尚未实践他们的诺言，供应武器、弹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如果他们不立即找到武器、弹药的来源——地雷和其他炸药在当时是最急需的——他们至迟到年底将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军事行动并承认失败。

阿拉法特就瓦齐尔必须在欧洲解决的问题向他作了出发前的很好的周到的指示。有两项主要内容。第一项导源于这一事实。法塔赫和欧洲的军火商没有联系。所以，瓦齐尔务必要找到同他们联系的线索。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必须考虑到第二个问题。这就是莫萨德。根据阿拉法特的情报，以色列的秘密特务机构在西欧国家首都或多或少都可以放手行事。正如法塔赫后来吃了苦头后才发现的，以色列搜集情报的活动是如此有效，以致到1967年时，莫萨德为在西欧任何地方积极参加学生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设立了档案，并附有照片。最近几年，以色列评论家曾经推测，60年代策划莫萨德欧洲活动的人是伊扎克·沙米尔。

瓦齐尔预期离开前线至少需要几个月。在他离开贝鲁特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谁将成为参谋长和军事行动协调者？阿拉法特曾初步考虑由他自己担任这一工作。但是，如果他在任何一地超过两天或三天，就很有可能会被认出并遭逮捕。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尽可能多地参加军事行动。

当阿拉法特提出这一问题时，瓦齐尔笑了。“没有问题，”他回答。“能够从事我的工作的人已经在贝鲁特这儿了。我的英蒂莎。我的妻子。她能够做我们的参谋长！”

起初阿拉法特根本不愿考虑这一想法。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非凡的、美丽的英蒂莎能够担当这一工作。作为过去六年中的瓦齐尔的秘密的特别的助手，她已经熟知处于地下的巴勒斯坦人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情报机构的特务，会有足够的机警能把她和法塔赫或暴风部队联系起来，除非他得到具体的证据。情况肯定是这样。穆斯林的妻子和母亲们有他们的职责，最肯定的是不会参加一个采取武装斗争反对阿拉伯政权意志和愿望的解放运动。引起阿拉法特警惕的是这一思想。易受武力袭击的英蒂莎在另外的情况下会怎样呢。因为军事行动的命令只能口头传达，她的许多任务之一是会见那些将去以色列执行破坏任务的人，并向他们作出发前的指示。不可避免地有些人会被捕。然后，这只是时间问题，某个人被严刑摧垮，泄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英蒂莎的作用和她的行踪。如果她被捕并遭受严刑拷打，整个地下组织网将会在几天之内遭到毁灭。

“你应当懂得，她无论如何不能被活捉，”阿拉法特说。他的意思是，一旦英蒂莎处于即将被逮捕的关头，她可以选择是自己结束生命，还是给她的警卫一个由他事先规定的射击她的秘密代号。

“她是否准备作出这样的牺牲？”阿拉法特问。

“是的，”瓦齐尔回答，“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多次。她已经准备好了。”

“我亲爱的哈利勒，你怎么样呢？你和你的英蒂莎共享的爱情

是某种超越了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们有两个儿子，并且有一天，真主保佑，将会有女儿。你是否准备好了让她作出这样的牺牲？”

这不是瓦齐尔曾经预料到的问题。他暂停片刻，对此进行了思考。“是的，”他最后说，“我已准备好了。”在当天稍晚时候，他们两人拜访了易

卜拉欣·伊亚德神父。

英蒂莎就是这样成为法塔赫的第一位参谋长和军事行动协调人。

就在此时，哈利勒起用他的战斗名字阿布·杰哈德。阿布的意思是“某人的父亲”。杰哈德是他的长子。英蒂莎就成为乌姆·杰哈德，杰哈德的母亲。他们在法塔赫的多数同事都同样采取这种简便的方式为自己起一个假名。阿拉法特化名阿布·阿玛尔，哈拉德·哈桑化名阿布·萨耶德，萨拉赫·哈拉夫化名阿布·伊亚德。在西方人中最熟悉的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作为例外，此后，在我谈到巴勒斯坦领导人时，我将使用他们的化名。

整整六个月，乌姆·杰哈德的贝鲁特寓所，实际上成了法塔赫的军事司令部。“我什么事情都做，”她说。“我准备军事公报。我为每一次军事行动接待各个分队的领导人并给他们下达指示。我是一个分队和另一个分队之间的联系人。你可以说，我关心我们战士的所有需要。我甚至是给他们发放武器的人。”

我问乌姆·杰哈德，她是否有过这样的担心，她的来访者中会出现一个阿拉伯情报机构的特务。“真的没有，”她答道。“当然我们的人必须用暗号来证实他们自己的身份。但是，我真的没有遇到问题。因为我和阿布·杰哈德一起工作，他们中多数人的名字和相貌我都清楚。他们几乎都是我在度蜜月时见过的人！”

阿拉伯情报机构在一点一点地拼凑暴风部队的组织情况及其如何进行工作的图象。到1965年夏末，阿拉伯特务机构正在准备下毒手。这一天终于到来，当时阿拉法特不得不戏剧性地赶往贝鲁特，从危急中拯救乌姆·杰哈德。

在科威特，哈拉德·哈桑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正怀着日益增多的警觉和痛苦评价阿拉法特军事行动的后果。这是真的，他们都接受了武装斗争的思想。但是，这也是真的，巴勒斯坦的军事努力无助于解放巴勒斯坦的任何领土，除非它是一个协调的阿拉伯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哈拉德及其支持者看来，这时的悲剧是，阿拉法特的军事行动正在破坏同阿拉伯政权特别是同纳赛尔任何和解的前景，更不用说同他们协调的前景了。

整个夏天，哈拉德和其他人千方百计想同纳赛尔接触。通过一个途径，哈拉德甚至通过某一途径同《金字塔报》的编辑穆罕默德·海卡尔取得了联系。他是纳赛尔的代言人。在私人关系上，他也是纳赛尔最好的朋友之一。哈拉德又通过另一渠道，直至同埃及情报局阿拉伯处负责人法泰赫·哈迪布取得了联系。“同他我有过一次斗争，”哈拉德说，“他成了我们的终身的敌人。”

同那些能够打开走向纳赛尔大门的人谈话的结果是，使哈拉德和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完全丧失了信心。“我们只知道纳赛尔正在听信关于我们的两个谎言，”哈拉德告诉我。“第一个谎言说，我们是伪装的穆斯林兄弟会，我们要杀害纳赛尔。后来纳赛尔告诉我们，他的情报人员在日常工作基础上坚持认为阿拉法特是兄弟会的秘密领导人，而正是阿拉法特他总有一天会图谋杀害纳赛尔。第二个谎言说，我们是复兴党人阵线，因而是叙利亚的代理人 and 傀儡。正是海卡尔，他告诉我纳赛尔正同我们作战，因为他相信我们是叙利亚的代理人。”

当埃及人明显地拒绝接受同法塔赫取得任何和解的主张时，他们也暗示，如果法塔赫证明它不是叙利亚阵线或其傀儡，他们也许愿意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法塔赫无意成为任何一个政权的傀儡；但是，法塔赫同其他前线

国家之间的对抗持续得越长，法塔赫就越被推向依靠叙利亚的支持，因而就更加显现出法塔赫正在变成叙利亚的傀儡。对哈拉德及其支持者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多数——需要得出的结论是明显的。如果他们取得机会同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达成一项和解，法塔赫将必须放弃军事行动。如果巴勒斯坦被解放，这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是他们所需要的。舍此，没有其他办法来证明，法塔赫不是叙利亚的傀儡和在将来它也无意成为这样一个傀儡。

正如哈拉德及其支持者看到的那样，他们是被要求作出决定，哪个阿拉伯国家是巴勒斯坦人最需要的。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对手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埃及在历史上是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也是最强有力和作用最大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它现在的统治者无可争辩地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尽管他有许多错误和失败。如果埃及是法塔赫的同盟国，法塔赫就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及时赢得多数其他有关的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和支持。法塔赫若被看作是叙利亚的傀儡，则失多得多。

还有一个情况，叙利亚企图控制法塔赫的动机要比纳赛尔更加不义和不光彩。叙利亚要取代埃及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叙利亚人认为控制了法塔赫有助于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纳赛尔曾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巴勒斯坦人把他卷入同以色列的战争，但他并不想抛弃他们的事业。在纳赛尔和法塔赫领导人之间的实质分歧，是关于巴勒斯坦人在任何一项解决方案中现实地期望得到什么和一项解决方案如何能够达成。

当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作出原则上使军事行动逐步降级的决定时，和阿拉法特的对抗已不可避免。在哈拉德·哈桑为此进行准备时，阿拉法特正在大马士革。

在那儿，阿拉法特大概是从苏韦达尼处得悉，乌姆·杰哈德处于危险之中。阿拉伯情报机构显然已得出结论，暴风部队的作战指挥部在贝鲁特。

黎巴嫩安全部门的首领们经与他们在埃及和约旦的同行们协商后，即将进行捕杀。

9月2日黎明之前，许多巴勒斯坦人被捕。那些已经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人则惨遭严刑拷打，直至他们被整垮。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是几个小时，在一个人真的垮掉并泄露了他所知道的暴风部队组织详情，包括乌姆·杰哈德的作用和在哪儿可以逮捕她的地址之后。

阿拉法特乘一辆出租汽车从大马士革赶往贝鲁特。以下是乌姆·杰哈德叙述的在后几个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

“当阿拉法特进入我的寓所时，天还未亮。他刚关上门，就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讲话。他说：‘我们必须离开。快，快。’我问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时间回答问题，’他说。‘我将在途中告诉你。’

“他非常急切，但又十分沉着。他说：‘我来照顾孩子，你必须收拾好所有你的文件和材料。快，快。’

“杰哈德和尼达尔还在熟睡。阿拉法特叫醒了他们，帮他们穿衣服。我听到他对他们说：‘我们只有收拾一个携带你们衣服和玩具的手提包的时间——把你们想要带的东西给我。快，快。’

“20分钟后我们离开了寓所。阿拉法特抱着孩子进入了出租汽车。他对司机说：‘我不说停车不得停车！’

“在我们一驶上大马士革的公路，我就问阿拉法特发生了什么事情。‘怎

怎么回事？是否阿布·杰哈德出了什么事？’当时阿布·杰哈德还在欧洲——在西德。我多次询问阿拉法特这个或那个问题，他一字不答，直至我们越过边界进入了叙利亚。这时他告诉我全部内幕以及他为什么总是担心我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被捕。”

乌姆·杰哈德在结束这段故事时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令人惊叹的事。我们的同志遭受了难以置信的严刑拷打，但是他们从未暴露我。他们被热烙铁灼伤。他们受皮鞭抽打。他们被反复扔进滚烫的和冰冷的水中。他们把盐擦在他们的伤口上。他们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但是他们坚守我们的秘密。当阿拉伯情报机构读到你写的书时，他们才将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我的真实情况！”

恰巧阿布·杰哈德在同一天早些时候从欧洲回到贝鲁特。他直接回到他的寓所。当他警觉地看到他家里的人匆忙离去的现场后，他并不感到惊奇。乌姆·杰哈德说：“幸亏我给房屋看管人留了口信。我请他告诉我丈夫，我和我的‘叔叔’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习惯于把阿拉法特称为我们的叔叔，因此，阿布·杰哈德知道我在那儿。深夜，他在大马士革阿拉法特的住处打电话给我。我被惊恐得甚至在电话上谈起话来。当时我向他提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什么时候我能见到你？’从他的反应我可以说，他为我竟然提出这样一个危险的问题而吃惊。‘好吧，’他说，‘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放下电话，便去就寝。两小时后，我们听到门铃声，那是阿布·杰哈德。”

这就是法塔赫如何和为什么把它的作战指挥部从贝鲁特迁往大马士革的情况。

我没有发现阿拉法特何时或如何得知他的中央委员会同事的多数赞成减少军事行动，以便给他们机会去争取同纳赛尔进行对话。我所知道的是，阿拉法特说过他将拒绝执行那种意义的任何正式指示。他告诉他的同事们，如果需要，他准备走他自己的路。

阿拉法特的决定将导致一场对抗，它可以称之为法塔赫的第一次对抗。这一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这不是对来自科威特信息的愤怒和霎时反应。对阿拉法特好几天一直为犹豫不决所困扰就是证明。他没有最后下决心，一直到他再次同伊亚德神父进行谈话。

“这一次他没有到修道院来见我，”神父说。“他换了一种方式。他要求一些朋友邀请我们两人共进晚餐。当我到达时，主人对我说：‘你将要会见一位非常钦佩你的人，他希望同你谈话。’晚餐后，阿拉法特和我单独交谈。他告诉我，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正要求他放弃军事斗争道路，而他拒绝服从他们的意见。他说，他知道他们担心他将被推向成为叙利亚人的傀儡，他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他们不理解他。他说：“我将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变成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傀儡。”他十分镇静，但也非常动情，非常激动。我向他询问了有关叙利亚的情况。他预料会有一些麻烦吗？‘嗯，是的，’他说，‘很多麻烦。这个政权在是否支持我的问题上分裂了。很快将会发生另一次政变。一旦某些人掌了权，他们将会试图杀害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将不会愿意成为他们的傀儡。’

“我们也讨论了和埃及人进一步商谈会出现某种积极因素的可能性。我问他如果放弃军事行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说：‘什么也不会发生。没有一个国家会认真支持我们，除非我们通过武装斗争来表明我们是一个不能被

置之不顾的民族。如果我们现在放弃武装斗争，我们的事业必将失败。’

“在这以后，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神父，我已经决定我必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你愿意为我祈祷吗？’”

“我说：‘愿意，’我祈祷了。我告诉他以下的话：‘上帝是爱，而爱是正义的。你不会孤军作战。’他笑了。”

至于涉及在科威特的他的同事们，阿拉法特现在是处于与之对抗的状态。大概正在伊亚德神父为阿拉法特祈祷的同时，哈拉德·哈桑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取消了阿拉法特和军事司令部的资金。这是为迫使阿拉法特接受中央委员会多数决定的政策而谋划的一系列制裁中的第一步。多数人按照这一论点采取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同意军事行动仅仅基于这一理解，这一决定应根据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来检验。

对阿拉法特来说，中央委员会取消他的资金的决定不能在比这更坏的时刻到来。他把他个人资金的最后一部分投到实现阿布·杰哈德欧洲之行的使命上。它已经取得了成功；阿布·杰哈德终于找到了一位准备卖给他武器、弹药的军火商。但运输问题尚待解决。必须首先装运到阿尔及利亚，再从那儿作为阿尔及利亚人的礼物发送出来。但叙利亚人尚未给予准许接受这些礼物。

11月3日，主要由于阿拉法特缺乏资金，他只好使他的组织处于接近停滞状态——多数战士有妻子、儿女需要赡养——法塔赫的军事行动停了下来。阿拉法特也用完了他最后保存的地雷和炸药。雪上加霜，约旦和黎巴嫩的情报机构充分利用他们用残酷手段榨压来的情报。他们严刑拷打落入他们手中的阿拉法特方面的人员。由于他们得悉有关暴风部队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是，约旦和黎巴嫩当局在他们努力阻止阿拉法特的人跨越他们的边界方面现在大为成功。此后的五个月，没有从约旦或黎巴嫩出发的对以色列的袭击。

那是哈尼·哈桑，哈拉德的弟弟，做了最大的努力帮助阿拉法特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对我说：“最初，阿拉法特没有对他的经济问题阐明真正的原因。他只是说，没有经费供应，革命将要停止。因而我开始在西德和其他地方的学生组织中筹集款项。后来我又想到应该把在西德的巴勒斯坦工人也包括进去。正如我曾告诉过你的，单在西德就有65000名工人。他们有星期天工作的习惯，因为星期天可以领双份工资。所以我建议，他们应当每月有一个星期天为组织、为法塔赫工作，其余三个星期大为他们自己。他们同意了。我们开始在一个经常的基础上等集大笔款项。

“你可以说，钱对阿拉法特来说这时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每月都派阿布·杰哈德来取款，并给收条。阿布·杰哈德在莫萨德如此良好组织的地方经常亲身出现是十分危险的。那是阿布·杰哈德，他告诉了我关于阿拉法特同在科威特的同事之间的问题，以及我亲爱的哥哥如何曾经说服中央委员会断绝资金！我对阿布·杰哈德说：‘只要你和阿拉法特在战斗，我们将作你们的后盾。开始我们有过政治上的分歧，但是我们都支持枪杆子！’”

一位哈桑兄弟拿走的东西，另一位哈桑兄弟又送回来了。虽然当时哈尼并不知道他正在成为帮助阿拉法特处理危机的关键人

从西他的巴勒斯坦学生和工人处得到的资金的重要意义，在于使阿拉法特赢得了必要的时间来发展一项战略，以保持军事选择的活力。他在战略上暂时挫败了他在科威特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但是，他知道，哈拉德·哈桑将把所发生的一切看成只是这场特殊的意志战的第一个回合。对抗将继续下

去。阿拉法特也知道，除非他能设法说服大马士革当局允许他从叙利亚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否则他将处于失败一方。

阿拉法特的策略就像他们铤而走险一样危险。他决定他的唯一现实的选择是运用分裂。在 1965 年底，受分裂威胁的叙利亚政权面临解体。这是一种需要他违反——如果不是打破——他自己基本原则的战略。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阿拉法特那时对自己，以后又对别人，证明他当时的行动是正当的。其根据就是他仅仅是在叙利亚人自己的赌博中利用权利。他们正在利用他，他也要利用他们。这也是一个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几乎两次使他丧生的战略。这帮助他认清，只要哈菲兹·阿萨德还活着，他就是他的头号敌人。

表面上看，统治叙利亚的复兴党是在如何更好地利用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分裂了。但是，阿拉法特从与苏韦达尼和其他人谈话中得悉，这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另一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的掩护。那些正在掌权的是总统阿明·哈菲兹将军及其支持者。那些想夺权的是所谓复兴党青年土耳其党——一些知识分子和极左派的激进分子，更重要的是代表阿拉维派的军人。阿拉维派是一种神秘的、守口如瓶的、以什叶派穆斯林占优势的宗教派别，在叙利亚总人口中不超过 14%。有一个人深信他命中注定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统治权利，此人就是哈菲兹·阿萨德。

当阿明·哈菲兹取得政权时，他强烈地反对纳赛尔，是这一思想的首要倡导者：只要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就能够在战场上击败以色列。阿明·哈菲兹是作为 1964 年政变的结果上台的。哈菲兹在国内外被广泛地看作是一头自夸的驴和一个愚蠢的人。他两者兼而有之，但他并不是如此愚蠢以致他拒绝考虑关于纳赛尔所说的一切。在 1965 年 9 月第三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纳赛尔曾说，即使阿拉伯人把他们的军事力量真能联合起来，他们也敌不过以色列。

1965 年即将结束时，阿明·哈菲兹暗中相信纳赛尔是正确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能做的最坏的事情是，用一种可以激起以色列攻击权利的办法来支持阿拉法特。1965 年底，阿明·哈菲兹是一个多虑和惊慌的人。他开始后悔不该同意苏韦达尼去谈论他将给阿拉法特以任何自由。当时这好像是一个好主意。由于宣布 he 自己是游击队的支持者，阿明·哈菲兹就可以放弃 he 同以色列进行快速、全面战争的承诺，而又不大丢面子。或者他是这样想的。

这一年年底，叙利亚总统正在考虑一项新的巴勒斯坦政策。出台的是一项通过游击战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但是，这种斗争只有在完成了必须的、适当的准备之后才能开始。简言之，这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给了阿明·哈菲兹的对手以机会。现在他们可以谴责 he 是叛徒，而一旦他们自己掌了权，就可以以唯一的真正的革命武装斗争哲学的信徒的面目出现。

阿拉法特在场外观望，允许自己悠然一笑。现在是为 he 自己利益而行动的时候了。

阿拉法特和苏韦达尼回顾了局势和他们在 1 月切的选择。到这时，阿拉法特有点绝望。从他的最近一次军事行动以来，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已经过去了。

阿拉法特告诉苏韦达尼，他们正在认真做的是这样一个论证，它足以充分说服哈菲兹总统允许法塔赫经过叙利亚袭击以色列。总统对这样的建议当

然很警惕，但是，他可以由苏韦达尼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如果想作为总统生存下来，他别无选择。苏韦达尼应该告诉他的是，使对手无能为力的最好的办法是剥夺他们的口实。他的反对者声称，他过分听信纳赛尔的忠告，而对履行自己关于武装斗争的承诺是不认真的。总统通过允许法塔赫使用叙利亚作为其军事行动出发地，就会证明他的批评者是错误的，剥夺他们进行反对他的行动的借口。

苏韦达尼跟阿拉法特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总统也许会很好采纳的论点——假如他绝对相信他自己的人，苏韦达尼在何时和从什么地方将要发动作战行动问题上有最后发言权。总统会坚持这一点，因为他害怕以色列报复性进攻的前景。他要确信，如果以色列使局势白热化，他能够停止法塔赫的军事行动。

这时轮到阿拉法特承认他别无选择。在这种环境下，这是他所能期待达成的最好的交易。他允诺他将尊重苏韦达尼能和总统达成的任何协议的条款。

1966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哈菲兹批准了苏韦达尼的行动计划。1月23日夜，一支法塔赫的小分队从叙利亚土地上进入以色列，执行第一次破坏任务。叙利亚人对法塔赫的行动控制得非常严格。阿拉法特的人必须通过约定的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陆军检查哨所，并且每夜都有不同的代号。但阿拉法特赢得了这场交易，它证实巴勒斯坦人确实存在。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还有另一件事——苏韦达尼已经为一架阿尔及利亚运输机在大马士革着陆进行了安排，阿布·杰哈德的武器和弹药运到了。

在科威特，阿拉法特取得成功的消息没有得到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应有的重视。多数人认为他的行动是不可容忍的，是危险的挑衅举动。它是不可容忍的，因为阿拉法特表现出对集体领导思想的完全蔑视。它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正明显地将自己置于叙利亚的掌握之中。在这方面，主要由于阿拉法特的同事们误解了他的人品和性格。他们对他作出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时间将会证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维护巴勒斯坦人作出决策的独立性方面，比阿拉法特更顽强地斗争。正如他曾经正确表明的，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允许他自己被利用的结果是为事业赢得了利益，他准备被利用。但是，阿拉法特过去没有，今后也将永远不会愿意允许任何一个阿拉伯政权或任何一个大国势力为巴勒斯坦人作出决定。阿拉法特所有的同事，包括他的批评者和他的敌人，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这个决心是他的最伟大的力量所在，同样，也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但是，这不是在1966年出现的情景。

哈拉德·哈桑大发雷霆。他和他的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同事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使纳赛尔周围的人相信，法塔赫不是叙利亚的一个阵线或傀儡，法塔赫无意同叙利亚结成联盟，使叙利亚人能够在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问题上向纳赛尔挑战。现在在开罗还有谁会相信哈拉德·哈桑呢？集体领导显然已失控。在埃及人眼里，哈拉德·哈桑最好也只看成一个傻瓜，最坏则是一个恶棍。

如果中央委员会在最激烈的时刻作出一个关于如何处理阿拉法特的决定，很可能他将被解除他的军事司令并被开除出这个组织。但是，哈拉德及其同事们同意在作出决定之前，让时间使怒气冷静下来。

平静的反应暴露了他们面临的全部两难困境。如果他们不控制阿拉法特，他们和纳赛尔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话的意图必将落空。如果不

进行对话，那就没有政治基础来发展巴勒斯坦—阿拉伯联合战略，而这一战略到头来是绝对需要的，如果巴勒斯坦要解放一平方米的领土。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阿拉法特的军事行动有可能使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团结起来，走向为巴勒斯坦事业进行的斗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会害怕，而且也许更多而不是更少准备同法塔赫达成某些和解。

如果法塔赫真的分裂，作为中央委员会对阿拉法特执行纪律的结果，情况将会怎样？谁将会从中得利？哈拉德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以下设想基础上进行工作，如果他们证实法塔赫不是叙利亚阵线，通向纳赛尔的大门也许可以被打开。设想一下，他们错了吗？是否纳赛尔的人已经暗示了某些东西直接促使哈拉德分裂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已有分歧，但它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唯一的可信赖的领导。产生分歧，它能生存。使之分裂，它也许就不能了。

哈拉德告诉我：“最后我们决定对阿拉法特执行纪律，内容是停止他法塔赫会籍三个月。”

哈拉德的意图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从长期政策考虑要求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哈拉德会说，他和多数人并不放弃武装斗争的思想。事情远非如此。他和多数人所需要的是一个喘息的时间，给他们以可能最好的机会与一些阿拉伯政权达成一项谅解。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将达成一项联合的与以色列对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政策。然后真正的武装斗争将开始。当时，即使哈拉德也相信，阿拉伯政权唯一缺乏的是战斗意志；一旦他们真正起而战斗，以色列将在战场上被击败。如果他们无力执政，法塔赫将带头进行革命，推翻现存的阿拉伯秩序。

在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现在已十分清楚。哈拉德·哈桑是一个重在战略的人。阿拉法特是一个重在战术的人。他在任何时候看到有行动的良机，他就要抓住它。

哈拉德的意图是想通过平静的、说理的辩论，使阿拉法特转到多数人的想法上来。这样做如果行不通，哈拉德将要告诉阿拉法特，在集体领导中没有他的个人主义的地位。

在这两人之间的最后对抗的舞台就这样撰开了。如果对抗真的发生，阿拉法特大概会失败。但它没有发生，因为在大马士革发生了戏剧性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当阿拉法特在抵制粗暴的、难对付的叙利亚接管法塔赫的企图时，他正在为他的生命而战斗。

第十章从监狱到监狱

1966年5月第一个星期的周末，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以及其他20名创建法塔赫军事组织的同事，头一次有机会在一起聚会——却是在叙利亚的监狱。他们是在一项叙利亚支持的暗杀阿拉法特的计划失败后被捕的。叙利亚当权者此时企图以捏造的谋杀罪绞死阿拉法特。他们准备正式指控阿拉法特充当了一起暗杀阴谋的唆使者，但实际上，阿拉法特才是被人谋害的对象。

如果不是阿布·杰哈德最小的儿子从居住的四层寓所阳台上跌下摔死，如果不是阿布·杰哈德因此从监狱获释料理其子的后事，阿拉法特很有可能已被处死。

哈拉德·哈桑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我们同叙利亚的麻烦，是从那些为了私利而要权力的军人掌管政权并亵渎复兴党口号时开始的。他们在夺取政权之前，仅仅自称是复兴党员以便使自己具有合法性。当他们当权后，曾正确地把我们当作志在赢得群众支持和赞同的一种运动。简言之，他们知道我们是主张民主方式的。这也正是法塔赫同历届叙利亚政权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历史原因。一般说来，也是法塔赫同许多阿拉伯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历史原因。叙利亚军事领导人，从来没有通过民主途径获得人民赋予的权力和合法性的丝毫打算。他们靠武力接管政权，尔后又通过警察国家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权力。”

哈立德谈论的这种紧张关系，在1966年2月叙利亚第九次政变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进展。因为这场政变为占少数的阿拉维教派的军人打开了掌握大权的大门。

哈拉德继续说：“如果你是一个具有政变心理的领导人，如果你只代表占国家14%的人民，那么你将始终生活在担心被推翻的恐惧中。克服这种恐惧和防止被推翻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大多数人民更畏惧而不是相反。这也正是叙利亚在1966年政变后开始发生的情形。从这一点看，很明显，叙利亚军事领导人必须粉碎或控制任何主张公开讨论问题的团体或派别。当他们封闭了他们自己的人民的喉舌后，便转而对付我们了。在他们看来，由于我们真正想要遵循民主的方式，我们便成为他们唯一的严重内部威胁。至于我们拒绝他们为了私利占有和玩弄巴勒斯坦这张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前所述，阿明·哈菲兹总统曾希望他对游击战争的象征性支持，能够反驳他的反对派说他不认真抗击以色列的指责。那些阴谋反对他的人决定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将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他们的夺权行为正当。

这次政变的领导人是前总参谋长萨拉赫·贾迪德将军。他是阿拉维派教徒。新总统是前副总理努尔丁·阿塔西。但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知道，他不过是挂名首脑。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萨拉赫·贾迪德。在他旁边还有另一个人，也是阿拉维派教徒，这就是哈菲兹·阿萨德。这个人知道，他目前离总统职位不过一步之遥，一次政变而已。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是唯一能同阿拉法特较量的阿拉伯人，但是在手段上完全是冷酷的，对此阿拉法特甚至连想也没想过。就这一点来说，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最不公平的斗争。

苏韦达尼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立场，当时他是总参谋长，大概萨拉赫·贾迪德和哈菲兹阿萨德并不想要他插手军事情报机构。

因为他们打算通过这一机构接管法塔赫。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准备杀死阿拉法特。他们可能认为，当情况进展不妙时，苏韦达尼由于老交情的原因也许试图在帮助阿拉法特。苏韦达尼终于得出结论，他的新主子是阿拉伯舞台上最大的伪君子。他这样说时犯了错误。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列入被清洗的名单后，便设法逃往中国。

叙利亚斩当权者比其前任更执意避免同以色列进行一场常规战争，这一点至少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一样，尽管很多宣传和表面迹象与此相反。叙利亚避免战争的做法，是在表面上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游击战求得解放。这种把戏是在寻找适当的平衡。叙利亚人不得不支持一定数量的游击活动，以便使人们相信他们的关于要认真抗击以色列的虚伪宣传，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确保使游击活动局限在一定水平，不足以给以色列提供打击叙利亚的借口，这是十分危险的平衡把戏，然而叙利亚人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可以利用它而避免危险。他们的战略在实质上比纳赛尔棋高一着。他们希望取代纳赛尔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要有一个不准进行战斗的傀儡巴解组织，叙利亚则要一个允许进行战斗的傀儡法塔赫，但要以叙利亚的方式进行战斗。

在大马士革政权变更的短短几周内，阿拉法特似乎得到了很多东西。他仍然自由地继续从叙利亚进行打击以色列的行动。叙利亚新领导人也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巴勒斯坦事业的真正战士。阿塔西总统保证，革命“将鼓舞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并在各个方面帮助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去解放自己的家园。”

但是，阿拉法特保持着警惕。他料到会有麻烦。此时，他既已被正式暂停作为法塔赫成员，并面临着被开除的前景，他有两条理由来抵制叙利亚人控制法塔赫的任何行动。一方面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他所说的法塔赫的“纯洁”；一方面他须向在科威特的同事们证明，他们错误地对待了他，他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他能够在叙利亚人的花招中有幸打败他们。

叙利亚人企图用一个他们选择的巴勒斯坦傀儡，来取代阿拉法特担任暴风部队的军事领袖。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打算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这一领导职务的更迭。他们的计划是，在暴风部队内部安插他们自己的人，然后再帮助他们取得领导权。只有当阿拉法特拒绝充当叙利亚傀儡的副手时，才会将他除掉。

叙利亚选择的人是艾哈迈德·贾布利勒。他自视为舒凯里的当然继承人，但他根本没有舒凯里的才能，他想掌权不过是出于私利。同阿拉法特一样，贾布利勒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在叙利亚军事学院学习并获得学位。在那里他被叙利亚军事情报局吸收为它的一名代理人。1961年，贾布利勒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阵线。这是一个完全为其叙利亚主子收集情报的组织。

二月政变后不久，贾布利勒会晤阿拉法特并提出建议，他们应将他们的两个组织合并起来。阿拉法特毫不犹豫地同意讨论这一想法。他知道贾布利勒是叙利亚的人，但是他考虑，如果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成为法塔赫的一部分，他可能更容易遏制贾布利勒所代表的叙利亚干涉的威胁。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的那样，与其让你的敌人“从外面向屋子里小便”，还不如叫

他进来“从屋里向外小便”。

据哈拉德·哈桑和乌姆·杰哈德讲，法塔赫同贾布利勒的确就合并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然而贾布利勒并不满意，因为根据阿拉法特的建议，他只在提议建立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贾布利勒要求完全的军事领导权。他辩解说，他的要求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上，即是他而不是阿拉法特能使叙利亚为他们的斗争提供全力支持。当阿拉法特明确表示，他无意允许一位叙利亚的代理人来指挥法塔赫时，贾布利勒向他的控制者请求新的指示。贾布利勒同叙利亚军事情报局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决定并计划杀死阿拉法特。

暗杀阴谋的构想是，利用一个不明真象的第三方，诱请阿拉法特出席一个会议，会上将其射死。这个无知的第三方就是约瑟夫·乌拉比。他是巴勒斯坦人，在叙利亚军队中任上尉，他被提出充当贾布利勒与阿拉法特纠纷调停人的角色。乌拉比出于良好的愿望，相信如果对抗可以转变的话，调停是有必要的。他邀请贾布利勒和阿拉法特参加一个由他主持的讨论双方分歧的会议。

阿布·杰哈德说：“乌拉比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忠于他所服务的叙利亚军队的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是知道这一点的人，因为乌拉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乌姆·杰哈德也证实了他丈夫的话，并说乌拉比也曾给她“许多帮助”。哈拉德·哈桑告诉我，乌拉比曾被考虑选进法塔赫军事委员会。

会议预定5月5日下午6时在阿萨卡区的一所房子里进行。到会前最后一分钟，按照预定计划，贾布利勒突然想起他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更紧急的约会。他派来一个人代替他，而这人正是要暗杀阿拉法特的人。他是叙利亚的一名军官，化名阿德南。哈拉德·哈桑说：“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发现恰好在会议预定开始之前，通常在阿萨卡区值勤的国民警卫队撤走了。他们适时消失了。”显然，当局不想有任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官方证人在场。

但是，阿拉法特没有到场。他也派来一位代表。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希沙姆。希沙姆带了一个名叫阿卜杜勒·马吉布·萨穆德的警卫。他被命令躲在隐蔽处，注视周围事态。希沙姆受命讨论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且声称，阿拉法特可能晚一会儿与会。

那位名叫阿德南的人开始叫嚷，高声指责乌拉比是叛徒。其意看来是说乌拉比已以某种方式警告阿拉法特离开。阿德南也有可能推测或被告知，乌拉比了解这一阴谋。也可能是他开始怀疑自己陷进了圈套。

他的吼叫持续了数分钟。接着响起了两声枪响。名叫阿德南的那个人逃向夜晚的黑暗之中。当萨穆德闻声赶来，乌拉比和希沙姆已经停止了呼吸。

贾布利勒没有估计到他的计划会出岔子。他没有等到确认阿拉法特的死亡，就采取了下一步行动。哈拉德·哈桑说：“当时贾布利勒推测阿拉法特已被杀死，便散发了一项声明。声明谴责法塔赫是沙特阿拉伯的傀儡，指责我们所有领导人都是巴勒斯坦革命敌人的代理人。我已记不得确切内容，因为这是一个不连贯的、无条理的宣传性声明。但它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刚刚发生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它将会改变一切。事实上，正如我们不久所知，贾布利勒正准备发布一项通告，宣布阿拉法特已死，他本人，贾布利勒，开始担任所有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的指挥。”

我曾问过阿拉法特，为什么他没有参加这次预定暗杀他的会议。是不是他那著名的鼻子或对危险的嗅觉拯救了他。他答道：

“完全不是。这一回并不像你说的是我的鼻子，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幸免。我之所以未去那个地方，是因为阿布·杰哈德和我被要求去同叙利亚一位很高级的官员会晤。他后来便成为我不在乌拉比遇刺现场的证人。”

阿布·杰哈德告诉了我同这位“叙利亚很高级的官员”会晤的较多情况。我推测，此人是总参谋长苏韦达尼。杰哈德说：“这位官员承认，他和他的上级对以色列没有通过袭击叙利亚来迫使大马士革政权放弃对我们——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支持感到吃惊和困惑。阿拉法特和我都同意，以色列没有采取报复性袭击是很奇异的举动。早在 50 年代初期，以色列就制定了一项政策，对那些被以色列称为允许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跨越边界去袭击犹太国的阿拉伯国家，要进行打击。当以色列确知纳赛尔和侯赛因在试图控制我们并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时，他们曾多次在加沙地带和约旦进行报复性进攻。此时叙利亚正在公开地、骄傲地表示支持我们，……而以色列人却没有进攻叙利亚！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正在耍什么花招？不管怎样，一些叙利亚人对此不仅感到惊奇和困惑，而且感到担忧和恐惧。他们认为，以色列人正在玩弄诡计，以色列向叙利亚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可能发生在旦夕之间。这样，我们这次会见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他们请求我们从黎巴嫩派出一支巡逻队，在以色列战线后方侦察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同这位叙利亚高级官员会晤后，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直接回到他们在亚穆克难民营的基地。他们计划在那里组织在以色列战线后方执行侦察使命的巡逻队。但当他们到达营地时，立刻就为乌拉比和希沙姆被暗杀的消息所震惊。他们向萨穆德详细询问了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事态的寓意十分清楚。阿拉法特有幸活下来了，但是，他的真正麻烦尚未开始。

叙利亚人打算陷害阿拉法特的第一个迹象是拘捕萨穆德。执行拘捕的官员对萨穆德被控杀人没有留下什么可疑之处。十分清楚，稍后他们将逮捕阿拉法特，并指控他是这次暗杀阴谋的唆使者。

阿拉法特对我说：“他们逮捕的那个人完全是无辜的。我们自己相信确实如此。他看到了他所看到的，听到了他所听到的。但是他完全是清白的。不幸的是，某些人并不考虑真实情况。他们逮捕了我们的人以掩盖事实真相。”

乌姆·杰哈德好不容易刚刚把她最小的儿子尼达尔打发入睡。尼达尔还不到 3 岁，但精力却比几个普通孩子加在一起还多。他有时这里爬爬，有时那里走走，几乎无处不去。他的住处在第四层，大人每时每刻都要看住他。阿布·杰哈德差不多每天都要警告他的妻子：“如果你不盯住那个孩子，他就会到阳台上去，那样是会出事的。”只有在尼达尔夜晚入睡的时间里，乌姆·杰哈德才能在自己房里休息。但就在这天夜晚，她遇到了麻烦。

大约在晚上 7 点钟，几名法塔赫战士猛冲到楼上，急敲乌姆·杰哈德的房门。他们流露出惊慌的神情。“阿布·杰哈德在哪儿？阿市·阿玛尔在哪儿？”他们问道。乌姆·杰哈德回答说不知道。他们匆匆离开，没有告诉乌姆·杰哈德他们所听到的情况——约瑟夫·乌拉比和穆罕默德·希沙姆遇刺身亡。

乌姆·杰哈德说：“大约在 8 点钟又来了我们的一位同事，他问我：‘你是一个人回家吗？’我告诉他是的。我向他询问出了什么事情。他说：‘出

了大麻烦。叙利亚人正在搜查我们的营地和办事处，我是赶来保护你们的。’

“过了三个小时后，他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去找阿布·杰哈德和阿布·阿玛尔，如果你不介意一个人呆在这儿的话。’我叫他去了。价诉你实话，我很高兴。他显得很紧张，而他把我弄得更紧张。”

“一个半小时后，阿布·阿里·伊亚德来了。他是一位十分坚强的人，受到我们大家的爱戴和尊敬。他说：‘乌姆·杰哈德，我不会离开你的身边，一直等到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局势遭透了。’他叫我关上电灯，他打开了通向阳台的门。我们坐着，等待着。”

阿拉法特或者阿布·杰哈德可能已委派阿布·阿里·伊亚德去做某项必须做的事情。如果同大马士革当局摊牌，乌姆·杰哈德必须得到援救。她无论如何不能被夺去生命。他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乌姆·杰哈德继续说：“在凌晨4点钟，我们听到了汽车声。我们看到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从车里走出。只有他们两人，我们等着他们走上楼来。他们显得很疲倦，看上去十分悲痛，他们的眼睛红红的，我能看出他们刚刚哭过。我问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阿布·杰哈德说：‘约瑟夫和穆罕默德被杀害了，当局正准备指控我们。我们中了圈套。’”

几个小时后，两名叙利亚情报官员来把阿拉法特带走了。乌姆·杰哈德带着讥笑对我说：“他们声称，他们把他带到监狱是为了他本人的安全。”

“你知道他们是在撒谎，”我说。

“当然。”她答道。

两天后，乌姆·杰哈德正在厨房为她丈夫提前做早饭。他一个人在卧室看文件。寓所的门冲卧室开着。厨房离那儿有一点距离。她说：“当我端着咖啡走进卧室时，阿布·杰哈德不见了。我喊他，没有人回答。我在其他房间里寻找，仍然不见阿布·杰哈德。我等了大约半小时。然后下楼向正在楼下玩耍的孩子们走去。我问他们：‘你们见到阿布·杰哈德叔叔了吗？’‘见到了，他坐一辆轿车走了，’他们说。‘什么样的车？’我又问。‘一辆绿色的车。’他们答道。”

据推测，那是一辆军车，阿布·杰哈德被捕了。乌姆·杰哈德走访了叙利亚军事情报局总部。他们知道她丈夫的任何情况吗？他是已经被捕了吗？他是在监狱里吗？“所到之处，我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阿布·杰哈德不在监狱，他没有被逮捕，他们不知道他在那儿。”

此后的6天中，寻找工作主要由乌姆·杰哈德本人来做，她在大马士革翻来覆去到处打听阿布·杰哈德的下落。她察觉她自己或许已处在监视之下，因此，她没有去同任何法塔赫军事领导人进行接触。“最初，我确信阿布·杰哈德是在监狱里。但我自问，为什么叙利亚人说他不在。这不能讲得通。我开始怀疑阿布·杰哈德是否为一项使命而出走。我又开始想他已被以色列人俘获或杀死。”此时，由于中止阿拉法特法塔赫成员资格命令仍在生效，阿·杰哈德当时正式执行着该组织军事指挥司令的任务。

她继续说：“到了第7天，我决定找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人帮忙。我同他的妻子很要好，我知道她丈夫是叙利亚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但是，我是不允许知道这一点的。我同他谈了话。他说他可以打几个电话问问。不到半小时他就告诉我，阿布·杰哈德在监狱里。如果我去宪兵总部拿到一张许可证的话，就可以去探视他。”

这个监狱现已改为军事拘留营，坐落在大马士革机场附近。乌姆·杰哈

德说：“一名宪兵打开了房门，我感到十分震惊。在这间牢房里，有阿布·杰哈德、阿拉法特以及 20 多位我们的同志。除了阿布·阿里·伊亚德之外，所有最主要的法塔赫军事领导人都在那个房间里！阿布·杰哈德紧紧地拥抱我，我失声痛哭。他低声叫我不哭，同时一边安慰我，一边将一个折叠起来的纸片塞在我手中。这是他要我送交给在科威特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内当局告诉乌姆·杰哈德，她可以每隔三天来探视丈夫一次。在她第二次探视时，她被授与了她有生以来最危险的任务。

“阿布·杰哈德对我说，在他们这些领导人被监禁期间继续开展军事活动是绝对重要的。他说，这可以使权利当局确信，仅仅靠逮捕军事领导人是不能控制法塔赫的。如果军事活动继续进行，权利人将会感到恐惧。接着，阿布·杰哈德向我发布了他的指示。他吩咐我建立一个秘密的紧急行动委员会，负责继续开展军事活动。该委员会由阿布·阿里·伊亚德、艾哈迈德·阿特拉什和我三人组成，我本人是代理军事司令。阿布·杰哈德说：‘你告诉阿里和艾哈迈德，这些指示是我的命令，他们将会服从你。’”

乌姆·杰哈德被证明是一位颇为能干的司令。从叙利亚出发进行的破坏活动有所减少，但法塔赫部队却是几个月来第一次从约旦和黎巴嫩进入以色列。用军事术语来说，战斗总和不多——它从来就不是很多，但它足以清楚表明，叙利亚政权不能仅仅用拘留其军事领导人办法来控制法塔赫。

与此同时，也无迹象表明，叙利亚人打算释放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然而，在他们被捕后的 6 周，命运出来干预了。

乌姆·杰哈德通过一位未被捕的法塔赫高级官员，同一位叙利亚高层领导人约定了一次秘密会晤。乌姆·杰哈德说：“我要告诉你他的名字（她说了），但我希望你不要公开。他是叙利亚一名领导成员，但却同情我们。他准备告诉我对于在监狱中的阿拉法特和其他人将要发生的事情。

“在约定会晤的那天，阿布·阿里·伊亚德和艾哈迈德·阿特拉什在我的住处。会见地点是在确定这次会晤的我们的那位同志家中。我准备到他那里去会见这位叙利亚领导人，并打算带上我的孩子尼达尔和杰哈德，让他们在会晤时同那位同志呆在一起。我开始感到我们自己的住所不太安全。阿里和艾哈迈德让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要我带着会晤情况尽快回来。他们显得很急切。我答应了他们。我在离开大楼时，仰望了我们的住所，发现通往阳台的门是开着的。我急忙返身上楼。阿里和艾哈迈德问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又回来了？’我告诉他们关上通向阳台的门，因为我担心尼达尔会从那儿掉下去。

“然后我赴约了。消息真是糟透了。这位叙利亚领导人首先告诉我，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以及他们全体人员已被转移到大马士革最大的一所监狱。军事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完成。警察局接受了这个案子，这意味着阿拉法特将会以刑事犯罪而不是以政治过错受到指控。这位叙利亚人告诉我：‘他们已决心裁决阿拉法特犯有命令杀害乌拉比之罪，他们正在使之成为刑事犯罪以便他们能够绞死他。如果你们想拯救阿拉法特，你们必须动员你们在各地的所有朋友。’

“我回到住所同阿里和艾哈迈德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不能说感到吃惊。我们已猜到，叙利亚人想要消灭的人物正是阿拉法特。但我们还是受到很大震动。艾哈迈德变得十分愤怒。他说，我们应当做出决定，在全叙利亚搞爆炸事件。我告诉他，你这样的想法真蠢，这种行动的结

果只能使我们在监狱中的同事被处死和最终使法塔赫毁灭。他坚持他是正确的。我说：“我对决定是负有责任的，你要服从我的命令！”

当艾哈迈德·阿特拉什安静下来后，乌姆·杰哈德建议他们大家都需要用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两个人走了。

乌姆·杰哈德继续说：“他俩刚走，尼达尔对我说，‘妈妈，我要喝水。’我从厨房给他拿了一杯水。当他喝完水时，杯子掉在地上打碎了。尼达尔蹲在地上开始捡拾碎片。他割破了手。我给他包扎了一下，然后把他放在他的床上，要他休息。我到厨房去拿刷子和其他东西，以便清除破碎的杯子。”

“在此问时，我脑子里思考着能做些什么以拯救阿拉法特的生命。突然我听到一扇门打开又关上的卡嗒声。我冲出厨房奔向阳台，但是太晚了。尼达尔已经摔下去了。

“我跑下楼，我的孩子已摔坏，血流如注。一些朋友叫来了医生和救护车。孩子在去医院的路上死去了。”

乌姆·杰哈德从医院出来后，来到一位叙利亚女朋友家中。她同叙利亚当局的关系很好。她正在款待其他人。我半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这时她问我为什么如此沉寂。我说：“我的孩子尼达尔死了。我想要阿布·杰哈德获准出狱来埋葬孩子。请帮帮我吧。”

第二天凌晨一点，阿布·杰哈德被释放 24 小时。他说：“起初，我以为这是个圈套。他们只是告诉我，因为出了点问题，我的家中需要我。他们把我推进一辆军车，并且后面还跟着一辆。我想，他们是去搜查我的住所寻找文件。”阿布·杰哈德真正担心的大概是他的妻子将被逮捕。

阿布·杰哈德从一位邻居那里得悉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妻子正同一些朋友呆在一起。

乌姆·杰哈德说：“阿布·杰哈德一到就问我，杰哈德出了什么事。我说：‘出事的不是杰哈德，而是尼达尔。你经常害怕发生的那件事发生了。’我们俩都哭了。但是阿布·杰哈德十分坚强。他说：‘亲爱的，我们决不能让这件事压垮我们。我们还年轻，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孩子。’”

阿布·杰哈德对我说：“那天凌晨几小时内，我埋葬了孩子。我没有钱在好地方买一块墓地。我只得在普通的场地上埋葬了他。乌姆·杰哈德问我把儿子埋在哪里，我没有告诉她。我不想让她知道尼达尔没有被埋葬在一个合适的墓地里。”

那一天结束前，阿布·杰哈德在同内政部长的约会中谈了他的情况。这使他又赢得了 24 小时的自由。此时，他对许多过去同他合作过的叙利亚高级军官进行疏通活动，而他们知道或者觉得，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并不对乌拉比和沙希姆的死负责。这一接触使他再一次争取到 24 小时的自由。他们还为他安排了一次同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的约会。

阿布·杰哈德对我说：“没有人知道安排这次会见费了多大力气。当我走进阿萨德办公室时，他仍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的两眼不动，严酷而冷漠。他的握手也是冷冰冰的。整个气氛都是冷漠的，就好像置身于冰箱之中。”

在他们谈话的 3 个小时内，气氛显然没有升温。阿布·杰哈德说：“我一五一十、详细地向这位未来的叙利亚总统解释，阿拉法特和法塔赫为什么不可能卷入乌拉比和希沙姆的谋杀案之中。”

阿布·杰哈德本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同事们的支持和补充。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科威特来到大马士革，为拯救阿拉法特的生命进行辩护。阿

布·杰哈德没有回到监狱。过了两至三个星期，除了一个人外，其余所有被监禁的人都获释了。阿拉法特是在最后获得了他的自由。叙利亚拒绝释放的一个人就是萨穆德。阿布·杰哈德说：“他至今仍在监狱中。”除了贾布利勒，巴勒斯坦人中大概只有萨穆德一人能认出真正的杀人凶手——那个以阿德有的名字出现的叙利亚间谍。

哈菲兹·阿萨德很有可能就是策划陷害阿拉法特的人。当他意识到太多有影响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明白这一事件的事实真相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当我把这一推测提到阿拉法特面前时，他说：“这不是我要回答的问题。这是应由历史来决定的。”

我问阿拉法特，他当时是否对叙利亚人，或者说是某些叙利亚人，希望看到他被绞死有过任何怀疑。他答道：“这是他们准备要做的事情。对这一点没有怀疑。”

我又问他，是否对话着从监狱出来始终抱有信心。他沉思了大约 10 秒钟后答道：“是的，我确信。”

为什么他在回答我这一问题时要沉思这么长时间？

阿拉法特笑着说：“我必须想想你这个问题。在拯救我的生命中，如此众多的人都出了力。”

在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及其同事们被关在监狱中时，叙利亚情报局巴勒斯坦处处长穆罕默德·奥尔基少校叛逃到约旦去了。很自然地他随身带走了他的文件。以色列情报资料后来宣称，奥尔基的叛逃是法塔赫的一次重大挫折，导致约旦河西岸的许多法塔赫基层组织的消灭。阿布·杰哈德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告诉我：“奥尔基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贾布利勒及其助手所知道的那些情况。除了我们这些被捕人的姓名和某些细节外，他对法塔赫一无所知。我们并不十分关注奥尔基的行为。”

奥尔基的叛逃之所以值得注意，仅仅是由于他提出了一两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他是自己主动出走的还是被动为人推出的？他是自己想要离开他的叙利亚主子，还是受命叛逃？换句话说，他的叛逃是大马士革当局策划的毁坏法塔赫的另一种方式吗？

阿拉法特出狱后，精明的抉择是离开叙利亚，至少是离开一段时候。他的确这样做了，却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的。他化装成一名叙利亚军队中的下士，率领一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 14 人组成的法塔赫分队，潜入以色列北部。

迹象表明，阿拉法特领导法塔赫军事力量的问题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军事斗争。由于法塔赫部队从阿拉伯前线国家进入以色列变得越来越困难，阿拉法特想要侦察一下以色列的防务。他也很需要了解，如果组织得很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和获得充分供应，法塔赫部队在犹太国境内进行活动预期能持续多长时间。

阿拉法特说：“几天之内，我们完成了许多侦察任务，以确认今后将要袭击的目标。然后，我们展开了一些袭击活动。我记得的有两次。一次是袭击一个瞭望塔。我们摧毁了它。接着我们又炸毁了一个藏满武器、弹药的仓库。”

随后以色列的追踪开始了。

阿拉法特继续说：“一支以色列巡逻队跟随了我们整整一天一夜。我的目的不是同以色列人交战，而是要看看摆脱他们的难易程度。他们不错，但

我们更好。24 小时后，我们甩掉他们进入黎巴嫩南部。”

但不久他们被一支黎巴嫩巡逻队扣留了。几个小时后，阿拉法特又回到了监狱。这次是在贝鲁特。

阿拉法特提供了一个假名并否认他是这支分队的领导人。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他被折磨得到了死亡边缘。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是一位十分谦逊的人，他从不以英雄自居。对于他所受的折磨，他只是告诉我，那是“十分残忍和野蛮的方式”。他对自己不屈不挠显然十分骄傲。他说：“我生平到了此时已习惯于受折磨了。我知道他们能够杀死我，但我也知道他们绝不能使我屈服。”

阿布·杰哈德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补充：“他们每天都毒打他，踢他。他们对他施加了那么多恶劣的野蛮的暴行。也许有一天他将自己谈及此事。”我问阿布·杰哈德，这些酷刑是否包括使用了电刑，他们是否把电线接到他的睾丸上。他答道：“这不应由我来说。”

黎巴嫩人后来终于发现，亚西尔·阿拉法特，化名阿布·阿玛尔，就是他们差不多要杀死的这名俘虏。当酷刑不能使他屈服时，一位黎巴嫩高级保安官员同叙利亚军事情报领导机构的同行进行了接触。两国情报部门通过交换情报，确认了阿拉法特的身份。阿布·杰哈德说：“我们就是这样发现阿拉法特身处何地的。我们从一位在叙利亚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在此之前，我们以为他已被以色列逮捕或杀害了。”

阿拉法特对我说：“当黎巴嫩人发现我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后，我被带去会见高层情报人员。我见了他们所有成员。我们进行了 5 小时的很好的谈话。我向他们谈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我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巴勒斯坦人，除了进行斗争以确定我们的身份别无选择。我也告诉他们，为什么那些不能看到犹太复国主义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威胁的阿拉伯人，是十分愚蠢和十分麻木的。”

阿拉法特补充道：“我在那次会见中结交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后来，这些黎巴嫩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对我说，正是通过我们的会见，使他们开始尊敬我们的运动和我——作为一个人。”

阿拉法特，作为一个自由的人，重返大马士革了。

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对阿拉法特迷人性格的魔力的戏剧性证明。它也表明，当他同敌人面对面地进行斗争，而这些敌人又准备以公正态度听取他的陈述时，这一魔力如何在发挥其效力。

第十一章玩火

在大马士革，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分析了形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形势感到满意。这就是法塔赫仍然存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的保安机构未能摧毁它。叙利亚也未能使它成为傀儡。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打击力量，法塔赫仍然是一支为数不多的弱小的武装，它的军事行动影响很小，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由于法塔赫的存在，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思想就依然富有生气。它也正引发日益增多的巴勒斯坦人的想象，事实上，这些人如此之多以至巴勒斯坦这个小人物正开始左右阿拉伯局势。换句话说，纳赛尔及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正开始失去对事态的控制。“六天战争”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纳赛尔力图控制局势，避免战争，但这却给了以色列军事策划人以机会，他们在叙利亚帮助下为他设下一个圈套。这是现实对纳赛尔的嘲弄。

1966 年间，纳赛尔显得十分烦恼。他受到四个发展事态的困扰。

第一件事是大马士革的政变。纳赛尔确信，叙利亚新领导人对解放巴勒斯坦一事将是说得多、做得少。但事实是，叙利亚新政权采取很好的行动，使愈来愈多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方面的人们确信，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真正战士是叙利亚当局而不是纳赛尔。

第二件是舒凯里正在转变中的态度。他开始坚决要求纳赛尔和阿拉伯其他领导人，实现他们在建立巴解组织时作出的承诺。舒凯里特别关心的是建立巴勒斯坦解放军的进展不大。约旦、黎巴嫩已经拒绝在他们的领土上有任何巴勒斯坦解放军存在。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了一些巴勒斯坦解放军部队，但他们力量十分弱小。按照建制任职的人员仅达 10%。提供的武器装备只有 40%。因此，1966 年所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日益增多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一些阿拉伯国家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是不想同以色列战斗的，舒凯里则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傀儡。为了对付把他看成是傀儡的指责，舒凯里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他知道，如果他不能摆脱这一形象，他和他的巴解组织将输给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纳赛尔在 1964 年就曾意识到，舒凯里也许有一天会要求得到比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从安全考虑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但是，纳赛尔本人满足于这样的想法，即在这一问题出现时，他是能够对付舒凯里的。不幸的是，对于纳赛尔来说，现在的情况已发展到要控制这位巴解组织第一任主席已非易事。舒凯里同大马士革的新政权已经建立了联系。从舒凯里本人的观点出发，这样做是明智的。这是他的保险政策。纳赛尔担当不起舒凯里倾向叙利亚的损失。

第三件是某些巴勒斯坦人正在转变中的态度。纳赛尔一直把这些巴勒斯坦人视为自己最忠诚可靠的支持者。他们形成并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以反对法塔赫，他们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放在纳赛尔身上。他们以往曾讥笑主张在同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就一项协调一致的解放战略达成协议之前，就应当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现在即使这些人，一些领导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却公开声称，不能依靠这些政权，这当然也暗指纳赛尔，巴勒斯坦人应转而进行游击战争。

第四件是阿尔及利亚对大马士革新政权及其声称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支持。1965 年 6 月，胡阿里·布迈丁少校推翻了本·贝拉总统。他是一位重要的、有影响的人物。1966 年中的布迈丁正在讨好叙利亚人并答应反对以色列

的斗争给以真正的支持。

纳赛尔在思考这些事态发展及其影响时，他的烦恼转变成了恐惧。情况糟透了。因为他再也不能掩饰他对以色列的无所作为，不管是为了巴勒斯坦人，还是一般说来为了整个阿拉伯尊严，他本人的威信正受到严重损害。他的两难困境是尖锐的和骇人的。一方面他知道，阿拉伯人在同以色列的任何军事冲突中都将是失败者。另一方面，他不能在以色列领导人秘密地或必要时通过美国人发出某种信号以前，开始同以色列谈判的进程。这种信号表明以色列领导人准备在谈判结束时将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某种承诺。在这一点上，以色列领导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妥协。这一现实意味着，只有到阿拉伯国家很好地团结起来，运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迫使美国逼迫以色列妥协时，才能为巴勒斯坦人做些事情。但是阿拉伯的团结同往常一样遥遥无期。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造成分裂的影响，同哈拉德·哈桑对阿以冲突的起因的分析是吻合的。这就是英国人早就把犹太国这个植入阿拉伯心脏的欧洲人的殖民地视为保持阿拉伯分裂的工具。

纳赛尔的威望蒙受的损失，显然是对他本人的打击。但这也强烈地表明，他是在怎样失去影响和控制阿拉伯世界全局的能力。如果他无所作为，他将面临一种真正的危险，即所谓革命的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由于他不履行责任而转到叙利亚人手中。而如果大马士革被允许成为决定步速的带头人，那必将发生同以色列的战争。叙利亚人知道，他们充分允许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能使叙利亚政权得以装扮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真正战士和革命的阿拉伯世界的真正领导人，而他们这样做是在玩火。但是，叙利亚人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自信能够控制这场火。他们认为，只要巴勒斯坦人的行动看来有可能引起以色列人的大规模报复性攻击时，他们就对巴勒斯坦人立即限制，这样就可控制这场火。以色列对来自叙利亚、并为叙利亚所支持的巴勒斯坦行动都记下帐来，而在它所选择的时机到来时，它就公开算帐，利用这些行动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和理由。纳赛尔意识到，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是在为以色列人的利益做事。他必须寻找影响和遏制叙利亚人的途径。应怎么寻找呢？

在5月，当阿拉法特及其同事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监狱时，纳赛尔同苏联人讨论了他的担忧。苏联人建议他应竭尽全力同叙利亚人建立新的关系，以此作为控制他们的手段。纳赛尔同意了。到了6月，也许是因为苏联人要依靠他们，叙利亚人表示有兴趣同纳赛尔和解。10月，开罗和大马士革互派了大使。

11月4日，坎、叙签订了防务协定。协定声称，任何一方遭到侵略，都将被看作是对两国的攻击。以色列宣传机构自然把这称作是好战的步骤，并说它进一步表明阿拉伯人正准备摧毁以色列。事实并非如此。纳赛尔通过采取控制叙利亚军事部署和政策措施，是希望避免战争。但是，他的赌博是孤注一掷，十分危要。了解在“六天战争”长期准备期间以色列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关键是要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问题：“当叙利亚成为唯一向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行动组织提供庇护、安慰和某些援助的阿拉伯前线国家时，以色列为什么抑制着自己而不向叙方发动报复性进攻？”正是在同一时期，以色列惩罚的是约旦，尽管约旦当时正试图消灭法塔赫。

按照一位最有见地并受到普遍尊重的以色列作家埃胡德·亚里的话说，这个问题是“将来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时期时所必须回答的两个问

题中的一个”。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以色列未对叙利亚发动进攻，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亚里本人就是这样看的。这也许是答案的一部分。当时以色列正向美国寻求进攻性武器，包括隼式战斗机、巴顿 M-48 型坦克和远程大炮。隼式战斗机携带炸弹能力比法国提供的幻影式战斗机大四倍。在此以前，美国的政策是拒绝向以色列提供进攻性武器。然而，到 1965 年初，美国同意向犹太国提供它所想得到的武器，但是附有条件。条件之一是，以色列承担不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

在我看来，答案的最重要部分却在干，以色列领导人已经确定了一项政策，对叙利亚的攻击采取算总帐的办法，用作发动下一次战争的借口，并给自己以选择时机的自由，这一点曾在前面提到。这样，他们不必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逐一给叙利亚以惩罚。他们快心在 60 年代后五年发动战争。这不是一件需要认真争辩的事。他们的企图，从以色列人 1967 年以来自己所写的东西中就表现得很清楚。我从其他以色列人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况。这些人包括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他告诉我，如果形势在 1967 年下半年以前还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他们将要“捏造一个借口”，以便在那时“发动战争”。我从同一消息来源及其他相似身份的人那里还得知，从 1964 年起，几乎所有以色列军事策划人和绝大部分政治领导人都渴望发动战争，尽管不包括艾希科尔总理在内。他们希望有机会击毁由苏联人装备的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装甲部队。这是他们主要的特定目标。他们也想给阿拉伯人以一次永远难忘的教训。如果这一教训能够导致阿拉伯国家愿意按照以色列条件媾和，那将是一项额外的收获，这个条件就是对否定巴勒斯坦人作为有自决权的人民存在的默认。

到 1966 年夏末，以色列对叙利亚袭击自己所作的记录感到满足，可以说这个犹太国已认为拥有在其选择的时机内进攻叙利亚的理由。以色列领导人知道得很清楚，西方各国政府对进攻叙利亚将会深感遗憾。但他们不会对以色列的辩解提出严重质疑。这就是以色列面对叙利亚对巴勒斯坦人的破坏行径持续和日益增长的支持，已经忍耐了两年以上时间。对以色列国内想要战争的那些人来说，情况到此为止，一切顺利。但有一个问题。他们想要进攻的并不是叙利亚，或者约旦，或者黎巴嫩，而是埃及。这样，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伶俐的头脑中盘算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叙利亚

这张牌为以色列获得向埃及发动战争的借口。换句话说，他们将如何为纳赛尔设置一个圈套？

这个问题在 11 月 4 日得到了解决，那天埃及和叙利亚签订了两国防务协定，从那时起，以色列军事策划人便知道，他们能够实现他们想要的对埃及的战争。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威胁推向这样一种程度，即让纳赛尔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以表明他与叙利亚的防务协定至少是具有书写在纸上的实际价值的。一旦纳赛尔被迫作出军事部署来回敬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明目张胆的威胁，以色列人便可在需要时捏造借口打击他。

回想一下 1967 年 4 月 7 日星期五，这一无可以看作是以色列出色的欺骗活动的开始。它哄骗阿拉伯人和苏联人相信，是叙利亚而不是埃及将成为以色列下一次战争的牺牲品。那天早上 9 点 45 分，一个位于戈兰高地的叙利亚迫击炮阵地向一辆正在以色列定居点农田犁地的拖拉机开炮。这个定居点位于加利利海（太巴列湖）东岸与叙利亚边界之间的狭长地带。

以色列事实上的边界是在 1948 ~ 1949 年的战争中建立的。这场战争在达成了一系列停火协定以后结束。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停火协定起草时，就发现有些地方不可能在地图上画出无可争辩的边界线。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地所有权是混杂的。布雷恩·厄克特对我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亏拉夫尔·邦奇这位真正的好人的努力，在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非军事区的概念。联合国对非军事区负责。每个在非军事区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都可自由耕作。双方军事力量都不准进入非军事区。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主意。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联合国条款还规定，任何争端都将由混合停战委员会予以解决。

厄克特说：“叙利亚人从戈兰高地上俯视着非军事区。他们有一个时候并不十分清楚以色列人在忙着干什么。后来情况变得逐渐明显。叙利亚人注意到，每当以色列拖拉机在犁地时，它总要多犁出一条垄沟。这样，以色列人的土地便逐渐扩大，阿拉伯人的土地逐渐缩小。不久，在混合停战委员会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吵。但是，以色列人总是否认他们侵占了阿拉伯土地。在混合停战委员会无法制止以色列人的蚕食行为时，叙利亚人向以色列的拖拉机群发出警告性射击。我们知道，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人使用了装甲拖拉机。后来叙利亚人开始使用迫击炮和大炮，他们的确击中了一辆或两辆拖拉机。以色列立即还击。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炮战。这样战斗便逐步升级。今天，以色列人为他们占领戈兰高地辩解说，这是为了防止凶恶的叙利亚人炮击以色列和平农民的需要。这是瞎说，纯系一派胡言。挑起冲突的并不是叙利亚人。的确不是。如果以色列人不像他们一贯做的那样，企图碰碰运气、捞点便宜的话，叙利亚人决不会首先开火的。”

厄克特对我所谈的其他情况也说明，对以色列人来说，在他们选择的任何时候在叙利亚边界制造骚动是多么地轻而易举。一旦向叙利亚人进攻挑衅，以色列人便可自由确定把他们的战争行为升级到何等程度。

4 月 7 日早晨，以色列军事策划者批准射击长达近 4 个小时，促使军事行动升级；接着命令空军进入战斗行动。

以色列空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摧毁向以色列定居点炮击的叙利亚阵地。在以色列开始它的空袭行动十分钟后，叙利亚的三架米格-21 战斗机在空中露面。它们被击落了，不久，又有三架米格-21 战斗机遇到同样结果。以色列的幻影式战斗机随即直扑另一空袭目标——大马士革。

三天后，《耶路撒冷邮报》在一篇题为《对叙利亚的打击》的社论中，差一点泄露了天机。这篇社论开头一段这样写道：

“在星期五同叙利亚人进行的战斗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发展在于以下事实：以色列飞机已被特别授权在他们认为有用时，可以深入到叙利亚领土追击袭击者。以色列飞机同时被派往大马士革的叙利亚领空巡逻，以便在叙利亚飞机到达以色列前进行拦截。”

以色列 4 月 7 日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叙利亚当局感到自己极易受到攻击并十分恐惧。哈拉德·哈桑说：“我认为，推测叙利亚军事领导人命令供应大量防护衣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次事件之后，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很容易使阿拉伯人和苏联人确信，以色列企图攻击并在不久的将来入侵叙利亚。以色列的欺骗战略植根于精心策划的一系列的消息泄露。在官方，以色列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向报界不断

暗示，以色列正企图占领大马士革，以终止叙利亚对巴勒斯坦破坏行动的支持。为了给这些点头眨眼的暗示以证明，以色列总参谋长拉宾将军公开表明见解说，在叙利亚政权被推翻前，以色列和这一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得到保证。在秘密渠道，以色列发出很多虚假的无线电情报。他们知道，苏联人将会截取这些情报并把它们送交纳赛尔。这些通讯情报讲的是，以色列即将入侵叙利亚的各项准备。

于是，叙利亚军事领导人开始同以色列进行秘密交易。或者说，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曾把他们所了解到的有关叙利亚在“六天战争”临近前同以色列勾结的情况告诉过我，但我不能随便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感到很大担心，因而不愿公开谈论事情的真相。没有一位巴勒斯坦或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自愿就这一问题透露情况。我必须尽力向他们探询、深问。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采用记者老的手法，故作知情，引发他们谈谈这方面问题。唯一有录音的评论是哈拉德·哈桑的。在谈及叙利亚在1967年战争前几周及战争期间的行为时，他说：“我们终于知道了许多秘密。这些秘密使我们大为震惊。但是，对我们和其他人来说，说出我们知道的一切还为时过早和过于危险。”

根据我所获悉的情况，我确信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曾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它是一个有五条款的备忘录，这项协定的谈判，是通过西班牙政府好心的官员牵线，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谍报人员之间进行的。我不知道这五条款的具体内容，但是从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可以推断出来。

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秘密谈判进行期间，以色列人知道侯赛因国王并不打算发动战争。他们自己，并通过第三方接触，告诉侯赛因，如果约旦不开始采取任何反对以色列的行动，以色列人就不会对约旦发起任何进攻。然而，以色列人也意识到，一旦他们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侯赛因在埃及人，或巴勒斯坦人，或两者的压力下，也许将提供帮助。因此，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必须考虑到，犹太国将发现自己要被卷入进行一场在两条战线作战的战争可能性——埃及战线和约旦战线。但他们对这一前景并不惊恐。因为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相信，他们的飞机在几小时内摧毁埃及空军力量会获得成功。而且在那以后，埃及的地面部队将是易于打击的对象。

对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要使叙利亚人不进入这场战争——至少在初期如此。如果以色列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他们就要准备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尽管他们并不担心自己会因此失败。但他们要的是一场速决战。他们这一想法的理由很简单。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小时内，世界各国政府都会清楚地看到，是以色列发动了这场战争。这意味着以色列将立即面临要求它停止战争的巨大的外交压力。简言之，以色列只有几天时间，或许只有两三天时间来消灭埃及部队，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的话，消灭纳赛尔本人。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认为，纳赛尔将会被他们给他带来的羞辱所结束。但是，这一切都将取决于以色列人通过西奈沙漠的推进速度。如果他们不得不同时三面作战，推进速度就会大大减慢；如果他们在战争进行两天或者也许三天以后就被要求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要求，他们也许就无法实现消灭埃及装甲部队的计划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将不会或不能被看作是取得全面的、惊人的胜利。这种胜利，是以色列努力寻求的，为的是强化如哈拉德·哈桑所描述的阿拉伯“失败心理”。

因此，以色列同叙利亚秘密谈判所要求的在于达成这样一项协定：一旦犹太国同埃及——或许还有约旦——进行战争，叙利亚地面部队将不采取任何反对以色列的进攻性行动。以色列人懂得叙利亚军事领导人将不得不作出某些表面动作，来掩盖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而背叛他们的阿拉伯兄弟的事实；可是，叙利亚人可以只从固定的火炮阵地向以色列北部定居点进行一些炮击，这样就可能限制他们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卷入程度。对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来说，为使叙利亚地面部队不介入战争，以便使自己有更多自由集中兵力投入到进攻埃及的战线，如果需要再加上进攻约旦的战线，这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以色列军事策划者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不高的代价。定居点也许会遭到一些轰击，但居民们自己可以安然无恙地躲在他们的地堡里。

叙利亚军事领导人作出了一项承诺。他们的地面部队将不从他们的防御阵地进行重新部署，也不主动进行反对以色列的任何行动。作为回报，以色列人同意他们不主动采取任何从地面进攻叙利亚的行动——虽然以后的事件表明，以色列作出的唯一明确的保证，不过是不进攻大马士革而已。叙利亚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已有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规定以色列不向叙利亚任何领土，包括戈兰高地采取军事行动。但事实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在不带例外条款，或可作多种解释争论几十年也讲不清的情况下，达成一项协定。在1967年的夏天，叙利亚人还是要受到教训。

到5月中旬，纳赛尔确信，以色列正准备入侵叙利亚。最新的证据是，以色列决定不在5月15日的耶路撒冷独立节检阅时安排装甲部队参加。这一迹象表明，这些部队由于正在准备进行战斗，因而不能拿出来炫耀一番。这些部队的确正在准备参战，但是他们是在准备对埃及的战争，而不是纳赛尔所想的对叙利亚的战争。以色列的诓骗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纳赛尔此时知道，如果他要保持他所谓的阿拉伯革命世界领袖的威信，必须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以便至少给人这样印象，如果以色列进攻叙利亚，埃及不会袖手旁观。

毋庸置疑，纳赛尔的威信当时已经降到了历年来的最低点。4月7日事件后，叙利亚总统阿塔西曾经恳求开罗作出给予军事支持的实际表示。纳赛尔对此置之不理。而这或许就是叙利亚当局决定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同以色列进行秘密交易的主要原因。

约旦人也尽最大努力使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出丑。1966年11月，差不多在埃叙防务协定刚刚签订一周后，以色列向约旦发动了一次报复性进攻。由于三名以色列士兵被一个法塔赫地雷炸死，一支以色列大部队袭击了位于赫尔蒙山坡的萨穆村。这次袭击破坏了125所房子，摧毁了一个新建的警察所。约旦军队被派去同以色列军队交战，但受到了迅速而沉重的打击。这对侯赛因的威信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巴勒斯坦人面对侯赛因无力保护他们的事实，便要求他提供武器装备自己。以色列的袭击所引起的阿拉伯人的愤怒，也使侯赛因要控制法塔赫变得更困难。阿拉法特点燃的火焰正在蔓延。以色列袭击萨穆村事件后，侯赛因的人便开始奚落纳赛尔，说他对以色列在该地区以实力为所欲为的行径表现迟钝和无能为力。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约旦人不断指责纳赛尔躲藏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裙下。

联合国紧急部队是在1956年战争造成的后果中创建的。这些部队在埃以潜在的冲突点上，如加沙、内盖夫边界和沙姆沙伊赫，起到缓冲器的作用，而在西奈半岛的最南端则充当警戒部队，以色列拒绝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

它的领土上，认为这将侵害以色列主权。但是纳赛尔却同意让联合国这一位伟大的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反扭自己的手臂。它是在达成以下协议情况下实现的，即开罗政府一旦提出请求，联合国紧急部队随即撤出埃及。纳赛尔坚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看到请求联合国紧急部队离开的时间正在迫近，而是因为这是证实下述事实的唯一途径，即他接受联合国部队并不意味着他也正在接受对埃及主权的限制。纳赛尔终于把联合国紧急部队看作是他的保护者。他从未打算发动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他推断不管以色列多么渴望袭击埃及，也不敢在联合国眼皮底下这样做。在这一问题上，约旦指责纳赛尔躲藏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裙下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侯赛因的人嘲笑在当时形势下的纳赛尔真是愚不可及。他们这样做也许是想使纳赛尔威信扫地，或者甚至被以色列消灭。当时，侯赛因及其亲信都确信，纳赛尔已领导了一场颠覆约旦的运动。

在以色列看来，驻扎在沙姆沙伊赫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最为重要。该部队控制着进入蒂朗海峡的通道。这一通道连接亚喀巴湾。在亚喀巴湾尽头有以色列的南部港口埃拉特和约旦的港口亚喀巴。1953年，纳赛尔充分利用了埃及对沙姆沙伊赫的所有权，强行封锁了埃拉特港。在1956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沙姆沙伊赫，并发誓决不撤出。从此，纳赛尔和任何一位埃及领导人都再没有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以色列终于撤出了沙姆沙伊赫，但条件是只允许联合国紧急部队而不是埃及部队驻扎在那里，并达成两层谅解：如果埃及关闭蒂朗海峡，美国和国际社会则迫使海峡开放；如果国际社会未能使海峡开放，以色列便可有正当理由向埃及开战。

5月15日，当纳赛尔知道他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以维持他尚存的信誉时，他在埃及发表了一项进入戒备状态的声明。与此同时，他命令两个师穿过西奈地区，进入沿以色列前线的“防御阵地”。第二天，埃及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的维持和平部队作出有限的撤离。这封正式请求信件清楚地表明，埃及并不想要联合国紧急部队从高度敏感的地区，如加沙，尤其是沙姆沙伊赫撤出。纳赛尔的真正企图是想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让联合国人员从阿以边界上的观察点撤出，以便堵住那些指责他躲藏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的阿拉伯人的嘴；另一方面，绝对需要的是让紧急部队呆在沙姆沙伊赫及其他高度敏感的地区，以避免激怒以色列人。根据纳赛尔当时及后来与来访的外交官和其他人士的谈话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纳赛尔是希望双方摩擦的逐步升级能够结束，正在聚集的各种危机能够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同时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纳赛尔并没有任何一种战略，他只不过是对于所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罢了。

那天晚些时候，纳赛尔得知他已无法做到两全其美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作出裁定，纳赛尔必须作出要么全部留下要么一个不留的请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只能全部留驻或者全部撤出。对于纳赛尔来说，他并非在同联合国玩牌。吴丹是按照书面的规则来选择行动以便保护自己；这意味着他无视这一事实，即纳赛尔不仅在试图挽救他的面子，而且也企图避免一场战争。

纳赛尔知道，如果他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全部撤出，埃及军队就必须重新占据那些潜在的冲突地点，包括沙姆沙伊赫。而且，如果此时他不重新封锁亚喀巴湾——以色列船只自1956年战争以来就享受在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过权——他实际上等于结束了他作为革命的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的阿拉伯

兄弟将谴责他是懦夫和叛徒。他至多丧失他尚保有的任何威信和他在抑制阿拉伯一方激进分子方面的影响。但是，假如他真的重新封锁，他将招致以色列的进攻。另一选择是后退，取消他的对联合国紧急部队有限撤出的请求，并被人看作是躲藏在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裙下。这一做法也将使他蒙受羞辱并丧失他的抑制影响。纳赛尔堕入了圈套。在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防部中，以色列军事策划人正在自我庆贺。

纳赛尔在两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思考他的选择。5月18日他作出决定，埃及正式请求所有联合国紧急部队全部撤出，转移到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但是，他仍不愿采取重新占领沙姆沙伊赫和重行封锁亚喀巴湾的最后步骤。在以后的三天多时间里，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最后他自己确信，即使以色列真的诉诸武力，这场战争将不会是一场长期的或决定性的战争。同以色列军事策划人一样，纳赛尔深信，联合国不出几天就会出来坚持要求停火。这样在纳赛尔头脑中，主要思虑集中到一个问题：埃及防御力量能够在几天或者最多一个星期内，在不丢失太多的土地和太大的面子情况下，经受得住以色列的进攻吗？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纳赛尔却做出了错误的回答。正如事态所证明的那样，他严重地低估了以色列的打击能力。他也不认识他自己的高级司令部在重新组建和训练埃及武装力量方面是如何一败涂地。拥有大量苏制武器是一回事，懂得如何使用它却是另一回事。

纳赛尔不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事实。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想要中东发生战争，他一直相信，那些在联合国握有最大权力的政府，将导致他对亚喀巴湾的封锁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除。简言之，他准备在炫耀一番武力后，作一场必要的让步，他是依赖国际社会使自己摆脱危境。他在这里的错误是，他设想以色列领导人会准备给外交方式解决以机会。

在纳赛尔正为作出适当抉择而搜索枯肠的关键性三天中，约旦却火上浇油，嘲讽这位埃及总统未能采取最后的步骤。侯赛因正允准那些在他影响下的人们，做出许多鲁莽和愚蠢的举动。

5月21日，埃及军队重新占领了沙姆沙伊赫。次日，开罗宣布不准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亚喀巴湾。厄克特谈到：“我告诉纳赛尔，他充当了一个流血工具。我说，如果他公然封锁海湾，以色列人将会粉碎他。我对他说：‘不许这样做！’”

但是，这已为时太晚。吴丹行功极为迟缓，当他应当前往开罗和特拉维夫时，他却在纽约浪费时间。从纳赛尔宣布蒂朗海峡对以色列船只关闭时刻起，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因为以色列的军事策划人和政治集团中的鹰派需要战争。

以色列一方也有一些鸽派人物。他们的领袖是当时的总理、遭到很多诽谤中伤的列维·艾希科尔。他知道，他的所有同事也都知道，阿拉伯人并不打算进攻以色列。他对戴高乐总统在几个月前对以色列外长阿巴·坎丹的忠告也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戴高乐曾说：“不要进行战争。如果你们进行战争，你们将造出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并且将再也无法摆脱它。”大约在一周时间里，以色列那些渴望战争的人，允准艾希科尔和埃班作出姿态，自称以色列领导人真正对用外交方式解决危机感到兴趣。这短暂的一周，对那

些战争贩子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它给他们以时间，使以色列和西方世界的公众舆论相信，犹太国将要被消灭。这是一个荒谬的谎言，但却为人所相信。而给以色列的谎言提供证据的又正是阿拉伯人，他们对犹太国威胁说要摧毁它。舒凯里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名义宣称，以色列不久将被“彻底消灭”。以色列普通人民不能受到责备，他们从表面价值来对待阿拉伯人的讲话。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正在欺骗他们。

一条消息决定了战争时间，这条消息使以色列的战争贩子大为恼火。6月2日，美国国务院真诚地通报以色列，它已同埃及确立了谈判的基础，能够通过外交方式导致对亚喀巴湾封锁的解除。纳赛尔在他公开宣布对以色列船只关闭蒂朗海峡的当天，私下就通报联合国和美国，这样也就告诉以色列，他并不认真对待封锁，这只是为了在他一方控制事态而不得不作出的一个姿态。美国的通报也说道，纳赛尔的秘密特使扎哈里亚·毛希丁将于7月7日星期三抵达华盛顿进行会谈。简言之，美国人已告诉以色列政府，如果它准备给这一外交活动以多一点的时间，则不需要发动战争。

6月5日星期一，早晨7点45分，以色列发动了战争。在此之前，列维·艾希科尔被军方告知，如果他继续赞同以政治方式解决同埃及的危机，他就将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被解除职务。世界此时错误地认为以色列是在为它的生存而战。

那天早晨，阿布·杰哈德正在法兰克福。他刚从比利时到达这里。他是在执行一项购置武器的使命。大约在11点钟，他被那些呼吸急促、激动不已的同事们找到了。“快走，”他们说，“战争开始了。”

事实上，阿拉伯人此时已经战败了。在2小时50分钟的时间里，以色列人已经摧毁了埃及空军的主力。但是，当阿布·杰哈德准备离开法兰克福时，他对这一重大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他对我说：“我直接前往机场，想找一架前往大马士革的班机。但是没有。我只好从法兰克福飞往苏黎世，再从那儿飞往日内瓦，然后转机抵达安卡拉。那时已是下午5点左右，我遇见了刚刚参加过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的叙利亚内政部长。我们一起乘坐一辆由叙利亚使馆提供的专车前往大马士革。第二天早上10点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径直前往我们设在亚穆克难民营中的总部去会见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此时仍正式担任着法塔赫代理军事司令。

第二天，6月7日，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乘阿拉法特的大众小汽车前往前线。他们在车里装满了火箭炮弹，驱车向戈兰高地挺进。此时，他们在大马士革所能得到的情报是，叙利亚英勇的战斗部队正在同犹太国进行殊死战斗。据大马士革电台说，叙利亚军队已摧毁了许多以色列边境的定居点，并正向萨法和拿撒勒推进。

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准备到叙利亚前线侦察敌情，然后指挥法塔赫战士进入指定阵地，从这里出一臂之力协助叙利亚进行战斗。但是，当这两位法塔赫领导人到达前线时，他们才发现没有什么可帮助的，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叙利亚人的战斗努力。在这一天，即战争的第三天，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叙利亚地面部队没有任何行动。在此之前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从战前的防线向前推进一步。实质上叙利亚根本没有介入战争。的确，叙利亚的一些炮火群正在轰击以色列北部的定居点，但是这一行动很显然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从叙利亚前线的整个局势来看，人们只能从以下两个结论中选择一个。要么是叙利亚人感到恐惧，并且从未打算同以色列作战，除非遭到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人为什么要炮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而引来可能的进攻呢？要么是叙利亚人已同以色列达成了某种秘密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从固定的炮兵阵地向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炮击仅仅是掩盖叙利亚对阿拉伯事业的背叛。

6月7日夜里，当约旦已被打败并接受停火后，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正在等待他们的战士抵达叙利亚前线。阿布·杰哈德说：“这天夜里我们遇到了一场悲剧。一辆载有我们突击队员的大轿车同一辆叙利亚坦克在黑暗中相撞。我们的战士中至少有15名被撞致死或受重伤。”这件事很容易被看成是一起事故，但是，法塔赫的大轿车受到叙利亚坦克的撞击不是不可能的。法塔赫当时是单独活动，它不受叙利亚高级司令部支配。有充分理由相信，叙利亚军事领导人不希望法塔赫去战斗。

在6月8日，被击败的埃及接受停火的这一天，更多的法塔赫志愿者集合到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身边。有的人从大马士革赶来。有的人从约旦进入叙利亚。“简直难以置信，”阿布·杰哈德对我说，“在从戈兰高地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叙利亚人在以色列进攻前就已在离开他们的防务阵地向后撤退。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突击队员部署在叙利亚人撤出的阵地上。我们也派出一些战斗小组，携带迫击炮，打击以色列战线后方的以色列人。”

阿拉法特告诉我：“在此时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光荣的战斗。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表明，某些阿拉伯人是准备战斗的。”

6月9日，以色列人开始进攻戈兰高地。叙利亚很快便接受了停火。以色列人虽也宣称他们同意停火，但是他们实际上在继续战斗。他们已下决心要夺取戈兰高地。

以色列军事策划人也许一直打算欺骗叙利亚人，认为叙利亚人不可能指责以色列破坏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也是可能的，以色列人为他们对埃及和约旦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感到如此出乎意料和如此不可抑制，以致他们难以抗拒夺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的诱惑。第三个可能是，叙利亚军事领导人秘密同意，允许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以换取以色列人的绝对保证，不进攻大马士革。

赞同第三种可能是一个十分贴切事实的判断。经过各种攻击检验，戈兰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如果叙利亚的军事领导人下决心守卫它，即使以色列军官率领他们的士兵们穿过枪林弹雨夺取了叙利亚的一些阵地，戈兰也绝不可能在27小时内就陷入任何一支进攻部队手中。

对于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来说，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突击队员非常有效地阻击和推延了以色列军队对戈兰高地的进攻。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阿布·杰哈德说：“摩西·达扬后来承认，以色列推迟了它的前进，因为他们的部队遭到了来自背后的打击。使得以色列人推迟前进的正是我们的年青战士。”

到“六天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相当于以色列战前面积四倍的阿拉伯土地。他们夺取了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以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西岸和加沙的丧失，意味着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所规定的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全部领土，现已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策划以色列战争行动的人并没有打算占领约旦河西岸。6月5日上午，在以色列空军首次空袭了埃及空军基地后不久，艾

希科尔总理向侯赛因发去了一份信件，信中提醒侯赛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同他已有默契。这份信件是经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转交的。信中说：“我们决不主动采取任何反对约旦的行动。然而，如果约旦首开战争行动，我们将以我们的全部力量作出反应，（侯赛因）将对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侯赛因在战争爆发前夕同纳赛尔签订了一项防务协定，当时形势已使他别无选择，但他仍坚决不使约旦主动采取任何反对以色列的行动。同以色列开战的决定，是由埃及人为他并越过他作出的。当时在约旦有两支埃及的突击部队，均由埃及总参谋部成员、派驻在约旦的指挥官阿卜杜勒·穆萨姆·里亚德将军指挥。战争爆发的当天上午9时，里亚德将军接到开罗总部的命令：开辟约旦战线。开罗对里亚德将军讲了一堆谎话。它说，以色列战斗机的75%被摧毁，埃及地面部队已开始进攻。这显然是说，阿拉伯人将很快赶走以色列人。当然，事实与此相反，埃及军队正在遭受打击。开罗想要在约旦战线采取行动以减轻埃及所受的压力。

里亚德将军命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开火，侯赛因被卷入一场他并不希望有的战争中。他知道，这场战争对阿拉伯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约旦人付出了自己的代价。在经过短兵相接和逐屋战斗以后，他们失去了那路撒冷的一半。但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其他地区，由于没有空中掩护，他们没有进行抵抗的可能。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1967年的灾难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1948年的灾难。在1948年，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土地，但是，从那时起，他们始终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和信念，以色列在战场上是能够被打败的。在装备和人力上，阿拉伯政权拥有打败以色列所需要的一切，至少巴勒斯坦人是这样认为的。所有的人忽略了的是阿拉伯人的战斗意志。但是，事实现在是清楚了，不管他们的言词讲得怎样，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从未打算战斗。这就是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所得到的痛苦教训。所谓代表阿拉伯新秩序的政权同那些旧秩序时期的政权没有任何区别。

阿拉法特对这次阿拉伯巨大失败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对我说：“我的头脑已完全被搅乱了。”

法塔赫的战略是，创造一种对抗气氛，使阿拉伯政权在这样气氛中不得不同以色列战斗。这一战略得到的却是惊人的事与愿违的后果。

第十二章人民解放战争

战争结束后的两天，法塔赫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官员聚会在大马士革，举行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阿布·杰哈德说：“我们陷于绝望之中。我们中的许多人是流着眼泪讨论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我本人也哭了。由于阿拉伯军队被击溃的方式，我们同事中的一些人认为一切全完了。有些人谈论放弃斗争，到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方创建新的生活。”

在大会开幕前，一些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前往阿布·凯末尔饭店吃午饭。当他们走进饭店时，发现乔治·哈巴什就坐在紧挨他们预定的饭桌旁边的一张桌子旁。阿拉法特和哈巴什以前没有见过面。哈拉德·哈桑说：“当我们开始同哈巴什谈话时，他哭了。他说：‘一切都完了。’阿拉法特对他说：‘乔治，你错了。这不是结束。这是刚刚开始。我们将恢复我们的军事行动’。”当时他们谈了许多鼓舞斗志的话。但正如阿拉法特此后不久所发现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反映他的大多数同事们的想法。

法塔赫第一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正式议程是政策问题。正如哈拉德所说：“我们在讨论是否恢复军事行动。如果恢复的话，将在何时？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阿拉法特的地位，这一问题并未列入正式的议程。阿布·杰哈德此时仍是代理军事司令。正式说来，中止阿拉法特作为法塔赫成员的决定业已满期。但是，从阿拉法特1966年5月在大马上革被捕时起，局势发展得太快，以致中央委员会未能重新解决阿拉法特应担任何种职务的问题。”在1967年6月下半月，哈拉德和多数人已下决心阻止重新任命阿拉法特担任军事司令。

他们仍怕他会以一个独裁者的面目出现，尽管他们不能公开这样说。他们知道，这场战争已证明，以色列是无法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这样，巴勒斯坦事业将不得不通过军事和政治方式加以推进。单纯依靠军事行动的解放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还有一个以前就有的担心，阿拉法特也许会利用他的军事权力去阻止或破坏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事可能采取的任何政治主动。

出席法塔赫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如果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应采取什么形式的军事行动问题上，也发生了深刻分歧。一些代表完全反对恢复地面的军事行动，认为这将导致处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无助于巴勒斯坦事业。当时处于少数的其他代表则认为，在以色列占领区有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这一事实表明，开展人民解放战争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持有这种主张的人相信，他们现在可以运用毛泽东关于革命武装斗争的思想。以色列占领区中的一百万巴勒斯坦人就是革命的海洋，巴勒斯坦游击队作为毛泽东所说的鱼，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将翱翔自如。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群众，可以在近期内向他们的战士提供援助和庇护。而从长远来看，他们将爆发反抗以色列的起义。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其主要吸引人之处在于法塔赫不再必须依靠叙利亚或任何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作为它的基地。

但是，就是那些为有可能进行人民解放战争而激动不已的人也很清楚，在发动这一斗争以前，需要几个月，或者甚至一年至两年时间进行准备。如果它有机会取得成功，在新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需要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组织和教育。所以，即使那些赞成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人，也反对马上行动。

他们需要时间，去准备基础，准备人民。

阿拉法特的立场十分直率，非常明确，始终如一。这同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即他是一个战术性而非战略性人物。他主张立即恢复军事行动。他曾对我说：“我不会陪着别人流眼泪。我认为，我们现在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负有责任。这场战争不是阿拉伯人民的失败，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表明对以色列的炫耀是有可能应付的。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整个阿拉伯民族，各个地方的阿拉伯人，都会受到失败心理的影响。当然，这恰恰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在哈尼·哈桑从西德抵达大马士革之前，只有阿拉法特一人坚持这一看法。据哈尼说，甚至阿布·杰哈德也同意那些人的意见，赞成需要时间，以便在适当的有训练的情况下组织下一轮的军事斗争。

哈尼说：“我一抵达大马士革，我的哥哥，阿布·伊亚德和其他反对阿拉法特的人来看我。他们尽力试图影响我不要支持阿拉法特。”正如前面提到的，哈尼力量的根源在于各地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在全世界所形成的网络。没有人比在西欧各国的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更坚决地支持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而其中最激进的要数在西德的哈尼本人所在的巴勒斯坦学生组织。如果哈拉德和其他人曾把哈尼争取到他们一边，阿拉法特也许就已结束了他作为领导人的身份。

哈尼继续说：“我的哥哥和其他人对我同他们说的一切深感惊讶。我说，首先，我们在欧洲的同事们完全赞同武装斗争。我们对因此会付出多大代价并不在乎。我说，如果阿拉法特同意毫不迟疑地恢复战斗，我们就将同他站在一起。然后，我向我的哥哥和其他人透露了我自己的一些秘密。

“我告诉他们，当战争在6月5日开始时，我们在欧洲就作出了一项决定。我们对我们的学生说，除非他们准备回到巴勒斯坦去战斗，他们将不能继续成为法塔赫的成员。然后我说：‘就在现在，450名学生和工人正在阿尔及利亚接受训练。他们已放弃了他们的学业和他们的工作。我们把他们送往意大利的不同的港口，他们从那里前往阿尔及尔。目前还有50名来自开罗的学生同他们会合。他们将在7月底完成他们的训练，然后，他们将前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去战斗！’”

哈尼动情地停顿了一下，然后他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我怎么能对他们讲，我们反对阿拉法特是因为他要继续开展军事斗争呢？”他不需要得到回答，也无人给以回答。哈尼表明了他的立场。哈桑弟兄承认他们之间意见不同。

哈尼的立场有效地结束了阿拉法特的孤立状况；但这并未能使舆论的天平倒向他这一边。经过几天激动的有时甚至是尖刻的辩论，包括哈尼指责阿布·伊亚德企图取代阿拉法特地位以后，法塔赫的代表大会决定休会，以使气氛冷却下来。到此时，阿拉法特相信他在说服大会方面已经失利，中央委员会将拒绝他关于恢复军事行动的号召。

阿拉法特利用休会访问了约旦。他邀请哈尼与他同行。他们乘坐阿拉法特的大众小汽车前往。哈尼告诉我：“阿拉法特的情绪低落。我们刚刚上路没几分钟，他就说道：‘我该做什么呢？’在我给予回答之前，他说了一句使我十分忧虑的话：‘至少历史将会说我作了努力。’当时我与阿拉法特谈话的语气十分坚定。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你没有必要这样看问题。我的学生正在从阿尔及尔赶来，他们将同你并肩战斗。’”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的确十分简单。在阿尔及尔完成他们初步军事训练的学生大多数来自约旦河西岸。这项计划，对他们来说，是返回他们的家乡，以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出现。因为他们会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掩藏和保护。我以为以色列安全情报人员追捕到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的，……但是我错了。”

在约旦，阿拉法特从一个接近侯赛因国王的消息来源得到一些情报。在他返回大马士革出席法塔赫第一次代表大会续会时，这些情报能使他转而占据上风。他得知，也许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富有戏剧性的和平计划。根据阿拉法特听到的内容，以色列极有可能撤出“六天战争”中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以此换得同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全面的、正式的和平条约。如果这一情报是准确的，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它的含义如同哈拉德·哈桑所说，是“极其可怕的”。

这一情报和它体现的显而易见的威胁，使得许多出席法塔赫代表大会的代表重新考虑他们反对阿拉法特及其恢复军事行动的号召。

“我们决定把我们自己放在以色列的位置上。”哈拉德·哈桑对我说。“为了讨论问题起见，我们设想我们是以色列政府，我们问自己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很快得出结论，假如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将制定一项戏剧性的和平计划。我们会向阿拉伯各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布，我们准备从‘六天战争’中所占有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以此换得同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缔结和平条约。

“仍把我们放在以色列的位置上，我们设想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将会发生。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媾和。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内的以色列国家的前途将会得到永久的保证，而巴勒斯坦事业到此完结。如果有和平的话，没有一个阿拉伯前线国家会允许巴勒斯坦人以任何方式继续战斗。或者是阿拉伯国家拒绝同以色列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仍将是胜利者。因为这样全世界会说：‘这些残忍愚蠢的阿拉伯人，再也不值得得到任何支持与同情了。’以色列那时则将会被视为希望和平的唯一的一方。在全世界眼里，以色列那时所做的一切都将不是错误的，即使是它仍旧占领1967年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当我们使自己处在以色列的位置时，我们法塔赫人所犯的错误是，设想以色列领导人是聪明的、明智的，会按从以色列观点出发的最佳前景行事。因此，以色列可能从约旦河西岸撤出的观点，在我们头脑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我甚至可以说是困扰着我们。在当时，这对我们法塔赫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以色列人为媾和而撤出约旦河西岸，他们将继续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而我们巴勒斯坦人则将被禁止战斗。我们将没有战斗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在以色列作出任何撤退行动前同以色列作战。为了使斗争有可能保持下去，也为了使阿拉伯国家站在我们一边，我们需要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我们能够说，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已经举起了斗争的旗帜。以色列人的撤退正是我们行动的结果！”

阿拉法特关于以色列可能以撤退为交换条件，同阿拉伯前线国家媾和的情报从实质上讲是准确的。然而，阿拉法特所知的以色列的立场同实际情况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这一区别是，以色列坚持主张允许其部队部署在约旦河沿岸。这对阿拉伯国家来说是个问题。任何有自尊心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会同意给予以色列把军队驻扎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权利的和平。正是以色

列坚持这一条件，从而证明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为了得到充分证明，我曾询问了所有法塔赫领导人，他们当时是否曾相信，如果以色列愿意从 1967 年占领的每一寸阿拉伯领土上撤出，阿拉伯前线国家将同以色列媾和。他们所有的人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阿拉法特最为强调。下面是我同他就这一问题的谈话。

“阿布·阿玛尔，请回顾一下，你认为能否这样说，以色列人没有撤退是他们所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依我看，这对以色列是一个好机会。他们应当撤出。他们当时没有这样做，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认为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会坐下来并同以色列媾和，以此作为换回他们土地的代价吗？”

“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如果答应他们做到这一点，所有阿拉伯国家会根据那些条件媾和的。”

“包括纳赛尔吗？”我问道。

“是的，包括纳赛尔。阿拉伯政权和人民会从和平得到许多东西。当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告诉人民，再也不必花钱买武器，那些用来备战的钱将被用来发展他们的国家，从而给所有的人带来繁荣时，你认为阿拉伯人民将会作些什么呢？你认为阿拉伯人民会拒绝和平吗？他们将会在街上欢呼雀跃。他们的领导人也将成为英雄。”

“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话——我相信是正确的，倘荐以色列人明智一点，他们可能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和平。这个和平是通过政治手段扼杀了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对此毫无疑问，”阿拉法特作此结论，“我们会被消灭，我们的事业会遭失败。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十分愚蠢。他们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是他们骄横武力的结果。骄横武力正在破坏犹太人的一切。到头来它将摧毁犹太人的文化、社会和宗教。他们正在自己摧毁自己。”

6 月 23 日，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有足够的聪明和明智为求得和平而采取必要的行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和出席在大马士革代表大会的高级官员通过了一项恢复军事行动的计划。由于那些不愿同阿拉法特和解和不赞成恢复军事行动主张的人辞职，表决时这一计划获得一致通过。阿拉法特作为军事司令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军事行动预定在 8 月的最后一周开始。在此之前，阿拉法特将在波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立他的行动指挥部。

如果这项决定听任阿拉法特去执行，他肯定会在当天就前往约旦河西岸，并于当天夜里在以色列巡逻车路过的路上埋下一两颗地雷。在进行这些活动中，他肯定会按照他自己的第一斗争法则行事，概括地说，就是充分利用今天此时此刻的机会，而把明天的机会留在当他们到来时再说。

然而，当时有一个充分理由使其耽搁下来。法塔赫在 6 月 23 日并没有打算发动和支持一场破坏与颠覆运动。它自己所拥有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已几乎消耗殆尽。那些被称作突击队员的战士人数，阿拉法特两只手就能数过来。因此，当作出恢复军事行动的决定时，它是根据这一设想，即要到 8 月底哈尼的学生武装才能到达并作好行动准备。与此同时，为了增补那些来自西欧，经由阿尔及尔抵达的战士人数，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受命组织紧急的新兵征召和训练计划。

阿布·杰哈德说：“我们派出征召官员前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每

一个城镇。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志愿人员，并为他们前来我们在叙利亚的营地接受训练作出安排。在那两个月中，我们接收了大约 500 名志愿者。我必须告诉你，在被占领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它对我们很有帮助。当我们的巴勒斯坦青年头一次见到以色列士兵时，感到非常惊奇。他们相互议论道：‘难道这些人真的是打败阿拉伯军队的超人吗？这怎么可能呢？他们瘦小，很多人还是少年……他们不在乎自己的言谈举止，也并不那么遵守纪律。’我之所以介绍这一情况，是想说明我们的巴勒斯坦青年并没有把以色列士兵看作超人。他们不理解阿拉伯军队怎么会被这些人打败。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有一个主要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我们的年青人说：“没有必要躲开这些以色列人……我们能够面对他们……我们能同他们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有如此众多的志愿者。”

每一个志愿者来到法塔赫的训练营地时，都要受到一个安全委员会的审查。阿布·杰哈德说：“我们必须确信他们不是以色列间谍。”事实上，以色列人当时正忙于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土中的地位，还顾不上把巴勒斯坦人训练为变节者的工作。

阿布·杰哈德继续说道：“在三个星期内，我们训练他们至少学会了 24 种武器的使用，包括步枪、手枪、火箭炮、迫击炮、地雷、爆破器材和手榴弹。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战术训练，诸如如何组织小分队，如何搞伏击；我们在真枪实弹和炮火硝烟中训练他们。所有这些都在白天进行。晚上则用于讲授政治课程和讨论。我必须说的是，我们是非常民主的。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讨论。有时阿拉法特来上课。有时是哈拉德·哈桑。有时是其他人。所有领导人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每当为期三周的训练结束时，我们便把这些战士编成小组派回他们的城镇。这时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你们从哪儿来的？’‘我们五人来自杰里科。’‘好，这是你们的武器，走。’‘我们来自耶路撒冷。’‘好，这是你们的武器，走。’‘希伯伦，走。’‘纳布卢斯，走。’‘加沙，走。’等等。”

阿布·杰哈德的谈话清楚地表明，法塔赫当时并不缺乏武器。哈拉德·哈桑解释说：“我们利用叙利亚人在战场上丢弃的武器弹药很好地装备了自己！在我们召开代表大会的头一天，我们便派人前去收集这些武器弹药。当叙利亚人得知我们正在干什么时，我们同他们搞了点交易。我们同意将重武器交还给叙利亚军队，而留下轻武器供我们自己使用。”

在恢复军事行动的最后一分钟，叙利亚人要求法塔赫放弃重新开发军事行动的计划；他们是以威胁口吻提出他们的要求的。阿布·杰哈德认为，这一威胁不是空的。如果法塔赫坚持把它的以军事手段对抗以色列的计划推向前进，大马士革政权会对付并摧毁法塔赫。

阿拉法特曾把 8 月 28 日定为恢复军事行动的日期。到那时，哈尼的 500 名学生战士已从阿尔及尔归来，并分布到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他们的家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化装成伊拉克士兵已经进入约旦（伊拉克军队当时驻扎在约旦以帮助侯赛因的防务）。在法塔赫设在叙利亚的营地里完成速成训练课程的大约 500 名志愿人员，也都到位并准备行动。阿拉法特本人已在 8 月中去约旦河西岸。尽管他不想在同一地方连续居留两晚以上，他还是在纳布卢斯老城迷宫般的街道中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8 月 27 日，叙利亚人发出了停止行动的命令和最后通牒。阿布·杰哈德说：“我直接给阿拉法特发去一封信，请求他推迟开始我们的进攻行动。我

告诉他，叙利亚人正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幸的是，要停止我们计划在 8 月 28 日进行的某些行动已为时太晚，我们的人在加沙、特拉维夫和其他一两个地方进行了爆炸行动。但在此之后，阿拉法特还是成功地停止了行动。人们会对我们在无法使用电话或电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感到钦佩。我们必须通过通讯员送达我们的行功命令。”到 1967 年夏，以色列人已找到窃听阿拉伯前线国家间电信联络的方法，这在当时已人所共知。六月战争期间，以色列人甚至监听到纳赛尔和侯赛因的电话对话。

阿布·杰哈德说：“在几天之内，我设法约见了哈菲兹·阿萨德国防部长。我十分坦率地对待他。我说，处在以色列占领下的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全世界都认为，在军事占领下的人民有权进行抵抗。我还告诉他，我们将在被占领土内发动我们的行动。我们从不从叙利亚边境向以色列进攻，因此，对他不会带来任何责难。阿萨德沉思稍许，然后他说：“行，你们是对的。你们在彼占领土内继续你们的行动。我将则那些在你们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人去说。”

叙利亚人此时忙于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还是有些可供了解的线索。在 8 月 28 日，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预计在喀土穆召开一次首脑会议。他们通过美国和联合国渠道得知，以色列有实现永久和平的想法，即以色列从六月战争中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以此换取同阿拉伯前线国家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条件是以色列能在约旦河沿线驻军。在喀土穆首脑会议上，阿拉伯领导人将要对以色列的提议作出他们正式的最后的回答。首脑会议的结果不出人们意料。阿拉伯人将拒绝在所提出的条件下同以色列进行会谈的主张。

叙利亚人决定不参加这次首脑会议。他们知道，首脑会议将是一次拒绝的会议。他们抵制这次会议的决定，同他们战前作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事业唯一真正战士的公开立场背道而驰。他们当时的立场明显地表示，叙利亚将是战斗到以色列被消灭为止的唯一阿拉伯国家。然而，叙利亚人现在的表现，却显得准备为保持同以色列的谈判大门敞开而做任何事情，只要以色列有可能从六月战争中侵占的土地撤出。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中，叙利亚领导人看来只有一个目标——在阿拉伯世界知道他们的失败是叙利亚同以色列秘密勾结的结果之前，收回戈兰高地。这意味着大马士革政权必须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使以色列相信，叙利亚不是一个敌对的国家。表现的一个方式是不参加喀土穆首脑会议。表现的另一个方式是在法塔赫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如果叙利亚人能够告诉他们的以色列朋友，他们已经阻止了法塔赫试图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发动一次起义，可以肯定，这将有助于劝说以色列不必惧怕把戈兰高地还给它们的合法主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为什么在阿布·杰哈德会见阿萨德时，他能得到显而易见的不费力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因为阿布·杰哈德是以无可辩驳的论点来对付阿萨德的。全世界都知道，巴勒斯坦人有权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如果叙利亚人现在否认巴勒斯坦人这一权利，大马士革将不得不回答某些与其动机有关的非常窘迫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要到叙利亚同以色列的勾结完全暴露后才会结束。阿萨德有足够的精明在两难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

在阿布·杰哈德劝说阿萨德去除叙利亚在法塔赫道路上设置的障碍以后，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人称作“人民解放战争”于 9 月的第一周内开始了。但是，它只持续到年底就结束了。

到 12 月底，在被占领土上的大部分法塔赫小组及联络网被以色列保安机

构发现和破坏。数百名法塔赫战士被杀害，一千多名战士被捕。阿拉法特本人也差点遭厄运。如果不是阿布·杰哈德派遣突击小组去援救他，阿拉法特可能也会被抓。

在法塔赫看来，最令人沮丧的是，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多数巴勒斯坦人也巴不得那些曾声称是他们的解放者的人走开。

对阿拉法特和法塔赫来说，哪些方面出了毛病呢？

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法塔赫的真正目标。迄今为止，大部分西方评论家和作家都满足予以其表面价值对待法塔赫的宣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塔赫未能在被占领土上发动一场人民起义？而回答差不多都是说，阿拉法特和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同事们，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他们如何行动的计划。特别是如他们所说的，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制订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他们不懂得，发动一场人民解放战争需要数年时间，在进行实际的斗争或战斗之前需要有详尽的政治、心理和组织计划。他们说，阿拉法特是急于求成。

如果法塔赫的真正目标与其公开宣传的目的相同的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法塔赫是在寻求发动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想通过起义把以色列军队赶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那末上述评判将是正确的。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法塔赫领导人同意恢复军事行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不给以色列同约旦媾和而主动撤出约旦河西岸以机会。事实上，如果双方实现媾和，将使以色列和约旦（或许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可能控制和扑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星星之火。阿拉法特本人的目标也没有特殊之处。他希望战斗，以便保持斗争理想，使之继续生存下去。

法塔赫关于在被占领土继续斗争的决定，不是一项周密计划或长期的解放战略的一部分。它是一项战术行动，针对被察觉出来的对运动的威胁而采取的。如果没有以色列撤军的前景，或者关于以色列撤军的认真的会谈，法塔赫领导人绝不会支持阿拉法特关于恢复军事行动的号召。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为什么阿拉法特未能激发足够的人民支持，使他和法塔赫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行动得以坚持下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点。第一，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多数巴勒斯坦人，只不过不相信单独采用军事手段来继续斗争会得到什么结果。多数人，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居民认为应当有一个同以色列政治谈判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将使阿拉伯人多少承认在 1967 年前的边界以内的以色列，从而让以色列军队撤回到这些边界以内，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某种巴勒斯坦实体。我不以为，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会以任何热情期待这一前景，因为这一解决办法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将要放弃原有的返回他们在以色列的国土和家园的希望。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阿拉伯军队可以被以色列很容易地击溃，巴勒斯坦人没有机会通过军事手段来推进他们的事业。如果法塔赫当时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纲领，在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将有可能给予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以更多的支持。但是，在 1967 年法塔赫还远没有制订出任何政治纲领。

第二，被阿拉法特看作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消极甚至失败主义态度，因以色列采取的残酷而有效的行为得到加剧。以色列以残酷而有效的方式破坏法塔赫组织，与此同时，阻止占领下的人民支持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看看以色列军事和其他保安机构采取的孤立然后打击法塔赫的行动，就足

以证明这点。

这些战术行动有：宵禁、设置警戒线和逐户搜寻；限制旅行和行动；对法塔赫积极分子和同情者判处长期囚禁；不经审判的拘留；驱逐；毗邻或集体处罚，包括封闭学校、商店和办事处，炸毁那些给予或被怀疑给予法塔赫积极分子以掩蔽的人的房屋。摩西·达扬 1969 年 12 月声称，炸毁房屋的总数达 516 所。而伦敦《泰晤士报》在达扬讲话的两个月前的一份专题报导中说，实际数字是 7000 所。

受到惩罚的不仅是那些被发现参与破坏行动的巴勒斯坦人，而且还有被怀疑与这些行动有牵连的人。以色列的政策是，惩罚任何不服从以色列命令和指挥的行为。

对于法塔赫组织在被占领土如何被消灭的报导，以色列一方面竭力缩小以色列的残暴，而另一方面则夸大法塔赫的弱点。根据权威的以色列人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法塔赫的安全是不存在的，法塔赫战士一旦被捕就准备并愿意出卖他们的同事。毫无疑问，法塔赫的安全措施在那些日子里确是很差，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是最早谈到这一点的人。但是，这并不是以色列各种情报和特务机构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得以逮捕 1000 多名法塔赫战士的主要原因。

事情真象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莫萨德已经掌握了哈尼·哈桑从西欧派回的学生战士的档案。哈尼说：“我们在欧洲的学生组织自然是十分民主的。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们需要民主。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政治事务公诸于众。这样，当我们参加学生组织竞选时，我们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我们的会议当然也是公开的。这一切给了莫萨德在欧洲的间谍以机会，得以了解和跟踪我们，并将我们的情况记入档案。到我们的学生从欧洲去阿尔及尔的时候，莫萨德已经建立了我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档案并附有照片。当我们不再居住在欧洲我们的住所时，莫萨德便很快知道我们在哪儿和我们正在做什么。

“艾萨德间谍在建立他们的关于我们情况的档案时，也得到了欧洲当局的大量合作，特别是西德当局的合作。许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了解到莫萨德是如何对付我们的。那是在霍梅尼革命成功以后在伊朗。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在伊朗革命以前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谍中心。革命以后，我进入以色列大使馆并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记载有我们许多战士和人士姓名的书。人名按字母顺序排列。每个人的姓名下面都有四至五行的文字记载——说明我们这些人如何危险等等，大多数人都附有用片。有关我那一栏中的照片是我于 1959 年在慕尼黑读大学时交给学校的照片的复制件。莫萨德就是这样得到我们当时在欧洲学生政治活动中大多数积极分子的照片的。我仍保有在以色列大使馆发现的这本书。它证明欧洲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同莫萨德进行合作。当然，西德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德国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内疚感，他们准备向莫萨德提供任何便利。我也应当指出，以色列人在向德国人进行道德讹诈，他们是负有罪责的。有一次我正准备去会见维利·勃兰特，那时我是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而他任西柏林市市长。他却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会见，理由是他不愿给以色列人以机会，指

责他为“纳粹”和“反犹太人”。我从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中感到，许多德国人对这种道德讹诈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是以色列人在向他们敲诈。

“正是由于莫萨德在欧洲的工作成果，使得以色列军事当局在我们准备

军事行动时，就已掌握了每一个人的档案材料。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地址。他们也拥有我们的照片。我必须说的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是非常仔细的。我们后来知道，在每个人的卷宗里都有两张照片。一张是照片原件的复制件，这就是说，这张照片是我们进入欧洲各高等学校时的相貌。另一张相片相同，但却在每个人头上画了一幅阿拉伯头巾。系上这幅头巾，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变成另一付模样。以色列人显然料到我们将这样做。一旦以色列人掌握所有这些有关代们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在我们开始行动时追捕我们已不是什么难事。”哈尼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我们学生战士中接近 90% 的人遭到杀害或逮捕。”

以色列人也强迫一些被囚禁的法塔赫成员，辨认从而出卖他们的同事。据哈尼和其他参加 1967 年最后四个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斗争的人说，以色列有时采用“盖世太保的战术”。他们把一些法塔赫囚禁人员带到他们的村子和家乡一带。在那里，他们的面孔被兜帽蒙住，只留下两条眼缝。他们被要求在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中认出哪些人是法塔赫的成员。那些不愿按以色列要求而行动的人，受到被处死的威胁。或者，如果他们不予合作，他们的家人，特别是妇女，将受到伤害。

假如那一切都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以色列保安机构的头子们就有充分理由来祝贺他们镇压起义行动的功效。但是，他们失败的一件事是，未能抓住并杀死阿拉法特本人。而这并不是以色列人不想努力这样做。

阿拉法特究竟有多少次差点被逮捕，这是他本人的秘密。他之所以不愿谈起他在被占领土逃脱的细节，大概是因为在以后的某一时刻他又要转入地下活动。阿拉法特本人只对我讲过两次有关他的逃脱经历。一次是他手挽着他的一个同事的妻子，抱着另一个同事的孩子，从以色列警戒线溜走。另一次是发生在东那路撒冷。阿拉法特说：“我正打算在那里的我们一所安全的房子里过夜。我化装成一个老人来到那儿。在进门处我停顿了几秒钟。然后我说：‘小，不，我不喜欢这里。’接着我便立即离开了。不到 30 分钟，以色列士兵包围了这个地区，进入了我曾经打算过夜的那所房子，你可以说，这就是被你们称之为我报警的鼻子多次拯救了我当中的一次。”

从阿布·杰哈德和其他人的谈话来推测，阿拉法特在这几个月中至少有几次幸运地逃脱。有一次他藏在一辆由朋友驾驶的联合国汽车中通过了一个以色列路障。阿拉法特实际上好几次处在以色列人的眼皮底下，但以色列人竟未发觉。还有一次，他化装成牧民乘坐一辆公共汽车，以色列警察挡住了这辆汽车并搜查了汽车和乘客，然而他们对这个牧民并没有感兴趣。

好运气在帮助阿拉法特免遭逮捕方面肯定起到部分作用。但是同样也应归功于他本人在安全方面的谨慎。他是一个化装大师。他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旅行或转移。他在不同时候的称作：阿布·阿玛尔，阿布·穆罕默德，医生，侯赛尼博士和阿卜杜勒·拉夫。

当在大马士革的阿布·杰哈德确信，在阿拉法特身边至少有一个情报人员后，阿拉法特终于结束了他在约旦河西岸的日子。阿布·杰哈德向包括哈拉德·哈桑在内的几位中央委员会成员出示了证据，他们决定派遣一个援救小组保护阿拉法特撤离。看来阿拉法特除了离开别无选择。事实上他是被命令离开的。他似乎也是在以色列人包围他在拉姆拉哈住所前几分钟才转移出来。根据埃胡德·亚里所说：“以色列保安部队包围了这座城郊小屋并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床上的被子还是热的，壶里的茶水还是滚开的，但阿拉法特

已不在那里了。”在受到以色列人的打击和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实际拒绝情况下，阿拉法特定在返回大马士革的路上。

七年以后，阿拉法特充当了那些谨慎地提倡和努力宣传与以色列达成政治妥协解决办法的人们的领袖。这一解决办法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在 1967 年下半年就准备接受。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在 1967 年失败后的几个月和几年当中，当多数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准备妥协已经变得清楚的时候，阿拉法特坚持通过军事手段继续进行斗争是错了吗？

在我看来，阿拉法特没有错。他本人向我讲述了他的理由：“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巴勒斯坦人只有通过战斗才能确定我们的存在。就我而言，对我们的问题讨论出一个解决办法毫无意义，除非我们已表明那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问题。‘六天战争’后，阿拉伯各国政府和大国仍坚持这样的看法，即所谓阿以冲突可以在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权利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我们必须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当国际社会在 11 月 22 日接受联合国 242 号决议作为解决阿以冲突、取得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基础时，对任何了解情况的客观的观察家来说，阿拉法特显而易见是正确的。

鉴于 242 号决议不长，也因为研究 1967 年以后的事件不可能不频繁地涉及到这一决议，特在此将其全文引录如下：“安全理事会，表示其不断关切中东严重局势，强调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以及必须致力公正及持久和平，使该地区每一国家均得安然生存，复强调所有会员国接受联合国宪章，即负有遵照宪章第二条行动之义务，一、确认为履行宪章原则，必须于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其中应包括实施下列两项原则：

（一）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的领土；

（二）终止一切交战地位的主张或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与其在安全及公认的疆界内和平生存、不受威胁及武力行为的权利；

二、复确认必须：

（a）保证该地区国际水道的自由通航；

（b）达成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

（c）经由包括建立非武装地带在内的措施，保证该地区每一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及政治独立；

三、请秘书长指定特派代表一人前往中东与有关各国建立并保持接触，以期促成协议并协助努力依照本决议案的规定及原则达成和平及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

四、请秘书长就特派代表所作的努力的进展情形，尽速向安理会具报。”

上述决议就是被世界一些国家政府，最突出的是大国政府，骄傲地称为在中东寻求公正与持久和平的方案。但实际上没有前进任何一步。242 号决议不过是政治上权宜之计的胜利。它也是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意愿和骄横屈服的结果。如果是它是一项能够提供什么东西的方案的话，那么它不过是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提供了一个永久地葬送真正的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一个

见埃胡德·亚里：《引起恐怖》第 150 页。

联合国文件 S/8052，《安理会正式记录》第 22 号，1967 年 7 月、8 月、9 月附录。

在那些统治世界的国家支持和衷心感谢下实现这一点的机会。242 号决议对任何与其有关的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处方。我很难理解，那些富有理智和知识的男人和女人们怎么竟会把这项决议看成别的什么东西。那些把 242 号决议视为和平方案的人们，要么是对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某些基本事实不了解，要么就是有意邀请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来葬送巴勒斯坦问题。

242 号决议不是也不可能是寻求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基础，因为它无视冲突中的核心问题。242 号决议提出的问题是避免以色列和阿拉伯前线国家再度爆发战争。西方国家对再度爆发战争的关切并不在于它可能导致死亡和破坏，而是它可能引起石油供应和价格的危机。这种危机将会使全球经济陷入严重混乱。应当提出并加以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及他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利。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在决议中是以“难民问题”而提出的，并且所有问题都受这四个字包含的内容制约，242 号决议实际上否认了巴勒斯坦人具有的权利，或者是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因此可以说，这个决议是个一边倒的决议。它有利于以色列而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它实际上也取消了联合国以前作出的关于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他们在以色列的家园的决议。

实际上这个声名狼藉的决议产生了两个主要作用。第一，它使以色列除了使用子弹和炸弹外，拒绝就真正的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协议，在国际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第二，它证实了阿拉法特的判断，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正义要求根本不予理睬。

由于阿拉法特未能使武装斗争的思想在被占领土上得到大众的支持，他在 1967 年底已不可能向以色列的傲慢和国际社会的冷漠态度进行挑战了。这是事与愿违的。但是若是说巴勒斯坦事业此时已九死一生，则也不符合实际。从逻辑上讲，阿拉法特和他所代表的事业应当已告完结。如果不是以色列给他提供了一个着手进行新的开端的机会，他很可能会遇到上述结局的。

第十三章胜利的尝试

1968年初，阿拉法特集中关注的一个目标是，保持继续斗争的信念。

虽然出席喀土穆会议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拒绝了与以色列谈判与媾和，但阿拉法特知道，他们公开声明的立场与他们私下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旦达成某种交易，他们能向本国人民提交除了彻底投降以外的某些东西，他们就会同以色列媾和。他们指望美国压以色列作出微小的必要的让步。事实上，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当时正设想美国决策者会十分明智地懂得，如果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利益需要得到保障的话，那么他们就需要温和的阿拉伯人，至少同他们需要以色列人一样。阿拉法特还知道，侯赛因国王并未在静等美国人，他已经同以色列建立了他自己的秘密交往渠道。

阿拉法特对保持继续斗争信念的机遇十分悲观。在他从约旦河西岸逃脱以后回到大马士革时，他确信了他的预期的想法。叙利亚政权绝不会允许法塔赫可以自由地从叙利亚土地上出发去袭击以色列。这导致法塔赫别无选择。只有利用黎巴嫩或约旦或者两者。没有经过多少讨论，法塔赫领导人很快作出决定，黎巴嫩只是被用来作为最后一着的出发基地。

黎巴嫩作为非交战国的地位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承认的。自1948年以来，黎巴嫩人把他们的金钱和精力都用在他们国家的发展事业上。其结果是贝鲁特成了中东的日内瓦，整个这个美丽的国家看上都快成了地球上的伊甸园。黎巴嫩成了那些失望但却富有的阿拉伯人以及许多欧洲人的游乐场。因此，黎巴嫩无防卫力量可言。如果法塔赫经常从黎巴嫩出发去袭击以色列，黎巴嫩人则完全无力防御以色列不可避免的报复性进攻。这意味着，黎巴嫩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到时都会反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居住在他们当中的巴勒斯坦难民和那些为争取巴勒斯坦权利而战斗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局面并不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想要出现的。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我们知道，黎巴嫩是不会接受它的。”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不想急于卷入黎巴嫩的另一个原因是，黎巴嫩正在酝酿着一场内战。人口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穆斯林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日子正在来临。如果占据人口少数的基督教徒到那时不同意分出它占有的较多的权力，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对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其中含意是十分深刻的。如果他们把黎巴嫩卷进他们的斗争中，他们或许将要为激起内战承担责任。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他们都将为出现的情况受到责难。哈拉德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十分清楚的，卷入这些根源根深的问题中，我们巴勒斯坦人除了失去一切别无所获。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正在威胁着黎巴嫩本身的生存。在法塔赫内部，我们都确信，以色列将会利用黎巴嫩所发生的任何麻烦来掠取更多的阿拉伯土地。”

在1968年1月中，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决定，约旦可以用作对以色列进行打了就跑的出发基地。但是，为了尽量减少同侯赛因政权发生过早和严重对抗的危险，他们同意法塔赫将不试图建立固定基地。突击队是小规模的，并且是游动的。阿布·杰哈德说：“我们的计划是利用这里的山洞、那里的房子，如此等等。”当时，阿拉法特大概只有不多于300至400名战士（或者称作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可供使用。只有当法塔赫在约旦被侯赛因，被以色列人，或者被两者搞得走投无路时，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才可被利用。

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必须先接近约旦。哈拉德·哈桑说：“我们装扮成伊拉克士兵进行渗透。我们乘坐在伊拉克车辆中入境。我们身着伊拉克军服。我们携带伊拉克身份证。一旦入境，我们便再次成为法塔赫了——但是我们仍保存着伊拉克军服和身份证，假使我们处于要被拘捕的危险情况时，就准备好再次穿上伊拉克军服并使用这样的身份证。”

与此同时，侯赛因在以色列巨大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下，拒绝在他王国的任何地方给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解放团体作为庇护所。他已被毫无疑问地告知，以色列人认为他对任何边界侵犯负有责任，如果他不能控制巴勒斯坦人的话，以色列已准备好存心惩罚约旦。正如侯赛因本人后来对我所说，他当时对以色列的傲慢以及拒绝考虑他的不稳定处境而留有余地，非常“反感”。已有迹象表明，在约旦军队中的许多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些人是高级军官，充满了叛乱的情绪。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出于他们十分同情阿拉法特和他的路线。他们反叛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在一个国家武装部队中所处的二等公民地位，而他们对这个国家却是一片忠心，尽管他们是巴勒斯坦人。

“事实是我们受到我们的约旦同僚的仇视。他们仇视我们的基础是恐惧，因此他们拒绝提升我们，并总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按照他们的话来说，我们是‘叛徒’或‘潜在的叛徒’。我们当时是百分之百地忠于国王陛下，而且我们打算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们对来自约旦人的辱骂和蔑视行为所能做到的忍受也到了极限，这些约旦人正以国王的名义掌管着军队。”说上述这番话的是一位曾在约旦空军服役的地位很高的巴勒斯坦军官，目前他是阿拉法特最信赖的中尉之一。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因为他的妻子和家庭仍在约旦。

从1968年初起，侯赛因一直在危险的境况中艰难地对付着。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以避免激怒傲慢的、准备入侵的以色列人。他很清楚，在以色列，有那么一些狂热分子，他们认为所有约旦领土都应并入犹太国家，他不想为他们提供口实。因此，在2月间，侯赛因为了向以色列人表明他愿尽全力遏制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行动组织，他宣布，他正采取“坚定而强有力”的步骤来对付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约旦将把巴勒斯坦破坏小组从其领上派出看作是“空前罪行”，国王的声明不能说是一篇开战宣言，但是它的确标志着约旦对法塔赫部队进攻的开始，不管它在哪里发现他们。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对最近增强的压力感到忧虑，但并不怎么惊恐。他们曾经料到这点，而且他们知道有两件事对他们有利。第一是约旦武装力量决不赞成真正对抗。他们在从“六天战争”中所遭受的打击下重新组建和武装起来需要相当时日。第二是法塔赫可以期待它在约旦部队中的同情者给予某种帮助。

阿布·杰哈德曾经向我讲述过法塔赫事实上从这方面得到帮助的一个实例：“在国王声明发表后不久，一位在约旦军队中的巴勒斯坦军官告知我们，我们的临时的或者说流动的营地之一将要在当夜遭到袭击。当夜幕降临时，我们撤出了那个地方并包围了这一地区，深夜，准备袭击我们的这支约旦部队进入了我们的埋伏圈。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在这儿？你们想要做什么？’一名约旦指挥官说：‘我们以为你们是以色列人。原来你们是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那好，我们是朋友。’于是他们离开了我们。”

“在2月间和3月初，我们同约旦军队和边防警察有过许多冲突。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清楚的，他们不是真想同我们战斗。最高级军官，特别是国王的叔叔，真想一见到就干掉我们。但是，面对我们的许多普通的约旦士

兵当时并不那样想，他们并不反对我们，他们恰恰是不希望出现任何麻烦。”

尽管建立固定基地不是阿拉法特的本意，他从灾难性的西岸战斗中吸取了这一教训，然而，到2月底，法塔赫事实上强有力地立足于东岸第一个固定的基地。这是一个难民营。不久它的名字就出现在全世界报刊大字标题中。阿布·杰哈德向我讲述了法塔赫是怎样立足在那里的故事。

“在我将要向你讲述的事件之前，这个特定的难民营就像在约旦的许多难民营一样，它是我们法塔赫战士的有用的转运站，是他们在战斗间隙中可以在朋友中休整一下的地方。在2月底，约旦士兵的一支特遣队进入了这个难民营。他们带有一份名单。他们逮捕了一些刚好在那里休息的我们的战士。一些难民立即开始组织抗议示威，他们四处奔走相告，号召人们参加，一些人跑到清真寺，通过那里的高音喇叭呼喊，不一会儿约旦士兵就被包围了，人们在呼喊：‘释放我们的战士，释放我们的战士。’”

在上一年11月，这所特定的难民营的许多儿童被以色列的迫击炮和杀伤炸弹炸死。随后，一些西方武官访问了现场，称这是一次报复性袭击，它“十分准确地”击中了预定的目标。迫击炮弹落在大街上，击中了一个警察哨所、一个口粮发放中心和一所女子学校。袭击时正值女孩子们离开学校的大楼。发生了这次袭击后，这所难民营的人们再也不相信约旦武装力量能够或者愿意保护他们了；他们的结论是应把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看作为他们唯一的保卫者。

阿布·杰哈德继续说道：“难民营中的人们非常愤怒和激动，但是他们没有使用暴力。他们只是进行他们的抗议示威，呼喊口号。当那位约旦指挥官看到他已无能为力，他便释放了我们的战士，然后带着他的士兵离开了营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则完全是自发的。人们把他们的营地称之为‘解放区’；在没有接到阿拉法特和我的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战士开始将重武器带进这个营地。他们再也不用担心暴露自己了。难民营的人们说：‘来，保卫我们吧，’这些战士响应了。”

不久，阿拉法特视察了这个难民营。他为他自己在那里所看到的抵抗精神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个地方叫卡拉玛。它的意思是“尊严”。阿拉法特决定把他的总部建在那里。

我问阿拉法特是否某种第六感觉告诉他，决定命运的某一时刻正在来临。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惊奇。“这恰恰就是我当时感觉到的。”他说。

3月18日，一辆载有以色列儿童的校车碰上了法塔赫的一枚地雷，几名孩子受了伤。随车的一名医生死亡。按照以色列的记录卡，这是以约旦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的第37次破坏和暗杀行动。总共有6名以色列人死亡，44人受伤。

以色列要发动一次大规模报复性袭击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阿布·杰哈德说：“许多路经卡拉玛的巴勒斯坦人告诉我们他们亲眼看到的情景——以色列军队和军车正在杰里科和从耶路撒冷过来的公路上集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报纸和电台广播中也宣称，很快就将发生对在约旦的恐怖分子基地的袭击。我们自问，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如此明显地暴露出他们自己的企图。从军事观点看，他们正在做的事肯定是很不安全的。

“很快我们就认识到了以色列的战略意图所在。首先，以色列人是在向约旦发出信息。以色列人如此公开地表明自己真实目的，是在告诉侯赛因和他的军队：‘我们是当真的。我们要摧毁法塔赫。如果你们妨碍我们的话，’

我们也要摧毁你们。’以色列人通过这项策略说服约旦置身于战斗之外。

“对于我们，以色列人正在玩弄更加精明的手法，或者说他们认为如此。他们正如我们一样熟悉游击战争规则。规则首要一项是游击力量不同正规军队正面抗衡和交锋。因此，以色列人寻思我们定会遵循这项规则。如果我们恰好在他们袭击之前撤走，他们就没有机会如此容易和如此大量地杀死或俘虏我们。简言之，他们在挑动我们背离游击战争规则，进行正面抗衡和交锋。在全世界舆论由于以色列的鼓噪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形势的情况下，他们估计我们顶不住被视为逃之夭夭的一伙胆怯之徒。因此，他们相信我们为了我们信誉缘故会同他们进行正面抗衡和交锋，对此他们有充分把握。这意味着他们将消灭我们。他们相信，我们是一群兔子，对于巨大的强有力的以色列战争机器来说，我们不是竞赛对手。事实上，摩西·达扬在以色列就对记者说道。战争一旦开始，很少几个小时之内便可结束。他保证将在耶路撒冷把被俘的恐怖分子领导人游街示众。”

法塔赫果真决定进行正面抗衡与交锋。

阿拉法特说：“当以色列人正在进行他们的战争准备时，阿布·伊亚德和我到驻约旦的伊拉克部队司令官那里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我们，很显然以色列人正在准备一支巨大的入侵力量，卡拉玛将是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我说，我们知道这点。随后他劝告我们遵循游击战争的规则，撤到山里去。他说：‘你们不能同他们正面作战。这是不可能的，撤出来吧，让他们的阴谋落空。’他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进行我们的撤退。”约旦人不久也向阿拉法特提出了同样的劝告。

阿拉法特继续说道：“我对伊拉克司令官的劝告表示了感谢，同时阐明了以下意见：‘自1967年阿拉伯人战败后，必须有某个组织为阿拉伯民族作出榜样来。应当有某个组织能够证明，在我们阿拉伯民族中，是有人准备战斗到底的。因此，我很抱歉，我们不能撤出。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3月20日晚上，阿拉法特对他的战士们讲话。他告诉我：“准确地说，我们当时只有297名战士，许多人是青年人。说真的，他们当中一些人还仍是儿童。”

有一名小战士问道，他们是否能打败以色列人。阿拉法特说：“我很想笑，但实际上是想哭。我回答说：‘我勇敢的战士，不能，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我们只有不到300人，而他们则有数千人，并且装备有最新式的美国坦克和其他武器。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但是我们能够教训他们一顿。’”

人人都说阿拉法特在作他的临终讲话，但是它不是一位指挥军队的将军或者一位政治家所作的演说。阿布·杰哈德说：“他作为巴勒斯坦大家庭的领袖，正在倾吐他的肺腑之言。”而那时正值阿拉法特能够转移到山区去之时。

在3月20日晚上，阿拉法特要求他的战士们为他们的事业而献身。他对他们说：“阿拉伯民族正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像勇士一样，充满勇气和尊严来肩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这个民族中确立百折不挠的信念。我们必须粉碎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临近午夜之时，阿布·杰哈德离开了卡拉玛。他对我说：“当时决定派我去大马士革筹集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箭推进榴弹。”

那天夜里，卡拉玛的保卫者们的士气是怎样的呢？阿拉法特对我说：“真叫人难以置信，他们在相互交谈，好像他们是俨然不可战胜的军队，而以色列

列人则是小小的无足轻重之辈。”

那么阿拉法特本人在那天夜里又在想什么呢？他的正面抗衡与交锋的决定真是另一种战术、一种对当时机会和需要的响应？还是他相信他和法塔赫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总还能生存下来？

我向阿拉法特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回答说：“对你提出的这类问题我真的没有作过任何考虑。我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教训一下以色列人，同时给阿拉伯民族作出一个榜样。告诉你实情，我没有期待我们当中任何人会在卡拉玛战役后活下来。”

我以为，阿布·杰哈德之所以离开卡拉玛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我想，阿拉法特相信他会战死在卡拉玛。我的猜测是，他要求杰哈德本人离开战场，以便他能活下来接任军事领导的职务。

3月21日凌晨5点钟，当阿布·杰哈德在大马士革熟睡时，以色列人进攻了。他们沿着50英里长的战线，在多处跨越了约旦河，但是，地面主力部队直接对着卡拉玛。与此同时，以色列直升机在卡拉玛后面空投了伞兵部队。他们正从背后向前推进。以色列的战斗计划现在已十分清楚。卡拉玛将被包围，法塔赫的末日正在临近。阿拉法特和以色列人一度想到一块去了。

首批进入卡拉玛的一名伞兵后来描述，这个地方看上去像是一座鬼城。他说：“我们用扩音喇叭要求居民们举起双手走到清真寺前的广场去，但是我们似乎是在对墙壁说话。”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像是被弄胡涂了，但一点不感到着急。根据他们的最新情报，法塔赫和它的军事领导人是被困在卡拉玛。难道是以色列有名的情报机构搞错了吗？法塔赫在夜里悄悄溜走了吗？

阿拉法特对他自己的战斗计划反复思考。只有等以色列人进入卡拉玛，他们才能被制约。关键所在是打击以色列的装甲部队。如果法塔赫能够击毁他们的一些坦克，以色列人将会产生几个心理上的问题。阿拉法特有这样一种理论，时间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大于谬误，即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以色列人不比任何其他具有明确动机而为他们一度轻视的战士强，或者说，他们拥有优越的重武器装备、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战斗机，却无法发挥他们的长处。

战斗打响了。阿拉法特说：“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儿童，从他们隐蔽的地方冲出，他们拼命奔向以色列坦克。一些战士爬到坦克上把手榴弹塞进里面。其他战士则把甘油炸药棒束缚在自己的身体上。”

事态发展的影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以色列人迅速逃离被击中的坦克，寻找掩护和逃命。

当然，这只是卡拉玛战役的开始。以色列人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逐渐开始使用他们在兵力和火力上的绝对优势，发动新的进攻。大约在11点钟，当阿拉法特的1/3的战士牺牲时，约旦人参加了战斗。

在约旦的炮火掩护下，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们撤退到新的阵地。这个阵地就在一个新的临时野战指挥部周围。它是阿布·杰哈德刚刚从大马士革经阿曼返回时建立的。现在手头拥有新的武器弹药供应，包括阿拉法特曾经要求得到的火箭推进榴弹和反坦

克武器，还有水、食品和毛毯，以及增援力量。

《泰晤士报》，1968年3月23日，见载维·海斯特的《枪杆子和橄榄枝》（费伯和费伯出版公司，伦敦，1977）。

阿布·杰哈德说：“大约在那天下午2点左右，我们开始接到从卡拉玛撤下来的战士。当阿拉法特偕同阿布·伊亚德和阿布·卢图夫来到时，我们制定了继续战斗的计划。我们派出了许多小的分队到以色列人战线后面给以打击。”

那天早些时候，以色列人为减少他们的损失，决定撤退。他们的伤亡数是，28人被击毙，90人被击伤，以色列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另一证据是，有18辆坦克被击中，他们被迫将它们丢弃在战场上。据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称，法塔赫的损失是，93人阵亡，“许多人”受伤。乌姆·杰哈德告诉我，当时他们没敢宣布他们的阵亡人数，约旦方面的损失是死伤128人。

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约旦人参加战斗完全是自发的，他们卷入战斗是因为他们目睹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良知触动思考。

我认为阿布·杰哈德是希望我同意这一分析的，按照这一分析，约旦人投入战斗的动机是出于他们对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们的敬佩之情和他们对坐视巴勒斯坦人孤军作战的羞愧之感。我的猜测是，阿布·杰哈德说约旦人设置炮火掩护网，给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以撤退的机会，而一旦约旦人真的开起火来，这场战斗便径自发展了它自己的新的契机。

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似乎很有可能阵亡或被俘，如果约旦人不曾介入战斗。但是，这一结论绝不降低法塔赫胜利的意义。在巴勒斯坦斗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没有哪场战斗比在卡拉玛所进行的这场战斗更为重要。假如阿拉法特在那里曾被击败，巴勒斯坦事业也就从此被断送。这肯定是阿拉法特的判断。

这场战斗后，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彻夜欢呼法塔赫在卡拉玛的“胜利”，把它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复兴”。这次胜利也给各地的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深感宽慰并感谢巴勒斯坦人。卡拉玛战斗并没有卸去1948年以来压在所有阿拉伯人心上的羞辱感，这一感受在1967年又大大加重了；但是卡拉玛战斗却使这一重负减轻了，变得较能承受了。

法塔赫开始恢复元气和活力，而这正是以色列给了它这样的机会。

然而，以色列的卡拉玛行动也不是完全失败。以色列人在卡拉玛所做的事为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无耻的行为模式。从此，西方各国政府和新闻机构经常毫无遗憾地承认，入侵其他国家是以色列的行为方式。

第十四章现实的曙光

阿拉法特从本应成为他的坟墓之地升起，比他在卡拉玛战斗以前要更加强有力。主要是他掌握法塔赫更有把握。哈尼·哈桑说：“在卡拉玛战斗之后，我们继续说我们是一个集体领导。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在卡拉玛战斗之后，我们称之为历史性领导人的所有创始人都承认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阿拉法特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你的意思是，在卡拉玛战斗之后，没有人在领导问题上能向阿拉法特提出挑战并期望赢得胜利。”我说。他笑了。“是的，”他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真正意思。”

哈拉德通情达理地俯首认可阿拉法特作为集体领导中首屈一指人物，其权力迅速上升的不可避免性。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部分是因为他开始认识到，他对“突然袭击心理”的憎恶和对民主的信奉已经使得他看错了阿拉法特的性格和人品。阿拉法特在卡拉玛的决一死战是一个戏剧性的证明，表明阿拉法特是一个为事业而奋斗的人。如果阿拉法特是一个哈拉德个人忧惧的那种渴望揽权的独裁者，那他就不会准备自己作出牺牲。哈拉德是在反对阿拉法特的绝大多数法塔赫领导人中第一个发觉阿拉法特事实上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正是他能够采取一切办法激励巴勒斯坦人去进行斗争——如果需要，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即使独自一人也要去斗争。

对阿拉法特实际政治权力的第一次转移，是在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之间的一次会谈之后。这次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决定需要及时任命一位正式代言人之后，在科威特哈拉德的住所举行。“你们必须记住，我们仍然是一个秘密组织，”哈拉德说，“我们的面孔和我们的真实姓名是不为人们所知道的。”

选择是在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之间。最后的决定留给了哈拉德和阿布·伊亚德，这两个人在“六天战争”后曾经对阿拉法特大加挡道。哈拉德告诉我，他不表示个人对一个或另一个的偏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阿布·伊亚德发表一项声明，宣称为人们所知的领导人阿布·阿马尔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将是法塔赫的正式代言人。

阿拉法特从电台新闻公报中得知了他的任命。他没有告诉我关于他此时的感受，但是我想象得出他感到宽慰，因为他同哈拉德以及在中央委员会中他的多数同事之间的对抗已经成为过去。

如果把这项任职赋予阿布·杰哈德，而这本是容易做到的，那么成为今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就可能是他，而不是阿拉法特。

法塔赫在卡拉玛战斗中取得的第一批胜利果实在庆祝这次战斗胜利结束以前，就已瓜熟蒂落。阿布·杰哈德说，“战斗结束后的那天和以后的三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9点，我在萨勒特一直坐在一棵树下。我只带着我的笔记本和一些铅笔。我的工作记下几千名前来参加法塔赫的志愿者的姓名和地址。在那三天里我们接收了近5000人。”在以后大约18个月的过程中，又有2.5万名志愿者参加法塔赫去战斗。

对于尚无经验和相当非正规化的法塔赫的反情报机构来说，新成员的剧增是太多了。阿布·伊亚德说：“在卡拉玛战斗之后，以色列人向我们抛出了数百名特务、间谍，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他们在西岸和加沙主要用胁迫和讹诈手段吸收来的。以色列人利用我们的男人、我们的妇女，甚至我们的儿童。

我谈过话的最年轻的一个只有 11 岁。无疑，一些混在我们当中的特务和间谍确实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使以色列的空军能够非常准确地向我们基地进行袭击。但是，我们也终于知道，我们的一些人是被迫当卖国贼的。”

我问阿布·伊亚德，他是怎么会知道的。他回答说：“非常简单。他们跑来告诉我们。他们说，例如，他们被带到这样那样的地方，并被教以如何使用隐形墨水来制做他们的秘密情报。但是，作为以色列阴谋和胁迫活动的结果，我们也有我们可利用的机会。我们告诉我们的一些人继续为以色列人做间谍，但是只提供我们准备好的情报。这样，我们造就了许多双重间谍人。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向以色列人供给假情报，而从我们的双重间谍那里获取的一些情报则帮助我们预先知道以色列人的动向。我们也开办了一所改造和整顿学校，处理以色列的特务和间谍问题。它是为那些已经被以色列人洗了脑子的人开办的。在这所学校里，我们再次清洗他们的头脑，这也是一种智力的战斗。”

早有警告表明以色列各种情报人员能轻而易举地伸出触角并接触到法塔赫领导人，这在卡拉玛战斗之后很快就提出了。当时，一个信件炸弹被送到阿布·杰哈德的办公桌上。它是寄给阿布·杰哈德和另一位法塔赫中央委员阿布·萨布利的。乌姆·杰哈德说：“阿布·萨布利正在要把信件拆开的关头，阿布·杰哈德大声叫喊，‘不，不，住手！把信件给我。’他把信件稍稍打开一个口，确认了它是一枚炸弹。他正在去出席一次同其他领导人的会谈的途中，因此，他命令把炸弹放在一棵树下。会议之后，他们拆除了炸弹上的引信。

更多的证据表明在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对法塔赫的支持正在日益增加，这些证据是阿布·伊亚德向我提供的。“在卡拉玛战斗的一两天之内，许多小汽车和大卡车开始来到我们在萨勒特的新的总部。他们给我们送来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社团赠送的毛毯、衣服和食品。有了这些赠品，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向我们的战士包括新入伍的成员在内提供足够的食物。”

当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民加入了斗争行列，后勤的一整套服务机构随之发展起来。这是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非暴力支持的自发表现。当巴勒斯坦学校，巴勒斯坦诊所，巴勒斯坦医院和巴勒斯坦孤儿院纷纷建立起来时，形势有了迅猛发展。随着这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巴勒斯坦官员。巴勒斯坦文化也得到复兴。巴勒斯坦人民正行进在新生的道路上。

前进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塔赫对埃及和约旦的立场和关系中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直到 1967 年阿拉伯战败为止，这两个国家的政权或多或少地同法塔赫处于战争状态。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同以色列和那些大国一样急切地去阻挠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觉醒。哈拉德·哈桑和法塔赫其他领导人所作出的希望同纳赛尔建立对话的每一次尝试，都受到埃及情报首要人物的阻挠。1967 年阿拉伯的战败，给法塔赫以再次试作努力的机会。

这次，境况较为有利，因为纳赛尔的许多政治同僚们认识到，一个失败的埃及需要法塔赫，哈拉德解释说：“紧接在这次战争以后，我会见了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我告诉他，在战争之前我们被阻止同纳赛尔接触，这是一个悲剧。我说，我们现在就会晤他，商讨一项联合战略，这是绝对必需的。因此，我要求里亚德说服纳赛尔会见我们的领导人。里亚德说，他将尽他最大努力去做，而且他也非常、非常坦率地谈他自己的看法。他请

求我们在新被占领土开展一些军事行动。他说这样的行动对分散埃及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群众的注意力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继续斗争的思想上来，人民群众将会转而反对他们的政权。”

里亚德没有能说服纳赛尔会见法塔赫的任何领导人。因为纳赛尔的情报首要人物仍然在向他撒谎，纳赛尔继续确信，法塔赫是他的敌人，而阿拉法特则要置他于死地。

使通向纳赛尔的大门得以开启的人是洛特费克·胡利。他告诉我：“那时我是一家杂志的编辑。这个杂志是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喉舌。而我则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在那些日子里，我像一个蠢人在监狱进进出出，因为纳赛尔周围的人不喜欢我所写的东西。

“我去见海卡尔，我恳求他说服纳赛尔会见法塔赫的领导人。海卡尔提出情报机构的报告问题。我说：‘那些都是胡言。’我告诉他，自从巴勒斯坦局在阿尔及尔设置之日起，我曾经结识了好几位法塔赫的领导人。我还说，如果埃及不同法塔赫合作，我相信它会失去许多东西，我同意海卡尔的看法，在纳赛尔和法塔赫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是我说我相信通过讨论分歧能够获得解决。

“长话短说，海卡尔同意要求纳赛尔会见法塔赫。在纳赛尔听过海卡尔的话后，他说：‘但是你所说的同我们的情报人员告诉我的截然相反。’海卡尔于是提出一个建议，他对纳赛尔说：‘如果我会见法塔赫的一些领导人，如果我确信我们情报机构的报告是错误的，那么你将会见阿拉法特吗？’纳赛尔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是的，我见。”

由于海卡尔努力的结果，纳赛尔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四人代表团之间的会晤安排在1967年11月。将陪同阿拉法特出席这次会晤的有阿布·伊亚德、即将成为巴解组织正式外交部长的阿布·卢图夫和不久将负责情报工作的阿布·霍尔。

阿拉法特是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去的，仍然佩带着他助手枪。纳赛尔的保安人员要求他在会谈期间交出他的手枪。阿拉法特拒绝了。有理由认为，这是纳赛尔的保安人员仅仅在恪守他们的职责，而别无他意。但是，如果说埃及的情报首要人员早自1965年起就已经卖力工作以阻止纳赛尔—法塔赫的会晤，那么推测埃及情报机构的一些人正打算挑起事端以便他们取消这次会晤，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阿拉法特拒绝交出他的武器时，纳赛尔被征询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还被劝告，无论如何他不应同意接见一个武装了的阿拉法特。纳赛尔发话说，阿拉法特是他的客人，他可以携带他的手枪。

几分钟后，纳赛尔对阿拉法特讲的第一句话是关于手枪的事。他说：“我的情报人员告诉我，你坚持携带你的手枪，因为你想要杀死我。就在这个时刻，他们正在说这样的活。”

阿拉法特这个伟大人物，卓有才能应付此时此刻的这项挑战。他从容不迫地解开他的手枪腰带。然后，他用双手将腰带和手枪奉献给纳赛尔。“总统先生，”他说，“你们的情报人员错了。我把我的自由战士的手枪奉献给你，以此为证。”

纳赛尔第一次笑了。他回答说：“不，你保留着它。你需要它。而且更需要。”

洛特费克·胡利说：“在这次会谈之后，我随即同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当纳赛尔使用‘更为’这个词时，他们知道纳

赛尔打算支持法塔赫。”

按照胡利和其他人的看法，纳赛尔被阿拉法特“吸引住了”。同时，他也对他的情报头头们的所作所为大发雷霆。

在同阿拉法特会谈以后，纳赛尔在独自一人思考的时候，向他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一直萦绕着他，直到他死。正如他后来在同已成为他朋友的那些法塔赫领导人的私人谈话中说的那样，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的情报头头们就阿拉法特和法塔赫之事欺骗他？显而易见，他们的主要意图是阻止纳赛尔—法塔赫对话。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纳赛尔和法塔赫领导人来说，其中含意至少是这样的，纳赛尔的高层情报人员中的一些人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或起码受其操纵，并通过中央情报局又同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勾搭。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是企图造就一种形势，使得纳赛尔垮台，并使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消失，在爆发“六天战争”前的最后时刻，以色列领导人中的一些人对他们的主要目标已毫不置疑，那就是使埃及蒙受失败，以羞辱纳赛尔，使他除辞职外别无选择。由于法塔赫的斗争升级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机会，在纳赛尔和法塔赫之间的合作显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而假若他们在1965年或1966年会晤，这一合作也许就会出现。实际所发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纳赛尔确实在1967年6月9日宣布辞职，并且在第二天又加以收回。消息灵通的以色列人士示意，一项试图实施的政变失败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以色列和美国政府未曾正式批准这项阴谋。两者的态度可能是“干，但不要告诉我们”，美国曾经反对英国和法国在1956年企图在以色列的帮助下除掉纳赛尔，10年以后美国玩弄这同样的一招，它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美国国务院在1967年确信，如果以色列准备给外交活动以更多一点时间，危机不用战争就能获得解决，这一事实表明，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干的事，一无所知，甚至未能通过非正式途径获悉。

从阿拉法特本人那儿，我仅从录音中摘录一点对这个问题的评论。他说：“以色列人只是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法塔赫领导人提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侯赛因和叙利亚人暗示，1967年实际要做的事是除掉纳赛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这件事能够释明，为什么约旦的宣传家们把纳赛尔勾画成为一个躲藏于联合国紧急部队裙子下面的懦夫。

甚至直到他1967年11月在同阿拉法特会晤时，纳赛尔才采取了措施以确保法塔赫领导人再也不会发现他的大门是紧闭的。他告诉阿拉法特，如果官方的渠道被堵塞，法塔赫可以依靠海卡尔，而海卡尔当着法塔赫领导人的面领受了这项旨意。

尽管纳赛尔同阿拉法特的关系具有政治联姻上的各种方便表现，它却是植根于相互间的真正感情。正如哈尼·哈桑说过的，阿拉法特开始把纳赛尔看作一位“父辈”。但是，直到卡拉玛战斗胜利以后，在纳赛尔和阿拉法特之间以及在埃及和法塔赫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建立和发展。在卡拉玛战斗之后，阿拉法特为纳赛尔的一项请求感到既惊又喜。这项请求要求法塔赫接受一个埃及陆军军官代表团，他们希望研究和学习在卡拉玛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代表团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代表团访问之后，紧接着向阿拉法特和其他参加过卡拉玛战斗的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到埃及陆军军事学院讲课。

阿拉法特说，“我自己在埃及进行了一些讲课，而且我作了一些安排，让我们战士中的许多人讲述他们的战斗经验，告诉人们对付以色列的侵略是

可能的。这是我们非常骄傲的时刻。”

然而，在约旦，法塔赫从卡拉玛战斗中获得直接效果最为明显。形势在一夜之间有了改变。约旦政府把法塔赫在约旦的存在看作是生活中的一件憾事给予承认，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开始享有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行动自由。

阿布·杰哈德阐述道：“卡拉玛战斗为我们在安曼的自由生活打开了大门。我们有了这新的自由，打开了更多的大门。正如你所知，我们没有护照，因为没有地方承认我们是正式公民。但是，在卡拉玛战斗以后，由于人民群众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支持，我们仅用我们的法塔赫身份证就能自由旅行。因此，我们不用护照，就可以从约旦去伊拉克，从约旦去叙利亚和黎巴嫩，从约旦去埃及，从约旦去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从约旦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等。我们超越地域，自由移动。这意味着我们得以自由地开展组织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卡拉玛战斗之后，由于人民群众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广泛支持，法塔赫作为一个不能没有的邪恶不得被容忍下来。即使是那些在侯赛因周围的人也至少暂时加以承认。这些人是以他们的反巴勒斯坦情绪和跟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调子跳舞的意愿而著称的。（从来没有一个亲西方阿拉伯领导人在他们的部长和高级顾问们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由于没有进行策略活动的安全余地，侯赛因决定听任事态自然发展。在他静观将要发生的情况时，他抱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希望是，他能与阿拉法特就法塔赫军事活动的规模和导向达成一些谅解。目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阿拉法特会利用他新的力量和新的行动自由更猛烈地打击以色列。是从约旦出击。接着以色列将逐步升级它的报复行动。侯赛因知道，他无力阻止这些事件发展。但是，如果他能同阿拉法特达成一项谅解，至少存在这种可能，即他们能在他们之间阻止事态完全滑向失去控制。

侯赛因的第二个希望是，他和纳赛尔能以某种方式说服美国使用它的影响去迫使以色列从它在“六天战争”中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按照侯赛因当时看法，说服美国去做这件正当的事理应是可能的，因为美国同其他国际社会一起承担了执行联合国 242 号决议的义务，这项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

一个实际问题是，对 242 号决议的解释没有形成定论。原始的草案曾经要求以色列军事力量从它在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所有领土上撤出。但是，以色列人曾说过，如果“全部”这个词出现在最后的文本里，他们不会接受 242 号决议作为实现和平的方案。由于在这项决议中最初的论点强调“通过战争获得领土的不可承认性”，那么那些以国际社会名义负责起草 242 号决议的人应该正告以色列人“全部”这个词正保留在最后的文本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以色列因此能以貌似公正的理由自称，它不必从所有的被占领土上撤退，以色列撤出的任何范围都有待于谈判，以色列只要说一声“我们不同意从这里撤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任何和平步骤。

侯赛因、纳赛尔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可望取得的出路是，世界各国政府愿意承认 242 号决议的精神，要求以色列基本上全部撤出以换取和平。侯赛因希望，他和纳赛尔能够说服美国迫使以色列遵守 242 号决议精神，其结果，正如阿拉法特很快从纳赛尔那里获悉的，约旦和埃及愿同以色列媾和。在侯赛因和纳赛尔之间的唯一分歧是，能为巴勒斯坦人做些什么，如果

有所可为的话。

侯赛因仍然默默地充满自信，242 号决议可能提出的和平会约他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以机会，去扑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火。这位国王肯定，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当中多数人，会高兴地看见以色列占领的终结，并且会因而欢迎可能成为现实的和平。另外，侯赛因能够允诺修改宪法，这会给他的巴勒斯坦臣民在管理他们的自己的事务中有一个较大的发言权。或许，这是一项自治的办法。但是，当然要在约旦的旗帜下。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也许希望继续战斗，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按照他们的和约的义务将被要求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有必要，摧毁他们。

至于纳赛尔，他不怀疑这一事实，同以色列的正式和约会要求阿拉伯前线国家领导人去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去压垮那些仍然坚持继续武装斗争权利的巴勒斯坦人。出于同以色列媾和的原因，纳赛尔本人准备使用所有必要的措施，来消灭巴勒斯坦人的好战精神，但是，如果它要和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最后摊牌，纳赛尔不相信这些政权会赢得一场轻易的或迅速的胜利——像侯赛因似乎正在设想的那样。巴勒斯坦人在卡拉玛的战斗确切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政权最终会获胜，并且他们会因此保证同以色列媾和。但是，这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和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现在纳赛尔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他自己的估量。他无需别人使他确信，这位法塔赫领导人真是一位掌握命运之人，他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不会停止战斗，直到他们为他们的人民至少获得某种程度的公正对待，纳赛尔越想就越信，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的媾和不会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火得到遏制。如果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再次被赶入地下，他们会同每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不满分子、每一个激进的和革命的团体，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各种原教旨主义者，建立起一个联盟。这就是纳赛尔处在法塔赫地位时所要做的事。两次被出卖的巴勒斯坦人会成为一场真正革命的原动力。已经同犹太国媾和的阿拉伯政权会被撇在一边，阿拉伯世界要进入一个新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黑暗年代。这就是阿拉伯国家为实现媾和而完全无视巴勒斯坦正义要求最终所要付出的代价，纳赛尔对此感到担忧。

如果实现 242 号决议达成的媾和不导致在阿拉伯世界可能发生的大动乱，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需要确信，阿拉伯政权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不是在洗手不干。这意味着即使当阿拉伯政权在同以色列议和的时候，也必须保证他们为巴勒斯坦解放斗争提供支援。而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只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愿意放弃武装斗争思想，采用政治方式继续战斗。

事实既然如此，只有一件事是纳赛尔能够做的。他努力说服巴勒斯坦领导人，他们也必须面对某些现实。由于西方世界各国政府拒绝对 242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人为和平进行必要的撤退作出表态，从而使纳赛尔得到帮助。在实现 242 号决议方面的延宕，给了纳赛尔按阶段做巴勒斯坦人工作的时间。第一阶段他要说服巴勒斯坦领导人产生一个政治纲领，第二阶段他要努力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和采取政治方式继续他们的斗争。

在“六天战争”以后，纳赛尔决定，舒凯里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日子应是屈指可数了。他的关于消灭犹太国的狂热讲话曾经一度为纳赛尔的目的服务。现在对阿拉伯事业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有破坏性的使人为难

的事了。在他同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的 11 月会谈之后，纳赛尔已经决定法塔赫应当接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如果它的领导人，特别是阿拉法特，表现出他们自己是务实的人，准备采取现实态度进行妥协——在纳赛尔的引导之下。

那是在 11 月会谈当中，纳赛尔开始行动，建议法塔赫领导人应当坐下来，拟定一个说明他们的斗争目标的政治纲领。原则上这不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所热衷于的一种想法，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看作是在通常意义上的领导人。按照哈拉德·哈桑这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看法，他们把自己看作为复兴的动力和民主制度的建设者。这种民主制度将使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政策和提出他们斗争的最终目标。

纳赛尔根本没有对这种思想方法留下印象。他告诉他的新的巴勒斯坦朋友们，这是一种迹象，表明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浪漫派”和“梦想家”。梦想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他们真正为他们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务实的，并且对想要的和可以得到的两者之间作出区别。正如英国人曾经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根据大家所说，纳赛尔没有提出他自己的关于法塔赫的领导人应当是怎样的务实的想法；他知道他不能为他们作出决定。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多大程度上被纳赛尔的论点所说服，这方面的证据不久就可得到。几天之后，许多法塔赫领导人在开罗洛特费克·胡利家中会晤。胡利说：“在那些前来参加讨论的人当中有阿拉法特本人、阿布·伊亚德和哈拉德·哈桑。这次会议的思想是纳赛尔的——这是毫无疑义的。就我所知，法塔赫领导人中任何一位自己谈到政治纲领问题和纲领应具有的内容，这是第一次。我终于知道，纳赛尔的情报人员窃听了这次会谈的全部讨论情况。这对我引起了麻烦，因为我对纳赛尔拒绝以民主方式统治埃及是表示强烈谴责的。但是，这对法塔赫是并无妨害的。窃听文本表明，阿拉法特和其他的人正在非常认真地采纳纳赛尔的劝告。”

法塔赫对纳赛尔要求的详尽反应是 1968 年元旦在巴黎以一个正式声明的形式作出的。这项声明概括了这个组织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民主国的各项主张。基本思想是一个以政治行动搞掉犹太国的方案；但是它不是以色列人所声称的那种东西——一项要他们接受自杀的邀请。法塔赫的想象中的民主国是一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平等相处，没有歧视的国家。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将是这个非教派国家的正式语言，一个犹太人可被选举为总统。

阿拉法特本人这样表述它：“即使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法塔赫方面对世人所讲的是十分清晰，十分明白的。我们对犹太国说‘不行’，但是，我们对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则说‘可以’。对他们我们说：‘欢迎你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但是在一个条件下——你们必须准备作为朋友和平等成员生活在我们当中，而不是作为统治者。’我自己总是说，对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有一个保证，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保证，这就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阿拉伯人的友谊。它是如此清楚，如此明白。”

法塔赫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案要求犹太国的消失，因此只引起以色列人的轻蔑和嘲笑。国际社会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暗示。法塔赫的想法作为不值得任何认真考虑或研究的事立即被扔在一边，这对那些所有有关的人来说是一个悲剧，而在法塔赫的思想中，有很多是极其积极的东西。但是，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谁代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讲话，这是因为法塔

赫的建议被巴解组织拒绝，法塔赫在 1968 年时还不是巴解组织的成员，事实上它也被每一个其他巴勒斯坦行动团体或阵线所拒绝，理由是它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让步。一些法塔赫的批评家，只愿意接受那些直到 1948 年以色列独立宣言发表时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其他的人则主张把时钟拨回到 1917 年，仅接受那些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夕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

7 月，在卡拉玛战斗 4 个月以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 4 次会议在开罗举行。会上通过了包括在宪章内的七项新的条款。

宪章第六条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侵占巴勒斯坦之前就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将是巴勒斯坦人。”这样，法塔赫的民主国的思想被巴勒斯坦最高决策机构正式拒绝。但是，法塔赫的想象受到正式拒绝，不反映或代表在巴勒斯坦政治活动中发生的现实情况，一点不反映或代表法塔赫是唯一的在巴勒斯坦人民群众中得到巨大的和真正的支持的解放组织这一事实。因此，法塔赫更真实地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并比其他组织加在一起的所有代表具有更强大的潜在力量。

哈扩德·哈桑向我解释了巴勒斯坦政治活动中正在发生的另一基本事实：“在巴勒斯坦，有 200 万到 300 万以色列人。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在 1968 年谈论把他们一脚踢出去或者把他们扔进大海里是愚蠢的。在其他巴勒斯坦组织里，那些说他们反对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的人，在心里明白我们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也会不得不接受我们已经面对的现实——所有以色列的犹太人要存在于我们的民主国中这个事实。”

在这个时候，哈拉德为证明一点，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批评法塔赫的人中有一位巴勒斯坦作家，他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写写关于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哈拉德，我头脑里明知道你和阿拉法特是对的。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别无选择。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与在巴勒斯坦的 300 万犹太人居住在一起……。然而，问题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它是在我们的心中，我的心不允许我的手写你们所说的话。’

“在法塔赫和我们在其他组织中的巴勒斯坦的多数批评者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是我们法塔赫里的人准备公开地承认一定的现实——我们的批评者们则不是，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懂得确实必须面对的一定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如果我们的民主国思想不断经受谈判的考验，它是会盛行生效的。”

事态证明哈拉德是对的，当法塔赫在 1969 年掌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它的民主国思想确实盛行。它不是正式方针。正式方针是由宪章第 6 条所规定的。但是，它是法塔赫愿意和能够提出的一项政策，给以色列和国际社会能够这样行事的一个机会。

从法塔赫领导人提出他们的民主国思想进行讨论时刻起，国际社会就应当认真地怀疑以色列的断言，即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委身于在犹太国里消灭犹太人民。但是，正如以前一样，西方世界表明它宁愿相信以色列所宣称的法塔赫的意图，而不相信法塔赫领导人自己讲的。

法塔赫的领导人感到西方国家不会对他们事业给予任何支持，尽管它们开始面对身边的现实，于是他们决定再一次敲莫斯科的大门。直到这个时

候，苏联人仍然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表示不感兴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实际上强烈要求纳赛尔消灭它，而且他们一直设想他会成功。在卡拉玛战斗以后，法塔赫的领导人希望苏联人会较为认真地对待他们，但是，莫斯科对巴勒斯坦事业仍然没有兴趣，并且不愿接待阿拉法特或法塔赫代表团。

哈尼·哈桑说：“苏联人知道法塔赫来自右翼。因此，他们有一个难题。他们不能支持我们，不支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当地的共产党。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苏联人知道这些，这是一点，还有另一点，而且今天情况仍然这样，法塔赫对苏联人来说太具独立性了。他们知道，我们在法塔赫中有影响的大多数人，决不会放弃我们的独立性而允许自己跟着莫斯科的调子跳舞。因此，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利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人曾把法塔赫看作天然的或有用的盟友，那才是咄咄怪事。”

至于为什么法塔赫的领导人在 1968 年夏天是如此急切希望同苏联建立关系，哈拉德·哈桑讲了下面这段话：“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方针是同在西方和东方的每一个国家建立关系。但是，由于我们自己开始受到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教育，我们认识到没有两个超级大国中至少一个的支持，我们不能期望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们已经敲了美国 and 它的西方盟国的大门，我们没有得到答复，因而我们希望尝试同苏联的接触。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期望在东欧国家打开任何大门，除非莫斯科给它的盟国亮了绿灯。”

纳赛尔对法塔赫响应他建议的迅速感到高兴，他建议法塔赫应当确定解放斗争的目标，以便在他的支持下，在政治行动中承担它自己的一份职责，他是第一个赞赏法塔赫领导人沿着现实的道路迈出巨大一步的人，承认在巴勒斯坦的 300 万犹太人的具体存在并与之共处是一个生活中的现实。他现在必须说服阿拉法特，继续假想解放——即使如现在被法塔赫所定义的那样——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任何东西都不会得到，或许会失掉更多东西。在卡拉玛战斗之前，正如哈拉德·哈桑和其他领导人根据他们的经验所知，说服阿拉法特接受这样一个建议，将是相当困难的。在卡拉玛战斗之后，纳赛尔设想这将变得更为困难。第四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证明，对军事道路的支持正在增长。除正式拒绝法塔赫的民主国思想之外，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们还通过了一个对宪章的修正案，它体现在第 9 条当中。第 9 条是这样说的：“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因此，它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方针，而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阶段。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表明他们自己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毅力，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和努力从事人民武装革命，以解放他们的国家，返回家园。他们还坚持他们在巴勒斯坦正常生活的权利，坚持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

此外还有：宪章第 21 条说：“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的巴勒斯坦革命来表达他们自己坚强的决心，拒绝一切取代巴勒斯坦全部解放的所有解决办法。”宪章第 28 条宣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坚信他们的民族革命是真正的和独立的革命，反对任何形式的干涉、托管和附属关系。”

纳赛尔无需被告知，第 28 条是针对他同阿拉法特的发展中的关系的。纳赛尔确信，没有法塔赫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制定一条走向灾难的路线。

他现在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法塔赫一定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以现实主义统治它。但是，他首先必须说服阿拉法特放弃武装斗争的想法。

纳赛尔知道，他必须以谨慎态度对待阿拉法特。这位法塔赫领导人会拒绝对它组织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和对巴勒斯坦人决策独立性的任何侵犯。纳赛尔也知道，如果阿拉法特有一点机会劝说那些即使是他自己的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运动中的普通支持者们，使他们相信用政治方式比用战斗方式能够获得更多成果，那么阿拉法特需要在幕后秘密使用的论点要具有说服力，也只有这些论点是他自己经验知识的产物。纳赛尔已经发现阿拉法特的真正秘密，那就是他总能说服他的人民接受任何东西——如果他真正地相信他所正在宣传的东西。

在 1968 年困难的夏季里，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战斗机作为飞行火炮来袭击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的基地，使冲突逐步升级，纳赛尔必须找到一种完成其对阿拉法特进行教育的方法，向他揭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现实，然后由他自己作出结论。

纳赛尔即将访问莫斯科。他决定带着阿拉法特与他同行，但是，这位埃及领导人不可能征得他苏联主人的同意，因为他们肯定要说他们没有兴趣同阿拉法特会晤。因此，他安排阿拉法特作为埃及代表团的一位正式成员，用姆辛·阿明这一名字的埃及护照。只在他们安全抵达莫斯科时，纳赛尔才使他的苏联东道主小小一惊。阿拉法特不反对这个计划。他对有这个开始同苏联领导人建立关系感到相当高兴。

结果，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阿拉法特的希望。然而，它要比纳赛尔所预期的做得多。纳赛尔确切知道苏联人要告诉阿拉法特的是什么。他们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接受在“六天战争”前夕以色列国在其边界内的存在，而当阿拉法特在这爆炸性的事件的冲击下醒悟过来之前，苏联人还会告诉他，他们没有一丁点儿支持或鼓励巴勒斯坦人尚武精神的意图。

止如同阿拉法特本人对我确认，这确切是他在莫斯科这样被告知的，但是，显然不是苏联领导人说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主席波德戈尔内不同意接见阿拉法特。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没有兴趣同我对话。他们通过纳赛尔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处理这里局势。我说 242 号决议不能给巴勒斯坦人任何东西，但是，苏联人始终强调他们支持一项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方案。”

苏联的官方立场的态度是通过克林姆林宫的亚非团结委员会成员的谈话告知阿拉法特的。

三个星期以后，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为继续同亚非团结委员会会谈而赴莫斯科。据两人讲，讨论“非常艰苦”。阿布·伊亚德说：“苏联人对我们十分清疑，他们想知道关于我们的组织的一切。特别是想知道我们同中国关系的详情，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向我们提供武器的。”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布·伊亚德同他的苏联主人要么是大发脾气，要么是几乎大发脾气。“我气愤，并且非常直截了当。我说：‘我们已经不是一次敲过你们的大门，而是两次，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我们已经敲过你们的大门十次——你们没有一次回答。你们怎么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转向中国人寻求我们的武器呢！’”

像在他们之前的阿拉法特一样，阿布·伊亚德和哈拉德·哈桑带着一清二楚的印象离开莫斯科，即巴勒斯坦人不会得到苏联对他们事业的支持，除

非他们准备接受以色列在“六天战争”前夕所在边界内的存在。

因此，在 1968 年，苏联人采取的立场可以实实在在被称之为亲以色列、反巴勒斯坦的。我问哈拉德·哈桑，他和他的法塔赫领导层中的同事们当时有多大的失望，他回答说：“从感情上讲，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失望和非常沮丧。但是，我们也开始了解国际政治。在我们同苏联人的谈话中，一次我说了这样的话：‘对我认为你们正在告诉我们的事，请让我作一个概括。你们在说，要你们特别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和通常为我们阿拉伯人的原因，而被卷入同美国人的对抗，那是没门的。’苏联人十分坦率。他们回答的意思是：我是完全理解他们的。”

“关于这几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必须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苏联人对待我们法塔赫总是非常非常直率，也非常非常诚实。他们从不、从不、从不鼓励我们的武装斗争。他们总是、总是、总是说，以色列应当继续存在，我们阿拉伯人和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犹太国进行一项政治解决。我们对苏联领导人以直率方式对待我们，终于表示尊敬。我们对他们十分诚实。一次他们曾告诉我，他们宁愿同自称不是共产党人的法塔赫的右翼分子打交道，而不愿同我们的解放运动的‘左派冒险家’打交道。”

阿拉法特对莫斯科的访问实际上是现实旅程中的一个终点。这个旅程开始于上一年的 11 月，其时他为了同纳赛尔的会晤来到开罗。现在是清点存货的时候了。假使两个超级大国都要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要求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媾和，同样，埃及、约旦、黎巴嫩，或许还有叙利亚，也都是这样，那么，事情就清楚了，在和平进程甚嚣尘上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则被要求在两个痛苦之间作出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与那些准备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一起工作。这个选择要求解放运动放弃武装斗争思想，采用政治方式继续它的战斗，如果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为赢得对巴勒斯坦人的公正对待取得成功，或者至少取得进展。这个选择，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把巨大的和当时完全不合理的信任，寄托在他们所需要获得支持的阿拉伯领导人和政权的善意和能力上。它还要求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和人民接受阿拉伯政治现实的表演。

另外一个选择则是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的谈判解决，对抗那些赞成并在幕后努力寻求这样一项解决的阿拉伯政权。这要求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使自己成为第一个真正的阿拉伯革命的先锋。这个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要推翻那些正在打算或者已经同以色列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媾和的政权。这个真正的革命的第二个和更长期的目标，是要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和统一的阿拉伯社会。它要由民主政权所领导，这些民主政权又转过来要准备集结他们所有力量——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为了同以色列和它的那些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支持这个犹太国的大国同盟者进行一场最后的决战。那些赞同这项选择的人认为，为这项选择获得成功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就是阿拉伯的对抗意志和使之成为可能的阿拉伯的团结；而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则已经存在。

以色列人无疑要争辩说，巴勒斯坦人有一个第三种选择——他们应承认以色列和它的存在的权利。这个建议的问题是，如果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之前承认以色列，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要放弃曾经是他们自己领土的要求，并且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这是按照国际法的见解。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之前，巴勒斯坦没有而且不

能承认以色列的原因。

在 1968 年终临近时，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高级同事们秘密地倾向于把他们的信任寄托于纳赛尔的思想，并且在采取第一种选择。

对纳赛尔的感情和对他判断的尊敬给阿拉法特很大影响。纳赛尔的判断是，在这个被外国势力支配和控制下的世界，它们在以色列的存在中具有既得利益而不顾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那么，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又能获得什么呢？阿拉法特自己的结论或多或少与纳赛尔的相同。当我在同阿拉法特谈论关于他同纳赛尔个人关系的性质时，我问他，他把这位埃及总统视为父辈是否是真的。阿拉法特以一种对纳赛尔充满感情的语调回答说：“噢，是的。噢，是的。确是这样。我可以说他对待我们的事业如同一位教父一般。”

阿拉法特事实上没有改变他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和通过武装斗争所能取得成果的想法。如同伊亚德神父的证词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阿拉法特从未认真地相信巴勒斯坦人能够单独地用武装斗争解放他们的国家。尽管他不能公开地这样说，但他一直把军事道路看成是确立巴勒斯坦人地位的手段，以防止阿拉伯政权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撒手不管。在一开始时，纳赛尔曾经反对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思想，并曾力图消灭它。现在，他准备好支持它。如果纳赛尔支持的代价是采用政治方式继续斗争——如果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媾和或者媾和的前景发生——那么，情况就是这样的。纳赛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阿拉法特也是。

阿拉法特对采取第二种选择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深谋远算，是拒绝它的另一个理由。完全撇开他自己的“不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首要准则，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现存制度的政权之间的对抗，必然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更多死亡、更多损害和更多苦难。除非绝对必需，阿拉法特不准备使他的人民遭受更多损失，特别是能作另一个选择的时候。哈马德·阿布·西塔说“阿拉法特憎恨流血”，从我了解的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全部情况看，我确信他告诉我的是确切事实，阿拉法特绝非是一位凭藉幻想的革命的或者甚至激进的领袖。第二个选择不是他的保守的和中产阶级的准则所允许他采取的——除非可能作为一项最后手段的政策。

当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确定，同阿拉伯政权对抗以阻止它们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与以色列媾和——假定以色列人想在此基础上媾和——不会很好地服务于巴勒斯坦事业时，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理智和感情之间一场意志战的舞台被设置了起来。这将给予它的强大的敌人以打击的机会，他们希望在中东方程式中永远取消巴勒斯坦这一因素。

第十五章阴谋四伏和在约旦的灾难

在 1970 年 9 月 15 日，约旦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拜会了侯赛因国王。这些代表人人都是强硬的反巴勒斯坦派。这次会见是应这些将军们的请求而举行的。他们对国王说，如果他不下命令消灭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他们将把他软禁在他的住处，并且无需他的准许而自行其是。侯赛因后来对我证实了这件事。

按照西方报道的说法，在约旦的这场双方内战是为决定谁统治约旦而战的，是侯赛因还是阿拉法特。事实上，约旦危机的发展表明，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实际上是站在一边的。两人都在尽他们所能做的一切避免由他们自己的极端分子挑起的一种全面对抗。两人都很清楚，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同时在积极活动，在尽他们各自力量以确使在解放运动内部的一场危机变成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场灾难。

如果必须要把它归纳为人的因素，那么导致内战的对抗实质中的真正问题，在于谁统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亚西尔·阿拉法特，还是乔治·哈巴什。但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它也不真正是人的问题。

解放运动中的分歧在于政策。阿拉法特代表领导层中的某些人，他们认为解放运动必须同阿拉伯前线国家一起干，即使这些国家准备同以色列媾和。哈巴什则是那些赞成采用革命方式的人的领导人，他们认为革命必须从约旦开始，通过激发对抗以打倒侯赛因。导致内战的对抗不是发生在整体的均一的巴勒斯坦运动和约旦政权之间。它发生在这一运动中的一翼——就人数来说，是巴勒斯坦活动分子的一个小小少数派——同约旦政权之间。事实是，阿拉法特在他成为巴解组织主席之后不久，失去了在他自己一方对事态的控制。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对这场既非阿拉法特也非侯赛因想要的内战，阿拉法特在处理巴解组织内部分歧和危机方面应当受到多大指责呢？阿拉法特应当使用法塔赫占有巨大优势的军事力量去镇压那些正在挑起同侯赛因政权对抗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左翼分子吗？就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人数来说，他们是一个少数派。

当侯赛因回忆紧接在“六天战争”之后在大马士革的阿布·卡马尔饭店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的情景时，他说，“从第一次谈话来看，显然，阿拉法特同我对如何在阿拉伯失败后的新形势下指导我们的解放斗争，有着很不同的看法。”

在 1967 年底，哈巴什和其他相信他们能将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应用于斗争的人们组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人阵是由哈巴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和艾哈迈德·贾布利勒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发起的两个小游击组织合并而成。贾布利勒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是为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服务的一个阵线。过了一段时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再次分裂。按照大马士革的指示，贾布利勒从人阵分裂出来建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总部）：纳瓦夫·哈瓦特迈赫和他的支持者同哈巴什分裂，建立了人民民主阵线（民阵）。但是，哈巴什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继续是法塔赫的主要对手和主张革命道路的首要斗士。

到了 1968 年 12 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表明，就指导武装斗争而言，它所奉行的方针与法塔赫是多么的不同。法塔赫的方针是把暴力行动限制在巴勒斯坦本土。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领导层中的同事们知道，如果他们在

巴勒斯坦以外打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将与各国政府为敌，并且疏远国际公众舆论，而如果他们要推进他们的事业，他们对国际公众舆论是必须争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不同意这点。在 12 月底，该组织的两名枪手向停在雅典机场上的一架以色列客机开火。这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中东内外反对犹太人利益的一场恐怖运动的开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从此以劫持专家身份出现。这个组织的恐怖活动首领是瓦迪·哈达德医生。他经常领先作出行动，这类行动对哈巴什来说是太激烈了。当哈达德在阿尔及尔被一名外国情报人员投毒，最后在东欧死去时，哈巴什并未感到过分悲伤。在大马士革举行的哈达德葬礼上，哈巴什在他的悼词中表示了对他的这位老同事的不满。对一些巴勒斯坦人，包括法塔赫领导人来说，这是他们所长期猜测的一个证明，即哈达德曾经迫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走上极端道路。哈巴什知道这对巴勒斯坦事业是有害的，但是他无力制止。

为报复首次雅典机场事件，以色列人炸毁了停在贝鲁特机场的 13 架阿拉伯民航飞机。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奉命声称，以色列的报复是“一项傲慢的、不相称的行动”。以色列的做法之所以根本未能制止其民航飞机再次受到袭击，主要是因为哈达德感到他受到反对派的挑战，要显示他能做些什么。以色列的报复行为，给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当时最需要的宣传以及在一些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民眼中的一定的革命的信任。

从某种程度上讲，哈达德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中主张暴力的人是想坚决报仇。但是，他们的疯狂是一种方式，或者说他们是这样想的。人阵与法塔赫不同，它不是一个真正植根于广大群众基础上的民众组织。它基本上是一个由被激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这些知识分子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像落水者发现了可以紧紧抓住的漂浮物。但是，他们知道，向巴勒斯坦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共产主义同阿拉伯主义不是天然盟友。因此，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打击以色列的利益来赢得巴勒斯坦群众的注意力，然后再进行教育和灌输。总而言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认为，用这种方式，它能够同法塔赫竞争，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最终把它自己建成一个群众性组织。

但是，驱使哈巴什、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声称赞成革命方式的激进的个人和团体的真正动因，在于恐惧他们在谋略上被阿拉法特取胜，恐惧如果法塔赫被允许来统治解放运动，则到头来在以面对现实的名义下它将作出众多妥协，以致巴勒斯坦人将一无所获。事实上，主要目标在于阻挠和破坏在阿拉法特的法塔赫与那些正在谋求与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和约旦之间的正在发展中的伙伴关系。

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的、激进的团体在 1969 年 2 月感到惊恐，因为法塔赫在纳赛尔的帮助下参加并有效地控制了巴解组织。这一事件发生在开罗召开的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在总数为 105 个席位上，57 个席位分配给各游击队组织；在 57 个席位中 33 个分配给法塔赫。其结果是，法塔赫处于得以保证阿拉法特当选主席职务的地位。

从某种观点上看，可以说左翼的和激进的团体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法塔赫的行动自由现在是由宪章所规定的目标和政策所决定的。在理论上说，宪章是解放运动的圣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宪章规定所有巴解组织成员必须保证以武装斗争来实现彻底解放，而且这一点按照宪章中的话说，只

有在“为此问题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成员”赞成才可修改。由于反对法塔赫道路的那些人很可能在当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中占压倒多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获得修改宪章的三分之二多数是不可能的。因此，阿拉法特的手是被束缚着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法塔赫在各解放组织和阵线中是最大的、最强的，并且最受群众拥戴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执行不符合宪章的政策。正如时间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法塔赫领导人从没有公开这样说过，他们事实上没有想到要受宪章原后的约束，如果宪章的这些规定在他们看来不能为他们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的话。

在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闭会以后的几个星期，一个戏剧性的新闻出现了。它证实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最担心的事，即巴解组织的政策导向要由法塔赫掌握，而阿拉法特出任巴解组织主席。这项消息的带信人是哈拉德·哈桑。他是曾经当选为十五人的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中的四位法塔赫领导人之一。他当时任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这样，除其他事务外，他负责对外政策。哈拉德在4月返回约旦，带着他取得的第一次外交胜利，从历史角度看，也是他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一次外交胜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说服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支持法塔赫，并通过法塔赫支持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和主张。沙特阿拉伯对法塔赫支持的重大意义不能被认为是言过其实。正如时间所证明的，法塔赫有沙特阿拉伯站在它的一边，是不可摧毁的——只要它奉行沙特人所能赞成的政策。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在安排法塔赫掌管巴解组织时，曾经问及埃及总统关于埃及为解放运动提供一些财政支持的可能性问题。哈拉德·哈桑在同我谈话时非常坦率地谈到法塔赫当时的经费困难。他说，“我们穷极了。我们有一些武器和弹药，因为中国人自1964年以来一直经常地负责地向我们提供。事实上，我们表示要向中国人付费，但是他们总是坚持我们应当把他们的帮助作为礼物来接受。但是，当我们接管巴解组织时，我们无钱支付生活费用和行政开支。老实对你说，我们甚至已无钱填饱我们自己的肚子了。”

纳赛尔无法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他建议他们在这方面应当转而寻求沙特人的支持。当哈拉德·哈桑动身去沙特阿拉伯，乘汽车、骑骆驼旅行，企图非正式地进入这个国家时，他发誓他要完286成他的同事未能在那里完成的任务。在他之前，阿布·伊亚德、阿布·杰哈德，甚至阿拉法特本人，都曾叩过沙特阿拉伯的大门。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一切是，除非国王发话，大门是不会对他们打开的。而国王现在无意这样做。哈拉德知道，他无论如何必须见到费萨尔，这是他此行的目的。

为什么费萨尔是如此不愿意接见法塔赫的领导人呢？为什么他甚至不准备听取一下他们援助的恳求呢？费萨尔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当代没有一个人，包括那些在华盛顿权力走廊上踱步的强硬分子，比这个沙特君主更狂热地反共。某些西方情报机构，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已使沙特政权确信，法塔赫领导人是共产主义分子。哈拉德说：“这完全是使我们遭受怀疑的卑劣谎言。费萨尔是一个非常聪明而机敏的人，他通常总能识破西方欺骗他的种种图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自己抱有的强烈意识，他听信他被告知的关于我们的一切，而没有产生那么多的疑问。”

哈拉德微笑着形容为在法塔赫与费萨尔之间“误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舒凯里在成为巴解组织第一位主席前后的行为和态度。沙特人从不饶恕舒凯里那些日子里成为纳赛尔的人，当时他被认为在联合国正为他们工作。当舒凯里作为纳赛尔傀儡的巴解组织的主席，号召推翻所有阿拉伯反动政权时，在沙特人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但是，现在舒凯里已不在位，巴解组织是在新的领导管理之下。哈拉德希望能够在沙特阿拉伯实现新的开端。

当哈拉德抵达沙特时，他此行拥有的唯一东西，是一位具有一个有用姓名的朋友——法赫德·马拉克。这位沙特先生是一名外交官。哈拉德说：“法赫德·马拉克 1948 年在巴勒斯坦参加过战斗。他生平一直认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是他终生的职责。他从一开始就在经济上支持我们。”显然，法赫德·马拉克也是在沙特王国中极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事先未得到费萨尔点头同意情况下就准备帮助巴勒斯坦人。

哈拉德继续说道：“我的朋友把我带到利雅得的雅玛迈赫饭店。正如你所知道的，来访者是不允许得到房间的，除非有政府、公司或沙特公民作为保证人。饭店接待人员问法赫德·马拉克，谁在为我作保。我的朋友回答说：“法赫德”。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姓氏，也是王储（现今国王）和内政部长的姓氏。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这位接待人员以为我是王室的一位宾客！我的朋友选择了这个特定的旅馆，因为法赫德王储的许多客人都在此下榻。

“由于相信我是王室的一位宾客，他们为我安排了一个豪华的套间。在以后的 8 天中，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我给许多知名人士打了电话，我得到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人在这里。’随后，我收到阿拉法特的一份电报，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怀疑是否我已在沙漠中失踪了！”

正是阿拉法特的电报，使哈拉德产生了第一个巧主意。这位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毫不迟疑地坐下来，给巴解组织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尚未见到国王，因为国王陛下实在太忙，但预期会见会很快实现。在对费萨尔作出热情而诚挚的称赞之后，哈拉德用这样的话结束了全信：他确信“像费萨尔这样的人绝不会加害于我”。哈拉德并没有意思发出此信。他把未封口的信留在套间的写字台上，外出散步去了。他知道在他外出时会有人看到此信，信的内容会传到有关当局那里去的。“但是，我的小把戏没有成功，”哈拉德说道。仍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天或两天过后，一个偶然机会，哈拉德得知费萨尔的私人医生是一位巴勒斯坦人，此人曾在海法当过哈桑家庭医生。哈拉德和法赫德·马拉克邀请他出席晚宴。他应邀来了，哈拉德向他谈了自己的使命和他渴望拜会费萨尔的心情。哈拉德告诉我：“我被劝告向这位医生讲出一切，因为人们知道他会把我讲的每句话报告给国王。他这样做了，但是从国王陛下那里仍无反应。此后，我试图会见王室的一些亲王，但是我被十分率直地告知，没有人能帮助我，除非我见到国王。

我打断了哈拉德的故事，问他到这时他是否在开始感到他已经失败了。他回答说：“不，我仍然把我的使命看作是一种挑战。但是，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地沮丧……20 多天来每天 24 小时呆在我的旅馆房间里，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没有书可读，没有人可交谈。简直糟透了。”

哈拉德这时十分失望，准备冒险行事。他获悉这位国王每周为各部落领袖们举行一次“非礼仪性”的会见。哈拉德说：“对来自部落的人，按照礼

仪行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领袖们不受检验，径自到达，等待依次会见国王陛下。”

在这个星期规定的一天，哈拉德穿着打扮得像一位部落首领，加入了正聚集在一起等待会见的 100 名真正的沙漠之子的行列。当每一个人依次接近这位国王时，他仔细观察着。有些人向他递交请愿书并简单致词。也有人喜欢多讲话。当每个人离开时，这位国王向他的侍从低声发出指示。

突然，轮到哈拉德这位冒充者面见国王了。“我说：‘您好，陛下。我是法赫德的哈拉德·哈桑。我目前正住在雅玛迈赫旅馆，我来这里是要会见您。在我能真的会见您以前，我不会离开利雅得的。很感谢您。’然后我就走开了！”

法赫德·马拉克此时正焦虑不安地等着哈拉德。他在等待时曾闪过再也见不到他的朋友的念头。“法赫德问我，是否见到了国王。我说：‘见到了。’他说：‘你同他握手了吗？’我说：‘握手了。’法赫德问：‘他说了任何反对你的话吗？’我说：‘没有，他只是在望着我微笑。’”

这两位共谋者这时尽其所能迅速传播哈拉德受到国王接见消息。虽然事实尚不能完全证实，含意是哈拉德也已得到了费萨尔的同意。当天晚些时候，由于法赫德·马拉克的努力，哈拉德被邀请出席了在费萨尔姻兄弟家举行的晚宴。

哈拉德继续说道：“在黄昏来临时，这位国王的姻兄弟和他的客人们进行祈祷。我加入到他们的中间，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问：‘你是一个具有西方生活方式的人，你也祈祷吗？’我说：‘为什么不呢？’他们于是迷惑不解。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大笑起来并且告诉他们，我绝对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且从来也不可能是。”

在夜幕即将降临时，这位姻兄弟的兄弟有几分钟不在场。哈拉德说：“他返回时拿来了一枝加里什尼科夫来福枪和一支左轮手枪。他问我是否我愿作为礼物收下。我说，‘难道你想看见我被关在监狱中吗？如果我带着这些武器回到旅馆，我会被逮捕的。’这位兄弟笑了。他说：‘好吧，当你离开时，我将在机场把它们交给你。’我感谢他，但是说，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我携带武器抵达安曼，我会被约旦人逮捕并投入监狱。这位兄弟十分吃惊。‘这是真的吗？’他问我。我说：‘确实如此。’他更为惊奇。他说，‘你的意思难道是在告诉我你们正在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战斗而你们却不允许拥有武器？’我告诉他情况正是这样。这也正是我为什么来到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原因。接着他说了如下的话：‘我向你保证，这两支枪将同第一批装船武器从沙特发往安曼。’”

在哈拉德来到沙特阿拉伯的第 23 天的下午，他所居住的旅馆套间里的电话第一次响起了铃声。电话线的另一端的声音通知哈拉德，他会见国王的时间定在当晚 8 点。

当晚 7 点 55 分时，哈拉德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典礼局长告诉他，由于国王还有许多会见，他同国王谈话只能有 15 分钟时间。哈拉德对我说：“对典礼局长，我说：‘好，谢谢你。’对我自己，我说：‘这是荒谬的。在 15 分钟的时间里我能得到什么？答案是什么也得不到。’我很沮丧，随后，在我将要进入这位国王的房间时，某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回首观望，看见卫兵正在伸举起他们的手做出祈祷的样子，愿真主祝福我会见国王陛下成功。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我哭了。当我同费萨尔握手时，我仍在努力控

制我的泪水。”

在这次历史性会见时刻，是费萨尔而非纳赛尔是阿拉伯世界实际领袖的这一事实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广泛承认。只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法塔赫的政治对手和人数较少的其他阿拉伯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否认这一现实。纳赛尔在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仍是占有特殊地位的超乎所有其他人之上的领袖。大多数普通的阿拉伯人并不真正了解以色列和西方处心积虑破坏纳赛尔在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中的机遇，他们似乎本能地以为他是一位远比环境允许他作得更好的领袖。因此，纳赛尔仍能获得阿拉伯群众的爱戴。然而，哈拉德·哈桑目前准备使之卷入的却是通过石油而获得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一位人物。

瞬间，哈拉德容许自己闪过这些相似的想法，他很快重新恢复镇静。随之他意识到所在的危险处境。如果不能说服费萨尔支持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事业，那么像哈拉德和他的同事那样的温和的、务实的人能够影响巴勒斯坦事态发展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哈拉德继续说道：“我们开始谈话后，这位国王离开他的办公桌，在长沙发椅上坐在我的身旁。由于我的心中有那么多事，要说的话又那么多，我十分焦急，因为费萨尔按照通常准则在限制着我们谈话时间，而时间又迅速流逝。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在20分钟过去后，典礼局长走进来，提醒这位国王他的下一个约会。卫兵的祝福声在呼应着。然而，费萨尔注视着我的目光却不离开，他用一只手的手指做了一个小的几乎不能觉察的姿势。这是信号，表示他不想再有任何约见。我的心情大大宽解下来。”

4个小时过后，这两个人仍在谈话，但是，哈拉德没有理由感到庆幸。他说：“4小时后，我不能从他的脸上或者眼里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我已经使他信服。我开始想我已经失败了。我还没有提出援助的特别要求。”

同费萨尔有直接接触经验的所有人，包括我本人都知道，同他详细谈话是一种考试般的难熬的经历。费萨尔从不或者几乎从不直截了当说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宁愿以寓言般的方式说话。有一次在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以后，我大胆地问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说话。这位国王流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淡笑。他通过一位翻译说了下面的话：“如果我说了错误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以错误的方式说了正确的东西，中东将起火被烧毁掉。”

午夜过后不久，哈拉德决定他必须采取主动。“我鼓足勇气，我对费萨尔说了如下的话：‘陛下，在我看来，您好像不想充当中东的统治者和救星。’他答道：‘谁说我想这样作？对我来讲，在麦加做真主的仆人就足够了。’我说：‘陛下，我的意思不是说您自己想作中东的统治者，或者控制这一地区，我是在谈论关于您的信仰和思想。’这位国王回答说：‘这同你来到沙特阿拉伯的原因有什么关系？’我意识到，这是我以环境所能允许的坦率程度讲话的机会了。

“我说：‘陛下，我们巴勒斯坦人正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我们的权利而战斗，这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只有左派人士在支持我们。（正如费萨尔所知，哈拉德主要指的是中国人。）这不是我们法塔赫里的人要这样。我们不想受任何外国意识形态，受任何政府或领导人所制约。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独立，但这只有我们能从多种来源得到支持才能做到。您能帮助我们独立吗？如果您不帮助我们，我们将被迫只同那些现在正在支持我们的人在一起。’

“这位国王保持缄默，我仍然说不上来他在想些什么。我决定以一种我知道会吸引他注意力的方式来概述我的情况和理由。我说道：‘陛下，让我们假设您是在沙漠中，骑在骆驼上，带有充足的水，而我正向您走去，濒临渴死的边缘。如果我向您索水，您将给我一些水，并让我同您一起骑上您的骆驼吗？’这位国王答道：‘当然，是的，这是我们的传统。’我说：‘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在一起旅行了一段路，我向您再次索水，您告诉我，我可以得到，只要我准备为您做些事情。即使我不想这样做，我能拒绝您所要求的事情吗？’国王答道：‘也许。’我说：‘尊敬的陛下，对您要求的任何事情我不能说不，因为您将抛弃我，而我将会死去，因此，我别无选择。’国王说：‘这是合乎逻辑的。’我继续说：‘现在，让我们设想，当您正在向我提出要求时，另外一个人骑着骆驼带着充足的水出现，这时，如果我不想做您要求我做的事，我可另有选择，因为我可以从另外的那个人那里得到水，您同意这看法吗？’这位国王说：‘是的。’最后我说：‘陛下，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不得不只从一个来源得到援助，我们将受到制约。只有当我们有许多人愿意向我们提供支持时，我们才是独立的。’”

哈拉德是筋疲力尽了。但这已无关紧要，他能说的影响费萨尔的话都说完了。在随之而来的静寂中，哈拉德注视着这屋里的那位第三者靠紧这位国王，这位第三者是拉什德·法龙，他是费萨尔最信任的顾问之一。

按照哈拉德的记忆，这最后几分钟的谈话进行如下：

费萨尔：“拉什德，给予哈拉德他所要的东西。”

哈拉德：“不，陛下，首先我要从您这里得到一些东西——然后再从拉什德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

费萨尔：“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哈拉德：“我希望您对所有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一项解放税，该税占他们工资的5%。”

费萨尔：“同意。还有别的吗？”

哈拉德：“我们需要从您个人那里得到一些列名的财政支持。”

费萨尔：“可以，还有别的吗？”

哈拉德：“我们也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一项列名的财政支持。”

费萨尔：“一年1200万美元够吗？”

哈拉德：“那是足够了。”

费萨尔：“还有别的吗？”

哈拉德：“我们需要武器和弹药。”

费萨尔：“可以。拉什德，你去进行必要的安排。务必使哈拉德得到他们需要的而我们可能提供的任何东西。”

第二天，哈拉德会见了一位沙特高级陆军军官。就这一次，这位非凡的巴勒斯坦人可就力所不及了。“我对这位军官说：‘你瞧，我不是一个军人，我不了解武器。但是，我们是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武器和弹药。您能否为我开列一份适用的武器、弹药的清单并说明从那里可以得到它们吗？’这位军官说：‘当然可以。’他制定了这份清单，我把它交给了拉什德。第二天就获得同意。”

哈拉德回到安曼。“两个星期之后，”他说，“28辆大型沙特陆军卡车载着武器和弹药抵达。沙特人把它们分发给遍布在约旦各地的我们的基地。他们曾经在利雅得给我的那支加里什尼科夫来福枪和手枪，也送给了我本

人。”

哈拉德第二次会见费萨尔是在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哈拉德说：“我最后一个同这位国王道别，以示敬意。我对他说，‘陛下，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说道：‘瞧，哈拉德，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你们所代表的事业。因此，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他停顿了一下，随后补充说道：‘但我必须告诉你，人民在他们的前额上有成功的标志。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费萨尔此后活了6年。在此期间，没有人比哈拉德·哈桑同他保持着更密切的关系。哈拉德同沙特人没有密约，没有交易合同。正如哈拉德所说的，“这不是沙特人的工作方式。”但是，在哈拉德同费萨尔之间，随后在哈拉德同费萨尔的继任者之间，未明言的协议是，只要法塔赫控制的巴解组织倡导沙特人所能支持的、不破坏他们同美国特殊关系的政策，沙特阿拉伯会竭尽全力以政治手段推进巴勒斯坦事业，不管谁试图摧毁它，沙特都会站在巴解组织一边。

巴解组织新的主席利用费萨尔赠送的武器弹药，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逐步升级。他必须这样做，除非同犹太国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妥协方案取得进展。按照以色列人的记载（他们的统计要比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惊人宣称较为可靠），恐怖主义的渗透活动和事件在1967年为97起；在1968年为916起；到1969年则为2432起。在这3年中，以色列的伤亡人员先后为78人，273人和243人。

在一个10分的比例尺上，可以说阿拉法特使冲突逐步升级达到3分。以色列人的回答则使冲突逐步升级达到8分。（10分表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在1982年夏围攻贝鲁特。）直到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主席前后，以色列人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行动的回报满足于来一还一，或者多半是在许多行动后发动一次攻击作为报复。以色列人以这两种方式之一作出反应。到1969年初，这项政策被放弃了。为了反对阿拉法特逐步升级，以色列人采取了一项新的“积极自卫”政策。它的实际含意是以色列人不再满足于作出反应。从此以后，无论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出现在哪里，以色列人都对他们发动进攻。

同轰炸（主要用空袭）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的基地一样，以色列也袭击约旦的一些极重要的设施。例如，在6月，以色列突击队破坏了东古尔水渠，这是美国人援助约旦和约旦农民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样品。在8月，这条水渠刚刚恢复，以色列人又加以破坏，致使约旦最好的500平方英里农业土地上的水果和蔬菜烂掉。以色列的这些恐怖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迫使侯赛因控制并击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

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以色列组织之间的对抗在一条战线上逐步升级的时候，它也扩展到其他地方。在1969年初，阿拉法特派遣他的500名游击队员进入黎巴嫩南部，命令他们准备从那里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出于我已经说过的原因，法塔赫的领导人不愿使黎巴嫩卷入战斗；但是，在1969年，他们考虑到已别无选择，正如阿布·杰哈德所解释的：“由于以色列在约旦如此猛烈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变通做法。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采取相应行动。当以色列人弄得我们在约旦呆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越过黎巴嫩边界发起一些战斗。”巴勒斯坦这些小人物1967年在阿拉伯世界主动行动带来如此灾难性后果后，纳赛尔再也没有允许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从

埃及土地上向以色列发起袭击。

在 10 分比例尺上，阿拉法特沿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界使对抗升级达到 2 分左右。以色列用大炮猛击、空中袭击和被称为搜索一摧毁行动的偶然的小型入侵，使对抗升级达到 6 分。正如在约旦一样，以色列使用它的庞大的优势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打击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而是以军事手段企图说服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不向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提供庇护所。以色列的另一个目的是说服贝鲁特政府采取行动。

以色列决定对在黎巴嫩南部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发动战争，导致阿拉法特的战士和黎巴嫩军队之间经常的、日益严重的冲突。在幕后，正如纳赛尔当时告诉阿拉法特及其他法塔赫领导人一样，他请求贝鲁特政府保持克制并给他以更多时间。据法塔赫领导人说，纳赛尔告诉黎巴嫩人，他和侯赛因正在竭尽全力劝说美国迫使以色列作出必要的撤退，以谋求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实现和平。纳赛尔还对黎巴嫩人说，他有信心，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将不会阻挠这样的和平，并且会同意为实现和平将采取政治方式继续战斗。

一些美国人在开始听取侯赛因、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意见。所以当这位埃及总统告诉黎巴嫩人他们的克制也许会得到报偿的机会时，他没有加以夸大。

从 1969 年初开始，纳赛尔和侯赛因曾表演一种双重行动向美国施加压力，以促使以色列撤回到它在“六天战争”前夕所在的边界之内。纳赛尔在进行射击，侯赛因在从事谈判。

3 月，纳赛尔向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开火，发动了后来所称的他的消耗战。它持续了 16 个月，实质上是一场限于大炮和坦克的火力交往的静态的战争。自然，以色列领导人把纳赛尔的行动说成是再一次证明他是和平的敌人。但是，正如以色列领导人所了解的，事实完全相反。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加温，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他们他仍然能够伤害他们，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他们认识到他们也需要和平。第二个信息是对美国人的。对他们，纳赛尔在转达阿拉伯人的沮丧心情，并警告美国政府，除非他们利用他们的影响迫使以色列实现和平，否则战争的趋势会继续发展。

4 月，侯赛因去华盛顿向美国人转达同样的信息，但是，这是通过正式的外交方式。正如这位国王后来向我证实的，他强调，他和纳赛尔及多数其他有关的阿拉伯领导人都非常愿意和以色列媾和，但是，他和其他希望和平的阿拉伯领导人都无法公开采取任何行动，除非以色列至少承诺撤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边界线。

在侯赛因刚刚离开理查德·尼克松之后，这位总统说：“我们要开始帮助这位国王。我们不能让美国的犹太人制定政策。”不幸的是，还得经过五年，尼克松才懂得，阻止以色列和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来指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是真正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多么重要的事，但是，到那时，这已经太晚了——尼克松被卷进了水门事件。

在 1969 年，应该成为主管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人是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正在试图尽他们最大努力来拟订一项纳赛尔、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

所能够接受的和平计划，它将赋予 242 号决议以实质内容和意义。不幸的是，他的地位、他的权力和他的思想正在被尼克松的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所破坏。

当时，基辛格反对任何要求以色列人放弃其所占领土以换取和平保证的倡议。很明显，任何一个对局势持理智看法的人都认为，没有以色列至少承诺撤退，就不可能有和平。必须指出基辛格在当时就是反对和平本身。基辛格的观点是，以色列的撤退，或者即使以色列愿意讨论撤退，将成为阿拉伯（主要是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和左翼分子的胜利，他们的恐怖袭击那时会被看作是是正确的。这也会成为重新武装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人的胜利。如基辛格完全无视苏联承诺以色列在 1967 年 6 月 4 日边界内的存在这个事实，他似乎也不能把握这一局势，即以以色列不作出撤退的承诺，这就为所有各种阿拉伯和穆斯林极端主义的生长创造条件。哈拉德·哈桑作为阿拉法特和所有他的法塔赫同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代言人，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不得不说的第一件事是基辛格毫不理解在中东发生的事。但是，更严重的是，他并不想去理解。对基辛格来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只不过是全球棋盘上的小卒子。对基辛格来说，关系重要的棋手则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那些人。除此之外，基辛格被两种思想所迷恋。其一是，他，基辛格，是西方最卓越的人物。我猜想他在入睡时会告诉他自己，如果美国人真是明智的，他们总有一天会选他当总统。不管怎么样，他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个人权欲。其二是，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包括在中东发生的种种麻烦，背后都有苏联人插手。我本人不认为基辛格真的相信这种胡言。我认为，他是在宣扬，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他是美国军事工业联合公司的使者和俘虏。那些控制公司的人是他的真正的后台，他必须说出他们所要说的话，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如果你要我非常直率地说，那我愿再讲一点：我认为基辛格是一个政治娼妓，更明白他说，如果他为他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所作所为而憎恨自己，我不会感到惊讶。以后我愿向你证明，他还是一个可怕的说谎者。”

在 12 月 9 日，国务卿罗杰斯草拟了他的计划纲要。它要求埃及同以色列媾和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沙漠撤出，除此之外，罗杰斯呼吁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谈判，以最终达成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西岸换取和约旦媾和，并解决耶路撒冷未来归属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由于罗杰斯和他在国务院中他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长期以来就确信，纳赛尔在他私下表示的谋求和以色列媾和的愿望是真诚的，美国计划的要点一个月前就被转达到开罗。纳赛尔告诉华盛顿，尽管他欢迎这一迹象，即美国终于想方设法来对付在阿拉伯前线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的真正障碍——以色列占领在“六天战争”中所强占的阿拉伯领土——他不能和犹太国进行单独媾和。换句话说，正如他也对美国人和后来对法塔赫领导人所说的，纳赛尔希望有一个为求得全面和平的美国计划——全面和平换取全面撤退。侯赛因是失望的，因为罗杰斯计划没有把以色列从西岸撤退作为和约旦谋求和平的一个条件；但是，他对纳赛尔本人的保证感到满意，埃及将不走单独媾和的道路。

以色列的反应是迅速的并可预料到的。果尔达·梅厄召开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罗杰斯计划遭到拒绝。以色列对第一个罗杰斯计划拒绝的仅有的得益者，是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赞成革命方式的那些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和激进团体。他们现在在损害法塔赫现实主义者的情况下

开始挣得大量政治和宣传资本。

虽然阿拉法特及其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没有公开说过，同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一起工作是他们的政策，即使在阿拉伯前线国家同以色列媾和的情况下，他们也准备以政治方式继续他们的斗争；对那些赞成革命方式的人来说，这是明明白白的，确实这是法塔赫的政策，而它无意为宪章所束缚。以色列对第一个罗杰斯计划的拒绝，意味着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可以指责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并向他们提出一些麻烦的问题，加以质询。他们争辩说，阿拉伯政权设法劝说美国人去做的就是制定这样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忽视了巴勒斯坦人的正义要求。以色列人加以拒绝；美国人像通常一样屈服于以色列，而阿拉伯政权则对此难以作为，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傀儡。武装斗争和革命是解放的唯一道路。

在以色列拒绝罗杰斯计划的日子，法塔赫的领导人很清楚，那些赞成革命方式的人的论点正说到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心里。甚至许多法塔赫的忠诚战士也开始说，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蛮有道理。现在不是有充分理由可以用推翻侯赛因的办法在约旦开始这场革命吗？

法塔赫领导人感到十分担忧的是，他们被指责出卖给那些要同以色列媾和的政权。这种担忧的迹象在以色列拒绝罗杰斯计划后不久召开的拉巴特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明显地流露出来。这次会上最突出场面是哈拉德·哈桑和纳赛尔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哈拉德告诉我：“在读到一份正式声明后，我说，我不认为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有试图同以色列媾和的任何理由。我说，这是明白的，以色列人拒绝一切，他们宁要土地不要和平。我向纳赛尔建议，他应放弃谋求政治解决，而应团结阿拉伯人去战斗。纳赛尔大怒。他扔下他的文件，离开了会议室——但是，这不是发生在他说我是一个‘梦想家’之前，不是发生在他说团结这种东西在阿拉伯世界将永远不存在这样的话之前。”事实上，纳赛尔在他因暴怒而冲出会议室之前说了许多话。他对谁将去进行战斗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他自己的回答没有说出口，但含意是，如果发生另一次欲争，他的阿拉伯同事们会再一次制造借口或者同以色列进行秘密交易而站在战斗之外。纳赛尔明显暗示，他的阿拉伯同事中的许多人是没有勇气的、空喊的伪君子。据法塔赫领导人说，正是在这同一次首脑会议上，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告诉纳赛尔说，他对叙利亚的虚伪极为“厌恶”，以致他正在撤回他对埃及企图和以色列达成一项政治解决一事的反对。

哈拉德进而说道：“在首脑会议之后，我们终于了解到关于纳赛尔为什么如此发怒的特殊原因。美国人已经告诉他，他们正试图改进罗杰斯计划。他们已经采纳了纳赛尔不能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观点，正要提出一个纳赛尔和侯赛因能够接受的全面的方案。换句话说，美国人已经告诉纳赛尔，第二个罗杰斯计划将要求以色列从埃及领土和两岸撤出。可是对美国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他们会有一段艰难的时间来说服以色列人接受第二个罗杰斯计划。美国人曾经要求纳赛尔帮忙，要他尽最大努力，确保拉巴特首脑会议不通过任何激进的或者反对的决议。通过海卡尔，我本人看到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两位大使的信件，要求大使尽一切办法来劝说阿拉伯领导人阻止阿拉伯激进分子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上表达自己的主张，如果可能，使首脑会议延期。”

我认为，哈拉德激怒纳赛尔，大概是有计划安排的，可以这么说，是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商量后作出的，以便给法塔赫这样一个机会，向它自己的支持者表明它没有向那些要和以色列媾和的阿拉伯政权出卖灵魂。哈拉德不得不成为做这件事的一个人，因为解放运动中激进分子正针对他及他作为法塔赫右翼领导所阐述的主张，集中火力，口诛笔伐。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较早时候曾经力图用破坏沙特在黎巴嫩的输油管道来阻挠法塔赫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在拉巴特暴发的愤怒看来在一个短时期内损害了法塔赫和纳赛尔的关系。但是，在 1970 年初，这场不和修好了。法塔赫的领导人向纳赛尔说明他们为什么不得不表明他们不是他的傀儡的原因。作为回报，纳赛尔告诉了他们所有他知道的关于不断发展中的和平进程。哈拉德说：“纳赛尔非常坦率，非常诚实。他说了以下的话：‘美国人曾经告诉我，我可以在任何我愿意的时刻收回西奈。但是，我对此并不在乎。问题是西岸和加沙，除非以色列人从那儿撤出，否则我将同他们媾和。’为了向我们证明他是真诚的，纳赛尔接着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并使我们十分吃惊的事情。他说，追溯到 1967 年喀土穆首脑会议时，他就曾授权侯赛因，为了使以色列人撤出西岸，他同美国人怎么干都行。”

从哈拉德告诉我的情况来看，很清楚纳赛尔为失去西岸而内疚；而这终究是埃及的将军们在向纳赛尔、以后又向侯赛因谎报战场军情后，迫使约旦卷入“六天战争”的。

在纳赛尔和法塔赫之间，在 1970 年初有一个默契。如果巴解组织不想去破坏阿拉伯国家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和以色列媾和的尝试，如果出现了和平，巴解组织同意采取政治方式继续它的斗争，那么纳赛尔会尽一切努力说服侯赛因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自然，他们还能得到加沙。当我问哈拉德，他是否能确认，这就是实际上的默契。他答道：“是的，你是对的。但是，作为提供证据的东西，我必须说，即使我们法塔赫人也尚未想过以西岸和加沙的状况为根据来作为我们承认以色列的代价。”

由于同意和纳赛尔一起干，法塔赫领导人也必须承诺他们自己同侯赛因合作，因为纳赛尔和侯赛因两人在和平进程中是合伙者。所以，对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说他们是亲纳赛尔、反侯赛因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抗约旦政权并推翻国王，这不是也不能是法塔赫的政策。

但是，即使当法塔赫领导人告诉纳赛尔他们准备和侯赛因合作时，这很清楚，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推翻这位国王的号召，在原则上和感情上，受到大多数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支持——包括现在法塔赫忠诚战士的大多数。在处理这一情况时，给阿拉法特增添了明显的困难，因为一种广泛流传的看法是，只要这位主席发话，侯赛因就能被推翻。

第一个引起我对这一事态注意的法塔赫人士是这样一个人，他 1970 年在以色列最需要索拿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名单上名列前茅。他的名字，或不如说他的斗争化名，是阿布·达乌德。在这本书里，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他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坦率他说话”。当法塔赫的一些人，在巴解组织在约旦被压垮和逐出之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时，以色列和约旦情报人士断言阿布·达乌德是被称之为“黑九月”组织的出谋划策者之一。事实上阿布·达乌德不是一个“黑九月”恐怖分子。当恐怖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组织实施一项推翻侯赛因的秘密计划——由于他在约旦被出卖并被囚

禁，这项秘密计划破产。

1970 年，阿布·达乌德是巴勒斯坦在约旦的所有民兵队伍的司令员。这意味着他处于可能的最有利地位，得以了解广大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们正在想什么。

“但是首先让我告诉你当时我自己的感觉，”阿布·达乌德说，“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打倒侯赛因。其次我要坦率地对你说，这不只是左翼分子和在其他游击队组织中的所谓激进分子的想法，这也是我们法塔赫的绝大多数人——战士和年轻军官——的想法和愿望。在我们当中——我现在所讲的是指法塔赫的年轻军官——我们非常认真和十分经常地讨论推翻侯赛因的问题。我们也同阿拉法特讨论我们的观点。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不采取行动反对侯赛因。我想，这是某种证明，说明我们是一个民主组织。不管怎样，阿拉法特总是说，‘不’。他对我们说，用战争来反对侯赛因或任何阿拉伯政权不是争取解放之路。”

我问阿布·达乌德，为什么他和其他人曾经如此确信侯赛因能被推翻。

“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并且由于像今天这样的形势，有许多人——我可以肯定包括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在内——宁愿真相不被泄露出去。但是，我本人认为，不再有任何理由掩盖它。

“基本的事实是：从 1968 年卡拉玛战斗时起直到 1970 年 6 月，我们法塔赫人受到大约 50% 的约旦军队的支持。在 1970 年 6 月之后，部分地由于我们运动中左翼分子的愚蠢的和罪恶的活动，我们开始失去这种支持。我们稍后可以说到这些愚蠢的和罪恶的活动。这样，在 1970 年 6 月之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机会。但是，在那以前，从卡拉玛战斗时开始，我们法塔赫人，加上那些支持我们的约旦军队，曾经有可能改变在安曼的这个政权。”

阿布·达乌德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不认为指名道姓他说对我说来是明智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在 1968 年至 1970 年之间，有好几次约旦军官接近法塔赫，问我们愿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发动政变。有一次一位十分亲侯赛因的军官试图同哈巴什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达成一项交易，但是，这是一个圈套，当反政府的军官接近法塔赫时，他们是很认真的。但是，阿拉法特和我们的领导人总是说：‘不。’要理解这点，你必须知道约旦真实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它部分地是多次未遂政变的历史。在多次失败之后，那些想要更迭安曼政权和制度的人害怕单独行动。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合作的原因。”

据阿布·达乌德说，法塔赫及其在约旦军队中的朋友的最好时机是在 1970 年 2 月至 6 月期间。正如他所解释，这段时期，由于以色列的猛烈进攻，以及随后对罗杰斯计划的拒绝，这是表明以色列要继续在西岸停留下去的第一个真实证据，巴解组织和约旦的态度正在变得日益强硬。以色列人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强征在希伯伦（即哈利勒）的阿拉伯人土地，并把犹太人家庭定居在这里。对约旦军队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纳赛尔和侯赛因要乞求美国帮助其和一个蛮横的、侵略性的和彻底不妥协的以色列媾和。

假设，在法塔赫忠诚战士中，随随便便地就能找到多数人赞成与侯赛因政权交战并一直战斗到底，那么为什么法塔赫领导的不对抗政策能占上风？我向阿布·达乌德提出这个问题。他答道：“回答并不太复杂。不同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和激进团体，我们法塔赫人有一定纪律。这是

一点。另外一点是，我们是一个民主组织。从一开始我们就同意，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讨论我们的内部分歧，但是，在我们内部的会议上，我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我们想说的意见。即使是我们最缺乏经验的战士，也可以自由地批评领导人，告诉阿拉法特他错了。因此，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我们准备好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且还有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法塔赫内，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转而求助于枪杆子来解决内部问题，我们将给敌人以毁灭我们的机会。”

因此，在法塔赫这个组成巴解组织的最大、最有力量的组织内，一个十分困难的情况得以控制。

在约旦进入内战前的最后的几个小时内，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越是表明他们同侯赛因合作的决心——即使他正在 242 号决议基础上大力推进谋求同以色列媾和——巴解组织内的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就越加在寻找机会挑起同这位国王的军队的对抗。六月初，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约旦军队之间发生激烈战斗。如同在前几次一样，射击是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纳瓦夫·哈瓦特迈的人民民主阵线开始的。也是如同在前几次一样，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如同一个人一样共同努力来解除这场危机。差不多在后来的三个星期，当哈巴什仍在阻挠一项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已经达成的阻止进一步战斗的协议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公开斥责了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同事。“我们的群众不能再容忍一个极端主义的煽动者，他没有做任何一点改变现状的事。”他怒喝着。虽然阿拉法特没有点这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的名字，对所有人来说，这是清楚的，哈巴什就是在他心里的这位“极端主义的煽动者”。对阿拉法特来说，公开攻击一位巴解组织的同事是一件轰动的事件。这作为尺度可以用来估量这位主席日益增长的受挫和失望。

从人数来说，正如我们所见，在巴勒斯坦方面，实际从事挑衅活动的是那些积极从事解放斗争的人中的少数。但是，正是这少数人支配着事件的进程。他们得到约旦、以色列和美国的奸细的帮助，来破坏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合作的政策。早在 1968 年 11 月，侯赛因曾经说过，“更多的可能是以色列特务挑起在安曼的枪杀事件，以制造混乱，从而为以色列的攻击准备时机”。

到 6 月战斗这个时候，许多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占领了约旦的很多地方，这些在巴解组织控制下的地区，被称为国中之国。从 6 月以来，某些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的支持者，在毕竟是一个东道国中，以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可原谅的方式在行事。在许多城镇，包括安曼的部分地区，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而不是约旦政府成了行政当局。在这里，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尽其所能制造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他们设置路障，劫持车辆，向地方工商业者勒索钱财。哈瓦特迈的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支持者从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上进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广播，还强奸当地的妇女。这些就是阿布·达乌德所谈及的一些“愚蠢的和罪恶的活动”。法塔赫的战士和支持者也不都是受欢迎的行为的模范。法塔赫也有它的流氓分子，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中的牛仔们，全副武装，到处吹牛皮，好像他们拥有这个地方，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总的来说，在法塔赫旗帜下服役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并不是一群无纪律的乱民。

不足奇怪，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所作所为使得解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失去那些以前曾经钦佩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约旦人、包括许多巴勒斯

坦人的支持和同情。巴解组织在这唯一的有适当的安全基地的阿拉伯前线国家，不是赢得朋友，而是在树敌。但是，还有其他的力量在同样愚蠢和粗暴的人的指挥下工作，他们决心损坏巴解组织的名誉，并破坏阿拉法特的和侯赛因合作的政策。

在六月战斗之后，一个特别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或者所谓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开始为它自己起了一个秘密的名字，它以“胜利部队”著称，它的专业是劫持汽车，经常是劫持那些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的车；绑架军官；骚扰那些在军事和政治机关工作的人的家庭。很快就清楚了，指挥这“胜利部队”的人掌握有关于这些高级军事人员行动的内部情报，当后来发现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只不过是约旦高级司令部一手制造的一个工具时，没有人为之惊讶。

那些指挥这“胜利部队”的人有两个目的。一是使那些知名的或者被怀疑为敌视约旦政权而同情法塔赫的军官，改变他们的感情。阿布·达乌德说，“那些围绕在国王周围的要压垮我们的人，正在日夜努力使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另一个更加广泛的目的是诋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信誉。如同在巴解组织年围绕阿拉法特的极端分子一样，围绕侯赛因的极端分子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内战。

6月，西方政府对一则新闻报道中所说的要杀死侯赛因的图谋表示义愤。据阿布·伊亚德说，并没有这种图谋。他告诉我：“子弹打在侯赛因的轿车上，这是真的——但是，这位国王不在车内。而且这些子弹不是巴勒斯坦人发射的，是伪装成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约旦军官发射的，他们的上级随后赶紧跑到这位国王面前，告诉他曾经有一个杀害他的图谋，幸好他当时没有乘坐这辆汽车！”

“那些出主意伪造暗杀企图的人的看法是，侯赛因不够强硬，反巴勒斯坦人的劲头也不足。他们正促使他就像他们自己那样强烈憎恨巴勒斯坦人。”

阿布·伊亚德具备了解这一事情的最好条件。它是巴解组织各种情报机构执行负责人，在内战前还同侯赛因保持着极佳的友好关系。在内战前，阿布·伊亚德实际上是法塔赫领导成员中最亲近侯赛因的人。他参加了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阿拉法特同这位国王的会晤；当有些事情要和侯赛因打交道，而阿拉法特又不能出席时，阿布·伊亚德代表这位主席。

侯赛因本人不了解谁是这“胜利部队”的幕后人，等到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一点也未卷入低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信誉的秘密计划中。他至少像阿拉法特一样急于避免一场内战。有时侯赛因也感到激怒，因为阿拉法特明显的不愿使用武力来制服他自己的极端分子；但是，当侯赛因对自己说真话的时候，当他为阿拉法特设身处地考虑时，他对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不得不感到有些同情。侯赛因毕竟是国王。他有一个国家，而且所有国家机构都在他的统帅之下——这是在理论上这样说。但是，仍然是这位国王，他不能控制他自己的极端分子。那么，对阿拉法特来说，那又是多么大的困难呢？这个想法经常在侯赛因心里盘旋，他不止一次地同阿布·伊亚德讨论此事。

根据阿布·伊亚德和法塔赫其他领导人所谈以及我自己在约旦、以色列和西欧的详细调查，以色列的代理人应对某些事件负责。这些事件使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在约旦被人憎恨，并且为内战的发生设置了舞台。在多数情况下，以色列的代理人是一些曾经受到这种或那种讹诈而被改变了立场的

巴勒斯坦人，他们随后加入了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团体。

阿布·伊亚德解释道：“过去在少数情况下，以色列人曾经使用高级的危险的药剂来为他们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的头脑编制程序。稍后，我愿意告诉你这样一个事件的详细情况，如果你希望知道的话。这实际上是莫萨德要杀害我的一个图谋。但是，一般来说，以色列人依靠三种简单但却有效的讹诈办法使巴勒斯坦人转变成为叛徒。我还应当告诉你，巴勒斯坦特务中的大多数是莫萨德在西欧吸收的，或使他们转变为特务的。

“第一种办法是金钱。莫萨德代理人掌握大部分也许是全部在欧洲学习和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个人档案材料。莫萨德特别注意那些生活超支和正沉湎于赌博和玩弄女人等等的巴勒斯坦人。我想我无需告诉你这些故事的结局。实际上，那名最接近达到杀害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足轻重花花公子，他的赌博的债务由莫萨德偿还。

“另一个莫萨德特别喜爱使用的诡计是威胁在欧洲的巴勒斯坦人，除非他们同以色列人合作，否则他们就得不到工作许可证或者不能更新他们的旅行证件。这是莫萨德在西德大量使用的一种讹诈技术，因为它的代理人可以利用德国罪行联合公司，成功地从德国当局得到关于巴勒斯坦的所需的官方情报……诸如什么时候他们的工作许可证需要更新等等详细情况。

莫萨德的第三个办法是威胁在欧洲的巴勒斯坦人，如果他们不和以色列人合作，他们在西岸和加沙的亲人将遭受磨难。当莫萨德代理人在和某人打交道时，他们通常带有接触对象亲人的照片，有时是影片。从莫萨德代理人泄露的情况看，显然，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了解的关于这些亲属的全部情况——名字、习惯、问题、缺点，等等。有时候威胁说，他们的亲人会丧失他的维生之计。有时威胁说，他们的亲人将遭到肉体摧残，被夺去生命。但是，经常的是暗示他们亲人中的妇女要被奸污。这些莫萨德代理人知道，当我们妇女的尊严受到威胁时，我们阿拉伯人会变得如何疯狂。”

在阿布·伊亚德向我讲完这些事情时，在他胖胖的圆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我问他为什么笑，他说，“当你注意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正在想，我们巴勒斯坦人民是多么勇敢和忠诚。”

他继续说：“多年来，由于采用我说的讹诈和恐怖手段，莫萨德准备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来图谋杀害我们的高层领导人——特别是阿拉法特和我。但是，他们的图谋总是失败。你知道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准备杀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最后一分钟，当他们事实上有可能杀害我们时，这些以色列的叛徒-特务总是说：‘不，我不能这样做。’随后他们就自首了。”

为了举例说明他的论点，阿布·伊亚德给我讲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这是莫萨德杀害他的多次图谋中的最初一次。“有一天，我正在安曼的办公室工作。电话铃声响了。这是我的最可靠的秘书之一从另一个房间打给我的电话。她对我说：‘阿布·伊亚德，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个人问题。对不起，我能够过来和你谈谈吗？’我说：‘亲爱的，为你作什么事都行。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来。’她来了，并且很快茶送来了。在我们开始谈论她的问题之前，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我转过身背着她去接电话。当我放下电话时，我能感到她十分紧张、非常惊恐。当我正在观察她的面部表情时，我端起我的茶杯。我的嘴唇实际上刚刚碰到茶杯，就要喝第一口茶，突然，她从座位上跳起来，并且猛烈把茶杯从我的嘴边和我的手上夺走。‘不，阿布·伊亚德！’

她喊道。‘别喝！这茶有毒！我在你的茶里放了毒药！’她曾经从她正戴着戒指中的一个秘密的分隔空间里，把毒药倒进我的茶里，这只戒指是她的操纵者莫萨德给她的。这可怜的孩子抱着我的脖子，心都要哭出来了。她坦白了全部事情。以色列人发现她在为我工作，他们说，如果她不按照他们所要求的去做，她的亲人就要受苦难。”

假如侯赛因不能以某种方式被强使去做以色列的肮脏勾当并对抗巴解组织，以色列领导人知道他们迟早会被迫在这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要么把这个王国夷为废墟，要么占领它的余下的部分。这是以色列军事政策的逻辑。但是这里有着明显的问题。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第一选择会失去声誉和国际支持，代价太高——即使是以色列最好的西方朋友和盟国也不会对以色列的这种残暴给予支持和宽恕；第二个选择太危险，因为以色列人要冒风险，被吸进越南式处境和圈套。侯赛因不得不被迫为了他们去打垮巴解组织。

当以色列的情报头子们使他们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在约旦开始工作时，所有的迹象表明，他们不是单独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正是按照一项细心准备的计划在进行工作。证据，或者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所认为的证据，是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为什么在1969年初以色列竟真的决定使用它的空军来反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

到那一年的夏天，以色列的领导人开始承认每一个军事专家都知道的事——游击活动和渗透行动是不能用空袭来阻止的。当他们被迫解释为什么使用空中力量的真正原因时，以色列领导人说，这是“给我们一个暂时喘息”，“使敌人失去平衡”，“保持主动”和“实现长期目标”。

什么是那些未特别指明的“长期目标”？得益于事后的认识，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对这项回答是肯定的。正如阿拉法特所说：“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不是在同我们战斗，而是要驱赶我们进入城镇。在那里，当侯赛因以这种或那种手段被迫攻击我们时，我们会更容易被袭击。”

到1970年7月，以色列的军事策划者们正在悄悄地进行众所周知的骑墙探试。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非常猛烈地袭击约旦——在这过程中他们试验以色列的西方朋友们忍耐的极限——他们在约旦的代理人正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挑起一场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这位国王的军队之间的对抗。但是，以色列的长期战略没有在起作用。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这位国王的人之间的六月战斗，没有如以色列人所曾希望的那样，导致一场全面对抗。同以色列的期望相反，侯赛因仍然拒绝即使是考虑和巴解组织的最后摊牌。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太坏了，这位国王竟然还在和阿拉法特一起工作去阻止爆炸性局势的发生。更坏的是，侯赛因竟曾昭告于众，他宁愿退位也不干以色列的肮脏勾当，事实上，侯赛因真的曾决定退位，但是他被纳赛尔说服改变了他的主意。从他的和法塔赫领导人以及和纳赛尔的谈话中，这位国王知道不存在约旦被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接管的危险。他清楚在解放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有制造麻烦的无限能力，但是，他也知道，没有法塔赫的支持他们形不成对他的政权的任何军事威胁。至于对他的王位的一个真正威胁，则不是来自巴勒斯坦人，而是来自这位国王在最高军事司令部里的所谓的朋友。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对他不愿下令对巴解组织进行一场全面和最后的进攻，感到恼怒。

以色列人灰心丧气，在7月他们要求他们的美国朋友帮助他们拧侯赛因的胳膊。也许是以色列人仅仅要求帮助，因而无疑义地得到了帮助。也可能

是以色列人有效地讹诈美国人去讹诈侯赛因。因为亨利·基辛格当时正在谈论关于把苏联人从埃及和中东逐出，也因为基辛格和以色列人都坚持认为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是苏联的傀儡，这就不难看到为什么在他们之间有一种心领神会。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美国人决定帮助以色列。大概是基辛格策划了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侯赛因的行动；甚至更像是这样，这种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是通过基辛格著名的幕后渠道进行的。基辛格后来自夸，他把等于是他自己的情报机构合成一个整体——“幕后渠道”——每当他不想让政府机构知道他在干什么的时候，他就使用它。基辛格把他自己凌驾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及他自己的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之上，这是无疑的。

某些美国人如何讹诈侯赛因采取行动反对巴解组织的故事，是由阿布·达乌德告诉我的，正如在最特殊的情况下由这位国王本人所告诉他的一样。

侯赛因向阿布·达乌德透露全部情况的那次会晤，是在安曼的一所单人牢房里进行的。时间是1973年9月18日。随着埃及总统萨达特为谋求和平而准备发动战争，侯赛因曾经作出两项决定。第一是他将不参加战斗。第二是宣布大赦政治犯。阿布·达乌德就是在被释放的政治犯当中。以下是阿布·达乌德叙述的关于这位国王的故事。

“这位国王亲自来打开我牢房门上的锁。想到我是由于组织推翻国王的阴谋而入狱的，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但情况就是这样。侯赛因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他也是一个好心人。我想他也许对我受到如此虐待而感到内疚。”这也可能是约旦情报机构的头头们拒绝执行这位国王关于释放阿布·达乌德的命令。

“在我告诉你他跟我说了些什么话之前，”阿布·达乌德继续说，“有一些背景情况你必须了解。当时这位国王对美国的金钱依赖很大。每年他们给他现金以支付宫廷费用和军饷。这被认为是一项秘密，但是，这在阿拉伯世界是人所共知的。美国人一年两次向这位国王支付这笔款项——在1月和7月。现在来讲这位国王所谈的话。

“他告诉我，1970年他采取行动反对我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人威胁他，如果他不能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去做，他们将解除他的权力。据国王所说，情况是这样发生的。7月份，他一个钱也没有收到——换句话说，下半年的正常的付款被拖延了。在8月初，他收到的只是一个月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六个月的款项。这位国王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大使。他问这位美国人，‘为什么你们只付一个月的款项？’这位大使回答了一句话。他说：‘陛下，你应该知道，美国只支持获胜的马。’这位国王对我说，他非常生气，可是他什么也没说，把电话放下了。他当然懂得，美国人告诉他，他们把正在约旦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在两匹马之间的竞赛——这位国王和阿拉法特。

“现在从我给你讲到的这个故事来看，好像这位国王起而反对我们是因为金钱。但是，这不是问题所在。正如侯赛因对我说的，金钱只是作为美国的真正威胁的一个象征和信号。他们实际上对他说的是：‘如果你不准备起而反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那么，我们美国人就不需要你，我们也不会付款给你。换句话说，陛下，如果你不按我们的要求去做，我们将以你将军中的一位来取代你！’当然，美国人没有以这些措词来实施威胁。但是，当他们切断他的资金时，这就是他们想要这位国王所得到的信息。这位国王获得了这种信息。这是侯赛因在我的单人牢房里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亲自告诉我的故事。”

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侯赛因的本能反应是宁愿退位也不屈服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威胁。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真的退位，美国人用以取代他的任何一名将军将不会停止杀戮，直至巴勒斯坦人的鲜血流尽为止。

在阿拉法特看来，侯赛因如果不认为他有着纳赛尔的支持，他仍然不会允许自己被迫同意对巴解组织发动进攻。按照阿拉法特的观点——含蓄多于明言——巴解组织内的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所犯的许多罪行中最大的罪行是他们组织的一次特别的示威。这次示威使纳赛尔丢丑，并使他在怒气冲冲中给侯赛因发出一份信件。这位国王错误地把它理解为是来自开罗的对他在他所选择的时机采取行动反对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支持。

举行这次示威的时机正值纳赛尔在 1970 年 7 月 23 日接受第二个罗杰斯计划之际。几天之后，侯赛因，随后以色列人，也都接受了它。第二个罗杰斯计划承认以色列应该从西岸和埃及领土撤出这一原则，它要求以色列、埃及和约旦接受联合国调停者贡纳尔·雅林的斡旋。这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是要求停火。纳赛尔和以色列也接受了这点，从而将导致在苏伊士运河前线上的消耗战的结束。事实证明，雅林使命和伴随这一使命的罗杰斯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并不打算从西岸撤出。但是，在它尚未显露出来的时候，第二个罗杰斯计划的确向纳赛尔和侯赛因投射出一线希望。

哈拉德·哈桑说：“我同意阿拉法特的看法。我们在约旦的真正麻烦始于我们巴勒斯坦人采用拒绝第二个罗杰斯计划这种做法。尽管当我说我们巴勒斯坦人时，我真正意思是指左翼分子。纳赛尔曾就罗杰斯计划事先告诫我们，他说了这样一些话：‘我将接受它。你们有自由拒绝——这是你们的权利。但是，不管你们怎么决定，不要批评我。’”

巴解组织正式拒绝了第二个罗杰斯计划，阿拉法特主席做出这个姿态，公开说解放运动将继续进行它的武装斗争。如果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太少，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将在自己组织的广大普通成员中失去他们的信誉。但是，非正式地而且在实际上，法塔赫同纳赛尔之间的默契，并延伸到同侯赛因之间的默契，仍在坚持。如果罗杰斯计划和雅林使命导致在阿拉伯前线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法塔赫会同意只使用政治方式继续斗争。

巴解组织内的左翼分子和激进阵线了解到这是法塔赫领导人的真正立场，决定举行一次反纳赛尔的示威。阿拉法特说，“我请求哈巴什和其他左翼分子不要举行这样一种示威。我彻底反对这种示威。当他们拒绝了我的请求时，我对他们说，‘在举行任何示威之前，至少让我们去见见纳赛尔并和他谈谈。’他们再一次拒绝了我。”

就这样，左翼分子走上了安曼街头。他们喊着口号，打着旗帜，谴责纳赛尔是“叛徒”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示威队伍由一头脸上戴着纳赛尔画像的驴子为前导。

阿拉法特对我说：“这是非常粗鲁、非常进攻性、非常愚蠢的。这也是我们的致命的错误，纳赛尔是我们的保护者。从 1967 年以来，他曾一直对侯赛因说，‘为谋求同以色列媾和和收回西岸，你想怎么干都行。我愿支持你为实现此目的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行动——但是我不愿支持任何旨在消灭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运动的图谋。’当我告诉你纳赛尔像一位教父在对待我们时，这就是我所指的意思。”停顿片刻之后，阿拉法特以一种对左翼分子蔑视的声音说：“如果他们力图在我和纳赛尔之间制造麻烦，那他们是成功了。”

据哈拉德·哈桑说，阿拉法特本人随后犯了一个错误，对纳赛尔伤害之外又加侮辱。“在巴解组织的一次执委会会议上，我们决定派代表团到各个阿拉伯国家，”哈拉德说，“确实，阿拉法特不得不一次去两个地方——开罗和巴格达。”

如果发生约旦对巴解组织的进攻，阿拉法特指望在约旦的1.7万名伊拉克军队会给他帮助。伊拉克领导人在这面对巴解组织曾经作过许诺，因此，对阿拉法特来说，尽可能保持同巴格达政权的最好的关系是重要的。

哈拉德继续说：“问题是开罗和巴格达之间的关系当时是糟透了。作为折衷办法，我建议我应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巴格达，阿拉法特应该率领主要代表团去开罗。如果阿拉法特先去巴格达，那么很明显纳赛尔会变得更加生气。我乞求，真正地乞求阿拉法特先去开罗。这是我们都同意的。我动身去伊拉克。路途中我们遇到一次袭击，我的两名警卫人员被杀害了。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到达巴格达，可是两小时之后，我非常吃惊地在那儿看到了阿拉法特。我跟他说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天啊，阿布·阿玛尔，你疯了！我们经不起招惹纳赛尔更多的怨恨。’他说，‘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也是巴解组织主席，维护我们组织的团结是我的责任。多数人坚持我应该先来这里。’”

当阿拉法特最后从巴格达到达开罗时，纳赛尔拒绝会见他。“但是24小时之后，我们的好朋友海卡尔再次使纳赛尔的大门敞开，”哈拉德说，“法塔赫和纳赛尔的关系再次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之上。”确是这样，正如阿拉法特喜欢说的一样，但是，损害已经被酿成。纳赛尔在他生气和受到侮辱情况下曾对侯赛因说过，如果国王认为这是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应受到一次教训的合适时机，他是不会反对的。

阿拉法特说：“我事后得知，纳赛尔的本意只是告诉侯赛因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教训，用言词等触犯一下我们。不幸的是，侯赛因把纳赛尔的话理解为是对我们采取行动而开的绿灯。这就是我们因左翼分子侮辱纳赛尔而付出的代价。”在纳赛尔临终的那一天，他对阿拉法特说，他为自己没有对侯赛因讲清他的信中的意思而感到内疚。

在8月初，侯赛因开始重新布署他的兵力。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从以色列边界被转换到安曼和其他城市周围。法塔赫的野战军官们对正在发生的格局已经感到很明确时，他们要求会见阿拉法特。

阿布·达乌德说：“我们对阿拉法特说，我们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坦克开进安曼和其他城市。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的主要兵力限制在边界地区，约旦人就不能向我们发起一场进攻。阿拉法特十分坚定。他说：‘这些是阿拉伯坦克。我们不能袭击它们。如果这一时刻来到，我们将保卫我们自己，但是，争取解放的道路不是采用打击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的办法。’”显然，阿拉法特不打算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反对约旦政权。但是，某些巴勒斯坦人的确采取了行动，而且是以可能的最富于戏剧性的方式进行的。

上次他们在开罗会见时，纳赛尔曾经告诫阿拉法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对侯赛因部队的进一步激怒。阿拉法特说：“当我回到安曼时，我把纳赛尔所说的话告诉了每一个人。我再次恳求左翼分子停止他们的挑衅。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们，他们正在对我们的人民制造一场灾难。但是，他们又一次拒绝了我……你知道以后发生了什么？”

在9月6日，哈巴什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发动了一场只能被称作是一次大规模的、耸人听闻的劫持行动。第一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恐怖

分子劫持了四架国际航线客机。一是泛美航空公司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它在旅客下机后在贝鲁特机场被炸毁。其他两架，一架属于环球航空公司，另一架属于瑞士航空公司，最终被迫降在道森训练场。这是约旦的一段狭长沙漠地带，更多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恐怖分子正等在那里。在空中劫持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图谋在飞机上被以色列安全人员挫败。他们杀死了一名恐怖分子，俘获了另外一名，她的名字叫莉拉·哈立德。这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安全降落在伦敦。以色列要求将莉拉·哈立德引渡。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则要求将她释放。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劫持英国一架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来支持它的要求。这架飞机也被迫降落在道森训练场。到现在一共有三架非常昂贵的飞机和大约 600 名人质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手中。

劫持导致了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侯赛因的军队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些人质的生命危在旦夕，阿拉法特和侯赛因这两位十分沮丧、各自已经失去对他们自己的极端分子的控制的人。同意停火，但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民主阵线拒绝这项协议。

阿拉法特和国际红十字会通力合作的最优先目标是寻求这些人质的获释。地要求召开一次巴勒斯坦抵抗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是唯一的拥有军事组织部有代表参加的机构，包括那些不是巴解组织成员的军事团体。就这一次，阿拉法特决定他甚至不愿试图取得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他说他在释放人质问题上希望并会接受多数表决。在这戏剧性的时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心目中突然成了英雄。出于对劫持者和那些策划这次行动的人的钦佩，一些法塔赫战士改变了他们的忠诚，加入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因此，阿拉法特一如往常，正在逆人民和激动人心的舆论潮流而勇进。

有些人说，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抵抗中央委员会说过，如果表决结果是反对他的主张的，他将辞去巴解组织主席的职务。不管怎么说，他获得了他需要的多数，释放人质的命令下达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作出的反应是，释放了除 60 名人质外的全部人质，在他们离开道森训练场之前炸毁了这三架飞机，利用剩下的 60 名人质作为他们的掩护和安全的保证。

在大部分人质获释和飞机炸毁之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被暂停巴勒斯坦抵抗中央委员会成员资格，并受到警告：如果再有任何“损害革命”的行动，将要采取一项反对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强硬立场。随后，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当阿拉法特表示他不会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变得“孤立和受非难”时，他似乎是在改变过去的立场。事实上，这是阿拉法特向国际社会要求对他和哈巴什及其极端分子同事们之间的政治问题的一点谅解而采取的做法。

这一异乎寻常的大规模的劫持，对约旦最高司令部来说，是不堪忍受的最后一击。但是侯赛因仍然拒绝下令全面进攻巴解组织。他担心剩余的 60 名人质的命运（他们最终未遭伤害而被释放）；他更为烦恼的是，一旦叙利亚决定介入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一方，这将对他的国家发生什么情况。然而，对伊拉克人，这位国王倒不必担心。他已获悉，伊拉克国防部长已大量受贿按兵不动，不参与任何战斗！这项情报的来源之一是约旦的一位高级空军军官。他是巴勒斯坦人，现为阿拉法特的高级顾问之一。他说：“当这位伊拉克国防部长到达时，我正在穆富拉克空军基地。他亲自提着两只大而

轻的显然是空的手提箱。他的访问是未经安排和完全秘密的。正式说来，并没有进行这次访问。他在约旦的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轻声耳语，随后，他见到了我。他十分吃惊，显得非常尴尬，也许可以说我感到很内疚。但是，他对我没有说任何话。两小时之后，这位部长离去。他再次提上自己的手提箱，但显而易见，现在箱子已变得非常沉重。根据我亲眼所见和后来亲耳所闻，我推测那两只箱子里装满了美元！我不能证实，但我认为这是事实。阿拉伯世界各国国防部里的人也认为这是事实。纳赛尔对他的许多阿拉伯同事们的蔑视是完全有道理的。”

哈尼·哈桑对行贿的故事和第一回合的内战增添了一个结束语。他说：“依照我的看法，阿拉法特指望的是伊拉克人，而不是叙利亚人。他十分确信，如果约旦人攻击，伊拉克人会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不认为他甚至考虑过侯赛因有打垮他的可能性：我还认为，伊拉克人欺骗他的方法，使他完全了解了阿拉伯的政治。”

当侯赛因的将军们拜访他，发出他们的最后通牒时，他仍然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在他们作出决定要迫使这位国王表态的时候，我想基辛格的“幕后渠道”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我认为作这样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约旦人发起他们的进攻时，叙利亚人装出一副表示支持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样子。他们未用空中掩护，便越过边界，从地面进入约旦；但是，当大马士革一经获悉以色列人在得到尼克松的同意下将同他们交战时，他们立即调头回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好像完全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阿拉法特接管约旦的阴谋的幕后是苏联人。哈拉德·哈桑说：“你知道当时在我们和苏联人之间是什么情况——一张白纸。苏联人在危机临近时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主要通过纳赛尔发出一连串紧急信件，要求我们大家冷静对待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约旦的对抗。在这次以及未来多次，苏联人倒是像政治家那样在行事，而美国人则以危险的、鲁莽的方式在行动。这是法塔赫右翼领导人的我作出的判断。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至于指责我们正在企图接管约旦——那纯粹是胡说，由于你听过我们叙述的情况，我想你是会同意的。”

阿拉法特在1970年初曾提出警告，说1970年将是反对他的人民和他们事业的“国际阴谋年”。他是多么正确！这一年也是阿拉法特本人的危险的一年。出现了两次对他生命的谋害。

据阿布·伊亚德说，两次都是以色列的两个情报机构中的一个干的，或是莫萨德，或是军事情报总署。当以色列人决定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力图暗杀阿拉法特时——这项决定看来是1969年早些时候作出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解决阿拉法特秘密行踪的问题。到1969年时，以色列人在阿拉法特周围派有许多巴勒斯坦特务，但是，他们从没有可能知道阿拉法特何时将要行动。阿布·伊亚德说：“以色列人解决这个难题靠他们的一名特务在阿拉法特的沃尔夫汽车里安装了一个窃听器或归航通信装置。这个计划显然是以色列战斗机将用雷达波来自动跟踪它的信号。将发射火箭猛击——阿拉法特就不再存在了。”

我问阿拉法特这个装置是如何被发现的。他大笑说：“起初一架以色列军用飞机跟着我，我想这是运气不好或者是巧合。也许是这样。后来我发觉他们拥有了解我行动的一些手段，不要忘记我是一位工程师。我知道该寻找什么，并终于找到了这个装置。”

阿布·伊亚德补充说：“此后阿拉法特更换过他的贴身警卫。这次我们从没有发现有以色列特务身份证明，但是，这位主席不存侥幸心情。”

以色列人为了实行他们的第二次谋害，冒险暴露他们的一个在伊拉克军事情报机构隐蔽得根深的特务。这个特务送给阿拉法特一份炸弹信件。阿布·伊亚德说：“它看上去真像一包文件。它是由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军事情报总部送交在约旦的伊拉克军事情报首脑的。完全是正式的，并以恰当的、正常的方式写着送交阿拉法特本人——由他亲启。像正常一样，在约旦的伊拉克军事情报首脑毫不耽搁地由特别信使把这包文件送给阿拉法特。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你别忘记，我们自1968年以来就通过伊拉克人渗入约旦。于是这份信件送到了，其时阿拉法特、我自己和其他在领导机构里的人正在开会。在我们谈话时，阿拉法特就让这份信件放在他的书桌上一段时间。他没有表示出他对这份信件有什么怀疑。突然，他停止了我们的谈话，平静地说道，‘把它拿走，它是一枚炸弹。我能嗅出它的味道。’”

这故事怎么结束的呢？阿市·伊亚德说：“当我们以适当的方法打开这份函件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如果在我们所在的房间里打开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被炸死。”

当9月17日内战开始时，侯赛因的将军们发誓，要在以色列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叙利亚人曾经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他们指派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去执行探寻并杀死巴解组织主席的任务。阿拉法特不会被活捉。

阿布·伊亚德说：“约旦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确曾发现了阿拉法特所在的那所房屋。你该知道，那儿在实行宵禁。行动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们包围了那所房屋，并且从各个方向进行袭击。它被摧毁了。当时他们正在追捕我。在一个让人们去取水和食物的短暂的休战间隙，当我从一所房屋转移到另一所房屋时，他们逮捕了我。他们告诉我阿拉法特已经死了。不幸的是我相信了他们，他们逼着我在广播上宣告这件事并号召我的人民停止战斗。或许他们真的以为阿拉法特死了，或许他们是在欺骗我。但是，阿拉法特仍然活着。他是在房屋被包围前的几分钟从这里悄悄溜走的。”

谋害阿拉法特没有成功，侯赛因去开罗出席纳赛尔召集的关于停止战斗的阿拉伯首脑紧急会议，将军们拒绝保证他安全通过。当时这位国王实际上没有权力。将军们除了他的名义以外，接管了一切。他们拒绝执行侯赛因为响应开罗首脑会议号召而接受的休战协定。为了达到目的，将军们命令炮轰苏丹总统尼迈里正居住的地方。他是作为出席首脑会议的阿拉伯领导人的代表来到约旦的。他的任务是安排停战和保证阿拉法特的安全。他失败了。

正是在这时刻，纳赛尔告诉侯赛因，如果这位国王不能控制他的将军们，他要命令埃及军队强行停火。这位确曾智胜侯赛因的将军们的人是谢伊赫·萨阿德·阿卜杜拉·阿萨里姆。现在他是科威特的王储。当时他是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受开罗首脑会议派遣，在尼迈里曾经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哈拉德·哈桑说：“当他到达安曼时，约旦人就跟踪他。他们希望他会引导他们见到阿拉法特，然后，当他们找到这位主席时，他们就将杀死他——阿拉法特。谢伊赫·萨阿德脱下外衣，只穿着他的内衣，把他的斗篷长袍给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随后假装成谢伊赫·萨阿德，乘坐一辆约旦的装甲运兵车飞驰到达安曼机场！”

10年以后，当我正考虑提出我的和平倡议时，我曾有机会问阿拉法特，他是否感到他可以把他的生命委托给侯赛因。经过短暂的思索以后，他答道，

“侯赛因，是的……但不是围绕他周围的，那些人中的一些人。”

1970年9月27日，当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在开罗握手言和时，约旦内战的第一阶段趋于结束。纳赛尔不相信他曾经迫使约旦将军们接受的这次停战会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他希望它能赢得他和侯赛因所需要的时间，以便为推动罗杰斯计划作些事情。在这方面，纳赛尔和侯赛因知道，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在华盛顿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如果罗杰斯对美同的中东政策继续有所影响、那么就有可能看到美国政府会促使以色列为和平作出必要的撤退。但是，如果基辛格的影响继续增长，如果基辛格斗争胜利当上了国务卿，那么就没有希望了，但愿此事不会发生。基辛格反对任何会使苏联人在中东留下影响痕迹的和平，即使这种影响是极为微小的。

对阿拉法特一方来说，他感到宽慰，知道他把信任寄托在纳赛尔身上是正确的。虽然这位埃及领导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一定责任——向侯赛因发出一份怒气冲冲的可以作多种解释的信件——他确曾信守诺言，一旦约旦人发起他们的进攻，他就千方百计尽力保护解放运动不被消灭。阿拉法特现在知道，在阿拉伯方面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巴勒斯坦事业在纳赛尔手中是安全的——假如巴勒斯坦人在关于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对比正义要求解决的办法问题上可以自由作出决定的话。因此，不唯想象，21小时后，当阿拉法特得悉纳赛尔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去世时，他几乎完全垮了。

哈拉德·哈桑说：“当纳赛尔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在大马士革。阿拉法特，我本人和叙利亚总统，正在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我无法用语言向你表达，我们感到多么空虚，多么孤独。阿拉法特和这位总统都哭了。他们哭着、哭着、哭着。最后还是阿拉法特代表我们大家——我肯定也代表大多数阿拉伯人——说道，‘我们蒙受了最重大损失！’”

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真正感到巴勒斯坦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保护者。这是他们为什么如此艰苦努力使停战得以生效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

哈拉德·哈桑说：“如你所知，在过去我曾和阿拉法特有许多分歧。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继续存在分歧。而且毫无疑问，在将来我们还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在纳赛尔逝世后的期间，我为有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作为我们的领袖而感到自豪。我们解放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感情上如果不是在他们的理智上，是很痛苦的，是要复仇的。我们的人民已有3000人被杀害，他们中多数是老百姓，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我们的人民正在公开谈论必须复仇。但是阿拉法特没有说。在我们所有的会议上，他只是说需要同侯赛因政权和解。这个阿拉法特不是一位政客。政客只说人民爱听的话。这个阿拉法特是一位政治家。当绝大多数人要走向另一个方向时，他把人们引导到一个与之相异的方向。他对左派人士以诚相待。他对他们说：‘你们拒绝我的意见。这就是后果。你们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他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挑起同约旦军队的另一次对抗，我们的运动无异于‘自杀’。”

自11月以来，在巴解组织和约旦军队中的双方的极端分子竭尽能事挑起另一次对抗。但是，据阿布·伊亚德说，作出最多挑衅的是约旦人。他说：“他们做得很聪明。他们不进入在安曼及其周围的难民营，而是在难民营附近租赁一些房屋，再从那里向难民营开火。”1971年1月，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和侯赛因的军队之间，一场严重的战斗爆发了。哈巴什重新提出

打倒侯赛因的号召。此后，阿布·伊亚德在他自己主动倡议下同侯赛因议定一项协议。阿布·伊亚德希望这项协议会解除约旦向巴解组织进行第二次和最后一次进攻的借口。这项协议规定巴解组织从安曼撤出它的所有重武器并且限制在杰拉什和阿杰伦地区。如果侯赛因的将军们真正有兴趣和巴解组织实现一项和解，阿布·伊亚德的协议可以成为它的基础。结果，阿布·伊亚德的协议仅仅是推迟了最后摊牌，反倒使约旦人进行屠杀时更容易得手。阿布·伊亚德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他被这位国王欺骗了。

法塔赫领导人急切地甚至拼命地要同侯赛因合作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知道他们别无选择。如果法塔赫失去它在约旦的基地，它能在哪里扎根呢？

在理论上，叙利亚一如既往准备为解放运动、包括法塔赫，提供一个基地。但是，叙利亚彻底反对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主张。由于阿拉法特和他的大多数法塔赫的同事们不愿意成为叙利亚的傀儡，叙利亚不是也不可能是取代约旦的另一选择。事实上，在1970年11月，当阿拉法特的老对手哈菲兹·阿萨德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取得政权时，在法塔赫控制的巴解组织和叙利亚之间已不复存在和解的可能性。

阿萨德是唯一的像以色列人和基辛格一样狡猾和残暴的阿拉伯领导人。他也是一位善于左右逢源从中得利的专家。他这个人依靠苏联加强它自己的防务，而又能同美国人和以色列人进行秘密的政治交易。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极其出色的玩弄拨火棒的人。

在后来的几年间，阿萨德和阿拉法特自称他们是站在一边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他们之间没有信任。如果阿萨德曾准备允许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方面所可能容许的框架内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那么，这位叙利亚总统就多少能保有像纳赛尔与阿拉法特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或许已经改变历史的进程。阿萨德加上阿拉法特，再加上沙特阿拉伯的财富和政治力量，会胜过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愿意像一个人一样地工作，阿萨德、阿拉法特和生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就能够成功地迫使美国人以这种或那种方法责成以色列为和平而作出必要的撤退。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主要原因在于阿萨德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玩弄巴勒斯坦这张牌。

由于叙利亚不是取代约旦成为巴解组织基地的另一选择，一旦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被赶出约旦，唯一可以作为他们重新集结或至少可以保卫自己的地方就是黎巴嫩。但是，这不是法塔赫领导人所想采取的一项抉择。

哈拉德·哈桑说：“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们法塔赫里的人始终知道，对解放运动来说，扎根于黎巴嫩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知道，黎巴嫩不能承受由于我们的出现而遭致以色列的进攻，或者，即使我们像天使一样，以色列的攻击有一天会成功地使黎巴嫩人转而反对我们。然而，问题不仅在此，还有更多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法塔赫里的人曾经研究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伯莱文原文的政治文献，我们完全清楚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长期战略。以色列人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一个在黎巴嫩的基督教派统治的政权。如果你不信我的讲话，你应当读一读例如已出版的摩西·谢里德和本·古里安的谈话。当时，处于60年代末，以色列人面临一个真正问题——因为在黎巴嫩的人口统计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爆炸的情况是，穆斯林正在变成多数。很明显，成为多数的穆斯林根据他们的人数和民主原则，要坚持拥有最大的政治权力的这一天

正在到来，现在以色列人将怎么办呢？他们能保证基督教少数派在黎巴嫩掌权的唯一途径是进行武力干涉。但是，以色列人需要有一个借口才能以这种方式卷入。我们在法塔赫的人很清楚，如果我们进入黎巴嫩，我们恰恰会给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以使用武力在那儿为所欲为。总之，我们在法塔赫的人完全清楚，只要我们把自已扎根在黎巴嫩，我们就正在于对以色列人有利的事，给我们自己、黎巴嫩人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和可以预见的后果。现在你懂得为什么我们在法塔赫的人是如此急切要和侯赛因达成一项和解了吗？”

尽管如此，当侯赛因的将军们在 1971 年 7 月 13 日进行屠杀时，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还是逃往黎巴嫩，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场进攻是由当时约旦首相瓦斯费·塔尔带着狂热指挥的。他曾是一位司机，一名英国安全情报署的兼职特务。瓦斯费·塔尔是一个不应忘记的名字。他的日子不长。

约旦人动用了他们拥有的一切——坦克、飞机、大炮。这是一场凶恶的、残忍的屠杀，是为了把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彻底赶出约旦。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封锁他的边界，阻挡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增援，以帮助约旦人。

战场上发生了这一真实情景：100 名或者更多一点的阿拉法特的战士宁愿向以色列军队投降，也不愿被侯赛因的人生擒。有位差一点要向以色列人投降的法塔赫的忠诚战士，在我不讲出他的姓名的条件下，对我讲了以下故事：

“我们 6 个人在一起，我们曾亲眼看到，这些约旦人在他们杀死我们的人之前是怎样折磨他们。我们向同以色列接壤的边界跑去。当我们接近约旦河时，我们用双手在我们头上举起我们的加里什尼科夫来福枪，向以色列人表示我们要投降。我没有见到以色列人，但是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用阿拉伯语以友好的声调在向我们喊话：‘你们好，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的成员们。来吧，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的成员。放下你们的武器，你们将会得到安全。欢迎你们。’我只是站在那儿，思索着。随后，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想向前移动，我已决定投降。可是我的腿就是不听使唤，不能使我的身子前进。我的头脑在说：‘放下你的枪，保全你的生命。往前走。’但是，我的心灵却说：‘站住。你不能这样做。’我的心灵得胜了。于是我开始逃离以色列人。我哭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的战友们同我在一起奔跑。我以为以色列人会杀死我们。但是他们一枪未发。或许他们为我们感到惋惜。谁知道呢？”

另外一个关于许多巴勒斯坦人感到真正恐怖的故事，是由一位现在成为法塔赫的高级工程师的人告诉我的。他说：“如你所知，许多曾经是约旦的公民和正在约旦王国军队中服务的巴勒斯坦人，在 9 月战斗期间及其后逃向我们。约旦政权当时通过一项法律，声称任何参加巴解组织并被抓住的官员将被绞死。于是，当许多官员加入我们的行列时，都携带着他们的家眷。不少官员和他们的家眷住在北约旦杰拉什森林的加沙难民营中，我曾在那儿呆过。7 月 13 日，当我们被约旦人包围时，恰好在战斗开始之前，我听到附近传来的四声手枪声响，随后一位男子在哭泣。我急忙前去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官员正跪在地上。在他的身旁躺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躯体，他刚刚杀死了他们。他是我的朋友，我对他说，‘你为什么干这样的事？’他仍然在哭泣，他说，‘我不能让他们被约旦人杀死。我知道他们一来将会发生的一切。如果我在战斗中死去，他们仍然会杀死我的妻儿，因为他们是我’

的亲人。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的朋友请求真主宽恕，他杀死了自己。几分钟后，出现了更多的手枪声响，枪声越来越多。另外两位官员杀死了他们的家人，然后杀死自己。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后来我听到有许多其他官员也都做出同样的事情。”

7月19日，瓦斯费·泰尔宣布在约旦已不再存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基地。在六天之内，一切都过去了。侯赛因的将军们已经结束了他们在1970年9月所开始的勾当——后来巴勒斯坦人把它称之为“黑九月”。

哈尼·哈桑说：“黑九月之后的一个月，侯赛因召集所有巴解组织领导人同他会晤。他向我们发表了一个十分戏剧性的声明。他说：‘已不再有理由使我们去战斗。美国人已经答应我们可以收回约旦河西岸。’”

对在场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中的一些人来说，侯赛因的声明是一个迹象，或许美国人在试图执行第二个罗杰斯计划问题是认真的。

哈尼继续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含义是很明显的。美国人曾经告诉过这位国王，他们要对以色列人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迫使他们撤退。我们完全被弄晕了，有一个长时间的沉默。甚至阿拉法特也没有说话。最后，是我打破了我们一方的沉默。我说：‘陛下，您是对的。如果您收回西岸，您将成为我们的英雄，我们将向您致敬，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将没有需要去进行战斗——如果您将西岸收回。在此同时，我们将要观察事态发展。’

“对侯赛因来说，问题是在华盛顿。他刚刚去过那儿。在他同我们正在谈话的当时，罗杰斯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仍然有一些影响。正是罗杰斯或者是在国务院的人对侯赛因作出了承诺。但是到1971年夏初，罗杰斯已经在他的斗争中失利，基辛格的影响处于支配地位，而基辛格对全面和平没有兴趣。在那个时候，他对和平全然不感兴趣。基辛格的唯一目标是把苏联人赶出中东，特别是赶出埃及。基辛格曾经研究过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的全部档案和资料，并且得出了某种结论。结论是，萨达特是一个爱虚荣的人——基辛格实际上在私下称他是一位‘小丑’——如果他，基辛格，准备给他以足够的奉承，他就会被基辛格所控制。简而言之，基辛格决定把真正的中东问题冻结起来，扼杀罗杰斯计划，同萨达特一起工作——首先把苏联人赶出埃及。当这些实现时，基辛格相信他本人会拥有巨大影响和威望，那时将能够说服萨达特同以色列人进行一项单独媾和。当然，基辛格知道，随着埃及被中立化，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再不可能去战斗。他也知道，当埃及被中立化时，以色列人就可以在中东为所欲为——为他们自己和为美国。在那种情况下，对一个美国政府来说，就不需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之撤出西岸。一旦埃及被中立化，以色列会成为中东的超级大国，而那些要求和平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约旦，将不得不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条件来谋求和平。

“现在侯赛因知道在华盛顿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感到十分沮丧。他得出他自己的某些结论。第一是罗杰斯计划和一项全面解决的主张不再存在了——因为基辛格实际上已加以扼杀。第二是基辛格对西岸根本不在乎，他所参与的美国政府绝不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之从西岸撤退。侯赛因于是作出一项决定。实际上他对他自己这样说：‘由于基辛格的立场和政策，现在每个阿拉伯领导人都只考虑他自己。既是这样，我也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我的国家现存部分的安全。不再有任何理由来和我自己的将军们斗争，以避免同巴解组织的一项最后摊牌。’在这种心情下，这位国王对瓦斯费·塔尔和他的将军们说：‘行，干吧！’”

我问哈尼，情况是否这样，即侯赛因决定在约旦消灭巴解组织，因为他要向基辛格证明，他是他自己家里的主人，能够在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同以色列媾和。

哈尼答道：“那是可能的，但是，我确信我对你所说明的是这位国王在7月行动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很少有人比哈尼·哈桑和他的哥哥哈拉德享有同侯赛因国王更真诚的关系。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但它现在是这样。仅仅出于这一原因，哈尼对为什么这位国王在1971年7月决定把巴解组织赶出约旦的分析，大概是最正确的。

它引出这样一个结论：是亨利·基辛格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责备，因为他破坏了罗杰斯计划以及纳赛尔和侯赛因在巴解组织的谅解下为谋求和平所作的努力和所抱有的希望。还应该说，以色列的领导人是盲目的，看不到在侯赛因将巴解组织赶出约旦后，如果他们想要和平的话，和平已经垂手可得。我本人相信果尔达·梅厄是真想要和平的，但是，我也认为她是以色列人自己宣传的受害者的突出典型。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仍然存在一线希望之光。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至少是它的一部分，是彻底反对基辛格的立场的，如果基辛格一旦成为美国国务卿，这些政策会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国务院作出，然而，基辛格真的在1973年7月任职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明智的人们，直至副主任一级或许更高层，都知道基辛格的立场不只是给阿拉伯人带来灾难而且给美国自己在这地区的长远的最大利益带来不幸。我的猜想是，20世纪下半叶异乎寻常的未经透露的故事之一，就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基辛格之间的连续战斗，因为美国情报人员努力阻止一位美国国务卿破坏在中东谋求和平的前景。

剩下的是阿拉法特同侯赛因政权自杀性对抗的责任问题——阿拉法特并不寻求这一对抗，而且他通过外交途径力图避免。那么，为阻止巴勒斯坦方面少数左翼和激进分子来操纵事件进程，他是否能够或者应该作出更多的事情呢？

在法塔赫的高层领导人中，多数人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塔赫应该使尽可能多的力量来孤立并控制左翼分子和激进团体，以阻止他们挑起同侯赛因的一场对抗。为了说明阿拉法特的同事是如何热衷于使用武力，阿布·达乌德向我讲述了下面一个故事。

“在我们一次与哈巴什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之间发生问题时，阿拉法特到开罗去了。在他不在时，领导机构给我一项命令，要我用武力孤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而我拒绝执行这项命令。我对领导机构说：‘你们是知道的，我本人反对我们的现行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适当方式对抗侯赛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意阿拉法特。我们不能用枪杆子来解决我们的内部问题和矛盾。’”

在过去，哈桑兄弟俩在关于阿拉法特及其主张方面有许多看法和论点上都曾经处于对立地位。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哈尼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失去约旦是因为阿拉法特拒绝对左翼分子执行纪律。我认为在我们同左派和激进分子进行辩论的时候，不向他们施加压力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和侯赛因合作的路线的时候，我们就应对那些不执行路线和破坏我们和侯赛因达成的许多停火协议的人进行惩戒和处罚。”

哈拉德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我们的优势军事力量来对付左翼分子和所谓的激进分子，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我们有两次机会可以遏制他们。第一次是在“黑九月”对抗之前。在1969年的任何时候和1970年8月以前，我们曾可以这样做。第二次是在9月战斗之后。那次是我们真正应该争取行动的时候。左翼分子完了，我们法塔赫人为了民族团结的原因使他们再次新生。但是，依我看来，那些只是我们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错误。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错误是，允许左翼分子成为原先的巴解组织的一部分。当我们在1969年接管巴解组织时，领导机构的多数人，特别是我，要把左派分子排除在外。他们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如果巴解组织的组成是在真正民主的原则上、按照对各个不同团体的人民支持来确定，这些左翼分子会连一个席位也得不到。但是，阿拉法特坚持所有组织都应包括在内——为了民族团结的原因。而阿布·伊亚德支持他。我说，我们已经有了民族团结——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国土和家园，我们要把它们收回来。你毋需说服人们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是鲜明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你必须说服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我说，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一种不相关的思想强加于我们的斗争，这将引起混乱并在事实上导致在人民中的不团结。但是，阿拉法特说，所有组织部必须包括在内。”

哈拉德加上了一个带有几分哲学味的注脚。“如果我们要正确、如实地估计我们在约旦的错误，如果我们要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左翼分子，我们不得不说，在理智上成熟和变得聪明起来之前，必须有一个成长过程，必须经历过童年和青年，不只是人是这样，政党，甚至解放运动，也必须经过同样的成长和学过程。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由于没有经验也会犯错误，因此，你必须考虑到，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缺乏经验。在1968年，当我们最初开始向约旦渗入时，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还不到5岁。而在那5年中的2年，我们是一个地下组织。在地下时不能进行真正的政治辩论。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其他左翼团体成立还不到12个月。因之，我们十分缺乏经验，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是那么多。在法塔赫，多亏纳赛尔，我们确实学得很快，以致我们必须向现实屈服。不要忘记，早在1968年1月我们法塔赫人就承认这一原则，即所有准备以平等身份生活在我们当中的以色列人，在我们的民主国中均受到欢迎。在我们政治生涯的极早期，这是向前迈出的很大的一步，你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的一个很大的让步，但是，世界没有为这戏剧性的证据而对我们加以称颂，说我们法塔赫是注重实际的人，当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经验时，我们是在根据现实进行调整。我愿告诉你其他一些事情。如你一直受到不公正对待，经常生气，那么要总是保持明智是不容易的。我们巴勒斯坦人每天都不得不蒙受羞辱。我照镜子，我知道我所看到的一切。哈拉德·哈桑在那儿。我为他刮胡子，我为他刷牙，如此等等。我是真的人。我就是我。但是，以色列人告诉我，我不存在。其实他们知道我在，他们在用炸弹炸我，证明他们知道我在。但是，他们为了否定我的权利，不得不说不存在。这是何等的狂妄啊！当我被要求成为这种狂妄的组成部分时，我能够真正地总是那么明智吗？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要你原谅或者为我们在约旦和其他地方发生的错误辩护，而是对之作出说明。”

阿拉法特不用武力去控制和遏制左翼分子的部分原因，其根源要追溯到1936至1939年期间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巴勒斯坦人起义反抗

英国占领军，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建立他们的欧洲殖民地，英国占领军在紧紧抓住这个场所。

阿拉法特说：“在起义期间，我们巴勒斯坦的领导是分裂的。对立的组织互相战斗。”

主要的分裂是出现在由阿拉法特的亲属哈吉·阿明·侯赛尼所领导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分子同那些支持纳沙希比斯及主张同约旦人一起工作的以达成一项最终同英国人和犹太人妥协的人之间。

阿拉法特继续说：“由于这一内部斗争，我们的许多领导人被暗杀了。现在，在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英国人和以色列人把他们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这段历史上。他们说，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文明的犹太人和不文明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异。当犹太人正在创建家园时，愚蠢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互相残杀。这就是在西方书籍中所写的内容——你可以读到。以色列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所说的，通常有一点儿事实——但是，就只是一下点儿，而且是非常小的一丁点儿。本质上说，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所叙述的这段历史是一个宣传谎言。事实是，当我们的领导人掉转枪口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时，我们的敌人乘机利用这有利形势，并且发动了一场暗杀运动以摧毁我们的领导。许多杀害是英国特务干的。作为一名青年和在开罗的学生领袖，我有机会来研究这些事情。我感到震惊。我发誓，我这一代决不重复过去的错误。”在约旦，当我们在和左翼分子发生严重问题时，我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前来找我，他们说：“阿布·阿马尔，你看，我们的情况危急。我们必须走阿尔及利亚的道路，我们应该准备去消灭那些在我们的运动中危害我们事业的人。”真的，我理解他们说的话。但是，我十分坚定。我对他们说：“瞧，我们不能把自己同阿尔及利亚人相比。我们不能把自己同任何解放运动相比。我们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正是由于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的敌人遍布在我们周围并渗入我们内部。如果真的我们开始互相残杀，我们的敌人将乘机毁灭我们，像他们在30年代所做的那样。”

大约就在这同一时候，当法塔赫领导人正要求阿拉法特批准使用武力时，哈尼·哈桑正在为这位主席起着特别的耳目作用。他告诉我：“我终于得悉左翼分子的一些人和我们法塔赫的一些同事正和叙利亚人一起玩弄鬼计。他们正在密谋反对阿拉法特。我终于得悉这些情况，因为我跟随他们到达他们的旅馆，并且通过我自己的秘密方法了解他们所讨论过的内容。一天，我向阿拉法特报告，我对他说，‘阿布·阿马尔，你必须采取行动。这些左翼分子和我们同事中的一些人将毁坏我们的运动，他们也许甚至力图杀害你。请吧，阿布·阿马尔，你必须行动！你一定要消灭他们！’阿拉法特说：‘不。’我感到惊讶，我对他说：‘你疯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反应。他非常痛苦地笑了，把他的双手放在我的两肩上。随后他说道：‘哈尼，你是一位年轻人，你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你要反对这些左翼分子和那些正在阴谋反对我们的同事，是对的。事实上我比你更反对他们。但是我们必须用政治方式结束他们。’接着他给我讲了1936年至1939年的历史。”“阿拉法特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当真正迫使辩论时，像我做的那样，即使那些阿拉法特的批评者中的许多人也准备承认这是——一个尚待论证的问题。确实如此。如果阿拉法特曾经批准使用武力，如果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曾经温顺地屈从法塔赫的意志而不发一枪，那么历史的进程或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但

是，如果他们抵抗法塔赫控制他们的企图，阿拉法特的恶梦毫无疑问地会变为现实。代表阿拉伯政权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打手们会迅速行动，乘机利用这一形势，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大概会被消灭。阿拉伯政权和以色列那时可以向世界宣布，巴勒斯坦人已经毁灭了他们自己。而在无知中的世界无疑会相信那是事实。

“但是，正如阿拉法特本人对我说的，‘谁知道呢？’我曾经向他提出一个建议说，他的批评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左翼分子被武力控制，法塔赫以政治手段更快地推进巴勒斯坦事业就会是可能的。‘他们也许是对的，’他回答说，‘谁知道呢？’”

阿拉法特拒绝允许用枪杆子来解决关于政策的内部争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们用枪杆子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会使我们的民主成为无稽之谈，我们的群众就会丧失对我们的信心。他们会说，‘你们要用武力强加你们的观点。你们和其他阿拉伯政权没有区别。你们为要权力而要权力，我们不准为此而去斗争和献身。’你看，民主不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民主政治中，人民必须是自由的，可以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和他们所要求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所有解放阵线和团体应当被包括在巴解组织中的原因。我一贯认为，这种自由对我们的斗争是必需的。我自己的口号是，唯有自由的人能够战斗。现在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是什么，‘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的斗争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程，它将不得不继续许多年，也许甚至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寿命。我也知道，一旦我们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抹掉，我们就成为保卫者而以色列则成为攻击者。我的口号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如果继续下去的唯一原因是我用枪口对着他们向他们发号施令，你认为我的人民会如此长久地继续这场斗争、会忍受如此多的痛苦和不幸吗？当然不是。我们的抵抗能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出于我们人民所自由表达的意志。告诉你实情，我们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能够幸存下来，不是靠我们枪杆子。如果这是武器和军事技术问题，我们早在好几年前就已被消灭了。以色列是这一地区的超级大国，而我们是在用相当于弓、箭之类的武器抵抗它。我们生存下来，因为我们民主。我们生存下来，因为我们的民主赋予人民对抵抗和斗争的主张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自由。在民主问题上，在民主如何增强抵抗意志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在给所有阿拉伯人民和国家上课。但甚至是纳赛尔，他也不懂得唯有自由的人能够战斗，作为一名领导人，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新式最优良的军事装备，但是，如果人民没有战斗或保卫他们自己的意志，你也将一事无成。不自由的人民的抵抗意志不能超出一定限度，除非他们是盲从者。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一个独裁统治之下，而你知道这个政权不关心你的遭遇，为什么你应为这样的一个政权奉献出你的生命呢？这是阿拉伯政权在 1967 年战争以后所应吸取的教训。因此，我重复说，我们得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我们民主。它是我们的生命线。在约旦以及后来，我不愿割断这一生命线，或者甚至冒割断这一生命线的危险。”

一经阿拉法特裁定，不得使用武力来遏制这些巴勒斯坦人反对法塔赫的同准备谋求公正和平的阿拉伯政权合作的政策，这时，对组成巴解组织的各个团体来说，解决他们的根本分歧只有一种方法——通过谈判。

阿拉法特是一位主张意志一致的政治家。从 1969 年至 1971 年这段期间和在以后的整个年代，这位主席为创建巴解组织内部一致，承担了看来似乎

不可能的任务，他为此受到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的许多批评，他们说“使形成决定的进程瘫痪”。从 1984 年的情况来看，两个结论是合乎逻辑的。第一个是，阿拉法特形成一致意见的允诺使巴勒斯坦领导可以自由地公开承诺进行某种称解的日子拖延了好几年，法塔赫领导人，特别是阿拉法特本人知道，如果巴勒斯坦人要取得一定程度的公正对待，这种和解是必需的。第二个是，阿拉法特的立场经时间和事件的证明是有道理的和正确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阿拉法特靠内部会谈而不是靠枪杆子迫使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屈服让步。他从未忽视他的更多缺乏耐心的法塔赫同事们并不总是准备面对的这一基本事实。正如阿拉法特本人对我说的那样：“你不能把和解强加于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么和解将在第二天，第二个月或者第二年受到怀疑。处于我们的情况，只有通过讨论、辩论和达成协议取得，和解才能发挥作用。”

我请阿拉法特假设，我们能够把时钟拨回到 1968 年左右。“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说，“你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在约旦的危机吗？”

他答道：“不。我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来对付那种形势。”

在约旦的事件是对巴解组织阿拉法特领导品质的第一次考验。按照我的判断，从这次事件中，他带着对他的更多信任出现。关于他拒绝批准使用武力反对左翼分子的讨论，无论如何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讨论。即使他曾使用武力，而武力起了作用，在约旦的摊牌可能会被推延，但是，不会避免。以色列人和基辛格下了决心，要消灭巴勒斯坦解放运动。5 年之后，当巴解组织从它在约旦的挫折中恢复过来，并且开始赢得重大的政治胜利时，还是这同一队人马——以色列加上基辛格——再次投入行动。正如阿拉法特所说，“就我的人民所关心的来说，约旦的内战和黎巴嫩的内战之间的唯一不同是，被要求来为以色列和基辛格的美国干这肮脏勾当的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派民兵和叙利亚人，而不是侯赛因。”

第十六章恐怖武器

关于“黑九月”（恐怖）组织的真相可以概括如下。它是法塔赫的一部分。全部领导，包括阿拉法特，曾辩论过玩恐怖牌的问题。但是，法塔赫领导没有作出过采取恐怖行动的决议。当时，除了被普遍认为仅次于阿拉法特的二号人物阿布·伊亚德之外，听有法塔赫的高层领导人都反对使用恐怖武器。作出决定的是法塔赫普通战士中饱受痛苦的人士。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人对我的说：“你可以说，黑九月组织是那些为保持抵抗运动存在而准备牺牲自己的突击队员们的灵魂。”阿布·伊亚德本人说，他认为如果没有使用过恐怖武器，运动就已经被消灭了。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法塔赫领导人对他们的组织失去了控制。

我问哈拉德·哈桑，他是否反对这样的结论。他说：“不，这是公正的，但这不是全部事实。如果领导人是明智的，他们知道他们曾多次无法控制事态，而如果他们试图控制的话，这将得到适得其反的后果，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灾难是如此巨大。那么多人民惨遭杀害。那么多人失去了父亲、丈夫、兄弟和亲戚。自然，在我们方面有极大的痛苦和愤怒。加之人们普遍认为——实际上这是事实——美国人，某些美国人，对促使侯赛因去做以色列的肮脏勾当应负主要责任。我们的战士也知道，伊拉克人背叛了我们，叙利亚人为了方便侯赛因关闭了他们的边界，而一些其他阿拉伯政权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遭遇正在暗自高兴。在约旦、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政府控制的报纸以兴高采烈的心情宣称巴解组织完蛋了。当他们处于这种境况时，愤怒和失望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阿拉法特和他的在法塔赫领导集团中的多数同事们从一开始就谴责采用恐怖手段，并在以后努力阻止使用，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向哈拉德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答道：“我们将失去我们作为领导人的信誉；在我们的普通成员中将无人听信我们，而恐怖行动仍然要发生。我们中的一些人将被暗害。大概我会成为头号目标，因为在我们的运动内部谁都知道哈拉德·哈桑是公开批评使用恐怖武器最多的人。在领导机构中，我们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办法，使我们自己和基层群众玩恐怖牌的决定相联系，以便为我们的行动创造必要的信誉，这样，当我们认为时机成熟时，可以进行控制并最终停止恐怖机器。那就是阿拉法特从一开始起就有的意图和目标。我们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百分之百地支持他。我本人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

如果阿拉法特控制并进而停止恐怖机器的战略得以执行，1972年9月的慕尼黑行动将会是“黑九月”的最后一次。在这一事件中，由于以色列人坚持在慕尼黑机场武力解决，这一行动的结局是灾难性的，并标志着这场冲突的一个恶性的、危险的升级的开始。它把中东，而且几乎把世界，带到1973年的10月战争。

黑九月组织的故事和阿拉法特使之停止行动的斗争始于开罗。在那里，在1971年11月28日，瓦斯费·塔尔在走进希拉顿旅馆去参加阿拉伯联盟的联合防务理事会时被暗杀。在侯赛因对巴解组织发起最后进攻的时候，瓦斯费·塔尔是约旦的总理兼国防部长，直至他去世。

据黑九月组织当时声称，瓦斯费·塔尔是它的第一个受害者。而且根据历史，他的谋杀标志着它的国际恐怖运动的正式开始。但是，“黑九月”的说法是不对的。三名“黑九月”恐怖分子中的一人从旅馆外向瓦斯费·塔尔

开枪射击，这肯定是真的。但是，正如埃及验尸官在接到不许在公开场合发言的指示之前所披露的，真正打死瓦斯费·塔尔的子弹不是巴勒斯坦人射击的。据目睹者包括两名阿拉伯领导人所说，瓦斯费·塔尔从他的汽车里走出来，立即被旅馆里发出的子弹所击中，他急速地抓住自己的枪，跑向旅馆寻求掩蔽，紧接着就倒了下去，其时从旅馆外来的子弹向他射击。正如验尸官所披露的，当“黑九月”的枪手开火时，瓦斯费·塔尔由于被第一颗子弹击中而面临死亡。

这样，谁真正杀害了瓦斯费·塔尔？按照在哈拉德·哈桑帮助下现在可以揭示的新的证据，最似有道理的答案是，他是被一名约旦秘密特务暗杀的。这名特务的指挥机关是一项阴谋的组成部分，萨达特总统和也许一个或一些基辛格的幕后渠道合伙人卷入其中，目的是阻止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在约旦军事上失败之后采用政治手段来推进他们的事业。

哈拉德揭示的最惊人之处是关于谋杀的动机。他告诉我：“瓦斯费·塔尔是在将要同巴解组织签署一个历史性协议之前 25 分钟时死去的。代表巴解组织一方将要签字的人是我，出席的有阿拉伯联盟国防部长们。”实际的协议在前一天的瓦斯费·塔尔和哈拉德·哈桑之间秘密会谈中已经达成。瓦斯费·塔尔是当时约旦最强有力的人物，他在单独行事；他责成他自己，作为总理兼国防部长，去商谈并签订一项他明知会受到国王身边许多人的反对的协议。

当瓦斯费·塔尔遭到致命的射击时，哈拉德正驱车前往希拉顿旅馆的路上。他说：“我刚下车，一个我很想再次相会的人——为了向他致谢——立即走近我身前说：‘哈拉德，请不要从前门进旅馆，从后门进。’我问：‘为什么？’他说：‘请你只是按我的话去做。’然后，当我正在走向后门入口处时，我看到一位记者朋友。他一认出是我，就开始呼叫起来：‘哈拉德，快到这儿来，我碰到了麻烦，请帮助我！’当我们靠近时，他说：‘我没有什么麻烦事，但是我必须在我的汽车里跟你说。’这时离我会见瓦斯费及其他国防部长的时间还有 20 分钟，所以我说：‘好。’我们刚坐进他的汽车，他就发动了引擎，驱车走了。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答说：‘哈拉德，信任我，到我家里去谈。’我们进了他的家，我说，‘行啦，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绑架我！出了什么事？’他回答道：‘你是一个傻瓜吗？瓦斯费·塔尔刚刚被暗杀了。如果你一脚踏进希拉顿旅馆，你会被杀死的！’可能是这两个人救了我的命——但是我们失去了和瓦斯费的协议。”

明显的含意是，暗杀瓦斯费·塔尔，在于阻止执行他即将签署的协议。根据哈拉德对我说的——他就协商进程对我作了一个很长的、详尽的介绍——协议的主要之点是巴解组织将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回到约旦。在这两个人之间达成的交易的实质是，巴解组织允诺仅以政治手段进行解放斗争，作为回报，约旦将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承认实际上包含在协议的第三条中。

大多数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准备放弃武装斗争作为求得解放的手段，即使要付出分裂巴解组织的代价——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阵线和一个伊拉克赞助的小组织曾说过，他们将破坏这项协议——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证明，表明大多数领导人是如何极度渴望避免被迫在黎巴嫩建立最后军事阵地。在巴解组织从约旦被逐出以后，尽管阿拉法特相信政见一致，但很显然，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取得重返约旦的回程票。当我向哈拉德

提出这个看法时，他严肃地点点头。“是的，”他说，“你是对的。鉴于近几年在黎巴嫩发生的情况，我不能过分强调我们法塔赫不是幼稚的。由于我在前面已经向你解释过的原因，我们知道，黎巴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陷阱。我们懂得，如果我们被迫扎根在黎巴嫩，以色列人会把它变成屠杀场，而我们仅仅为了保卫我们自己和我们人民，就不得不继续采取军事斗争，这就是我和瓦斯费·塔尔协议的重要性。这不仅给我们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政治斗争的机会，而且使我们免于被推进黎巴嫩的陷阱。已发生的情况是，由于瓦斯费·塔尔被暗害，我们被推进了陷阱。一旦我们被发觉，以色列人肯定不会罢手，直至他们把我们毁灭——或者至少直至他们能最大限度地摧毁我们。

我问哈拉德，他是否认为，如果瓦斯费·塔尔还活着，那么自1971年以来发生的许多灾难能够得以避免。他答道：“在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不能。在理论上有充分理由可以说黎巴嫩将免经痛苦折腾——但是，即使对此我也不能十分肯定。如果瓦斯费仍然活着，如果我们跟他一起实现我们达成的协议，以色列人和基辛格将会想方设法使约旦动荡，以便把我们消灭在那儿。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许总有一天要在黎巴嫩。我同瓦斯费的协议将会给我们所有的人结束暴力的机会，但是没有理由相信以色列领导人有结束暴力的任何意愿，除非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已被消灭。如果我变得现实一点，我想我应该说，我们从我和瓦斯费的协议中唯一真正所得是在公众关系领域。我们的新的现实主义将会受到西方客观的和开明的人士的欢迎，我们将会赢得对我们事业的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即使如此，那或许也会有反作用的。你现在应该认识到的，对我们斗争的真实历史的坦诚研究表明，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巴勒斯坦人越是表现出我们准备面对现实并且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以色列人就越是使他们的军事行动升级——因为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在政治战场上交锋。他们知道，在政治战场我们至少是他们的平手。”

有一个人对瓦斯费·塔尔独自决定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协议一事负有主要责任，此人即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哈拉德说：“在一次从亚历山大乘火车到开罗的旅行途中，我说服费萨尔成为我们和约旦人之间的调停人。我们四个人在一个特级车厢中——萨达特、费萨尔、阿拉法特和我。费萨尔同意成为调停者，这对我们十分重要。在我们阿拉伯的传统中，引起调停失败的一方就变成调停者的敌人。因此，坦率地说，人一开始侯赛因和他的人就被置于不利地位！”

瓦斯费·塔尔本人一直没有卷入，直至谈判将要破裂的最后几分钟。

哈拉德继续说：“我们在火车上谈话以后，费萨尔完全明白什么是对我们巴勒斯坦人、对整个阿拉伯人以及对世界生死攸关的事。”在火车上，哈拉德和阿拉法特告诉费萨尔，如果他不协助他们获得一个政治基地，他们将会失去对巴解组织内部的左派分子和激进分子的控制——包括法塔赫内部那些正在转向恐怖行动的人。正如哈拉德说的：“我们请求费萨尔给我们机会，以便把我们方面的愤怒和痛苦从暴力转而引向对积极的政治行动的支持。我们毋需告诉费萨尔，如果我们失去控制，将出现暴力升级，从而给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及其他地方进行毁坏活动的机会，并且导致阿拉伯温和力量届时瓦解和失败，最后，导致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垮台。这就是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在——而且现在仍然如此。费萨尔了解这一情况。他也知道基辛格是笨蛋一

个，正是基辛格的立场把这一地区和世界推向灾难的深渊。在法塔赫中的我们正在极力以积极的政治的方式来加以引导，基辛格却要割断我们这些人的立足基地。”

约旦人在正式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他们的立场——对巴解组织说“不”，言外之意，就是对费萨尔说“不”。我问哈拉德，他是否了解当时侯赛因本人的立场是什么。他说：“如果一定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说，侯赛因本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肯定地，一些围绕他身边的人，将军和文职官员们，百分之百地反对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

阿拉伯部长会议只有几天就要在开罗召开，可是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哈拉德继续说：“费萨尔越来越生气。当他的耐心达到极限时，他给侯赛因发出一封非常强硬的信，要求他在一定的时间内回答‘同意’还是‘不同意’。请不要问我，如果侯赛因的回答不是费萨尔所希望的，他准备怎么办。我真的不了解。那是两位国王之间的事。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安曼受到沙特阿拉伯的巨大的压力。”

在这关键时刻，瓦斯费·塔尔未经同侯赛因磋商，决定由他本人对约旦关于巴解组织的决策负起责任。他飞往开罗去参加阿拉伯联盟国防部长会议。当他一到埃及首都，他就立即受到所有部长们的很大压力。但是，施加最大压力的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部长。瓦斯费·塔尔终于开始了他同哈拉德·哈桑的秘密会谈。

除黑九月组织以及在约旦的军事、政治和情报机构中的某些人之外，萨达特总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不赞成实现瓦斯费·塔尔的协议。对萨达特来说，协议中不能接受的部分是第三条——约旦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到1971年11月，萨达特正热衷于同基辛格进行幕后渠道的交往，他充分了解基辛格的立场和思想，肯定同基辛格的美国作交易是可能的。如果萨达特能够把苏联人从埃及赶出去，基辛格将以归还西奈换取同以色列的单独媾和作为对他的回报。但是，萨达特出于自择不想单独媾和。他希望有一种全面解决办法，能把约旦包括进去。而问题在约旦。如果侯赛因能自由地代表巴勒斯坦人，萨达特认为可能的是，基辛格将能劝说以色列撤出西奈和西岸——或者至少是西岸的相当部分，以使侯赛因高兴。但是，如果侯赛因由于瓦斯费协议的第三条而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就不会进行关于西岸的谈判。这就给萨达特留下一个选择：或者单独干下去，这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最后终于使他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或者坚持巴解组织有发言权，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和基辛格对任何交易都不感兴趣。总而言之，如果瓦斯费的协议得以实现，萨达特就必须进行危险的单独媾和或者一事无成。要是埃及在所谓的和平进程中一无所得，萨达特在他的内部阵线中将面临严重危险。国家在沸腾着。群众生活水平是骇人听闻的而且在继续下降。没有钱和其他能伴随和平而来的发展财源，国内局势面临巨大的日益增长的爆炸的危险。埃及需要和平，而要取得和平，萨达特需要有约旦和他在一起。如果瓦斯费的协议得以实现，这将是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基辛格和他的那些合谋者们花了如此巨大力气以迫使侯赛因打击巴解组织，对他们来说，巴解组织重返约旦将是一个明显的重大的挫折——正当基辛格开始使适当的人们相信他应成为国务卿之时。除此之外，一个政治性的巴解组织将开始在西方世界赢得朋友，而这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继续坚持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将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还有萨达特的反应问题。当

萨达特被告知，如果约旦不能自由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将不同约旦进行谈判，那么萨达特会有勇气去进行单独媾和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基辛格的全部中东战略也许注定要失败。还有这样一个危险，即约旦将开创一个先声。一旦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其他阿拉伯国家就不会照做吗？如果他们做了，而且只要以色列拒绝和巴解组织打交道，美国将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一个信任问题，而这将有助于苏联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不难理解，为什么基辛格和他的同谋者把瓦斯费·塔尔同巴解组织的协议看成是一个潜在的和非常实际的问题的根源。

因此，是谁杀害了瓦斯费·塔尔？谁扣动左轮手枪的扳机射出了致命的一枪？谁批准这次暗杀？当我向哈拉德提出这些问题时，他的回答的第一部分如下：“如果你要求我认证实际凶手，我不愿意。我知道那是谁，而且我可以说，两位在希拉顿旅馆并且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情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知道那是谁。这两位领导人是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我还知道，瓦斯费的遗孀最后知道了全部真相。我准备要说的是，实际的暗杀者是一个约旦分子。”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说，“我想明确的答案是，瓦斯费·塔尔是被一名委派去保护他的约旦人击中的。”哈拉德开始没有反应。然后他说，“我相信，我们的谈话记录在其被写入你的著作中时，将会作为你说的话加以引用，而不是我说的。”

萨达特在暗杀阴谋中的作用，是我在同哈拉德多次谈话过程中几度重复提出的话题。我知道，事实真相是来自同所有法塔赫领导人谈话中所揭露的点点滴滴情况积累起来的，而在我这方则需要耐心和坚持。

根据哈拉德的介绍，萨达特本人的作用表现在下达一项指示，即对瓦斯费·塔尔不给以任何埃及的安全保护。我后来发现这一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在阿拉伯世界被普遍承认。在萨达特当时被问及此事时，他说到在埃及很多人憎恨瓦斯费·塔尔，他忧虑会出现暗杀图谋，他不希望对瓦斯费的生命承担责任。基于这些理由，显然，萨达特建议约旦人应该保卫他们自己的人。

哈拉德说：“在埃及许多人不太喜欢瓦斯费，这是事实，至少可以这样说。但是，萨达特讲的其余的事是捏造。如果他真的为谋害瓦斯费生命的企图忧虑——我的意思是他事先不知道这一图谋——作为总统他有责任和义务下令指派两倍或三倍的埃及安全人员来保卫瓦斯费。如果瓦斯费得到即使正常的或最小的埃及的安全保护，我不相信他会以他那时被害方式遭受杀害。”在瓦斯费·塔尔死后不久，约旦的参谋长说，“像这样的人物应当得到较好保护。”

随后我对哈拉德说，“这样我们可得出结论——为了阻止瓦斯费·塔尔和你的协议得以实现，某些在约旦的不知姓名的人与萨达特总统和在埃及的其他人合谋杀害了他。”

哈拉德答道，“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在美国的不知姓名的人有没有卷入？”我问。

哈拉德说：“对这样一种严肃的事情，我认为我不应该去猜测我不能证实的东西。可以作出某些结论，但是我不想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瓦斯费·塔尔仍然活着，他能成功地使协议起作用吗？”

哈拉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揭露性的，其含意是令人惊讶的。他说：

“首先，你必须知道，瓦斯费是一个非常强硬、非常冷酷但又非常诚实的人。其次，你不应忘记，他在当时是约旦的强有力的人物。第三，你应记住，他曾经重新组建了约旦的武装力量。这是说明背景。现在，我要告诉你，在他被杀害的前一天，在我们最后一轮秘密会谈对他对我说的话。他说：‘假设国王不接受这项协议……你愿对我所能做的事给予支持吗？’我说，‘是的，任何事情。’”

这明显的含义是，如果侯赛因国王反对同巴解组织的协议，瓦斯费·塔尔就准备迫使他流亡。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情况，如果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证实他们政治上是有力的，那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以色列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撤出被占领的西岸，因为这已十分清楚，在以色列军事力量可能得到的限度之内，巴勒斯坦问题十分接近于解决。

正如哈拉德·哈桑早先说过的，很可能以色列人和基辛格将共同努力使约旦的新政权不稳——这个新政权或许是由瓦斯费·塔尔总统所领导——以便为以色列制造借口用军事手段来消灭巴解组织。但是，也许以色列人和基辛格并没有能使事情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如意算盘进行。从以后的事态来看，特别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充当尼克松和巴解组织之间秘密对话的联系人这一情况来看，新的形势有可能表现为基辛格和中央情报局内反基辛格派作出戏剧性的摊牌，如果瓦斯费·塔尔仍然活着的话。正如阿拉法特在谈到另一问题时所说：谁知道呢？

瓦斯费·塔尔的被暗害，实际上破坏了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努力。他们正力图把所有从事解放斗争的人们的愤怒和失望情绪从暴力引向对政治行动的积极支持。如同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从亚历山大到开罗的火车上向费萨尔所预测的，领导层随后开始对采取暴力的人失去对事态的控制——法塔赫黑九月组织分子和斯他游击队组织特别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中的极端分子。对后者来说，使用恐怖武器已不是新鲜事。对那些在法塔赫的人来说，则是新事。

在法塔赫的普通战士中，帮助从基层建立黑九月组织的是一位年青人，他入伍时的化名叫本·贝拉。现在他是阿布·伊亚德的特别助理。当我同本·贝拉谈及这个组织的建立时，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在瓦斯费·塔尔去世后，我们收到人民群众数百份要求参加黑九月组织的申请。当然很多是我们法塔赫的弟兄；有些则是我们在其他组织中的同志；还有一些是以前不属于任何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团体的散居在外的群众。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话：‘你们终于找到了使全世界都听到我们声音的办法。’”

我向本·贝拉问及阿拉法特对黑九月组织的态度。他说：“那时阿拉法特不能公开说反对我们的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行动得到我们运动中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我们的道路是人民的道路。但是，在我们私下会见中，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告诉我们，我们做错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说：‘你们疯了，把我们的战斗打到欧洲。’我非常生气，我说：‘阿布·阿马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是疯了——但是，请告诉我：每天在黎巴嫩坐等以色列战斗机来袭击，对我们来说这也不是疯了吗？眼看我们每天要失去十来名战士而对我们的事业却毫无推进，这难道不也是疯了吗？’”

曾经努力从巴勒斯坦方面去理解黑九月组织情况的记者和作家们经常说，黑九月组织“与其说是一个这样的组织，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两者俱有。这是一个组织中的组织；它有它自己的指挥机构；它享有法

塔赫的通讯和情报汇集的方便。它的领导人是阿布·约瑟夫、卡迈勒·阿德万和阿布·哈桑·萨拉梅赫。当时在以色列的各种情报机构中工作的人很快就了解这一情况。在瓦斯费·塔尔死后几个星期，莫萨德渗透到黑九月组织。莫萨德特务是一些在西欧受到讹诈和恐吓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混杂在数百名申请加入黑九月组织的人群当中。这样的日子会到来：以色列人可能将以最残暴和最富于戏剧性的手段来表明，他们知道所要知道的关于黑九月组织领导人的全部情况——他们是谁，他们可以在哪里被找到并被杀害。

哈拉德·哈桑就他的法塔赫同事转向恐怖一事，不得不这样说道：“如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反对玩恐怖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另外一些事情。那些转向恐怖的我们的法塔赫的同事们不是没有头脑的罪人。他们是狂热地献身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正在尽他们认为应该尽的义务。我不得不说他们错了，当时我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必须理解他们。在他们看来，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世上的人正在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说，‘我们对你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一点也不关心，除非你们对我们的利益是一个威胁。’作为回答，那些法塔赫里转向恐怖的人在说：‘好的，世人们。我们将按照你们的规则来行事。我们会使你们关心的！’这不表明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说明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动。也许有一天第三世界的行动团体转向恐怖活动，从而使你们西方人关心那每年杀害千百万人的贫困。当那一天到来时，你会称那些行动的人为恐怖分子，但是，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只能谴责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没有给予应有关心，直至你们被迫去关心。”

阿布·哈桑·萨拉梅赫是黑九月在欧洲行动的指挥者和协调人。他的第一个成为头条新闻的行动是1972年5月初劫持萨布纳客机。他的4名恐怖分子迫使飞机降落在以色列的卢德机场。在那里，他们威胁，如果以色列不释放106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他们将炸毁飞机，他们自己及90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将同归于尽。等待了将近24小时之后，以色列突出队员穿着全身白色的机场机械师服装强攻飞机。两分钟全部解决问题。4名劫持者中的两人被杀害，6名受伤的乘客中有一人后来死亡。

在5月底，卢德机场再次成为恐怖行动的场所。这一次这项行动是由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策划的，但是，实际执行的是被称为赤军的日本恐怖分子组织的3名成员。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恐怖首领瓦迪·哈达德认为，理所当然没有巴勒斯坦人能够从事他想要做的这件事。这三名神风队队员从巴黎和罗马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到达。作为日本人，他们没有受到怀疑，他们进入海关大厅等待他们的行李到达。他们的箱子一到，他们就立即打开，急速取出冲锋枪和手榴弹，并向人群开火。最后的伤亡数字是25人被打死，78人受伤。恐怖分子中两人自杀。第三人在他能够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之前被制服。当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时，它把这一行动描绘成为它的“代尔亚辛”。这也很清楚，它要显示凡是黑九月组织能够做的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可以做得更好。

阿拉法特和他的在领导机构中的反对使用恐怖武器的同事们，对卢德机场的屠杀感到震惊——袭击的凶猛、生命的丧亡、在世人的心目中对巴勒斯坦事业造成的伤害以及两个组织之间由于竞争而燃起的一个不断升级的恐怖运动的前景。

正是在这时刻，阿拉法特和所有他的在法塔赫高层领导中的同事们决定，他们必须，可以这么说，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以便打击他们。将要进行

的是一项属于最不寻常性质的处理危机的行动。但是，它仍然是危机处理。我问哈拉德·哈桑，这样行事是否为正当做法。他说：“非常坦率地说，是的。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同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从而使我们自己取得控制局势的信任，然后关上你所要称之为恐怖的龙头。正是由于这种处理危机的行动，阿拉法特、我本人和领导集团中其他反对使用恐怖武器的人，被称为恐怖分子。”

作为主管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安全和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阿布·伊亚德承担了计划和组织一项“黑九月”行动的责任，他和其他人都希望这项行动会得到集体领导的支持，如果这一战略得以实行，它将是“黑九月”的最后一个行动。

这项行动的目的——扣押一些以色列人质以寻求释放被囚禁在以色列的200名巴解组织成员——没有太多争论就取得了一致。只是阿布·伊亚德宣布逮捕以色列人质的地点，震动了他的许多同事。将要被扣押的人质是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以色列运动员，从而保证这出戏的实况转播的遍及全球的电视观众。法塔赫的一些领导人争论说，扰乱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们说，体育运动在西方和东方是一心追求的目标。干扰它将是一个错误。从公众关系的观点来看，巴解组织将是得不偿失。另一些领导人争辩说，法塔赫应该坚持它的一项根本原则，把行动限制在巴勒斯坦。因此，为什么不在以色列拘捕人质呢？如果从公众关系来看，那还不够戏剧性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改变目标和地址而在以色列拘捕美国人质呢？阿布·伊亚德赢得了争论。没有阿拉法特的支持，他能取胜吗？我想不能。

阿布·伊亚德对组织慕尼黑行动担负着执行责任，但是准备工作和以后贯彻实行这项详细计划是由许多人进行的。据哈尼·哈桑说，在慕尼黑，巴勒斯坦学生和工人在这项行动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他说：“其后果是，他们中的数百人在事件过去之后被驱逐出德国。”我从其他法塔赫领导人处得悉，如果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的支持和提供的方便，这一行动是不可能的。这些便利条件大概包括协助传递信息和运送武器和人员。

在9月5日清晨5点钟左右，8名“黑九月”恐怖分子中的一人从奥林匹克村以色列人住所的一楼窗口抛出一张纸条。它宣称黑九月组织扣押着9名以色列人质，如果以色列不释放被囚禁的200名巴勒斯坦人，他们将被枪杀。

德国政府将此情况通报了以色列政府。以色列的答复是不妥协的。以色列拒绝了最后通牒和同恐怖分子谈判释放人质的任何想法。以色列人并且要求立即反击。事实上，以色列政府拖延它的回答，直到他的保安人员已经从特拉维夫降落到慕尼黑。以色列人说，他们行功前的任务是“劝告”德国警察当局。

可以这么说，这是德国的表演；但是，毫无疑问，以色列人在发号施令。德国人允许这一情况发生，部分地是因为这属于以色列人的生命攸关的事；部分地是因为德国人准备承认以色列人是专家；部分地是因为以色列人施加了等于在恐吓德国人的压力——那就是用武力解决的压力。从我本人同当时德国当局的一些人的谈话中，我对维利·勃兰特总理赞成用非暴力结束这一事件十分满意，他想用以色列人质的生命来换取黑九月恐怖分子的生命。如果这样，黑九月组织就可以声称它的行动取得了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巴勒斯坦事业的效果，但是，它仍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释放被囚禁在以色列的200

名巴勒斯坦人——并且会被看成是失败了。

以色列保安人员有效地控制慕尼黑地面 14 个小时稍多一点，这 9 名人质和这 8 名恐怖分子中的 5 人都死了。

在晚上 10 点钟左右，恐怖分子和他们的人质被两架直升飞机带到费尔德法尔布鲁克军用机场。在那里，离开降落区域大约 150 米左右，一架波音 727 飞机闪亮着灯光正等候着运载他们飞往开罗。恐怖分子怀疑这是一个圈套，他们被告知说，埃及同意看管人质直到以色列政府释放巴解组织被囚人员。

当直升飞机着陆时，5 名射击手、不知其数的但实际上数量很多的带着冲锋枪的武装警察，加上 600 名边防军，都严阵以待。还有充足的泛光灯照明静待启动。

两名直升飞机的驾驶员从他们的机舱走下来，两名恐怖分子跟随并控制言他们。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分别从两架直升飞机走出来，走了 150 米左右，检查正在等待起飞的波音飞机。他们发现在机舱里没有机组人员。当这两个人正返身走向直升飞机时，射击手开火了。两名恐怖分子开始奔跑，一人被击中并被带到直升飞机下掩护。控制直升飞机驾驶员的两人已经死了或濒于死亡。从一架直升飞机里面，另一名恐怖分子开枪还击，一名射击手被打死。

在晚上 10 点 50 分，警察号召恐怖分子投降。由一名以色列保安人员用阿拉伯语反复呼喊。过了 2 小时 15 分，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时 9 名人质和恐怖分子中的 6 人仍在两架直升飞机中，警察开枪了。一名恐怖分子从其中的一架直升飞机上跳下来，扔进一枚手榴弹。另一人向第二架直升飞机内射击。这就是阿布·伊亚德向我描绘的“一场以色列人和我们的悲剧”是如何的结束的。

在 2 小时 15 分钟时间内，在费尔德法尔布鲁克机场上什么动静也没有，果尔达·梅厄和她的高级部长们正为怎么办而极度苦恼。为了避免给以色列人造成出现危机的印象，没有召开内阁会议，高级部长们到耶路撒冷果尔达的官邸拜访她。以色列的一些或者绝大多数部长们，主张最优先考虑挽救人质的生命。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达扬为反对这种意见在他的许多威胁中提出了以辞职相威胁。达扬至少考虑要辞职的传说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非常盛行。在人质被害后几小时，但在以色列和世界尚不知道他们已死去之前，《耶路撒冷邮报》以大字标题报道说：“尽管有谣传，达扬仍在位。”

达扬要冒牺牲以色列人质生命的危险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在这事件中，这的确是为更广泛的以色列的利益和事业服务的。它否定了阿拉法特的胜利，他需要这一胜利来恢复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们对他的领导的信任。除此之外，达扬在慕尼黑的强硬立场，进一步挫伤了所有那些参与解放斗争的巴勒斯坦人的低落和贫乏的士气。作为这一事件的后果，阿拉法特现在发现他本人作为领袖要为他自己的存在而斗争。

在法塔赫的慕尼黑行动失败之后，阿拉法特是如此失望，以致他不得不佯称赞同一项推翻侯赛因的计划以争取时间。当这一伪装必须停止时，组织这一计划的负责人阿布·达乌德被出卖给约旦人了。随后的事态戏剧性地说明，阿拉法特为了生存和来日再为缓和与和解奋斗，不得不施展危险的策略。

以色列对法塔赫慕尼黑行动的反应是，大规模地袭击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阵地和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区。空袭和陆地入侵结合进行，以色列地面部队洗劫巴勒斯坦人财物，摧毁整个村庄。300 到 500 名巴勒斯

坦人被杀害。一如往常，当以色列人使用他们的喷气战斗机作为飞行火炮时，死亡的多数是老百姓，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而这与以色列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即每一个犹太人由于巴勒斯坦行动而被杀害，就要使 30 至 40 有时甚至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丧生。

但是，这次进攻恰恰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三天，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反对巴解组织的战争的新的升级的开始。以色列强化攻击并使之经常化的结果之一是，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感到开展游击行动是越来越困难了。另一结果是，黎巴嫩当局正在增加对阿拉法特的压力以谋求协议建立禁区——黎巴嫩禁止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进入的地区。为了防止和黎巴嫩军队的严重对抗，阿拉法特对贝鲁特当局要求他的每一件事或多或少都同意。但是，人一些法塔赫的野战指挥官们看来，当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们正在从他们合情合理的安全的领土走出时，阿拉法特向黎巴嫩人作出了过多的让步。结果是，在秋天一些法塔赫军官由于反对阿拉法特同黎巴嫩当局合作而叛变。在阿尔及利亚大使的干预和调解下，一场潜在的严重危机从而被避免。主要的叛变领袖阿布·优素福·卡伊德被流放去阿尔及利亚。

整个 1972 年，阿拉法特为了补偿剥夺他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的自由，就把他的更多的兵力集中到叙利亚边境地区，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大多数袭击是从叙利亚领土上发动的。在 10 月和 11 月，以色列人的反应是用空军和大炮大规模袭击在叙利亚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地区和渗透路线。同时，以色列人承认，他们的攻击不只限于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这一目标。他们袭击村庄“只是作出例子”——换句话说，是要说服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叙利亚公众不值得去援助和安慰游击队。此后，叙利亚政府采取行动拒绝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通过叙利亚领土进入以色列。

在 1972 年底临近的时候，阿布·达乌德概括在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运动中广大战士的情绪如下：“不只是阿拉法特和我们的高层领导人知道，我们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是没有安全和没有前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正在对我们自己说，除非我们能够赢得约旦，否则我们的解放运动将被消灭。”

如果法塔赫是团结的，阿拉法特也许能使他自己（以及法塔赫）与再次号召推翻侯赛因及随后实际上要除掉他的秘密计划割断联系。但是，法塔赫是分裂的。哈尼·哈桑向我谈了关于在法塔赫内部已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着的事实真相。

他说：“在我们从约旦被驱逐以后，在法塔赫内部发展了一股左的潮流。我们组织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渴望苏联人站在我们一边，以致他们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苏联人利用他们。我还必须告诉你，请不要误解我，我们法塔赫的左派分子中，不管怎样，没有人是共产党人或亲苏分子。他们成为自命的左派和激进分子，纯粹是为使他们自己能引起苏联人的注意。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想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他们说：‘真正在后面支持消灭我们解放运动和我们事业的企图的是美国人。如果我们要生存，因而，我们必须有另一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后面以实际方式支持我们。’

“于是，我们法塔赫的左派分子和另外的左派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阵线、等等——结成了一个策略上的联盟。阿拉法特把这看成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了避免法塔赫内部的分裂，也为了保持对巴解组织的控制，他同全部左派结成了他自己策略上的联盟。我本人、

哈拉德和在法塔赫里的右翼分子非常反对阿拉法特这项策略。我们说：‘是的，这是真的，我们必须要有苏联人的支持和后盾——但是不能采取会有损我们独立性的方法。’

“阿拉法特说，他同意没有比维护巴勒斯坦的独立决策更为重要了。但是，他又说，我们需要使用策略手腕。他向我们解释的战略在当时是十分明智的。他说的内容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用政治手段来推进我们的事业，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要有苏联人的支持。然而存在一个问题。亚西尔·阿拉法特、哈桑弟兄、阿布·杰哈德和大多数法塔赫高层领导人，对苏联人来说独立性太大了。这意味着莫斯科将不会支持法塔赫，除非它感到在内部有它自己的人。’这也是阿拉法特为什么愿意同左派分子联盟达成和解的一个原因，”

那是在 1971 年初，苏联人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去接触巴解组织。哈尼说：“苏联驻安曼使馆的一个人和我们接触。他要求会见阿拉法特。我们曾经试图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可是失败了，所以我对他说‘可以’，并且带他到山上去会见阿布·阿玛尔。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你，这位苏联人对阿拉法特的谈话使我非常吃惊。他对主席说：‘现在我想你该明白这个教训，没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合作，你将一事无成。’当然，他的意思是，美国人应对 9 月在约旦对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这是事实——如果我们要反对美国人保护自己，我们就需要苏联人。他还明显地暗示说，苏联人将会帮助我们——但是要按照他们的条件。”

那次山顶会见的结果是，阿拉法特被邀请对莫斯科进行首次正式访问。但是，即使在那时，苏联人仍然扣发了正式邀请，直到巴解组织从约旦被逐出。他们显然设想或者至少希望，阿拉法特沮丧失望，足以使他或多或少会成为苏联的傀儡。但是，苏联人不免感到惊讶。亚西尔·阿拉法特是不愿意用巴勒斯坦人决策的独立性来做交易以换取苏联的支持的。为了表明这点，他为他的苏联主人作了一次关于他如何把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奉为他的神圣之物的简短讲演。这样，苏联人对阿拉法特失望了。这正是为什么当法塔赫左派转向莫斯科寻求援助时他们会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

在法塔赫的高层领导人中，决定担任激进分子和左派角色以取得苏联某种实际支持的人是阿布·伊亚德。这就是为什么阿拉法特感到必须要同在巴解内部的左派联盟进行和解的另一个原因。

当法塔赫的左派分子增强他们的呼声重新提出推翻侯赛因政权的战略时，如果阿拉法特本人同这一秘密计划无关，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的右翼人物就完全无法对事件进行任何控制。事实上从 3 月份以来，要求实行推翻在约旦的政权的战略已不可阻挡。就在那一个月，侯赛因宣布了他的建立阿拉伯联合王国的计划。这项建议是，当以色列人撤出时，对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给予在约旦人控制下的完全的地方自治。（1982 年的里根计划实质上几乎就是 1972 年侯赛因计划的翻版。）就连那些像哈拉德·哈桑那样的温和分子或者他们希望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对侯赛因的意图也不存幻想。哈拉德·哈桑说：“这是一个使巴解组织无法工作的计划。”

这肯定是侯赛因的目的之一，他发现如果瓦斯费·塔尔和巴解组织的协议得以实现，他就会被他自己的总理赶下台，他无疑对这一情况有所触动。但是，他为什么急于要赢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对他的和平努力的支持，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以色列工党政府，在他自己的强硬路线者和极端分子的

压力下，正在积极推进一项更具野心的把犹太人定居在被占领土的计划。在加沙地带，沙龙将军刚刚把 1500 个贝都因人的家庭从他们的 3.3 万英亩土地上驱赶出去。他们的房屋被推土机铲平，他们的水井被沙土壅塞，他们的树木被砍伐毁坏。以色列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将重新迁入 20% 的贝都因人住户。其余的呢？好吧，他们可以另寻别处栖身。当温和的以色列人自己起来抗议反对窃取阿拉伯人土地的时候，他们遭到了本·波雷特——一名以色列记者——的怨责，他被广泛地视为以色列国防部的喉舌。他写道，现在是“剥去虚伪的面纱的时候了”。他要他的读者记住在现在就像在过去一样：“没有阿拉伯人的迁移，没有没收，就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就没有新拓居地的土地，就没有犹太国！”侯赛因得到了这个信息。除非用和平方式阻止以色列人在被占领土开拓殖民地，否则对阿拉伯人来说已没剩下什么可以谈判的了。

我问阿拉法特，侯赛因宣布他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是否是在以色列人有可能得到他们说的他们所要求的和平的那个历史上的另一个时刻。他答道：“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如果以色列人有任何一点意思，他们会对侯赛因这样说：‘陛下，我们赞赏你的计划。明天我们将从西岸撤出。第二天你们可以来耶路撒冷和我们签署和平协议。’侯赛因会回答：‘我准备好了，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明天你们从西岸、西奈沙漠和加沙撤出。第二天萨达特总统和我将一起前往耶路撒冷同你们签署协议。’”

以色列人不可能如此快地撤出，但是，考虑到阿拉法特正在提出的论点，我说，“你真正相信侯赛因和萨达特会以你所说的那种方式作出回答吗？”

阿拉法特回答说：“肯定，我敢打赌。为了以色列的撤出，他们会进行和谈，而巴解组织则将被消灭。彻底消灭。有时候我想，我们有以色列人做我们的敌人是幸运的。他们多次搭救了我们！”

阿布·伊亚德被委托负责组织实施打倒侯赛因的计划，但是，阿布·达乌德则掌管在约旦的地面行动。他解释说：“我是执行这一计谋的当然人选，因为在我们从约旦被逐出之前，我作过所有何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民兵指挥官，我有经验。”

对阿布·伊亚德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前一个月公开作出的承诺和当面对侯赛因的威胁。还该记得，阿布·伊亚德曾责成法塔赫和巴解组织从安曼及其他城市撤出它们的重武器，以避免同约旦军队的最后的和自杀性的对抗。在 1971 年 6 月中旬，阿布·伊亚德开始猜疑约旦人无意遵守他真诚地与之签订的协定。有迹象表明，国王的人正在为最后的进攻进行准备。6 月 15 日，在杰拉什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基地，阿布·伊亚德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说。他在演说中对瓦斯费·塔尔和侯赛因提出了警告和威胁。约旦情报机构作了报告，阿布·伊亚德被召请同侯赛因和瓦斯费·塔尔进行会晤。

回顾当时情景，阿布·伊亚德说：“国王手上拿着关于我演说的情报。他说：‘阿布·伊亚德，我们是朋友，我们共同工作解决了许多问题……这是什么？这些报告是真实的吗？’我直盯着国王，对他说了以下的话：‘陛下，你不需要依靠你的间谍，我将当面向你复述我在杰拉什所说的话。如果对我们约旦的人民有任何伤害，哪怕天涯海角我也要那些责任者找到，

并杀死他们！’”

1973年1月初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巴解组织正式提出推翻侯赛因的政策。表决结果对左派联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对那些在法塔赫高层领导中仍占绝对多数的右翼和现实主义者则是一次重大的失败。但是，将军没有军队，在战场上就无用武之地。自从巴解组织从约旦被驱逐以来，在解放运动内部，人民群众舆论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并开始集结力量，这次表决结果与这一潮流发展方向戏剧性地相一致。

阿拉法特几个月来大概就知道，全委会表决赞同这样一项愚蠢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许是阿拉法特他本人为什么决定在初期就和推翻侯赛因这一秘密计划取得联系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他反对人民的意志，他本人很可能在第11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当的民主手段所推翻。至少他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个除了辞职别无他择的境地。事实上，那正是哈拉德·哈桑在第11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下场！实际上哈拉德不仅说出了他自己的观点，而且也表达了阿拉法特真正赞同的态度。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最突出的部分是，哈拉德和阿布·伊亚德之间戏剧性的猛烈的对抗，他们相互指责。哈拉德说：“真的，我不愿详细谈论它，因为今天我们又成为好朋友了。没有必要再揭这些旧的伤疤。当时我们在气头上，双方都说了一些以后感到后悔的话。我的政治性的告别信是十分坦率的。我对我的左派同事们说，他们没有从我们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他们的真正的错误；我说，他们正在使我们的运动走上一条对我们的人民毫无益处而只会带来灾难的道路。”哈拉德对我说，在他向阿布·伊亚德摊牌之后，他辞去了他在巴解组织执委会的职务。我想象，不管怎么样，他在那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没有再次当选。

当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本身表态要推翻侯赛因时，阿布·达乌德为了实际推行推翻约旦政权的企图，正在对他的计划进行润色。他事实上业已对此工作了6个月。直至他被出卖然后又被告约旦情报机构逮捕的那天，阿布·达乌德说，他是“百分之九十九确信”阿拉法特不是在做游戏，他是严重地卷入这一密谋之中。百分之一的怀疑是由于阿布·达乌德知道，“阿拉法特对每一件事情打赌，并且喜欢经过他的手使所有的赛马都奔跑起来，从而给他自己有尽可能多的选择。”

为了说明阿拉法特认真地支持这一密谋，阿布·达乌德告诉我：“通常我是向阿布·伊亚德汇报。但是，有好几次我同阿布·伊亚德和阿拉法特一起讨论我的计划和需求。有一次我要求阿拉法特帮助给我一些得力的人。另一次我要求他帮助武器。真的他表现很好，使我信服！”

下面是阿布·达乌德自己对他的被暴露和被捕的叙述。

“在这特定的时刻，我在约旦伪装成一个穿着传统长袍的贝都因人，带着沙特的护照在旅行。我在安曼停留了3天，和我的骨干人员谈话，然后我去看望了一位名叫贾比尔的人。这不是一次重要的会见。他好像可以帮助我们提供隐蔽我们车辆的地方。我去看望这个人的唯一理由是因为阿布·伊亚德要求我去的。

“我会见了贾比尔这个人，我从他的眼神看去，就看到是一个叛徒。这正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的感觉。我把他带进一间我们可以单独谈话的屋子，我对他说，‘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任何人出卖我，他会死的。当心点。’然后他离开了我。

“在当天晚上，这位贾比尔来看我，他邀请我去他的家中做客。我去了。他的家在安曼郊外。当我返回城区时，我发现在内政部外有伏兵在等着我。警察要求检查我的护照并说，‘好，我们到警察所去一趟。’可是，我知道，他们在把我带往情报中心。我一走进那里，我就发现约旦情报局的5名高层人士在等待着我。我对他们大笑，情报局的头子问我：‘你为什么笑？’我说：‘因为你们给了我如此好的接待！’显然他们为我作了周全的准备，我被出卖谁出卖了阿布·达乌德？为什么？”

我想，这些问题是很简单的。阿布·伊亚德为了使推翻侯赛因的计划夭折，把阿布·达乌德出卖给贾比尔这个人，他显然是约旦的一名特务。这是今天阿布·达乌德自己的结论。

但是，为什么阿布·伊亚德决定使这一计划不得不夭折？我觉到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阿拉法特告诉阿布·伊亚德，无论如何要制止阿布·达乌德的行动计划。但是，这又进一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阿拉法特希望这一行动计划被制止？为什么阿拉法特具有如此强制力的理由使阿布·伊亚德以他现在采用的方式行动？为什么他不能用某种其他办法来制止它？

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与阿拉法特占有最机密的情报一事有关。这机密是，萨达特总统说他正准备率领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而这个话明显地是说，当阿拉伯军队正在进行准备的时候，巴勒斯坦人不应当做任何事情以挑起以色列对除黎巴嫩以外的任何一个前线国家的攻击。

阿拉法特从未打算对阿布·达乌德计划的执行给以认可，但这位巴解组织主席知道，他无论如何不能完全控制事态。因此，一旦阿布·达乌德准备就绪，有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去执行计划。要是出现这种情况，要是约旦局势不稳，那么这场灾难的范围将是无止境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以导致以色列直接卷入这个王国的余下部分。在那种事态下，埃及和叙利亚的武装力量将不得不处于警戒状态，准备对付任何突然事变。这将会挫败或者说摧毁一场基于阿拉伯突袭思想的阿拉伯战争的前景。阿布·伊亚德的难处主要是他不能泄露为什么必须使这一预谋夭折的理由。

阿布·达乌德于1973年2月8日被捕。他受到了虐待——在他向我叙述他的经历时我感觉到这种痛苦——并被判处死刑。有两次他已准备被处决。

在3月的第一天，黑九月组织发起了另一次劫持人质的行动。这次行动发生在苏丹。3名“黑九月”恐怖分子进入沙特驻喀土穆大使馆，那儿正在为美国代办柯蒂斯·穆尔举行外交招待会。许多人质被拘留，包括穆尔本人、他的大使克利奥·诺埃尔、比利时代办盖伊·埃德、沙特大使和约旦代办。“黑九月”组织随后提出了它的要求。为换取人质的生命，它要求释放阿布·达乌德和他的16名也被判处死刑的共谋者。两次最后期限来到并过去了。穆尔、诺埃尔和埃德随后被带到使馆地下室并被机枪打死。

“黑九月”和巴解组织在世界各地遭到谴责和谩骂。以色列人有了他们最惊人的反恐怖行动的舞台。一个星期以前，以色列人击落了一架西奈上空迷航的利比亚民航客机，他们大概认为“黑九月”和巴解组织领导人在飞机上。40~10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被杀害。但是，世人把这一事件和其他事都忘却了。在喀土穆屠杀发生后，以色列人就更为所欲为，干什么坏事也是有理的了。

以色列的反恐怖组织以特别任务机构这一名称进行活动。特别任务机构

这一名称在希伯来语为莫萨德·托弗肯迪姆·迈尤哈迪姆。它是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1972 年 5 月底在洛德机场的袭击之后建立的，建立前在以色列曾就以色列人是否应该采取恐怖办法来打击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认真的和公开的辩论。政府决定，目的证明手段有理。这样，以色列正式开始使用恐怖武器，而且，一如以往，以色列人总是比他们的巴勒斯坦人敌人更有效率。

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暗杀巴解组织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参与策划和执行“黑九月”行动的人。多数暗杀事件是快速的无声行为。通常巴解组织的被害对象是被他们用无声手枪在近距离杀害的。有时一枚炸弹在一家旅馆的床下爆炸。许多暗杀是在西欧进行，而西欧政府对所发生的事情多半是睁一眼闭一眼。一个恐怖分子在什么时候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是太复杂了。

这个机构的最大的、最大胆和最成功的行动是 1973 年 4 月 10 日深夜在贝鲁特市中心在以色列突击队的帮助下进行的。有些突击队员化装成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他们的目标是黑九月组织的领导人，如有可能，就杀害阿拉法特。

对以色列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坐落在凡尔登大街上的两套公寓住宅。一套住宅是巴解组织的正式发言人卡迈尔·纳赛尔和黑九月组织的 3 位高级领导人之一的卡迈尔·阿德万的住所。以色列人还知道，阿布·伊亚德一周有四、五个夜晚是住在卡迈尔·纳赛尔的寓所的。另一套公寓住宅是黑九月组织的另一位领导人阿布·优素福的住所。

阿布·伊亚德告诉我，他本人预期会有以色列的袭击，而且在它发生之前一个星期，他曾提醒他的 3 位朋友安排强有力的安全警卫。他还告诉我，他们都说：“不会发生在这里的。”

在 4 月 10 日那一天，阿布·伊亚德、阿布·优素福、卡迈尔·阿德万和卡迈尔·纳赛尔 4 人去阿里·萨玛卡拉餐馆吃午饭。阿布·伊亚德说：“午饭以后我们回家去，我就睡在卡迈尔·纳赛尔住所的床铺上。”

晚上 6 时，这 4 个人离开寓所去参加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会议。大家都未想到，会议竟在晚上 8 时半就结束了。这 4 人决定这一晚早点回家。他们返回凡尔登大街的两个寓所。

阿布·伊亚德说：“阿布·优素福回到他的住所，我们其余 3 人回到卡迈尔·纳赛尔的公寓住所。因为我們是最要好的朋友，过了一会儿，卡迈尔·纳赛尔请求我离去。他说：“阿布·伊亚德，今晚我必须写一些东西。如果你留在这里，我就写不成了。行行好，你到别的地方去款待自己吧。”这样，我就离开了这个寓所。”

大约午夜过后 30 分钟，阿布·伊亚德听到来自法赫卡尼区的枪声，阿拉法特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而当时阿拉法特确实就住在那儿。阿布·伊亚德说：“后来又过了半小时，我也不太在意了。我想这大概是我们两个组织间的某些小摩擦。紧接着我们的一个人找到我说，‘犹太人来了。’”

以色列对阿拉法特的法赫卡尼总部的行动被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的抗击挡住了。这使阿拉法特本人赢得了逃离时间。他隐藏在这个城市的基督教（或者说敌人）区的那半边。

阿布·伊亚德现在的看法是，以色列向阿拉法特总部的袭击是一种佯攻。他说：“他们要拿阿拉法特，但是只有在没有太多麻烦的情况下才愿意去干。我肯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卡迈尔·阿德万、阿布·优素福和我。”

在凡尔登大街的这两套寓所由一名武装警卫守护着。他从没有听到杀死他的枪声。当他倒地死去时，以色列人把带有磁铁的地雷放在门上。当它们爆炸时，以色列的突击队冲入寓所，他们一进去就用冲锋枪扫射。

阿布·伊亚德说：“告诉你以色列的火力有多猛，他们对着那张以为我正睡着的床发射了 200 发子弹！我亲自数了数，所以我知道。我想他们是十分失望发现我没在这屋子里！”

在这两个寓所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以色列的袭击下幸存下来。一个也没有。对那些来了解详细情况的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钉害卡迈尔·纳赛尔的方法是最令人厌恶的。阿布·伊亚德说：“这是一种祭神式的杀害。因为卡迈尔是我们的发言人，他们在他的嘴巴的四周喷射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在离去之前，以色列人摆布他的尸体，就像绞死在十字架上。”

在此后的一个月，黎巴嫩军队采取行动反对巴解组织。这是一项粉碎巴解组织的图谋吗？“不，还不是。”哈尼·哈桑说。他当时同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保持着良好关系。“黎巴嫩基督教派这次是想把我们禁闭在难民营中，以阻止我们同爱国阵线力量结成联盟。爱国阵线力量是指穆斯林和德鲁兹。在显然正在到来的黎巴嫩内战中，我们从来无意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我们面临重重困难的处境。最后，我们决定拒绝把我们自己禁闭在难民营中的主张。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允许我们自己在这种方式下被禁闭并成为中立，我们将被基督教派和以色列人击垮。因此，这就是为什么 5 月在我们和黎巴嫩军队之间有一场对抗的原因。”

战斗被制止了。当时那些正在准备同以色列进行战争的阿拉伯领导人，请求停止这场战斗。他们担忧，在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引发出复杂的情况，也许会损害他们进行战争的准备。

事实上，正是十月战争，使巴解组织从可能的毁灭中得救，并给阿拉法特以采用政治手段继续进行斗争的机会。

第十七章橄榄枝

在 1973 年，或者说是“十月战争”前夕，很难看出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有什么前途。

作为一个能够发起反对以色列的重要军事行动的组织，已经完结了。恐怖组织机构也被关闭了，尽管极端分子小组还在继续从事其恐怖主义活动。在慕尼黑事件后，阿拉法特开始努力说服那些转向恐怖行为的法塔赫成员，并取得进展，他指出恐怖活动的作用是反生产性的，严重地削弱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在喀土穆屠杀之后，阿拉法特的这一论点获得阿布·伊亚德的支持。也需要指出，当以色列人消灭了在贝鲁特的两位黑九月组织领导人之后，他们增强了阿拉法特一方的力量。这样，在走向十月战争进程中，巴解组织主席的军事战略完全是防御性的。当以色列人加强他们反对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的战争时，在阿拉法特指挥下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们只有一个目标——生存。

以色列领导人向他们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介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们说，在 1972 年 6 月，阿拉法特从莫斯科归来，得到苏联将开始向巴解组织直接运送武器弹药的许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冲突。以后，以色列领导人说，苏联第一批装运的货物确实到达，证明巴解组织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新的进攻，苏联现在已经公开站在那些竭力要毁灭犹太国及其人民的人的一边了。事实真相是，阿拉法特当时正在努力改善他的防御能力，而以色列领导人则认为他们大概只需几个星期、至多几个月，就可以以军事手段消灭巴解组织，不管他们公开怎么说。

对巴解组织方面发生的情况，沙菲克·胡特向我提供了有价值的看法，并得到阿拉法特本人的证实。沙菲克是巴解组织在贝鲁特和黎巴嫩的首席代表。他说：“1973 年 4 月 10 日在贝鲁特发生事件后，整个城市的人民举行罢工。黎巴嫩人民并不是为我们的 3 位领导人被害而抗议。他们抗议的是，以色列人竟毫无阻挡地能够长驱直入首都，并且得以任意胡作非为长达几个小时。因此，贝鲁特人民对弗朗吉亚总统说：‘你到底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以阻止以色列人再次进犯？我们必须防卫！’当轮到我们会见总统时，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你将如何保护在难民营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民？’

“弗朗吉亚对我们十分坦率。他说：‘瞧，首先，你们巴勒斯坦人不是被邀请来到这里的。第二，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保护你们。’我们被怔住了。接着总统说：‘如果你们决定依靠你们自己的手段保护你们的人民，我不能说不行——但是不要指望我。’这真正是他对我们说的。‘不要指望我。保护你们自己。’这就是阿拉法特为什么去莫斯科说服苏联领导人出售一些武器给我们。此后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悲痛地不可避免的。我们越是改善保卫我们人民的手段以反对以色列的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同盟者的攻击，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对我们的进攻就越加升级。”一直到 1982 年夏天，这种升级没有停止。当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多路进入贝鲁特，采取最野蛮的军事手段，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是这一次，暴露了苏联人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使巴勒斯坦人能保卫自己。

哈尼·哈桑说：“我愿意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也许还需要保密，但是，我认为这对你了解实情很有用。当我们在 1982 年即将面临以色列人进攻时，也当我们亲爱的阿拉伯兄弟拒绝给我们反坦克武器以延缓预料中的以

色列进逼时，我们派阿布·瓦利德去莫斯科，执行一项特别的绝密使命。他带了一张 1 亿美元的保兑支票。我们想购买一些苏制火箭推进武器，使我们得以袭击以色列城市。我们的意图是想对以色列人说：“瞧，我们的火箭武器已安置在适当的方位上。它们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但是，如果你们要进入贝鲁特，我们就要发射。苏联人在对他说‘不行’之前，连情况都没让阿布·瓦利德说完。”

然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 1972 年时的处境，不同于它在 1982 年时的处境。如果它在被约旦逐出至“十月战争”这段期间，不能成功地依靠军事手段生存下来，巴解组织将失去一切。但是，“十月战争”在巴解组织的命运中是一个转折点。它给了阿拉法特他曾经长期寻求的运用政治手段继续进行斗争的自由。

关于战争本身，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有许多问题确有证据，但仍要求能得到答案。根据他们知道的关于阿拉伯一方发生的实际情况，他们深信，“十月战争”如果不是得到基辛格的鼓励，也是得到他的同意的。基辛格在“十月战争”前两星期被任命为国务卿。按照这一论述，基辛格的目的是给不妥协的以色列人一次教训，以便使他有会和力量，将其意志强加于和平进程，主要意图的迫使以色列分阶段地退还埃及足够的领土，诱使萨达特的犹太国单独媾和。

基辛格十分清楚，一旦埃及真正卷入和平进程，那么阿拉伯—以色列全面冲突的危险，加上它造成的对西方利益的威胁，都将消失。如果用这种方法能使埃及中立，美国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之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撤退的问题上就无需担忧。不管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多么反对以色列对这些阿拉伯土地的继续占领，没有埃及参加，他们就不能发动战争。反转过来，这意味着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要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要么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条件言和，这些条件明确要求阿拉伯国家拒绝巴勒斯坦的合法要求；要么生活在没有和平和随时遭受进攻威胁之下，包括以色列人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发起的攻击。这就是基辛格战略的实质；在十月战争前夜，可以这样说，以色列的不妥协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障碍。

基辛格曾经卷入同萨达特密使及通过他自己私下渠道同萨达特本人进行的多次高层秘密谈判，今天这已是可查的事。尼克松政府对以色列在涉及埃及问题上的不妥协而一致愤怒，这也是有案可查的事。在给基辛格的一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加了以下的批注：“停止迎合以色列不妥协立场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过去的行动使他们认为，不论他们如何无理，我们都将和他们站在一起。”尽管基辛格断言美国及其情报机构并不知道埃及和叙利亚人将在 10 月 6 日进攻以色列，似是，在阿拉伯方面这也是有案可查的事，基辛格其时正在给萨达特传送秘密信息，内容是军事形势的稍许加热将得到华盛顿的赞赏。

果尔达·梅厄是第一个向我介绍这一看法的人，基辛格赞同萨达特的战争努力。她是在我和她最后一次私人谈话中透露此事的。这次谈话恰在 1979 年 11 月她患癌症逝世前的几个星期时进行的。我们这次最后交谈的地点是在特拉维夫郊区她的十分朴素住宅中的起居室。果尔达在长期政治生涯中有一位自己最好的朋友和特别助手，她是一位机智的、美妙的妇女，名叫卢·基

德。果尔达去世前三年，卢曾对我许诺，当果尔达弥留之际，将约我前去。卢没有忘记并实现了她的诺言。

在我和果尔达最后一次谈话过程中，有一位第三者在场。他是应我之邀而去的。他想会见果尔达，可以这么说，我为他做了一件成人之美的好事。反过来，他也为我服务——他是我们的见证人——虽然当时我未有意这么说。

我同果尔达的谈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第个人抽了两包香烟。果尔达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极为详细地叙述了“十月战争”以及为什么以色列人感到吃惊。

在她开头叙述这场战争时，果尔达告诉我，她是如何婉言拒绝非正式顾问团会议上的意见的。这次会议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一房间里举行，其时达扬建议以色列应“放弃”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前线阵地以避免更多的以色列人丧生。果尔达对我说：“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放弃，放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语里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然后我去盥洗室呕吐了。”

果尔达还告诉我，她是如何在电话上经常“恳求”尼克松着手用空运战斗机和坦克来接替在战争开始几小时内以色列所损失的那些武器装备。在她生动地讲完这些电话谈话后，我问她，她是否怀疑基辛格阻碍了她的请求。她回答说：“我敢肯定那就是真正发生的事情。那也是我坚持要亲自前去华盛顿的原因之一。”

我问果尔达，如果他曾经信任过基辛格，那么她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她给了我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无声的。她把右手举到她齐眼睛的地方，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圆圈。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零，因为她的拇指和食指没有合拢。接着她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当基辛格在以色列时，我的内阁同事们经常叫他亨利，并拍拍他的背以示亲密。他也拍拍他们的背，并直呼他们的名字。我不允许发展这种关系。我总是坚持他应称呼我梅厄夫人或总理夫人。而我也经常称呼他国务卿先生或基辛格博士。”果尔达笑了，“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们说，对这样的一个人用直呼名字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果尔达结束了她对“十月战争”又长又详尽的介绍后，我向她提出，从这里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亨利·基辛格实际上利用萨达特使以色列人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为的是给以色列人一次教训，以便使他按他的条件开始一项和平计划。除此之外，果尔达对我所谈的内容明显含义是，基辛格好歹应对扣留有价值的美国情报负有责任，这些情报将能使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出正确的结论。

果尔达没有片刻思考就立即回答说：“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对我们自己，也不能这么说。”

至于巴勒斯坦方面，由于他们享有同费萨尔国王极其良好关系，一些法塔赫领导人、特别是哈拉德·哈桑十分清楚阿拉伯方面在“十月战争”前的长时间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按照他们的观察，故事在1972年6月开始，当时萨达特把苏联人驱逐出埃及。

美国那时的官方态度是美国感到吃惊。但是，如果萨达特可以信任，那么某些美国人不仅知道他企图对苏联人作些什么，而且曾经答应在他作了以后将给他报偿。

哈拉德·哈桑说：“在所有阿拉伯领导人当中，对萨达特的行动没有一

个人比费萨尔更感到高兴。沙特人一直在力劝他离开苏联人一段时间，以便激发美国人认真地卷入和平进程。但是，由于萨达特表面上没有和美国人达成任何一项交易，费萨尔非常生气。换句话说，萨达特已经为美国人做了大大有利的事，但是他却没有要求得到任何回报。因此，费萨尔要求我向萨达特提出一些问题。

“我会见了萨达特，引用费萨尔所言，我说了以下的话：‘为什么你白白赶走苏联人？没有代价，美国人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而以色列人也决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不在事先谈好作为回报的大价钱。因此，为什么你干事而不要代价？’”

“萨达特的回答是这样的：‘你告诉费萨尔，他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详细的情况。你也告诉费萨尔，由于我赶走了苏联人，我已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一些非常特别的承诺，他们会帮助我们。’”

“这也许是萨达特在夸张，也许是他事实上就没有得到美国任何特别的承诺。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毫无疑问，某些美国人曾经给萨达特以充分理由相信，他如果驱逐了苏联人将会得到报偿。在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必须记住，基辛格通过他的私人渠道，已经同萨达特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信件交往。”

在他决定逐出苏联人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萨达特发现，他的美国朋友要么是不愿意，要么是不能够实现他们的确切的或者暗示的许诺。他发现美国不愿意向以色列施加某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对迫使他们按照联合国 242 号决议撤出被占领土是必需的。萨达特随后就开始同苏联修补篱笆。到 11 月，他再次从苏联购买武器。萨达特同时又前往沙特阿拉伯同费萨尔会谈。

哈拉德继续说：“萨达特告诉费萨尔，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人很不严肃，中东僵局只能靠另一次战争来打破。然后，萨达特说，他想带领阿拉伯人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把以色列推回到 1967 年的边界。正如费萨尔本人告诉我的，他于是说：‘萨达特兄弟，你是严肃的吗？’”

“萨达特坚持他是严肃的。他向费萨尔要求三件事以使长期战争成为可能：提供足够的小麦以供应他的人民；对他的工业和军事设施保证零部件；保证石油供应。当时埃及仍然在进口石油。除此之外，萨达特还说，他需要一项保证，即费萨尔将利用石油武器反对美国和其他支撑以色列战争努力的西方国家。

“费萨尔告诉萨达特，他愿意给予他要求的所有帮助，甚至更多一些，但有一个条件。费萨尔说：‘条件是你应该长期战斗，你不要打了几天就要求停火。你必须进行不少于三个月的战斗。’萨达特说他接受费萨尔的条件。

“基于萨达特的诺言，费萨尔于是十分认真地开始进行全面战争努力。我不认为应该由我来揭示费萨尔战略的细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萨达特所允诺进行的战争是要把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卷入进来。由于费萨尔为支持萨达特所作的安排，穆斯林军队在需要时将从像巴基斯坦那样远的地方前来。

“不幸的是，萨达特欺骗了费萨尔，而萨达特和我们大家发现已为时过晚。萨达特从未有过打算，要进行一次他所谈到的大战。他是在和费萨尔耍弄花招，以便加强他自己在同基辛格交易中的分量。”

按照巴勒斯坦人对这阴谋分析的看法——以后我发现这也是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私下的看法——萨达特假装被委托正在领导进行一场重大战争准备，以便同基辛格讨价还价进行一项困难的交易，他需要费萨尔的支持，使他在

讨价还价上有可靠性。叙利亚同意按照萨达特的规则进行战争赌博。约旦拒绝。阿布·达乌德说：“当侯赛因从监狱释放我时，他告诉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要进行一场争取和平的战争。他还说，他无意使约旦卷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基辛格很害怕阿拉伯人使用他们的石油武器。在 1973 年 4 月，费萨尔派他的石油大臣谢伊克·亚马尼去华盛顿。亚马尼的任务是告诉基辛格及其他人，如果美国不采取真正的步骤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退，费萨尔将不会根据西方要求增加石油生产。根据当时可靠的报告说，基辛格建议亚马尼不要把费萨尔所讲的内容对任何其他人透露一个字。据亚马尼说，基辛格的意见是，如果阿拉伯人被看作是在进行威胁，那么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亚马尼说，他认为基辛格不希望费萨尔所谈内容公开泄露出来，是因为它会使公众舆论深入想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美国继续拒绝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而必须付出代价。

假设以色列人顽固地拒绝从西奈哪怕是象征性地撤退，而这对给萨达特进行谈判机会是必需的，那么，显而易见，基辛格本人将面临一个令人震惊的困境。他可以在失望中举起双手，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承认以色列人在他开始之前就已击败了他。这意味着他就任国务卿时却没有一项中东政策，而他深知以色列的继续不妥协，必定或迟或早挑动费萨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使用他们的石油武器。这对全球性经济将造成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或者，他可以利用萨达特的战争，来教训一下他的以色列的朋友们，主要目的在于制造一个开端，使他得以推动以色列同萨达特进行谈判。

海卡尔在其所著《愤怒的秋天：萨达特遇刺》一书中谈到，埃及总统如何通过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许多不同渠道收到基辛格的秘密信件。这些信件的大意是，美国人欢迎萨达特采取一些军事行动。海卡尔还引用了沙特阿拉伯的中央情报局联络员告诉他的话，美国人甚至说，他们也许准备自己稍稍加热，假使以色列人“表现出越来越顽固的迹象”。海卡尔接着写下了这样揭露性的句子：“直到 9 月 23 日，大卫·洛克菲勒在阿拉伯堡会见萨达特时，他还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稍稍加热将是适宜的。”这日子本身具有某一重要意义。这是基辛格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翌日，是埃及和叙利亚人发动他们对以色列突然袭击前的 14 天。

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动荡年代》中说，美国对以色列遭受阿拉伯的攻击感到十分惊讶。他承认，美国方面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掌握的所有情报可以得出埃及和叙利亚正在企图进攻的结论。但是，所有美国专家和分析家都未能正确解释这些情报。按照基辛格看法，真正的问题是他和其他人没有能够提出正确的题目进行研讨。他说，首先，他和其他人满足于他们自己的一些设想。主要的设想是，萨达特不会发起进攻，因为他从事军事冒险将一无所得。明显这是不真实的。没有人比基辛格更了解萨达特要得益的是什么。基辛格的另一个解释就像他所透露的一样令人吃惊。他说，美国败于对情报的正确分析，这些情报说阿拉伯的进攻的来临过去是现在也是“莫名其妙的”。表明萨达特及其真正的战争目的的关键时刻是在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埃及作战室出现的人当中，有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事顾问，他代表阿拉法特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他对我谈了以下情况：

《愤怒的秋天》（安德烈·德契，伦敦，1982），第 49～50 页。

《动荡年代》，第 465、466、467 页。

“到战争的第二天凌晨，埃及人已横越苏伊士运河。埃及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在先前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内的5英里处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就在这第二天凌晨，我对自己说：‘这是真的。在两天或三天之内我们将在特拉维夫！萨达特确实将要完成纳赛尔称之为不可能的事！’真的，在一个短时间内，这是我自己正在告诉自己的话。然后，我开始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埃及军队停滞不前。我环绕战争作战室非常缓慢地走着。我一个挨着一个地观察正在指挥战争的埃及人的脸部表情。他们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最后，我提出了他们知道正在我心中萦怀不释的问题。‘正在发生什么事？’我说，‘你们为什么停滞不前？在通向特拉维夫的大门已经敞开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不继续前进？’他们非常窘迫。可怜的同僚们！我在镇静中十分生气。但是，我真正地为他们感到难过。开始没有人回答我。他们眼睛看着地面，又看看天花板。他们那儿都看，就是不看我。这样，我再一次问：‘为什么？’然后，我得到了回答。‘没有命令。我们不前进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命令。没有计划，也就不会前进。’

“就在那时，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对萨达特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他和美国人做了一笔交易，以便使他自己成为名震一时的英雄，现在他正等待基辛格迫使以色列进行谈判。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紧要时刻……不仅是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且也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我在一生中第一次为做一名阿拉伯人而感到羞愧。我离开了战争作战室，我痛哭，我的心都要碎了。”

同一天，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基辛格信心十足地向他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同僚们保证，埃及军队不会越过他们在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内5英里处建立的防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以基辛格为主席的一个危机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中有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基辛格在他的书中写道，他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些同事们担心萨达特将继续前进。基辛格说，他告诉他们，他的判断是，萨达特恰好将坐在那儿，坐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他不相信萨达特会进一步向前挺进。假如全世界都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正在进行近战厮杀，而以色列这次真正是在为其生存而战斗，那么，不可思议的是，基辛格在没有得到有关萨达特有限战争目的的事先情报的情况下，竟会愚蠢到如此地步，不惜用这样一个预言使其信誉扫地。

当萨达特发起他的进攻时，基辛格也知道，跨越运河对埃及人不会造成太多问题，因为以色列的地面防御力量极为薄弱。我本人早在1970年周游以色列前线阵地时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当时，我对以色列的运河防卫竟掌握在如此少数人手中，很为惊讶；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以色列人正在耍弄的花招，使埃及人认为以色列有一支很强大的防卫力量在场。当我回到特拉维夫时，我对果尔达·梅厄说：“总理，我刚刚发现了你们国家许多秘密中的一个。”

她说：“很多秘密中的哪一个？”

我说：“噢，我从你们的沿苏伊士运河阵地访问刚刚归来，我从防线的这一端一直走到另一端。”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果尔达问。

“非常简单，”我回答。“你们地面力量太薄弱了，萨达特可以在他需

要的任何时候拿下运河。”

果尔达被真正的恐惧吓呆了好一会儿。随后她缓和下来。她说：“我的印象是我们有一项政策，不允许外国记者一次访问一个以上的前线阵地。”接着她笑了。最后她说道：“我很遗憾地说，你是对的。但是，看在上帝面上，请不要告诉埃及人！”

基辛格在他的书中愉快地承认，一旦战斗开始，他预期这是“六天战争”的再现，但只需要其一半时间。基辛格在其和萨达特密谋策划时，实际在想些什么，他的真正战略是什么，上述事实为此提供了确切的线索。埃及人将会跨越运河，萨达特将在一夜之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英雄。所有阿拉伯人以前在战场上团失败而蒙受的羞辱将被刷洗干净。萨达特终将成为一位胜利者，可以自由地进行谈判。而以色列人呢？咳，他们会感到震惊。但是，几天之内，也许最多两天至多三天，他们就会有力地打击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然后，当基辛格确定光荣可以平时，他将要求以色列接受联合国停火号召。这样，关于以色列从西奈分阶段撤退的长期谈判将可开始，而基辛格这位和平缔造者，则将坐在这一长期谈判列车的驾驶席上。

很遗憾，对这位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来说，事情进展十分不妙。基辛格失去了控制事态的能力，直到尼克松总统把世界置于核警报之下，他才得以恢复。这是可怕的，但是真实的。

为什么战争会升级到使一位美国总统第一次需要掀核钮的程度，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以色列损失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的如此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争第一天就损失了几十架飞机和多达 500 辆坦克。阿拉伯的攻击确实伤害了以色列——或者看来是这样。但事实真相更加骇人听闻。当以色列人为了反击而动员他们的后备军时，500 辆坦克中有许多，也许是绝大部分，处于不适宜战斗的状态。以色列人终于秘密地向基辛格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告诉他的比他们自己承受的灾难的全部实情要少得多。

以色列人真正受苦的缘由主要不是来自阿拉伯人的突然袭击——这次袭击不管怎么说目标是有限的——而主要是他们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严重玩忽职守造成的后果。达扬讨厌日常文书工作和他的职责中的行政管理部分。事实是他没有适当地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也没有要求其他人包括他的参谋长过问这一工作。其结果是，当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到来时，以色列的战争机器没有准备好投入行动。的确，萨达特揭开了一个问题：只是在尼克松决定对以色列恢复供应时，并由于萨达特同基辛格达成协议埃及军队不再从距运河 5 英里处继续前进时，以色列人才能够对付这场战争。以色列人应当感激萨达特促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

这一情况的最直接后果是，以色列人对阿拉伯进攻的反应所需要时间比基辛格估计的两天或者三天要长得多。

以色列延宕进行反击的另一原因，仅仅是由于以色列领导人被正在发生的事情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一时弄得目瞪口呆。不管这么多年来他们曾经对他们的人民和世界说了些什么，他们从未认真相信过阿拉伯人敢于进攻最强有力的以色列。这种傲慢的、自鸣得意的思想状态也是达扬为什么不在乎保持以色列战争机器处于常备不懈正常运转的原因之一。他真的相信不需要这样

做，除非是以色列人想教训一下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尽管他是大力散布这种宣传谎言者之一，说什么以色列经常面临被阿拉伯人消灭的危险。

战争升级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当战争趋势出现转折和以色列人正向另一个辉煌的军事胜利前进时，果尔达·梅厄失去了对她的一些将领的控制。给她造成最多麻烦的那个特殊将军就是阿里尔·沙龙将军。

10月16日，沙龙特务部队中的一支跨越中部运河并开始埃及战线后方活动。很快情况就很清楚，沙龙的目标是埃及第三军。他正企图包围它，然后消灭它。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前景使得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警铃同时响起。

对基辛格来说，埃及第三军的覆灭将破坏所有打算。尽管他已经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但他仍有可能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利。如果萨达特保持着十月初期胜利者声誉的余威，在战争中出现，基辛格仍可促使谈判进行。如果埃及的第三军被摧毁了，彻底丢丑的萨达特连想都不敢想同以色列进行谈判。那么，基辛格的全部努力将化为乌有。

苏联人也有他们的问题。坐视沙龙摧毁埃及第三军，他们也承担不起。如果他们听任萨达特蒙受羞辱，苏联人在这一地区享有的一丁点儿真正的信誉也将被摧毁。

基辛格致信果尔达·梅厄，请求她制约沙龙。她作了尝试，但失败了。沙龙继续准备他的进攻。10月20日，基辛格十分绝望，以致他去了莫斯科。接着，在10月25日，世界各地美军处于红色（核）警戒状态的消息也宣布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有两种分析。一是世界真的处于一场核灾难的边缘。根据这一分析，苏联人正企图直接干预以阻止沙龙消灭现在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而基辛格则劝说尼克松发出核警戒命令，警告莫斯科：美国人为了使苏联人置身这场冲突以外，什么手段都可采取。另一种分析是，苏联的威胁和美国的反应是基辛格同苏联人达成的一项交易的结果。

在我同果尔达最后一次谈话中，我问她，这两种分析她同意哪一种。她说：“如果你在当时问我这个问题，我不能确定我会给你什么样的回答。今天，我是倾向第二种看法。”

我问：“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基辛格和苏联人在耍花招吓唬你？”

果尔达说：“是的。”

接着发生的是，果尔达本人用以下方式告诉我：“我登上一架直升飞机。我飞往埃及——想象果尔达·梅厄是在埃及——在那儿我镇定地面对沙龙。我对他说：‘我是你的总理，我命令你不要采取行动反对埃及第三军。’”

那大致就是“十月战争”如何结束的情况。果尔达的鞋子上沾上了一些埃及的沙粒。被围的埃及第三军得救了，萨达特的面子也保留了。签订了停火协议，基辛格最终得手。如他一直打算的，“十月战争”确在中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使得美国国务卿能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所谓的和平进程上。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利用广为宣传的穿梭外交，先劝说以色列和埃及，后来又劝说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了所谓的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萨达特收回了西奈的很少的一小部分，足以说服他继续同美国人合作是值得的，即使这样做需要他背叛巴勒斯坦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事业。最终他自觉

自愿为了小利出卖他的灵魂——确切地说是向一个名叫吉米·卡特的种花生的庄园主出卖他的灵魂——而这使他失去了他的生命。

“十月战争”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为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一场史诗的、但却荒谬可笑的不平等斗争设置了舞台。这场斗争是关于他们两人中谁更能影响中东事件的进程。这两个人，一个是基辛格，另一个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为了忠于事件的真实记录，我必须进而说明，这场斗争在开始时一方是联系着基辛格，另一方联系着阿拉法特和费萨尔。但是，费萨尔被暗杀了。

这场斗争可以这么说，提供了关于 1974~1977 年之间发生的多数事情的主题背景。当时，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赛路斯·万斯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恢复了一些明智和体面。基辛格同万斯的许多差别中的最主要的差别是，万斯的兴趣在于真正的和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万斯比以前或其后任何一个美国人都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当美国人需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帮助使在伊朗的人质获释时，是万斯写了一封“亲爱的阿拉法特”的信给这位巴解组织主席的）。

基辛格的目标不是要给中东带来和平。他的目的是，为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能发生另一次战争进行安排。战争之所以必须防止仅仅因为它对美国 and 西方在这一地区利益造成威胁。除此之外，基辛格这位全球战略家并不很关心阿拉伯人的甚至在以色列的他的犹太同类的命运。

按照以上扼要叙述的来龙去脉，如前所说，基辛格的首要目标，是向萨达特提供他极想得到的同以色列开始进行谈判的机会，以使埃及中立，同时迫使以色列接受同萨达特谈判的思想。一旦萨达特被卷进所谓的和平进程，一旦他确信他可从中有得，这就不可逆转。埃及将置身于战事之外，没有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即使他们想同以色列进行战斗也不可能。如果那种情况发生，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条件媾和。基辛格的结论是，如果以色列对和平比对领土更感兴趣，阿拉伯国家就可以得到和平，但是以色列的条件是阿拉伯国家必须抛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也正中美国国务卿之意。

阿拉法特对基辛格战略的挑战和威胁的反应是迅速的、大胆的和富有勇气的。“十月战争”结束后四个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被称之为“工作文件”的声明。它要求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上承认巴勒斯坦人“在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其中含义是深远的，但在当时没有被很好理解。“民族权力机构”一词是商定的巴解组织称“小型国家”的代号。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74 年 2 月的工作文件，对以色列和全世界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它表明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他的多数同事，不仅是为谋求政治解决而负责工作，而且是为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他们原有故国土地 70% 的损失——也许是空前的损失——来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小型国家而认真努力。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他的多数同事们知道，这是他们不得不作出的让步的实质，但是他们也知道，要说服解放运动中的广大成员接受这点需要时间。如果在 1974 年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公开承认他们准备达成妥协的真实幅度，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受到绝大多数真正从事解放斗争的巴勒斯坦人的唾弃和拒绝。

阿拉法特对我说：“当时，我们的悲剧是，对这可能性的问题，世界拒绝理解有两个方面、两边的问题。第一是巴勒斯坦人怎么可能达到目的的实现

际条件问题——当时面对的事实是两个超级大国承担了保证以色列存在的义务，而以色列又是这一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怎么有可能说服它的人民接受的问题。当一个民族正在要求百分之百地归还她的领土时，领导说：‘不，你们只能收回 30%。’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阿拉法特停顿了一会儿进而说道：“你对我说，多少年来我们教育我们的人民关于妥协的必要时，对我们准备要妥协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我们的真正立场，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以色列政府一直是了解的。怎么了解的呢？从 1974 年，甚至从 1973 年底开始，我们的某些人就正式受权同以色列人和西方的重要人士保持秘密联系。他们的责任是把当时不能公开讲的活秘密地告诉这些人。你知道这些人是谁。你可以同他们谈谈……”我同他们谈了，我在稍后将详细叙述。

事实上，经过 5 年之久，阿拉法特才得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正式委任，在建立 1977 年原则上得到认可的小型国家妥协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在 1974 年至 1979 年之间，他得到以色列同意进行实际的谈判的尝试，阿拉法特不可能在小型国家方案的某基础上提出和平而不分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是，在 1979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在妥协方案问题上已经没有分裂的危险。如果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阿拉法特在 1979 年会晤进行谈判，阿拉法特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他处于可以提出这一和解方案的地位。

当我在 1979 年下半年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并且开始我自己的和平倡议时，他仍然兴高采烈，因为 5 年来他终于在为宣传和解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成就。虽然这是一次私人谈话，我希望他对我引用它不会介意。他说：“我们使我们的人民转变了立场。把犹太人赶进大海这样的愚蠢说法不再有了。今天，我们的人民准备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小型国家里以犹太人作为邻居。这是一个神话！在五年时间内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程啊！”

当然，阿拉法特得到了活跃的哈桑兄弟、冷静的阿布·杰哈德、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阿布·伊亚德以及他的其他许多法塔赫高级同事们的帮助。阿布·伊亚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他和阿拉法特商议好，针对各种人发表各种言论。例如，当阿拉法特的演奏家们需要去弹拨一首激昂的曲调以抚慰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及其他方面的激进分子时，去弹拨的是阿布·伊亚德——但这通常是与阿拉法特合作，起着异曲同工之效。对局外人来说，包括当时我本人，似乎阿布·伊亚德有时正在反对阿拉法特。然而，这是法塔赫领导人采取的策略行动的组成部分，以便在谋略上挫败并以智取胜那些反对小型国家妥协方案的人。

当我们在 1979 年下半年谈话时，阿拉法特告诉我，在 1974—1979 年这关键性的 5 年过程，他对每一个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个别地进行了疏通活动。当时有 300 名委员。在环境许可时，他一个一个地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召集到贝鲁特，秘密地进行私人 and 个别谈话。在那几年中，差不多有两年时间巴解组织遭遇到黎巴嫩的第一次内战，而在黎巴嫩，记者们都不知道，阿拉法特正在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并正为他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在那段时间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1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利用一切手段。——译注

的其余很多时候，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进攻升级时，阿拉法特忙于组织巴解组织的防御。然而，他仍然挤出时间个别接待和游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每一名成员。“我保存了一份我用于那些谈话的时间的记录，”阿拉法特告诉我，“在5年期间，总共花了550个小时。”他还保存了一份记录，记载当他要求他们在适当时候投票赞成小型国家妥协方案时，哪些人表示“同意”，哪些人表示“不同意”。在他结束他的故事时，阿拉法特从他臀部口袋里抽出一个小记事本。这显然是他记述他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成员谈话的许多记事本中最后的一个。“它全在这里，”阿拉法特带着胜利的心情说道，“让我告诉你数字……296票赞成小型国家方案，只有1票反对。想象一下，这是奇迹。”

我想要阿拉法特告诉我谁是这4个反对者。他拒绝了。

我说：“他们当中有一个是乔治·哈巴什。”

停了一会儿以后，阿拉法特仍然带着笑容说：“是的，他们当中有一个是乔治。”

我说：“他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表决中也许仅是一票，但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会给你制造许多麻烦。”

阿拉法特对我的断言感到有趣。“你是这样想的吗？”他说。

“是的，这么说吧，”我答道，“过去他就曾经使你遇到没完没了的麻烦。或者，譬如，你们不会被压垮并从约旦被驱赶出来，如果哈巴什……”

阿拉法特打断了我的话，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那是过去，”他说，随后他停顿了一下，“我正在谈论的是关于今天和未来。”又停了一下说：“你不要为乔治而担心。他是一个空想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行。”

我说：“你的意思是他没有问题。”

“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阿拉法特回答。

事实上，哈巴什和他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1979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真的接受了小型国家方案。哈巴什本人曾告诉我，一旦小型国家成立，如果以色列人愿意进行对话，他准备采用政治方式为创建一个民主巴勒斯坦国而努力。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用和平方式同现在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非常好。只有罪人才会拒绝那样做。我不是罪人。我只是不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愿意同我们以平等身份在一起生活。”

我不知道阿拉法特同300名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逐人进行谈话时是如何陈述自己的理由的，但是，我想我能猜到他的获胜点在许多如果不是全部，一对一的谈话中。在我向阿拉法特告别飞往塞浦路斯并从那儿去以色列之前，我对他说，还有一些我必须知道但我们尚未讨论的事情。我说：“当我向我的以色列朋友转达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时，他们会问我三个问题。第一个会是：“他是认真的吗？”他们的出发点是，你不是认真的，你只是口头说说你要和平，因为你没有军事上的选择。他们的第二个问题会是：“他会提出来吗？”他们的第三个问题会是“他为什么真正地愿意达成这样一项妥协？”这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我可以回答的。我想很多有赖于你的回答。”

阿拉法特在椅子上向后靠靠。他把一只手举到他的肩头，然后让它慢慢地沿着他的身体往下落。这只手搁在他的手枪皮套内的手枪上。他说：“我愿告诉你。”他的声音安静而平淡，显然他正努力控制他的感情。“这军装使我厌恶。我要求停止屠杀。我的眼睛试图微笑。我的心灵在哭泣。”

在“十月战争”以前，甚至法塔赫的主要现实主义者哈拉德·哈桑也反

对这个小型国家概念和妥协方案。他说：“我们巴勒斯坦人要向以色列作出这样一种让步，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有！”那么，为什么在几个星期之内，由于“十月战争”，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的多数同事，努力寻求这一小型国家妥协方案，而明知提出这样一种政策他们的前景是被称为叛徒？

阿拉法特说道：“事实上并不如此复杂。当我们研究了战后出现的新的形势，我们知道，基辛格是不会放松对以色列的压力的，直到他迫使他们从西奈作象征性的撤退——不要很多，只要归还一点西奈的沙子，就足以使萨达特他本人和埃及作出保证投入谈判进程。如你所知，这就是基辛格在谈判1974年1月签订的埃及、以色列脱离军事接触协议时的目的。当然，我们懂得，一旦萨达特承诺投入谈判进程，所有阿拉伯国家将在以色列愿意从被占领土撤出时立即同以色列媾和。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不以现实态度表达我们的要求，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提出一个阿拉伯政权能够支持的政治纲领，阿拉伯国家将舍弃我们自去言和……

“所以形势对巴解组织来说是十分危急的。我可以说，这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以色列很明智地进行撤退，那么，阿拉伯国家在没有巴解组织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将是什么样的和平？242号决议的和平。242号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什么？对难民的一点赔偿，也许，我只是说也许，很少一点难民返回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家园。但是，其他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我们要完蛋。对我们巴勒斯坦人重新成为一个民族的机会，哪怕是在我们祖国的某一小部分，都已消失。完了。巴勒斯坦民族不再存在了。故事结束了。”

无疑他们担心巴解组织被阿拉伯国家抛弃，这使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在巴勒斯坦人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的基础上，设计出一个政治纲领。但是，哈尼·哈桑告诉我，对领导者还有另一个压力。他说：“在西岸和加沙的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处于危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有一个政治纲领，以鼓励以色列人用撤退来换取和平。所以阿拉法特必须告诉他们，‘我答应你们。’”

如果阿拉法特能够自由地公开说出妥协方案的全部的真实的内容，为这一妥协方案他和他的法塔赫同事们从1973年底起就在巴解组织内部开展活动，那么，以色列人和其他犹太宣传家们将会遇到一个困难时刻。事实上，在1974~1979年整个时期，他们向主要不关心和很不了解情况的西方世界说明，不存在一个“温和的”阿拉法特这样的事。当他们进行这项说服工作时，他们实际上没有遇到反对。阿拉法特一直是他原来那个样子。一个恐怖分子。在70年代，同在60年代一样，以色列宣传的基调是，断言巴解组织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用这样一种方法，以色列人和其他犹太宣传家们就得以借用由巴解组织的少数集团和派别所进行的孤立的恐怖分子的行动，来诅咒和指责阿拉法特、法塔赫和整个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些少数集团和派别是反对妥协方案的，他们的领导人因而是阿拉法特的政敌。

在这些年中，阿拉法特几乎没有使用策略的余地。他的选择是：要么把他的真实方面公之于众，这将导致巴解组织内部的分裂和交战，就会形成一种他无法在其中宣传妥协方案的气氛和形势；要么保持沉默，推进工作，通过秘密讨论和争辩，取得对妥协方案的意见一致。阿拉法特对我说：“你认为那是选择吗？”他选择了后者，即使它意味着他由于害怕动摇巴解组织内部脆弱的平衡不能对破坏者执行纪律和处罚。他知道后果将使他自己的名声

遭致以色列宣传机器的诋毁。这样，以色列没有进行战斗就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总的来看，西方公众舆论很容易相信阿拉法特是一个恐怖分子，而实际上当时他为寻求一个真正的、公正的和平方案所做的工作，比以色列人、美国人和大多数阿拉伯人加在一起所做的工作还要多。

但是，正如阿拉法特曾经说过的，西方国家政府和以色列不是不了解巴解组织幕后所发生的真实情况。阿拉法特的使者秘密地把主席不能公开发表的关于他承诺在小型国家方案基础上协商解决的全部真实含义都告诉以色列人、美国人和欧洲人。

1974年初，观众们在为伦敦外交舞台上出现的一位新星鼓掌喝采。他叫赛义德·哈马米，在孩提时就从他的家乡加法被驱赶出来，他还记得犹太人只给他家半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他童年的其余时间都在难民营中度过。他在大马士革大学英国文学和哲学系毕业。在个人生活中，除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之外，他热爱的就是英国诗歌。他非常熟悉伦敦。他头脑聪明，也是开放型的。哈马米能够并且经常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对所有知道他的人来说，哈马米的声音是非常理智的。从任何标准来看，他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称赞的人。尽管如此，由于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在外交界的出现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他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的公民，一个众所周知的恐怖分子领袖阿拉法特的伙伴和朋友。由于他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工作，特别是为阿拉法特工作，他就成了莫萨德的暗杀目标。

哈马米的正式职务是，非官方地代表巴解组织常驻伦敦。他的一般任务是，向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阐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主要领导人承诺采取小型国家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为之努力工作。这样，按照定义，也就是说巴解组织领导人在采取一项政治解决方案，在谈判进程结束时，将会看到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

但是，哈马米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受阿拉法特之命，负责开辟并保持一条同以色列交往的秘密渠道。正如哈拉德·哈桑向我证实的，哈马米的部分秘密任务是，把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不能在公开场合讲的话，告诉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以色列人。哈马米带给以色列的第一个信息具有深远意义，如果当时及以后任何以色列政府为实现和平，在包含有对巴勒斯坦人公正措施的全面解决的基础上，那怕有很少一点儿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个信息是这样的：在1973年底，他们允诺小型国家方案，同时考虑到为向他们的支持者提出并宣传妥协方案，他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从那时起，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已作出含蓄的但又明显的对以色列国的事实上的承认，这个以色列国在1967年战争前夕他们所在的边界以内。接受这样一个以色列是暗指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小型国家将是以色列的邻居。正如阿拉法特对我确认的，在实现一个真正的基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小型国家方案基础上的和平协议之前，他和他的同事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对犹太国给予这个含蓄的但又明显的事实上的承认；正式的或法律上的承认自然会在谈判进程结束之时继之而来。这就是哈马米传给以色列人信息的主要内容。

过去的好几年，历届美国和西欧国家政府始终坚持，至今仍然坚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能成为谈判的一方，除非它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换句话说，承认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为取得参加有关他们自己前途的谈判的权利所

必须付出的代价。乍看起来，对许多人来说——事实上对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如果巴解组织真的准备在和谈进程结束时正式并在法律上承认以色列，那为什么不能在开始时就承认呢？

承认以色列的问题，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的，正是“一个难题”，要求巴解组织必须在和谈进程开始时就承认以色列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根据国际法，也根据联合国大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旨意：通过战争对领土的获取，不给予战胜的和占领的国家对被征服的和被占领的领土拥有产权或主权的权利。这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来说，意味着以色列越出 1947 年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以外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按照国际法是非法的，按照联合国决议是不能允许的。可以这么说，那是个半承认问题。

另外一半是，根据国际法，通过战争对领土的获取，只有在对被占领土拥有所有权的一方承认占领国时，才能使之成为合法。因此，根据国际法，巴勒斯坦人在承认以色列的时刻，就将要放弃他们的权利和他们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以前或直到那时，能够承认以色列的理由。正如哈拉德·哈桑提出的：“如果我们在以色列承认我们的自决权之前承认以色列，我们不仅将放弃对我们全部国土的所有权，我们将消除我们的生存权利！”

阿拉法特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曾经从许多以促使自杀为目的而要摧毁我们的企图幸存下来。我承认我们有时做了很愚蠢的事——但是，我们不是十足的蠢人！自然，以色列人，一些美国人，甚至我们的一些阿拉伯兄弟喜欢我们在这样一种美好的、干净利落的方式中自杀。但是，我很抱歉地说，我们不能答应他们！”

阿拉法特于是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西方世界的人民拒绝理解这一对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斗争是如此重要的事情？”我回答：“阿布·阿玛尔，问题不是这么多人民不愿意理解。问题是大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

然而，政府是知道这些事情的。那么，当他们明知这样做他们是在要求巴解组织放弃巴勒斯坦人的对土地所有权和自决权时，为什么他们仍然坚持要巴解组织在谈判前先承认以色列？

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领导机构中他的所有同事对这个争论最多的问题的回答是一致的。哈拉德·哈桑是他们的代言人，以下是他所说的：

“如果你不介意，为了证明论点，我将以夸张的方法开始我的回答——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回答。从我们巴勒斯坦人表明我们不允许把我们的问题掩盖抹杀的那时起，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对以色列有影响的国家，有两个主要选择。一个是加强巴勒斯坦人和限定的阿拉伯人。另一个是加强以色列的犹太人。

“实际上不是这样一种选择。由于以色列的不妥协，它本来会变成这样的，但它没有成为本应的那样。实际上，而且一旦我们巴勒斯坦人用我们的反抗来表示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斗争直至获得某种公正对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选择就是这样：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犹太国同巴勒斯坦人达成一项和解——在我们方面从 1974 年以来就是可能的；或者，给以色列人采取一切手段来消灭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特许证。

“问题过去是现在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会和我们巴勒斯坦人达成一项和解，纵使我们就此作好了准备。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说：‘有

我们就没有他们。’我们必须承认，而且我们确实承认，在我们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答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说：‘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而且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是我，或者阿拉法特，或者在法塔赫里的任何人——讲到把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到时候成长起来了。正如我以前跟你谈的，我们跨过了我们政治上的童年，进而进入青年，进而臻于成熟。我们看到并接受我们需要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随后我们产生了我们的小型国家方案。接着，我们又冒着我们信誉的危险，而且坦率地说，冒着我们生命的危险，向我们的人民作宣传。结果如何呢？

“我们越是变得现实，越是变得明显地面对现实，我们就开始越加赢得国际公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产生了后果。谢天谢地，基辛格离任了。在这之后，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在华盛顿的政府，开始感到他们有责任对以色列施加真正的压力——他们不时这样做过。但是，对我们来说很遗憾，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已经预料到他们有朝一日会面临压力，他们已经准备了他们的防御。我可以说，因为这是真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成功地抵抗了美国的压力，就像我们曾经成功地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我们和我们事业的图谋一样！

“现在，我差不多准备好来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为了让你了解全面的背景，我必须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反对美国压力有两个主要的防御手段。第一个是犹太人的金钱力量。它使占美国人口大致 7% 的犹太人或多或少可决定谁将成为入主白宫的总统，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金钱可使他们决定谁将不能成为总统。但是，不管你怎么样表述它，美国政治的首要事实是：除非你本身非常、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除非你能尽量从企业中榨取资金，否则，你如没有犹太金钱的支持，就不能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成为一名候选人并期待取得进展。也许有一天，参议员格伦将会告诉世界，在现行总统选举中，他由于这个原因所面临的问题。所以，美国犹太人的院外活动集团在总统当选上多半有很大的发言权。同样的理由，在搞垮总统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每一位总统都想连任。不幸的是，那会使他在第一任期内的任何时候易受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讹诈的袭击。而且总统越是软弱，我的意思是他遇到的问题越多。他就越加容易受到这种袭击。

“我猜想你的许多读者将会说，我把犹太人的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说得太玄了。遗憾的是我没有。我告诉你的是政治的科学事实而不是神话。大多数熟知内情的美国人都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但是，他们不愿意谈论它，因为他们知道它将使他们称之为民主的东西变得毫无意义。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问心无愧的右翼分子，但当我听到美国总统就他们的民主优点向世界发表演说时，我从来不知道我是该发笑还是该作呕。我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政变，但是，我也不要美国式的民主。我想美国人民总有一天会认识到他们的总统是如何听让 300 万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操纵美国的对外政策。当这一天到来时，将会出现一个反对犹太人的强烈的不利的反应。你知道谁将蒙受责难吗？我们阿拉伯人，特别是我们巴勒斯坦人。我们阿拉伯人没有屠杀 600 万犹太人或者虐待他们。这是欧洲人干的。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付出了代价。我想我有权利说，生活对我们是太不公正了！

“当我谈到犹太人的院外活动集团所起作用这个题目时，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使人沮丧的但是有趣的故事，当我有一次在美国时，同一位正在开始了

解我们情况的犹太人国会议员进行了接触。他要求我向他提供情况，以便包含在他的日后的演说中。因此，我们坐在一起并拟出内容提要，他答应将在几周期间写出。没有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只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有关于我们的谎言在这点或那点上引起一些疑问。不管怎么样，他还答应把他的讲话稿、剪报等等送给我。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以后，我本人再次来到美国。我对他说：‘怎么样？’他非常伤心，摇摇他的头。他说：‘哈拉德，连你也永远不会相信，我的人民是怎么对待我的。我作了第一次发言。在此后的 72 小时内，我的电话铃声不断，在办公室，在家里，在早晨，在夜晚。我本人，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们都快疯了。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骚扰和惊人的辱骂运动。目的只不过是使我无法生活，因为我竟敢提出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利的观点。坦率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我做了所有美国政治家在这种环境下所做之事——我收次回了在第一次发言中我所讲的内容，并不再提出我们同意的其他论点。我很抱歉。’我说：‘不必过虑，我理解。’然后，他的犹太人的幽默感又起来了。他说：‘哈拉德，我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如果你们阿拉伯人只有我们犹太人 5% 那样的无情，如果你们阿拉伯人只有我们犹太人在进行政治讹诈活动时 10% 那样的效率——那么，你们早就有了你们的小型国家……而且再想想，你们或许有了整个美国作为你们的最大型国家！’

“不管怎么样，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反对美国对以色列压力的两个主要防御手段之一——由强大的犹太人的组织和金钱使之得逞的政治讹诈。另外一个主要防御手段是以色列的惊人的常规和核军事力量。你要认真地想想为什么以色列要成为如此可怕的拥有 600—700 个核弹头和它自己的巡航导弹的军事强国？是因为受阿拉伯人的军事威胁吗？这是天大的笑话。我想你现在理解，除了 1948 年的少数几个星期外，以色列人从未、从未、从未面临过被阿拉伯人消灭的威胁，或者甚至这一前景。没有。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

“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常有远见。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西方国家也许有一天会背叛他们，正如它背弃我们给犹太人让路一样。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自己说：‘没有人将会背叛我们。’而以色列今天之所以成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真正的原因，是它在为美国也许要对之施加真正的压力的那一时刻作好准备。当这一天到来或者假若到来时，以色列人将对美国人说：‘你们不能使我们做任何违背我们意志的事。我们是很强有力的。’那时美国该怎么办？入侵以色列强行解决？当然不会。美国所能做的是切断维持以色列生存的钱财供应。但是，那时以色列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的猜想是 60~70% 的犹太人将要离开以色列——假定他们没有被当时控制局势的发动政变后上台的法西斯军政府所阻挠。下一步怎么样呢？以色列法西斯分子那时要向美国试弄核讹诈：‘恢复财政援助，不然我们将用我们的核武器袭击选定的阿拉伯目标。’如果美国把这视为以色列的吓人的虚张声势，将会怎样？这不会是虚张声势吓人的。像沙龙这样的疯子会实现他们的威胁。我猜想沙龙要威胁用他的第一次核打击摧毁海湾油田。现在，我已准备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曾经坚持而且还在坚持要我们在以色列承认我们的自决权之前承认以色列，要我们自杀！”

尽管当时我没有告诉哈拉德，我有证据，说明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在

1980 年的一天，我坐在贝京的一位高级部长的外间办公室里，等待他从一个会议结束后回来，当他到来时，他向我报以通常的欢迎的笑容，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上，推着我进入了他的私室。我走向他的书桌对面的椅子，桌上没有许多类如单页文件那样的东西。这位部长背靠后坐下，把他的双脚放在桌上，把我忘了。他为一些事情很烦恼。出现了某种危机，但显然不是要求他采取行动的紧急事件。我非常了解这位部长，而且我很尊敬他。最后我说：“你明显地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希望它不是个人问题。你需要我另外约定一个时间吗？”

大概整整一分钟，他什么也没有说，还在想着别的事。我的印象是，这也许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被吓着了。最后他说：“我刚刚听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而且这是真实的，我知道。我已经对它进行了核实。”

“嗯？”我说。

这位部长说：“这关系到我们著名的沙龙将军。你知道那个狂人刚刚做了什么事……他秘密发誓。他起誓如果本届或任何未来的以色列政府企图从西岸撤退，他将在那儿设立总部，为阻止撤退战斗至死。”

我说：“你认为他是认真的吗？”

这位部长紧紧地盯着我。“你呢？”

我说：“是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这位部长答道，“假如他有办法保护这个小国免于核武器爆炸后的放射性尘埃，他疯狂到竟要使用核武器来袭击整个阿拉伯世界！”

哈拉德继续说：“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被要求在以色列承认我们的自决权之前承认以色列，进行自杀，这是因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受到以色列的恐吓。从前，美国人和欧洲人经常向他们自己提问：‘我们最需要帮助我们控制这个地区和保护我们在那儿利益的是谁？’但是，当我们巴勒斯坦人用抵抗来表明我们的问题不能被掩盖和抹杀时，而且一旦阿拉伯国家对我们现实纲领的支持明朗化时，问题就变了。于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懂得，为了帮助我们，帮助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干点什么，但是，他们自己问自己：‘我们最怕的是谁——阿拉伯人，还是正在变成傲慢的、霸道的、新法西斯国家的这个以色列？谁会使我们的日子更难过——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还是阿拉伯人？’

“当这个问题这样被提出来时，它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因为事实是，或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敌，或以阿拉伯人为敌，西方都不能承受。因此，问题变成‘是的，但是以谁为敌会使我们的负担小一些呢？按照我曾经讲述的理由，美国人确定，为了他们自己和欧洲人，他们在权衡之后，害怕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势力甚于阿拉伯人。当然，美国人和欧洲人——我说的是政府——不会承认他们害怕以色列，并且不会承认他们结果会听从以色列来指挥他们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以色列的帮助下，他们萌生了一个聪明的办法，那就是指责我们。实际上，美国人说的是：‘当然，我们准备好要对以色列施加必要的压力，但是，不能要求我们理所当然地这样做，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所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指责美国出于害怕而拒绝进行必要的努力以迫使以色列同我们达成和解。但是，实际上，自 1974 年以来，我们没有再加以谴责。’

“这一年十分重要，作为领导，我们承诺同以色列进行和解。作为领导

人，我们已经在说服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得不同那些夺走我们国土和家园的人和解。这是真的，我们不能公开宣布我们的真实意图，但是在政治上，特别在和平和战争、生与死的政治问题上，这类行动从来不能公开进行。因此我们利用秘密渠道，把我们的真正立场诉诸世界，这样做是正常的。在那种境况下，不可能过多地强调赛义德·哈马米的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伊扎克·拉宾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通过哈马米发出的信号曾经作出反应，那么在很短的几年之内我们也就能够取得公正的和平。我们从以色列方面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愿告诉你。

“在 1974 年，我们希望以色列能够说出以下的话或者类似以下的话。‘我们听了你们说的话，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而且你们也没有使我们信服你们会采取你们所谈的这个不可想象的妥协方案。但是，我们受到了鼓励。让我们保持接触，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在同你们讨论和解问题。’不幸的是，拉宾政府丝毫不感兴趣。拉宾政府有一个朋友——基辛格——他像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作出摧毁巴解组织的同样保证。事实上，在我们自己同尼克松进行交易而在谋略上挫败基辛格之后，在我们连续取得两大政治胜利之后，基辛格是企图在黎巴嫩消灭我们的设计师。这第一次政治胜利是在 1974 年 10 月，其时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第二次是在 1974 年 11 月，其时阿拉法特戏剧性地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

在 4 年多的时间里，哈马米的信息在经常的基础上传达给拉宾政府。哈马米在以色列的联系人尤里·艾夫纳里是前国会议员、一家周刊的编辑、这个国家的最著名的“鸽派”人物。哈马米于 1973 年底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这个巴勒斯坦人和这个以色列人进行了他们的第一次相互接触。哈马米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号召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相互承认。艾夫纳里证实他曾多次和拉宾本人谈过。艾夫纳里除了传递信息之外，还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理事会。

在哈马米—艾夫纳里对话那个时候，多数评论家设想哈马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单独人士，他先走一步，希望勉强中的巴解组织领导跟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哈马米是阿拉法特的特使。

在 1978 年 1 月，一个在电话上说他的名字叫阿德尔的假扮成阿拉伯人的人进入在伦敦的巴解组织的地下室办事处。哈马米站起来同这位来访者握手。“阿德尔”开枪打死了哈马米。

赛义德·哈马米不是第一个被害的巴解组织驻欧洲办事处的代表。但是，他是阿拉法特许多特使当中——为数约 20 或者更多一些——在 1978 年 1 月到 1983 年 12 月这一期间被杀害的第一个。所有那些死去的人都在两个方面成就中的一个方面立下了功劳。有些人，像哈马米本人和伊萨姆·萨尔塔威，在同某些以色列人建立良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以色列人严厉批评以色列政府愚蠢的政策，并取得原先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支柱的某些非以色列犹太人的理解甚至支持；其他被暗害的阿拉法特的特使是那些成功地同某些欧洲国家政府和像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建立了极好关系的人。如果不是被害者的全体，也是绝大多数，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历届以色列政府曾享有其影响的完全和不可挑战的自由的地方，他们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倡导者。

负责进行暗杀的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的身份从来也不是个秘密。他的化名

是阿布·尼达尔。他的真名是萨布里·哈利勒·班纳。在 1973 年阿拉法特和他的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保证要同以色列进行和解之前，阿布·尼达尔是法塔赫的一名忠实成员，但是，就在那件事情上，他同法塔赫闹翻了，并在伊拉克建立了他自己的组织。他从此变成一名反对领导机构与以色列和解政策的疯狂敌手。

阿布·伊亚德说：“当时在法塔赫内有许多人持有和他同样的看法，但是他们反对运动内部的分裂。因此，阿布·尼达尔失望了，他转而搞暗杀。”事实上，阿布·尼达尔发誓要杀掉任何一个和以色列接触的法塔赫官员。阿布·伊亚德继续说：“他把约 50 名法塔赫领导人的名字列在他要打击的黑名单上。他们不是很高层的领导人。他们都是那些同高层领导人关系密切并为他们——特别是阿拉法特——执行特殊使命的。”

阿布·伊亚德透露，早在 1975 年法塔赫就曾缺席审判阿布·尼达尔，并判处他以死刑。在哈马米被杀害以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曾以阿拉法特的名义要求引渡阿布·尼达尔。巴格达政府竟然拒绝考虑。在第二次暗害之后，也就是在 6 月巴解组织驻科威特代表被谋杀以后，法塔赫再次提出引渡阿布·尼达尔的要求。这次是公开的。伊拉克政府又一次拒绝考虑。那时，阿布·伊亚德命令他自己的射手采取行动。他们在巴格达两次试图打死阿布·尼达尔，然而两次都失败了。阿布·伊亚德说：“两次伊拉克当局阻止我们。”在 7 月和 8 月间，世界各地的报纸报道了在法塔赫和阿布·尼达尔集团之间的交火。交火行动发生在巴黎、贝鲁特、伊斯坦布尔和卡拉奇。我问阿布·伊亚德那些都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演习，”他说，“我们正要把他们引出来。我们必须证实他们是谁、他们在什么地方。在第二年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宣传，我们悄悄地消灭了他们 27 个人，主要是在欧洲。”

我问阿布·伊亚德，为什么法塔赫迄今未能打死阿布·尼达尔本人。他说，“阿布·尼达尔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阶层。当他在巴格达时，他居住在许多伊拉克领导人也居住在那里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区。他不常旅行，当其旅行时，他享有伊拉克的外交掩护。但是，我保证一旦他作为我们能够射击的目标，他将立即死去！”

法塔赫的领导人，包括阿拉法特本人，确信莫萨德插手了阿布·尼达尔的行动。更确切地说，莫萨德是为阿市·尼达尔实际选择一些或许是很多暗杀目标的机构。

阿布·伊亚德说：“你会赞赏我们仍在同阿布·尼达尔和莫萨德进行战斗，所以有许多详细情报我不能向你披露。然而，我将告诉你一些，足以使你思考。我们知道莫萨德的特务，开始时是两个或三个，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渗入阿布·尼达尔的组织的。这发生在摩洛哥。那儿，如你所知，有一个欢乐的、繁荣的犹太人社团——包括很多把自己冒充为阿拉伯人的人和惯于搞欺骗的能手。我的意见是他们可以愚弄任何人。

“告诉你实情，莫萨德成功地渗入阿布·尼达尔的组织完全是偶然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碰上了你可以称之为的好运气。当时进行渗透的实际行动是山摩洛哥情报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关于这件事真的还有一段故事。

“的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摩洛哥情报处是在合作执行渗入阿布·尼达尔组织的任务。为什么合作？有两条主要理由：一是在这两个情报机构之间有着十分好的关系；二是阿布·尼达尔从北非招募他的多数人员。”

“但是，如你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至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部分机构，同莫萨德有着特殊关系。他们经常地夜以继日地交换情报。因此，莫萨德得以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干什么……向这止是莫萨德把自己的特务安插进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机会。我们及时地并在摩洛哥情报处的合作下发现，第一批渗入阿布·尼达尔组织的特务中肯定地有2名也可能有3名特务是为莫萨德工作的。”

“我可以告诉你，打进去的为莫萨德工作的一个特务非常接近阿布·尼达尔本人。非常接近。你会问我——那是真的这么容易吗？回答是肯定的。我将告诉你为什么。这是由于阿布·尼达尔本人的性格和人品造成的。你必须了解有关他的两件事。第一，他是一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养。第二，这是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十分反复无常的人。他有一种分裂心理和一种病态心理。他情绪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刚刚大喊大叫，马上又风平浪静。现在，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知道任何一个情报专家都能证实，当一个组织由这样的人来掌握时，渗透是十分容易的。我们可以作另一种假定。如果阿布·尼达尔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人，如果他总是镇定而沉着，他会有更多考虑，更为谨慎……这时莫萨德就不会如此容易得逞了。”

我要求阿布·伊亚德告诉我，他认为莫萨德特务在阿布·尼达尔组织内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他说：“我肯定他们有几种作用，但主要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帮助阿布·尼达尔的组织选择将要袭击的目标。选择目标。”

我说：“你认为莫萨德特务有时在搞暗杀吗？”

阿布·伊亚德回答说：“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那些真正的暗杀者是谁……但是，我要说，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保密的。”

最后我说：“谁真正杀害了赛义德·哈马米？我们都知道他是被阿布·尼达尔的组织暗害的，但是他是莫萨德特务内定的杀害目标吗？甚至有可能那个阿德尔本人就是一个莫萨德特务吗？”

阿布·伊亚德回答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作出你自己的结论——但是，我可以向你提供更多一点现在不再是秘密的情况。它甚至曾经在英国的报纸上报道过。它是真实的。早在赛义德被暗杀前，他曾经得到英国特别分部警告，他是莫萨德枪击名单上许多巴解组织人员中的一个。特别分部人员告诉赛义德，这一情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传送给他们的。根据赛义德当时告诉我们的情况，而且我们相信他——为什么不呢？——特别分部还说，英国当局曾经警告以色列大使馆，如果以色列人进行任何枪杀，那么所有在英国的莫萨德特务都将被驱逐出境。”

从我同阿布·伊亚德问答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以色列的莫萨德特务暗杀了哈马米们类似他的其他人，以色列在政治上十分失利。这就是为什么莫萨德要渗入和利用阿布·尼达尔组织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我以为阿布·伊亚德将不再谈论这个题目了。当时他变得非常生气。他很痛苦他说：“如果你想知道我真的在想什么——我愿意告诉你。如果阿布·尼达尔的组织不存在了，以色列人也会创造一个。这就是莫萨德的工作方式。”

在9个月内，世界上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三位领导人中有两人被毁灭了，1974年8月9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事件所击垮，不光彩地辞去了总统职务。1975年3月25日，费萨尔国王遭遇暗害身亡。在这两个事

件期间，亚西尔·阿拉法特赢得了两项巨大的政治胜利。在 1974 年 10 月拉巴特首脑会议上，阿拉伯领导人，因而也是他们的政府，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这意味着侯赛因不再能自由地为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这是对基辛格和以色列政府一次粉碎性打击，接着在 1974 年 11 月，当阿拉法特戏剧性地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时，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承认得到了国际社会实质上的认可。没有费萨尔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这两个胜利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阿拉法特从 1973 年底以来同以色列言和承诺的实际内容，尼克松总统是属于世界上最早被完全地、忠实地告知的人士。阿拉法特的这一承诺一旦正式作出，就包含有对以色列存在的事实上的承认。尼克松十分清楚，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即使对和平的兴趣极少，都会赞同阿拉法特的小型国家方案。他也知道，如果以色列政府同意就此进行谈判，一旦阿拉法特和在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们经充分说服，在解放运动广大成员中拥有接受这一妥协方案的足够支持者们，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就将结束。在 1974 年 3 月，尼克松亲自派弗农·艾·沃尔特斯将军去中东同巴解组织的两位领导人进行一次秘密会晤。当时沃尔特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但是，尼克松和巴解组织双方都理解沃尔特斯是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来参与会晤的。

巴解组织的两位代表是法塔赫的主要右翼人物哈拉德·哈桑和法塔赫的杰出左翼人物马吉德·阿布·沙拉尔。后者出席是为了和前者取得政治上的平衡。哈拉德·哈桑是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同时以阿拉法特私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会晤的。马吉德·阿布·沙拉尔当时是法塔赫情报部的负责人。（在 1981 年 10 月，他在罗马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一颗放置在他床下的炸弹爆炸，被害身亡。此事猜测是莫萨德特务干的。）在秘密会晤当时，巴解组织不知道沃尔特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哈拉德说：“首先，我们告诉沃尔特斯将军关于我们认为需要政治解决的背景。但是，主要任务是向他充分地、详细地介绍关于我们和以色列和解承诺的实际内容。至于我们内部的问题，我们也是很诚实的。我们说，我们是领导这一阵线的领导人，为了说服我们的人民需要同仍然占领我们祖国土地 70% 的人进行和解，我们还有许多障碍要去克服。

“对于我们，就我记忆所及，沃尔特斯将军提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他所称的‘技术’问题，他说：‘我们美国人是这一地区的技术拥有者。你们将采用什么技术？’他显然是在询问武器、机械等等。他问关于这一题目的问题，其真正目的是想摸摸底，我们是否正在成为苏联的傀儡。我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所听到的有关我们和苏联人的关系和牵连大多数都是胡说，我非常坦率地说，作任何外国的傀儡不是我们的意向。而且我还提醒他注意一系列的事实。一个事实是法塔赫是来自正义和向着正义的。另一事实是，我们的领导在阿拉伯世界是唯一相信和实行民主的。接着我对他说：‘是的，你是对的。在我们队伍里，有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些所谓的激进分子和一些所谓的左派分子……们是，你知道为什么一些巴勒斯坦人和一些阿拉伯人指望莫断科？’我告诉他，这是因为美国使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说，具体地说，是基辛格愚蠢的战略所致，而一般地说，是 1948 年以来美国和以色列愚蠢的政策所致。我也很坦率地告诉他，我们发现人某些方面严肃对待美国是很困难的。美国总统和官员们经常在发表关于需要遏止共产党

人的连篇累牍的废话。我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天的到来，美国人认识到在世界许多地区，正是他们的政策和他们的态度在那些大声呼喊要成为美国朋友的人民中制造所谓的共产党人。这些人叫喊要成为美国的朋友，只要美国不坚持主宰他们的命运。所以我对他说：‘你们美国人要阻止共产主义前进，’但你们实际上正在促进它发展。’自然，这里所讲的也是今天正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情，这是由于里根对那里的政策。这样，你看，对于巴解组织是共产党人傀儡的这一荒谬的问题，我们作了我们自己的很好阐述。

“这位将军的第二个问题是，巴勒斯坦小型国家在阿拉伯舞台上将如阿表现和设计自己。他说：‘你们将要讲巴勒斯坦的语言还是泛阿拉伯语言。’我们说，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所以我们相信阿拉伯团结并为此而努力，但是，我们又说，我们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恰恰就像我们不愿成为东方的或西方的傀儡一样。所以我们也不愿受任何阿拉伯政权的统治。我们直率地告诉他，我们看到在阿拉伯舞台上我们今后面临着某些问题。”

有一次在我跟阿拉法特聊天时，我大胆提出的一个意见是，阿拉伯政权为什么从未真心愿意出现一个巴勒斯坦国，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将成为一个民主的典型，那些不民主的，多半非法的政权将视之为危险的威胁。阿拉法特变得非常严肃。他说：“是这样。你说得对。我坦率地跟你说，这是我十分烦恼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小型国家里，我们的民主将是许多阿拉伯人希望效法的榜样，那时，他们也许会要求我们巴勒斯坦人所享有的那样的民主。这些政权对此将如何作出反应呢？无疑，这些政权害怕我们的民主。也许这是在阿拉伯世界我们面临许多问题的头等原因。”

哈拉德继续说：“这位将军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约旦。他简要地问，‘那安曼呢？’他的意思是‘好，让我们假定你们有了你们的小型国家……那侯赛因呢？到时候你们的政策是推翻他吗？’我们告诉他为什么这是另一个胡言乱语问题的全部理由。我们还建议，如果他要了解在约旦真正发生的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他应该调查一下某些正式的美国情报机构的黑暗角落。如果他未能在哪里找到证据，他应当沿着基辛格的一些幕后渠道看看，或者对之调查，或者对之访问。在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时，我们说明，推翻侯赛因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政策而且为什么它从来就不会是这样。”

这个秘密会见中最秘密部分是如何结局的呢？哈拉德告诉我：沃尔特斯将军说了三件事。第一，他对我们所谈的内容留下深刻印象。第二，他相信尼克松总统也会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的第三点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使我们相信他是很真诚和很认真的。这不仅是他所说的内容，而且是他说话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说的确是这样，如果我留下的印象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

“我们明确约定在沃尔特斯将军向尼克松总统汇报后尽快再次会晤，我们还同意，第三次会晤也许是必要的。”

“此后发生了什么？哈拉德说：“我从沃尔特斯将军得到的第一次音信是，在他能告诉我们何时我们再次会晤之前要有一个月时间的延宕。第二次音信说，将不再有会谈了，对话已经结束。完了。我被非常明白地告知，而且我可以遗憾他说，沃尔特斯将军已经为基辛格所迫割断这一接触。”

现在来看一个最有意思的相抵触的证据。基辛格在他自己的书中蔑视地用不到两行的字来写 1974 年 3 月在沃尔特斯将军和巴解组织之间的会晤。基

辛格还说，三月会晤是沃尔特斯和巴解组织的第二次会见。按照基辛格说法，第一次会见是1973年11月3日在拉巴特举行的。在那次会见中，仍然按照基辛格说法，巴解组织人士告诉沃尔特斯，巴勒斯坦人不会把小型国家限制在西岸和加沙，而且侯赛因必须要被推翻，以便让巴勒斯坦人拥有约旦作为大的祖国的一部分。另外，基辛格说，巴解组织人士拒绝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如果存在任何条件的话——巴解组织将承认以色列；谈到恢复以色列回到1947年分治计划边界的可能性，拒绝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在沃尔特斯和一位巴解组织人士之间有没有11月8日的会见。或者，也不在于甚至是否有一位巴解组织人士说了或者没有说基辛格所说的话和暗示他这样说的。事情的要害是，基辛格把他描述的第一次会见和他没有加以叙述的3月的第二次会见联系起来，说什么除了第一次会见的论点外，事情没有取得进展。

同多数巴解组织领导人一样，哈拉德·哈桑曾几次阅读基辛格的书。当它打开在我们面前时，我请哈拉德说明他和基辛格所说的有什么重大分歧。哈拉德对我一笑，伤心的一笑，然后说：“阿兰，我以前已经对你多次说过，而且无疑将来我还必须多次对你说，基辛格此人是个大谎言者。”

如果哈拉德·哈桑是对的，结论必然是基辛格破坏了有成效的尼克松—巴解组织对话。这一对话是尼克松授权的，作为他本人探索全面解决所作努力的一个部分。这一对话，为所有关心在以色列从1967年所占领土全部撤出以换取彻底和平和给巴勒斯坦人一项公正措施的基础上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人，提供了很多希望。

阿拉法特和哈桑兄弟两人以不同方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们确信，以色列政府和在美国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曾利用水门事件，在尼克松迫使以色列作出必要的撤退以换取和平之前，就把他搞垮了。

纵然有这样一项阴谋，它也永远得不到证实。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有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尼克松曾认真地从事于全面和平，并且为了使之实现不惜在必要时和以色列对抗？回答是肯定的——有很多证据。

在1974年6月，在基辛格破坏了尼克松—巴解组织对话以后的大约两个月，尼克松前往中东。他访问了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以色列和约旦。根据基辛格自己对尼克松访问以色列的叙述及以色列报纸的报道，很清楚，总统对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坦率的，甚至强硬和直截了当。

6月17日《那路撒冷邮报》头版刊登通栏大字标题：“尼克松敦促以色列应以‘政治家风度对待和平’”撰稿人是阿·舍·沃尔费希和戴维·兰多。他们的报道的开头三段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昨晚呼吁以色列领导人选择具有政治家风度的‘正确道路’，并且认为‘继续战争不是争取以色列生存的解决办法’。

“尼克松先生在以色列总统于克内赛特的查格尔大厅为他举行的国宴上对艾费雷姆·卡特齐尔教授的祝酒致答词。

“抉择在政治上是比较容易的，尼克松先生说——坚持维持现状和抵制首创精神。但是，首创精神可以导致和解。”

根据这同一报道，尼克松还说：“和平需要勇气，正如战争需要勇气一样。”

在《动荡年代》一书中，基辛格说，尼克松在和以色列领导人的私人谈话中甚至更加强语气。据基辛格说，尼克松告诉他们，继续战争不仅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它也是“不对头的”。基辛格引用尼克松的话这样说道：“……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也许会说，在美国犹太人社会中我们的许多非常好的朋友们现在就这样说：让我们回到过去的年代，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全部敌人和所有其他的人。我不认为那是一项政策。我不认为对将来是可行的……时间将会证实！”

远在 1973 年 10 月，基辛格曾经警告以色列政府，尼克松也许在准备切断武器供应作为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在我同果尔达·梅厄最后一次谈话期间，她告诉我，基辛格在“十月战争”正在接近尾声和美国武器源源输入这个国家的当儿访问以色列时和她说的一些话。“基辛格悄悄地对我说，‘梅厄夫人，假如我向你提出一些忠告你会介意吗？……既然空运正在进行，你必须利用这一机会从尼克松那儿得到每一件可以得到的东西——每一辆坦克、每一架飞机、每一枚炸弹——因为他不再愿意向你们供应的这一天也许会来到。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各种压力如此之大，他无法加以抵制。’”

据哈拉德·哈桑说，尼克松对费萨尔作了两项秘密承诺。两者都包含在总统致国王的私人的亲笔信中。第一封信是在尼克松中东之行返回后立即发出的。

哈拉德说：“我亲眼看到并读过第一封信。费萨尔给我看这封信，因为里面有一句话是关系我们的。我将精确地告诉你这封信说的是什么，请记住这是尼克松写给费萨尔本人的：‘尊敬的陛下，相信我，我将实现对巴勒斯坦人的公正原则。’”

据哈拉德说，这封信的更大或更广泛的承诺是，尼克松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以色列人按照 242 号决议撤至 1967 年的边界。然而，有一个条件。尼克松明确地告诉费萨尔，他不能保证对那路撒冷问题提出一个速决办法。

第二封信是尼克松从莫斯科返回后在 7 月初发出的，似乎是对费萨尔的信或口信的答复。这位国王在信中问，如果以色列和它在美国的朋友们成功地否定了总统在开始对以色列施加真正压力时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尼克松实际上计划做些什么。

哈拉德说：“我没有看到尼克松的第二封信，但是费萨尔告诉了我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对它讨论了一些时候，因为尼克松说得如此惊人，而且对他来说是如此危险。他告诉费萨尔，如果他发现他的道路被以色列和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阻塞，他将在他下一次作国情咨文报告时把他准备好的内容抛出来，而且他将通过电视实况和广播电台把关于以色列和它在美国的朋友如何成为和平障碍的全部真相告诉美国人民。换句话说，尼克松正准备揭露以色列政府和它在美网的支持者们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做法。”尼克松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以外交界视为惊人的纪录而结束。费萨尔在他的送别辞中，明确地，因而是非寻常地，而且是完全没有先例地提到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和美国的国内政策。在通常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应该是最后一个打破这一常规的人，即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企图去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但是，以下就是他所说的：

“非常重要，我们的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朋友自己有足够的智慧支持

你，总统先生，在你从事崇高的、几乎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旨在寻求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努力中，团结在你的周围……任何在美利坚合众国或在美利坚合众国之外的人，持反对你总统先生的立场，或者持反对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你们的朋友的立场，显然心怀一个目的，那就是促使世界的分裂，促使世界不正常的两极分化，促使灾祸的形成，这些都不会导致世界的安宁与和平。”

我问哈拉德他如何解释费萨尔的异常的讲话。他说：“这是费萨尔告诉美国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许多事情的方法。首先是他知道这个院外活动集团正在利用水门事件打击尼克松。其次是他，沙特阿拉伯国王，已经准备好在与这个院外活动集团的任何对抗中支持尼克松。费萨尔暗示，如果需要，他准备使用石油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可摧毁这个院外活动集团权力的根源——财富。”

在7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8票对0票裁定尼克松必须交出用传票索取的水门录音带。正如基辛格表明的，这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下台的开始。

基辛格谈到尼克松在8月6日晚上知来的一次电话。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刚刚接到以色列要求得到长期军事援助的一项请求。据基辛格讲，尼克松说他将予以拒绝，而且他正打算立即取消对以色列的全部军事供应，直至它同意一项全面和平。尼克松接着要求基辛格准备取消对以色列全部军事供应的命令。基辛格随即引用尼克松的话这样说道，他很遗憾，他没有更早采取这样的行动。他肯定他的继任者将会感谢他。

3天之后，在8月9日尼克松辞职以避免遭受弹劾。

以上所述不能证明有一个搞垮尼克松的阴谋。但是，他使人想起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产生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随着尼克松的离去，基辛格的下一步行动就是把他在埃及曾经做的事在约旦重演。他希望说服以色列归还一点土地给约旦，以便把侯赛因拉进谈判，把阿拉法特排除在外，基辛格的设想是，一旦侯赛因代表他本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将完蛋，这一想法在当时也许是对的。因此，基辛格那时的战略是用政治手段来扼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但是，这位美国国务卿受到了十分恼火的打击，阿拉法特要用他自己的两位国王战胜基辛格的一位国王！

把10月底在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发生的事情称之为基辛格的失败和阿拉法特的胜利，是一种很大的克制的说法。首脑会议通过了两项主要决议。一是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这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就是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政府的地位；就阿拉伯人给予他们可能给予的保证来说，巴解组织的未来这样就得到了保证。第二个决议要求侯赛因在西岸解放后把它交给巴解组织。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拉巴特首脑会议决议的直接后果是，侯赛因不能再自由地决定被占领土西岸人民的未来或者代表他们说话；而且他再不能自由地在没有巴解组织作为谈判伙伴的情况下谈判西岸收回问题——当然，除非巴解组织授权他代表它去进行谈判。基辛格的战略破灭了。

阿拉没特的胜利是借助两位国王赢得的——费萨尔和摩洛哥国王哈桑。

沙特新闻部发表的告别词正式文本，基辛格《动荡年代》在1131页引用。

《动荡年代》，第1265页。

在首脑会议前的几个月，甚至就在首脑会议上，侯赛因彻底反对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这一想法。哈拉德·哈桑说：“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你，如果那两位国王没有使用他们的全部力量来说服侯赛因，他会在拉巴特对我们说‘不’。”

首脑会议的一个有趣的花絮是，摩洛哥的安全人员对6名阿布·伊亚德的人进行逮捕。他们奉他们的首领之命寻找机会在侯赛因离开拉巴特之前杀害他！据阿布·达乌德说，在拉巴特首脑会议后几星期里，阿拉法特和阿布·伊亚德之间的关系“非常坏”。我在前面说过，阿布·伊亚德在帮助阿拉法特宣传小型国家方案上起了重要作用，那完全是真的，但是，直至1975年初他尚未成为需要实行妥协的信仰者，从那以后，阿拉法特在他宣传妥协方案的斗争中，获得了所有他的法塔赫高级同事们的并肩努力。

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以后，以色列领导人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巴解组织。从此，他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接受巴解组织在未来某一时期作为谈判对手，如果阿拉法特能提出他们知道他作出承诺的并且正在他自己的战线后面努力进行宣传的妥协方案，而他们有理由感到满意。第二个是以军事手段消灭巴解组织和他代表的一切。以色列领导人主张采取第二个选择。

终于，一味凭仗凶残武力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一直未能作出，直至以色列自己的极端主义分子掌权。他们的领导人是梅纳赫姆·贝京和阿里尔·沙龙将军。贝京在1977年成为总理。但是，在他的两届政府和由伊扎克·拉宾领导的上届工党联合政府之间的区别，只是作风上的不同，而非实质上的差异。拉宾和他的所谓的温和的工党同事们，要以军事手段来消灭巴解组织甚至巴勒斯坦人民。但是，他们十分聪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毕其功于一役，他们在国际同情和支持方面损失太大。因此，拉宾宁愿选择分阶段消灭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1977年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分界线。正如阿拉法特所说：“贝京上台以后，事情跟往常一样。唯一真正的区别是，贝京对其意图是直言不讳的，而在他之前的那些统治者是伪君子 and 说谎者，首先欺骗他们自己的人民，随后又欺骗世界。

我问阿拉法特，他对历届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是否有所区别。

阿拉法特以极大的热情答道：“是的，是的，是的，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当以色列的犹太人起来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时，犹太复国主义就将失败。你看，作为一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或者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不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真正可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它是一项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从定义和实际看，当一个犹太人同意不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并和他们在平等条件下和平相处时，他就不再是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我们的情况来说，这是基本的。我们仍将去消灭像我曾经描述的那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而且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因为当它被消灭时，当以色列的犹太人起而抵制它时，我们两个民族就可以共同生活在真正的和平之中。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真正到来的日子。我是这样想的。到那时，而且直至他们准备好同享我们的美丽梦想时，我们准备把他们作为邻居一起生活。”

当阿拉伯领导人在拉巴特作出决定的消息披露时，基辛格在南斯拉夫。他大发雷霆——怒不可遏，甚至忘记了和他在一起的人也有阿拉法特和他的一些最高级的同事，包括哈桑兄弟的朋友。

哈尼·哈桑说：“我不想损害我们在南斯拉夫的朋友，所以我不想确切地告诉你基辛格在怒气冲冲时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可以说说他的意思。无疑地他留给我们的共同朋友的话是，他将惩罚我们，而且是大规模地在黎巴嫩惩罚我们。他没有用‘消灭’这个词。但是，对听到他讲话的我们的朋友们来说，那是很清楚的，他打算结束我们，或者更确切他说，打算叫我们完蛋。坦率地讲，我是能够给你这个基辛格阴谋的真实内情的人，因为我和阿拉法特是试图阻止这场内战的两个人。我的责任是，甚至当我们都在相互战斗时，同黎巴嫩当局，同阿萨德总统，进行秘密接触。但是我们还是及时谈到正题。基辛格发怒的一个原因是他失去了侯赛因作为谈判的伙伴。但是还有比这更多的缘由。他说，阿拉伯人进行了这场战争，并从战争中得到必要的荣誉以允许他们进行谈判——然而最后巴勒斯坦人是得益者！”

哈拉德·哈桑说：“我可以独立地证实哈尼所说的话。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也告诉过我，基辛格在一个方面说道，他已经着手在找一位裁缝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做一件新衣服，他以最显著的方式明白暗示，那将是一件丧葬用的衣服——当然，是我们的！”

在拉巴特首脑会议后两个星期，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对基辛格的血压来说只能是不妙的。11月13日，星期一，亚西尔·阿拉法特戏剧性地出现在联合国，开始大会辩论“巴勒斯坦问题”。那天他像国家元首一样受到尊敬和接待。当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正准备进入大会辩论大厅时，真像进入一个世界议会，以色列大使特科阿赫准备退席。当阿拉法特出现在大厅时，世界各国代表几乎像一个人一样起立，鼓掌欢迎。当他在101分钟之后离开会场时，他们跟他在入场时一样起立欢呼。只有美国人依然坐着。

在11月的这一天，对阿拉法特本人来说，这世界还不是相当完美的地方。我对他说：“阿布·阿玛尔，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你有可能利用那个机会毫不含糊他说出你的真实立场——换句话说，你可以画出你正在为之努力的妥协方案的实际轮廓……不是那样吗？”

阿拉法特再一次苦笑，随后说道，“是的，当然。那是我真心诚意想说的。但是，由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原因，那时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必须用你称之为我的含糊的方式发出我的信号。”讲到这里，笑容消失了，阿拉法特的声音带着些痛苦，接着他说：“但是，实际上我不是那样含糊的。是的，我的讲话要求听众自己去思考，并在某些想法之间加以联系……但是，我为好心的人民，甚至为好心的以色列人，说了许多，使他们理解我正在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名义提出一项巨大的让步……难道那不也是这样吗？”

纵然对阿拉法特在公开场合以毫不含糊方式说话存有限制，他的讲话仍是一项明晰的杰作——假定他的听众准备听取和准备像阿拉法特所说的那样为他们自己作一点点思考的话，阿拉法特讲话的明智之处是把两个特殊的思想连结在一起的方式。

他首先谈到巴勒斯坦人的梦想——建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取代多少排他性的犹太国。对此他说：“当我们谈到我们巴勒斯坦明天的共同希望时，我们在我们的前景中，包括了所有现在住在巴勒斯坦的选择和我们一起在那里和平生活而不受歧视的犹太人。”这是两个中心思想之一。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希望，在以色列可能被劝说撤出的西岸和加沙的土地上建立一个

“民族权力机构”（在1974年11月仍是小型国家的代号）。他把这两个思想和一个问题连结在一起：“难道我没有权利做梦吗？”就像他对我说的——他对那些有心听取的人真正说的是：“是的，我有权梦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权梦想……但是，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准备面对以色列存在现实的人，我承认并接受梦想不能经常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我们的民族权力机构的原因——那是我们准备为之建立的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型祖国，以便和以色列和平相处，直至以色列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和我们一起创建我们梦想的民主国的这一天的到来。”

阿拉法特用两句他将永远记住的话来结束他的演讲：“我带了一株橄榄枝和一支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

在11月22日，除了以色列和美国之外，国际社会承认了巴勒斯坦人具有的权利。那一天，联合国3236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阿拉法特的胜利得到了确认。可以这么说，这是正式的。而3237号决议则授予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国观察员的身份。

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史上，这肯定是明智要求以色列以枪杆子以外的其他办法作出反应的时刻。时机对实现和解是恰当的，因为双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赢了。以色列赢得了军事战的胜利。它的军事优势以及这一优势的频繁显示的结果，已经使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愿意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仅仅要估及这一事实，即在阿拉法特能够在不分裂巴解组织情况下提出妥协方案之前，他还有一段路程要走。而巴勒斯坦人赢得了政治战的胜利，证实他们的存在、他们的问题不得掩盖勾销，不幸的是，以色列领导人他们这一方简直没有看到这些，没有别的只是用枪杆子作回报。

在联合国，以色列人对阿拉法特讲话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特科阿赫大使谴责阿拉伯国家是“疯狂攻击犹太人民的先锋”。他谴责联合国邀请阿拉法特到这一世界性机构发表演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谋杀组织”，而联合国已经“屈服”于它。这位大使说，以色列“不允许在巴勒斯坦的任何地方建立巴解组织的权力机构。以色列不允许将巴解组织强加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恰恰在特科阿赫大使正在发言时，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那些原先对解放运动失去信心的人，正欣喜若狂，重新献身于巴解组织，特别是献身于阿拉法特。

以色列政府当场作出反应，加速在被占领土发展它的居民点；接着在12月1日，以色列总统正式确认人们几年来都已非正式地知道的事——以色列具有生产核武器的潜力。

11月19日，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出现后仅6天，4名以色列公民，包括两名妇女，在贝特谢安的一幢公寓里被人民民主阵线的恐怖袭击打死。人民民主阵线说，它进行这次袭击以表明阿拉法特挥动着橄榄枝并不意味着他已放下武器。巴勒斯坦人准备妥协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军事上已被消灭以及他们由于没有别的选择才准备进行谈判。它说，人民民主阵线试图表明，巴勒斯坦人要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我认为，这个逻辑的真诚程度竟像它的荒唐可笑一般。但是，阿拉法特和整个巴解组织总是为误入歧途的少数派别的行动而遭受责骂。

阿拉法特出现在联合国大会有四位主要的舞台监督，两位沙特人和两位

阿尔及利亚人。两位沙特人是费萨尔和这位国王的外交部长、他最信任的顾问和朋友奥曼尔·萨卡夫。萨卡夫也是哈拉德·哈桑最好的朋友和良师。两位阿尔及利亚人是布迈丁总统和全国人民议会当时在任议长阿布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阿拉法特起初对他必须亲自去纽约的主张并不热心。哈拉德·哈桑告诉我：“当我们得到道路已经扫清的消息时，阿拉法特充满着怀疑。他对我说：‘为什么你不……你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他不是开玩笑。他确实不是。我跟他说：‘阿布·阿玛尔，你疯了。你是我们的主席。你是我们的象征。你是巴勒斯坦先生。这应该是你，不然就没戏了。’”

进一步证明阿拉法特心神不定状态的是，他的一些同事偷了他的护照，急忙送交埃及外交部长，请他要求美国大使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他的护照上盖上美国签证。哈拉德说：“当时我不在场，但是我相信这是十分有趣的。那些偷护照的人 15 分钟就回来了——带着签证。他们对阿拉法特说，‘现在你得去了！’”

我问哈拉德，为什么他认为阿拉法特起初并不十分热心。他说：“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肯定，他是在衡量各种因素。但是，你必须记住一件事……那是 1974 年，那时阿拉法特处理国际事务还缺乏经验。联合国对我是一种游戏——我去过好多次。对阿拉法特它还是个谜。”

“你的意思是阿拉法特担心他自己力所不及，他不能像你或其他人那样做好这个工作？”我问。

哈拉德答道：“是的，我想是这样，但是你不能为此责备他。事实上，我想你应钦佩他对自己是实事求是的。”

一旦决定作出，阿拉法特就像通常一样，全力倾注于起草和反复修改他将要发表的演讲稿，哈拉德说：“这是一项真正的委员会的工作。起草、起草、再起草。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把它写好时，我们请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来对它最后润色。”

显然阿拉法特主要考虑的是他个人的安全问题。我问阿布·伊亚德，作为法塔赫和巴解组织安全执行负责人，他是否曾经担心过阿拉法特也许不能活着离开纽约。他说：“事实上——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我的看法是美国不会允许阿拉法特在美国的领土上被暗杀；而且他们曾经要求我们给以帮助，使访问的时间尽可能缩短。我得出的理论是，在西方国家你必须把你自己交给当地的安全机构来保护，并把全部责任加在他们肩上。这样，你的安全就变成一项政治事务而不是一个治安防卫问题。依我看那是最好的保护。”阿布·伊亚德与苏联的克格勃有联系。他在向阿拉法特提供他的意见之前，会先征求克格勃的意见，这样的推测是有道理的。

所有陪伴阿拉法特旅行去纽约的人们，对许多美国安全人员关心他们和他们的主席的职业的和礼貌的态度，大加赞扬。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上万的美国人，他们中决不全是犹太人，聚会在联合国总部大楼荫影处的哈马舍尔德广场，举行反对和抗议示威。横幅标语表达他们自己的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国际暗杀者”；“联合国变成恐怖主义的讲坛”。一名工会领导人号召禁运“有毒的阿拉伯石油”。多数发言是极端中的极端。许多发言的要旨仅仅只是一个憎恨。甚至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这位苏联犹太人斗士向乌合之众说，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决定“威胁着本已惨淡的和平前景”，与此同时，保卫犹太人同盟作出诺言：阿拉法特将不能活着离

开纽约，这一诺言是在保卫犹太人同盟行动主任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作出的。他把一支手枪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场景和威胁制成了电视新闻简报，这简直就是对一个比所有以色列领导人加在一起还要认真对待和平的人的一种下马威。

星期六，在阿拉法特到达之前，联合国总部大楼和综合设施已经被完全封锁，与外界隔绝，巴解组织主席在星期一凌晨4时乘直升飞机降落在它的院子里，从那儿他进入联合国主楼的一套房间。直到中午他去发表演说之前，他没有离开那儿。演讲之后，出席了在联合国的午餐招待会，傍晚，阿拉法特及其一行被转移到瓦道尔夫·托瓦旅馆。查希迪·泰尔齐，这位将成为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大使的人，讲了以下这段故事：

“显然，这个旅馆从安全来说是最好的地方之一。他们在这个地方布置了骑警队。他们在建筑物上设置了狙击手。他们在地面架设了机关枪。他们在我们特定的楼层里放了警犬。而且，我们如果不显示证明我们身份的特别的圆形小徽章，也不能从我们自己人的房间走来走上。

“那天晚上，我们都上床睡觉了。我们相信，我们保证可以睡一个长长的好觉和有一个轻松的新的一天。我们知道计划。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日程。阿拉法特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共进早餐。中午将和黎巴嫩总统弗朗吉亚共用午饭。我很快睡着了，半夜有人敲我的门。阿拉法特的一位助手说：‘准备好，我们就要离开了。’

“这次我们乘小汽车去飞机场。我期待一个十分迅速的运送。实际上他们要我们一次走一辆车，而且每次出发之间的时间间隔都不一样。没有什么惊慌，但是我感到有麻烦事——我的意思是麻烦来了。阿拉法特的汽车最后到达——在我们其余人之后的两个小时。随后我们起飞去往古巴。这是属于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的专机。我们有些人推测我们的飞机有被导弹击中的可能性。我可以跟你说，我们很担忧。但是我们到达了。”

那么为什么在半夜三更改变计划呢？

我请阿布·伊亚德告诉我，阿拉法特改变他离去的计划，是否仅仅因为他在采取他的通常的防范措施，还是因为有一个反对他的阴谋。他答道：“我想两者都有。甚至连我也不知道。对我来说，惊奇的不是他离开的行动，而是他离开前去的方向。我想那就是线索。大家都以为他会返回非洲或去西方——但是，他往南去……因为它近，因为它安全。”

没有得出肯定结论的足够证据。我自己的猜想是，阿拉法特或许认为他会遭到空中袭击。

在1975年3月25日，费萨尔国王，这位为巴解组织带来政治上胜利做了最多工作的人，被暗杀了。暗杀发生在觐见室，当时费萨尔正在接见一个科威特代表团，而且是发生在那个瞬间，即这位国王和他的访问者被一支小小的摄影师队伍包围时。费萨尔·伊本·穆萨混在他们之中。他是这位国王的许多侄子中的一个。他走近费萨尔，拔出手枪，开枪把这位国王打死。这个暗杀者立即被捕，4月2日被判死刑，并于6月18日在利雅德公共广场被斩首。

关于费萨尔之死的第一份官方公告说，费萨尔·伊本·穆萨是“精神错乱”。但是，许多人知道这不是事实。五天之后，新闻部宣告，这种推测已被当局摒弃了。

阿布·达乌德是了解这个暗杀者不是精神病的许多人之一。他说：“在

沙特阿拉伯我当教师多年。费萨尔·伊本·穆萨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可以告诉你，他心智十分健全。这是事实，而且很多人都充分知道这点，因为费萨尔·伊本·穆萨多少是个知名人物。”

沙特当局花了5天时间提出一个掩饰的说法，接着又拒绝公开进一步谈论暗杀的任何情况。为什么这样，对此有解释吗？

哈拉德·哈桑说：“当他们发出第一个公告时，沙特当局强烈怀疑，而且后来他们自己满意地证实事实真相是什么，但是，如果他们在费萨尔被暗杀的那天把他们的怀疑给人以暗示的话，他们就会点燃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怒火，这种怒火将在几小时内从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这一端燃烧到另一端。你们西方人对此很幸运，阿拉伯领导人特别是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在许多情况下比你们自己的领导人更负责任。”

“沙特人相信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哈拉德·哈桑说，“这不再是他们怀疑的事。这是他们知道的事……但是，他们不能公开诉之于众。伊本·穆萨是这位国王的侄子和暗害他的杀手——可是他只是别人手中的一个工具和武器。这次暗杀是美国情报人员策划和指挥的，得到至少一名以色列特务——一个妇女——的帮助。”

根据哈拉德和熟悉沙特的巴解组织其他领导人，还有阿布·达乌德对我说的，关于费萨尔国王是如何遭致暗杀的故事概要对于很多阿拉伯记者和许多西方熟悉阿拉伯事务的记者来说，已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在暗杀前几年的一段时间里，伊本·穆萨主要住在美国。哈拉德说，“他吸毒，并且负债——这就使他成为被敲诈和操纵的目标。”

据哈拉德和声称从沙特人处了解全部故事内幕的其他巴解组织领导人说，伊本·穆萨对他的美国和以色列操纵者来说，是实行这项计划的最理想的候选人，因为他有两件互不相关的对费萨尔国王心怀不满的事。

他为他亲生的父亲的逝世谴责国王。他的父亲是在费萨尔把电视引进沙特阿拉伯并准许妇女不带面纱之后不久被杀害的。伊本·穆萨的父亲是占领第一个电视台并威胁要毁坏它的示威者之一。沙特警察包围了这座建筑物，最后开了枪并打死了人——包括伊本·穆萨的父亲。伊本·穆萨随后当众发誓，他总有一天要以这位国王的生命来为他的父亲报仇。

哈拉德说：“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费萨尔国王宽恕了伊本·穆萨，而且多少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潜在的暗杀者得以继续享受接近国王的权利而不被怀疑的原因。”

另外一件不满属于王朝的现在是有案可查的事。伊本·穆萨的母亲属于拉希德家族，这个家族在本世纪初被费萨尔国王的父亲、沙特阿拉伯的创始人所击败，因而失去了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家族的机会。

据哈拉德·阿布·伊亚德及其他人说：关于伊本·穆萨和他的背景的情报资料，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在好多年期间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加以搜集。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它不一定说明那些指使伊本·穆萨暗杀费萨尔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有许多美国的机构和许多个人是有机会接近或者可以得到中央情报局档案中的低级情报的。

哈拉德继续说：“因此，伊本·穆萨有两个弱点……那些指使他的人用一种很聪明的办法来耍弄他。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个女朋友，她是莫萨德的特务。他们利用她来加深他怀有的复仇情绪。这位漂亮的姑娘是操纵他的关键人物。正是她，在毒品的帮助下。向他大力灌输谋杀思想，在他回沙特阿拉

伯去进行凶杀之前，他在美国的全部时间，她一直和他在一起。接着她就消失了。完全不留一点痕迹。她没有接到伊本·穆萨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到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将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

我问哈拉德，他是否知道有任何足以证明这个女朋友是一名莫萨德特务的铁证。他答道：“你怎么证明这种事情？我能肯定告诉你的是，沙特和其他方面的调查很容易地而且是很快地确认，她是一个献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你也不要忘记，沙特人有十几个星期时间来审问暗杀者。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把所发生的事情组成一幅图画，并且把伊本·穆萨和他的女朋友的某些对话重新组合。”

我问哈拉德，在他多次与费萨尔谈话的印象中，有没有哪一次国王曾猜疑有一天他会遭到他的美国或者他的美国和以色列敌人的暗害。哈拉德回答：“我知道费萨尔有那种感觉。告诉你全部实情，有一次他对我说，暗杀大概就要发生。”

在纽约，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查希迪·泰尔齐对我说：“根据我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外交界的共同设想是美国人杀害了费萨尔国王。当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时，所有外交界私人谈话中都是在这样说。这并不是预料不到的事。”

在费萨尔被暗害的消息传开时，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明显地喜出望外，他在办公室里“跳起了快步舞”……这至少是一些以色列报纸派驻华盛顿的记者向以色列发回的报道中说的故事。

我请哈拉德根据他的认识谈谈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去杀害费萨尔的动机。以下是他的回答：

“他们有两个主要动机——我们可以称之为长远的动机和近期的动机。按照我的看法，事实上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看法，最重要的是长久动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对费萨尔有极其充分的了解。他们知道，他有人品、能力、愿望、意志、决心，也有所必需的力量和影响，能在几年期间实现阿拉伯团结的唯一活着的阿拉伯领导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费萨尔告诉我，他想他还需要 10 年时间。我亲爱的，这就是实际情况。如果费萨尔仍在活着，我们阿拉伯人会在共同采取行动方面获得成功，换句话说，我们会有足够的团结来施展我们的集体经济和政治力量，迫使美国逼迫以色列为了和阿拉伯人及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撤回到 1967 年的边界。换种说法，如果费萨尔仍然活着，美国总统被迫去做尼克松被阻止做的事的这一天将会到来，费萨尔对他自己发过誓，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将继续战斗。所以在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看来，费萨尔必须在某一个时刻被消灭。

“近期动机我们可以说实际上是在两个方面。我的意思是，在他们行动时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决定去杀害他。一个是和最近的过去有关。另一个是和最近的将来有关。就和最近的过去有关的是，费萨尔是维护巴解组织存在并且帮助我们在拉巴特首脑会议和在联合国大会赢得两项伟大胜利的出力最多的人。因此，从这方面讲，费萨尔被谋杀是一个报复性的杀害。”

在费萨尔被暗杀后不到 3 个月，黎巴嫩内战爆发了。哈拉德·哈桑说：“费萨尔是我们的保护者，而且费萨尔在阿拉伯世界内有力量 and 影响来阻止基辛格把黎巴嫩变成他的私人的屠杀场所。我不是在说费萨尔能够阻止内战发生。我是在说，如果他仍活着，他会利用他的影响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起，在我们的帮助下，使局势在控制中……”

按照基辛格对黎巴嫩内战第一阶段的说法——这在他的书中顺便说了一句——发生的情况十分简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企图接管黎巴嫩，而叙利亚总统为阻止这一事态的发生明智地进行干预。当谈到巴解组织主席兼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政策时，基辛格的断言同事实南辕北辙。但是，在谈到某些巴解组织领导人考虑在与他们的穆斯林盟友联合下他们能干些什么的时候，基辛格的断言近乎事实，一些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包括法塔赫本身的左派分子，认为他们在和他们的穆斯林盟友联合下可以接管黎巴嫩。德鲁兹民兵首领卡迈勒·琼布拉特是改变黎巴嫩政治制度的穆斯林宗教战争——在政府中给予穆斯林以公平的发言权——的领导人。

哈立德·哈桑说：“黎巴嫩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萨达特和阿萨德之间为了地区的权力和影响而不断发展的对抗和斗争的一种延伸。当我在内战开始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的许多阿拉伯联盟里的同事们笑话我。但是，要知布丁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当沙特人帮助我劝说萨达特和阿萨德言归于好时，这场战斗在1967年底结束了。”

在内战开始时，萨达特支持基督教民兵。尽管他自称是忠诚的穆斯林，萨达特不希望看到穆斯林在黎巴嫩接管。他害怕这样的事会鼓励在埃及的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自然，原教旨主义者是萨达特的敌人，而且正是他们最后杀死了他。跟当时很多人的看法相反，阿萨德在黎巴嫩的兴趣也是为了防止穆斯林的接管——部分是因为他知道美国和以色列是绝不会允许的，部分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穆斯林一旦在黎巴嫩成为统治力量，他就无法为自己的目的控制穆斯林各个派别。阿萨德主要兴趣是在黎巴嫩维持现状。他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穆斯林不失去任何地盘。因此，实际上，萨达特和阿萨德并不处于相对立的地位，尽管这位埃及总统并不充分信任阿萨德会冒险对待这一现实存在。苏联人主要通过叙利亚人和法塔赫左翼分子进行干涉。

仅次于美国人的最危险的外国干涉者是以色列人。他们正在南部建立他们的黎巴嫩傀儡军队的过程中。这支傀儡军队由叛变的基督教军官萨阿德·哈达德少校指挥。以色列的主要兴趣，除了粉碎巴解组织外，就是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来阻止穆斯林接管，即使穆斯林是大多数。

黎巴嫩内战，官方说法始于4月。有一种普遍的但不是完全的一致看法：战斗是由一名基督教伏兵在贝鲁特向一辆满载巴勒斯坦人的公共汽车开枪引起的。但那不是这故事的开端。

哈尼·哈桑说：“这个真正的故事开始于我们在拉巴特和联合国的胜利之后基辛格进行他的首次反击行动时，基辛格的人要求苏莱曼·弗朗吉亚总统在黎巴嫩“做一项约旦所做的事”——换句话说，像侯赛因曾经做的那样，来压垮巴解组织。我必须告诉你。我有美国人和弗朗吉亚及其人员之间进行会谈的日期、时间、地点的全部记录。我也知道所谈的每一件事情。了解这些是我的职责。你也不应忘记，我得到弗朗吉亚的信任，因为他知道阿拉法特在黎巴嫩危机中正在起着调解人的作用，而我为阿拉法特正同所有各方进行谈判。

“的确，基辛格的人无论如何要求弗朗吉亚消灭巴解组织。开始弗朗吉亚说“不行”，而且他十分生气。他对美国人说：‘瞧，首先，我们黎巴嫩人是文明的，这不是我们的行为方式。其次，即使我想做你们要求我做的，我也做不到，我们的军队是弱小的，并被宗派路线所分裂。我没有力量。’

“美国人的回答是惊人的。基辛格的代表对弗朗吉亚说：‘你必须把文

明的问题抛在一边，这是不相干的。’如弗朗吉亚所知，这个美国人真的说，‘丢掉文明的这无用的东西！’然后这位美国人说：‘你说你不能做到。好，我们接受你在这方面有一点理由……但是，请记住，当我们要求侯赛因在约旦干这事的时候，侯赛因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帮助过他。我们也能帮助你。’美国人的主要意思是以色列将武装和支持基督教派。

“弗朗吉亚起先对美国人说‘不行。’但是他随后受到来自他自己的马龙派教徒社团里主张强硬路线者的强大压力——特别是皮埃尔·杰马那勒的长枪党的强大压力。因此，弗朗吉亚最后对美国人说‘行’，不是完全同意，但他同意合作，这样，在基督教民兵和以色列人之间开始了认真的合作，而内战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内战开始时，甚至在开始之前，阿拉法特、哈拉德、我自己和所有右翼分子——实际上你可以说是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主流——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使内战变成黎巴嫩—巴勒斯坦冲突。我们已从约旦得到了教训。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确切知道基辛格耍的什么花招。所以，事实真相是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要成为这场冲突的调停者。

“按照我的看法是，这是阿拉法特成为真正的政治家的时期。自然，他有他自己的巴勒斯坦原因，要尽可能快地扑灭在黎巴嫩的这场战火——稍后我们将谈到那些原因；但是，阿拉法特是阻止黎巴嫩被分裂和被摧毁而努力工作的真正的唯一的领导人。基辛格和以色列人没有对于摧毁黎巴嫩发出胡言，然而，如果那是为了压垮巴解组织。保持基督教派掌权必须付出的代价——好吧，对于他们那是好极了。实实在在基辛格和以色列人是真正的杀人者，真正的凶手。至于阿拉法特这位政治家，我认为他正在努力处理这场危机，采用费萨尔会采取的同样办法，如果他仍活着。”

在战斗开头的几个月期间，当阿拉法特在控制着他自己的事态时，巴勒斯坦主流派力量保持一个不太令人注目的形象，而且总的来说，尽一切可能避免站在穆斯林一方被直接卷入冲突。这至少可以说，阿拉法特坚持执行这样的一项政策是不容易的，因为穆斯林是巴解组织的天然盟友。而巴解组织内部的左派组织，包括法塔赫自己的左翼分子，已经和琼布拉特建立了一个爱国阵线联盟。后来，在9月，阿拉法特授命哈尼·哈桑去执行一项秘密的、戏剧性的和平计划。

哈尼继续说：“在弗朗吉亚总统的支持下，我乘直升飞机到基督教民兵的一个主要基地。这真是十分危险的，我以为有可能我一走下直升飞机，他们就会开枪打死我。不管怎么样，我们谈了又谈。我对他们说，我们不想支持哪一方，我们愿和基督教派作出一项安排。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里来进行谈判的原因，而且我出示了我称之为我的黎巴嫩人中—基督教派—巴勒斯坦的文件。我们终于达成了可以签字的一项协议的基础。到这时为止，一切顺利。接着我出示了我称之为我的黎巴嫩人—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的文件。我说，很明显，我们必须同穆斯林签订一个类似的不干涉的协议。起初，基督教派非常生气。他们说：‘解决黎巴嫩内部问题与你们有什么联系！’那时，我变得很生气，我说：‘瞧，在手头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巴勒斯坦人就在黎巴嫩这里，我们必须同双方达成一项和解。’结果他们同意让我继续进行调停努力。

“这样，我来到琼布拉特处，我说：‘你如果准备签订一项协议，巴解

组织以此保证自己不干预黎巴嫩内部事务，那么阿拉法特能促使这场战争很快结束。’我告诉他基督教派已准备同意。我说，如果我们都迅速行动，我们就可以防止这场冲突被国际化。

“琼布拉特拒绝了我。他说：“你傻了吗？你是一个叛徒吗？难道你不知道叙利亚人正在支持我们，而且他们将继续全面支持我们，直至我们改变黎巴嫩的制度，结束基督教派的统治！”

“我大笑。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卡迈勒……你错了。你还没有开始了解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叙利亚人永远不会支持推翻黎巴嫩的基督教政权。你不知道 1973 年黎巴嫩当局、以色列政府和叙利亚政权之间有一项秘密协议吗？你不知道在那个协议的条款下以色列人说，他们将允许叙利亚人进入黎巴嫩，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条件是叙利亚人不得进入基督教地区，而且不得威胁现状？你真的不知道叙利亚人和以色列有这个秘密协议吗？，琼布拉特很吃惊，但是他不相信我。因此，我对他说他不了解情况。我说叙利亚人会支持他——但是，只限于在黎巴嫩的政体中带来某些微小的改变，给穆斯林在贝鲁特政府中有较公正较大的发言权，但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发言权。他仍然不相信我。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事实上是两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在 1 月和 2 月，琼布拉特和我们自己曾经同叙利亚人讨论过关于在贝鲁特组织一个新政府的问题。这时琼布拉特才认识到，我告诉他的关于叙利亚人的情况是真实的。他来到我处并说：‘对不起，哈尼，你是对的。叙利亚人欺骗了我。他们是在耍花招，利用我们作为一种手段以保持他们在黎巴嫩的影响。请告诉阿拉法特，在黎巴嫩人——黎巴嫩人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让叙利亚人见鬼去吧：告诉阿拉法特，为促进和平他喜欢怎么干都行，我愿意支持他！’”

自然，阿拉法特十分高兴。现在他手里掌握了所有的牌以促使内战在国际化之前结束，但是和琼布拉特不同，阿拉法特十分聪明。阿拉法特没有说‘叙利亚人见鬼去吧！’阿拉法特第一个承认叙利亚人过去和现在与黎巴嫩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他要求的是一项叙利亚人可接受的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解。为什么阿拉法特在坚持同叙利亚人一起工作？他知道，如果巴勒斯坦人发觉他们自己处于同叙利亚人对抗的境地，基督教派和以色列人就会结成联盟，直到巴解组织在黎巴嫩被击败。真的，阿拉法特看到了 1982 年灾难的来临，他在 1976 年就尽一切可能试图阻止它。

“因此，阿拉法特去同叙利亚人谈话。实际上他对他们说：“瞧，由于我们调停的结果，我们可以促使这场内战的结束。但是，我理解并尊重你们在黎巴嫩的利益……我们现在能够合作来促成和平吗？”

不幸的是叙利亚人拒绝了阿拉法特。他们不愿意使巴解组织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在黎巴嫩的和平缔造者。他们知道，如果他真的促成了和平，他将加强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政治基础。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巴解组织对叙利亚人的依靠愈来愈少，而叙利亚人干预巴解组织内部事务的自由也愈来愈少。叙利亚人也开始喜欢他们从基辛格那儿听到的消息。他正在发出信号，暗示如果美国不必对付巴勒斯坦人，美国会发现帮助叙利亚人同以色列进行谈判要容易得多。这些信息还不是邀请叙利亚采取行动反对巴解组织。但是，它们正在为这一邀请铺平道路。

哈尼·哈桑继续说，“当时基辛格和他的人员非常忧虑——从他们的观

点来看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个以色列人和基督教派利益的联盟是粉碎巴解组织的武器，可是建立这一联盟远比他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且从基辛格的观点来看，更糟糕的事是阿拉法特正在调解黎巴嫩的内部危机。如果阿拉法特在实现和平方面成功了，那么以色列人和基督教派之间的一个强大的联盟的前景就可能被毁灭——因为基督教派不需要它了。因此，基辛格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使叙利亚人直接陷于反对巴解组织的冲突。他的头脑里有一个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他的最高目标或者希望是，叙利亚人能被说服去摧垮巴解组织。但是，如果不可能的话，他相信叙利亚的干预将会产生两个积极的结果。第一，由于掌握和控制了黎巴嫩的全面局势，叙利亚人将有效地排除阿拉法特取得政治上胜利的机会，这种胜利会使他巩固他在黎巴嫩的政治基础。第二，随着阿拉法特被叙利亚人有效地抵销，并且不能在基督教派和穆斯林之间劝和，基督教派和以色列人就可以在他们需要的全部时间里结成联盟，这一联盟将使他们得以在将来摧毁巴解组织……但是，首先，基辛格和他的人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使叙利亚人卷入反对巴解组织的冲突。”

“他们通过琼布拉特找到了他们的办法。基辛格的人接近他并获得了他的信任。然后他们对他讲了以下的话：‘你看，我们美国人对在黎巴嫩做些什么面临一个真正的困境。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此，首先我们是坦诚的，并告诉你我们的难题。你知道，我们美国人把黎巴嫩看作是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你知道，我们有义务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去。而且，你知道，过去这许多年我们牺牲穆斯林一直和基督派一起工作。因此，现在这就成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失去我们控制局势和赶走共产主义分子的能力，因为基督教派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因此，我们决定采取一种我们不喜欢但我们必须接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准备同你和你的穆斯林社会主义者伙伴一起干——假如你能使我们相信你不是共产主义者。’

“琼布拉特为这种美国人的表面诚实而十分感动。他说他准备和他们一起干。美国人于是告诉他两件事：第一，他们已准备好支持他的改变黎巴嫩政府的体制的斗争——给予穆斯林拥有与他们的人数相一致的占统治地位的发言权；第二，美国人将利用他们对大马士革的重大影响来阻止叙利亚人破坏琼布拉特的斗争。

“自然，美国人是在说谎。这仅仅是一个诡计，一种欺骗。但是，琼布拉特相信他们！更坏的是，巴解组织的所有左翼分子，包括我们法塔赫的左翼分子，我们所谓的左翼分子，相信琼布拉特和美国人的协议是一项严肃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人，还有为美国人帮忙的琼布拉特，确实令人信服，甚至即使当地的共产党人也信以为真！

“那么，琼布拉特随后干什么呢？他相信美国人是真正地同他在一起，于是承诺他将重新展开反对基督教派的斗争，如果叙利亚人企图干预，就跟叙利亚人战斗。我们的全部左翼分子加入了他的行列以实现这一承诺。

“美国人真正在做什么？我愿意告诉你。最初他们曾经要求阿萨德为他们做一件事——在黎巴嫩采取行动反对我们，但是阿萨德没有给予美国人他们所需要的回答。他告诉他们，在理论上和原则上，他最喜欢的是掌握巴解组织这张牌，就像自己的牌一样玩弄它，并以此来满足美国人，作为在同以色列谈判中对他们的帮助的回报。但是，阿萨德有点害怕。按照他自己的宣传，他是巴勒斯坦事业的战士，他不想早日暴露他自己是一个伪君子。他也

不喜欢在黎巴嫩陷于困境的想法。因此，他起初和弗朗吉亚在开始时一样，不急于做美国人希望做的事。于是，美国人决定给他一点刺激。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假装愿意同琼布拉特合作的原因。这是我们真正可以称之为德鲁兹因素在起作用。美国人知道，德鲁兹和阿萨德的少数阿拉维部族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感情不利。因此美国人采用假装和琼布拉特及德鲁兹一起工作的作法，向阿萨德发出一个信息。他们说：‘如果你不愿意干这工作，我们将支持德鲁兹，而你会面对一个完全和你敌对的黎巴嫩，最终完蛋。’这是一个政治讹诈的典型之作。阿萨德说：‘好，我愿做你希望做的事。’

“阿拉法特和我试图使琼布拉特和我们的左派同事们认识到，他们正走进基辛格的圈套。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我本人对琼布拉特说：‘瞧，美国人的刀上正沾满我们的鲜血！美国人正在制造这场战争，叫我们完蛋。你怎么能相信美国人正在对你说的话！’”

阿拉法特对琼布拉特也很强硬。他对琼布拉特说了些什么呢？这是主席先生在这些时候乐于在录音机前回答的唯一的问題。他说：“我告诉琼布拉特，他也许是黎巴嫩内部问题的专家，但是，他对阿拉伯和超级大国反对我的人民的密谋则一无所知。我说：‘我对国际上反对我们的密谋是专家，你应该听我的。’”

当叙利亚明显要插手黎巴嫩时，阿拉法特作出最后一次拼死的努力，以阻止各派基督教民兵同琼布拉特的由激进的穆斯林和巴解组织左翼分子组成的爱国阵线联盟之间的战斗。他希望一项停火协议也许仍能足以使叙利亚人境外止步。他带着一个七点停火协议先去大马士革征求阿萨德的同意。哈尼说：“阿萨德对阿拉法特说：‘行，我给你 48 小时时间去安排停火。在那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概不负责。’”阿拉法特后来对哈尼说：“当我在离开总统办公室的时候，我很奇怪，阿萨德为什么毫无争论地就完全同意了。我很怀疑。”

回到贝鲁特，阿拉法特召集了所有能够来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和琼布拉特，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哈尼说：“当阿拉法特开始谈到停火时，琼布拉特起身要离开会议室。他说，他不需要停火，他要去和他的美国朋友会谈，要他们来停止叙利亚人的任何行动。阿拉法特大声对他说：‘站住，坐下！你不能离开。我们必须在你和基督教民兵之间达成一个停火协议，而且你必须现在就表示你同意。’事实上这次会议同意了一项停火，但这只是一场游戏。我们的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左派分子无意尊重它。他们在叙利亚人进来时，投入战斗。他们正好走进基辛格为我们设置的陷阱，而阿拉法特为改变局势已无能为力。他只是一位名义上的领袖。这正是巴解组织如何被卷入同叙利亚人对抗的真实经历。”

由于叙利亚军队准备在 1976 年 3 月 31 日行动，阿拉法特决定离开黎巴嫩。他的意图是去游说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他要求他们向阿萨德施加压力。阿拉法特现在能够希望的是最好能出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干预，来限制这场他知道因叙利亚军事干涉而使巴勒斯坦人将要承受的灾难。哈尼说：“阿拉法特离开之前，下了最后一道命令。他划了一道巴解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逾越的红线，这道红线的作用是禁止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进入基督教派地区。他还要让基督教徒们相信，巴解组织的武装力量对他们不构成危险。琼布拉特对阿拉法特的决定大发雷霆，但是，阿拉法特是正确的和十分英明的。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是在真正保护黎巴嫩的南部，在那儿我们有 11

个难民营，现在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因为我们的部队正在重新组合以反对叙利亚的干涉。阿拉法特知道，一旦巴解组织的部队越过他所划的红线，以色列人就会从南部入侵。所以，他正在努力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和南部的土地。他是要剥夺以色列人入侵的借口。但是，他甚至想得更远，他知道我们不能阻止叙利亚人，而当战争结束时叙利亚人大概马上就会在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地区解除我们的武装……所以，如果在我们和叙利亚人战斗期间，我们向以色列人丢失了在南部的土地，那么，即使作为一个有能力保卫我们自己的运动，我们将会被彻底断送。按照我的看法，正是阿拉法特这一英明决定，使我们得以在黎巴嫩生存下去，直到 1982 年。”

当阿拉法特离开黎巴嫩时，叙利亚和巴解组织之间的战斗尚未开始，大马士革机场对他仍然开放。从那儿他飞往开罗，开始他的陷于绝望的一次旅行。也许除了 1948 年的日子之外，这次他离开黎巴嫩后的几天及随后的几个星期，是他生平迄今最痛苦的时候。1948 年那次是他在阻止犹太人接管巴勒斯坦的战斗中被埃及人解除了武装。在这次旅行中，阿拉伯领导人口头允诺很多，但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给人的启示是明白的。他们都为叙利亚人降低巴解组织的重要性而暗自高兴。在阿萨德完成这项任务前，阿拉伯领导人什么行动也不会采取。当叙利亚人在黎巴嫩开始强加他们的意志时，阿拉伯官方对黎巴嫩发生的事情的评论中，用的主要的一个字就是“泰赫吉姆”。它的意思是“降低其重要性”。由于费萨尔逝世，阿拉伯抵抗的精神也随之消逝。所有有关的那些阿拉伯领导人为求和平不惜任何代价。基辛格常常在对他们说，只要没有巴解组织，他就能更成功地代表他们。

我请阿拉法特告诉我，在那八个来星期中他的真实感情，在这期间，他离开了黎巴嫩，并且在重新发现，当危机来临时巴勒斯坦人是孤立无援的，他要说的话很多，但他不准备多说。“我知道我心中的感受，但是，对我来说，告诉你是不明智的。”他说。然后，好像他是在出声地自言自语而不是对我说，他平静地说：“这是他们这帮人的最大的阴谋。”我问他，如果费萨尔仍然活着，他是否认为情况会不一样。“哦，是的，”他回答，“对此毫无疑问。要是费萨尔仍然活着，我们在 1976 年初就能结束在黎巴嫩的这场内战。基辛格和其他的人就不能耍弄他们的花招了。”

我问哈尼，他是否认为叙利亚人的干涉实际上是彻底消灭巴解组织的一项大阴谋的一个部分，它会给基辛格以最大可能的刺激，以劝说以色列为了和平撤回到 1967 年的边界，而这个和平是阿拉伯国家拼命想要取得的。他说：“非常坦率地讲，我是真的相信这一点的。我愿意告诉你为什么，这的确十分简单。我们知道，那是美国人推动叙利亚人去干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难道不是吗，苏联人是在大马士革。我认为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希望我们被消灭。我不相信阿拉伯国家要消灭我们，但是我想他们希望我们也许被……你懂得我想说什么吗？”

阿拉法特返回黎巴嫩的经历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他不能飞往大马士革，因为叙利亚正在同巴解组织作战，以色列的海军舰只又在黎巴嫩沿海水域巡弋，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事实上被困阻在外面。这就是为什么他有 6 至 8 个星期未能返回的原因。他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真的回去了，是一份宣布阿布·伊亚德为巴解组织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报道促成的。

这是政变吗？阿布·达乌德说：“这不是罢免阿拉法特的企图。这是对黎巴嫩的现场局势作出的一个对应措施。当你们正在为生存而战斗时，你们

的领袖必须和你们在一起。”

阿拉法特作了极好的化装，登上一艘埃及载谷物的船，回到黎巴嫩。萨达特本人为阿拉法特的安全亲自负责。关于旅途发生的情况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有一种报道说，这艘载运谷物的船遭到以色列海军巡逻舰的阻截和搜查。根据这个说法，以色列人已经把阿拉法特弄到手而不知情。阿布·伊亚德的说法是，这艘谷物船受到了以色列人的阻截和挑战，但是船长非常精明，他使他们相信他的船完全是无害的——只有谷物，没有枪。据阿拉法特本人说，被以色列人阻截和搜查的是一艘诱船，而不是他乘坐的船。哈拉德·哈桑说：“我不知道真正发生的情况……但是，当时我听说，当以色列人拦截和搜查这只诱船时，我们有32人被捕。”

我请阿拉法特告诉我，如果他一旦遇到被以色列人活捉的真正的危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这个时候要我来谈论这样一种事情是十分困难的。”他的意思是，“我宁愿不告诉你。”过了一会儿。他以非常实际的态度说道：“我永远不会被活捉的。如果遇到你所说的情况，我的贴身警卫中就会有一个人开枪打死我。”

“所以你真的有一个人的末日计划？”我问。

他点点头。

阿布·伊亚德告诉我，巴解组织的多数领导人对他们的贴身警卫都有同样的安排。他说：“我们有暗号，许多不同的暗号，但意思都一样。你明白，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高级领导人中有一人被活捉，对群众士气就会有影响——特别是阿拉法特。告诉你实情，我们以往从不过多考虑此事……但是，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一旦活捉阿拉法特，他们将把他放进一个网笼里，悬吊在直升飞机上，让他从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头上飞过，这时，我们开始认真考虑此事。”

当阿拉法特回到黎巴嫩时，他的麻烦远未过去。巴解组织中坚持同叙利亚人对抗的那些人，还在继续对抗，死拼到底，即使叙利亚军队在地面有强大的兵力，对局势已在完全控制之中。阿拉法特希望停止战斗，但他不被置理。哈尼·哈桑说：“阿拉法特只身回来，没有权力。即使他的贴身警卫也未能跟在他身边。”如果哈尼和他的哥哥哈拉德没有实现一些外交上的奇迹，阿拉法特或许要失去其领导地位，并且紧接着的是，巴解组织只能化为乌有，除非成为叙利亚的傀儡。

哈尼同阿萨德开始对话，为此，他被法塔赫的左派分子和所有那些为反对叙利亚人而继续斗争的人，指责为“叛徒”和“娼妓”。但是，哈尼和阿萨德的谈话没有产生一项解决的办法。这位叙利亚总统愿意同巴解组织达成一项和解，但是，他只同阿拉法特打交道，并且要在没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介入的条件下。阿萨德希望阿拉法特成为他的傀儡。没有这，就没有交易。这笔买卖始终没有成交，最后是沙特的调解挽救了阿拉法特并使巴解组织能够保有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阿拉法特对此得感谢哈桑兄弟两人。

10月在利雅德举行的小型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作出决定，然后在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参加的开罗会议上得到确认，把叙利亚军队转为一支阿拉伯威慑部队。实际上这一决定的意思是，叙利亚人的占领要继续下去，占领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控制巴勒斯坦军队。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由于叙利亚军队的干涉，黎巴嫩的秩序得以重建；但是，不应忘记，如果阿拉法特调解结束内战的努力能在琼布拉特准备接受阿拉法特的忠告时被允许获得成功，那么早在叙利

亚干涉之前几个月秩序就得以重建。很明显，叙利亚人的干涉在其开始之时起，就具有比重建秩序要多得多的目的。巴解组织再次生存下来。但是，即使当阿拉法特正在收拾局势时，他知道巴解组织的最大的生存考验，还要来临。完全可以预期，在阿萨德、基辛格和其他人已经失败的地方，以色列人必将努力求得成功。

在 1976 年期间，莫萨德下了最大决心企图杀死阿拉法特。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在吃了事先做成的看上去像米粒那样的细小的毒丸后本来就要死去的。把毒药放进阿拉法特食物中的这名巴勒斯坦的叛徒-特务，是以阿布·萨依德的化名出现的。他在阿拉法特的办公室曾经工作了 4 年。在这 4 年过程中，他显然向莫萨德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阿布·伊亚德说：“阿布·萨依德得到了很好的装备。莫萨德给了他一个很小的但功率很强的收音机，看上去像一把头发刷子。在我们发现后，他表演给我们看，他用它就可以发送和接收信息。”

我问阿布·伊亚德，他们是怎样抓住阿布·萨依德的。他说：“我们没有抓他。他自首了。在他为莫萨德工作了 4 年后，他最后得到的命令是执行“杀死阿拉法特”这一重大的行动计划。但是，当这一时刻到来时，他没能执行。首先，他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去做这件事。”

第十八章在黎巴嫩的摊牌

当吉米·卡特进入白宫时，他说，1977年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是“我回忆所及争取和平的最充满光明希望的一年”。

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一方，卡特和他的最可敬佩的国务卿赛路斯·万斯十分了解有岩石般坚固的证据来证实这种乐观。从1973年，其实是自从1967年以来，有关的阿拉伯国家不仅愿意同以色列言和，而且拼命争取和平。为争取和犹太国的全面、正式和最后和平，阿拉伯方面的要价也是人所共知的：以色列人从1967年战争所侵占的土地撤出和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某种具体东西——当以色列人从西岸和加沙撤出后，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型国家。阿拉伯人还愿意作一些较小的和共有的边界的调整，以适合以色列。

正如我们看到的，阿拉法特正在向他自己的人民宣传和解思想。1977年8月，戏剧性地证实，他正在取得稳固的进展，巴勒斯坦人准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3月会议上，原则通过了小型国家的方案。对阿拉法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和他个人的巨大胜利。从那一时刻起，如果以色列能使他得以进行谈判的尝试，这位主席能够提出包含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接受的小型国家方式之内的妥协方案。如有需要以武力控制他的少数左派分子时，阿拉法特能够而且会那样做。

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结束后不久，阿拉法特向卡特总统送交了一份大约25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我读过。它阐明了巴解组织和解主张的现实性质，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和约旦建成邦联的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不会也不能构成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阿拉法特的文件是经由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现在的国王）法赫德面交给卡特的。卡特像他的前任尼克松一样，被充分地告知关于阿拉法特主张的现实性和他在和解方面能够提出的方案。

当卡特对和平的前景正在表示他的乐观主义态度时，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等待回答：当考验到来时，他能否有胆量勇敢地面对以色列和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这个问题将在10月的最初几天作出回答。

10月1日，美国—苏联联合声明发表，这项声明实际上是一个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概要计划。它包含了谋求和平的所有必需的组成部分。声明的表述方式对任何真正有志于和平的理智的阿拉伯人或犹太人都不应在他们心中激起愤怒或惊恐。

巴解组织没有被提到，这是为了使以色列人较为容易地接受这项声明作为讨论的文件。声明里没有涉及242号决议，这是为了使巴解组织较为容易地作出它的赞同的决定。

美国—苏联联合声明实质上是要求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言和并在会谈结束时正式承认以色列，以换取以色列从1967年冲突中占领的土地撤出。除此之外，两个超级大国联合保证这一地区所有边界的安全。实际上，除了真正的和平之外，以色列得到了超级大国对它的存在的保证。以色列人则被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当然，明显的含义是，在谈判进程的某个阶段，以色列人必须同意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

计划是，“卷入这场冲突的所有各方代表，包括巴勒斯坦的代表”，将在日内瓦会晤，在美国—苏联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原则基础上，讨论他们解决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途径。

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欢迎并接受美国—苏联联合声明作为导致与以色列言和的谈判的基础。由于所接受的这项声明包含有在谈判进程结束时承认以色列的意思，巴解组织的少数领导人感到不悦，因为声明没有提到巴解组织的名字，而且没有对建立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作出特别的承诺。但是，阿拉法特在劝说他的同事们接受声明作为同以色列谈判的基础是没有问题的。

我问阿拉法特是否他真的相信美国人和苏联人在他们之间敞开了和平的大门。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承诺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做一些事情。真的，我相信这将是为我的人民带来某种公正的和平。我比在我生平的任何时刻都乐观。”

以色列人拒绝美苏声明。梅纳赫姆·贝京派他的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去华盛顿，威吓和讹诈卡特总统撕毁美苏联合声明而代之以美国—以色列联合声明，达扬随即开始向卡特和万斯口授声明的条款。实际上美以声明是为以色列参加任何日内瓦会议而提出的以色列条件的清单。按照这项声明的条款，巴勒斯坦问题后退为“难民问题”；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决的合法权利；242号决议回到议程上去——这意味着巴解组织不会接受它；巴勒斯坦实体问题从议程上取消；以色列将讨论西岸问题而不是就西岸问题进行谈判。达扬还扬言，如果巴勒斯坦国的问题被提出，以色列将退出日内瓦会议。

在美苏联合声明发表前后的一些日子里，对如何代表巴解组织出席日内瓦会谈有许多争论。声明发表后的一个时候，阿拉法特为竭力促成，后退很远，他甚至说巴勒斯坦人不必非要由巴解组织官员代表。但是，这个争论和寻求一种方案是不相干的。以色列不准备从西岸撤出或者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以色列不准备给巴勒斯坦人任何东西，除了在真正被迫时允许它在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岸有有限的地方权力机构。

哈拉德·哈桑说：“真正悲哀的是，卡特屈服于达扬的讹诈和威胁；正是卡特的投降，扼杀了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实现一项全面和平的真正希望。”

也许有一天，历史学家将能告诉我们卡特为什么向达扬投降。这位总统顶住以色列可得到许多好处。如果卡特在苏联帮助下要求以色列明智一点，那么无疑在美苏联合声明基础上进行的谈判将导致一项全面的和平。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卡特将可保证自己第二次入主白宫；他也许将作为所有总统中最伟大的总统被载入美国史册。

在他向达扬和以色列屈服后不久，卡特写了一封伤感的信给萨达特，敦促他不要过高估计美国总统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能力。这似乎是卡特为他未能勇敢地面对以色列而表示道歉。

为萨达特单方面同以色列媾和计划的舞台就是这样搭起来了。直到此时，阿拉法特同萨达特的关系在政治和个人交往两方面都是好的。根据大家所说，阿布·阿玛尔至少是萨达特孩子中一个孩子的心爱的叔叔。但是当萨达特发出了他自己的戏剧性的和平倡议时，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变坏了。然而，他们个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并不是由于萨达特单独寻求媾和的态度所致。这方面的原因以及阿拉法特遇到的一些严重政治麻烦，是萨达特在准备发起

他的和平倡议时，对这位巴解组织主席所采取的骇人听闻的做法。

当时，阿拉法特正在充当埃及和利比亚之间争端及处于酝酿状态的危机的调停人。11月9日，阿拉法特从萨达特处收到一份他称之为“紧急通知”的东西。它传唤阿拉法特去出席埃及议会以听取这位埃及总统要作出的重要声明。萨达特的演说是号召竭尽全力争取日内瓦会谈开始。这时，当阿拉法特静坐聆听并点头表示他的赞许时，这位埃及总统扔出了他的炸弹：“我决心取得和平，以至我准备去以色列。”

萨达特刚坐下，阿拉法特从会议厅猛冲而出。他是在向他的汽车快速跑去，被穆巴拉克副总统（现任总统）迅速抓住。阿拉法特摆脱了他，喊道：“难道你不知道萨达特是怎么折腾我的！”由于穆巴拉克坚持，阿拉法特像他通常一样妥协了。副总统的家就在去机场的路上。阿拉法特能不同意中途在他家停留30分钟或大约这点时间吗？阿拉法特同意了。他停留了整30分钟。然后他仍然处于极度的愤怒中，踏上了去大马士革的旅程去召开一次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阿拉法特发怒的原因，不在于萨达特说了些什么，而在于这位埃及总统给人一种印象：巴解组织主席正在支持他的即将到来的对以色列的访问。阿拉法特知道，当他到达大马士革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一半同事，也许更多，将会指责他卷入萨达特的一项和平阴谋中。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哈拉德·哈桑说：“我为阿拉法特十分难受。他们使他受不了。实际上，在一个时期内，这件事给他造成了若干麻烦的内部问题。”

阿拉法特本人说：“毫无疑问，萨达特欺骗了我并且在利用我。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十分肯定，他这样做是在给我制造麻烦，而且是在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当中制造分歧和分裂。对我来说，首先这证明萨达特对我们巴勒斯坦人和我们阿拉伯人是不忠实的。从那以后，我确信他只是在耍弄花招以掩盖他真正在为单独媾和而工作。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他想成为忠实可靠的，他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做同样的事情，是的，甚至去访问耶路撒冷我说：“另一种什么方式？”

阿拉法特回答说：“依我看，他应该召集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同他们一起讨论整个战略。这应当是协商从事，应当是一项联合的或集体的倡议。如果萨达特这样行事，整个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就是我处在他的地位要采取的做法。”

我带着某些惊奇问阿拉法特：“你是在对我说，如果萨达特要求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授权他去访问以色列，他将会得到这样的委任吗？”

阿拉法特回答：“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但是，是为了进行试探的目的。而且主要在于萨达特如何向阿拉伯国家首脑和我陈述他的想法。如果我是他，我会对我的阿拉伯同事这样说：‘给我机会。我愿去，并且我愿牺牲我自己。如果我成功了，这个成功是归于我们大家。如果我失败了，这个失败只是属于我个人。’如果萨达特这样做，他将成为一位英雄——不管胜利或者失利。这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出现不同的结果。”

我问阿拉法特，如果萨达特得到阿拉伯领导人同意，他认为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目的该是什么。他答道：“很清楚，目的就是要求以色列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巴勒斯坦人讨论各种问题。讨论将在美苏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行。以色列政府很可能仍然要说‘不’。但是，如果它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后还说‘不’，全世界会确切地知道以色列是和平的

唯一障碍。你想，如果萨达特是忠实可靠的，如果他真是愿意在为一项协调的战略而努力，那么行与不行我们阿拉伯人都不会是失败者。”

我问阿拉法特，他认为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而没有要求阿拉伯国家的委托，是因为他认为他不会得到它，还是因为他本人已经秘密承诺要同以色列进行单独媾和。

阿拉法特说：“肯定是后者。对此毫无疑问。你不应忘记，正是按照达扬的意见，萨达特在他的向以色列议会的演说中删去了所有涉及巴勒斯坦的内容。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论证，但它是一个论证。”

当萨达特从他的历史性的对耶路撒冷访问回来时，他邀请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出席他所为的日内瓦首脑会议的开罗预备会议。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拒绝参加。只有以色列人到场了。有许多中东问题专家说，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应当参加，如果导致以色列人退席——这样就好再次显示以色列是和平的障碍。我向阿拉法特提出了这一观点。

他说：“出于我在前面跟你说过的理由，这已经是为时太晚了。时机已经过去。当萨达特没有像我建议的那样同阿拉伯领导人协调他的战略时，我们知道他是在耍花招。另外有一个小论证。当以色列人出席开罗会议时，他们看到会议桌上有一面小的巴勒斯坦旗帜和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旗帜在一起。以色列人说，如果巴勒斯坦旗帜不从他们的眼前拿开，他们将离开。埃及人说，‘行，把旗帜拿走，你们留下。’萨达特在其被问及如何解决这个危机时，应当说这样的话：‘瞧，这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我们能够决定那些小旗应该放在这里。你们的权利只是坚持要有你们自己的旗帜。如果这面小小的巴勒斯坦旗帜扰乱你们——那么请便！’”

阿拉法特笑笑：“我愿告诉你另外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我们正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日子里，许多西方领导人和其他人士经常对法赫德王储、现在的法赫德国王陛下说：‘是的，但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问题怎么样？’法赫德总是说：‘我的问题不是阿拉法特和他的问题。我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我的问题是我不能阻止萨达特对美国人和以色列人说‘是’。’”

萨达特在 1979 年 8 月签署了他和以色列的单独媾和。在 1981 年 10 月 6 日他被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刺杀。我问阿拉法特，当萨达特遇刺身亡时，他是否对他怀有同情。他说：“作为一位老朋友，我同情他。我是一个人。他是我的老朋友。抛开这项政策，抛开这项反对我的人民的阴谋，他是我的朋友。”

有些人认为萨达特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当贝京宣称他不愿意遵守戴维营协议中有关西岸巴勒斯坦人自治的条款时，卡特没有向以色列人施加压力来支持萨达特，我问阿拉法特，他是否赞同这个观点。他说：“不，一点也不。如果萨达特认真关心巴勒斯坦人即使仅限于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一些实质性东西和价值的话，他就应该在签署单独媾和协议以前退出戴维营谈判进程。他可以说：“你们瞧，我的人民，你们瞧，我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朋友们，我已经作了努力……但是，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无意于真正的和平。’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将成为一位英雄。而且，那时也许美国人会被迫去对付以色列人。”

在理论上，萨达特和以色列在 1978 年 9 月戴维营协议基础上签订的协定，提供了超出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单独媾和所能提供的东西。在协定上有关

于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享有有限自治的规定。遗憾的是，戴维营协议可以任意解释；而以色列人的解释是，不给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任何可以含糊其辞地叫作自治机构的东西。以色列人甚至连水和土地资源都要控制在他们手中。

正是阿拉法特、他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为萨达特和以色列的单位媾和付出了全部的惊人的代价。在单独媾和协定签订后，埃及正式中立化，一个月内，以色列开始了对黎巴嫩持续五个月的猛烈空袭。大约 5 万巴勒斯坦难民由于他们的难民营被炸毁并遭到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的扫射，有时受到远程炮弹的连续猛击，从而逃往北方；17.5 万黎巴嫩人逃离南部，成为他们自己土地上的难民；几千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遭受杀害。在贝鲁特，西方外交家公开承认，他们为以色列进攻的规模 and 他们的政府明显的置之不理感到震惊和厌恶。

阿拉法特说：“你们应真正认识到所发生的事……这是以色列的以军事手段对巴勒斯坦问题作最后解决的开始。1982 年夏天沙龙远道来到贝鲁特消灭我们，当时发生的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在萨达特签订他的单独媾和协定之后的一个月。当以色列人在 1979 年 4 月开始发动他们的最后进攻时，他们的战略是什么？他们对我们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进行任意的、致命的攻击的目的是什么？我愿告诉你。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引起恐怖和大肆屠杀，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恐怖和屠杀使黎巴嫩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转而反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人扔下的每一枚炸弹、发射的每一阵炮火，都在对黎巴嫩人说：‘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在你们中间，我们就不会对你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毁坏你们美丽的国家……其实你们不应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责备我们……你们应该责备巴勒斯坦人。’用这样一种办法，贝京、沙龙和其他阴人正在为他们的侵略准备条件，这是犹太人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

接着是一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阿拉法特又说话了。

他说：“阿兰，你知道，把以色列人或某些以色列人同纳粹分子相比，这实在不是我的习惯。我不认为这样说会有利于实现什么目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发自内心深处的一些事。当我想到以色列为消灭我们装备极差和手无寸铁的处于难民状态的人民、一个正义在其一方的民族时所使用的策略、战略和火力，我认为这样说是公正的，以色列人，某些以色列人，和纳粹一样行事的以色列人，其灵魂深处就是纳粹分子，为了便于论证，让我们假设你是希特勒。你下命令用在煤气室里杀死的办法消灭犹太人这一个民族。现在让我们假设我是贝京和沙龙。我下命令用轰炸和扫射难民营并以群体投掷集束和杀伤炸弹的办法，去消灭巴勒斯坦人这一个民族。这哪里是因为我用更常规的手段、更能接受的手段去消灭一个民族，我与你不同？就比你不好？这个罪行是什么……它是消灭一个民族，或者是用以消灭一个民族的那种手段？难道我们能说用某些手段消灭一个民族是可以的，而用另外一些手段消灭一个民族则是不可以的吗？我希望很多以色列人将会读到你的书。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对我提出的问题思考他们自己的答案。

“于是我们接着谈论着 1979 年 4 月以色列最后进攻的开始。为什么它使以色列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3 年——才一路来到贝鲁特？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由。首先，美国人正不时地打这个淘气的犹太小男孩的手心，并且说，‘啧啧，你做得太露骨了。你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对巴勒斯坦人在干什

么吗？你必须不时地缓和一下。如果你不这样做，这个世界会对我们发疯，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对你们施加一些压力。现在我不希望这样，是吗？’第二个理由是以色列人本不想要花三年时间……但是，正如你知道的，有过一段停火，而且我们使这段停火持续了将近一年。沙龙和他的将军们非常恼火，因为亚西尔·阿拉法特证明他是遵守停火协议的……所以这也是使他们推迟的原因。”

即使在 1979 年夏天以色列人轰炸和猛烈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人时，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其他领导人及高级官员还在继续从事重要的勇敢的和平倡议。这些倡议中最有重要意义的一个——赢得卡特总统本人支持的一个——是偶然地在华盛顿提出的。

在 6 月的一个星期六，一位美国官员吉姆·莱纳德在某一位阿拉伯国家驻华盛顿大使家里午餐。莱纳德有一项世界上最难对付的、最不可能办到的任务。他正在试图推动在戴维营协议中提供的所谓的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因为以色列人不同巴解组织谈判，美国人和萨达特正希望并祈求他们能找到一些西岸的和非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他们的谈判对手。但是，莱纳德刚从西岸回来，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告诉这位阿拉伯大使，美国人必须寻找一种同巴解组织谈判的方式。

就在那天早些时候，这位阿拉伯大使邀请哈桑·拉赫曼喝茶。他是巴解组织驻华盛顿代表。他被告知莱纳德所言，并被要求提出一个能使美国人同巴解组织谈判的方案。拉赫曼说：“如果美国人是严肃的，这很容易。我愿去做。”

拉赫曼在贝鲁特获得阿拉法特批准的方案是，如果 242 号决议能被延伸包含四五个含糊的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巴解组织准备接受 242 号决议并因而承认以色列。巴解组织的这项提议以其最后定稿交给了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安理会当月主席艾弗·理查德。理查德告诉我：“依我看，它是 1948 年以来潜在的最大的突破。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过分。”理查德随即把这份文件交给了他的相对应的美国人安迪·扬，以便传送给他的高层领导。

当卡特见到这一提议时，他对它的看法和理查德一样。各个有关方面秘密地进行了磋商。以色列拒绝这一方案。同样地，萨达特、侯赛因和阿萨德也拒绝了。

拉赫曼告诉我：“以色列人拒绝它有明显的理由，萨达特拒绝它，因为他不想分享他和美国独有的关系。而侯赛因和阿萨德拒绝它，则因为当时他们两人中谁都不能容忍在巴解组织和美国人之间发生直接关系的主张。当然，阿萨德至今仍然不能容忍。”

卡特没有放弃，他派了一位特使去中东，试探以色列人制订包含巴解组织方案的一项联合国新决议的可能性。以色列人拒绝这个思想。贝京拒绝在任何条件下同巴解组织打交道。他下定决心在美国政府中也不应当有人这样做。

除贝京和他的部长们决定卡特为竟然胆敢去和巴解组织会谈需要受到惩罚之外，事情真的是那样……拉赫曼对我说：“我肯定你知道，以色列为每个美国总统划了一道红线——他不得跨越雷池一步的一道红线。卡特跨越了它。他必须受到惩罚。”

以色列人对卡特的惩罚是要求他解除安迪·扬的职务。当然，以色列政

府不是这样提出要求，那不是这个体制的工作方式。发生的事情是像通常一样，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得到指示去挑起一次可怕的骚乱。扬的罪行是，他于6月26日在科威特驻联合国大使比沙拉·阿卜杜拉的家中同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查希迪·泰尔齐会见了15分钟。但是，以色列人从他们得到的扬对这次会见的报告副本中知道，扬没有卷入任何秘密策划中。他同泰尔齐和比沙拉会见是讨论联合国一项辩论的延期，为卡特赢得时间，当时他正试图使以色列对制订一项联合国新决议产生兴趣。

为什么贝京和他的部长们特意要扬的脑袋？拉赫曼说：“他们知道他在内阁里是卡特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扬的辞职会大大伤害总统，确实这样。”当卡特读到扬的辞职书时，他哭了。

在卡特为巴解组织这一特殊的倡议而进行的一些努力遭到失败之后，国际社会一些十分关心中东事件的人，要求我去从事一项我自己的和平倡议。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的任务是，在阿拉法特和某些以色列领导人之间建立一个秘密的交往渠道，以我自己作为联络人。在当时以色列政府中并非所有部长都是像贝京和沙龙一样的狂热分子。反对派工党的多数领导人，虽然不是全部属于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准备私下承认有一个巴勒斯坦问题需要用政治手段进行解决。我不能随意指出任何一位参与这一倡议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名字，所以不能谈论有关它的具体情节。可是有一个重要事实我愿意披露。当要摊牌时，阿拉法特准备同一位以色列领导人秘密会见并进行讨论——就巴解组织主席来说，可以是两个人中的一个——而这次是以色列人不能派出。他们愿意会见阿拉法特，但是，他们害怕一旦秘密泄露，他们的生涯就完结了。

到1979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他的这一方为同以色列取得一项妥协解决办法准备基础，尽了最大可能。他说服他的人民。在犹太国仍保有他们祖国土地70%的情况下与之媾和。1979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授权阿拉法特这样做之后，他能有自由在此基础上公开地进行谈判。阿拉法特对他自己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信誉，依靠而且自1974年以来就一直依靠他通过政治手段提供某些具体东西的能力，证明和解可以取得成果。

在这方面，阿拉法特信誉的高峰是在1979年。从1979年底以来，由于没有出现和解取得成果的迹象，一些巴勒斯坦人开始对阿拉法特的政治途径是唯一出路的想法失去了信心，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1980年5月，法塔赫代表大会产主了第一个叫喊“消灭”以色列的决议草案。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决议。但是，这是一个由一些法塔赫领导人，特别是左派分子，向阿拉法特发出的警告，表示政治活动与和解主张使他们一事无成，他们感到失意。阿拉法特看到了背叛的种子。最好的证据是，他任命阿布·杰哈德为他的正式副手。直到这一时刻，阿布·伊亚德一直被广泛地看作是非正式的第二号人物。

在1981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正是阿布·伊亚德发出了怀疑的言论，解放运动的许多普通成员都在开始产生这种怀疑。他说，显然，政治活动和和解还不够。很清楚，他想把恐怖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阿布·伊亚德在1984年对我说：“我认为我们在1981年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我们应当把你们说的恐怖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重新引起世界的注意。”

这是否是一种迹象，表明阿布·伊亚德和那些在1981年赞同他的观点的人正在开始怀疑阿拉法特态度的明智和在小型国家方案基础上同以色列和解

的必需吗？阿布·伊亚德说：“不，一点也不。在1981年，直至今今天，我仍然赞同小型国家方案和所有和解及勇敢面对它所代表的现实的主张。我只是不认为单靠政治活动可以实现。”

在1981年7月16日，在受挫折的以色列大选运动之后，贝京第一次得到机会同其他团体和派别组成新一届政府。（他自己的利库德集团赢得的席位要比主要的对手工党的席位少，但是作为在职的总理他第一次得到机会同其他团体和派别组成联合政府。）就在7月16日同一天，贝京下令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空袭。第二天，以色列参谋长艾坦将军下令轰炸贝鲁特市中心。至少有136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被杀害。几百人受伤。

阿拉法特知道如果他继续抑制还击，他的信誉将蒙受摧毁性的打击，第二天阿拉法特代表巴解组织下令射击——霎时火箭弹降雨般地落在以色列的北部定居点上，阿拉法特宣称，“贝京，如同希特勒一样，正在寻求最后解决。”

根据联合国最高层消息来源，阿拉法特是正确的。贝京和艾坦决意继续进行屠杀，并且无意停止，直至巴解组织被消灭。根据同一消息来源，艾坦的计划是把那些有巴解组织存在的贝鲁特的地区夷为瓦砾，紧接着和基督教民兵一道发起快速陆地进攻。总的目的是无论在哪里发现巴勒斯坦人就杀死他们。人们认为，贝京和艾坦之所以往手是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或许是美国新总统罗纳德·里根捎了口信。

阿拉法特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说服法塔赫左派分子和他的许多陆军指挥员接受停火主张之后，于7月26日同意在黎巴嫩停火。

如果不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厄克特·布雷恩亲自负责实现停火，那么完全有可能实现不了停火。他首先得到阿拉法特的同意。当他清晨3点钟接到里根的中东特使费利浦·哈比卜的电话时，他得悉了以色列的立场。他说，以色列提出了三项要求，必须在他们同意停火之前得到满足。

厄克特告诉我：“我对费利浦说，‘忘了它吧。如果你要停止战斗，我会使它停止。我已得到阿拉法特的同意。但是我不准备把它印得好好的并再花10年时间去跟我的以色列朋友进行辩论。’以色列人的根本目的是想把停火扩大到约旦，上帝知道还扩大到其他什么地方。他们要求阿拉法特保证，巴勒斯坦人不能再从任何地方开枪射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能再从任何地方进入以色列。以色列人知道阿拉法特是不能对此作出保证的。费利浦说，以色列人坚持他们的要求。我说：‘瞧，我可以保证阿拉法特停止在黎巴嫩的射击，而且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们试图包括整个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算了吧。我不会去做这件事，而且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我的意思是，说到底，究竟谁侵犯了黎巴嫩南部？是以色列人。谁发动这场我们正在努力使之停止的射击竞赛？是以色列人。看在上帝面上，你是愿意停止战斗还是你不愿意？’以色列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最后同意只在黎巴嫩境内停火。他们一点也不喜欢停火。后来他们说停火还包括其他地方。其实没有。”

停火进入两个小时，联合国部队发现一个带有粗糙定时装置的火箭。这个火箭是要在几分钟时间内发射到以色列的。厄克特说：“我们的士兵简单地切断了线路，希望得到最好的效果。他们这种做法是最糟的，幸亏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装置，没有出什么事。这显然是策划破坏停火并使阿拉法特陷于困境。当我听到这一情况时，我打电话给他说：‘现在我知道，现在我真

正地知道你的问题之所在。’他说：‘你是严肃的吗？’我说：‘是的，我是严肃的。’接着阿拉法特说：‘如果我同联合国达成一项协议，我是非常严肃的。我认为我们是把你当做理解我们的人。你是我们的朋友。你不能做很多事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把同你的合作看作是重要的。我们愿意停火，并将遵守停火。’”

后来发现，为叙利亚人服务的巴勒斯坦代理人设置了这支火箭。看来大马士革愿百到以色列人加紧进攻。据阿布·伊亚德说，叙利亚人在此之前的三、四个月曾经试图在一次伏击中杀死阿拉法特，但失败了。

在8月5日，贝京宣布了他的新政府的组成，并且声明他永远不同巴解组织打交道。以色列的新国防部长是沙龙将军。

据联合国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这次不是厄克特）说，沙龙同贝京和艾坦不一样，十分赞同停火。因为这给他这位即将就任的国防部长有时间去构思一个更加全面的用军事和政治手段粉碎巴勒斯坦人的计划。事实上，今天已是有案可查的事，沙龙确实反对过贝京—艾坦在黎巴嫩摧毁巴解组织的战略，因为他懂得，靠在黎巴嫩结束巴解组织这件事本身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沙龙一劳永逸处置巴勒斯坦问题的计划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消灭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在发起入侵时，目标是彻底消灭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彻底消灭巴解组织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而且消灭阿拉法特和尽可能多的巴解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沙龙全面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在西岸和加沙扶植一个巴勒斯坦傀儡领导。这是有案可查的，沙龙在1981年11月着手完成他的计划的这一部分。就在这个月，他指示被占领土的民事行政官员梅纳赫姆·米尔索来担负制造巴勒斯坦傀儡领导的任务。沙龙全面计划的第三部分是推翻侯赛因国王。在结束的那天，如果他的计划得到实现，沙龙就将对巴勒斯坦人说，以色列人将继续永远留在西岸和加沙，大以色列现在已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犹太国承认反对它的巴勒斯坦人应当有他们自己的祖国，它就在那儿，约旦——拿下它好了，以色列欢迎。

在沙龙正在密锣紧鼓策划他的战斗计划之际，政治行动集中在将被称为法赫德计划的阿拉伯和平计划上。这项计划很快就以沙特阿拉伯王储、现在的国王法赫德的名义提出。

事实上，法赫德计划开始孕育时同巴解组织五点和平计划一样。巴解组织这项计划在1977年4月曾由哈拉德·哈桑在西欧提出。哈拉德解释说：“我们知道和平进程正无路可走，因为没有人同意实现和平的原则。这样，我们说，好吧，让我们把原则搁置一边，让我们以一项实现撤退的计划从另外一头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巴解组织的计划要求以色列人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撤出，将其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将在一年之内，在与巴勒斯坦人民代表合作下安排进行选举，让巴勒斯坦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如果绝大多数人投票主张在西岸和加沙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将由联合国通过决议建立。在这之后，巴解组织的和平计划要求所有有关各方的合法代表坐下来，讨论和解决全部主要问题。哈拉德说：“所有有关方面，我们意思是指美国、苏联、欧洲共同市场、阿拉伯国家，当然还有以色列政府。我们准备讨论它好几年。我们准备遵守联合国宪章并且参朋国际法来解决全部争端。”

不幸的是，巴解组织没有能够为它的求实的计划获得必要的国际支持。

因为，一如往常，美国当局和西欧国家政府不愿使以色列讲道理。在失望之余，哈拉德、阿拉法特和领导机构中的其他成员拜访法赫德王储寻求帮助。这次轮到他了，他也在很大的失望中发现，要引起美国和西欧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最后，法赫德提出了他自己的八点计划。这项计划的原则在 1981 年 8 月中旬由这位王储概括提出。当时第二届贝京政府在以色列掌权后不久，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正是沙龙在紧锣密鼓策划他的战斗计划之时。

就本质说来，法赫德计划是这一主题的变种：以色列从 1967 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全部撤出，规定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以换取完全的最后的和平，并从而在谈判进程结束时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约定于 11 月 25 日在摩洛哥非斯开会通过法赫德计划。计划第七点承认“本地区所有国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像所有主要各方人士包括以色列领导人所理解的，这是法赫德计划对在谈判进程结束时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承诺。

因此，在非斯将要发生的事态的意义是重大的。如果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阿拉法特赞成法赫德计划作为同以色列和美国谈判的基础，并且由于这项计划得到通过，随之即将出现阿拉伯国家愿立即生效并在谈判之前给予含蓄的、但明显的事实上的对以色列承认。如果发生了这一切，美国就不再能以花语巧言的托词，拒绝接受巴解组织作为谈判的一方，并拒绝向以色列施加必要的压力，使之一旦谈判开始就撤出 1967 年所占领土。

在非斯首脑会议前，阿拉法特就曾表示他赞成接受法赫德计划。哈尼·哈桑对我说：“阿拉法特本人对法赫德计划并不太满意。然而，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第七点——含蓄而明显的对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在我们的小型国家方案中已经提出了这点，对阿拉法特来说，问题是他嗅出了一点肮脏的国际阴谋。告诉你真实情况，我是提出反对法赫德计划的第一个人。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这一行动不妙。当我真的说出了我的看法时，我几乎失去了我同沙特人的关系，并且同阿拉法特大吵一架。他对我说，‘你不能对沙特人以这样一种方式说话。’但是，真的，我必须告诉你，阿拉法特确实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确信沙龙在任何时候都会找到一个借口来破坏停火，并且开始这场旨在反对我们的最后的进攻。阿拉法特知道，当沙龙来侵犯我们时，没有沙特外交上的支持，我们将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阿拉法特说我们担负不起打乱沙特计划的原因。”

非斯首脑会议的天折迄今没有得到充分解释。据说是阿拉伯领导人未能在他们之间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外部世界确切知道的全部事情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决定不出席是首脑会议夭折的原因。

哈拉德·哈桑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非斯只是在阿萨德原定到达时间前的 20 分钟，才得到他不来参加会议的通知。他的房间、安全措施，所有一切都已准备好了。

为什么阿萨德不参加？据哈尼·哈桑说，苏联人在法塔赫的两名左翼领导人的帮助下，说服他破坏非斯首脑会议。苏联人显然害怕美国人认真地公开表示支持阿拉伯和平计划；他们担心他们将会被排除在中东的影响之外。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政策过去是并将继续是一致的。苏联愿支持任何和平倡议，如果他能分享缔造和平的声誉——以便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如果它不被邀请来参与缔造和平，它将破坏任何和平倡议。

哈拉德·哈桑对非斯首脑会议是如何被破坏的持有另一看法。他认为美

国人应对阿萨德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负主要责任。哈拉德说：“美国人希望首脑会议夭折，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在他们准备提出将被称为里根计划的東西之前，先出现阿拉伯和平计划的想法。

第三种分析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哈拉德·哈桑和哈尼·哈桑两人都是对的——出于不同原因，苏联人和美国人两方都插手，促使非斯首脑会议瓦解。这种分析在巴解组织领导人中有它的支持者。支持这一观点的那些人说，两个超级大国中没有一个希望在沙龙获得机会消灭巴解组织之前，出现一个重要的政治倡议。

这也许就是摩洛哥国王哈桑在宣布中止非斯首脑会议时心中怀有的想法。他说：“这个主题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

在1982年1月中，沙龙本人秘密访问了西贝鲁特基督教徒区。他的目的是向他的基督教盟友说明，当入侵开始时要求他们做些什么。他带领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指挥官们视察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据点，要求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占领它们。

从1月底起，沙龙已准备好行动，而且需要行动。但是有一个停火问题，全世界都知道阿拉法特是遵守停火的。以色列人继续向世界宣传，停火不仅限于黎巴嫩，以色列完全有权把巴解组织从约旦或任何地方发起的行动看成是违反停火。但是，以色列人是在撒谎。这谎言导致厄克特和以色列军事情报处主任萨吉·耶赫舒阿将军之间的富有戏剧性的对抗。摊牌在贝京的办公室进行。在此之前，以色列俘获了8名从约旦渗入的巴勒斯坦游击战士。沙龙要利用此作为他入侵的借口。

厄克特说：“我向总理汇报这一事件不违犯停火，萨吉打断了我的汇报说，这是违反停火。我担心我会发脾气。我说：‘瞧，将军，当我正在向总理汇报时，你强迫我住口，因为你正有意向总理谎报情况，而你明明知道你所说的是假话的。如果你想就此进行辩论，我愿意同你公开较量，因为你我都知道你所说的只是一个巨大的、愚蠢的谎言。’贝京说：‘厄克特先生，你是绝对正确的。我相信你，而我对萨吉将军所说的感到十分遗憾。我知道那些人是从约旦来的。’”

在1月底举行了海湾国家国防部长秘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助手和顾问出席。只有部长们自己。我请求阿拉法特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如果有任何这方面情况的话。起初，他似乎并不想谈他所知道的或推测的情况。因此，我说：“好吧，让我加以推测，然后听取你的评论。我认为，他们知道沙龙为了实现他的最后解决就要实际行动——我想自从非斯首脑会议遭受破坏以来他们就了解此事；我想他们正开会决定不采取反对沙龙和支持你的军事行动。我的猜测是，当会议结束时他们向华盛顿发出信息说，事实上，‘我们不准备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阿拉法特说：“我很高兴，你理解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实际面临的处境。要说的东西太多了，但是现在不是时候……然而我愿意告诉你一些其他事情。在那次会议之后，我会见了一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我不告诉你他是哪一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对我说的话。他注视着我的眼睛，说了以下的话，确切的是：‘我们知道将会有一个消灭你们的图谋。你们会要求我们帮助，而这是不会实现的。当心啊。’”

4月，里根宣布，他正在考虑一项对中东的新的更加公正的立场。阿拉法特和一些巴解组织领导人认为，这项声明是对那些阿拉伯领导人的感谢

信。这些领导人曾表示，他们将不批准以武力为手段来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预期的侵犯。巴解组织领导人对我所说的话的含义不是指在里根和各个阿拉伯领导人之间有一项交易；而是里根政府说，事实上：“我们感谢你们将不阻挠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犯。我们将在巴解组织被摧毁对向以色列施加真正压力来报答你们。”

停顿了一会儿，阿拉法特说：“在卡特和万斯的年代，没有反对我们的重大阴谋。万斯确实是一个好人，他作了许多努力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帮助……我不敢肯定。但是，当里根和黑格开始执政时，他们决心在基辛格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

阿拉法特获悉他的阿拉伯兄弟无意给他帮助，他们甚至不愿意提供他反坦克武器以减慢预期的以色列的推进。大约在这同时，这位主席会见了厄克特。在会见过程中，他要求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给以色列领导人一个口信。阿拉法特说：“请告诉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蠢人，一旦我死去，他们会感到遗憾的。我是唯一能够为缔造和平提出妥协方案的人。”

1984年厄克特对我说，“这是悲剧性的。阿拉法特说的完全是真理。从一开始，他就是唯一能够谈论同以色列打交道而没有在第二天由于这样说而被杀害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这也是在巴解组织领导机构中所有阿拉法特的高级同事们的看法。

在整个4月和5月，以色列人多次厚颜无耻地破坏停火，轰炸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他们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要挑起阿拉法特的还击，以给沙龙所需要的发动进攻的借口。正好在5月9日有一次巴解组织真的还击了，一些火箭落在以色列北部定居点。

阿布·达乌德说：“在这一时刻，阿拉法特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们的一些陆军指挥官没有得到主席的命令就进行还击。如果按照阿拉法特自己的方针，我们仍然连一枪都不会发。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他立即下令停止还击，他大概当时当地就会被推翻。真的，我一点也没有夸大。这样，他做了什么呢？他对陆军指挥官们说：‘好，你们可以发射少数火箭，但是当我下令时，你们就将停止！’我的看法是，阿拉法特因此而得以幸存下来。”

唯一拒绝遵守阿拉法特停止射击命令的是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布利勒。因为贾布利勒从来没有在未得到他的在叙利亚军事情报处的主子命令就采取行动的，推测阿萨德总统批准了贾布利勒的行动，看来这一推测是合理的。阿布·达乌德说：“阿拉法特对贾布利勒说，他要隔离他。这一回主席非常严肃，贾布利勒停止了射击。”

事态表明，沙龙认识到他做得过分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他向阿拉法特挑衅。所以，巴解组织的还击不能成为以色列入侵有理的一个充分借口。

在5月20日，沙龙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黑格进行了一次会谈。在会谈过程中，黑格给沙龙开了绿灯。从后来的显然是消息灵通的以色列方面对会谈的介绍，所存疑问则是黑格如何确切地给沙龙以行动信号。为了掩藏他自己真实面目，黑格好像更多的是转达信息而不是回答沙龙的问题。以色列的介绍十分清楚，黑格主要关心的是，如果以色列要有机会说服世界舆论，它在黎巴嫩将要采取的行动即使被证明只具有极少的一点道理，那也必须要有巴勒斯坦违反停火的确凿事实。

这意味着以色列国防部长有一个真正的问题。这就是阿拉法特。只要他在他自己一方拥有权力控制事态，这位主席简直就不会给沙龙以他所需要的

借口。

在入侵开始那天，阿拉法特正在沙特阿拉伯。他在那儿的出现明显地意味着，他制止他的愤怒的巴解组织部队对以色列的进攻事件进行还击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要说以色列情报机构不知道阿拉法特在那里，这是难以置信的。

在6月8日星期四夜里，发生了暗杀以色列驻英国大使沙洛姆·阿戈夫的事件。在他正离开道切斯特旅馆时，他的颈部被击中。在国家神经病医院进行了两小时脑部手术之后，他仍濒临死亡。这次袭击，是在伦敦的阿拉伯学生从在伊拉克的阿布·尼达尔的总部得到命令进行的。

第二天早晨，当阿拉法特在以最快的速度从沙特阿拉伯驱车去黎巴嫩时，以色列飞机用火箭阵阵轰击，并以机枪扫射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区。以色列人说，这不是他们入侵的开始，只是对阿戈夫在伦敦遭受袭击的报复。由于没有阿拉法特强加限制，巴解组织的军事指挥官们对着以色列进行还击，这是他们知道的该怎么做的唯一途径。而这就给了沙龙以他所需要的借口。

巴解组织领导机构一致认为，莫萨德通过它对阿布·尼达尔组织的渗透，应对下令杀害阿戈夫以便给沙龙提供报复性进攻借口负责。这种进攻保证能迫使巴解组织在阿拉法特不在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首先承认对这一断定没有具体证据。

纵观在沙龙蓄意进行的命运之战中的力量对比，就说明它本身情况。以色列投入战斗的兵力有9万人、1300辆坦克、1.2万辆军用和后勤供应卡车、1300辆装甲运兵车，直升飞机和军用飞机需要多少就可从全部634架战斗机中调用多少。除此之外，还必须注意到，以色列正在以最新的有效的军事技术进行作战——有些新技术连美国人还未曾有时间或机会在实战条件下进行评估。基督教民兵凭他们本身的质量是一架杀人机器，而他们是站在以色列的一边的。同样，在南部的以色列傀儡哈达德少校也是如此。

巴解组织的战斗力量，包括和他们并肩战斗的黎巴嫩的兵力，总共不到1.5万名成人和青少年——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装甲兵。总起来说，很少有任何种类的现代化的或尖端的武器。

以色列也在同叙利亚交手。但是，在以色列人迅速摧毁了在黎巴嫩的整个叙利亚空中防御体系和击落92架叙利亚战斗飞机之后，叙利亚的战争机器中立了。然后，以色列的主要进攻矛头指向巴解组织。事实上，阿萨德不想同以色列战斗，他恰好站在他们入侵的路上。正如成千上万散居在外的犹太志愿者在1967年去以色列一样，成千上万散居在外的巴勒斯坦志愿者同样在1982年去支援巴解组织。许多人到达大马士革，寻找他们前往被叙利亚封锁的战场的道路。

一位美国专家克利福德·艾·赖特后来说，一个内容丰富的可供研究和分析的题目是巴解组织对贝鲁特的保卫。他说：“以色列人并非由于缺乏努力而无法把巴解组织驱逐出去，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和迄今尚未探究出的这场战争的某一方面。”

我请求阿拉法特对赖特的意见给予评论。他说：“真的，这是很简单的，

是不需要分析的。我们在贝鲁特的坚定不移之所证明的，是越南和我们自己从斗争开始以来所曾经证实的同样的一课。

你不能用炸弹和子弹杀死或击败一种思想，在这里指的是巴勒斯坦本体思想。你是不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战争贩子是如此愚蠢的原因。如果他们真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他们是不会成功的，除非他们杀死了最后一个巴勒斯坦男人、妇女和孩子。”

在以色列人以真正闪电战的方式向北推进后，在 86 天战争中有 67 天，阿拉法特和西贝鲁特穆斯林区的所有居民都处在包围中。因为有电视，世界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仔细察看犹太复国主义者面目的丑恶一面。这一面以前只有巴勒斯坦人在近处看到。总而言之，世界人民为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感到震惊、憎恨、恐怖。他们的政府说它们也同样感到震惊，但它们什么也没干。

对我来说，在这些戏剧性的日子中，阿拉法特揭露的事件中最强烈吸引我的是，他本人是沙龙的战斗飞机多次袭击的主要目标。阿拉法特轻声笑着说：

如同阿拉法特和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们后来发现的，以色列在贝鲁特西区有一个大约 70 人的特务网——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穆斯林。他们每个人都配备有最新式的最尖端的不大于香烟盒的盒式发报机。这 70 个特务是从 1200 个潜在的合作者中挑选出来的。当沙龙在 1981 年 8 月认真着手策划这次贝鲁特袭击时，这些合作者的名字已经在以色列各个情报机构的档案中了。这最后选出的 70 人，在以色列训练了 6 个月。他们的任务是跟踪巴解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并尽可能经常地报告他们的方位。接着炸弹就会落下。阿布·伊亚德告诉我，70 个特务中大约有 40 名被指定盯住阿拉法特。他是首要目标。其他的重点有阿布·伊亚德、乔治·阿巴什和阿布·杰哈德——按照这个次序。

我问阿拉法特，什么时候他第一次发现他本人是以色列轰炸的首要目标。他答道：“在战争第二天我就开始怀疑，到第四天或者第五天，我证实了。但是直到 6 月底，我们才发现以色列的情报网和事实真相。”

阿拉法特有多少次濒临被杀害境地？他说：“这要看你对‘濒临’含义的理解。如果你是指以色列飞机有多少次差点击中目标，我可以说有几十次。如果你是指有多少次由于以色列准确的攻击我将被打死，我可以说有十二次……是的，我从以色列的这些轰炸中十二次死里逃生。”

在阿拉法特到达一定的场所和炸弹的投落之间有多少间隔时间？他说：“有时候可以长到 20 分钟左右。但是一般的是 10 分钟或更少。有时候只有很少几分钟。”

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是如何发现以色列情报网的？“偶然。”阿布·伊亚德告诉我，“确切地说是这样的。6 月底，也许是 6 月 27 日，我们巴勒斯坦姑娘中的一人找我。她十分惊慌，但是当时她还努力控制自己。她说：‘阿布·伊亚德，我的全家人都死了。’我说：‘我很难过。’她说：‘我要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会死。’接着她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发报机。‘你知道这是什么？’她对我说。我点点头。她说：‘我就是用这个杀死了全家。我是一名以色列特务。我报告了阿布·阿玛尔的方位……炸弹来了……我的全家人死了。’”

由于这位姑娘的自供，阿布·伊亚德的安全人员在大约 48 小时内验明并逮捕了 27 名以色列特务。由于第一名特务把揭开整个行动计划的秘诀告诉给

了阿布·伊亚德，其他许多人，也被识别了，他说：“以色列人一天改变一次密码，有时两次。地面的特务只知道密码的一半，因此，他们每天，有时一天两次，必须到在贝鲁特分界线上的以色列—基督教检查站去取另一半密码。所以，很自然我们有我们的人在监视。好了……其余的你都能猜到。”

阿布·伊亚德指示将第一批 27 名特务带出去并枪决。其他特务在他们被发现并在他们供认后一个一个地被执行处决。

在 7 月 3 日，以色列人对这个城市的一半穆斯林区强行正式封锁。他们切断水电供应，并且阻止运进其他燃料、食物和药品。此后，沙龙消灭巴解组织的战略明显地成为要消灭每一个人，沙龙这样认为，封锁会迫使 50 万黎巴嫩人的大多数逃离。他们离开后，就只有巴勒斯坦人和少量黎巴嫩穆斯林留下。这时，沙龙用他的飞机和坦克可使西贝鲁特化为废墟，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存。但是，贝鲁特的大多数穆斯林拒绝在轰炸、饥饿和恐吓的威逼下离开他们的家和他们的城市。而从他们拒绝离开那个时刻起，沙龙的图谋就无法得逞。他随即下令以色列空军对西贝鲁特作出一些惊人的攻击以发泄他的怒气。

然而，曾有两次阿拉法特认为末日该到了。第一次是在 7 月中。在以色列强施封锁后的大约两个星期。

阿拉法特说：“一个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来拜访我，他们代表整个穆斯林社会。他们来请求我放弃战斗，他们说，因为巴解组织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给这个城市造成更多的灾难和进一步的破坏没有意义。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要继续下去？阿拉伯政权是不会帮助你的。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不会帮助你的。有人答应你什么东西吗？没有。如果你能有证据表明你将得到什么帮助的话，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斗争。但是，不会有的。不会有奇迹的……所以，阿布·阿玛尔，我们请求你现在放弃斗争。’所有这些是他们对我说的。

“我对他们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这是你们真正所要求的，我在现在，此时此刻，就准备好下令停止战斗。你们有权要求我停止，而我愿意尊重你们的愿望。但是，首先，请听听我必须说的话。’接着我对他们谈了关于阿拉伯历史上的教训。这是一次长谈。我提出了许多论点。最后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为子孙后代，坚守战斗岗位直至死去。我说，如果我们现在放弃斗争，阿拉伯的抵抗精神就将永远被打垮。最后，我谈到了我们现存的阿拉伯世界的毛病，我说，现在的毛病是因为每个新的一代被它的父辈出卖了。我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是准备像所有其他一代人那样背叛我们的孩子，还是准备做树立一个忠贞不屈榜样的第一代人？’

“当我讲完时，他们围过来接近我，泪水直淌，他们说：‘阿布·阿玛尔，我们为我们说过的话感到羞愧。你必须继续战斗。我们跟你死在一起。’”

阿拉法特以为末日已到第二回是在 8 月初的一天。当时，以色列坦克完成了他们对西贝鲁特的包围，似乎要迫近城市中心进行屠杀。

阿拉法特说：“虽然当时我没有告诉我的同事，约有几个小时我是完全颠倒的——混乱的，我无法理解以色列人怎么会仅在 6 小时内完成了他们的包围，因而我去祈祷了约 30 分钟。当我结束祈祷时，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我感到天国之风在吹拂……’按照我们的宗教和传统，我是在说两件事。第一，我已准备好了去战斗并作为一名烈士死去，从而进入天国。第二，我预期会死。于时，我以这样的口号发布我最后的战斗命令：‘天国之风在吹拂’。

我们战士的士气变化是难以相信的，惊人的，我无法告诉你形势是怎样变化。如果以色列人真的一路进入贝鲁特，我们已经准备对付他们，”

我说：“你真的预期会死吗？”

“哦，是的，”阿拉法特说，“没有疑问，丝毫没有疑问。”

好了，我们来谈谈阿拉法特最喜欢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故事吧。通过中间人，阿拉法特和沙龙不时在相互谈话，或许说他们在相互发出信息，更为准确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左右，阿拉法特记不得确切的日期，沙龙有一项非常特殊的口信要送给这位巴解组织主席。

当时，沙龙正要求阿拉法特投降。他把里根的特使费利浦·哈比卜召来见他。这位以色列部长用他的大拳头猛击书桌桌面，并向哈比卜放声大叫，‘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他们不像是阿拉伯人……他们没有从战斗中逃跑……我向他们扔射了我拥有的一切东西，可是他们仍然在那儿！告诉阿拉法特，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原子弹了！’”

根据沙龙的要求，哈比卜向沙耶布·萨拉姆转达了沙龙的口信。黎巴嫩的前总理萨拉姆是哈比卜同阿拉法特的联系人。哈比卜向他描绘沙龙的情绪极坏，然后给他口信，事实上是另一次强调要求阿拉法特投降，萨拉姆耐心地倾听。当轮到萨拉姆说话时，他说了以下的话：“我无需同阿拉法特商量。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的回答。确实这个沙龙不了解巴勒斯坦人。他们已誓死战斗，如果他们必须一死，那么如何去死对他们来说，则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告诉这位愚蠢的沙龙，扔他的原子弹去吧——那就是阿拉法特的回答！”

萨拉姆后来短途旅行向阿拉法特通报他和哈比卜谈话的要旨。当他谈到这句妙语“因此，告诉这位愚蠢的沙龙，扔他的原子弹吧”时，阿拉法特没有说话——他只是在笑。但是，这一次它不是一个以前就曾听到过这一切的人的悲伤而消沉的笑，而是一个知道已经击败沙龙的人的放声的真正的笑。巴解组织现在将不得不撤出贝鲁特和黎巴嫩，在某一方面来讲，这是以小的代价赢得了这样的胜利。在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高昂的代价。阿拉法特过去多少年来曾暗自希望，能以从黎巴嫩出来转而进入巴勒斯坦小型国家的办法进行谈判。可以这么说，他曾希望以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出现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小型国家。这一选择现在是完了，至于将来，一如以往，则是个问号。但是，至少是有一个将来的，现在得到了更多的保证。当一位以色列国防部长，在所有的人中偏偏又是沙龙，被迫承认他只有扔原子弹才能消灭巴解组织时，那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

第十九章与阿萨德对抗，与侯赛因结伴

经历三年时间，事情清楚了，沙龙得到的是他所想要得到的相反的东西。在 1982 年夏天，他的主要目标是消灭巴解组织——取消它作为在中东和平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沙龙所做的却创造了这一形势，给了巴解组织同侯赛因国王结盟的机会。这一结盟给了这位主席以新的政治力量，它事实上是一种保证，使以色列阻挠巴解组织参与和平进程的日子变得屈指可数了。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人对此结盟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一次流血的最后的摊牌，这一斗争由于叙利亚阴谋杀害阿拉法特而得到加强。在 1985 年 6 月写作此书的时候，叙利亚的情报头子们还在努力找出为什么他们上次暗杀阿拉法特的图谋遭致失败的原因。他们本想等侯赛因在华盛顿宣布约旦和巴解组织一起准备好在国际和平会议的保护伞下同以色列谈判之后，在空中袭击阿拉法特乘坐的从安曼飞往突尼斯的飞机。有可能苏联也卷入了。哈尼·哈桑本人也是叙利亚一系列暗杀阴谋的目标。他说：“我不愿给你谈详细情况——为时还太早。说说这样一件事就够了，我们在我们的约旦朋友帮助下，在最后时刻之前发现了杀害阿拉法特的最新的阴谋。”（在这项阴谋未被发现的时候，我预定要去会见阿拉法特。这是第一次主席未能践约按时见我。）

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和少数了解情况的观察家来说，阿拉法特决心和侯赛因共命运的第一个暗示是巴解组织对里根计划的反应——或者我应该说阿拉法特掌握的巴解组织的反应。这项计划是这位总统在 1982 年 9 月 1 日披露的。这是阿拉法特以体面的和礼仪的方式从贝鲁特废墟中撤出后的第一天。（在贝鲁特战斗的初期，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曾考虑过巴解组织接受联合国 242 号决议从而承认以色列的可能性——开始一项政治进程和停止入侵。沙特人曾波要求去探索同华盛顿进行这一交易的可能性。他们做了。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他即将被里根解职之前，作出以下答复：“我不建议巴解组织在这个时候承认以色列。如果承认了，沙龙将向贝鲁特发动一场以色列全部军事力量的进攻……我们将无法阻止他。”我不能随便说出这项消息的巴解组织和其他方面的来源，但是我对这一情况的准确性是相信的。）

当阿拉法特在去突尼斯的途中和他离去的战士正被分散到阿拉伯世界相隔很远的各地时，里根说了三件事：“同意”那些生活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在和约旦联合下成立自治政府；“不同意”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原则“同意”这一主张（如 242 号决议所要求的），即以色列应从 1967 年被占领土撤出，允许巴勒斯坦人自治，这就是里根计划的实质内容，随后美国的声明含蓄地指出，巴解组织同侯赛因结盟将从中得到一些东西。

在以色列，贝京政府彻底拒绝这一计划。两星期后，沙龙派以色列部队进入西贝鲁特穆斯林区的中心，为基督教（长枪党分子）民兵消灭巴解组织残余“恐怖主义分子”的一项行动提供掩护。按照沙龙的数字，那儿最多还有 3000 人自由自在。据以色列的报道，沙龙对长枪党的指挥官说，“我不让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留下。”在以色列人进逼包围情况下，1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被屠杀，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

童。当阿拉法特为巴解组织从贝鲁特撤出进行谈判时，他从美国人那里谋求并得到许多保证。一个是在难民营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安全和健康必须得到保证。另一个是以色列军队不得进入西贝鲁特。“这些不只是理解问题，”阿拉法特对我说，“它们是所有各方签了字的协议的组成部分。”沙龙破坏撤退协议的借口是，9月14日黎巴嫩的（基督教）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遇刺。沙龙宣称他正派遣以色列军队进入西贝鲁特以保护穆斯林免受基督教徒的报复。但是，事实是另一回事。正如以色列作家们曾经详细解说的，沙龙的行动是在9月14日暗害之前就已构想出的一项“精心制作的计划”的一部分。贝希尔是以色列的合作者。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叙利亚的一个情报机构应对暗害负责。以色列作家们指出谋杀者的名字叫哈比卜·沙东尼，并谈到他如何从他的操纵者、“在罗马的一个叙利亚情报机构的特务”那儿得到命令的。阿萨德的动机是简单而明显的。他想要他的合作者、贝希尔的弟弟阿明成为黎巴嫩的总统。在这件事情上阿萨德得手了。

虽然里根的五点计划远非巴解组织所能够接受，阿拉法特和在主要领导中的他的同事并没有立即拒绝它。他们准备探索美国计划中的灵活性的迹象。他们感到怀疑，有限的自治政府能够有一天导致成为完全的自决、并在同约旦的邦联中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吗？这是可能的吗？当里根将其计划公之于众时，他似乎暗示有这种可能性。例如他说：“这些（被占领的）土地的最后地位，当然必须通过平等交换的协商来确定。”

在1983年2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

这次会议在讨论其他事情时，也考虑对里根计划的正式答复。此时，在非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已经通过了法赫德计划。因而，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已经对在安全边界内的以色列给了含蓄的但又是明显的事实上的承认。

阿拉法特的目标是阻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向里根发出一个完全否定的回答。他需要有回旋余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多数代表准备看看究竟在和侯赛因合作的问题上他能用里根计划做些什么。（早在1979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曾委托阿拉法特和侯赛因讨论在未来的巴勒斯坦小型国家和约旦之间建立邦联的可能性。）但是，巴解组织内的左翼团体和法塔赫自己的许多左翼分子要求立即拒绝里根计划。他们指出里根计划特意排除了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他们说，无论如何，里根是不严肃的。不幸的是，对阿拉法特来说，有一些可靠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对手的说法。当里根概述他的主张的时候，他要求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土内建立新的以色列定居点。以色列人以建立更多定居点作为回答，而里根在发表他的计划以后的6个月内没有做任何事情加以阻止。

为了避免分裂巴解组织，阿拉法特没有坚持并妥协了。结果是通过了一项全国委员会的最后决议，拒绝以里根计划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给阿拉法特以足够机会同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起努力说服里根改进他的计划。

当时许多西方评论家说，阿拉法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说，阿拉

宰夫·席弗和爱胡德·哈内：《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乔治·阿兰和安文出版公司，伦敦，1985），第246页。

同上书，第247页。

法特本应当在坚持他自己的条件下分裂巴解组织。他们说，这将激发里根为温和的巴勒斯坦人提出较好的建议。或许是这样。但是，1983 年在阿尔及尔，阿拉法特为什么拒绝分裂巴解组织是有极其充分理由的。

恰恰当他们在阿尔及尔开会的时候，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同事们知道，阿萨德总统在利比亚卡扎菲上校的帮助下，正准备策动一次法塔赫的叛变。那个时候分裂巴解组织将直接为阿萨德的利益服务。阿拉法特的战略是迫使叙利亚总统首先采取行动。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彻底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控制和打巴勒斯坦牌的人。当他被迫公开表明他自己的真实目的时，他企图策动的叛变就不会得到巴勒斯坦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阿萨德要的是什么花招。

阿萨德最大的担心是，阿拉法特和侯赛因结成伙伴关系，将使他失去巴勒斯坦这张牌并导致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在那种情况下，从阿萨德的观点来看，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获得全面解决，唯有叙利亚被排斥在外。简而言之，阿萨德害怕他将发现他自己被孤立，失去他拼命想要争取的媾和前景，除非他准备为此付出让以色列继续占领戈兰高地的代价。这样，阿萨德的打算，采取一切措施阻止阿拉法特同侯赛因达成一项协议。

一位法塔赫高级领导人说：“当我们开始和约旦接触时，我们收到了阿萨德的一个口信。他说，假如巴解组织达成一项和侯赛因一起工作的协议，他将对我们关闭叙利亚边境，撤回对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的承认，并且另立一个新的巴解组织。自然，阿萨德不是自己直接对我们说的，他是通过某一渠道将这一口信传给我们的，实际上是通过另一位阿拉伯总统，但是这项口信是正式的。”

法塔赫的持不同意见者和叛变者的未来领袖，以及一小撮高级战地军官，他们自己分裂了。有些人，如阿布·穆萨，从 1974 年以来就反对阿拉法特的政治路线。另一些人，如阿布·萨拉赫，只是由于阿拉法特的政治和解方针没有取得成果而失望，灰心丧气。他们发现，他们在反对里根计划和反对阿拉法特决意对之探索研究这一问题上是一致的。法塔赫的持不同意见者对阿拉法特宽容在某些忠于他的人身上的腐败行为，为之激怒。解放运动中的许多普通成员在这点上与持不同意见者的看法相同。甚至绝大多数阿拉法特的最高级的同事也要求他们的领袖处理在他周围的腐败行为。但是，他们也知道，对主席来说，采取行动不是容易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是出于明显的理由他必须奖励忠诚。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这些腐败分子——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高级领导人——得到巴解组织不能轻易得罪的某些阿拉伯政权的支持。阿拉法特的回旋余地是十分有限的。

这位叙利亚总统和这位利比亚领袖曾准备出现这种可能性，阿拉法特要说服聚集在阿尔及尔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大多数代表对里根计划给予一项积极的回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阿萨德和卡扎菲打算在几天之内就挑起法塔赫的叛乱。阿萨德正在策划中的这次叛乱的协调人是他的忠实的巴勒斯坦傀儡艾哈迈德·贾布利勒。他是叙利亚支持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领导人。他被选中为这次叛乱的协调人，是因为阿萨德的情报头子不信任法塔赫的持不同意见者。他们要阿拉法特离职，但是他们大概不会参与一项杀害他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贾布利勒是唯一可以被依靠的。除了阿拉法特和他的最信赖的高级同事外，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贾布利勒在阿尔及

尔会议中心他的住处有一个秘密的相当特殊的客人。哈拉德说：“贾布利勒的特殊客人是卡扎菲军事情报处的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他的任务是在贾布利勒帮助下监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进程和气氛，并且用无线电定时向卡扎菲报告。我们的人监听了，所以我们多少了解这一阴谋是如何进行的。”

当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拒绝给阿萨德他所需要的挑起叛乱的借口时，这位叙利亚总统被迫等待他的时机。像阿拉法特一样，阿萨德对于被看作是发动这场战斗的人，哪怕是通过他的代理人，是承受不了的。

1983年4月，看来阿拉法特和侯赛因似乎接近达成一项一起于的历史性协议，这时阿萨德认为他的第二次机会来到了。阿拉法特在否定了侯赛因写的文件草案后，提出了他自己的一项临时协议的文本。这位国王显然很满意，因为它给他开了绿灯，他可以同美国人探讨以前所有的和平建议，包括里根计划。但是，正如阿拉法特很快告诉他的同事们的一样，他对侯赛因说，“我不是国王。我必须使它得到批准。给我48小时。”

阿拉法特在科威特进行了幕后活动，努力劝说他的领导集团中的同事们批准他同侯赛因的临时协议。他说，不竭尽全力进行政治工作的代价，将是更多的屠杀，但是，这位主席的论证和他同侯赛因的协议都失败了。

按照西方和其他评论家当时的说法，与往常一样的事件发生了。他们说，阿拉法特再一次缺乏勇气和智慧去对抗少数左翼分子和强硬路线分子并根据他自己的条件分裂巴解组织。事实上，正如哈桑两兄弟和阿布·伊亚德向我证实的，阿拉法特的和侯赛因的临时协议，遭到领导机构中的多数人的反对——左派和右派，现实分子和梦想家——因为多数人不相信里根计划能使巴勒斯坦人民的即使是最低的愿望和要求足以得到满足。科威特会议的实际情况是，阿拉法特的多数同事本可批准与侯赛因的协议，如果美国人那时准备在里根计划中增加如哈拉德·哈桑所描述的一个“发展的因素”。换句话说，多数人要求得到一项保证，在里根计划中对一些巴勒斯坦人提供的有限的自治政府，能有一天导致真正的自决和建立一个在同约旦的邦联中的巴勒斯坦小型国家。直至阿拉法特到达科威特时，事情很清楚，里根不准备作出这样一项保证，如果巴解组织委托侯赛因去讨论原来那样的里根计划，阿萨德那时就得到他要挑起叛乱的借口。而由于广大群众反对里根计划的力量，这样的叛乱也许会激发起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以致会使阿拉法特和支持他的政治路线的温和的或者现实主义的领导人的垮台。阿萨德将得到足够的证据——为了他自己的目的——来谴责他们是叛徒。

在他的同事们面前，阿拉法特态度自若地接受他的失败。但是，在私下他非常生气。狂怒之下——也许独自一人，也许经过同哈尼·哈桑商量——他确定，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和阿萨德进行最后对抗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这位巴解组织主席不能赢得自己和侯赛因一起工作的自由，巴勒斯坦事业将要失败。要真正理解为什么阿拉法特决定再也不能回避同阿萨德的最后摊牌，我们必须后迟至1977年来看。

在我完成此书的第一版手稿后，我发现，卡特总统曾经准备勇敢地面对以色列，要求它在阿拉法特能够接受的条件下媾和。通过沙特阿拉伯王储、现在的国王法赫德的斡旋，并且完全按他自己的倡议下行事，卡特和阿拉法特达成了一项秘密谅解——此事极为秘密，这位主席最信任的许多同事当时都不知道。

在本书第十八章，我透露过法赫德王储亲手向卡特总统递交了一份秘密

文件，其中概述了法塔赫为同以色列媾和准备作出的让步的全部和实际限度。卡特显然对法塔赫的文件留下深刻印象。同阿拉法特秘密谅解的实质是，当阿拉法特接受联合国 242 号决议时，卡特将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向以色列施加必要的压力。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为了使阿拉法特有可能接受 242 号决议而不被打倒和暗杀，卡特准备认可阿拉法特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即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否则对以色列的含蓄的承认将不会生效。这是绕过难题的好办法。但是，当卡特和万斯准备好了和以色列对抗时，阿拉法特却不能履行他这一方的成交诺出了什么毛病？据一位非常高级的巴解组织领导人说，阿萨德得到了关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风声，传唤阿拉法特主席到大马士革。这位领导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因为他担心揭露对阿拉法特仍然是非常刺痛神经的事。叙利亚总统说话简短而蛮横。他告诉阿拉法特，如果阿拉法特给予卡特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将摧毁巴解组织。这位主席完全相信阿萨德能够而且也会做得出来的。

假设阿拉法特在 1977 年春末夏初曾有自由作主给予卡特他所需要的东西……这位总统能够履行他这一方成交的诺言吗？他会同以色列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进行这场必要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吗？随后的事件，特别是卡特在 1977 年 10 月美苏联合声明问题上的失败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公正地对待卡特总统，也必须指出，他在阿拉法特履行成交诺言问题上的经验，无疑地是他为什么不进行斗争以阻止以色列破坏美苏创议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个。经过考虑，我认为这是在阿拉法特头脑中不言明的思想，当他谈及万斯和暗指卡特时，如在第十八章所引用的，他说：“也许我们对他帮助不够……我不能肯定。”

在 1977 年夏天，法赫德王储由于阿拉法特未能履行成交诺言而发怒。在 1983 年春天，侯赛因国王由于阿拉法特未能履行成交诺言而发怒。一次是阿萨德独自阻挠阿拉法特玩他的政治牌。另一次因素是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阿拉法特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与阿萨德对抗外他别无选择，这一对抗为的是一劳永逸地决定将由谁来制定巴勒斯坦的政策——是控制一个多少是独立的巴解组织的阿拉法特，还是随着阿拉法特被免职或死去而控制一个傀儡巴解组织的一位叙利亚总统。就这样为在阿拉伯政治生活中两位伟大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设置了舞台。这两个人在 20 年的大半时间里相互处于交战状态。

顺便应该说的是，侯赛因因为阿拉法特无法履行成交诺言而发怒是短暂的，哈尼·哈桑到安曼去向国王通报。侯赛因被告知，他应当把他和阿拉法特的协议看成是“延期而不是取消”。哈尼还解释说，阿拉法特为了赢得巴解组织作出它自己的决定的自由，打算对抗阿萨德。从同哈尼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陛下对这消息感到很高兴，但是，对阿拉法特在与阿萨德对抗中能作为胜利者出现的前景感到怀疑。

1983 年 5 月初，在他自己选择的这个时间里，阿拉法特激烈地变动了法塔赫驻黎巴嫩部队指挥部的组成，以激发法塔赫的叛乱。阿拉法特新任命的是他的忠实分子，持不同意见者蔑视他们，说他们怯懦，10 天以后，持不同意见者指责阿拉法特在法塔赫内部进行了一次“军事的和组织上的政变”。他们说对了，阿拉法特在一星期后剥夺了持不同意见军官的军事权力。作为回答，他们宣布他们仍将留在他们岗位上以“纠正革命路线”。叛乱现在是正式的了。第二天，阿拉法特切断了叛乱分子的经费、食物和燃料供应。实

际上，他对他们说，“要么支持合法的领导，要么站到阿萨德一边。”这位主席做出他仍然有兴趣和叛变领袖和解的姿态，但实际上，他知道他们离开接受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案已经很远。如果他们当时要在他们四、五百名支持者的眼中保持他们的信誉，叛乱的头头们就必须战斗。而且更中肯地说，阿萨德将被迫支持他们，否则将信誉扫地。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和这位叙利亚总统之间的最后摊牌开始了。但是，发号施令的是阿拉法特而不是阿萨德。

阿拉法特从他在突尼斯总部来到叙利亚，并同判乱分子对抗，这使阿萨德十分吃惊，由于来到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法特多少暂时牵制了这次判乱。但是这并非他的主要目的。如同这位主席对我证实的，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对阿萨德说：“那么你现在将要做什么？”

6月24日，阿萨德作出反应，将阿拉法特驱逐出叙利亚——在头一天晚曾经试图杀害他。凑巧我和阿拉法特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大马士革。当他的贴身警卫允许我和他作伴时，这位被驱逐的巴解组织主席正在突尼斯航空公司的清洁袋上写笔记。但是，他的精神异常地好。当一位巴勒斯坦妇女从飞机后舱走来请求阿拉法特为她的婴儿祝福时，他是一个完美幸福的化身。这位母亲明显地感到，她是尽可能地接近一位神圣的人。这位单身汉的阿拉法特以一位有经验的、慈爱的父亲的专长，把孩子抱在怀里，轻吻他的双颊。他不是专门对谁在说，而是自言自语：“我的孩子……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几秒钟后，我们讨论阿萨德最近杀害他的企图。

阿拉法特头一天是在特里波利他们的总部和他的忠实部队在一起。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他被邀请去大马士革同阿萨德的兄弟里法特会谈，阿拉法特猜想，这是给他设置的陷阱，但是，他仍然应邀前往。有人告诉阿拉法特不会遇到危险，其中有一位苏联官员。

阿拉法特说：“告诉你实情，同里法特的谈话进行得很好。晚上我们分子时，里法特说，‘我要告诉我的哥哥，我认为，我们能够解决在你们之间的这个问题。’”阿拉法特相信里法特是真诚的，不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

阿萨德总统知道，阿拉法特不会像通常那样在大马士革睡觉，因为他有充分理由怀疑他可能不会活着醒来。总统设想阿拉法特当晚会回到特里波利，事实上，阿拉法特在大马士革躲起来了。但是，他确实派了一支小的护送车队返回特里波利——包括一辆会被误认为是他自己的装甲奔驰车，此后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说：“真不出所料。阿萨德的特别武装用机关枪和火箭弹袭击了他们以为是我的小汽车。我们损失了13名勇敢的战士。”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后来告诉阿拉法特，叙利亚攻击手中最先到达现场的人说：“我们追踪的不正是你们这些杂种嘛！”

当西方评论家们正在推测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垮台时，各种各样的巴解组织代表团被约定和阿萨德及他的部长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公开的报道是，双方都有兴趣寻找一个在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和解条件下，实现巴解组织团结的方案。实际上阿拉法特知道和解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楚，阿萨德是在利用这些讨论作为幌子，以便实现一项用子弹以外的办法来除掉阿拉法特的阴谋。经过几个月时间，轮流同每个人谈话，阿萨德提出把巴解组织的领导交给阿拉法特的三名最高级同事。第一个受到这项提议的是巴解组织的正式的外交部长阿布·卢图夫。第二个是阿布·伊亚德。第三个是哈拉德·哈桑。在每一种情况下，如同哈拉德·哈桑向我透露的，提议都是一

样的,如果巴解组织抛弃阿拉法特,阿萨德就同意和解。有些人认为,阿布·卢图夫被这一提议半吸引住了。还出现了这样的时候,某些阿拉伯政权催促哈拉德·哈桑去做阿萨德所希望做的事并罢免阿拉法特职务。

与此同时,阿拉法特正在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这将是 he 生平最大的赌博——迄今为止。9月,在未与他的任何一位高级同事磋商情况下,他乘船回到特里波利。他在那里实际上曾一度陷于困境。以色列人不让他活着从海上出去,阿萨德不让他活着从陆地出去。阿拉法特向阿萨德提出最后挑战。如同这位主席本人向我证实的,他对这位叙利亚领袖说:“我又在这儿了——要是你能够,就杀了我吧。”

阿萨德决定接受挑战,他命令他的将军们对阿拉法特在黎巴嫩的最后一个据点部署最后的冲击。但是,自然他很小心继续捏造他只不过是支持合法的法塔赫叛乱。

12月,当阿萨德杀向城市中心时,西方和其他评论家们正在写阿拉法特的讣告。这是一个他无法从中逃脱的陷阱。《观察家》中东问题专家帕特里克·西尔在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无线电访问记中,信心十足地预言阿拉法特将在几小时内完蛋。在同一节目中,即使持中立和同情态度的彼得·曼斯菲尔德也断定,巴解组织很快将有一个新主席,此人大概是叙利亚的傀儡。

接着阿拉法特向阿拉伯领导人挑战,特别是沙特领导人。事实上,正如他告诉我的,他对他们说:“你们对阿萨德有影响。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拯救我。我在请求你们作出选择。谁将成为巴解组织的领袖——是我,还是阿萨德?”

在第一批听到阿拉法特谈话的阿拉伯领导人中,有一位是沙特皇室中年长的很有影响的成员。这位人士正在科威特访问。阿拉法特要求巴解组织驻科威特代表奥尼·巴塔什作出安排,让这位沙特王子到巴解组织办事处收听来自特里波利的无线电通讯。在接通以后,阿拉法特问巴塔什,他应当如何坦率地讲话,当时沙特王子就站在一旁。巴塔什答道:“讲你心里的话,阿布·阿马尔,我们的朋友将倾听。”当这位王子拿起电话,阿拉法特把无线电话对准那里正在战斗的声音。然后他说,“阁下,我的流亡的人民正在死去……你能够制止这场屠杀!”

不管怎样,如果阿拉法特的领导机构中的所有同事们没有利用他们的力量,劝导沙特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向阿萨德施加压力,阿拉法特很可能已被击败和在战斗中死去,有阿布·杰哈德在他的身边,阿拉法特对他自己幸存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他的绝望的在数量上超过进犯者的战士的鼓舞。当阿萨德发起他的最后进攻时,他曾计算在8天之内消灭阿拉法特——4天窜犯难民营,余下四天,如果需要,从特里波利本身摧毁阿拉法特。但是阿拉法特的战士们进行了另一次英勇的军事抵抗,使阿萨德的计划成为泡影,并为巴解组织其他领导人赢得时间,创造另一次外交奇迹。

至少可以这样说,有很多原因使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向阿萨德施加压力停止战斗以拯救阿拉法特。一是仅仅因为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害怕阿萨德。在阿拉伯世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阿萨德的某些情报头目是这一地区的恐怖老手。多少年来,通过代理机构,他们曾经讹诈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以索取金钱或者政治支持,或者两者。一些叙利亚控制的恐怖集团常常只要发出一个死的威胁,就足够产生效果。但是,这些恐怖老手在很多场合使用暴力。作为在黎巴嫩的残害人的肢体罪的创造者,

他们比得上沙龙和他的同伙。当 1985 年 5 月 25 日试图夺取科威特埃米尔的生命时，许多着军装的阿拉伯人自动地认为，袭击者（地下的达瓦党的什叶派极端分子）是作为叙利亚的代理人在行动。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向阿萨德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自从 1975 年以来就需要他作为对伊朗疯狂的毛拉的一种遏制力量。显然，一个因素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整个解放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的传统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正如我曾试图表明的，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有这么一点想法，希望没有要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一位阿拉伯统治者几年前在和巴解组织一位高级领导人进行友好而坦率的谈话时说：“老实对你说，有好几次我希望大地会张开大嘴，把你们巴勒斯坦人吞进去。”尽管他没有用那么多字说它，他是在承认如果没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阿拉伯政权很早以前就能够并且会同以色列媾和。一旦

这种复兴发生，就暴露了阿拉伯政权无能纠正对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兄弟——造成的错误。从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看，亚西尔·阿拉法特时时在提醒着阿拉伯的软弱无能。

所有这些都强调，为什么阿拉法特真的用他的生命来冒最大的危险，非常沉重地置自己于阿拉伯领导人支配之下。最后，已解组织领导人提出的论点足以说服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向阿萨德施加压力。结果阿萨德像沙龙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被迫让阿拉法特溜掉。

但是，这仅仅是阿拉法特对危险的嗅觉，加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可能还有美国人的一些暗中帮助，把阿拉法特和他的 4060 名战士中的许多人在即将被杀害的最后一分钟拯救出来。一些以色列人正打算在 1983 年在特里波利去做他们在 1982 年在贝鲁特曾经试过并已失败的事。简而言之，有一个以色列计划要在特里波利消灭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尽管以色列政府在关于进行直接军事干涉是否明智问题上有深刻分歧，但这没有改变有一项进行这种行动的计划这一事实。当穆巴拉克了解到这一情况时，他通过外交途径平静宣布，对以色列破坏埃及和以色列和平协议的任何明显的武力炫耀，他将作出反应。他还说，埃及将要战斗。穆巴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秘密地劝说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运用他的影响对贝京做工作。我自己的推测是，美国人劝以色列人说，阻止阿拉法特逃脱或者杀死他，他们蒙受的损失太大，这才使形势发生倾斜，在此书写作的时候，关于这一事件的官方消息被所有有关政府列为机密。为此原因，我的巴解组织和其他提供消息者都不愿意引用他们的名字。

撤离本身，计划在 12 月 20 日，星期二，早晨 5 点至 7 点半之间进行。在同一天早晨破晓之前，以色列高飞的飞机向特里波利船坞和等待在那里的希腊轮船之间的水域扔下了许多水雷。这些水雷定于这次撤退进行时爆炸，预感到以色列人在“策划肮脏的勾当”，并使没有被围困在特里波利的他的不理解的同事们感到十分烦恼，阿拉法特由于争论协议中关于他的撤出的战士能带走什么东西而耽误了撤离。他告诉我：“水雷按计划爆炸了。如果我不改变离开的时间，我们将被炸成碎片。”

当阿拉法特驶离特里波利时，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记者评论说，巴解组织的一位被击败的主席正在进入“默默无闻”的旅程。没有要求举行最后的仪式，但是，阿拉法特已经完了。中东各地的记者向世界发出了同样信息。在世界所有重要首都的专家们持有相同的看法。不到 48 小时之

后，阿拉法特再次显示了他战胜灾难的雄才大略。如果他想教训一下这些宣传工具经常过低估计他，他不可能选择一个比这更好的或者更惊人的方式去做这件事。

在12月22日，这艘希腊船载着阿拉法特通过苏伊士运河停在伊斯梅利亚。这位巴解组织主席上了岸。在那儿正式迎接他的是埃及总理福阿德·毛希丁。他们一起迅即乘直升飞机直飞开罗。在那儿，阿拉法特满面笑容，拥抱了穆巴拉克总统。这是一个和好的姿态，它向阿拉伯世界以及更远的地方发出了惊奇和愤怒的冲击波。当时埃及是被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排斥的。阿拉伯国家政府和巴解组织仍然正式受到1979年巴格达首脑会议拒绝决议的约束。这些决议——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反应——表明，除非埃及承认它的做法错误，即放弃它和以色列的单独媾和，否则将不允许它回到阿拉伯大家庭的怀抱。阿拉法特既没有受到巴解组织也没有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委托去进行他的访问。这是他个人的外交的登峰造极。

除了埃及人自己之外，美国人是唯一欢迎阿拉法特的这一姿态的。以色列既怒又恨。以色列政府的一份声明说：“埃及欢迎杀人的巴解组织的头目是对和平进程的严重打击……巴解组织的存在和活动与和平相抵触……这个组织的最终消失是这一地区取得稳定与和平的先决条件。”沙龙则公开宣称，以色列应当使用军事手段阻止阿拉法特得被营救。

法塔赫叛变分子和他们的叙利亚操纵者的反应是不出所料的。阿拉法特证明自己是一个像萨达特一样的大叛徒。叛变分子警告阿拉伯国家政府“从今以后不要和阿拉法特打交道。”法塔赫叛变分子还第一次得到巴解组织中反对阿拉法特政治和解方针的其他左派团体的一些支持。乔治·哈巴什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名义，和法塔赫叛变分子一起，要求免去阿拉法特主席的职务。

多数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保持一种为难的沉默。在私下他们已经承认他们需要与以色列媾和的埃及回到阿拉伯大家庭。但是，他们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步骤，因为他们害怕激起阿萨德对他们的愤怒。所以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的沉默，决不是表示不赞同阿拉法特的作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幕后受到扰乱，并感到愤怒。

在同穆巴拉克戏剧性地和好后的两周内，阿拉法特事实上是处于真正的麻烦之中。当法塔赫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在突尼斯会聚时，阿拉法特的未来是大家争论得很多的问题。由于在同叛乱分子和阿萨德冲突中人员的损失，阿拉法特多数同事的情绪达到顶点，为拯救这位老大哥，他们又竭尽全力地进行了他们的外交努力。他们对阿拉法特采取这样的一项步骤而不同他们商量，非常生气，阿拉法特在他访问开罗之前只同一位高级同事商量过，他是在特里波利和他一起战斗的阿布·杰哈德。没有一个人比阿布·杰哈德更忠于阿拉法特，但是，当他得悉他的领导人想要做的事时，他的反应也是惊讶的。他告诉他在突尼斯的同事们，他曾请求这位主席在未得到集体领导同意之前不要会见穆巴拉克。

在阿拉法特未来成败未卜的这关键性的两周内，我和巴解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哈拉德·哈桑，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在同哈拉德·哈桑进行了一次专门的谈话后，我认为形势不利于阿拉法特作为主席生存下来。后来我得

出一个结论，如果他的法塔赫的高级同事中有任何一个人有接任主席的野心，阿拉法特就一定会被免职。阿拉伯国家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施加了很大压力。

阿拉法特本人没有低估他的主动行动会激起的愤怒。即使在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和朋友们的反应也正如他所料。在领导危机处于高峰时刻，他没有理睬要他返回突尼斯向他的同事们亲自进行解释。当一位巴勒斯坦朋友问他为什么拒绝去突尼斯，阿拉法特回答说，“如果我现在去，他们将会私刑处死我！”当这位朋友问及他平息这场危机的策略时，阿拉法特昂首望天，用他的两手做了一个姿态。然后他说：“我向天空扔了许多碎片。当我的同事们把它们收集起来时，他们将会是平静的，并准备好客观地就此进行讨论。”

真的，为什么这位巴解组织主席竟然要去开罗呢？

对阿拉法特来说，这是重要的，他应该借这第一次机会亲自感谢穆巴拉克总统，他在防止以色列破坏撤离和杀害许多撤离的巴解组织战士也许包括阿拉法特本人的行动中起了秘密的、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阿拉法特的意图，即对阿拉伯团结进行一次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正如他对我说的，他希望他的榜样能够鼓励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扔掉他们更多的约束，欢迎埃及回到阿拉伯行列中来。有许多只在嘴上号召阿拉伯团结的伪君子，阿拉法特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访问开罗的主要原因关系到巴解组织的生存。事实是，阿拉法特极其需要同唯一与以色列有特殊关系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好，以便给他自己——因而给巴解组织——打政治牌的余地。可供选择的办法不是如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所评述的进入默默无闻的旅程，但是，没有与埃及的关系，阿拉法特要从遥远的突尼斯来影响事态进展的能力将受到很大限制。而最近毕竟发生了这种关系。哈尼·哈桑是这样说的：“对开罗的访问，保证我们能够继续在阿拉伯舞台的中心占领我们的地位。”他的哥哥哈拉德说：“没有穆巴拉克给予他政治上的掩护，阿拉法特手中将无牌可打。他不想去阿拉伯国家，像一个乞丐那样跪下，那不是他的作风。”

阿拉法特从特里波利撤出以及领导机构正式认可他个人创议的开罗之行，标志着这位主席向阿萨德摊牌的第一阶段结束。他在黎巴嫩的难民遭受了更多死亡和更多痛苦，以此为代价，这位主席迄今得到了些什么呢？他实际上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他把阿萨德引到了前台，并迫使这位叙利亚总统表演，他为了阻止巴勒斯坦人自己作出决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西方记者和外国观察家们还在继续收买杜撰的消息，说法塔赫叛变分子和巴解组织其他持不同意见者在巴勒斯坦群众中得到大显支持；西方公众舆论（并且还有西方政府）的后果是，当阿拉法特和阿萨德之间的对抗进入第二阶段时，对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听到的经常是并且总体上是错误的消息。但是，在特里波利战役之后，拥护阿拉法特的绝大多数人明白了这一真理——阿萨德是在利用少数人的叛乱作为掩护以取消真正的巴解组织作为在中东和平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特里波利战役已经看到阿萨德的表演，他跟沙龙一样，要杀害巴勒斯坦人，多数巴勒斯坦人现在认识到阿萨德企图在沙龙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法塔赫持不同意见者对阿拉法特容忍他身边人的败坏行为第一次表达他们的愤慨时，他们得到相当多的人民的支持。但是，当叛变分子（及巴解组织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一经被看出是和阿萨德站在一起并帮助他从事他的肮脏勾当时，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信誉，并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心目中完蛋了。

1984年，阿拉法特的主要目标是要证实：他是用有巴勒斯坦人民自然多数的支持；代表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并为他们说话的是他的巴解组织，而不是阿萨德的巴勒斯坦傀儡；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这位主席的努力去寻求同以色列的政治的和互让的解决——在全面和平的框架内。必须指出，在多数人或亲信集团中，对美国和以色列是否能在公正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基础上真正有意实现和平，存有许多怀疑；但是这些合理的怀疑并不改变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阿拉法特站在一起的事实。

阿拉法特能够证明这些事情的唯一办法是召开一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认可他的领导地位并且赋予他所希望的委托去和侯赛因国王制定一项共同战略。这是阿拉法特的宣告，他要求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召开会议，标志他和阿萨德摊牌的第二阶段的开始。至于叙利亚总统一方则决心阻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只要阿拉法特仍是巴解组织主席。据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同事们说，阿萨德曾信心十足地对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美国国务院预言，到1984年11月底巴解组织将要有一位新的主席。（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确曾相信，阿萨德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在1984年夏天，许多阿拉伯记者反映他们从官方来源所获悉的消息，告诉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正等待在年底之前欢迎巴解组织一位新的主席。）这含意确实是十分清楚的。在1984年一个较早的关键时刻，阿萨德如果无法说服阿布·卢图夫或阿布·伊亚德、或哈拉德·哈桑免去阿拉法特主席的职务，他绝对确信他的射手将会成功地杀害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和阿萨德之间摊牌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在外交领域进行，而且多数是在幕后活动。当这场斗争开始时，阿萨德相信，他握有两张王牌。

第一张王牌是，他拥有能力运用他的影响拒绝向第十七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提供会址。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之外，他们显然必须要在一个主权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上召开他们的流亡议会。这意味着（正如往年那样）除非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同意作为主人，提供它的首都或者该国其他地方作为会址，否则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就无法举行。

在1984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阿拉法特本人对会址的第一选择还是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人惊人地妥协了。作为少数几个具有真正革命资历的阿拉伯政权之一，它愿意成为第十七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东道主。但是，它的领导人受到阿萨德方面的巨大的压力。他最后用了一个论点来压他们，这个论点听起来似乎非常有理，但是它实际上缺乏实质性意义——未来的事态将会证实。根据我来自巴解组织的消息，阿萨德对阿尔及利亚人用的论点如下。按照现状来看，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将是巴解组织被分裂成两个多少是相等的和可以生存的部分。这样一种分裂将给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阿尔及利亚人一定不希望在他们的双肩上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他们不愿意，而阿萨德似乎是赢了。

9月，我和阿拉法特在突尼斯坐在一起。我们，作为朋友而不是作为作家和采访对象，在讨论形势。他知道，我十分了解他的巴解组织是真正代表并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说话的，但是，我说，那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继续说：“因为外部世界不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得出结论是你无法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因为你不再博得多数的支持……而且因为你在西方享有的一点信誉正在受到侵蚀。”阿拉法特的脸上没有关切的明显表情，他说：“是的，我知道。我懂得你所说的意思。事情是这样的。”在谈话停顿的间

隙，他和他的两位同事交换了一个阴谋家的眼色。当他再次转向我时，我可以看到他眼中闪耀着胜利的光芒。“我愿意告诉你一个秘密，”他说，“侯赛因国王陛下已邀请我们在安曼举行我们的巴勒斯坦全坦国委员会会议。”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国王发出邀请是一个信任和勇敢的行动。就在我们谈论的时候，阿拉法特的看法是侯赛因受到阿萨德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他撤回这一邀请。但是，还有另一种考虑，如果侯赛因顶住了压力，阿拉法特将必须配合这位国王的勇气，说服他的支持者将安曼作为会址。感情多于政治理智，不是所有阿拉法特亲信都能轻易地忘却过去。但是，我让这位主席相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能够在安曼召开。当我们分手时，我说，如果你在约旦召开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你将不仅击败阿萨德，你还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因为西方最终将得到这样的信息，你是一位和平人士，并且能有作为取得支持。阿拉法特笑了。“但愿如此，”他说。“但愿如此。”

根据我从巴解组织得到的消息，阿萨德一时惊慌了。他飞往阿尔及尔，提出如果阿尔及利亚能够坚持巴解组织的所有团体，当然包括叙利亚的傀儡组织，都得参加的条件，他将撤回在阿尔及尔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反意见。在此基础上，阿尔及利亚向阿拉法特确认它的邀请。但是，这位主席不是别无选择。他不是必须接受条件的。他在他的口袋里还有一份伊拉克的邀请。（早些时候，伊朗的毛拉曾提供德黑兰作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的会址。正如他本人告诉我的，阿拉法特在答复他们的发言人时说，他可以考虑这一邀请，只要伊朗准备同意停火并同伊拉克谈判。）

11月12日，按照巴解组织宪章的要求，阿拉法特提出正式请求，第十七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安曼举行。阿萨德这时被迫打出他认为他的第二张王牌。如果他能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阻止至少1/3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能够活动的代表前往安曼，巴勒斯坦的流亡会议就无法召开。如果会议在不到1/3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召开，那只不过是阿拉法特亲信分子的聚会，没有宪章所规定的作出正式的和有约束力的决议的权力，在那种情况下，阿拉法特将成为失败者。阿萨德相信他有能力不让阿拉法特达到他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于是，这就成了一场数字斗争。在理论上，有564名代表的1/3出席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就可以合法召开。但是，这些席位中有181个分配给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下的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将不允许在他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代表出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由于以色列禁止他们参加，这181名被占领土的代表就被认为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不能活动”的成员。剩下的是383名“能够活动”的代表。这意味着阿拉法特需要255名法定人数。

直到11月20日，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宣布开会的前两天，阿萨德仍然信心十足地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西方保证，阿拉法特将达不到法定人数。在几天时间之内巴解组织将会有一个新的主席。阿萨德的信心是他采取三个步骤以保证1/3以上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能够活动的代表不会出席安曼会议的结果。

第一个步骤不需要费力。阿萨德只是警告在他控制下的法塔赫叛变分子和巴解组织的持不同意见团体中的代表，如果他们胆敢参加安曼会议，他们将完蛋。第二个步骤需要费点力气。叙利亚当局没收在11月12日以后仍然

住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他们住所中的亲阿拉法特的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的护照。第三个步骤需要费更多的力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当时主席是哈拉德·法胡姆。他住在大马士革，很久以来就以他的亲叙利亚观点而闻名。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的同事们出于政治上有利的理由，原先一直表现迁就。11月12日，法胡姆以他的正式身份，拒绝阿拉法特提出的在安曼举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请求。按照事情正常的进程，应该是法胡姆作为主席发出邀请。当阿拉法特行使可选择的但符合宪章的程序，要求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时，法胡姆却去为他的真正的主子——阿萨德——工作。他给很多在阿拉伯世界或更远地方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打电话。他给他们每个人讲的话都一样：阿拉法特没有可能达到法定人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可能合法召开。在这个基础上，法胡姆劝告代表们不要浪费时间旅行去安曼。他还提出一个论点，说什么获得巴解组织所依靠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支持的是阿萨德总统，而不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含义是清楚的，继续支持阿拉法特将会疏远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有些接到法胡姆电话的人坦率地说道，他们献身于阿拉法特和他所代表的事业，应当要去安曼。其他一些人声称，他们本人尚未作出决定。但是，更多的人则说，他们在聆听了法胡姆的谈话之后，接受他的劝告，不去参加。法胡姆在这些电话谈话和他所收到的保证的基础上，向阿萨德提交了一份肯定缺席者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上，阿萨德又增加了那些被他吊销护照的人以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中的法塔赫叛变分子和巴解组织中其他持不同意见者的名字。全部加起来总数超过了阿萨德所需要的阻拦会议的1/3的数字。他自己确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将无法召开，他已经击败了阿拉法特。哈尼·哈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阿萨德并不知道。相当多的代表告诉法胡姆，他们不准备去安曼，是为了安全和策略原因。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得到了他们的机票。其他一些人一放下电话机就去订他们的飞机座位——曾在电话里对法胡姆说他们将不去！”这似乎是为什么阿萨德的第二张王牌原来是一张百搭的主要原因。

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召开前的一个星期，哈拉德·哈桑告诉我，正式的领导人员正期待着“法定人数加10人”。结果，阿拉法特在第一天就得到了法定人数加6人，而且还有许多代表稍后到达。晚到的人在叙利亚大使和情报人员能够施加影响的阿拉伯国家机场上，遇到了过境的麻烦。

单独就数字来说，它仍然看来好像阿拉法特仅仅勉强得到了关键人数。就需要2/3多数以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和赋予它的决议以合法权威来说，情况是这样。但是，数字决不反映对阿拉法特支持的真实程度和对他的政策的普遍信任。如果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564个议席全坐满了——换句话说，如果所有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都能自由地来到安曼，他们当中不少于500人，而且或许更多，会认可阿拉法特的领导。如果以色列人聪明一点，帮助促进巴勒斯坦人的温和和现实主义，那么有一个人会到安曼出席会议，他就是伯利恒市市长伊莱亚斯·弗拉吉。弗拉吉市长是公开要求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解的最早的巴勒斯坦人之一。在第十七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前夕，他对记者们说：“被占领土的绝大多数人民是赞成在安曼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反对的是一个小的极端主义的少数派，凡是摆在桌面上的东西，他们总是要反对的。”弗拉吉市长是正确的。

直至今今天，许多西方报纸和其他宣传机构仍然坚持大肆夸大巴解组织队伍分歧的意义，宣传媒介不时提到“阿拉法特派别”，包括我所写到的英国广播公司也是这样。这里明白的含义是，一个派别差不多同另外一个派别一样。就是说，反对阿拉法特的派别在巴勒斯坦人民群众中，多少享有同这位主席和他的中坚力量法塔赫组织享有的同样的支持。那是一派胡言，当然，要对人民真正支持的那些在解放运动中反对——或者他们说反对的——阿拉法特政治和和解方针的人设置一个精确的计量标准，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这么说的一个估计，阿拉法特的政治对手代言的巴勒斯坦人不超过 10%。或者更少。如果你问有多少巴勒斯坦人真正相信阿拉法特政治和和解方针会取得成果，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不禁想到，宣传工具多年来拒绝公正地对待阿拉法特，已成为在西方取得了解的主要障碍，并且因而也是谋求和平本身的主要障碍。

第十七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回答了谁将制定巴勒斯坦政策的问题。阿拉法特现在可以自由地和侯赛因国王谋求一项联合行动——假定权威的巴解组织和约旦能够找到足够的共同点。到这一地步，可以说，阿拉法特是在同阿萨德摊牌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阿萨德为破坏约旦—巴解组织创议能干些什么和会做些什么的问题，则是以后的事了。

如果约旦和巴解组织将在一起工作并有机会说服美国人支持他们的努力，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侯赛因国王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概括地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国王要求召开一个有所有各方都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来商定，这包括巴解组织以其本身名义但作为一个与约旦在一起的联合代表团的一部分。）这对他的多数巴勒斯坦听众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些听众包括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在被占领土、约旦、叙利亚及其他地方在电视机前注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进展的人们。但这位国王坚持必须以联合国 242 号决议作为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谈判基础，这是坏消息，或看来当时对阿拉法特的亲信来说是坏消息。然而，这位国王很明智，他给巴勒斯坦人一个选择。他说：“如果你们发现这一选择是可信的，我们准备和你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并向全世界提出一个共同创议，我们将为此聚集支持。如果，在另一方面，你们认为巴解组织有能力单独干，那么我要对你们说：‘祝愿成功，你们将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决定由你们去作。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将尊重它。’”

这是一篇慷慨而又明智的演说，带有许多需要破译的间接表达的音信。侯赛因在第一次公开告诉美国人、以色列人（和阿萨德），再也不可能把巴解组织排除在谋求和平进程之外。假定阿拉法特能使巴解组织按上述条件和约旦一起工作，侯赛因以此为依据实际上在说，虽然巴解组织作为同约旦在一起的一个联合代表团的一部分，如在会议桌上得不到席位，那就不会有谈判，因为没有巴解组织参加约旦不会参加。这位国王正在作出保证，使巴解组织在会议桌上有其席位——当然，假定美国人和相当多的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能光荣接受的条件的基础上有意于和平。在这场冲突的 38 年中，侯赛因终于找到一个办法诱使以色列人摊牌。

在国王演说后的几个小时，阿拉法特似乎又一次遇到麻烦。他要说服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托他和侯赛因一起工作，这项任务将更为困难，或许不

可能。许多巴勒斯坦人、代表和其他人士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位国王正以他的支持为代价要求他们接受 242 号决议，这样使他们在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之前先承认以色列。事实上，这第一个印象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情绪激动的气氛下，加之过去给予他们的痛苦的回忆，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代表和其他人士不能确切地把握侯赛因对他们所作的奉献和他期待他们的回报。许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忽视了侯赛因实际讲话的要旨，他们自己谈论，陷入了一种如同哈拉德·哈桑后来所描绘的“消极情绪”。阿拉法特对此的回答是先发制人的进攻。他辞职了。在以后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大批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平常在巴解组织政治生活中并不活跃的巴勒斯坦人士，来到阿拉法特下榻的旅馆房间里会见他，恳求他改变主意。谁也不会感到惊奇，他同意了。这就是他如何保证他能够得到和侯赛因一起工作的委任的。

多数外国观察家很容易相信，这所发生的一切全是“阿拉法特剧作”的一个片断。但不仅仅如此。在同这位主角本人和他的许多高级同事谈论过这次演出后，我相信，阿拉法特如得不到委托他和侯赛因国王一起工作的保证，他不再会承担领导的重任了。

在巴解组织领导人和侯赛因之间，在这位主席和他的领导成员之间，讨论了几个星期，于 1985 年 2 月 11 日在安曼达到了高潮。那一天，这位主席和这位国王签署了一个为和平而共同工作的历史性协议。协议基于“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思想——这句话是阿布·伊亚德在第十七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要求代表们深思的。正如哈尼·哈桑详细向我解释的，巴解组织和约旦协议的实质和在签署这一文件时巴解组织的说明，是这样说的：“世人必须理解，由于许多原因，巴解组织不能接受 242 号决议并以此表明不能承认以色列，除非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然而，我们准备在一个国际和平会议的保护下，使 242 号决议起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能接受以下谈判目的：第一，如同 242 号决议所要求的，以色列从 1967 年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第二，在西岸与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与约旦成立邦联；第三，所有国家，包括在与约旦建立邦联中的巴勒斯坦国，承认以色列在安全有保障的边界内生存；第四，所有有关各方，同意继续讨论所有重大问题，并以和平、民主方法谋求解决。”协议表明，侯赛因没有要求巴解组织突然 180 度转变并说接受 242 号决议已不再成为问题。国王所要求而现在已经得到的是，巴解组织承认 242 号决议的原则和精神——土地换取和平。为了所有实际的目的，巴解组织因而在联合国所有有关决议的范

围内接受 242 号决议作为谈判的基础。

概括起来可以说，1985 年 2 月 11 日，约旦和巴解组织共同敞开了谈判的大门，其条件不是讲道理的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所能够拒绝的。到 5 月底，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帮助下，侯赛因使里根相信情况确实就是这样。1985 年春天，在法赫德国王带头下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接踵访问华盛顿。尽管他们所有的人由于不愿激起阿萨德的报复，抑制住自己不发表明确的公开的声明，但他们每个人都给里根带去同样的信息：如果美国人不作一些有助于迫使以色列积极响应约旦—巴勒斯坦协议的事，使阿拉伯温和派生存下去，那么西方在中东将失去一切。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取得胜利后，是哈尼·哈桑协调巴勒斯坦人的努力，获取沙特阿拉伯对真正的巴解组织的明确支持。当阿拉法特重新得到沙特支持一事已经明朗化时，叙利亚特务在

哈尼的住宅外面放置了一个 40 磅的炸弹。

对于侯赛因关于约旦和巴解组织一起准备进行谈判的消息，里根是在 5 月 29 日他和这位国王在白宫一起举行的一次临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作出第一个公开反应的。当侯赛因迫于记者压力要求他解释为什么把他的协议称为和平的“最后机会”时，是这位总统——在他们说不再提问之后——回答的。他说：“我认为寻求和平条件从来没有比现在这样的条件更好。谁知道这些条件今后出现时是否能像现在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要用‘最后机会’这个词的原因。而且我想我们应当牢记这也许是最后机会。”后来里根知道侯赛因在代表阿拉法特说话，他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他希望国王“勇敢的前进步骤”能导致年底有关各方之间的直接谈判。声明还说，“我们将作出我们的努力以促使其实现。”

白宫记者招待会逐字逐句的抄本，全文登载在《约旦时报》，1985 年 5 月 20 日。（原书日期似有误。——译注）

第二十章 “最后的机会”——抓住还是放过？

有几个星期，里根政府似乎是认真地表示了这个态度，想要利用约旦—巴解组织协议作为推动和平进程的工具。阿拉法特本人甚至也声称，他对侯赛因在华盛顿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

这位国王返回安曼后告诉这位主席，国务卿舒尔茨业已同意一项三阶段的计划，以创造条件使美国能够接受巴解组织作为谈判一方，并在此基础上和它打交道。第一阶段将举行一个由助理国务卿墨菲和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参加的会议。如果举行了这一会议并取得成功，第二阶段就是要阿拉法特发表一项声明。在声明中，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将表明接受联合国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以承认在 1967 年边界内的以色列。简言之，阿拉法特将被要求由他本人公开说明，他和侯赛因 2 月 11 日协议所含的意义以及他授权这位国王在华盛顿代他表达的内容。如果阿拉法特发表的声明对美国人来说是可接受的，墨菲将奉命在安曼和他会见。那将是第三阶段。换句话说，美国正式承认巴解组织就像是侯赛因手上悬着的一个奖品，在阿拉法特和他的领导集团的同事们面前摇晃。

这位国王还告诉阿拉法特，他在努力说服舒尔茨，同以色列谈判要在一个有关各方——包括苏联——都应被邀参加的国际会议保护伞下进行，这方面曾经取得一些进展。（侯赛因和阿拉法特都坚持要在一个国际机构下进行谈判，因为他们知道，苏联将利用它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代理人，来破坏苏联人被排除在外的任何和平进程。至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自己一方，他所担心的则是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会受美国的引诱同以色列单独媾和，像萨达特所曾做的那样。转过来，这正是为什么阿萨德为试图阻止阿拉法特同侯赛因达成一项和解，干了那么多的事，和为什么他现在毫不停顿地去破坏这一结伙和诋毁阿拉法特。记住艾奇尔·劳罗号这个名字。）

1985 年 5 月在里根政府方面，看来像是一项现实主义态度的新的见识实际上是与它对协议重要性的第一次评价是一致的。回溯在当年 2 月，在侯赛因和阿拉法特签署这项协议后刚刚三天，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就曾对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唐·奥勃道尔弗在内的一群记者们说，约旦—巴解组织协议是在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取得理解不指名这位官员的条件下，此人后来又说了以下的话：“以前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巴勒斯坦方面的承诺。现在有了。”

当阿拉法特和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们已经领会侯赛因关于他的华盛顿之行的报告时，他们准备从好的方面去看舒尔茨，并且继续设想他是认真地把巴解组织卷入和平进程的。但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不是天真的。他们十分清醒，里根政府就像它的自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所有前任一样，一旦事情进展艰难，可以屈服于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

美国人对拟订中的在墨菲和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之间的会晤强加了一个条件，阿拉法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被挑选参加这一会晤的巴勒斯坦人不能有巴解组织的成员。阿拉法特这位务实主义者接受了这一条件。他别无选择。到 7 月中，他通过侯赛因支给美国人一份七个人的名单，要求美国人从中挑选和批准四个人。鉴于将要发生的情况，这是值得特别提到的，美国人曾经事先说过并记录在案，一旦他们通过了参加会谈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单，将不允许以色列否决他们。

到 8 月的第二个周末，里根政府表明，巴解组织提名中的四个人是可以接受的。这 4 个人是：哈纳·西尼奥拉，他是受人敬重的东耶路撒冷报纸《黎明报》的总编辑，一位多年来主张同以色列对话的提倡者；法伊兹·阿布·拉赫曼，他是一位律师，用政治术语来说，是加沙的一位无足轻重的人；亨利·卡唐，他是一位成熟的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官，多年来一直居住在巴黎；纳比尔·沙阿斯，他是立足在开罗的一位企业家，阿拉法特的一位前顾问。美国人曾向以色列承诺除非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他们将同巴解组织人士会谈或会见，在这一方面，这四个人中只有纳比尔·沙阿斯对美国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沙阿斯是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个流亡议会是巴勒斯坦方面最高决策机构。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机构决定着巴解组织和它的主席所要奉行的指导路线和方针。美国人说，沙阿斯“属于我们所曾经提出的界定非巴解组织成员的这个范畴之内。”以色列人和在美国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不同意。他们说，从实际目的来说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同一恐怖主义机器的构成部分。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院外活动集团争辩说，在这一基础上，如果墨菲同这样一个事先提交名单的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会晤，美国人将是自食其言。

有一个星期左右，看来好像里根政府在打破传统，不让以色列来决定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墨菲本人急于要使会谈开始。在国务院多数高级官员和顾问们的强烈支持下，他催促他的上级为这次会见向他开绿灯。墨菲对舒尔茨说，如果他们不遵守他们对侯赛因的承诺，包含对阿拉法特的承诺，那就没有机会开始名副其实的和平进程。

在 9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美国主要报纸头版消息支持这种猜测，说墨菲很快要会见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然后众所周知的脏东西投击这位炽烈主张会见的人。以色列和它在美国的坚定的支持者们更多地是在私下而不是在公开，以他们惯用的伎俩和活力去进行工作。他们决心要使墨菲使命夭折，他们猜疑，或者他们认为，这个会晤旨在成为一个过程的开始，其最终能使美国承认巴解组织作为谈判一方。

对舒尔茨施加的压力是强烈的，但是，这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没有能够一切都随心所欲。一些在美国的最富有的和最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他们都是美国公民——作出了他们自己的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影响、左右这位国务卿。这些人中的一位与舒尔茨平素关系很熟，见面时称名不称姓，他安排了一次与他的会晤。像墨菲在他们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使态势不允许以色列否决沙阿斯，扼杀即使里根总统也曾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最后机会”。舒尔茨被提醒，沙阿斯是一位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非常文雅和富有经验的人士。更关键的是，当阿拉法特冒着他的信誉和生命危险，在 70 年代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陈述和以色列和解的主张时，他曾经做了很多工作来影响和支持阿拉法特。传给舒尔茨的信息是一清二楚的。如果由于害怕冒犯以色列和它的院外活动集团，美国人不能使自己同一位有着沙阿斯这样一个温和主义者和和平缔造者资格的人士会谈，那就没有希望了——现在没有，永远没有。

但是，舒尔茨没有被说动。正如曾经会见舒尔茨的一个人后来告诉阿拉法特，这位国务卿已失去了勇于顶住以色列和它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意志。而且，这或多或少是墨菲转达给侯赛因和穆巴拉克的特使的信息，当他们请求他再一次尝试说服他的主管，使他有所领悟。墨菲实际上被迫私下告诉他的朋友，他无法“转告第七层楼”（指国务院舒尔茨的办公室）。

外交家们和其他拥有内幕消息的人们相聚讨论墨菲使命夭折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讨论的地方人们这样说道，感到绝望的不只是侯赛因、穆巴拉克、阿拉法特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根据来自被称为耶路撒冷的喉舌深处的内部消息，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也在私下十分愤怒。据说，他曾对他的亲密朋友说，舒尔茨是一个“大笨蛋”，他已经“使这件事告吹了”。报刊报道说，舒尔茨应该做的是给以色列造成既成事实。换句话说，舒尔茨应该派墨菲去安曼同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会晤，同时阻止公开报道直至会见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在以色列会出现一场危机。佩雷斯领导的脆弱的联合政府的团结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联合政府的利库德集团那一半会谴责美国的行动是出卖。但是，佩雷斯是非常清楚，或者据认为是非常清楚，以色列从墨菲和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会晤中，一无所失，可能是得利良多。如果这项会晤举行了，而且如果阿拉法特随后不能发出他承诺发表的声明，以色列不难使世界相信，这位巴解组织主席无力履行诺言，因而他是一个不能期望以色列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如果这项墨菲会晤真的举行了，而且阿拉法特真的随后发出了他承诺发表的声明，那么一个全新的形势会出现——佩雷斯会选择进行一次选举，以得到一项委任去在谈判中试探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如果这样，佩雷斯可能得到赢得选举的最好机会，并以一个真正的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激起在以色列的这场内战，而这场内战，即使许多以色列人和其他犹太人也都担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以色列社会中现在正发生两极分化，那些反对任何形式和解的右翼顽固势力的极端主义正在增长。

佩雷斯发怒的众所周知的可靠的证明是，他认为在美国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变成了他的敌人。在他看来，或者根据可靠消息来源的报道，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已经变成“利库德院外活动集团”。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被称作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或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院外活动集团中的许多铁杆分子都已把佩雷斯看成为一名“叛徒”——因为他们相信，依我看他们这样相信是有充分理由的，佩雷斯准备在侯赛因和阿拉法特所能够接受的条件下媾和，如果他能找到一种不激起以色列内战的办法。（佩雷斯 1980年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贝京使西岸殖民化的目的是为内战创造条件，并以此防止今后以色列任何一届政府为谋求和平而撤退，按照我对这次谈话回忆，佩雷斯明确地说：“贝京清楚地知道，没有一个未来的以色列总理会作为下令犹太人军队向犹太人开枪的领导人被载入史册的。”）

在这一背景下，所报道的关于佩雷斯私下发怒的消息的重要之处是，舒尔茨允许以色列的强硬路线者和他们在美国的盟友终止墨菲使命，也许这除了对他自己之外，没有帮任何一个人的忙。这位国务卿可能已很好地保证他自己在办公室里过得更加舒服，但是，他却抽掉了在那些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脚下的小地毯，这些领导人不顾他们各自的内部问题正试图推进和平进程。

像通常的一样，在美国政府作出的又一个抉择失败之后，不得不作出最大努力加以挽救的是阿拉伯人。在阿拉法特的鼓励下，侯赛因和穆巴拉克率先努力，试图继续保持和平进程的活力。出乎许多观察家们预料，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或者当时似乎是这样的。

在9月中，撒切尔夫人正式访问了埃及和约旦。显然这次旅行是在墨菲使命被破坏之前早就已安排好的，但是，她到达中东的时间对穆巴拉克、侯

赛因和阿拉法特而言是太好了。在接近于完全绝望中，这位埃及总统和这位约旦君主准备请求撒切尔夫人采取一项英国人的主动行动以对美国人施加压力。在开罗和安曼，撒切尔夫人均被告知，就阿拉伯人所能看到的来说，美国的政策是对和平设置一系列障碍，一个障碍经过阿拉伯人的努力刚刚被排除，另一个障碍又立即在原地出现。

在开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说了许多话，足以表明她认为里根政府允许以色列和它的某些美国支持者否决墨菲同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会晤是错误的。关于代表团的巴勒斯坦这部分应包括谁的问题，撒切尔夫人说：“重要的是在那些名字中不应包括巴解组织的非常著名的人物，但是，它可以包括同巴解组织有联系的人，只要他们拒绝恐怖主义。”在撒切尔夫人看来，有“许多巴解组织的成员在前进的道路中反对恐怖主义”。她还说：“不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巴勒斯坦）代表团将要由巴解组织来选择。”

但是，在她出访的下一站，撒切尔夫人表明，她在如何使约旦—巴解组织协议中提出的倡议保持活力的问题上，是严肃的。在安曼的一次国宴上，她说，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这一地区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当然，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次日，在红海之滨亚喀巴的一次记者告别招待会上，这位英国首相抛出了一颗政治炸弹。她宣布她已邀请巴解组织执委会的两名成员去伦敦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会谈。这两位去伦敦的人——他们将作为去伦敦访问的一个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构成部分——将是穆罕默德·米尔希姆和史利亚·胡雷主教，前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教师、在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哈尔呼尔市前市长，后者是耶路撒冷的副大主教。“我们知道胡雷主教和米尔希姆先生是爱好和平的人，”撒切尔夫人说，“他们本人支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基础上的和平解决，并且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我知道他们在伦敦停留期间将重申他们的立场。”这一历史性的访问，计划在10月中或在此前后进行。

撒切尔夫人就她的决定作进一步解释，她说：“我希望这将被看作为支持侯赛因国王倡议的一项新的建设性步骤，这是它的目的。我希望这将有助于美国采取一项相似的步骤。”正如不少英国观察家指出的，这是对里根政府作的最明确的暗示，它必须停止制造困难，开始谋求和平。

大多数以色列的反应是可以预料到的。它们的手稿是可以由任何一个对这场冲突历史略有知识的人事先写成的。英国人好大胆竟敢给“一个旨在摧毁以色列国的组织”以鼓励，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以及当时的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正在美国。他指责英国“破坏和平进程”，英国人向这两名巴解组织执委发出邀请“沉重地打击了谋求和平的机会和那些为谋求和平而努力的人”。如果中东局势不是这样灾难性和这样危险，这位原犹太恐怖分子领袖的评论则是有趣的了。即使多数以色列人也不会把沙米尔看作是为谋求和平而努力的人。（在1986年10月，沙米尔根据联合政府阶议条款接替佩雷斯担任总理——这一事件被以色列最著名的前外长阿巴·埃邦描绘成为引入“结束光明的暗黑隧道”。）在有重要影响的以色列政府领导人中，只有佩雷斯选择作出一种有分寸的反应。为了明显的政治理由，他不得不谴责撒切尔夫人的决定；但是，就是在内阁，他只是说他不理解她愿意去会晤一个“今天仍在从事恐怖主义”的组织的成员，他的话没有超出这个尺度。虽然，这也许是他们方面一厢情愿，一些观察家，包括我本人，怀疑在佩雷斯的反应

中缺乏进攻性是否是一种信号，表明他暗中得到宽慰，有人正在作推动和平进程前进的事。在她发表戏剧性的声明之前，撒切尔夫人确实向佩雷斯通报她要说的内容。

巴解组织对撒切尔夫人支持姿态的公开反应自然是感谢的：但是，在私下，阿拉法特是谨慎的，甚至是忧虑的。他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更加了解，每当巴解组织正要在政治上取得重要进展的时候，他的敌人就要攻击——或者阻止巴解组织赢得新的政治条件，或者一旦成果已经取得，就使之化为乌有。正如所有西方政府所知道的那样，但它们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自从 1975 年以来，绝大多数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行动都是利比亚资助的、叙利亚指挥的、反阿拉法特的派别所干的。这些反阿拉法特的派别充其量没有获得超过 10% 的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在事情的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譬如，在 1982 年发生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采取这种旨在消灭阿拉法特和他领导集团中的同事们的企图，是因为巴解组织声称它已准备好谋求一项政治解决并开始受到西方认真对待，沙龙、贝京、沙米尔和他们这一类型的其他以色列领导人对此感到惊恐。在 1982 年夏，以色列当权人物的逻辑就像它的残暴一样清楚，它的推理发展像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再能够使世界相信巴解组织是个谋杀者的集团，而不是别的，那么这一天将会来到，即使我们的朋友也会要求我们和阿拉法特谈判。决不！让我们杀了他。”在 1985 年晚些时候，阿拉法特的第六感官正在告诉他，历史将要重演。

在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面前出现的第一个麻烦的警告，是在撒切尔夫人向胡雷和米尔希姆发出她的邀请不到一个星期，在他们预定到达伦敦之前近三个星期时来到的。阿布·尼达尔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宣称，如果他们不宣布拒绝接受撒切尔夫人的邀请，这两个人将被暗杀，这一威胁在阿拉法特总部受到认真对待，但是，比这威胁本身更严重的是它所暗示的意思。阿拉法特和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们非常清楚，阿布·尼达尔的组织受一个叙利亚情报部门的指挥——实际上是受叙利亚空军情报处指挥的。它的首领是穆罕默德·胡利将军。他是阿萨德总统最信任的同事和朋友。阿拉法特后来告诉我，来自阿布·尼达尔的组织的威胁是这一迹象的一个部分。它向他表明，阿萨德正在策划一些“非常肮脏”的事情使巴解组织主流派失去信誉，破坏它和约旦的关系和它所主张的东西。（再次记住艾奇尔·劳罗号这个名字。）

随后存在的问题是，为阻止巴解组织被认真地视作谈判的一方，以色列及其情报机构将作些什么。现在我可以透露，阿拉法特和领导机构中他的高层同事们预料以色列会在突尼斯攻击他们。

在撒切尔夫人向胡雷和米尔希姆发出她的邀请之前一个月，我和阿布·伊亚德在突尼斯曾共进午餐。在持续几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我提出以色列威胁升级，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反对巴解组织的问题。（考虑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习惯于跟踪以色列复杂政治形势的读者们应该了解一些佩雷斯和当时的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当时以色列工党中的两位最高级人物——拉宾是前总理——这两个人在理论上说来是站在一边的。但是，正如全以色列人都知道，事实是这两个人相互嫌恶。除了他们长期存在的个人方面的差异之外，现在加上这一事实，即佩雷斯已经变成——至少是在私下——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排除最后和巴解组织打交道的可能性——如果那是为了防止这个犹太国的分崩离析所必需的。而另一方面，拉宾是一个强硬路线者。我并不认为把他描绘成为工党的沙龙是不公正的。还值得

指出的是，正是拉宾，1967 年作为总参谋长，拟定了以色列光辉的战争战略计划。）1985 年夏天，国防部长拉宾经常誓言要以任何手段和在任何地方与恐怖主义战斗。当我审视拉宾的遣词用语时，我见到一种格调，它告诉我，他为了对阿拉法特进行一场特殊的打击，正在以色列和世界准备舆论。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大致从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和解和在约旦重新开设巴解组织各办事处——包括为这位主席设立的一个办公处——开始，在被占领的西岸，袭击犹太殖民者的次数有了显著增加。拉宾和其他一些以色列领导人向世界宣称，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应为这项暴力升级负责。拉宾曾经警告约旦，它不要认为给恐怖分子以庇护、安慰和尊敬，它自己可以避免受到惩罚。可是，宣称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要对暴力升级负责实质上是一个宣传谎言。就连一些以色列记者也曾经在出版物上说道，有充分理由相信 3/4 以上的对犹太殖民者的袭击，是由受挫折的巴勒斯坦个人进行的随意性的暴力行动。他们受以色列占领者的镇压和侮辱，陷入绝望之中。整个午餐期间，我和阿布·伊亚德讨论了这些和有关的事情的含义。为了把他的话引出来，我提出拉宾将利用在西岸的暴力升级来攻击在约旦的巴解组织，其目的也许是要杀害阿拉法特。我问阿布·伊亚德他对这样一个方案有什么想法。

他变得非常严肃。“不，”他说，“以色列人不会在约旦攻击我们。”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他们将来这儿攻击我们。”

这是我本人先前曾经考虑过并且否定了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我认为太奇异了。“你是认真的吗？”我问，“肯定的，即使是以色列人，即使是拉宾，不会走得这么远吧？”

阿布·伊亚德笑了。“或许你不了解你的以色列朋友，可是你还认为你是了解的。”停顿了一会儿，“是的，他们将来突尼斯攻击我们。事实上我们正等待着他们。”

10 月 1 日，在撒切尔夫人邀请这两位巴解组织执委去伦敦后的 10 天和在他们计划到达伦敦之前的两个星期，拉宾的喷气飞机轰炸了阿拉法特在突尼斯的总部，并摧毁了它。

按照阿拉法特和所有阿拉伯人的看法，这是一种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如果这位主席在以色列人袭击的时候正在他本人办公室工作，他会被炸成粉身碎骨。他在突尼斯时，他通常是在那儿。当这事发生时，他不在他的办公室，但是，他的 45 名工作人员和 25 名突尼斯公民被炸死了，还有 100 多人受伤。（总有一天阿拉法特肯定会披露他不在他办公室的原因。当炸弹落下时，他肯定不在许多记者所报道的那个地方——漫步在海滩上。这是阿拉法特本人告诉记者们的情节。但是，当他们要求他说明他的每分钟的行动时，这显然是他告诉他们别管闲事的一种方式！）

在拉宾否认他曾企图杀害阿拉法特或任何一个特定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之后，他告诉以色列议会外交事务和国防委员会，“最近增加的恐怖分子的攻击”使得以色列“别无选择”，只有攻击巴解组织的总部。拉宾所描述的作为“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是五天以前三名以色列人遭谋杀。这三名以色列人是两男一女，年纪都在 50 多岁，正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一个小船坞的游艇上。

直到今天，关于这三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仍是一个问号。以色列声称他们是“无辜的旅游者”，被法塔赫著名的第 17 部队的一个三人袭击队所杀害。

这支精锐的突击部队是由阿布·哈桑·萨位梅赫在 70 年代初组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阿拉法特，保护他的生命。巴解组织否认第 17 部队卷入拉纳卡的杀害事件，并声称这三个以色列人是莫萨德特务，他们正监视巴解组织设法用船只把人员和武器经过地中海运往黎巴嫩。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后来告诉我，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认证了这个被杀害的妇女是一名以色列特务，她曾经设置并引爆了汽车炸弹，于 1978 年在贝鲁特杀害了阿布·哈桑·萨拉梅赫。

使人不能相信这次拉纳卡杀害是第 17 部队所干的一个理由是，谋杀者之一是一个 23 岁的英国人伊恩·戴维森，来自泰恩赛德。戴维森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木工，他在电视图象上看到在黎巴嫩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惨遭屠杀，悲感流泪，十分愤慨，自己离家出走，加入了巴解组织。几位巴解组织领导人以后私下对我说，一个同情的但是本土出生的英国青年会成为阿拉法特的随身警卫部队的成员，或者是它审慎派遣的一支特遣队成员，那是一点也不可能的。当戴维森和这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向警察投降时，两名巴勒斯坦人中的一人对记者们大声叫喊。“我们不属于任何组织。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我们是被大家所遗忘的人，我们死了成千上万次。”我想他说出了真情。我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重新构成的认识是，正式的巴解组织情报来源确实证实他们所真正相信的至少有一名以色列特务——那名妇女。发现以色列特务的消息泄漏到法塔赫的成员中。从高层——也许从阿布·伊亚德或者从阿拉法特本人——发出命令，不得采取可能损害伦敦会谈的行动。在法塔赫普通成员中的一些人为这项命令感到沮丧和激怒。他们中的两人同戴维森决定采取自由人的行动。他们进行这种行动有利于拉宾。

对阿拉法特的积极方面来说——不说他的幸存——极少数西方记者把以色列声称的第 17 部队应对拉纳卡杀害事件负责看成是表面价值。更加中肯地说，很少有社论写作者接受以色列关于它为什么轰炸突尼斯的解释。在西方世界了解情况和有影响的人士中很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色列的强硬路线者试图破坏和平进程，因为在他们眼里，这项和平进程可能导致巴解组织被承认为谈判一方的危险。

在巴解组织一些领导人中辩论的一个题目是佩雷斯总理的作用。如果他真在巴解组织所能接受的条件下至少是一个潜在的和平缔造者，那么为什么他批准轰炸巴解组织总部？同样的问题也被许多外交家和其他关心的人士提出。接近佩雷斯的提议者向在华盛顿的他们的朋友提供的一个答案是，拉宾耍弄了一个非常粗暴的诡计。根据这项报道，拉宾曾经威胁，如果佩雷斯不赞同袭击突尼斯的计划，他要加入联合政府中的利库德强硬路线派，强行通过决议在约旦轰炸阿拉法特。

里根政府的同谋关系仍是讨论主题。阿拉法特本人公开宣称，白宫曾经事先获悉以色列袭击突尼斯，因而它是“这项暗杀我的阴谋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地说，里根政府确实知道以色列的军用飞机飞向突尼斯，并且可以命令它们折回。不难想象，飞机在地中海上空飞越 1500 英里，在某个地方加油——或许加以色列所声称的是在空中——而不被美国（还有苏联）雷达、卫星跟踪站和其他装置所识别。设想以色列飞机在它们长途旅程中的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受到美国人（还有苏联人）的跟踪，这是合理的。10 月 4 日，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的一份声明含蓄地承认此事。它说：“即使美国军队曾经跟踪这些战斗飞机飞越海上，在它们到达目标之前，也不能知道它们的最后目的地。”美国人对拉宾的目的不能作出敏感的猜测的说法，不值

得认真对待。在这方面，不能指责阿拉法特对里根本人对以色列袭击的第一个反应给予某种重视。这位总统说，他认为以色列有权袭击并且曾经“袭击了这个正确的目标”。

巴解组织和其他阿拉伯情报机构也声称，他们拥有在拉宾和当时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之间的一次电话谈话的证据——大概是苏联人提供的，他们从他们的空中的收听装置收集到的。在这次电话谈话中，据说拉宾已经思索这项袭击阿拉法特的三个可能的地区目标：萨那、安曼和突尼斯。当突尼斯被指名为可能的目标时，据说麦克法兰没说什么，对突尼斯开了绿灯。部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部分因为他们不愿意泄露他们的消息来源，阿拉伯人还不准备对他们所了解的这一敏感问题说出他们的想法。（麦克法兰随后辞去了里根政府的职务。但是，在 1986 年期间，他秘密旅行去德黑兰，装扮成一个牧师，持爱尔兰的护照，向当权的阿亚图拉奉献武器和军用零件以换取在黎巴嫩被拘留的美国人质的释放——这正是在美国奉行不同恐怖分子和那些赞助和支持他们的人谈判的官方政策的时候进行的。在涉及中东事务问题上，事实常常比神话更离奇。）

然后发生了由四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意大利游览船“艾奇尔·劳罗号”和船上一名坐在轮椅上的 69 岁的美国公民利昂·克林霍弗被杀害事件。这一次以色列试图归罪于阿拉法特本人。而实际上，正是由于阿拉法特停调的结果，由哈尼·哈桑代表他去执行，才使得这次劫持事件很快结束，仅有一个人丧命，而这四名劫持者则向埃及当局投降。叙述“艾奇尔·劳罗号”事件的全面的、不可思议的、惊人复杂的故事，要写另外一本书。在这最新版本的仅有篇幅里，我能介绍的只是以下情况。

在劫持事件后的两个月，阿拉法特告诉我他的结论是，巴解组织的一个小的派别的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巴斯显然策划了导致这次劫持的行动，他是一个“蠢人”。这是阿拉法特的问。阿拉法特说，阿布·阿巴斯曾经允许他自己被那些受叙利亚情报官员们指挥和控制的以前的巴勒斯坦同伙们所利用。叙利亚情报官员们的工作，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就是策划和协调由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敌对分子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使这位主席和他的巴解组织的主流派丧失信誉。现在考虑这点。

当“艾奇尔·劳罗号”事件这出戏正在展开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时刻，阿拉法特认为他能够毫无疑问地证实巴解组织已被叙利亚人，也可能被莫萨德，通过向反对他的巴勒斯坦或其他阿拉伯组织的渗入来从事某项活动。这一时刻的到来是哈尼·哈桑在开罗出现的结果。在一个旅馆的卧室里，他迫使阿巴斯把他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告诉他，特别是包括那些卷入“艾奇尔·劳罗号”事件的全部人员的姓名。（阿巴斯只是想利用这只船作为一个工具，使这四名游击队员能够乘船进入以色列发起一场袭击。劫持根本不是阿巴斯本人计划的一部分。）在哈尼所了解的情况的基础上，阿拉法特说服穆巴拉克总统把这四名劫持者用飞机送往突尼斯。阿拉法特正想在他们到达时讯问他们，直至他们屈服，然后将他们送交法庭受审。白宫里根总统在电视摄像机前说，就他这位总统，所关心的而言，如果阿拉法特审讯劫持者是认真的，那是“好事”。埃及民航飞机载着四名劫持者和阿巴斯离开开罗飞往突尼斯。在美国的压力下，突尼斯当局拒绝允许飞机着陆。在地中海 3.4 万英尺高空，这架埃及飞机遭到美国 F14 雄猫战斗机截击，被迫降落在西西里岛。在那儿，美国军队奉命捕捉这四名劫持者和阿巴斯，如果需要，可以

武力从事。当意大利军队以强大兵力到达并且明确表示他们也奉有命令，如果需要就开枪射击，到这时美国人才撤退并让意大利人把这些巴勒斯坦人拘留起来。

关于美国人为什么劫持这些劫持者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只是里根和他的人员感到需要证实他们的“蓝博”证书。但是，阿拉法特有另外一种看法。他的结论是，那些尚未被发觉的人不希望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得到这些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因为他从他们那儿可能了解到的一切，能使他得以弄明白谁真正是这次“艾奇尔·劳罗号”劫持事件的主使者这个奥秘。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调查的结论。

作为“艾奇尔·劳罗号”事件的直接后果——和它被以色列人和各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组织以有成效的方式进行利用——包括这两名巴解组织执委在内的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伦敦会晤没有举行。英国外交大臣说，他取消了这次会晤，因为他经常得到“明确的保证”，胡雷和米尔希姆将公开地表示拒绝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而他们拒绝这样做（参见下文）。自然以色列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英国的这一说法。它是以色列人一贯说法的最后证明——巴解组织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暗杀者的集团。对世界来说，现在是懂得为什么以色列从不和它谈判的时候了。几乎没有人知道的这项英国说法，使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们能够制造一种有说服力的事例反对在和平进程中必须包含巴解组织代表，而这种说法远不是事实。

在突尼斯，巴解组织关于伦敦会谈为什么未曾举行的一份详细声明，由哈拉德·哈桑发表了。哈拉德·哈桑是巴解组织最有发言权的发言人，而且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是同侯赛因商谈约旦—巴解组织协议的人。当情况明显表明撒切尔政府要临阵脱逃并要指责巴解组织时，他还受阿拉法特指派，去负责处理这项伦敦危机。遗憾的是，哈拉德的详细声明的实质，至少在西方未能得到广泛报道。

首先，必须指出，豪所说的“明确的保证”是约旦人而不是巴解组织给予的。而真正的故事是，是在什么环境下给予这种保证的。

回顾这一事件，可以看到，伦敦会谈遇到麻烦是从“艾奇尔·劳罗号”被劫持时开始的。克林霍弗的被谋杀注定了会谈的夭折。（那些最终要对劫持和克林霍弗之死负责的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美国——当时我在那儿——杀害的消息引起了一阵席卷全国的歇斯底里风波。宣传媒介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质问并证明巴解组织有罪，且明显的影射阿拉法特本人有罪。在这十分激动和强烈指责的气氛下，里根政府向撒切尔夫人施加压力要她取消伦敦会见。对她来说，在国内方面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名以色列内阁部长。安姆农·鲁本斯坦教授，未经邀请径自飞往伦敦。他的任务是聚合在英国的各个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组织向这位首相施加更大的压力。（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美国公民，恰好是一位亲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当他开门进入他在美国西海岸圣安娜的办公室时，被一枚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他叫阿历克斯·奥代赫，有妻子和年少的孩子们。他是被一个著名的犹太恐怖主义团体杀死的。这个犹太恐怖主义团体是美国面貌的当代杀人魔王，在以色列很吃香。尽管奥代赫被广泛地看作是一位和平人士——他经常地公开地阐述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之间需要对话——但美国的宣传媒介大大

“蓝博”是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主角，扮演越南战争中美国一名敢冒惊险的特种部队队员。——译注

地忽视了他的死去和致死方式。)

在要求取消伦敦会晤的压力甚嚣尘上时，传说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企图顶住。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一个英国政府将不受以色列和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所威胁。或者因此说是在权力的走廊地带。但是，正是后来撒切尔夫人和豪的作为，使伦敦会晤被取消，并给了他们以指责巴解组织的借口或理由。

撒切尔夫人和豪起草了一项声明，或者说由外交部官员曾经为他们起草了一项声明，要求胡雷和米尔希姆在伦敦认可。在巴解组织准备同以色列谋求和平问题上，这项英国声明超出了巴解组织曾经同意的范围。但是，在一般论述暴力问题上，只要以色列仍然占领在 1967 年以武力夺取的土地，这项英国声明远远超出了巴解组织能说的范围。立刻在这方面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这项英国声明被转交给在安曼的侯赛因的顾问。声明的部分内容由约旦人在胡雷正要离开机场时转交给他。他没有时间和阿拉法特或者阿拉法特的任何一位高级同事进行商谈。一个比这位主教更有经验的政治动物大概会对自己说，“看来除非我进行磋商，否则我哪儿也不去。”米尔希姆在美国，在他到达伦敦之前，甚至不知道这项英国声明。在此同时，约旦政府给英国外交部“明确的保证”，胡雷和米尔希姆将赞同这项声明。巴解组织的一种观点是，约旦人正希望胡雷和米尔希姆在伦敦受到强大压力，一切都将如愿以偿。巴解组织的另一种看法——普遍的看法——则是，那些在侯赛因身边的一直反对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协议的人利用这一机会，确信如会晤不能举行巴解组织将遭到指责。

米尔希姆一看到英国的这项声明，他立即认为他不能赞同这样的一项声明。最大的问题是要使他和胡雷，因而也就是使巴解组织有责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暴力，不论它来自什么样的缘由。”暗含的意思是，英国政府要求巴解组织放弃巴勒斯坦人以武装斗争来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任何一个关心国际事务的人所本应知道，所有在被占领下的人民有采取武装斗争进行抵抗的权利。这是被明确载入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部分中的。

米尔希姆通过电话向阿拉法特作了简要汇报。这位主席随即指示哈拉德·哈桑和米尔希姆讨论对这项英国声明进行可能的修改。关于暴力问题，巴解组织准备好提供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即放弃恐怖主义，但是在恐怖主义和“武装斗争”之间作出区别。武装斗争正如为联合国所承认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英国政府不感兴趣。它对约旦人说，告诉巴勒斯坦人，他们应该原原本本接受或者拒绝这项英国声明。

最后，由于“艾奇尔·劳罗号”被动持和里昂·克林霍弗被谋杀所造成的政治压力，撒切尔夫人没有勇气完成她开始的行动。她不是给和平进程注入新的生命，而是给了它一个死的吻。

对那些在美国和西欧正在指挥以色列的反对巴解组织的进攻的外交家、官员们和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组织来说，劫持“艾奇尔·劳罗号”是最高等级的宣传奖品。正如托马斯·弗雷德曼在 10 月 17 日《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以色列的官员们感到他们已把阿拉法特“击倒在拳击台的栏索上”，他们将很快能够对他的威望和信誉发出致命的一击——这一击“将一劳永逸地把他永远逐出和平进程”。

当时有强烈的暗示：以色列著名的情报机构掌握着有力的证据，证明阿

拉法特本人曾经批准截获这艘意大利游览船的计划，这个证明支持了以色列的指责。但是，它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以色列反对阿拉法特的说法除了凭借联想罗织的罪行以外，一钱不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以色列军事情报处主任艾赫德·巴拉克将军被问及他是否实际上真的掌握了阿拉法特与劫持“艾奇尔·劳罗号”有牵连的任何证据。他的回答是没有。但是，他接着说，阿巴斯先生在突尼斯的办公室“离开阿拉法特先生的总部只有 100 码多一点”。巴拉克于是说，假设以色列知道巴解组织的工作方式和“阿拉法特先生同阿巴斯先生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阿拉法特知道截获‘艾奇尔·劳罗号’的计划”。

巴拉克在这具体问题上的辩解和以色列一般性的断言引起了一个正当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假设阿布·阿巴斯是巴解组织执委会的一位成员——这是由于他是巴解组织中亲阿拉法特的一个小派别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一翼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位主席不知道阿巴斯的计划？他在“艾奇尔·劳罗号”船上偷带四名游击队员目的在于到达以色列时发起进攻？（在这问题背后的假设显然是，所有由巴解组织制定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是经过集体领导同意的。）我以最直率和尽可能直接的方式向阿拉法特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直率的回答是，假如巴解组织约定的准则得到遵守的话，会员组织进行军事行动不必经集体领导讨论或者得到批准。这项约定的主要准则是，军事行动必须限制在对以色列的和被以色列在 1967 年所占领的领土上的合法目标。

我自己的结论是，阿拉法特关于劫持“艾奇尔·劳罗号”的共谋推测是得到事实支持的。我不怀疑，阿巴斯是阿拉法特所描绘的那样一个“蠢人”。他被他过去的巴勒斯坦伙伴所利用，而他们又受叙利亚情报官员们的指挥和控制。这项行动的目的是使阿拉法物和巴解组织丧失信誉。我还必须说，如果莫萨德通过它对叙利亚情报机构的渗入卷入此事，我对这将毫不感到惊奇。在劫持事件发生时，我在美国，一位资历很深的参议员告诉我，他根据自己极为可靠的消息来源，很肯定以色列的特务曾经在他叙述的“艾奇尔·劳罗号”中起了作用。这俭参议员是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以保证为再次当选获得资金的许多人士之一。在西方世界首都，许多外交家和其他政府官员们持有同样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说出他们在私下的看法，因为以色列的代理人 and 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组织到处都在进攻中。

阿拉法特和他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在评价“艾奇尔·劳罗号”事件破坏他们声誉一事中，是从现实出发的。他们对它如实看待——一场对巴解组织政治上的和公众关系方面的灾难。当埃及飞机载着阿巴斯和这四名恐怖分子飞向突尼斯时，这位主席用以证明巴解组织被用来从事某项活动的所需要的铁的证据，被美国人从他的手里抢走了。（事后泄露，奥利弗·诺斯中校是里根这一行动的“蓝博”。）

“艾奇尔·劳罗号”事件之后，阿拉法特有两个主要的相互有联系的关切的事。第一个是，以色列和里根政府会利用巴解组织信誉的失落，在寻求推进和平进程中牺牲巴解组织。换句话说。他不希望“艾奇尔·劳罗号”事件造成的反巴解组织的情绪给里根政府以口实或刺激，以彻底抛弃在和平进程中把巴解组织作为约旦一个伙伴的思想。

阿拉法特的第二个主要关切的事是，一个由西蒙·佩雷斯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也许会提出一项动议，通过领土妥协的方式提供足够的东西以引诱侯资

因在没有巴解组织参加的情况下进入谈判，假设他这位国王能够安排这一行动所需要的广泛的阿拉伯的保证。

在劫持“艾奇尔·劳罗号”后几个星期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变化，使阿拉法特看到，以色列、美国和一些他的所谓的阿拉伯朋友，确实在密谋策划把巴解组织从和平进程中排除出去。早期的警告信号也出现了，一个灰心丧气的侯赛因为了保护他自己和美国的关系，决定抛弃巴解组织作为一个谈判伙伴，这将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是，里根政府破坏邀请阿拉法特出席纪念联合国大会成立 40 周年在纽约举行的庆典。八十多位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许多特使已经接受邀请出席定于 10 月中举行的这项为期十天的纪念活动。原先没有邀请阿拉法特，但是，在以色列袭击他们在突尼斯的总部以后，提出了一项邀请他出席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的发起者是不结盟集团的七个国家：印度、伊拉克、科威特、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北也门。当安理会除了美国方面一票弃权外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袭击时，在联合国的许多代表认为正好趁此时机利用对阿拉法特的同情。邀请他出席庆祝活动的主张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公开的故事，但是，还有更多的情节。

我现在能够透露，阿拉法特希望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庆祝活动，以使发表他的声明，确认巴解组织准备好在一个国际会议的范围内，“在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包括安理会 242 号决议和 338 号决议基础上”，谈判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换句话说，阿拉法特将要在最恰当的地方发表他早就该说的话，如果舒尔茨不曾让以色列和在美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破坏墨菲同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会晤的话。当然，阿拉法特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时机，发表这样一项声明，将在全世界成为头条新闻。宣传媒介将无法忽视、贬低或者扭曲他的讲话。阿拉法特希望，在把巴解组织包括在和平进程的问题上，这样的一篇演说将迫使里根政府的态度变得认真些。（虽然一些读者也许发现这难以置信，事实是在国际政治中，什么地方说的话经常就同说的什么话一样重要。）

邀请阿拉法特的决议是在“艾奇尔·分罗号”被动持前起草的，但是，直到这件事发生时为止，还未准备好把它提交给大会。即使如此，艾莱思·希奥林诺在 10 月 15 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这顶决议如果被提出付诸表决，“极大可能会很容易被通过”。但是，没有付诸表决，这项邀请阿拉法特的决议被撤销了。为什么？美国外交官告诉其他代表，如果阿拉法特将参加会议，里根总统也许要取消他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真正发生的事情被一位阿拉伯外交官在评论《纽约时报》时简练地概括了。他说：“事实是联合国需要美国，而我们需要联合国。”如同它在 1947 年保证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所做的那样，美国曾经诉诸压力进行讹诈，以达到它的目的。

为以色列总理迈步踏入的舞台现在已经搭置起来了。在佩雷斯赴纽约途中，他要求巴解组织被排除出和平进程。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宣称他本人已准备好同约旦直接谈判。为诱使侯赛因作出积极的反应，佩雷斯说他准备为进行谈判考虑某种形式的国际结构。（以前，佩雷斯和以色列的强硬路线分子曾经一致拒绝这位国工提出的一项国际结构的要求。他在联合国讲话时，佩雷斯正在同苏联人作交易，以确定他们将付出的代价来换取以色列撤消反对苏联参加的决定。他要求莫斯科同以色列重建外交关系并且允许 2 万名犹太人离开苏联去以色列。）佩雷斯还暗示他考虑归还一些 1967 年被以色

列占领的土地。

在以色列，佩雷斯的讲话激起了联合政府中的利库德成员和其他强硬路线者的抗议风暴。佩雷斯准备以一些土地交换和平的暗示，激起财部长伊扎克·莫达依宣布他将分配更多的政府基金在西岸建设新的（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

佩雷斯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还有一年时间担任总理职务，按照联合协议条款，他将把总理职务交给沙米尔。在联合国的讲话支持了这一推测，他将退出联合政府，并在以土地换取和平的问题上展开竞选斗争——如果侯赛因将作出积极的反应。

在佩雷斯的讲话之后，这位国王受到他的美国、英国及其他西方朋友的巨大压力。他们的论据并不新鲜，但是，佩雷斯的任期正越来越短，他将很快被一个反对任何一种和解的人所取代，这一事实增加了他们论据的新的分量。侯赛因的朋友说，阿拉伯人的选择是：要么在佩雷斯担任总理的时候同以色列进行谈判，以便收回一些土地，而且也许有希望在几年期间得到更多；要么接受以色列对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非法占领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如同以往一样，那些提出这种逻辑的人——不想和以色列及它的院外活动集团组织摊牌的西方政治集团——是不关心对各方，特别是包括对巴勒斯坦人的公正和合理的原则的。在出于私利的权术政治中，对法律上和精神上正确的东西从来是没有地位的。联合国 242 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它 1967 年占领的所有土地上撤出，似乎已无关紧要，只要同意边界修改一下即可。由于佩雷斯不能执行整个 242 号决议，阿拉伯人应当感觉到这点并且满足于部分地执行就可以了。

阿拉法特承认，没有迹象表明侯赛因早到要在 1985 年 10 月作出他的同巴解组织决裂的决定。（稍后我们将要看到，这次决裂发生在第二年的 2 月。）侯赛因所作出的对佩雷斯的主动表示，包括这两位领导人在巴黎一次秘密会晤中作出的那些反应，是在阿拉伯方面特意安排一场新的抢座位的游戏。当这位国王同他的宿敌阿萨德总统作朋友时，做游戏的音乐开始演奏了。

约旦同叙利亚和解的明显的含义是，侯赛因正在寻求创造一种同以色列谈判的阿拉伯一致舆论，这种一致舆论可以取得他从佩雷斯那里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这些条件按照限界对巴解组织和它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侯赛因知道美国人曾经告诉阿萨德，一个佩雷斯的政府将准备以戈兰高地作交易来换取同叙利亚签署媾和。这位国王同阿萨德——阿拉法特的头号敌人——和解的另一个含义是，侯赛因和阿萨德共同愿采取行动反对巴解组织和那些继续支持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的这一天将会到来——假如佩雷斯（和美国人）使之值得他们这样去做。

在适当的时候，侯赛因发现阿萨德原则上准备赞同和以色列谈判的这一主张，假如这种谈判是在一种国际保护伞下进行的话。但是，在达成任何官方的或正式的谈判联合战略之前，一个重大问题必须获得解决。如同侯赛因国王为同以色列进行交易需要叙利亚的掩护一样，阿萨德自己也需要防备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阿萨德的担心是，萨达姆将谴责他是叛徒并攻击叙利亚——假如或当他从他与伊朗的战争中解脱出来。（侯赛因国王在战争中支持伊拉克。阿萨德支持伊朗。）阿拉伯国家最有关系，并自然而然地急切于结束两伊战争，有了它们的默认，侯赛因国王着手试图安排阿萨德所需要的保护的工作。

在伦敦会谈取消和“艾奇尔·劳罗号”事件之后，巴解组织的第一个积极行动是在以声明的形式中谴责和放弃“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11月10日阿拉法特本人在开罗发表的这项声明成了知名的开罗宣言。阿拉法特说，对这一声明的违犯将受到严厉的惩处。为缩小其他方面蓄意歪曲巴解组织在暴力问题上的立场而进行损害巴解组织的宣传范围，这项开罗宣言在恐怖主义和联合国宪章所保证的合法武装斗争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合法武装斗争是所有在被占领下的人民的权利。因此，这项开罗宣言清楚表明，被抛弃的是恐怖主义。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在不能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将以各种合法手段继续进行。

以色列对开罗宣言的官方反应是由沙米尔的外交部发出一种轻蔑和辱骂。它的发言人说，“阿拉法特说他不会杀害在欧洲的犹太人，但是以色列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是目标。”通俗流行的报纸《最新消息报》在头版头条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阿拉法特。”对这样一个傻瓜和其他饱经阅历的观察家来说，这些和其他暴躁的反应暴露了一些以色列人方面的一种恐惧，阿拉法特的声明将使巴解组织作为谈判一方被美国重新认真对待。一些以色列强硬路线者和他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朋友们担心，如果那时秘密谈判取得进展，产生一个美国接受巴解组织作为谈判一方的方案，佩雷斯会走向谈判桌。

在约旦河西岸，一个最顽固的犹太人定居点号召为一场内战作准备，如果佩雷斯政府真的试图交回任何被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领土，这场内战就将被发动。这项号召是由一家杂志提出的。它是阿里尔定居点移民者的喉舌。它说：“让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的每一个人准备好在精神上站起来，举起他的手——和他的武器——反对他的弟兄。”在这同一杂志上，用笔名“本·以色列先生”（“以色列的儿子”）署名的一篇文章走得更远。它警告说：“在这民族非常时刻，大多数手段证明结果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到：遍布各地的地下活动、军队中的叛变，安全机构内部的颠覆活动、在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的武装起义，最后，一个犹太人同另一个犹太人战斗。”（这场悲剧过去是，现在仍是，如果相继任职的美国总统曾经禁止在被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建立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一场犹太人的内战就不会成为一个前景。）

为协调推动和平进程的各方努力的责任，落到美国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的肩上。他正试图缩小在佩雷斯所能够作出的和侯赛因所能够接受的之间的差距。但是，墨菲也公开宣布说，他同意巴解组织的开罗宣言是“真诚地”作出的，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墨菲的这项声明尽管没有被广泛报道，却有助于一些观察家，包括当时我在内，相信墨菲本人仍然认真地试图把巴解组织包括在和平进程之内。（墨菲和里根政府所有其他高级官员之间的主要区别似乎是，他厌倦于在把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问题上有着别的选择。）

佩雷斯在联合国的讲话、侯赛因对佩雷斯的友好表示、阿拉法特的开罗宣言和墨菲的穿梭外交，造成一种进展印象，甚至出现一定程度乐观，认为1985年底或者1986年初将看到一个突破。据报道，里根政府在原则上愿意邀请所有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参加一项国际和平会议。当时，阿拉法特得到相互矛盾的劝告。有些声称了解幕后情况的人告诉他，里根政府在关于按照巴解组织所能接受的条件谋求和平问题上认真的。其他的人则告诉这位

主席，美国人，某些美国人，在为他设置陷阱。

1986年1月，在一阵外交活动高潮之后，里根政府向侯赛因确认，它已准备好召开一项国际会议，如果巴解组织事先准备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它将被邀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明显的含义是，巴解组织正被要求打出它的唯一的谈判王牌——承认在1967年或多或少的边界之内的以色列——以换取美国承认巴解组织。由于阿拉法特和在领导机构中他的同事们在1985年夏初曾经原则上同意这样一种交换，以便使那一年的墨菲使命顺利进行，看来没有理由，为什么阿拉法特现在不能作出他的允诺声明。（读者们将会回忆起，在1985年5月侯赛因同意，或者说他曾经同意一项三阶段计划，同里根政府一起创造条件使美国能够承认巴解组织。墨菲会晤一个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之后，阿拉法特如确实了解墨菲将随后会见他，以标明美国承认巴解组织，他将在此基础上发表他的承认声明。读者们将还会记得，阿拉法特那次没有受到考验，因为国务卿舒尔茨容许以色列的强硬路线者和他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朋友们破坏这项计划。墨菲没有被容许会晤这个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

在1986年新年开始，在关于谋求和平的前景的问题上有理由乐观……假定美国的建议是它看来这样的。阿拉法特现在将经受考验。他会不会、能不能发出这项声明呢？

巴解组织对美国建议的第一个反应是以三个推荐的声明形式作出的，其中的任何一个阿拉法特都准备以巴解组织的名义作出。这些推荐的声明的文本被送交侯赛因和他的顾问们。我们将立即看到，这三个推荐的声明中的第二个声明的文本是最明确的了。在巴解组织准备和以色列谈判的问题上，它给予美国人的比他们所正在要求的还要多，比侯赛因在1985年5月向里根政府简述约旦——巴解组织协议的重要意义时所拥有的对巴解组织的约束还要走得远。它真正是阿拉法特后来向我形容的，这是他在谈判之前的“尽最大可能作出的声明”。

2月19日，使得那些曾同侯赛因商谈约旦——巴解组织协议的阿拉法特的高级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国王宣布他中断同巴解组织在和平进程中的伙伴关系。在一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演说中，他声称巴解组织曾经食言，拒绝接受242号决议作为邀请他参加一项国际会议的代价。但是，侯赛因的长篇演说比抛弃巴解组织更为厉害。他强烈暗示，阿拉法特和他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是巴勒斯坦人民中微不足道的人。他发出一项几乎是不加掩饰的号召，要在被占领的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己寻找出一个新的领袖。这明显的含义是，他们应当把国王陛下视作这样一位领袖。（如果他们响应，侯赛因显然要和佩雷斯谈判。）

如同侯赛因说的那样，破裂的情由不是没有一点真实的因素。阿拉法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坚持当他作出他的声明时，美国人也应作出他们自己的声明。但是，阿拉法特的这项要求有一个来龙去脉，而这位国王（和宣传机器）没有说出来。实情的记录说出了真相。

下面是里根政府在1月作出的送交侯赛因的书面建议原文：

当公开记录上明确载明，巴解组织已经接受242号和338号决议，准备同以色列谈判，并已放弃恐怖主义，美国同意向巴解组织发出一份参加一项国际会议的邀请。

下面是阿拉法特为回答美国建议准备作出的声明（三个建议的声明中的

第二个)原文:

在 1985 年 2 月 11 日约旦—巴解组织协议的基础上,并鉴于我们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我们准备在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有有关的阿拉伯各方和以色列政府参加的国际会议的范围内,通过谈判,使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包括安理会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巴解组织宣布它反对并谴责恐怖主义,这已在 1985 年 11 月开罗宣言中得到保证。

这是在侯赛因看过并同意上述文本之后,阿拉法特增加他的条件的。这位主席要等到这位国王从美国方面获得一项书面保证后,才会发表巴解组织的声明。这项书面保证是美国将作出它自己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声明。后来美国波要求与巴解组织同时发表声明,巴解组织声明的文本,连同巴解组织对一项美国声明的要求,由阿拉法特的一位同事转交给在安曼的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巴解组织究竟在想它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超级大国?”

阿拉法特决定增加一项条件是由于巴解组织发现美国的建议不是如同它曾经看来的和被设想的那样。当阿拉法特在回答他同事们的问题时,他要求侯赛因确认美国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就等于美国承认巴解组织时,麻烦就来了。美国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可以理解,就巴解组织所关心的而言,这改变太大。于是阿拉法特和他的高层领导同事在他们自己当中提出了许多站得住的问题。譬如,如果巴解组织作出它的声明,而国际会议由于以色列拒绝参加根本未能举行,或者,由于以色列不准备提供足够的东西来满足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和一般的阿拉伯人民的最低要求,国际会议失败了,情况将会是什么呢?答案是太清楚了。巴解组织可能打出它的唯一的谈判的王牌——承认以色列——而换回的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巴解组织领导人这时将会完蛋,在多数巴勒斯坦人民的心目中就会毫无信誉,并被许多人谴责为叛徒。

在这场冲突的整个历史的背景下,阿拉法特和他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开始感到他们正被引入一个陷阱,这肯定是不足为奇的。里根政府的一些人仍然坚持一项取消巴解组织作为在中东和平方程式中一个因素的政策,阿拉法特和他领导机构中同事们的这一认识正在突出他们的恐惧和破坏他们的信心。巴解组织从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已经获悉,比如,海军上将约翰·蓬德克斯特在 1985 年 11 月刚刚接替麦克法兰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作出的一项评论。(在 1986 年底之前蓬德克斯特已经辞职——“伊朗门”事件的第一个受害者。)当被问及他对中东的战略时,蓬德克斯特据说曾在私下说,他的目的将是“分裂再分裂巴解组织”,直把它削弱到无能为力的程度,使侯赛因可以没有它径自进行谈判。

按照报道的蓬德克斯特的看法,这样的一种战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机会,因为存在着他所称之为的“新的俄国的因素”。这明显同以下事实有关系,1985 年中,苏联人曾经告诉美国人,由于中东局势已经变得太危险,他们不再有兴趣使这一地区太激化了。在来自莫斯科的这一信息的鼓励下——它表明戈尔巴乔夫先生对于同美国达成全球性的和解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里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断定,他们现在可以随意以任何手段来降低巴解组织的重要性。假如激进分子接管,那也不再要紧,因为莫斯科将不给他们以帮助或安慰,如果巴解组织要保持这一交易,它必须是按照美国的

条件，而阿拉法特或任何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对此只能一筹莫展。

在巴解组织方面，这时真正的问题是，阿拉法特不能肯定美国的政策是什么和谁在制定政策。（如同世界随后从“伊朗门”事件丑闻中知道的那样，里根的白宫是一个秘密策划和施展诡计的地方，背着国务卿作出重大外交决策。）因此，在1986年2月他们所处的这种情势下，阿拉法特决定拿出一项保险政策。这就是他需要一项美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声明的原因。他实际上是要求里根政府在他打出他唯一的谈判王牌之前证明它是严肃的。

必须指出，阿拉法特需要一项美国声明决不减少他准备在自己的声明中所要说的内容的重要意义。这个最重要之点对墨菲不是不起作用的。他试图说服舒尔茨：对美国来说，表明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以引发阿拉法特声明的时机已经来到，阿拉法特的声明确实符合美国的条件，它将打开通向谈判的大门……如果里根政府将以一个声音说话，并准备勇敢地面对以色列的强硬路线者和他们在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朋友们。舒尔茨所准备提供的最多是一项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的美国声明。墨菲于是给侯赛因带去一项信息，说他无法做更多的事，现在是取决于巴解组织接受或拒绝美国的条件。

这是当时情况，阿拉法特及其一行和侯赛因及其顾问们坐下来，谈论他们将要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从巴解方面来说，对美国提出的声明为什么不足以解决这重大的问题，作了解释。戴维营协议曾经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说得好听，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贝京及其后继者曾得到美国允许，剥掉这一措词的所有含意。巴解组织问道，谁能够保证佩雷斯或任何一个未来的以色列（或阿拉伯）领导人不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美国是严肃的，它能够改进它提出的声明，对“合法权利”这一措词给予一定界定。阿拉法特，这位务实主义者，仍在寻求避免破裂。他本人曾经同意，美国人将不会让“自决”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作为一种妥协，他现在准备满足于一项从美国人方面作出的措词形式，它指明合法权利包括“政治权利”。

但是，这已为时大晚。这位国王与巴解组织断绝关系的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说已经写好并正在等待发表。在巴解组织和约旦人坐下来进行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谈之前，也就是说，在理论上那时还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之前，这位国王的演说事实上已经写好，已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并以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三种文字印就，准备分发！

在最后一轮谈判中出现的一次戏剧性的交锋，对在安曼破裂之前一些日子里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线索。阿布·伊亚德猛拍桌子，并说，“如果我们接受美国人现在所建议的东西，我们就要完蛋！”侯赛因的一位部长兼高级顾问阿布·奥德赫怒气冲冲地顶撞说，“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将要完蛋！”阿布·奥德赫在这位国王出席的情况下作出不加修饰的话语，其含意是，约旦人受到美国人的巨大压力——压他们在佩雷斯尚在担任总理时同以色列谈判；并且压他们指责巴解组织要对破裂负责，如果阿拉法特在美国没有作出某种形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拒绝接受242号决议。

阿拉法特和他的高层领导同事们在保留其对墨菲及其作用的判断的同时，确信里根政府中其他的和更有影响的成员确实为巴解组织设置了一个陷阱。按照这项关于阴谋的分析，那些设置陷阱的人的希望是，巴解组织为了保持在政治行动中同约旦的伙伴关系，将会打出它的唯一的谈判王牌，而当

人们看到它打出这张王牌却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回报时，在支持者的心目中它不再会获得信任……这使侯赛因在没有巴解组织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道路得以畅通，或者说更加畅通。

如果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错了，那就必须说，那是他们错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以推进和平进程，并保证他们自己分享这项政治行动。但是，这个论断是假定而不是佩雷斯愿意并有足够勇气去进行一次选举，并且敢于冒挑起内战的危险，以便取得一项同约旦和巴解组织进行谈判的授权，而且能够退还足够的土地以满足他们两家。这一论断还假定里根政府准备好勇敢地面对以色列强硬路线者和他们在美国的强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以支持佩雷斯。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里根政府为什么要说，美国对巴解组织发出的一项邀请不等于是对巴解组织的承认，从而使阿拉法特在关键时刻难以甚至不能生存？但是，这还不算是要害。要害是，阿拉法特所准备作出的这项声明确实满足了美国人正要求的和多少年来曾经要求的全部，甚至更多。我们从声明原文中看到，巴解组织承担了它自己同“包括以色列政府”在内的各方进行谈判。甚至侯赛因也不曾在一项公开声明中走得这么远。总的说来，我的结论是，里根政府中没有足够的人员认真对待在巴解组织所能接受和赖以生存的条件下推动和平进程。我认为，在不称职的里根政府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是在耍弄分裂和削弱巴解组织的花招。大概从不会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和平进程。

巴勒斯坦人看到，在安曼破裂之后，侯赛因和阿萨德的战略是在把巴解组织推向阿拉伯政治的边缘——使得它与世无关，而给予约旦和叙利亚在他们能从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取得的最有利的条件基础上媾和的自由。

侯赛因的作用是在给巴解组织制造一个可供选择的领导——如果不是他本人，那就是为了金钱或者为了权力或者为了两者会背叛他们的事业的巴勒斯坦走卒们。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这位国王的情报头子们试图发起一项反对阿拉法特的叛变。当它失败时——多数巴勒斯坦人对约旦人的这场愚蠢的表演感到可笑甚于愤怒——侯赛因把阿拉法特的人赶出约旦，关闭他们的办事处。在那些被驱逐的人当中有阿布·杰哈德和持有约旦护照的法塔赫的高级官员以及和约旦国外侨民结婚的人。

阿萨德在这场阴谋中的主要作用是要结束巴解军事力量在黎巴嫩的存在。这说明为什么什叶派阿迈勒集团，这个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最密切的盟友，向贝鲁特周围直至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进攻。如同叙利亚的一位前情报机构的官员对我说的那样，阿萨德的思想不难捕捉。如果巴解组织的战士能从黎巴嫩被驱赶出去，而被限制在他们遥在也门、也许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阿拉法特就无法在决斗中影响局势。如果那种情况发生，并被取消了一种政治作用，巴解组织将一事无成。阿拉法特会被降低为一种政治乞求者的身份，这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

第二十一章在被占领土的起义

巴解组织在谋求和平的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被否定，又不能依靠军事手段来影响事态的进程，再次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

事实上这是这场冲突历史中的另一个时刻，以色列——如果它愿意按照联合国 242 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给予约旦和叙利亚土地似换取和平——有可能以政治手段中立巴解组织。所有巴勒斯坦人都知道正是侯赛因而不是阿拉法特破坏了约旦—巴解组织协议，尽管如此，那些在被占领土的大多数人仍愿学会愤怒地生活，给这位国王以表达的机会——如果他能够对他们说：“听从我的领导，因为我已得到保证，我可以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以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为了防止巴解组织作为中东和平方程式中的一个因素被取消，阿拉法特知道他必须打“内部（被占领土）的牌”。当加沙和西岸的起义于 1987 年 12 月 9 日爆发时，世界都认为巴解组织同以色列一样大为吃惊。没有比这同事实更相径庭。愤怒和失望的爆发酿成一场反对二十年来以色列占领的起义或者说人民的反抗是自发的，但是，没有事先的和详细的计划，它不能持续数天、数星期、数月。现在我可以透露，计划和协调各方面的努力，以保证起义的持久的生命力的人，不是阿布·杰哈德——他随后被以色列特务杀害——而是巴解组织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我还可以透露，阿拉法特使起义坚持不懈进行下去的成功秘诀之一是，他有能力利用卫星直接同巴勒斯坦的示威者谈话！

据哈尼·哈桑说，早在 1982 年 9 月，这位主席就开始认真思考需要打内部的牌——当时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正从贝鲁特撤离。（由于它在那次反对以色列的真正英勇的立场，巴解组织——为了它自己和为了它所代表的一切——的确赢得了世界各地不少新的尊敬，但是，从所有其他方面来看，在那漫长的、炎热的 1982 年夏天所发生的事情，对阿拉法特和他的组织来说，是一场灾难。巴解组织失去了它在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最后的保存的基地。其后果是，阿拉法特失去了他在决斗中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那时，有许多巴勒斯坦人担心巴解组织正在被孤立，正在被推向阿拉伯政治活动的边缘。这正是为什么多数巴勒斯坦人准备支持阿拉法特试图通过问侯赛因和解使巴解组织继续介入政治行动的原因。）

对在被占领土的起义的倒计时时间准确他说开始于 1983 年，其时阿拉法特下令在纳布勒斯及其周围进行一次“总演习”。“总演习”是这位主席在巴解组织的支持者和以色列军队之间进行对抗所采用的一种代号。它是阿拉法特考验整个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感情和态度的一种方法。据哈尼说，反应正如阿拉法特设想的那样。对抗在纳布勒斯进行，但是，应该把这次对抗持续和扩展下去的主张没有得到支持。一场人民大众的起义仍然是梦寐以求的东西。

回想那时我同阿拉法特的谈话，我能忆及他是何等沮丧。比如，我国想起我告诉他我正考虑根据被占领土一场成功起义这一思想写一篇小说。他对我伤心、会意地一笑，并说，“此事不那么容易。”在以色列 1967 年战争期间夺取西岸和加沙之后的日子里，他在这些领土上发动人民起义中遭到的失败，依然萦绕脑际。20 年来，他还是面临这一状况，以色列和约旦的反情报机构丝毫没有停止阻挠组织一场起义。但是，还有另外的更深刻的理由使阿

拉法特小心谨慎，使他不能沉浸于打如意算盘。他承认，在被占领土之外的领导机构没有权利要求在被占领土之内的支持者们作出牺牲，包括牺牲生命。他继续说，这应该由在被占领下的人民在他们饱受创伤、苦难之时，自己做出决定的。

然而，阿拉法特没有让事情停留在此。他指示他的最高层和最可靠的领导成员中的一些同事——其中有哈尼·哈桑——进行最透彻和最详尽的研究，为什么在纳布勒斯的那次“总演习”没有能够激起遍布各地的人民群众的即使是一种象征性支持的表示。

“我们得出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论，”哈尼告诉我，“我们发现我们在被占领土内的绝大多数沉默的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心，如果不是他们的头脑，给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

用什么解释这种人民意见的巨大转移，一种人心的变化，它同其它事情一起暗示阿拉法特的温和的巴解组织正处在变成一个不相关的组织的危险之中？一句话——失望。首先，而且显然，出现这种失望是近 20 年的占领和以色列经常的野蛮镇压的产物。但是，紧跟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 1982 年它对贝鲁特的围攻，出现了“两个新的失望的因素”。

第一是认识到阿拉法特的政治与和解方针得不到任何地方的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尽管以色列仍然否认它，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承诺承认在 1967 年边界之内的犹太国以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沙龙在黎巴嫩的突袭使得每一个巴勒斯坦人认识到，阿拉法特越是表明他准备谋求和平（而且是在以色列的人民和任何明事理的政府都会宽慰地接受的条件下），以色列就变得越加坚决要用军事手段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对巴勒斯坦的新一代人来说，第二个痛苦的教训是，当危境到来时他们是孤独无援的。证明（如果需要更多的）就是，当沙龙试图用几个星期消灭巴解组织时，阿拉伯政权安然坐在他们背后，静观行径。有些阿拉伯政权正希望沙龙得手，这在一般的阿拉伯世界里，特别是在巴勒斯坦方面，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在此背景下，在被占领土内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把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视为有能力改变现状的唯一力量，这一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使巴解组织领导人感到惊讶和震惊的是那些已经转向和正在转向原教旨主义者的巴勒斯坦人的数目。哈尼说，“我们发现，在被占领土，不少于 60% 的年轻人认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会比巴解组织能够提供更多东西。”

面对这一现实，阿拉法特该做些什么呢？

在理论上，一种选择是按兵不动，让各种原教旨主义者的组织去干，目的是如果它得以滚动，日后就劫持他们的这个游行队伍前面的乐队车。但是，阿拉法特的本性不会允许他甚至考虑这样的选择。他不能也永远不会充当任何人的第二提琴手。而且让原教旨主义者去干可能产生的后果，细想起来人可怕了。首先，有一个明显的危险是巴解组织对在被占领土内的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会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组织。但是，这不是最坏情况下的形势。如果出现了一个的确引起变化的人民起义，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能够表其主要功劳，阿拉法特——即使巴解组织确实拥有它的一些信誉——也许无力倡导和解，这一和解是他在 1974 年至 1979 年之间向他的人民宣传并为之进行斗争的，并且此后他一直维护着它。

结论是清楚的。如果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在他自己一方保持对事态的控

制，他必须给予新的领导。因此，亚西尔·阿拉法特投身于同被占领土内的每一个政治上活跃的组织，特别是那些构成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组织，建立桥梁的任务。阿拉法特最初的目的不是要去鼓动或者挑起一场人民的起义，而是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包括各方面的网络，当挫折和失望爆发时，它有能力顶住和经受住。阿拉法特的口号是“星期五清真寺，星期天教堂”。过去几年来，阿布·杰哈德一直在建立一个新的法塔赫的地下基层组织网，这些基层组织对青年团体给予特别重视。

阿拉法特确实在建立如此广泛的联合方面取得成功，而以色列反情报机构辛贝特对在它鼻子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竟然没有嗅出那怕是一丁点儿气味。这是对阿拉法特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对其他人（指一般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保守秘密才能的很大赞扬。回顾过去，说阿拉法特的成功是辛贝特的头目后来被解除职务的主要原因，看来是有道理的。

在最初讨论关于建立一个共同事业联盟的过程中，看来同构成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团体达成一项策略上的和解是不可能的。涉及原教旨主义者的障碍是巴解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所表明立场。巴解组织至少曾公开承诺支持苏联人。当被问，这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头公牛来说，这是一块红色方布。为了避开这个障碍，巴解组织必须进行一些解释，在私下只有说真话，别无选择。巴解组织使自己承诺对苏联的支持，是因为它的对外事务正式发言人法鲁克·卡杜米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了那样的意思。卡杜米是巴解组织主流派领导人中唯一的认真亲苏人士。他使巴解组织承诺支持苏联人的声明并不反映他的多数同事的观点，但是，他们担负不起和他相抵触的后果。当你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你的朋友和同盟者时，你就惹不起这个麻烦去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人。对于这个解释，原教旨主义者是很实际的，他们理解巴解组织的困难处境并和它共处。

阿拉法特正在为各组织和团体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机构。一旦（和如果）起义到来时，这些组织和团体要负责组织。这时，超出阿拉法特控制的事态正在使被占领土内的政治温度上升。在那里，巴勒斯坦人沮丧和失望精神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哈尼说，这是三项分别发展的事态造成的影响，它们确立了巴勒斯坦人造反的决心——不管对他们在遭受更多苦难和牺牲生命方面要付出什么代价。

第一个是以色列在 1984 年决定提高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缴纳的税，并且同时进一步减少巴勒斯坦人从他们水井中提取用水的数量。哈尼说：“这是以色列的政策部分，使生活难以忍受，许多巴勒斯坦人只好离去。在这特定的时刻，以色列人正在对巴勒斯坦的上层阶级施加特殊的压力。”哈尼进而说，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人正希望 1948 年的情景再现，那时多达 3 万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在主要战斗开始之前携带着他们的财物逃跑了。

我问哈尼，是否 1948 年的情景会重复或类似情况会发生。他的回答有助于说明被占领土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以色列人迫使我们人民离开，在这问题上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次得逞。也许，在被占领土的我们的全体人民第一次真正懂得他们的处境和他们的选择。为什么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紧紧地掌握住自己的国土，除了明显的理由之外，他们知道，他们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作为难民或公民是不受欢迎的。他们知道，他们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能被允许为他们的事业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知道，除非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否则他们将永远得不到安全。他们认识到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

去。正是这种认识，孕育和产生了人民大众新的抵抗和拒绝以色列占领的决心。”

从这一时刻开始，以色列人摧毁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意志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彻头彻尾地破坏生产的。

第二个事态发展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 1987 年 11 月在安曼举行的紧急首脑会议上，没有给予巴勒斯坦问题以任何它所应得到的优先考虑之类的东西。戴维·海斯特当时在《卫报》写的报道中，叙述他们缺乏意愿，像“一个有说服力的表明阿拉伯人沉入低潮的标尺”。巴勒斯坦人自己把首脑会议看成进一步证明阿拉伯领导人——出于一种软弱和对美国的从属性的结合——正在继续淡化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

在首脑会议准备期间，一位非常高级的巴解组织的官员告诫侯赛因，如果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作出一点他们是认真承担义务至少解放一小部分巴勒斯坦领土的表示，那么在被占领土将会发生一场起义。显然，这位国王置之一笑。谈论一场起义是胡言乱语。他说，现在正是巴解组织“停止做梦”的时候了。

第三个事态发展是在 1987 年 12 月初，里根—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国首脑会晤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甚至都没有考虑。巴解组织对里根政府缺乏兴趣和关心并不奇怪，但是，它相信苏联人会提出这个问题。（苏联人会不会给予任何政治上的支持，阿拉法特本人没有寄予很多期望。几个月之前，一位非常高级的苏联官员曾经告诉他，克里姆林宫有一个它自己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问题。）

显然，没有外部力量愿意迫使以色列认真对待以土地换取和平。如果要使情况出现变化，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就必须自己起作用。形势对他们惊人地不利，但是，20 年来第一次，他们团结起来，并且在心理上准备好同以色列军队进行一场对抗，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人们已经听到星期五来自清真寺的信息和星期日来自教堂的信息。阿拉法特和领导机构他的高级同事们正在询问自己，要进行多少小的事件以激起以色列人的过度反应，有助于保证起义长久持续下去。

第一个有计划的挑衅是在加沙市的巴勒斯坦广场一个以色列人被刺死。这个以色列人据巴解组织说是一名警察。继这之后，发生了一名辛贝特特务的谋杀。但是，一个以色列的报复行动给阿拉法特的组织者的网络——负责领导和组织起义的巴解组织—联合领导机构——一个证实它自己的机会。四名巴勒斯坦人在他们乘坐的汽车被一辆以色列卡车蓄意猛撞时遇难。为他们举行的葬礼变成了一次示威游行。以色列军队反应过度。两名巴勒斯坦示威者被枪弹打死（一人因为扔一枚汽油弹），几十人受伤。其余部分——石块和报之以野蛮的毒打、枪击和放逐——则是电视反映的史实。

对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来说，最满意的功绩是打击了以色列反情报机构自己的情报工作。六个星期后辛贝特才开始恢复它在被占领土丢失的一些阵地。这一延误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告密者网络实际上的解体。许多告密者出于害怕，迳自取消他们的服务。有些人就此消失了。

这是必然发生的，大规模的逮捕和其他更多的日常反情报工作使辛贝特在这场正在进行的地下战争中取得某些胜利；但是，起义在继续着，部分是因为在阿拉伯方面的活动得到在被占领土 150 万巴勒斯坦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出于哈尼所讲的原因，这项支持来自社会所有阶层。在电视

上，我们从未见过巴勒斯坦人怎么会什么都有——水、食物、燃料和各种供应——使得公众在面对以色列的宵禁和各种限制以及巴勒斯坦商店主关门的情况下，多少能像正常的一样生活。

随后出现了阿拉法特的秘密武器。

辛贝特的反击是基于一项经过试验并证明是可靠的战略之上的——首先，半夜敲门和大规模逮捕，然后宵禁，切断电话联络，干扰巴勒斯坦电台和查封巴勒斯坦出版物。他们设想，当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不再能互相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当那些鼓动采用其他办法进行抵抗的人的意见既不能听到，也不能读到的时候，起义就会削弱。这样一个战略不管怎样是可预料到的；而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比以色列反情报机构大大先了一步，想出了办法。

从一家英国公司（在里丁的来卡·塔克梯空）那里，阿拉法特购买了一些太空时代的无线电设备——一个送话器和许多微型接收器——这能使他插上插头接通阿拉伯通讯卫星（阿拉伯卫星）并直接同在街头与以色列军队对抗的巴勒斯坦示威者谈话！

哈尼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谈到阿拉法特的精神出现在前线所产生的影响。

“你无法想象它，”他说，“对抗是十分严峻的。即使他们没有被杀死或者遭受严重创伤，我们的人民仍在遭受许许多多的惩罚。因而，很自然，不时出现士气低落的时候，而这时正是阿拉法特振奋了他们的精神，某些人会提供一个接收器，把这些示威者和主席联结起来。同阿拉法特直接谈过话的人都充满着激动和热情。他会骄傲地对别人说，‘我刚刚同阿布·阿玛尔谈了话。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当以色列人认识到阿拉法特依靠遥控对局势正在产生作用时，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伦敦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在议会中大惊小怪和声嘶力竭，谈论关于一个名为英国防御承包商曾通过阿拉法特的办事处向巴解组织——一个“恐怖主义者组织”——出售“军事无线电设备”。这个院外活动集团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要防止出售更多的接收器以分发到被占领土去。

4月16日，以色列特务在突尼斯阿布·杰哈德的家里杀害了他。阿拉法特为阿布·杰哈德遇害感到悲痛欲绝。莫萨德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为了进行这项国家恐怖主义行动，集中了他们的各种力量。（两个星期之前，哈尼曾向我表示过，他担心沙米尔总理和国防部长拉宾将会授权他们的情报机构去杀害巴解组织的高层领导人。）阿拉法特在关于他的副总司令被谋害的第一个公开声明中说，美国卷入其中。

根据他的家属和其他最了解他的人说，阿布·杰哈德最后的一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把起义看作是巴勒斯坦新一代已准备好继续斗争的证明。阿布·杰哈德对他的一些同事说：“我的工作差不多就要完成。很快就将是我把火炬传给别人的时候了。”他还感到高兴的是，在被占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终于用同一个清晰的、响亮的声音说到谁应该在和平谈判中代表他们——巴解组织。在他的最后的日子里，阿布·杰哈德特别喜爱的是说明这场起义怎么把在被占领土内的所有阶层团结起来的故事。“在以往的日子里，”阿布·杰哈德说，“一些中等和上等阶层人家的母亲们，总是告诫他们的儿子不要同以色列军队对抗。现在如果他们发现他们的儿子呆在家里，同样是这些母亲，却对他们的儿子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到外边去扔石块？’”

4月15日，星期五，大约晚上11点半，阿布·杰哈德回到在突尼斯一

个郊区（东北方向）西迪·布·赛义德的他的住宅。住宅是一所朴素的、白色粉刷的和带有鲜蓝色百叶窗的别墅。这所房子虽在一个道路交接处的明显一角，却被一道大约 8 英尺高的墙围了起来。（还要指出的是，这所别墅是处在许多当地人称之为“禁区”的里面。所以称“禁区”是由于它的安全地位。总统府及美国大使官邸同阿布·杰哈德所居住的别墅之距离是鸡犬之声相闻的。大约一年以前当阿布·杰哈德寻找一个家庭住所时，他被指引到这个特定的处所。突尼斯的官员对他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这天夜里阿布·杰哈德计划前往巴格达，所以他请他的武装司机穆斯塔法在汽车里等候他。汽车就停在靠近大门的路上，这个大门是通向别墅的唯一入口。

阿布·杰哈德，这位喜爱家庭生活的人，回来和他的孩子尼达尔和哈娜——他的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以及他敬慕的妻子告别。这本来会是一次易动感情的别离。如同许多巴勒斯坦人从这本书的前版本中知道的那样，阿布和乌姆·杰哈德（哈利勒和英蒂莎·瓦齐尔）是巴勒斯坦复兴中的伟大爱情传奇。当他们分离时，他们从不感到真正幸福。在 1983 年看来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将要死战特里波利时，乌姆·杰哈德进行了一次危险的旅行，从安曼来到黎巴嫩北部，呆在她丈夫的身边。她难以想象失去了她幼年时代心上人的生活，她决心和他一起死去。两年以后，乌姆·杰哈德怀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阿布·杰哈德后来非常幽默地、笑嘻嘻地对我说，它发生了，当他们正在“庆祝”巴解组织战胜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时候。（当阿拉法特违反多数人的预期成功地在安曼召开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以阻止阿萨德接管巴解组织的时候。）婴儿尼达尔来到人世。他取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他在 1966 年阿布·杰哈德正在奋力营救阿拉法特的生命时，悲剧性地死去了。乌姆·杰哈德这时决定，作一个母亲必须再一次成为她生活中最优先考虑的事。结果她不再能自由地和阿布·杰哈德一起旅行，而这使他们分别的时刻变得甚至更加情意切切。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乌姆·杰哈德在她丈夫的怀抱中正逐渐入睡。在她脑际回荡的是阿布·杰哈德最后一封情书中的词句。这封信是以一种诗的形式写成的。她后来告诉我，这是他的许多信和诗中最优美的。这封信中像以往一样，激励他们的在整个分离时日中的爱情。她每天都要阅读，直至他回来。婴儿尼达尔早已在床边的儿童摇床里睡着了。摇床离窗不到 2 英寸。窗户上挂着落地窗帘。这是主卧室里两个这样的窗户之一。1 时 10 分，阿布·杰哈德起床接电话。他拿起卧室书桌上的电话。这是他的一位同事打来的，告诉他他乘坐的班机延期了。

在将要成为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分钟里，阿布·杰哈德决定看一看在被占领土最新斗争情况的录相带。当录相正在放映的时候，他回到他的书桌旁。声音被调低了。他为录相荧屏上出现的图像所激发或者鼓舞，提笔给在被占领土起义的地方领导人写信……外面，以色列人为了杀害他正在靠近。

根据突尼斯调查者对事物的重新组合推理，先遣队由三名莫萨德特务（二男一女）组成，在 4 月 12 日，星期二，到达突尼斯。他们伪装成旅游者，拿着黎巴嫩护照，说的是地道的黎巴嫩口音的阿拉伯话。他们看来有三个主要任务：一是为以色列突击队提供交通工具。突击队将在离阿布·杰哈德住宅不远的海滩登陆。为此他们租用了两辆大众牌小面包车和一辆白茹牌客货两用轿车。二是寻找到达住宅的最安全和最快速的路线。三是把住宅置于监视

之下。在选择路线上，莫萨德做了出色的调查工作。它的特务选择的一条路大部分都是二级小路，有些地方是沙土和垃圾，它直穿过照明很亮的主要道路，在主要道路上以色列人会陷入麻烦。（巴解组织的官员们确信，在突尼斯活动的在三名莫萨德特务以上，谋杀阿布·杰哈德的计划的细节是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制定出来的。根据这一观点，星期二到达突尼斯的三名莫萨德特务只有一项主要任务——提供交通工具并充当突袭队的司机。）

突袭队和它的后援人员——据以色列非正式的消息透露大约有 30 名突击队员——从他们的靠近海法的基地出发，乘一艘快速导弹舰艇被运走。这些突击队员们乘橡皮艇到达海岸。登岸的地点选得极好。穿过海滩的 50 米全速疾跑把他们隐藏在树一样的灌木丛中，他们可以在那儿重新集结而没有被察觉的危险。莫萨德特务使用的作为他们的基地的旅馆在视程之外，但是不过几百米远。我自己走完以色列人走向阿布·杰哈德寓所这条路线，所花的时间表明突击队员开始登陆大约在一点钟。当突击队员们到达海滩时，这三名莫萨德护送者和他们的汽车大概正在灌木林中等候。

与此同时……在天空中，一架以色列的波音 707 飞机被伪装成一架民用飞机在从西西里到突尼斯的一条航线上飞行。据玛丽·科尔文在 4 月 24 日《星期日时报》对事件的报道，机上的那些人中有三名处于高级地位的以色列人：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和军事情报处主任。这些以色列人在空中正在协调地面的行动，并且准备好应付任何意外紧急情况的计划。设想他们和在特拉维夫的国防部长拉宾保持着不断的联系是有道理的。还有很大可能为沙米尔总理和内阁核心成员安排了收听。（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沙米尔说，他是从“无线电收音机”第一次听到阿布·杰哈德被暗杀的！）

看来，以色列突击队员正在想伪装成突尼斯特种部队，如果他们受到突尼斯警察的阻止或者挑战。据乌姆·杰哈德和哈娜说，这些以色列人身穿着深蓝黑色差不多是黑色的战斗军服，颜色和式样和突尼斯特种部队穿的完全一样，特种部队职责包括警卫总统。

这三辆载着以色列突击队员的汽车到达目的地区正好在凌晨 1 时 20 分以前。从海滩行进到这里的路上使他们花了 10 分钟或者不到一点。两辆面包车里的突击队员是后援队。他们的任务是警卫交叉路口，守望意外的来人，并准备应付任何紧急情况。

第一个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是阿布·杰哈德的武装司机。他被击中了心脏。他正站在阿布·杰哈德的汽车外面抽烟。当他的尸体被发现时，纸烟仍在他的手指间。

突袭队的 8 名成员分成两组，每组 4 人。一组从一家邻居的花园爬过围墙从后面进入阿布·杰哈德别墅的地面。这一组被这家邻居的临时照看孩子的人看到，他们控制了所有可能逃跑的窗户和门，只留下主要的前门。这个组在占领他们的位置之前，开枪打死了两名正在睡觉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是阿布·杰哈德的花工。（那天夜晚天气暖和，他正在外面睡觉。）另一个是老人阿布·苏莱曼，以前的随身警卫。（他正睡在向花园敞开的地下室。）当所有可能成为出口的窗户和门都从外面被控制之后，第二个四人小组经主要的前门进入阿布·杰哈德的别墅。

阿布·杰哈德在楼上卧室里听到他的大门被强力推开的声音，他警觉到了危险。他穿过房间去拿他的手枪。他把手枪放在尼达尔够不着的大衣柜上。阿布·杰哈德危急行动的声音惊醒了乌姆·杰哈德。她起身下床并在他要打

开卧室房门的时候站在他的身边。在那里他们面对面碰上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急忙跑上楼，越过楼梯平台，进入通向主要卧室的走廊。这个走廊太窄了，四个以色列人中只有两人有射击的空间。阿布·杰哈德打了一枪。在他俯面倒下之前，他被打了几枪或者更多。乌姆·杰哈德尖叫着，“真主啊！真主啊！”然后，这四个以色列人每人轮流走上前来向阿布·杰哈德的躯体发射更多子弹，她注视着，由于震惊和悲痛，她呆住了。“这像他们正在举行一种典礼，一项仪式。”乌姆·杰哈德后来告诉我。

但是，那还不是射击的结束。一个以色列人跨过阿布·杰哈德的躯体，向落地窗帘喷射了两阵机枪连发子弹。他们可能推测在窗帘后面隐蔽着一名随身警卫，他可以发出警报，或者会使以色列人在他们能够逃跑之前受到拦截。（当他们进入这所住宅时，以色列人把主要的电话连接插头，从墙上的插座中拔出来了。看来他们准确地知道这个插座在那里。）在卧室里的第一阵机枪子弹的连发射击警醒了尼达尔。他尖叫起来。乌姆·杰哈德以为他遭到射击并正在死去。实际上子弹的确打进了离开尼达尔小摇床不到2英寸的墙上，发出重击声。这些以色列人随后转身离开卧室。当从阿布·杰哈德的尸体上越过往回走时，他又向尸体开了几枪。乌姆·杰哈德抗辩道：“够了，够了。”哈娜正站在楼梯平台上哭泣，一名以色列人对她说：“到你母亲那儿去。”

据乌姆·杰哈德和哈娜说，这四名以色列人在他们脸的下半部戴着外科手术用的防护面具。只有他们的眼睛是可见的。乌姆·杰哈德后来告诉我，暗杀者之一才20岁出头，这个人有亚麻色的、卷曲的短发。另一个年纪大得多，大概有五十来岁。乌姆·杰哈德说，这个人有白色或银灰色头发，部分秃顶。

这四名以色列人逃下楼去。速度是如此重要，他们来不及攫取堆放在阿布·杰哈德书桌上的文件，这些文件会具有重大的情报价值。离去的以色列人中有一人在他的慌乱中丢失了耳机。他是通过这耳机接受从那些正在指挥和协调这次行动的人用无线电发出的指示。乌姆·杰哈德跑向阳台。她后来说，她数一数有不少于20个以色列人从各个方向奔向他们的汽车。

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去时，乌姆·杰哈德搂着哈娜说：“在你一生中能有好几年时间去了解你的父亲，这是你特殊的荣幸。现在你必须想到千千万万巴勒斯坦儿童，他们从未享有过和他们的父亲相处在一起的欢乐。”

这不是什么秘密，阿布·杰哈德，这位热爱家庭生活的人，是一个轻松的、容易袭击的目标。比如，对许多访问过他的记者来说，这一点是明显的。当他和妻子及孩子们一起在家时，为什么他拒绝有随身警卫和枪枝围着他，这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他认为，向没有任何一种安全措施的广大巴勒斯坦人民表明，他正在分担着他们的生存的危险，这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他还想以实例表明，不管发生什么事，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过正常生活是可能的。这是最有效的方法，用以揭穿过去以色列人所断言的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的谎言。在这个程度上，可以说他拒绝接受较好的保卫措施是一种崇高而又天真的挑战姿态。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我曾几次向阿布·杰哈德建议，他必须受到更好的保卫，有一次，他说，他担心在家里有许多安全人员和武器围绕着他，将会对减少或者毁灭他的人性产生影响。

事实是杀害阿布·杰哈德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成大问题。对他们的真正的挑战是，进行袭击和随后逃跑而不留下证明他们身份的痕迹。就连以色列那

些对世界舆论不加考虑的领导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授权进行一项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得到证实，他们将会陷入麻烦。在军事行动术语中意味着，以色列人不堪负担同巴勒斯坦和突尼斯安全力量以武力解决。一个以色列人成为捕获物——活的或者死的——不能冒这个险。

结果，以色列的确未波发觉。它的领导人可以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暗杀阿布·杰哈德是以色列特务和军队干的。关于向新闻记者介绍这项使命的工作则留给非官方的和不知姓名的以色列代言人了。

但是，以色列领导人期望从杀害阿拉法特的二号人物中得到些什么呢？也许他们希望，阿布·杰哈德的死会深深地损害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并且有助于他们粉碎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精神。如果是这样，那么以色列领导人在自阿布·杰哈德和亚西尔·阿拉法特点燃“黑暗中的烛光”以来的30年中对巴勒斯坦人一无所知。

当我在事件后大约两个月同阿拉法特谈起阿布·杰哈德之死的问题时，他使我惊讶地这样说道：“这是我们的过错。”当我听到这位主席的谈话时，我确信他实际上是在责备他自己。他说，例如，他曾经多次对阿布·杰哈德说，他的家不安全，他必须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有时我对他大声叫嚷，”阿拉法特说。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提出，以色列人决心要杀害阿布·杰哈德，即使他得到更好保护，他们也会得逞的。阿拉法特对我在这种事情上的无知感到吃惊。“你错了，”他说，“我愿意给你讲一个故事，证明你是错了。”

阿拉法特的故事是关于在1973年4月以色列突击队在贝鲁特市中心暗杀两名黑九月组织领导人的事件。根据阿布·伊亚德对我的介绍，这些以色列人袭击阿拉法特在法赫凯尼的总部是一场佯攻。主要的目标是黑九月组织领导人就寝的住所。“事情并非如此，”阿拉法特说。“我是以色列那次行动的主要目标。从两架大型直升飞机上，他们使大约200名突击队员在离开我的办公处不到50米的地方着陆。我们是8个人。我本人和7名随身警卫。在理论上，我们没有取胜机会。我们用自动武器开火。这产生了两个结果。它扰乱了这些以色列人，致使他们拖延了突击。它还使人民民主阵线的一支部队的战士警觉，他们加入了战斗。这样给了我以逃脱的时间。”

阿拉法特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要旨是，如果阿布·杰哈德有足够的随身警卫去和这些以色列人交战并加以拦截，如果他的住宅处于不太暴露的位置——一所具有通过或者越过其他建筑物逃跑途径的住宅——他是能够逃脱的。我确信，阿拉法特认为阿布·杰哈德今天会仍然活着，如果他，阿拉法特，曾经以某种方法迫使他居住在一个有足够保护措施的安全的住所。（如果情况是这样，我推测以色列领导人不会授权这一暗杀。阿布·杰哈德被杀害，因为他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们在家里，是一个轻松的、容易袭击的目标。）

6月初，阿拉法特对在被占领土起义头半年中巴勒斯坦人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作出了巴解组织的估计。根据他的材料，有358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9800人受伤，还有3470人致残。受伤的大多数是以色列的枪弹的受害者。致残的大多数是以色列毒打下的受害者。当世界对以色列用枪击致死手段来对付扔石块的巴勒斯坦示威者表示愤慨时，拉宾告诉他的军队要更加强调毒打巴勒斯坦人。如同我们天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许多年轻的以色列士兵狂热地执行着他们的政治主子的命令。（巴解组织掌握的被杀害的巴勒斯坦示威者的数字比宣传的估计数字高出100多人。怎么解释这一差异？据巴解组织说，以色列人在可能情况下就抢走示威者的尸体，悄悄地把

他们埋掉——防止举行葬礼，葬礼会激发起对起义的更多的热情支持。）阿拉法特还声称，大约有 700 名巴勒斯坦妇女遭受流产的痛苦——他说，主要是以色列的“烟幕弹和毒气弹”造成的后果。他估计被逮捕和遭监禁的巴勒斯坦人数在 2 万。他说有 3700 所房屋被用甘油炸药炸毁。此外，阿拉法特声称，在几千公顷土地上的橄榄树由于“纵火焚烧、大肆砍伐和连根拔掉”而被毁坏。他指出，这些橄榄树中有一些已经生长 2000 多年。“某些以色列人对任何事情都不尊重，”阿拉法特说，“他们连树木都要反对。”在阿布·杰哈德被谋害前不久，他指示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以火还火”。这样，一些巴勒斯坦人就烧毁以色列的庄稼进行报复。

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以表明他们的论点，即现状不能再加维持了？各地的巴勒斯坦人都在问，他们现在是否能够期望美国会认真地和苏联人一起工作，以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谈判终止以色列占领 1967 年战争中夺得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和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此换取同在安全的和被承认的边界之内的以色列的和平。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本应该是肯定的。在 20 年中，世界舆论第一次在电视的特写镜头上亲自看到，为什么只要允许以色列无视联合国 242 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继续占领西岸和加沙，对这场冲突就不能有解决办法。

到 6 月，看来甚至连国务卿舒尔茨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在耶路撒冷公开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虽然他没有提到沙米尔的名字，可是当他进而说到那些不这样认为的人是“自欺欺人”的时候，他显然在心里想到以色列总理。但是，还有更多的。舒尔茨对在他的旅行中遇到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给予保证，美国现在决心终结以色列占领 1967 年战争中所夺得的所有阿拉伯领土。

当舒尔茨对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谈话的内容被传达到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同事时，他们推测这位国务卿正在损害巴解组织的情况下要弄花招。他们担心他给阿拉伯国家政府以引诱，使他们放弃对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支持。当时阿拉伯国家政府正考虑他们在 6 月 7 日开幕的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这次会议是应巴解组织的要求召开的，以便给阿拉伯国家政府一种机会，表达他们的对在被占领土起义的支持，并且就舒尔茨的努力，采取一种立场，用召开国际会议——沙米尔加以阻挠——来推动和平进程。）

阿拉法特认为舒尔茨仍试图把巴解组织排斥在和平进程之外，这有其本身的历史原因。

在伦敦，舒尔茨同侯赛因和撒切尔夫人有过一次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这位国务卿挑动这位国王鼓起勇气抛弃巴解组织，走向会议桌。舒尔茨说，这场起义使他信服，在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全部撤出以换取全面和平这件事上，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他准备向阿拉伯人保证，美国现在认真承诺这样一项政策——但是，他也必须是现实的。如果阿拉伯国家继续坚持巴解组织是谈判的一方，那么他或者任何未来的国务卿都没有办法能够向以色列说项。所以，一般就该由阿拉伯国家，特别是这位国王，抓住这一机会。这也许也是他们的最后机会。在美国的支持下，阿拉伯国家能够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代价是排斥巴解组织。根据我的消息来源，这位有礼貌的国王不得不竭力控制他的愤怒。他的回答

是，过去已有过好多多次他能够而且愿意做舒尔茨现在要求他做的事。但是，美国人从未给他足够的帮助，而现在已为时太晚。在这次谈话中，撒切尔夫人在这一点上站在侯赛因一边。她无所畏惧地正视舒尔茨并说：“国王陛下是对的。你正在要求他承诺政治自杀。”

舒尔茨离开了伦敦，他知道侯赛因不能也不愿意代表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除非阿拉伯首脑会议委托他这样做。为了寻找机会来确定这个阿拉伯人席位问题，舒尔茨需要莫斯科的帮助。他去对苏联人做工作。他的目的是要说服他们放弃他们坚持在国际会议上要由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舒尔茨的成功程度，反映在为里根—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高级会晤所准备的工作文件中。在他们的文件中，关于中东问题，美国人说，他们不赞成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因为它的出现“会导致其他方面（沙米尔的以色列）离开”。苏联人找到了一个滑头的方案，以便推卸责任，并使自己成为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一方。文件说他们的立场是，阿拉伯人应该决定谁将代表巴勒斯坦人。

据各方反映，舒尔茨对苏联人的立场没有太不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些回旋的余地。实际上，苏联人是在对他说：“不论阿拉伯人在他们的首脑会议上作出什么决定，我们保证赞同；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说服他们，把巴解组织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他们将更有所得，那么，我们也不反对。”这就为在乔治·舒尔茨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之间设置了一个力量较量的舞台——决定这两个人中谁将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有更大的影响。

舒尔茨决定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他询问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否会在6月6日接待他——阿拉伯首脑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这是一个许多人说是缺乏想象力的人的十分大胆的行动！）阿尔及利亚人对舒尔茨延迟答复，并把他的请求转给在突尼斯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去讨论，阿尔及利亚人不能不这样做。这个决定——要对舒尔茨在阿尔及尔的讲话表示赞成还是反对，把巴解组织从和平进程中排斥出去——是由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他们各自的首都作出；但是，政治上的暗斗却由他们的代表在阿盟总部秘密进竹。

那时我在突尼斯，从我所听到的看，事情很清楚，阿拉伯国家为犹豫不决遭受折磨。一方面有舒尔茨的保证，美国现在决心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242号决议，从它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舒尔茨看来是严肃的。因此，如果一项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定，委托侯赛因和非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人取代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去进行谈判，将有助于舒尔茨说话，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巴解组织将会被触怒，至少这样说，但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也许能够受到控制，如果舒尔茨不失时机地证明美国确实决心结束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的占领。结论是，如果对巴解组织参加和平进程说不，是使以色列人从被占领土走开的最好的或者唯一的办法，那么也许允许舒尔茨在阿尔及尔作他的宣传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阿拉伯国家真的要求巴解组织知趣地靠边，而随后，事情又很清楚，美国人或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说通以色列，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时，巴勒斯坦人将指责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再一次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这种指责将仓坚持，巴解组织会同各地的阿拉伯激进分子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采取共同行动；或早或迟，也许很快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正为他们的王冠和总统宝座而战斗。至于涉及自身利益，情况该是这样，重申阿拉伯国家对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承诺。如果这是首脑会议的结果，

那么允许舒尔茨有机会在阿尔及尔讲话就毫无意义。让他来发表一个要求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排斥巴解的戏剧性的呼吁，然后叫他见鬼去吧，这将是侮辱之外又加伤害。

当阿拉伯世界的各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在突尼斯的代表正在讨论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时，在巴解组织的难民营出现了高度的紧张。巴解组织的一些官员心事重重，担忧另一次阿拉伯国家的背叛正在形成。哈尼·哈桑告诉我，情况是“危急的”。只有阿拉法特看来泰然自若。但是，当阿拉法特得知阿萨德总统和侯赛因国王也是促成舒尔茨于6月6日去阿尔及尔的人时，即使是他也在担心，阿拉伯国家将向何处去。

我问哈拉德·哈桑，他认为阿萨德和侯赛因居心何在。他毫无疑问地认为，叙利亚确实不希望首脑会议再次确认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尽管阿萨德在阿布·杰哈德葬于在叙利亚首都的一个难民营之后，和阿拉法特明显地和好，他仍然希望拥有巴勒斯坦这张牌，并为他自己的利益玩弄它。他这个时刻的目的是帮助舒尔茨使巴解组织在首脑会议上边缘化。哈拉德和我谈论，由阿布·穆萨领导的受叙利亚控制的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者，向阿拉法特在贝鲁特的最后两个强有力的堡垒——沙蒂拉和布加尔-巴拉奈赫难民营——发起了一场进攻。有理由认为，这一阶段的“难民营战争”是为了分散阿拉法特对首脑会议前的政治活动的注意力而安排的。由于阿布·杰哈德的去世，叙利亚人大概以为他们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这位巴解组织主席的日子比平常更艰难。（阿拉法特推测，激化在黎巴嫩决斗局势的建议来自美国人——舒尔茨和他的顾问们。）关于侯赛因和他的动机，哈拉德说了这样的话：“他对这场起义及其有可能蔓延到约旦河东岸这点感到十分害怕。所以他还是坚持说没有巴解组织他将不采取行动；但是，在私下，他毫无疑问地希望这次首脑会议委托他这样做。”我对哈拉德提起，哈尼曾经告诉我，情况对巴解组织来说是“危急的”，我问他是否同意他的弟弟的估价。“嗯，同意。”哈拉德怀着强烈的感情回答道：“你可以说这是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而无需担心反驳。”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情况之后，我问，阿拉伯政府在这次首脑会议上将被引向赞同舒尔茨而反对巴解组织，真的有这种可能吗？当哈拉德回答的时候，我认为，在他的声音中正有着一种失望的暗示。“你问了一个我设法回答的问题。在此时刻，我甚至不能确定阿拉伯领导人他们自己是否知道最好做些什么才能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以后，那是阿拉法特采取了他的行动。那时，他的多数高级领导同事们都觉察到，他已离开突尼斯，他在阿尔及利亚。当他回到突尼斯时，阿尔及利亚人在几个小时后曾通知舒尔茨，欢迎他在6月10日到阿尔及尔——当时这次阿拉伯首脑会议已经结束。在幕后那些指望舒尔茨干预的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国王，特别是阿萨德总统——大为恼怒。但是，他们必须被看作是阿拉伯意见一致的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原先就曾公开宣布，除非团结在会前得到保证，否则他将不参加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首脑会议。我不了解阿拉法特对阿尔及利亚人，并通过他们对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说了些什么。他可能威胁，如果舒尔茨被允许在6月6日出现在阿尔及尔并讲话，他将不出席这次首脑会议。没有阿拉法特意味着没有首脑会议；那不是这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得以生存的一种形势。在最后时刻作出取消这次首脑会议的决定，将使它们面临奚落和受辱的新的危险处境。

阿拉法特在这次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和舒尔茨的失败），在它通过的各项决议得到确认。他们重申对召开一项国际和平会议的承诺，“这个国际和平会议将有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在这一地区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参加，它处在平等的地位，拥有像其他各方一样的同等权利。”同时还确认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国这种形式的巴勒斯坦自决权的承诺。阿拉法特得到了几乎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继续进行在被占领土上这场起义的上亿美元的保证。确实，他事实上没有得到如他所希望的那么多的钱——他必须解决一笔立刻要付清的款项1,28 万美元和承诺每月大约 4000 万美元的经常费用。但是，他也准备承认这一现实，即使是海湾国家，相对地说，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趋势正面临着困难时期。（阿拉法特本人估计，巴解组织每天要花去 300 万美元，以维持公民的不服从运动，这将成为这场起义的第二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阿拉伯首脑会议关于国际会议进行谈判的决议，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如阿拉法特早在 1986 年准备以巴解组织名义作出的声明那么明确。1988 年在阿尔及尔，如同我们在上面曾经看到的那样，阿拉伯国家讲到的谈判包括“在这一地区冲突的所有各方”。按照明显的含义“所有”各方包括以色列，但是没有提以色列的名字。如前所述，作为对美国承认巴解组织的回报，阿拉法特准备发表一个和所有各方“包括以色列政府”谈判的声明。这里无疑是更多的证实，阿拉法特将是第一个跨越巴解组织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红线的人——要是有美国人，或者最好还有以色列人，准备做同样事情来酬谢阿拉法特就好……像联合国 242 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以承认巴勒斯坦的自决权来换取巴解组织时以色列的承认。

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之后不久，我和哈尼通了电话。我说，“我想你很高兴。”

他轻声笑笑并说，“就这一次以色列算是弄对了。”

我问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在看一份以色列的报纸，让我给你念念标题。它说：

‘扔石头的孩子们已经使阿拉法特成为这次首脑会议的新娘。’”

我说，美国人如果对待和平的态度是认真的，将不得不接受巴解组织作为谈判的一方。我认为，时机正在到来，一定要到来的。我问哈尼，他是否是乐观的。”

他答道，“只要我们活着，我是乐观的。”

“你的意思是假如以色列人不杀死阿拉法特。”

“如果他们不杀死我们两人。”阿拉法特的首席顾问继续说，有人已经警告他，他必须将这件事严肃对待，对他来说去西欧旅行已不再是安全的了。（警告哈尼现在应该把他自己看成是莫萨德黑名单上的人，大概是由西欧情报机构转达给他的。他们，或者无宁说他们的政治主人，没有兴趣看到在巴解组织方面谋求和平的人物被消灭。巴解组织的高级人物从这些来源得到此类警告这不是第一次。）

阿萨德对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取得的政治胜利的反应是迅速的和在意料之中的。这位叙利亚领导人，在他回到大马士革时就命令他的将军们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利用阿布·穆萨和他的巴勒斯坦不同政见者们作为他们的掩护，消灭巴解组织在沙蒂拉和布加尔—巴拉奈赫难民营的军事存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主要盟友，什叶派阿迈勒民兵，以前曾有 3 年时间包

围了这些难民营。在这 8 年中，这两个难民营对那里的平民居民来说变成了人间的活地狱。那些战争中的幸存者被迫吃老鼠。当被占领土的这场起义开始时，包围撤除了。阿迈勒的领导人说，他们正在结束包围作为对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们一种团结的表示。但是，这是一种借口用以解释阿迈勒扑灭在这些难民营里的抵抗精神的失败。当这次包围被撤除时，大多数幸存的和非武装的难民离开了这些难民营。在阿萨德决定消灭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的一个月之内，防卫力量——忠于阿拉法特的分子——投降并被撤到西顿。在为夺取这两个难民营所在的阵地的最后一轮战斗中，多数西方记者像以往一样满足于传播虚构新闻，说这场战斗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派别和另一个派别之间进行的。这与事实大相径庭。虽然，阿布·穆萨和他的巴勒斯坦的不同意见者名义上投入了进攻，但是，叙利亚的火力猛烈——从在叙利亚控制的西贝鲁特的叙利亚战线的后方发射来的——迫使巴解组织的防御战士投降……以便生存下来有朝一日在另外的地方继续进行战斗。阿布·穆萨和他的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者自称赢得了胜利，但是，没有叙利亚军事支持和利比亚金钱资助，他们一文不值。据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同事们说，阿布·穆萨知道，当他对叙利亚人不再有用处时，他们就会杀死他。

当然，阿萨德的策划有比报仇更多的用意。他决定结束巴解组织在贝鲁特的军事存在是一项战略的组成部分，用以先发制人，制止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以色列—叙利亚关于如何使黎巴嫩稳定的一项秘密谅解的挑战。美国和以色列决心继续保持基督教徒掌权——尽管穆斯林是大多数。阿萨德准备对此同意并且再一次干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干的肮脏勾当，只要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允许他在黎巴嫩插手。在以色列这方，它准备让阿萨德在他所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多少于他所想干的事——只要他不越过以色列人为他划下的红线。巴解组织的一位官员绝妙地概括了阿萨德的虚伪，他说：“当权利亚说‘是，是，是’的时候，它总是要我们对英国人说‘不，不，不’。”

沙蒂拉和布加尔—巴拉奈赫两个难民营的丢失，总的来说对巴解组织，特别是对阿拉法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局势可能更坏。阿萨德正企图采取进一步行动，在阿拉法特在黎巴嫩的最后一个军事堡垒西顿地区，粉碎巴解组织。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心中有数，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的空中轰炸削弱难民营和巴解组织的阵地，然后，在一个短暂的但是装装样子的间隙之后，在叙利亚的猛烈的火力支持下，阿布·穆萨的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者，发动地面进攻。贯穿叙利亚、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的思维逻辑是不难把握的。在其他前线国家——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巴解组织不能建立一种军事存在，除非首先出现政府政策的一种根本的改变，或者出现政权的更迭。因此，如果巴解组织最终在黎巴嫩被消灭，阿拉法特将无法在决斗中依靠军事手段来影响局势，后果是他将在自己的许多人民中大大地失去信任。阿萨德那时就将处在比以往更好的地位，用一个栖身在大马上革的傀儡组织来取代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而那些最热衷于把权威的巴解组织排斥在和平进程之外的国家（美国、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就可以在真正的巴解组织和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之间打进楔子。那时也许有可能说服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如他们放弃所坚持的唯有巴解组织代表他们进行谈判的主张，会大有所得而一无所失。用另一种方式来说……美国、以色列、叙利亚和约旦的政策制定者们的希望是，在黎巴嫩反对巴解组织的最后一次进攻，将抵销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曾经取得的成果。如

果这个目的达到了，舒尔茨可促使以色列人认真对待以土地换取和平的谈判，而不会激怒在美国的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因为他将不要求以色列去和巴解组织打交道，或者承认巴勒斯坦的自决权。

这是些危急的日子。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代表的所有东西，再次受到威胁。

但是，在黎巴嫩反对巴解组织的这场最后进攻没有实现。当阿萨德和他的巴勒斯坦代理人正为此进行准备的时候，阿拉法特和他领导机构的同事们向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送去了一个悄悄的但是戏剧性的信息。如果这项进攻发生，在西顿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巴解组织的防御战士们将誓死战斗到底。他们别无选择。那将是一场大屠杀。阿拉伯领导人是要用他们的沉默来鼓励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另一次大屠杀，还是他们要说服阿萨德放弃在黎巴嫩和巴解组织的最后摊牌？对巴解组织这一既是呼救信号又是挑战的信息的反应是，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确实向阿萨德总统施加了压力。根据我来自巴解组织方面的消息，即使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这次也在幕后发挥了一种积极作用。多年来，卡扎菲和阿萨德实际上是这一地区阿拉伯方面的真正的恐怖首领。在遵循他们结伙的条件下，利比亚出钱资助和叙利亚直接指挥那些激进的和极端主义的巴勒斯坦的团体。这些团体采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反对、诋毁和破坏阿拉法特的政治行动和和解政策。从 1983 年以来，卡扎菲就一直在财政上资助阿布·穆萨和法塔赫的持不同意见者。因此，当卡扎菲说，他将采取他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来反对任何想在西顿消灭巴解组织的企图时，这对他们和他们的叙利亚操纵者必定是一次震动。面对卡扎菲的亲阿拉法特立场和来自多数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压力，阿萨德断定，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使人看到他正在为美国和以色列干更多的肮脏勾当。他处于太孤立的危险境地。他和阿拉法特未完成的交易必须等待。

7 月 18 日，这位叙利亚总统知道他已经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一天正是伊朗宣布它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接受安理会 598 号决议作为和伊拉克谈判结束战争的基础。（伊朗的在病中的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说，同意和他憎恨的敌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言和就“像在服毒”。）海湾战争趋于结束，这将使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回到它在中东议事日程上居首位的恰当的地位，而对所有各方——阿拉伯、以色列和它们各自的同盟者和朋友来说，其含义实在是深刻的。但是，就在这短时期来说，对此最忧心忡忡的是阿萨德本人，特别是如果萨达姆·侯赛因从海湾战争中作为遏制阿亚图拉们的阿拉伯英雄出现。一般来说其他的阿拉伯人，特别是伊拉克人，将不会饶恕他支持伊朗所作的战争努力。当你再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即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早在叙利亚成为伊朗的同盟者之前就已经是竞敌和仇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叙利亚领导人在想到过去的时候，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如果他继续扮演这种破坏角色，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带领下将转而反对他，这不是说说而已。我的猜想是，阿萨德要避免给自己找麻烦，就只能像在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所反映的阿拉伯国家一致同意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这就尤其要求和阿拉法特一起工作而不是反对他。（由于美苏关系的改善，阿萨德得益减少。美国总想把苏联排斥在和平进程之外，叙利亚总统能够采取玩弄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办法，为他自己在困境中赢得耍弄花招的特别机会。但是，如同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他也被双方所利用。对美国人来说，他的主要作用是遏制巴解组织，并且在通常

的情况下，使阿拉法特的日子尽可能难过。对苏联人来说，他的主要作用是破坏任何允许以莫斯科为牺牲而使美国得利的和平行动，以换取苏联武器和外交的支持。随着美苏关系的改善，留给阿萨德的牌少多了。苏联人不再像他们需要他们那样地需要他了，而且，如果他不能去于美国人的肮脏勾当——因为挑起他的阿拉伯兄弟之间的敌对仇视，其后果他是担当不起的——他对华盛顿将不再有很多用处了。到 10 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也许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作了几个月的努力来说服阿萨德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把一个美国挑选的一个总统强加给黎巴嫩来接替阿明·杰马耶勒。阿萨德不能为他的美国朋友出力。）

当阿拉法特想到阿萨德在伊朗决定和伊拉克谋求和平后的尴尬处境时，他有理由希望叙利亚对巴解组织生存的威胁已被一劳永逸地得到遏制。但是，他就要在另外一条也许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战线受到挑战。

在 7 月底，侯赛因国王宣布他正在切断约旦同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在法律上和行政上的关系。这一地区的发展计划被停止；西岸议员在 60 个席位中占有一半的下议院被解散了；在约旦人统治——巴勒斯坦人说是“占领”——这一地区时创建的几千个文职人员职务被废弃。（虽然以色列通过它的军事占领当局管理西岸，它还愿意让约旦继续对许多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和宗教机构，进行日常的管理。由于这些职务被废除而使这些人工资和薪水无着，必然增加西岸人的经济困难，除非或者直到巴解组织能够找到一个代替的办法。）

在侯赛因发表戏剧性的和出乎意料的宣告以后的日子里，其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在各方面都有许多猜测。就“约旦不是巴勒斯坦”这一口号而言，侯赛因本人说他的作为是出于对巴解组织的尊重，并承认最终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我们尊重巴解组织——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愿望，脱离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基于这些，看来约旦实际上是在放弃它对西岸的要求。如果是这样，在原则上这是巴解组织的一项巨大收获。

但是，在这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双方的政治行动，不是，几乎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侯赛因的撤出明显地暗含着一种设想，巴解组织是准备、愿意并且能够担负起管理和解放以色列占领的西岸的责任的。这种暗含的意义的附带条件可能是难人的问题——或者阿拉法特和他的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们担心如此。巴解组织不仅已准备好并且愿意接受管理西岸和同所有各方包括以色列政府，谈判以土地换取和平的挑战。但是，它能够这样做吗？

如同以往一样，问题是以色列不会允许巴解组织在被占领土内或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任何作用。（拉宾很快宣布，以色列决不会允许巴解组织填补由约旦留下的真空。而以色列的极右派的代表则要求正式吞并西岸。）在这背景下，侯赛因的作为实际上对巴解组织来说有一种威胁的意义。阿拉法特的许多同事和支持者担心，他们眼看另一个战略又要把巴解组织从中东事务中排挤出去的先头行动。如果以色列否决美国政策，把巴解组织关在和平进程之外，如果以色列的军事反对派阻止巴解组织宣称经营和管理两岸，那么在西岸的大量巴勒斯坦人可能最终在失望中得出结论，当他们同约旦保持关系时，相对来说，他们生活还较好一些，那是侯赛因而不是巴解组织能较多地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处境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将导致巴勒斯坦方面分裂的加深。约旦、叙利亚、以色列、美国及其他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分裂声称，巴解组织不应再被看作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因

而它可以平安地被排斥在和平进程之外。如果这样，美国和苏联也许会召开一项没有巴解组织的国际会议。被分裂的巴勒斯坦人那时将被要求去接受从以色列餐桌上掉下的碎屑。

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心目中，有两件事使他们对侯赛因实际上在为巴解组织设置陷阱加重了忧虑。特别在阿尔及尔，这位国王曾说，阿拉伯首脑会议的一项决议赞同巴解组织以它自己作为代表的身份进行谈判的权利，也许意味着“一项国际会议将永远不会举行”。虽然侯赛因是在强烈攻击美国的情况下发表这一言论的——他说美国除了对以色列支持之外，没有中东政策——它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似乎他正在为未来设置一个指示器。如同许多巴勒斯坦人所阐明的那样，他向首脑会议发出的真正的信息是：“委托巴解组织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谈判没有意义，因为以色列，还有美国，将永远不会同意和它打交道。然而为了阿拉伯的团结，而且由于我为这场起义感到惊恐，我准备接受这次首脑会议的决议。但是，我也要警告你们，我的阿拉伯兄弟们。你们当中那些坚持只有巴解组织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谈判的人，我们阿拉伯人发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不现实的。当你们发现我是正确的时候，我愿意准备领导为结束以色列占领而进行的这场谈判——但是，为了实现这点，我和巴勒斯坦人所作出的任何和解将按照我的条件。”巴勒斯坦人对侯赛因的动机更为忧虑的第二件事是，在他宣布约旦决定割断它和西岸的关系之前，他没有和巴解组织磋商。许多巴勒斯坦人感到，如果这位国王的真正目的是向巴解组织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他会事先和阿拉法特讨论他的行动，以便给巴解组织以时间来制定一项利用这一新形势的战略。

依我看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十分怀疑，当他发表他的宣告时，侯赛因真的在希望巴解组织无法进行拯救，而有朝一日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会要求他来收拾这个破碎局势。但是，我认为侯赛因为了一个理由而且是仅仅一个理由，做了他所要做的事——保卫他王国所留下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同时保证他的哈希姆王朝的生存。我认为，他为美国继续拒绝要求以色列认真对待和平感到厌恶，他害怕如果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继续或多或少把他看成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走狗，这场起义将会蔓延到约旦河东岸。简言之，这位国王正受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损害，他对此感到厌倦。他也知道，在美国和西欧有人支持这种观点，应鼓励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或者两者，促使约旦不稳定——把约旦变成巴勒斯坦，让以色列占有西岸。如同侯赛因听十分了解的那样，那些在幕后鼓吹这样一种政策的外交家和其他人士认为，这会免去他们和他们的政府在同以色列及其各地强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摊牌时的极度痛苦。政治上的权宜之计长命不衰。从前犹太人是可牺牲的。然后，轮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明天，哈希姆家族……？他们的国王说不。（正如我以前所介绍过的，这从来不是一个秘密，以色列的沙龙将军——如果在贝鲁特成功地消灭巴解组织——接着则要动摇约旦，推翻这位国王，并告诉巴勒斯坦人：“那就是你们的家园。拿去吧，欢迎。”）在1988年7月底，侯赛因的许多忧虑之一是，在以色列的11月大选中，为利库德集团取得的一次胜利，将会给沙龙再一次尝试的机会。）

面对这种情况，侯赛因正在告诉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们，他们不再有选择。如果他们要结束这场起义并走向和平，他们将不得不接受巴解组织作为进行谈判的一方。

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领导成员在11月中回答了侯赛因的挑

战。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他们宣布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他们通过了一项斩的政策声明，含蓄地但毫无疑义地承认这个在 1967 年战争前夕在其边界之内的犹太国。这一含蓄的但毫无疑义的承认，是通过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接受联合国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作为国际会议谈判基础这一事实表达的。他们重申巴解组织以前的声明，抛弃——并且谴责——恐怖主义。阿拉法特还为在他认为时机合适的时候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开了绿灯。

这项单方面的独立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戏剧性效果，给予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那些在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以新的希望。这次以色列大选的后果有两件事是明显的。一件事是沙米尔先生会继续担任总理。另一件事是沙米尔、沙龙和其他以色列强硬路线者决心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来扑灭这场起义。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正希望这项独立宣言会增长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志气，会激励他们在这场预料中的以色列大屠杀到来时坚持他们的抵抗。虽然侯赛因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对西岸的要求，并已发誓他将决不再屈从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来代表巴勒斯坦人，这项独立宣言也被看作是防止这位国王改变他的主意的一种手段。

但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出的一项最重要的信息是寄给当选总统布什和那个已被提名担任他的国务卿的人，詹姆斯·贝克的。通过表明他们接受联合国 242 号和 338 号决议作为在国际会议上谈判基础的意愿，通过重申巴解组织以前谴责和抛弃恐怖主义的声明，大多数巴勒斯坦领导人和其他组成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代表们，实际上是在讲以下的话：“在谈判之先，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我们所能走到的边远极限，来表示我们同犹太国言和的意愿，我们已经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人民对谈判承担责任，这种谈判将给予犹太国以它所寻求的承认、合法性和安全——以此换取在不到 25% 的我们合法所有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小的巴勒斯坦国。我们巴勒斯坦人已经赢得在国际会议上拥有一席的权利，而这不是由其他方面来决定谁将是我们的代表。现在该轮到美国来做一切必要的事情，要求以色列认真对待和平。”舒尔茨，这位即将离任的国务卿，对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出的信号的反应是，拒绝发给阿拉法特签证，以允许他在纽约的联合国全体大会发表演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拒绝给予阿拉法特发言机会的图谋感到义愤。联合国全体大会被移到日内瓦举行，以允许这位主席在那儿发表演说。

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高层同事们对我说，对从布什政府那里获得一个较为积极的反应，他们并不完全感到悲观，但是，像他们在 1988 年 11 月中所具有的那种乐观，已被一个很大的忧虑蒙上了阴影……以色列特务将受权暗杀阿拉法特以在巴勒斯坦方面制造混乱——如果出现这种迹象，美国准备接受巴解组织作为谈判一方，并准备好压以色列做同样事情。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所有阿拉法特的高层领导成员中的同事和许多其他巴勒斯坦人都向我表示了这种忧虑。如果情况是这样。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唯一的这样一位领袖，他可以在以色列似乎比以往更决心要用武力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使通向和解的大门继续敞开，那么，他的被暗杀将有效地破坏在阿拉伯方面谋求和平的前景。许多巴勒斯坦人说，而这正是为什么沙米尔先生和以色列其他领导人可能很好地得出结论，鼓励暗杀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符合他们的利益。

跋

亚西尔·阿拉法特毫无疑问是国际政治中的霍迪尼。但是，他毕竟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幸存者吧？在和以色列对抗 40 年之后——其中 20 年作为巴解组织主席和它的军事力量的总司令——他没有解放国土；他丢失了在阿拉伯前线国家的阵地，其中有一些丢给了以色列；在许多方面巴勒斯坦难民的处境比过去更坏了。难道不能说，阿拉法特，这位解放运动的领袖，对他的人民来说标志着巨大失败和深重的灾难吗？

认为阿拉法特在 40 年的斗争中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显示的这种观点，是受到那些在北美和西欧的主要报纸和刊物上写社论专栏和为这些报纸和刊物写通讯的多数人的赞同的。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种结论更多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意算盘的宣传的回响，而不是对事物客观思考的产物。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实际上正在走向高潮，重要之点不在于阿拉法特迄今没有解放甚至一平方公里的领土。重要之点是他唤醒和领导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而且因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现在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大多数以色列人准备承认巴勒斯坦对自决要求的合法性，可能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假如理智被允许在犹太国占上风。（两者之中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如同我在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是对这一地区，对各地犹太人，或许对这个世界爆发一场巨大灾难性的后果。）一些以色列人也许要使阿拉法特本人活不到那么长久以亲眼目睹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诞生，但是，他们否定不了他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

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准确评价阿拉法特，仍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如果他们充分考虑到形势对他不利，他们也许会很好地推崇他为巴勒斯坦的大卫，他成功地对抗了以色列的歌利亚。他们是在言过其实地进行立论吗？我想不是。本书试图表明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孤独的。按照国际强权政治的准则，他们的解放斗争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当以色列牺牲巴勒斯坦人确立自己的时候，当时的大国所持的看法是，为纠正对巴勒斯坦人所作的错误行为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既成事实挑战，不是他们所想从事的光明正大行动。封闭巴勒斯坦案卷的办法，符合所有有关各方最佳利益，包括阿拉伯各国政权，当然不包括巴勒斯坦人。实际上，使这个案卷被封闭的绿灯已向以色列开放了。我们曾看到，以色列，这一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采用了两个主要的战略。两者都依靠使用残忍的武力来解决一项政治问题。从一开始，以色列的政策是要惩罚阿拉伯前线国家，借口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了打了就跑的袭击。但是，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不只是惩罚。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迫使阿拉伯前线国家的政权为它们自己采取一切必须采取的行动，来阻止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当这项政策主要由于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和其他人不断地机智战胜各个阿拉伯情报机构而遭到失败时，以色列决定它自己来干这件事。但是，它没有成功。到贝京先生执掌政权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个精灵存在着，并且充满活力。因此，它必须被遏制，并且，如果可能，就必须被消灭。正是这一逻辑，使沙龙和被称为以色列国防部的全部力量从头到尾在 1982 年夏天侵入贝鲁特。随后的多少日子里，西方和东方的大国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制止以色列的屠杀。在以色列入侵之前，阿拉伯领导人（和苏联人）知道这种入侵迫在眉睫，他们拒绝卖给巴解组织以反坦克和其他武

器，以便在以色列入侵时减缓他们进攻的速度。后来在很长很长时间内，在沙龙图谋以军事手段最终解决巴解组织的问题时，同样是这些阿拉伯领导人安然坐视不动……在这种形势下，竟然出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难道不是非凡的，甚至令人惊异的吗？

没有阿拉法特能出现这种情况吗？总的说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位我所了解、喜欢和钦佩的阿拉法特，既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又是一位奇才。按照我的判断是，如果他不存在，他不是巴勒斯坦人能虚构出来的那种领袖，没有阿拉法特所给予的激励和实际的领导，我不相信巴勒斯坦人今天会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对于要求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小的国家的形式，至少获得一定程度的公正对待。我非常怀疑，没有阿拉法特，阿拉伯国家会有可能夺得巴勒斯坦这张牌，然后利用他们的影响来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这个犹太国和它的美国盟友准备给他们的从以色列餐桌上抹下来随随便便什么样的面包碎屑。从这点上可以说，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斗争（还有和平进程）的最伟大贡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坚持巴勒斯坦决策的独立性，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执性，甚至不惜同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想占有并玩弄巴勒斯坦牌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对抗，突出了这位人物的智慧。阿拉法特比其他任何人更加了解，他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包括他在领导成员中的同事，会拒绝同以色列和解的主张，如果这项和解的决定不是由巴勒斯坦人他们自己作出的。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发现他根本不是一个强烈的独立民族主义者，他在他所真正认为对巴勒斯坦人民说来是最适合的基础上提出这些难以想象的让步，那么，阿拉法特就不可能向他的人民宣传这种和解的主张。如果他曾被看作是阿拉伯国家政府的一名代理人或傀儡，坚持和解以维护他们的利益而牺牲巴勒斯坦人，那就会无人听信于他，他大概也已经被暗杀掉了。

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内部，对阿拉法特的主要批评是关于他的领导作风。他的许多同事说，他是一位独裁者，更甚于一位民主主义者。如果提出这项指责的那些人的真实含意是，阿拉法特在提出重要政策建议时不跟他们商量，而嘲笑集体决策……好吧，他们有道理。但是，我愿用辩论证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和平）事业直到今天由于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断而得到很好对待。这项论点的许多例证中最好的一个或许是 1982 年 9 月所发生的事情，当时阿拉法特由于他和埃及总统言归于好而激怒了领导成员中他的同事们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如同我们所曾经看到的那样，这是一桩妙举，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在他们在黎巴嫩失败和被逐出之后，避免被撇在阿拉伯政治活动界线之外。阿拉法特在他对开罗戏剧性的访问之前，没有和他的领导集团的同事们商量，因为他担心关于时机甚至关于提出的访问是否明智的内部分歧，会迫使他放弃或者至少延宕他采取主动。由于巴解组织未来安危未定，阿拉法特不想冒险让集体领导施展策略，当他有机会扭转同他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对手的不利形势使之转败为胜。有人称阿拉法特的独裁倾向也可能是坚定的、正确的、有时真正激动人心的领导，事实不是这样吗？

在巴勒斯坦决策的最高层，那种认为阿拉法特是一个独裁者更甚于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人的指责，是经不起严肃的检查的。当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开会决定巴解组织的政策时，即使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也必须接受多数的观点。这是真的，他在过去曾经以威胁辞职来影响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任何东西阻止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诱使他摊牌——除非，或许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他将无法工作。

然而，阿拉法特的领导作风，对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事业来说，不是没有大的风险的。因为这实际上使巴解组织（虽然不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处于一种个人表现的境地，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断要求巴勒斯坦人把一切赌注都下在他的幸存上。如果在多次杀害他的阴谋中有一次曾经得逞，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可能会出现一种领导危机，并且或许是一场流血的权力之争——这场战斗会延续到巴解组织自己毁灭自己，或者，最小限度，失去全部信任。简言之，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事业会遭受一次致命打击。阿拉法特的多数高级同事们赞同集体领导的主张，它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样一场灾难发生的危险。他们认为，在一个个人的幸存上投资那么多是愚蠢的。在理论上，他们大概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他们则是错误的。集体领导是一个需要亲西方、亲苏联和强烈独立人格的混合，它是一个难于当机立断的机构。因而，这是为什么阿拉法特要强加他的意志的原因。

我在导言中曾经说过，这本书所必需讲的真情引出一个结论：在双方政治上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没有一个阿拉伯或犹太领导人比亚西尔·阿拉法特做出更多事情以准备条件全面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支持这项结论的证据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阿拉法特冒着各种风险，既有他的声誉，又有他的生命，来劝说他的绝大多数人民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这个在巴勒斯坦方面的最高决策机构——对以色列的存在这一现实作出让步。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巴勒斯坦方面，经过许多内心反省的结果，（和由阿拉法特所作的大量推动工作）形成了一个实现和平的方案，其基础是巴勒斯坦承认在多少是1967年前边界之内的犹太国，换取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自决权，这种自决权要在以色列撤出后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的一个小的巴勒斯坦国内行使，这种谋求和解的方式在1979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得到批准时，就成为正式的巴解组织的政策。

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是，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曾有这种勇气去进行一种同洋的努力——劝说他的或者她的人民，为了换取和平，他们必须准备接受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个现实和它合法的自决要求。

忠实地查验一下纪录，公开地在过去10年来，私下地那就是在更长的时间内，阿拉法特一直发出信号，他准备好和犹太国进行认真的政治交易。从1988年的后期的前景来看，我的总的结论是，没有从以色列来的一项积极的响应，没有他能做的更多事情来推进和平进程。即使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方面的奇迹创造者，也无法做到给以色列它所企求的正式承认和合法性，而得不到一些具体的东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自决权的承认——作为回报。我自己的印象是，各地的易达到多数的犹太人会赞同和巴解组织谈判，如果他们了解巴解组织的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他真正主张什么，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以真正和平的名义向他们奉献什么。因而，这是我为什么要向我的许多以色列和其他犹太朋友们献上这本书的原因。

巴勒斯坦领导人和组织

下列巴勒斯坦领导人和组织名单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识别在本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些著名人物和组织。它绝不意味着是一张所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和组织的综合名单。

领导人

阿布·阿迪卜（AbuAdeeb）：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科威特首席代表，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毕生朋友，巴解组织的高级领导人。

阿布·阿马尔/亚西尔·阿拉法特（AbuAmar/YasserArafat）：与阿布·杰哈德一起是 1957 年建立的法塔赫第一个小组的共同创始人。1969 年以来一直担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阿布·达乌德（AbuDaoud）：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司令，直至 1971 年内战第二阶段以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这个国家被逐出为止。法塔赫高级官员。

乔治·哈巴什（GeorgeHabash）：与瓦迪·哈达德及其他人一起，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一名创始成员，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

哈尼·哈桑（HaniHassan）：60 年代早期是在欧洲的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领导人。随后任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主席。他领导了他自己的在德国的地下突击队小组，并在 1963 年加入了法塔赫。现在他是阿拉法特日常政治事务的首席顾问。

哈拉德·哈桑/阿布·萨耶德（KhaladHassan/AbuSa'ed）：1963 年以来的法塔赫成员。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重要的巡回大使，一位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

阿布·伊亚德（AbuIyad）：阿拉法特最老的朋友，1963 年以来的法塔赫成员。黑九月恐怖主义者的精神教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全和反情报机构执行负责人。

艾哈迈德·贾布利勒（AhmadJabril）：作为一名叙利亚军事情报局代理人，在 60 年代早期为巴勒斯坦人地下组织的成员。从那时起，他一直为叙利亚军事情报局服务。他曾是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领导人，这一组织在 1967 年合并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贾布利勒在 1969 年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分裂出去，建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总指挥部，一个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的反阿拉法特的小派别。

阿布·杰哈德/哈利勒·瓦齐尔（AbuJihad/KhalilWa-zir）：同阿拉法特一起，是 1957 年建立的第一个法塔赫小组的共同创始人，担任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副总司令。

乌姆·杰哈德/英蒂莎·瓦齐尔（UmJihad/IntissarWa-zir）：阿布·杰哈德的妻子，他多年来的秘密助手。她在 1965 年一个时期，任法塔赫第一任参谋长和军事行动协调者。

阿布·卢图夫（AbuLutuf）：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正式外交部长。

哈迈德·阿布·西塔（HammadAbuSitar）：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独立委员，日常处理在约旦和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政

现在同时为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总司令。1989 年 4 月任巴勒斯坦国总统。——译注

他于 1988 年 4 月 16 日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人暗杀。——译注

治事务的负责人。

阿布·约瑟夫 (AbuYousoff) : 1965 年法塔赫第一位军事司令, 黑九月组织领导人。他于 1973 年在贝鲁特被以色列人暗杀。

组织

暴风部队 (Assifa) : 法塔赫用暴风部队这一名称在 1964 年发动了它的第一次军事行动。

黑九月组织 (BlackSeptemberOrganization) : 1970 年至 1974 年期间法塔赫内部的一个组织。它起名于 1970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镇压后的一个月。它在 1971 年 11 月开始它的行动。当时它宣称对约旦首相兼国防部长瓦斯费·塔尔 (WasfiTal) 在开罗遭暗杀负责。它的领导人是阿布·约瑟夫 (AbuYousoff), 卡迈勒·阿德万 (KamalAdwan) 和阿布·哈桑·萨拉梅赫 (AbuHassansalameh)。他们三人都是阿布·伊亚德的亲密同事。

法塔赫 (Fatah) : 组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解放组织。从 1957 年到 1965 年, 它是一个秘密的地下小组的组织网。这个地下组织网的创始领导人是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齐尔 (阿布·杰哈德)。法塔赫在 1963 年成为一个具有中央委员会的行使职责的组织, 1965 年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法塔赫在 1969 年掌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 (Fedayeen) : 巴勒斯坦突击队员。

人民民主阵线, 简称民阵 (PopularDemosraticFront,P.D.F.) : 由纳瓦夫·哈瓦特迈赫 (NawefHawatmeh) 领导。当哈瓦特迈赫和他的支持者于 1969 年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分离出去时形成。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简称人阵 (PopularFrontfortheLiberationofPalestine,P.F.L.P.) : 由乔治·哈巴什 (Geor-geHabash) 所领导。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 总指挥部, 简称人阵 - 总指 (PopularFrontfortheLiberationofPalestineGeneralCommand,P.F.L.P.G.c.) : 一个由艾哈迈德·贾布利勒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反阿拉法特的派别, 在贾布利勒在 1969 年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分离出去时形成。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 简称巴解阵 (PalestineLiberationFront,P.L.F.) : 由艾哈迈德·贾布利勒领导, 于 1961 年建立, 作为一个为叙利亚人收集情报的组织。它在 1967 年合并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简称巴解组织 (PalestineLiberationOrganization,P.L.O.) : 1964 年建立, 由艾哈迈德·舒凯里 (AhmadShuqairi) 任主席, 最初仅打算作为阿拉伯政权的一个傀儡。1969 年由阿拉法特和法塔赫掌管时, 它变成为一个多少是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解放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由许多组织组成——主要的是八个组织。法塔赫是其中突出的最大和最有影响的组织。其他组织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民民主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 总指挥部。另外两个在本书中未曾提到它们名字的重要组织是叙利亚支持的闪电 (Saiqa) 和伊拉克赞助的阿拉伯解放阵线, 简称阿解阵 (ArabLiberationFront,A.L.F.)。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PalestineNationalCongress,P.N.C.)。巴勒斯坦人民最高决策机构, 实际上是他们的流亡议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它负责。

